

老闻事

# 台前幕后

——我的亲历实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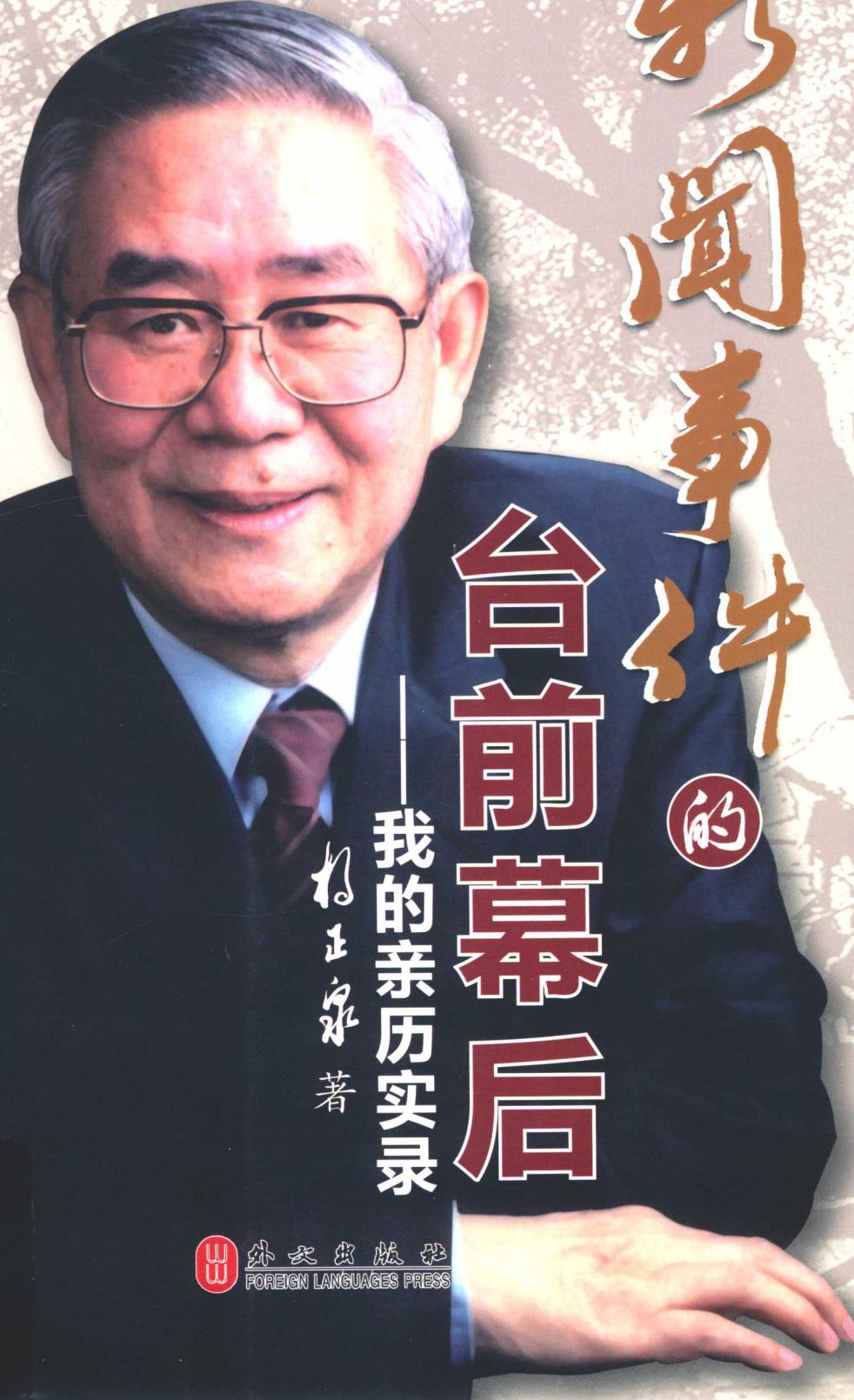
杨正泉著

的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往日经风雨  
波涛浪中行  
畅游无限景  
老来一支笔



## 新闻事件的台前幕后

“回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时常产生一种想要整理出来的冲动。总的感觉是，几十年一路走来，有太多的史实要写，有太多的话要说，不论是过去的成功还是挫折、经验还是教训、喜悦还是痛苦，都是共和国历史和新闻史的一部分，应该记载下来，这是历史责任。”

新闻工作是一条最敏感的社会神经，最迅速及时地反映和记录着现实，连同它本身都成为后来历史的一部分。

本书作者一直工作在敏感的新闻战线，亲历、目睹了几十年共和国的沧桑之变。本书重点记述了“文革”早期中央电台的宣传概况，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宣传始末，从“天安门事件”到“天安门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转折时期的宣传变化，大邱庄纪事，广播新闻面面观，中央电台播音与播音员纪事，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前后我国宣传的应对举措，北约袭击南联盟以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突发事件，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复杂的舆论环境，拉萨事件与火炬传递中西方舆论透视等等，从亲历实录的角度介绍了这些重大新闻事件宣传报道的台前幕后。

ISBN 978-7-119-09353-6



9 787119 093536 >

定价：58.00元

# 新闻事件的台前幕后

## ——我的亲历实录

杨正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闻事件的台前幕后：我的亲历实录 / 杨正泉著 .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

ISBN 978-7-119-09353-6

I . ①新… II . ①杨… III . 新闻工作—中国—文集

IV . ① G21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3132 号

责任编辑：吴奇志 杨 璐

装帧设计：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监制：冯 浩

## 新闻事件的台前幕后——我的亲历实录

杨正泉 著

©2015 外文出版社

出版人：徐 步

出版发行：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中国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网 址：<http://www.flp.com.cn>

电 话：010-68320579/68996067 (总编室)

010-68995844/68995852 (发行部)

010-68327750/68996164 (版权部)

印 制：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 外文书店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35.25

字 数：350 千字

装 别：平装

版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19-09353-6

定 价：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有印装问题可随时调换

紅日殘風雨過處  
良才老來主  
等陽將甘限景

楊玉環撰并刻於丙子年歲在己丑





2001年1月12日，在国家首批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左起黃友义、许嘉璐、钱其琛、杨正泉）。



2007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德人权论坛上，作者与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名誉会长黄华交谈，左一是会长周觉。摄影/杨同贺



2008年，作者向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孟复汇报工作。



1990年12月28日，在庆祝中央电台50周年晚会上，作者向耿飚同志询问当年粉碎“四人帮”时奉命来广播局的情况。



1998年9月，作者与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商谈工作。摄影/杨同贺



中国外文局党的核心小组和领导班子全体成员



2004年3月，作者与爱波斯坦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



2006年，作者在中德人权研讨会上发言。



作者向外文局老专家沙博理祝贺95岁生日。



2000年，作者在中国召开的人权研讨会上。



1999年，作者访日期间拜访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



1986年，作者在中央电台工作留影。摄影刘中枕



1999年，作者主持国务院记者招待会。



1992年12月26日，作者在中央电台业务大楼开工典礼上讲话。摄影/李新建



2008年1月，在中国记协举办的新闻界老同志春节联欢会上，作者与中央电台老同志合影。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北京申奥时，在电影厅等待宣布投票结果。



2001年7月12日，作者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前留影。



2001年7月北京申奥期间，作者在莫斯科白宫前留影。



2000年，作者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接受电台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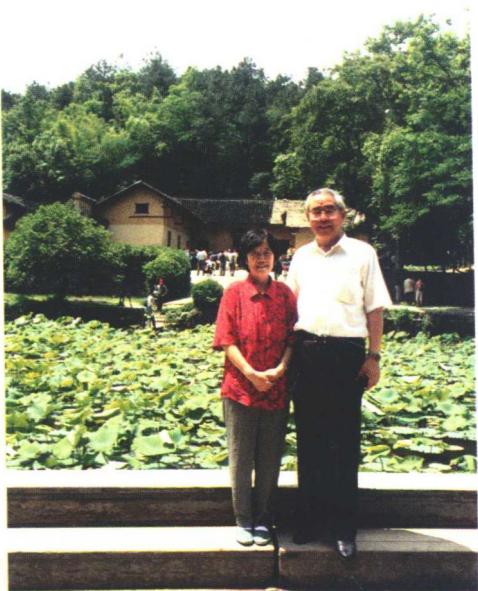
1998年10月20日，作者在中国举办的首届国际人权研讨会上。



1986年，在人民大会堂中央电台转播室与播音员常亮（左一）、漓江（左二）一起转播大会实况。



2014年4月在中国传媒大学与教授、博士生导师（左起）徐琴媛、展江、蔡帼芬、杨正泉、朱英璜、刘笑盈、何兰一起参加博士生论文答辩。



2012年6月，作者与妻子苏健敏在韶山瞻仰毛泽东主席故居合影。



2001年5月，作者与妻子苏健敏在五台山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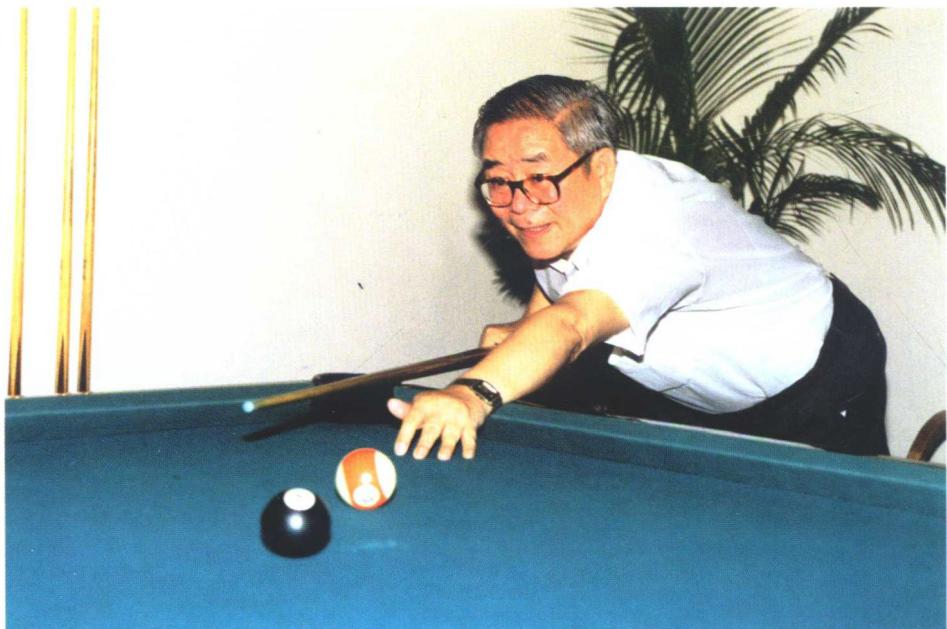
2005年拍摄的全家福 摄影/李新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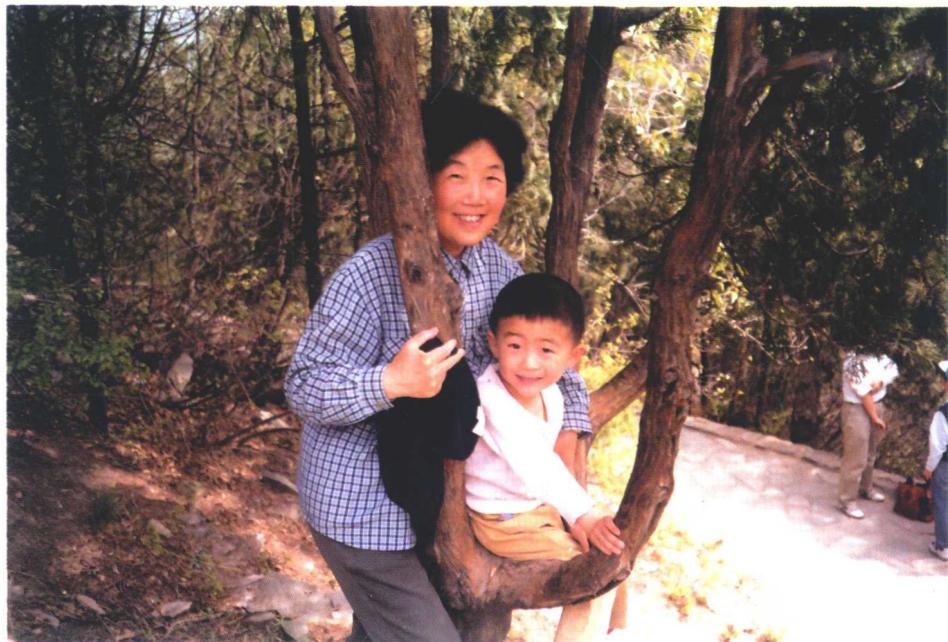
2014年春，与妻子苏健敏在太湖合影。



2010年春，作者与妻子苏健敏在临沂参观王羲之故居时，苏健敏应邀书写毛主席词《六盘山》。



2006年6月，作者参加中直万寿路俱乐部组织的老干部斯诺克台球赛。



1996年春，奶奶与孙子游玉渊潭。摄影/杨正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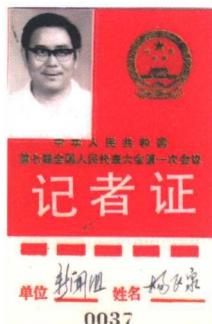
1949-1984国庆35周年



1984国庆节首都阅兵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七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



八届全国人大第一  
次会议

凝聚力量  
圆梦中华

杨正泉书

凝聚力量 圆梦中华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录古人名句

杨正泉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 自序

我在2008年11月出版了《新闻背后的故事》一书，但意犹未尽，现在出版的《新闻事件的台前幕后》一书，是她的续篇，或者是姊妹篇。这两本书记载的都是我在几十年新闻宣传工作中亲历、亲见、亲闻某些重大宣传的真实记录。

我想先袒露一下自己的新闻经历和写作心路。

我这个人很幸运，从旧社会走进新社会，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文革”走向改革开放，生活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又一直工作在敏感的新闻战线，亲历、目睹了几十年共和国的沧桑之变，中国从贫穷落后走向了繁荣富强，中华民族正展现出亘古未现的美好前景。

我从学生时代就向往新闻工作，在大学学新闻专业，50多年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如愿以偿。概括地说，我与新闻工作的结缘，前后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1960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专业，4年的大学生活初识新闻广播；二是1964年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文革”前到改革开放初期，前后近30年做对内广播宣传工作；三是1993年我被调到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同时兼管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管理新闻、出版和网络对外宣传8年多；

四是2001年5月退居二线后，在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人权研究会从事人权研究和宣传工作；在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新闻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借此契机促使我对过去的新闻宣传实践做些理性思考。也就是说，我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2009年退休，走过半个世纪的新闻路，由对内到对外，由广播到出版以至更广阔的领域，而其中大部分岁月又处于新闻工作的前沿，这段岁月也正是我国大变动、大发展的年代，我紧随人民共和国的步伐，见证了人民共和国的风雨航程和沧桑巨变，饱尝了新闻宣传的激动喜悦与风险困境，切身感受到我国新闻事业巨大的发展与进步。

在工作前沿时，每天忙于眼前的事。2001年5月，我从新闻工作第一线退下来，庆幸终于有了属于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能够做一点自己想要做的事。我曾经有感而发：“常与风雷伴，退职归安宁。人生最难得，自主一身轻。”接下来做些什么呢？余下的时间有限，只有也只能做一些自己熟悉、喜爱的事。我时常坐在书房，审视四周，把目光落在了满屋子的书、资料和满箱子的笔记本上。有的已经尘封多年，从床下移到屋角，又从屋角搬到书架上，一直顾不上翻阅，但现在有时间了。这是我几十年工作历程的记录，我在搜寻走过的足迹中，发现在庞杂的“矿藏”碎片中有不少闪光的“金子”，我感到拥有历史也是一种富有。此后，过去的一幕幕浮想联翩，我经常陶醉在资料与历史的回忆中且乐此不疲。有时我对在职的新闻从业人员讲，你们在创造历史，我在回忆和享受历史。

有人说，人过半百爱忆往事。我记得1995年4月20日，江泽民、李瑞环在人民大会堂为爱泼斯坦祝贺八十诞辰，他们谈到一个共同感受，随着年纪的增加，对历史的记忆愈来愈清晰，反而记不起今天的早饭吃了什么。李瑞环的几句趣谈引起哄堂大笑：“往事忘不了，今

事记不住；躺着睡不着，坐着打呼噜。”一位老者说，夕阳已短，往事漫漫，回顾过去也就是自律一生。

新闻工作是一条最敏感的社会神经，最迅速及时地反映和记录着现实，连同它本身都成为后来历史的一部分。回首半个世纪的新闻风云路，我又时常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新闻岗位上，有自己特有的体验。我大学毕业后工作不久，1967年1月中央广播局的造反派夺取了宣传大权，原来的领导机构和宣传机构被彻底打碎，广播局所属中央电台群众组织成立宣传小组管理全台宣传。1967年年底广播局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12月28日我阴差阳错地进了中央电台宣传小组并任组长，在军管小组领导下主持中央电台的宣传工作；1974年10月我被调任为中央电台宣传办公室（总编室）主任；1975年7月被任命为中央电台副局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依然是分管广播宣传工作；1985年我被任命为中央电台台长、分党组书记，主持台的全面工作；1993年又被调任为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外文局局长、党组书记。在此介绍这一简历，是想说明：

一、我长期处于新闻单位宣传工作的领导位置，工作特点主要是策划、组织和管理宣传报道。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被评为全国首批高级编辑时，有的电台同仁提出：“他连广播节目都不会录音，怎么能成为高级编辑呢？”的确，作为新闻人我具体参与编辑和采访的实践并不多，甚至不曾有过编辑、记者的深刻体验，更不必说能熟练操作机器录制广播节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广播新闻人的缺憾，但也由此体会到了“某种优势”，是他人经历中不多见的。至今，这种策划、管理的惯性使我认识到，当今某些新闻媒体整体宣传报道质量的提高，尤其是要想在众多新闻媒体激烈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加强整体策划是多么重要。策划出特点，策划出优势。

二、正因为我处于一种承上启下的宣传结合点上，也就有了特殊的工作体验，尤其是在中央电台期间更为典型。中央电台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新闻宣传部门之一，我可以从上级及时了解中央的宣传精神和部署，又从宏观上直接面对中央电台的各类节目和播出情况，尤其直接参与组织、主持重大活动和紧急的宣传报道，从中了解和应对种种意想不到的变数，经历其中的喜悦与风险，这也是一种收获、一种实践。新闻单位没有官，新闻媒体的领导离开新闻工作的实践便没有发言权。这种既是政策的接受者贯彻者，又是重大宣传的策划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角色，比具体编辑、记者掌握的信息更为全面，体验也更为宏观，为我后来的回顾纪事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现实工作的需要，使我养成了爱记事、爱想事的职业习惯。对于上级精神的传达，对于做过想过议过的事，只要有可能便随手记下来，而且尽量做到忠实于原事原意，利于传达贯彻，利于事后备查。尤其对于那些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和具有典型性的人和事，我一般是在当天播出结束以后，立即把所做所想详细记录下来，也有的是后来补记，但很容易走样，离开原来的环境气氛就没有当时的真情实感。当时的记录中又特别留意背后主持、策划、组织宣传报道的过程以及那些具有故事性、生动性、启发性的细节，这些最容易被人所疏忽，但却最能体现某一报道的特点，丰富文章的内涵并力显生动性和趣味性。有人看过我写的回忆文章后发问：你怎么会对事件的过程和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写得那么具体？我说“得益于平时的积累”。

回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时常产生一种想要整理出来的冲动。总的感觉是，几十年一路走来，有太多的史实要写，有太多的话要说，不论是过去的成功还是挫折、经验还是教训、喜悦还是痛苦，都是共和国历史和新闻史的一部分，应该记载下来，这是历史责任。尽管有如此有利的客观因素，但真的要付诸行动是另一回事，我深感事实与

底气不足：一是事实不足，不系统不连贯；二是自己的功力不够，时间跨度和变化太大，政治口径和分寸把握很难；三是难以衡量它的现实价值，在浮躁的市场中有没有出版的可能？能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四是深知写史难，真实的历史更难写，不要说政治尺度的把握，就是几个人同时经历的同一件事，各自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看法千差万别，甚至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会有出入，这种事屡见不鲜。种种疑虑使我迟迟下不了决心，完全放弃又不甘心，颠来倒去在心里折腾。为此，我多次求教于同行和朋友，受到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才有了写下去的勇气。

在多年对某些典型史料整理过程中，断断续续地写成某些文章，2008年集纳出版了《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一书，其中记载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逝世、林彪叛逃、粉碎“四人帮”、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唐山大地震、中国网络媒体的初期建设、北京申奥与对外宣传，以及中央电台的多次改革等重大新闻和新闻事件的前前后后。但因主、客观因素，仍有某些重大新闻事件未来得及整理。现在续写出版的《新闻事件的台前幕后——我的亲历实录》一书，重点记述了“文革”早期中央电台的宣传概况，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宣传始末，从“天安门事件”到“天安门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转折时期的宣传变化、大邱庄纪事、中央电台播音与播音员纪事、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前后我国宣传的应对举措、北约袭击南联盟以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突发事件，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复杂的舆论环境、拉萨事件与火炬传递中西方舆论透视等，从亲历实录的角度介绍了这些重大新闻事件宣传报道的台前幕后；另外对《新闻背后的故事》中已有的林彪叛逃前后、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等文章做了新的补充，或侧重了某一角度。总的来说，此书依然保持了《新闻背后的故事》一书的写

作原则和风格：“尊重事实，尊重历史；着眼于宏观，着重于典型事件；写过程，写细节，写本来的思想活动，增强其可读性和生动性；不追求彼此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便于排序。有的事实没有写，我所写的都是事实，但我深知，不管如何尽心竭力，我不能认定我所知道的事实都是绝对真实的，我的见解都是符合实际的。”

业界常说“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但对于新闻事件的回顾并不完全代替写史。我常说，新闻工作者是杂家，谈哪些方面都不会太离谱太外行，谈哪些方面也不会太专业太内行。新闻报道的是客观事实，而且是变化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事，每次报道属于事实的一部分而又是过程。写史需要把握和分析全部事实，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需要时间的沉淀。“历史是由后人写成的”，这话不错，后来人更有可能从整体上做出对某一事件接近全面、接近正确的判断。但历史也需要当代人、当事人来写。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5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段不短的历史，在新闻宣传上遇到过太多的事件和变故，而我所亲历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更准确地说是这一小部分的某些局部或侧面，只能算是为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提供某些事实的碎片。经常有记者与我探讨这样的问题：他当年写的某篇（某些）报道，产生过轰动的时代效应，但今天回过头来看，时过境迁，没有人再去注意，甚至没有集纳出版的价值。我认为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由于当时的局限性许多纪事做不到，造成了后来演绎种种历史事件的空间。而今的条件与过去已不完全相同，发达的信息和新闻出版业所特有的职业诉求，最敏感、准确地记录着某些事件的真实面目，反映着历史的演变过程，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具体、生动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历史存在的不足。这些新闻作品反映的是某个时期、某个方面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是当时历史的真实记录，尽管是历史的某个侧面，这样的事实愈多，

过程与细节愈具体，也就愈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和对历史认识的完善。

“研究历史是为着现实和未来”，这话不假。但首先要尊重历史，探求历史的真实，采取对历史严肃负责的态度，才能够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以现实的政治需求和发展的形势去任意揉搓历史。马克思主义早就提出，对待历史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的理解就是把历史事实（人和事）放在当时的环境中，经过社会实践的长期检验，做出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看它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与进步所起的作用是推动还是阻碍，从中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而不应该是完全用今天或未来发展了的现实去评判、苛求历史。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历史无定主义，不能一个时期一个看法，一个时期一个要求，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放纵古人或苛求古人都是不客观的；不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的需求或个人的好恶而任意解读、改变历史。试想，如果用今天的现实去苛求、评判历史，用后者否定前者，那就脱离了实际，而且是有害的。如此往复，也就永远没有历史遵循可言，永远没有可遵循、传承的民族精神可言。对于不符合现实之历史文化，可以不去提倡，也不必大兴挞伐、批判之风。多次的教训证明，用实用或强制的政治手段对待历史的和传统的文化，历来是不成功的。

“往日经风雨，波涛浪中行。老来一支笔，畅游无限景。”这几年体会到了在历史中遨游的快乐。“每个人都有生动的故事”。今天已经有了前人无可比拟的方便条件，一切有条件的人都应该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记录下来。写自己，就是在写时代的变迁，就是在记述历史。

2014年10月于北京

# 目录

## 第一部分 特殊年代的特殊报道

### 自序 / 001

#### 特殊时期新闻报道纪实

- 一 党的“九大”报道  
——特殊时期新闻报道的代表作/005
- 二 从国庆20周年报道看对新闻从业者的政审/010
- 三 “5·20”声明播出始末/013
- 四 国庆25周年录音报道纪实/017
- 五 林彪叛逃前后与叶群“抓电台、炸电台”/021
- 六 安东尼奥尼与影片《中国》的风波/042
- 七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续篇）/051
- 八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宣传始末/071
- 九 从“天安门事件”到“天安门运动”/085
- 十 乒乓外交和转播农民篮球赛  
——兼谈体育报道的演变与联想/092

#### 特定时期的宣传特点

- 一 “四清”——“文革”的前奏/115
- 二 “文革”初期的特殊宣传/121
- 三 “文革”特色节目设置与演变/127

第二部分 重大新闻事件报道的曲折过程

- 四 我办《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节目/130
  - 五 中央电台的文艺广播/133
  - 六 中央电台的抢先夺权/137
  - 七 军事管制下的广播电台/140
  - 八 阴差阳错我走上管理宣传岗位/144
  - 九 毛主席就对外宣传做出批示/147
  - 十 恢复中央电台少数民族语言广播/152
- 

- 一 伟大的转折  
——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宣传工作的转变过程/161
- 二 报道大邱庄纪事/203
- 三 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曲折发展  
——中外关系与舆论宣传/214
- 四 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的前后  
——苏联解体时的舆论斗争与我宣传应对策略/228
- 五 克林顿总统访华  
——复杂舆论环境的应对/264
- 六 北约袭击南联盟  
——复杂真伪的舆论战/271
- 七 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报道纪实/291
- 八 “人权”入宪前后/301
- 九 拉萨事件与火炬传递  
——西方反华舆论反华透视/312

## 广播新闻面面观

- 一 新闻在广播中的位置/349
- 二 广播新闻的稿源/352
- 三 中央电台的记录新闻/358
- 四 重要新闻的播出与重播/360
- 五 《新闻报摘》的特点与工作方式/362
- 六 《全国联播》节目/370

## 中央电台播出轶事

- 一 一首没有唱响的《国歌》/373
- 二 曾经播出的毛主席生日祝词/376
- 三 中央电台节目的开始曲与结束曲/378
- 四 广播称谓的演变/382
- 五 王震与评书《三国演义》/384

## 播音与播音员纪事

- 一 初识播音趣事/387
- 二 只有“两个播音员”的电台/389
- 三 中央电台的播音基调和风格/391
- 四 转播开国大典：中央电台的骄傲/392
- 五 对“大论战”中播音的再认识/394
- 六 播音员的考核上岗/397
- 七 “文革”时期的反常播音/398
- 八 记“文革”中一次播音员的选拔活动/402
- 九 艰难的播音改革/404

- 十 播音员与节目主持人/407
  - 十一 播音员的穿着风波/411
- 

## “首都有座外文城”

——中国外文局与对外传播

- 一 意想不到的工作调动/415
- 二 初进外文局的尴尬/418
- 三 我所知道的外文局/421
- 四 新时期书刊网外宣面对的新问题/433
- 五 外文局宣传格局的历史性变化/436
- 六 不可不说的翻译问题/441
- 七 “中国网”落户外文局/445
- 八 记忆爱泼斯坦/451
- 九 《政协提案的故事》丛书诞生记/461

## 中西观念的碰撞与磨合

——再谈“99《财富》上海全球论坛”

- 一 双赢：寻求利益的结合点/468
  - 二 磨合：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协调/469
  - 三 经济：无法摆脱的政治/471
  - 四 简明：与国际的沟通/472
  - 五 媒体：观念与应对/475
- 附：美国《时代》周刊总编辑眼中的中国/478



## 战争与宣传舆论

——从伊拉克战争看宣传舆论战

- 一 宣传舆论是第二战场/485
- 二 战争报道的开放与控制/486
- 三 未能“正名”出师不利/491
- 四 特殊时期的“特殊报道” /492
- 五 空前的心理战/498
- 六 战争与媒体/500
- 七 战争与记者/502

## 出访见闻

——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纪实

- 一 飞行途中看日出/508
- 二 游悉尼湾见故人/510
- 三 服务就是报道/511
- 四 “形象司”：如何应对记者？ /515
- 五 扑朔迷离的新闻观/518
- 六 行业性隐蔽管理方式/523
- 七 多元文化与报道中国/524
- 八 西方媒体批评国家领导人之谜/527
- 九 访问后的几点思考/531

## 第一部分

# 特殊年代的特殊报道

由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6月开始至1976年10月结束，历经10年。它来势迅猛，席卷神州大地，震撼着全世界。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谁都在劫难逃，难以置身其外。这场政治动乱给人民和国家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中共中央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做出结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革”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时期，也必然是一个特殊的宣传时期，有许多异于平常的新闻宣传情况值得研究，有许多历史教训值得重视。这期间，中央和地方的各种传媒有着基本相同的经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称“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新闻舆论机关，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具有“文革”新闻宣传的典型性。那时，我国的媒体，尤其是电视很不发达，广播又有着传播快、影响面广、直接进入千家万户、最能够动员和形成社会广泛舆论的特点，在各种媒体中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因此也就特别耀眼，受到特别的重视，在舆论上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也最大。虽然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不能代表当时新闻媒体宣传报道的全部，但有一定的代表性。

新中国成立后，党内的“路线斗争”与全国性的“阶级斗争”等各类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而“文革”更是“史无前例”。1964年我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走进了北京复兴门外的中央电台，经历的第一次大的政治运动就是“文革”的全过程。从“文革”时期走过来的广播人都记忆犹新，那种混乱、疯狂的宣传状态，复杂、艰难，瞬息万变、不可捉摸，每个人时刻处于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中。我在10年“文革”中，绝大部分时间处在管理中央电台宣传的位置上，风风雨雨，几经沉浮。1968年12月28日我进入中央电台宣传小组

任组长，在军管小组领导下分管中央电台的宣传工作；1972年7月去河南淮阳“五·七”干校；1973年7月回来后，任中央电台新闻部国际组组长，参与中央电台重要新闻节目《新闻报摘》、《全国联播》的审稿工作；1974年10月任中央电台宣传办公室（总编室）主任，1975年7月被正式任命为中央电台副局长，并直接分管和负责全台的宣传工作。这期间，我亲历了许多重大事件、活动和复杂的宣传，执行过错误的宣传路线和方针政策，是我人生中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

由于“文革”种种复杂的政治原因和情况，许多单位在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时，大多采取了回避的做法，或避而不谈，或几笔带过、一言以蔽之；或怕触及矛盾，故意绕开；或只谈原则和结论，不谈过程和细节；或觉得不好写、不便写，总是在它的外围绕来绕去。中央电台也不例外，一部广播史每写到此便省略掉。我过去陆续写过某些有关的文章，但由于历史和个人认识的局限，只是记述了其中一些重要片段，在这些片段中也只是截取了某些历史章节，而且着重记述的是正面事实，有意回避了某些细节和问题。但这终究是一段抹不去、回避不了的历史，而且是长达10年、情况特殊的历史，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不论负面或正面都有许多特殊的教训和经验，都是极其珍贵的，甚至是其他历史中无法寻觅的宝贵财富。“文革”已经结束几十年，随着时间的远去和政治改革的开放度，“文革”中的某些问题也日益显现出来，有关的事越来越清晰，有关的人相去渐远，历史的纠葛逐渐淡忘，从研究历史、面向未来的角度值得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

在我们那个时代人的记忆中，“文革”似乎是前天刚刚发生的事情，一切历历在目。而我在某些大学给学生们（其中主要还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讲课时，却发现他们几乎对“文革”一无所知，

竟是那么遥远的历史（不仅如此，他们对发生在 1989 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也知之甚少）。但他们很想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那时候的人民共和国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为什么会让那么多人和历史学家去关注，津津乐道。的确，“文革”这段历史和新闻史，他们应该知道，我们也有责任让他们知道，从中找出产生那些问题和后来残存的某些问题的根源所在，避免历史悲剧以后重演。这是一项大的工程，每个人所能做的只是这项工程中微小的一部分，我所记述的只是“文革”广播宣传中的某些片段。

这是在写历史。历史是严肃的，真实的。我遵循这样的原则，必须置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必须忠于当时的事事实；做法不是揭露或暴露，也不是批判，而是基本叙述当时的事事实，做必要的背景说明；历史不是枯燥的，而是充满着生动、有趣的各种故事，这些故事又多包含在过程和细节中；有些事实和情节我没有写，但我所写的都是真实的，至少是我所了解的真实；材料来源主要是当时广播宣传实践的原始记录、传达的原始记录和日常活动的积累，后来又留意阅读了一批有关的文件、文章和资料，应该说是几十年点点滴滴的积累。由于种种局限，有些传达与记录是否客观准确，已无法核实。我知道书写历史是多么艰难，要做到历史的客观、准确更难，只能把现已知道的部分事实提供给读者和研究者去核实、补充、评说，使之不断完善起来。

我所记述的主要是中央广播局的运动简况和中央电台宣传报道的部分经历。

# 特殊时期新闻报道纪实



## 一 党的“九大”报道

——特殊时期新闻报道的代表作

我在 2008 年出版的《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一书中，写了《横祸丛生：“九大”报道与文艺风波》一文，主要记述的是“四人帮”如何借庆祝“九大”向文艺发难、进一步打杀文艺。本文主要记述的是“九大”的宣传报道。

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文革”中一次重要的、标志性的会议。

“九大”难产。按照 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九大”的召开距离“八大”已经有 13

年。当然这并不是仅有延长的一次，从1945年6月“七大”到1956年9月的“八大”，相隔是11年。“九大”的召开已经酝酿了好几年，从一年以前就曾经布置要做好“九大”宣传的准备工作，但因为一直处于“文革”的激烈动荡时期，有许多基本问题和人员都难以确定下来。主要问题是：政治局势不稳定，思想混乱；许多基本理论问题难以理清，一些新理论需要全党统一认识；如何确定和表达全党的指导思想，把毛泽东思想提到什么高度、摆在什么位置？派别林立，派性十足，代表难以产生；最主要的是上一届中央委员绝大多数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许多人被揪斗、被审查、被打倒，而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人选不明朗不稳定，对中央委员会的核心人员组成更难以确定<sup>①</sup>。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迟迟定不下来。

到了1969年，“文革”初期最激烈的“打倒一切”的浪潮基本平稳下来，政治阵线和政治眉目逐步明朗，同时急需把一些基本纲领和原则以党章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便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和行动，这才决定召开这一次全国党代会。也正因为这是在“文革”期间第一次召开的、带有阶段性的党的代表大会，涉及“文革”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未来运动的走向，更涉及中央领导班子的变化，也就格外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1969年4月1日，已经酝酿了多年的党的“九大”终于开幕。在“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主席做了重要讲话，提出要把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大会定了调。林彪代表中央做了政治报告，高调赞颂毛主席，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强调“要加强团结”。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显然这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班子；大会通过的党章重新规定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

---

<sup>①</sup> 后来有资料透露出，林彪与江青两股势力幕后进行激烈的权力角逐。

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党章最突出的特点是全面评价了林彪，明确把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入党章。党章总纲中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种做法在党的历史和党章中从来没有过。大会闭幕，毛主席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次大会的宣传报道当然离不开“文革”总的形势，带有那个时期的鲜明特点，也可以说是“文革”前期重大宣传的代表作，为大歌大颂大造声势做出了具体详细的部署，对了解那个时期重大事件宣传的特点很有参考价值。

“九大”是在“文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召开的，对宣传报道极为重视。为此，在2月3日就专门做了部署，对迎接“九大”的宣传报道提出了“六个突出”：

“突出宣传国内外大好革命形势，突出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突出宣传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突出宣传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世界革命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突出宣传召开九大的伟大意义。”

对于会议如何开，是封闭式的保密开，还是半公开或公开，直到会前还未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保险和主动起见，中央电台按照公开的方式做了报道的准备：一、会前，“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宣传大好形势，造成声势，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向‘九大’献礼”。二、会中，如完全公开，报道好大会的报告、发言和会议进程，大歌颂，大讲两条路线斗争史。三、会后，宣传一系列重要文件，报道游行等各项庆祝、学习活动，北京庆祝游行搞录音报道，如开庆

祝大会转播实况。总之，准备往大规模搞，“大庆祝，大宣传，大学习，大落实”（那时总离不开一个“大”字，说什么都是一连串的排比句）。为此，中央电台对会议采访记者和各项报道都做了计划，安排了人员。

4月1日，“九大”在北京召开，采取了当时不多见的半公开报道的形式，当晚9点中央电台播出了开幕的新闻公报，从此进入了大会报道期间，但是对大会如何进行报道、还要播出什么，都不知道，事实上在整个大会期间再也没有报道会议的任何活动。大会什么时间闭幕也不知道，只能随时做好各种准备，一直处于紧张待命状态。在这期间，广播局军管小组传达了上级有关宣传报道的要求。这个要求具有那个时期的代表性，特做详细摘录如下：

会后报道要突出“五个歌颂”：歌颂“九大”的胜利召开，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歌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五个歌颂”的具体化，集中体现在闭幕后的前三天，具体安排是：

闭幕后第一天，充分反映全国军民热烈欢呼“九大”的胜利召开，欢呼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和新党章是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是指引我们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光辉灯塔；欢呼新党章重新确立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欢呼林副主席被确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并正式写入党章；欢呼新党章是毛主席英明领导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

闭幕后的第二天，全党和全国军民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大赞大颂毛主席在理论和

实践上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大赞大颂毛主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强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闭幕后的第三天，报道全党和全国军民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武装头脑，用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搞好各项工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说最后的胜利或彻底的胜利）。

同时提醒，会后，代表可能发表一些学习心得的文章，他们先走了一步，而且直接聆听教导，他们学得好，可以播出或请他们做录音讲话；准备播出国际上的祝贺函（电），宣传国际大好形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当时提到这样的高度）“九大”也是在全世界确立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

大会直到 24 日闭幕。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许多机关、单位、工厂、学校和群众团体等，都在随时准备着上街贴标语、游行，有的抢先把空白纸贴在街上，抢占有利地盘。那时中央电台广播的影响最大，毛主席的许多最新指示和重要消息都由中央电台首播。听众为了最先知道闭幕消息，每天守到晚上中央电台 10 点多的重要新闻节目之后，唯恐错过时机。

就是在通过党章的那一天，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温玉成传达中央“文革”的精神说：现在大街上有一股妖风，10 号在北京饭店开会的时候街上敲锣打鼓，张贴很多空白纸，抢地盘，准备刷庆祝“九大”胜利闭幕的标语，这股妖风不能长。广大群众是好心，但这样发展下去不好，特别是解放军应该更警惕些。工厂、学校每天都等到晚上 9 点半钟，有的就是怕知道晚了，这样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等到中央台广播了再游行也不晚嘛！过去有的根本没有听到广播就上街游

行。中央“文革”碰头会认为，这些现象不好，要立即纠正。这些做法是干扰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从明天起，再不要这样等待了，以后听广播要听完、要听清，不要忙着跑出去。

“九大”闭幕。中央电台广播了“九大”闭幕的消息（九届一中全会直到4月28日才结束），许多听众仍然没有听完广播，甚至没有听，就迫不及待地敲锣打鼓走上街头。此后，中央电台按照上级的布置连续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

毫无疑问，整个“九大”采取的是“高调”播音，尤其是公报的播出。具体情况，我在《播音与播音员纪事》一文中介绍。

## 二 从国庆20周年报道看对新闻从业者的政审

196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20周年国庆日。按照常规是大庆之年，鉴于10年大庆的先例，又是在“文革”当中，全国各地和各条战线都准备隆重庆祝，并积极建议中央搞阅兵式等大规模庆祝活动。周恩来总理在国家机关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快20年了，今年20周年是个好事，现在有的地方又搞大庆的献礼，毛主席说20年还年轻，为什么一定要大做？你搞20年大庆献礼，浪费人力、财力。今天打招呼，你们各个部都要取消这一条。一搞这个，就给贪污浪费造成机会，给搞表面化的人造成机会。那些新兴的国家那样搞，是取得国际的支持。我们的国家完全不同。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1969年9月15日内部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宣传工作的通知》，明确只搞群众游行，不搞阅兵式，并对国庆群众游行与各地庆祝活动做了具体部署，提出了要求。

9月10日以后，中央电台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国庆宣传上来，从难

从严从多变准备，一切保证安全播音，不出政治事故，避免技术事故。宣传上的具体设计是：一、转播国庆白天盛大群众游行。提前组成转播班子，办学习班，思想动员，设计方案，组织采访，撰写转播稿件，反复核实修改，提前送审。二、23日进行天安门现场预演，如同“十·一”实战一样。三、国庆晚上焰火晚会做录音报道。四、设立“国庆20周年专题节目”。五、各专题、对象节目从9月23日至10月5日挂牌播出，节目开始的统一用语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专题广播。先学习毛主席语录，……。”那时，凡重大宣传，需要挂牌播出时，都要统一规定挂牌的期限、名称和开头用语。六、国庆前后做好各地迎国庆、国庆招待会、工农兵观礼代表到京，模范、英雄人物事迹介绍，重大建设成就和外国贺电的报道等播出工作。

2011年2月看电视剧《五星红旗飘扬》才知道，当时面临着美、苏联手对我进行核打击的危险，为保证群众与毛主席的安全，曾经设想取消20周年大庆。后来，我们采取了核爆炸措施，才化险为夷，决定照常举行大庆群众游行和晚上的烟火晚会等大型庆祝活动，中央电台进行现场实况转播。中央电台国庆游行转播报道班子的组成是：天安门城楼7人（播音员4人——其中备份2人，时政记者1人，现场负责人1人——由中央电台宣传小组副组长谭树平负责），金水桥北（含红观礼台）6人（记者4人，机房1人，城楼上下联系1人），金水桥南（含广场）6人，灰色观礼台2人，录音技术人员2人。现场转播和广场扩音的技术人员由广播局技术机要处负责，不属于中央电台的机构和人员。晚会录音报道班子另组。另外，在广播大楼内，还有专门的游行实况播出人员、转播实况录音人员、实况剪辑复制人员、录音报道制作人员等，前后方是一个密切协调的庞大的集体。

对参加现场报道和播音的人员的政治审查是极其严格的，每次都

要召开专门会议，大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严峻形势和新动向，提出要求，而且对不同场合的人员有不同的政治标准。据我后来能够查到的记载，1970年对“五一”庆祝活动报道人员的审查是一典型案例，虽然不属于国庆报道人员的审查，但基本雷同，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国庆报道人员的审查实际更为严格。我把这份“五一”报道人员的审查条件抄录如下：

庆祝活动安全第一，特别要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参加人员审查条件：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于党中央；历史清楚，政治可靠，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场坚定，组织纪律性强；工作认真负责，身体健康（特意说明：没有传染病）。

二、下列人员不能参加主席台、天安门城楼、城楼门洞、观礼台和金水桥以北的活动：

1. 直系亲属被杀、关、管、斗和畏罪自杀，因而本人对党不满者；
2. 直系亲属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本人在政治上与其划不清界限者；
3. 本人或直系亲属与帝修反国家及驻华使馆人员、外国侨民、访华代表团以及港澳等地有可疑联系者；
4. 反革命嫌疑分子和私藏武器嫌疑者；
5.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道德败坏、品质恶劣和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而屡教不改者；
6. 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和对党心怀不满或其他不宜参加大会的工作人员。

三、桥南和会场区的条件：本人历史清楚，政治可靠，组织纪律好，工作认真负责。

四、审查办法：1. 加强领导，严格审查；首长负责，亲自动手；

指定专人办理，严格把关。2. 搞好审查表报材料，广场活动的只报名单，其他的要填表，组织签署意见。

从以上“条件”不难看出当时审查的严格程度、政治问题的复杂和斗争的严峻。如此分类审查，能有几人可靠？能有几人能够参加报道？能够被选拔、批准参加这样报道被看成是一种“政治的信任”。没有经过“文革”者，难以体验今天政治环境和宣传报道的发展变化。

### 三 “5·20”声明播出始末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朗诺右派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访问苏联的机会，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美国3月19日立即承认了朗诺政权。朗诺政变不仅改变了柬埔寨的性质，而且直接影响了东南亚的局势和民族运动的发展。

西哈努克是在3月13日抵达莫斯科的，18日苏方已经知道了朗诺政变的消息，但是他们没有告诉西哈努克，在西哈努克将要离开苏联到中国访问去往莫斯科机场的途中，苏联总理柯西金才告诉他国内已发生政变的消息，然后把他送上了飞机，把应对这一变故的难题推给了中国。

西哈努克是中国的老朋友，多年来对中国抱有友好的感情，深受中国人民的尊敬。西哈努克19日到北京，我国仍然以国家元首的规格隆重接待，周恩来总理到北京机场迎接，同时有40多个外国驻华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朗诺政变后，我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中央电台播出了我国政府的声明。20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发表声明，宣布废除他是非法的行为，他仍然是柬埔寨国家元首；27日西哈努克发表了《告

柬埔寨同胞书和庄严声明》，提出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五点主张。中央电台及时播出了西哈努克的声明和录音讲话。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北京电台（国际电台）的柬埔寨语广播，增加了播音时间，加大了发射功率，反复对柬埔寨广播。随后在北京成立了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流亡政府，成立以首相宾努为主席的柬埔寨民族解放统一战线。29日在中国南方城市举行了三国四方（柬埔寨、老挝、越南北方、越南南方）联席会议，发表了联合声明。同一天美国悍然出兵柬埔寨，第二天尼克松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公开宣布了这一消息。5月初柬埔寨民主联合政府在北京成立。

在此期间，周总理指示要加强对外宣传，“电台要活跃一下。外交部、新华社和电台要加强联系”。北京（国际）电台的柬埔寨语广播担负起传达西哈努克和柬埔寨民主联合政府声音的任务。

5月4日11点苏联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表示对柬埔寨民主联合政府的“支持”。同一天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周总理指示，我国政府的声明要抢在苏联招待会之前播出，总理在收音机前坐等收听，并几次打电话催促中央电台，但由于“文革”中取消了直播，拿到的稿子晚，又是录音播出，比预定时间推迟播出了20分钟。周总理说：“你们还是可以灵活一点，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直播嘛！”由此军管小组决定：中央电台要做好准备，在紧急情况下经过局批准，可以由老播音员直播。但“文革”中，始终没有直播过。

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柬埔寨和印度支那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央电台在当天下午6点预告有重要广播，晚上8点播出了声明全文。

当晚，北京和全国主要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掀起多年没有过的抗议美国的活动。21日上午10点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首

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美斗争大会”，100多万人参加，毛主席出席，林彪代表毛主席宣读了声明的全文，西哈努克亲王、首都工、农、兵、学和文艺界代表讲话，中央电台、北京（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大会的实况转播，会后中央电台连续播出了林彪宣读声明的录音，北京100多万人持续游行两天，有50万人通过天安门广场；全国中等以上的城市都举行游行或集会，声讨美帝国主义的罪行，支持柬埔寨和世界人民的反美斗争。中央电台新闻节目每天都搞录音报道，要求其他节目都要配合，尤其是文艺节目，连夜组织创作、录制、播出，广泛流行的“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就是当时创作、传唱起来的。各地电台也都放开单独搞录音报道，形成了全国强大的反美声势。

我想特别说明的是，在转播林彪宣读毛主席声明的过程中，林彪在宣读中随意插话、解释，出现漏读和错读多处，如把“巴勒斯坦”读成“巴基斯坦”、把“1970年”读成“1907年”等，都转播了出去，我们很担心、很紧张，也很着急，而且后头还要播出他的讲话录音。当时我在紧张地思索，怎么办？是应该用毛主席声明的原文，还是用林彪加进了自己话的录音？后打电话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电台记者，让他赶紧请示周总理。记者写了纸条送给周总理，只见周总理思索了一会儿，走到毛主席身边耳语了几句，然后对记者说：“还是按照毛主席的声明。”这给我们吃了定心丸，一块石头落了地。

要恢复毛主席声明的原文，对林彪宣读录音的复制是极其困难的，要去掉林彪自己的插话，要补上他的漏读，要改正他的错读，而且要保持语调的连贯性和现场的气氛，稍有不当都可能是政治错误。依据多年的经验，必须从林彪过去的讲话录音胶带中找出相同的字或者字不同而相同的发音来插入和替换（利用广播声音的特点），但是林彪公开讲话的录音不多，只能从中央电台库存的林彪内部讲话的录音胶带

中去寻找。令人欣慰的是中央电台有几个复制技术能手，如高洪廉、简燕萍等，在当时设备落后、技术手段极为缺乏的情况下，他们能够从转动的文字录音胶带中抠掉一个字、插进另外一个字，他们能从讲话录音中掐掉一个音而把所需要的另一个音插进去，这都是在两个机器同时转动的几分之一秒中完成的，巧妙地做到前后音调连贯一致，竟如同原版一模一样，听众分辨不出真伪。这次，他们从保存的林彪过去的多次讲话录音带中，找到所需要的相同的字音，把遗漏、读错的字音补上去，不长的声明竟复制了一个下午。首次播出以后，又连续修改了5次，精益求精。听众听后大为惊讶，与他们原来听到的实况转播完全不同了。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来电话说：“你们真行，原来听宣读时就担心，你们怎么个播法？我们特意听了，（没想到）一个字一个音也能改！”

1975年4月17日金边解放，朗诺集团垮台，中央电台打破发稿常规，当天发了快讯。《全国联播》节目也打破了过去坚持的“先国内，后国外”的排列惯例，把金边解放的快讯作为头条播出；第二条是我国政府的贺电，抢先发在各国的前头；第三条是欢迎朝鲜金日成主席来华访问的社论。18日，周恩来总理等我国领导人前往西哈努克在北京的住所向他祝贺胜利。19日北京市组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人民庆祝柬埔寨人民解放金边大会”，叶剑英副主席讲话，中央电台、北京（中央）电视台、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了大会实况（由中央台写稿、播音），掀起了庆贺柬埔寨人民反美斗争胜利的高潮。

1975年4月30日越南南方武装力量开进西贡（今胡志明市），越南南方傀儡政权杨文明投降。5月2日，北京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都人民庆祝越南南方人民解放西贡大会”，演奏了中国国歌、越南国歌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正式歌曲，中央电台等三台转播了大会实况。

## 四 国庆 25 周年录音报道纪实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时逢国庆、“五一”活动，北京除阅兵、游行庆祝以外，大多搞游园活动和晚上天安门广场的联欢烟火晚会。届时，中央电台总是要采访制作大型录音报道，形成了一定的思路。现以国庆 25 周年为例，做一详细回顾和记述，从中可以看出在当时政治形势和电台工作条件下的报道思路，也可领悟到复杂的名单排列的学问。

1974 年 10 月 1 日是国庆 25 周年，按照规定“逢 5、逢 10 是大庆”，庆祝活动要“比往年隆重、热烈一些”，但这一年进行了改革，“把重点放在基层”。周总理曾经说过：“那些新兴的国家那样搞，是取得国际的支持。我们的国家完全不同。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北京的庆祝活动，白天游园，在六大公园（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北海公园、景山公园、颐和园、天坛公园）组织游园和文艺演出，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以及天坛、中关村、石景山、东郊工人体育场施放焰火，放 3 次，每次 8 组，20 分钟。这是那时国庆、“五一”庆祝活动的通常做法。

但这次终究是属于“大庆”，中央电台决定搞国庆活动大型录音报道。录音报道是广播的一个特色品种，国庆活动录音报道是属于时事政治性的新闻报道，要求政治性、新闻性都很强，准确、及时，内容严谨，严格把握口径，同时又要现场感，有声势，节日气氛热烈。为此从 9 月 5 日起搭建了由我任组长，韩铎任副组长，曹仁义为总撰稿人的 25 人报道班子（除领导成员外，记者 16 人，播音员 2 人，外出录音员 4 人）。这一次的录音报道在“十一”和“五一”的报道中有代表性，为了说明问题，我特将当时工作的具体情况，做一真实详细的记述：

## 1. 制定报道方案

在采访的基础上制定录音报道预案是通行的做法，但那时必须将预案征得国庆筹备组的认可，征得上级主管部门的认同，这是保证录音报道制作顺利、审听通过和顺利播出的重要条件，避免上级审听时在整体设计和结构上产生歧义，防止在面临紧急播出的情况下又做大的变动和大的修改，某些局部修改是家常便饭，比较容易。

## 2. 需要各方事先认同的几个重要问题

每逢重大活动的报道，尤其是像这样的录音报道，政治性强，头绪繁多，关系复杂，有些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必须在事前统一认识，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甚至中央的确认批准，才能保证制作、播出的顺利进行，否则寸步难行，这不是只凭借着新闻报道的原则和技巧能够解决得了的。

(1) 录音报道开始是否播出简讯？也就是说，是否需要先把最重要的信息集中报道出去，如活动概况、参加人数、出席活动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名单等。播出简讯不仅把最新最重要的事实在第一时间传达给听众，而且给录音报道的制作带来许多方便，弥补许多遗漏和不足，对保证录音报道顺利制作和及时播出极为有利。

(2) 确定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名单的播出方案。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提法，这是一个特定的概念，系指：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等。

关于中央领导人的报道，有一套复杂的名单排列法。各新闻媒体都清楚，报道领导人的名单是最困难的事，政治非常敏感，而情况又非常复杂多变，人员不能遗漏，顺序不能颠倒，安排必须得当，尤其是在“文革”时期，政治性极强。尽管有“小名单”（党和国家领导人，

外宾兄弟党在政治局委员以上，外国政府在副总理以上)、“大名单”之分，有事先确定的报道次序，但两个名单也都是人数众多，尤其是“大名单”常在几百人、有时甚至上千人之多，要做到次序不乱，很难；而且人事不断调整，如同走马灯式的沉浮变化，有新人露面(是一种政治信号)或因各种情况临时不能出席者，都必须当天在现场一一核对，要保证准确无误；各个领导人、领导人的秘书和家人都在监听广播。

为了准确无误地核实名单，报纸时常到第二天的下午都出不了报，而广播不同，必须在当晚播出，所以必须事先确定播出的方案，而且得到批准。如，是先报“小名单”，还是连同“大名单”一起报？“小名单”是在简讯中报，还是不要简讯，放在游园活动的录音报道中报？如果在录音报道中报，领导人的排名次序是否可以有所变动？在外地参加活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如何报？是综合在简讯中一起报，还是放在外地活动中报？“大名单”是否放在录音报道后的文字报道中播出，如来不及，是否可以之后补报？这些都需要在预案中取得一致的看法。

名单排列法是一门重要、复杂而敏感的政治学，一般由专门的部门和人员审定(事实上，各国都有一套名单排列法，但没有我们报的那么多)。现在，有人时常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依据领导人排列次序播出新闻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没有按照新闻价值的大小来排列，而且为顾及排列次序把同一内容的新闻不得不分开来播出。实践告诉我们，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好办法。

(3) 白天的录音报道与晚上的焰火晚会是放在一起搞录音报道，还是分别搞录音报道？通常的做法，多数情况下是放在一起，以白天为主，晚上的活动在录音报道的后头提到，并播出一段音响。一是因为白天的活动政治性突出、群众性广泛、领导人出席多，而晚上更多的是文艺联欢活动；二是晚上的活动受晚8点《全国联播》播出时间的限制，来不及反映和制作；三是在同一节目中容不下类似的两个录

音报道，除特殊情况外，必要性也不大。而电视一般在白天、晚上都搞现场转播。

### 3. 录音报道的结构设计

是依照活动场所写，还是按照内容分类写。按照活动场所写（公园）比较好组织、省力，但过于分散、容易重复；打乱活动场所，按照分类来写，以工、农、兵、学为序（如有最主要的领导人参加，可随之变化），配以现场采访和文艺节目，内容比较集中，减少重复，但现场感不强，头绪零乱，多数情况下采用这种写法。

这次录音报道是以白天为主、与晚上合一，总共38分15秒，是比较长的一次。“十一”晚上《全国联播》中首播，3天共播出7次。录音报道以钟声迎来祖国的早晨开头，以焰火晚会的衬托和气势豪壮的大合唱结尾，中间突出了几段大特写。整个报道上下贯通，主题集中，重点突出，文字简练，表现手法新颖、音响舒展，节日气氛浓郁热烈。

搞好这种重大题材、重大场面的录音报道，要求严格，头绪繁多，是很困难的。报道组经常通宵工作。在完成报道后，我们报道组曾经相约，25年后在国庆50周年（1999年）时再相聚。遗憾的是我在1993年调离了中央电台，没能够实现这一愿望。

## 五 林彪叛逃前后与叶群“抓电台、炸电台”

按：我在《新闻背后的故事》一书中，记述了林彪叛逃以后中央电台宣传的情况，有些问题没有谈到，有的细节没有展开，现做必要的回述和补充。

### 突变！

#### ——应急宣传对策

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零点32分从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坐镇人民大会堂做出了一系列应急部署，其中对宣传报道提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要求。

关于林彪叛逃的情况，人们现在已一清二楚，许多“内幕”已通过各种渠道披露出来，现代人只是作为一种历史事件，平静地去看待、谈论它。可在当时，作为“接班人”的“林副主席”突然一夜之间叛党叛国而去，对于不知底细的人来说，如闻一声惊雷而目瞪口呆，毛主席、周总理为此被搅得彻夜难眠。

对于林彪的历史和表现，我们当时知道的并不多。在这之前，广泛流传他会打仗、能打仗，是一位年轻时就出了名的高级将领，指挥过平型关大捷、东北解放战争，是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之一，据说在苏联卫国战争时受到过斯大林的赞扬。“文革”开始，林彪突兀而起，那本流行最广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前面印着他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不仅人人会背诵，简直成了每个人的座右铭。从此，林彪总不离毛主席左右，拿着“红宝书”晃来晃去。1969年4月党的“九大”，他当

上了党中央副主席，而且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破例地被写进了党章，在党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全党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从此，“林副主席，林副统帅，毛主席的紧密战友”被呼得山响！总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忘不了祝福“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林彪的政治生命和威望达到了顶峰！

不过，也有对他的负面影响。直观上总觉得他不像未来的党的主席。他脸色蜡黄，身体虚弱，走路打晃，怕见阳光，尽管天天祝他“永远健康”也总是健康不起来！他的表情总是难以琢磨，声音有气无力、尖细而发颤，没有“副统帅”的气概。人们私下议论，不知他能不能等到接毛主席的班？这并不是做事后诸葛亮，而是当时一些人的真实想法，只是不敢说，甚至不敢深想。记得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5·20”声明，10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由林彪代为宣读，明显地感到他底气不足，上气不接下气地拖着长腔，短短的一份声明竟出现错字漏字好几处，多次把“巴勒斯坦”读成“巴基斯坦”，自己还任意发挥。有人曾脱口而出“怎么会这个样”！把中央电台的现场转播弄得异常紧张，使得事后复制播出录音实况十分困难！

林彪是公开叛逃，中央电台经常遇到紧急的重大的宣传，但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突如其来的大事件，在我党我国的历史上也没有遇到过。在这重大紧急关头，宣传报道必须听从中央的指挥，服从中央的统一部署，加强组织纪律性，与中央保持绝对的一致。根据指示，中央电台立即采取三项措施：第一，“盯住”莫斯科电台<sup>①</sup>的广播，及时了解、报告林彪的动向。为此中央电台专门组织人收听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一旦听到关于林彪的报道和动向，立即向中央报告；第二，

<sup>①</sup> 莫斯科电台开办于1929年，是苏联对外广播电台，1940年7月1日最早开办对华中文广播，1950年与我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签订合同，互派专家如播音员等参与对方的对外广播，而且互相赠送节目播出，中央电台也经常收听莫斯科电台的中文广播。中苏关系紧张后，中断联系并禁止收听。苏联解体后，莫斯科电台改为“俄罗斯之声”。

从严掌握，争取主动，采取果断措施，广播中立即去掉林彪的名字、习惯用语和题词等，停播一切赞颂林彪的文章、歌曲和节目。对此，中央电台要彻底清查，把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删除干净，不能再广播出去；第三，反复播出《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鼓舞人民，增强信心，加强纪律，一切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这些歌曲要反复安排，除了文艺节目以外，其他节目也破例安排播出，让听众预感所发生的异常变化，又不说明已经发生了什么，做好思想准备。我们不能等到外电已经报道，世界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还在按照原来的路子做宣传报道；不能让我们的人民在毫无觉察、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公开。但这一切还只能是吹风，在外电没有公开报道之前，我们暂不主动发布林彪叛逃的消息。

任务和要求是明确的，最难的是人们的思想转弯，立即清查停播一切与林彪有关的文章、用语、人和事，谈何容易！广播中的几乎每一篇稿子、每一次节目都少不了这位“副主席”、“副统帅”，要在一夜之间全部停播，撤换一天70多个小时的节目，同时又必须制作同样多的新节目来填补，还要查封过去用过的大量节目，以确保安全播出。停播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一时难以分辨清楚，如何掌握？如果有听众对这种突然的变化提出疑问，又如何做出解释？一系列问题都心中没底，更不能擅自做主。当时的思想顾虑很多：时间紧急，工作量太大，工作环节太多，任务又必须完成，只能动员全台的人员来做，但这事情太大，发生得太突然，如何传达动员？既要叫大家去做工作，又不能点明事情的真相，事实上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事情的全部情况，大家有许多“活思想”，如何做工作？这一切都来不及思索，也找不出答案。

当召开中央电台部主任紧急会议，不点名地向大家下达了任务时，凭多年的政治敏感，大家在惊诧之中，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可谁都没有提出问题，谁都没有任何迟疑，立即分头行动起来。党的长期教

育和多次重大政治斗争的锻炼，使中央电台的工作人员形成了这样的传统和作风：一切服从党中央指挥，遵守党的宣传纪律，随时完成好中央交给的宣传任务；越是遇到紧急的重大的宣传，大家更是团结一致，兢兢业业，都能很好地如期完成任务。这是中央电台内部的一场“人民战争”，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一夜之间，清查和重新制作了所有的播出节目，整个节目内容、口径变了一个样。

### 放点烟幕弹

#### ——宣传策略的改变

当按照上述的要求广播了两天之后，原先预料之中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使人迷惑不解的是一直没有得到林彪到达莫斯科的任何消息。这种沉默更使人紧张，捉摸不定。苏联和世界舆论竟如此平静，这是怎么一回事？是林彪没有到达莫斯科，还是在玩弄什么花招？就中苏的紧张关系而言，苏联绝不会缄口不言，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这时候也陆续有所传闻：据我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得知，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在蒙古的蒙肯特省坠毁，机上九人全部死亡。为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向我国政府提出了抗议。这是不是林彪一伙出逃乘坐的飞机？一时弄不清楚，但终究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

在中央没有完全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以前，对宣传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避免突然引起大的社会震动和舆论的种种猜测，采取了内紧外松的做法，适当放宽了宣传报道的尺度，以赢得弄清问题真相、争取内部做工作以及主动公开的时间。在严格掌握、统一口径的原则下，在某些文章和某些节目中，有计划、有控制地适当出一出林彪的名字，用一些林彪的习惯用语，甚至也可以偶尔出一次“以林副主席为副”

的提法（当然都是用过去时，而不是现在进行时），放点烟幕弹，稳定舆论，稳定群众，争取做工作的时间。但是，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用什么、用多少，要全台统一掌握和安排，不能没有，也不能多。中央电台节目多，每个节目出现一两次，总结起来数量就不少。为此，中央电台成立了专门“把关小组”，精心设计，统一安排。当后来完全证实林彪一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之后，公开宣传中掌握的口径不是严了，反而对有关林彪等提法的掌握又放宽了一步。

这样做果然取得了预料中的效果，不仅很快“消除”了国内人们一时的猜测和疑虑，稳定了形势，也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外电已经出现的种种猜测和议论。起初，外电从我宣传口径的改变和飞机坠毁的猜测开始，出现了种种猜测式的报道，有几天几乎接近明朗化的地步。在我们的宣传策略改变以后，他们坠入了五里云雾之中，反而怀疑并否定了自己正确的分析和判断，逐步平静下来。

在这期间，在接待外宾的对外表态中，我们对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避而不谈。如有人问起，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含糊其词，“王顾左右而言他”。事有凑巧，正在这时，广播局接待了来访的罗马尼亚广播电视台记者组，由我陪同。我们有些接待单位并不知道发生的事，在介绍情况时仍然时常提到“敬爱的林副主席”，时常引用林彪的话，我只能是默不作声。在江苏省广播局负责人宴请罗马尼亚客人时，不知是无意还是有心试探，罗方领队举杯特意“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我们也佯作不知，跟着举杯，不置可否，一笑了之。

为此，因林彪的叛逃而改变了国庆 22 周年的庆祝活动，以避免由于出席人员的改变而引起猜测。中央明确通知，国庆不搞大型的庆祝活动，公开申明的理由是：新中国已经建立二十多年，局势稳定，不必年年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劳民伤财，把庆祝活动主要放在基层和用在实际行动中。一些国家领导人来电来函祝贺我国国庆，有的提

到林彪的名字，广播时为回避名字而摘要或综合播出。这些做法，竟没有听众提出疑问。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查清了事实，赢得了时间。从1971年10月上旬开始，按照中央的部署，在内部陆续传达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材料，不久在宣传中公开点名批判。从林彪“九·一三”叛逃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当放宽、又严格掌握的变化过程。这种宣传策略的变化是依据实际情况而定、依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立足点是有利于稳定形势，有利于政治斗争，有利于党和国家利益。

### 艰难的清查与播出差错

宣传上一旦公开，必须保证绝对不能再让林彪的名字、形象、题词、语录、习惯用语等以正面的方式出现；绝不能再让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否则即是严重的政治差错。

对此，虽然在公开点名批判之前已有所准备，但是要真正做到彻底杜绝差错很难：一是量太多。这类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日常播出的稿件、节目、库存录音胶带中，林彪的影子几乎无处不在，要杜绝差错几乎得把所有的节目和库存胶带翻个底朝天。二是类别复杂，难以分得清楚。有的非常明确，如林彪的名字、图像、讲话、写的文章、题词等，一目了然，很容易识别。但大量的不是这样，很难分得清楚，如类似林彪代表中央做的“九大”政治报告等讲话，不能算是他个人的报告；如以林彪的名义对外发的贺电贺信，以及外国党政领导人给他的贺电贺信等，并不是个人的交往等等。有的能分，有的则不能分，如何处理？是否都要禁止？三是林彪的许多用语并非都是他的杜撰，大多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名人经典、民间精粹，但被他剽窃运用后，

则其含义变了味，如何区分对待？四是林彪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正面语言出现，由于林彪所处的地位，他的话流传非常广，许多成为当时的口头语言和思维方式，散布在民众的用语之间，渗透在宣传报道之中，成为日常习惯语言，很难辨认，如何纠正？五是林彪的影响并非都是有形的文章和语言，而是他篡改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如“政变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等，如何经过辨析而消除影响？六是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以及他们树立的典型如何界定范围，这是一个政治界限，必须非常慎重，不能遗漏也不能扩大，有的清楚，如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以及周宇驰等，而更多的一时难以划清楚，何况人员又不断变更，扩大或缩小，需要不断地清理和调整。七是编辑、记者受到林彪等多年的潜移默化，过去的习惯可能一下子扭不过弯来，具体操作起来也很复杂，很难在落笔时不留痕迹。尽管有如此多的难题，但必须改，而八亿听众都是广播的监督者、批评者，稍有不慎，都在“纲”上，更要加倍小心。

为能做到彻底清除、避免误用，只有发动全台群众，打一场清理的人民战争。首先，立即把住现时播出关，然后各部门自行清查所有的节目，写出清查汇报，为安全播音打保票。中央电台还特意成立了专门的“清查整理小组”，分门别类地进行详细登记，提出处理意见，等上级批准后再进行处理。可以想见，清查登记了厚厚的一大本，分别不同情况提出的处理意见有：一、对林彪讲话、报告的原始录音上交，自己复制的可自行销毁，如林彪宣读“5·20”声明时中央电台的录音及其播出复制版等，一律销毁；二、林彪代表集体的讲话、报告，以及内外相互的贺电贺信等，内容可以选用，但不提林彪的名字；三、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的胶带，以及他们树立的典型，开始掌握从严，包括一时分不清、把握不准的，一律不用，待弄清楚后逐步放开；四、凡今后采访有影响的人物，都要认真研究其背景，要请示，为安全起

见主要报道基层工农兵；五、中央电台过去自制的节目、文章、歌曲等，凡是与林彪有关的，一律销毁，一概不予保留，消除一切错播隐患。最后，各部门清理后，领导签字画押，做出保证，做到责任分明，层层负责。尽管如此严谨，清查结束后，又查出没有封存或销毁的林彪讲话胶带 12 盘、混合讲话 2 盘、林彪语录歌 42 盘、文艺胶带 42 盘，几乎造成严重播出事故。

为确保安全播出，同时做出严格规定：任何节目都要坚持重播重审，认真再认真，过细再过细，查堵一切漏洞，绝对不能发生播出差错；中央电台的录音胶带一概不外借，除非是由中央批准的，也要严格登记；外单位来中央电台录音，除中央批准者以外，不管什么单位、什么人、什么内容和形式，一律不予接待；地方电台来了解宣传口径，中央电台工作人员无权回答，由台领导统一答复，也只能介绍我们的做法，没有传达领导指示的义务，不要让他们摸到中央的口径和具体布置，以避免误传，更不知道他们背后有什么人；中央电台外出工作人员，都无权回答地方电台和有关人员的相关提问。

不仅如此，另外一项长期任务，是在宣传报道中广泛、深入地开展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深层次地肃清他们的流毒，也就更为缜密和细致。要批判肃清、拨乱反正的问题太多，不仅针对林彪等阴谋篡党夺权在政治、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问题，还必须揭露批判他的极左面目及其不利于党、不利于人民的提法等名词、副词、形容词，以及受此影响而派生的各种流行语言。

如设国家主席、天才论、政权观、政变观、镇压观、顶峰观；如“三忠于、四无限”，敬制、敬献、宝书、宝像；如光辉著作、光辉思想、光辉题词；如“四个伟大”以及伟大指示、伟大教导、伟大方针；

如“紧跟”，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的指示传达不过夜，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如“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一本万利的事”，“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

如突出政治，政治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大于一切、冲击一切；如最最最，最高最活，胜利最大最大最大，代价最小最小最小，形势大好而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如用战备的眼光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如“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要用毛泽东思想统率每一根神经”，“把毛泽东思想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等等，几乎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可见要消除他的影响是一项多么艰难、艰巨的工作。

为此，中央电台成立了一个专题小组，经过几十天的广泛搜集，分门别类加以整理，专门就林彪用语编辑过一本册子，便于宣传中统一把握。但这本很有反面教育意义的册子没有保留下来。对于林彪极左用语，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些用语对于认识林彪、认识“文革”，对于现在和未来依然有警示作用。

尽管如此严格的清查，差错和险情仍然屡屡发生。1972年1月1日8点30分，延边电台在播出《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报告文学中，有赞扬林彪的话，这是过去的一篇作品，播出时没有严格审查。因为是地方台，影响小，也没有太追究。

清查中，把著名作曲家劫夫与林彪集团挂上了钩。姚文元给中央电台打电话说：劫夫有问题，不要再播出他的歌曲。当时劫夫的歌曲非常多且非常流行，只是中央电台胶带库内，一次清理就封存了劫夫的录音带680多盘，如《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们走在大路上》和《去争取胜利》等语录歌。不久，北京电台（国际电台）不小心对外播出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因为是对外，国内许多听众没有听到，只受到批评。不久，吉林电台、新疆电台又把已经封存的李劫夫的歌

曲播了出去。李劫夫是吉林人，把吉林台的错播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对有关人员进行了严格的审查。

一次又一次的差错发生在广播战线，给中央广播局军管敲了警钟！他们尤其担心“中央三台”（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电台、中央电视台”，下同）出问题。1月4日局军管小组抓住这些典型案例进行安全播音的教育，并严格规定了几项措施，发了狠话：一、凡是与林彪及其死党有关的各种节目等，除中央电台封存待处理（有保存价值的）以外，一律销毁，要有专人检查落实、画押，出了问题找他是问；二、对其他节目要再统统检查一遍，有专人签字画押，保证没有问题，如果出了问题，就找他是问；三、以后录音或复制节目，一律使用新胶带，不准使用过去曾经用过的胶带，谁违背谁负责；四、有问题的但需要保留的胶带，一律交台里统一保存，不能放在各编辑部。我们不能屡说屡犯、屡教不改，如果出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那就更无法向中央交代了！

但是，话音未落，事故真的在中央电台发生了！1月17、18日，中央电台两次出现了劫夫歌曲《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吹奏乐，事情发生后自己还不知道，是由北京电台一位工作人员和四川台、大连油泵油嘴厂、北京28中等听众来电话揭发的，这说明清查仍然不彻底，留有漏洞和死角，管理制度不健全。

当我得知后怀着恐惧向军管小组汇报时，不知军管小组负责人是惊愕还是气愤，竟然几分钟说不出话来！他指着我：“你们这样，是对中央指示和批林批陈的态度问题，为林彪、陈伯达及其死党招魂，我们没法向党中央交代！没法向毛主席交代！！没法向人民交代！！！这一问题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要作为路线斗争的典型来抓！”

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召开全体紧急大会，由文艺部做检查；我是中央电台宣传小组组长，负责全台的各类宣传，自然难逃其责，

我痛心疾首地承担责任，无限上纲上线，提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认罪。军管小组抓住发生在身边的反面典型，召集全局各部门负责人大会，作为“一次严重的政治事故”和路线斗争的典型向全局通报，并发出通知，要各相关部门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宣传上、技术上进行一次安全播音的全面整顿，绝对不允许再出政治性和技术性的任何问题。有人抱怨“没完没了地查，刚查完又要查”。有一位女同志说过一句话：“为劫夫感到惋惜，现在歌又少了。劫夫是不是敌人，我们又不掌握依据。”这简直是火上浇油，局军管小组似乎找到了发生差错的思想根源，穷追不舍，反复批判，事故的当事人后来说：“被折腾得脱了一层皮！”中央电台为保险起见，不得不销毁大批很有保存价值的录音胶带，丢失了很多珍贵的资料，也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

广播的头绪太多，终究难以“彻底”。1972年4月25日又发生了纪念册事件。中央电台听众工作联络部没有检查，发出了过去出版的97本纪念手册，4月30日北京机械厂听众周凡才来信揭发其中有林彪的像，当即查对属实，立即采取措施发电报收回，进行调换，把未发出的封存，查明原因，做了严肃处理。

### “四个伟大讨嫌”

——毛主席批判林彪“不利于党和人民的提法”

林彪的用语总是很特别，就是常用语言，也总表现出与他人不同。毛主席讲解放军要革命化、战斗化，林彪加上“非常”二字，“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以表示坚决紧跟和更加“革命”。还有什么文理不通的“非常无产阶级”等提法。

1965年纪念人民广播20周年时（实际是25周年），毛主席为人民广播事业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题词都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唯独林彪用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进一步做好广播工作而努力”。表现出他比别人举得“更高”，“文革”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林彪的用语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是他提出和鼓吹的几种政治用语；这些用语他到处讲，广泛流传，并由此派生出许多相关的用语，被毛主席称为“不利于党、不利于人民的提法（名词、副词、形容词）”。1971年11月24日传达毛主席对“四个伟大”、“紧跟”的批示：“不利于党、不利于人民的提法（名词、副词、形容词）不用。”以后又做了多次传达，多次强调这些词“不用”，毛主席亲自动手删节、制止，并加以批判。新闻界都经历过这个转变过程，在此只是简要提及。这些用语主要有：

1. 鼓吹“天才论”。林彪在1966年“5·18”、“8·18”、“9·18”等多次讲话中，大讲“天才论”。他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一句话中用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他说：“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才。”“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

毛主席早在1956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对领导人“不要发一切致敬电，不要提英明领导，不要用马、恩、列、斯、毛的提法，

不要迷信权威”<sup>①</sup>。1968年毛主席就说“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以后他多次删掉林彪、陈伯达提出的“三个副词”。1971年8月、9月毛主席在外地巡视，多次指出：“我不是不要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sup>②</sup>他明确说“我不是天才”。

2. 鼓吹“四个伟大”。1966年8月31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说：“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自此，“四个伟大”充斥在各种发言、讲话和宣传报道中，一次发言、一篇文章、一次节目总要反复出现多次，而且“四个伟大”必须同时并用，少一个不行，位置颠倒了也不行，须处处加倍小心，不然就是政治问题，就是反对毛主席。林彪叛逃后，1971年11月，毛主席在会见美国作家爱德加·斯诺时说“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四个伟大讨嫌”，后来毛主席又说过多次。

3. 鼓吹“三个里程碑”。林彪反复鼓吹“三个里程碑”，“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要对毛主席“无限崇敬”，对毛泽东思想“无限信仰”。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信誓旦旦地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最高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

① 胡哲峰，孙彦编著：《毛泽东谈毛泽东》，第23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

② 同上，第246页

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所作所为，正应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1970年4月22日，“两报一刊”发表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毛主席审稿时删除了“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毛主席批示：“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sup>①</sup>

4. 鼓吹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立竿见影”。林彪主持编纂了《毛主席语录》，他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一本万利的事”；“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5. 鼓吹“紧跟”。“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等一系列的“紧跟”。“毛主席的指示传达不过夜”，“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等。对此，1972年1月毛主席说：“有人提出新的名词说‘紧跟’，我不爱听这个话。什么‘紧跟’呀？”对此，新闻界认识是混乱的，曾经变相提出“紧跟”一词不能用，可以用“跟着”、“永远跟着”的词语所代替。

---

① 同上

6. 鼓吹“三忠于，四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崇敬，无限忠诚，无限敬仰”。1971年毛主席南巡时说：“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毛主席把删除“万寿无疆”、“三忠于”、“四无限”的提法，看作是“去掉了几个浮夸的形容词”，认为是不符合唯物主义、不科学的。据传达，电视中尽是歌颂主席的，充斥着“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等，毛主席看了不高兴，看看就走了。对此，新闻界并没有理解，开始认为是具体所指，讨论中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有人提出“永远忠于、无限忠于不能用，但忠于可以用”，认为“忠于毛主席也没有错，特定情况下也不是不可以用，但天天这样讲，篇篇这样讲，就不好了”。

以上只是林彪几个最典型的政治用语，盛行于各个方面，尤其是媒体中。自1968年以来，毛主席针对社会上和内外宣传中的极左思潮，接连就对外宣传做出一系列的批示，严厉批评了内外不分、自吹自擂、强加于人的做法；就对内宣传中林彪等鼓吹的政治用语，多次删除，多次提出批评，1971年11月24日传达毛主席对“四个伟大”、“紧跟”的批示：“不利于党、不利于人民的提法（名词、副词、形容词）不用。”

在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一万句”、“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不过夜”的年代，对毛主席的指示自然是非常重视，但那时新闻界的认识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局限，在学习讨论宣传报道时上上下下都心存余悸。如，到底还用不用“四个伟大”？自上而下的传达者谁也不谈具体意见。一些人对“四个伟大”并非没有想法，但谁敢说？也只能由毛主席自己说；现在是毛主席说了，大家仍不敢直说，宣传报道中仍然不敢不用，最担心的是运动反复，风向一变被戴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

新闻界对此进行过多次学习讨论，有人解释毛主席批评“四个伟大”“那是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毛主席可以那样说，但我们不能这样做”。

因此，学习讨论的结论是：一、不是不用，而是“四个伟大”如何用的问题，只要用得恰当可以用；二、不是不用，而是少用，不能滥用，“四个伟大”不要同时用，分别用一个或者两个是可以的，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或“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显然，绕来绕去，谁也不敢说不用或不能用；三、新闻界各单位彼此观望，中央广播局军管领导人明确提出：对“四个伟大”如何用，我们跟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一致，他们怎么用我们就怎么用，与他们“保持口径一致”，我们不要走在头里。

我记得，1972年2月，新华社把一封电报送给周恩来总理审，送审的开头写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收到了一封电报”。周总理说，主席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就说“四个伟大讨嫌”，你们又用了，只写“毛主席收到一封电报就行了”。后来，毛主席对“四个伟大”的提法多次提出批评，直到传达说：“毛主席严厉地说，说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一句也不顶，我说了的话你们不改。”这时候才逐步得以纠正。

那时候，对于不利于党、不利于人民的名词、副词、形容词的掌握，当时主要集中在对林、陈反革命集团的清算上，而没有更广泛、深入地联系实际展开讨论；更多的是当作语言问题对待，而没有深层的分析，所以也就难以杜绝。

### 叶群：“抓电台，炸电台！”

——清查广播局中的大小舰队

1971年“9·13”林彪叛逃后，中央陆续印发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材料》，以供全国、全军进一步揭发批判。中央广播局及其所属“三台”，是中央对内对外新闻宣传舆论的重要阵地和中央机密要害单位。国内外大量的事实表明，一个国家的政权更替，特别是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者，首先是抢占、控制新闻宣传舆论阵地，尤其是抓广播电台。

林彪又是研究政变、念政变经的老手，当然十分清楚。

林彪 1966 年 5 月 18 日讲话中大谈政变经。他说：“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林彪的名言“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特别是“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

林彪叛逃之后，有许多不寻常的事实和迹象，更引起了中央对广播局的注意。一是广播局的群众揭发出林彪大小舰队与广播局人员密切来往、插手广播局的大量事实，披露出许多蛛丝马迹；二是中央专案组又从林彪的妻子叶群的办公室中搜出，在叶群的笔记本上写着“抓电台”、“炸电台”（被正式列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材料》），这就更印证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搞政变非常看重广播电台，而且早就盯上了广播电台，能掌握就掌握，不能就炸毁电台；三是中央广播局于 1967 年年底就实行军事管制，而从陆、海、空军抽调来的主要军管负责人，与林彪及其干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是否有关联？也就更增加了对林彪一伙早就预谋掌控电台的疑虑。这一切显示，广播局与林彪大小舰队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清查林彪反党罪行时，广播局结合实际进行了广泛的揭发和清查，基本问题已经搞清楚。但是，在林彪叛逃过去已经两年多后，1974 年年初在江青等人掀起的“批林批孔批大儒”中，又把广播局与大小舰队的问题重新提起，而且风马牛不相及地与揭发批判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及其影片《中国》联系在一起，把接待安东尼奥尼定性为“外交上的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显然是另有企图。

1974 年年初，中央文革小组决定，从 1974 年 2 月 6 日开始，在京西宾馆举办“广播局核心小组批林批孔扩大会议”学习班（简称“京

西宾馆学习班”), 把电影《中国》事件与清查林彪“大小舰队”在广播局的活动联系起来, 进行调查, 组织批判, 以“彻底解决广播局的问题”。那时, 遵循毛主席关于“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最新指示, 各种各样的学习班胜似雨后春笋, 要办什么事, 都要办学习班。但这个学习班却非常特殊, 学习班竟长达 9 个月(这是我所知道的最长的一次学习班), 广播局从“中央三台”和各机关选调的 120 多人, 其中有 7 个多月吃住都在京西宾馆, 先是揭发批判安东尼奥尼和他的影片《中国》, 后是清查林彪“大小舰队”。学习班开宗明义地说:“广播局这样的重要单位, 又有那么多的问题, 需要彻底地解决一下。中央决定采取这种形式, 住在京西宾馆集中搞。目的结合批林批孔, 联系广播局的实际, 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 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广播局的活动, 你们那里与大小舰队挂了钩, 小舰队开进了广播局, 还有批判反动影片《中国》, 肃清流毒。”

在学习班进行过程中, 1974 年 6 月 22 日传达“中央首长接见时的谈话”(那时常常不指明是谁)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广播电台非常关心, “九·一三”事件后, 毛主席问过电台的安全警卫问题。凡是搞政变的, 都要抓广播电台。世界上都是这样。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也是这样干的, 反革命分子叶群的笔记本上就写着“抓电台”、“炸电台”, 大量的事实表明他们对电台已经抓了, 陈伯达、王力、李广文、李敦白在广播局搞篡权等阴谋活动。广播电台是要害部门, 是两个司令部争夺的阵地, 必须掌握在党中央和无产阶级手里, 一定要保证安全, 消除隐患。广播局批林批孔会议, 重点是解决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 把“大小舰队”在广播局的罪恶活动查清楚。中央 17 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 如秘密录音、频率表等问题, 参与了阴谋活动、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服务的, 一定要查清楚, 有坏人要查出来。陈伯达、王力、李广文、李敦白在广播局也是搞阴

谋的，也要查。

中央电台重要，林彪政变必然抓电台，叶群明确要“抓电台”、“炸电台”，大量的事实表明他们对电台已经抓了，那么除了陈伯达、王力、李广文、李敦白，在广播局还有谁来抓，谁是他们的代理人？他们抓了些什么？显而易见，当时在广播局执掌大权的是军管小组，军管小组属于军队系统，他们的领导人来自各个军兵种，他们与林彪和部队几大总部过去有着隶属关系，以后不断交往，自然成为怀疑的对象，成为清查的主要对象。

9个多月的学习班，前一阶段主要清查安东尼奥尼（另文记述），后一阶段主要清查林彪的“大小舰队”。有关“大小舰队”进驻广播局的事实，与过去的揭发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主要事实有：

——1970年10月，经军管小组介绍，中央广播艺术团在中央电台大录音室，为李作鹏下令作曲的《重上井冈山》秘密录音。据传说是准备在林彪政变成功后用来代替《东方红》用的。

——1971年9月9日，在林彪叛逃前夕，林彪死党周宇驰曾经向广播局要去周围国家广播频率表，据说是为“大小舰队”提供导航用的。以上这两件事最大。

——1969年5、7月份，总后邱会作曾经通过军管小组的领导人“借走”两部从西德进口的录音机，直到1973年6月18日才取回，“为大小舰队”提供技术器械。

——与总后邱会作有关的电影《“五·七”指示万岁》，让中央广播艺术团参加合唱录音，并为之配乐。

——1970年10月和1971年8月，通过军管小组，中央电台两次为《平型关沙盘》解说词录音，是借此吹捧林彪。

——在广播局传读林立果在空军的讲话，为小舰队培训技术人员等，这证明“小舰队开进了广播局”。

10月学习班结束后取消了广播局的军管，一些从部队来的负责人陆续被返回、调出广播局。

“四人帮”把批判影片《中国》与清查“大小舰队”两个互不相连的问题放在一起，是想达到两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当时许多人已经意识到批判安东尼奥尼与影片《中国》是针对我国外交和周恩来总理的，企图篡夺外交大权，这是他们要达到的一个目的。但对清查林彪“大小舰队”的用意没有产生过怀疑。

后来，江青反革命集团暴露以后，再回过头来思考这次学习班，给人以新的启发：毫无疑问，林彪反革命集团搞政变是要抓电台的，但这次学习班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此替代林彪反革命集团控制广播局的一个重大步骤。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革”初期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但后来明里暗里进行着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党的“九大”的权力分配上已暴露出他们之间的矛盾，各自安插和扩大自己的势力。“文革”中，对广播局等中央新闻舆论机关实行军管，陈伯达分管宣传舆论和意识形态，无疑加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的阴谋暴露，“四人帮”趁机推出姚文元接替陈伯达掌握了宣传舆论大权。

“凡是搞政变的，都要抓广播电台。世界上都是这样。”江青反革命集团当然不会例外。林彪叛逃几年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借在广播局清查大小舰队的名义，达到牢牢控制广播电视舆论宣传的目的，为他们的篡党夺权做准备。后来的事实也充分给予证明。

林彪反革命集团从发迹到覆灭，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给人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毛主席也由此大病一场而难以恢复。这一奇特的重大事件留给后人很多的思索。

在开始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进行批判时，人们时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是“林彪是极左还是极右？”，从林彪发迹看靠的是极左，而最

后的恶果是极右，有人概括为“形为极左实为极右”。事实上“左”和“右”没有严格的界限，极左者往往也是极右者，从这边很容易倒向那边。但以极左面目出现最容易掩饰自己，也最容易得势。

历史和现实经验告诉我们：凡是虚假的都需要掩盖，野心需要掩饰，他们善用的伎俩是迎合、谄媚、吹捧。林彪包藏祸心，以极左的面目，好话说尽，最后图穷而匕首见，坏事做绝。“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应该说，这类人不难识别，但却让其屡屡得手，根源是上有所好，下有所投。

历史上的毛泽东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一直严守着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防线，但在“文革”前期，他感到由于政治斗争“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就屡屡被康生、陈伯达等政治阴谋家钻了空子，而林彪更是登峰造极；他的造神用语是其政治野心和那个时代相结合的产物。后来毛主席及时地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1968年毛主席说：“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在对内对外宣传中竭力扭转一些极左的言辞和做法，有些是针对林彪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12月28日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很有感触地说“个人崇拜现在没必要了，要降温了”<sup>①</sup>。随后，尤其在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批评的针对性更为明确，避免了一场严重的政治悲剧的发生，但是没有能够避免严重政治损失，没有清除它的影响。

这种历史现象今后还会不会重演？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此类人时时存在，此类现象更会绵绵不绝地以各种形式表现在各个方面。真理无需粉饰或追捧，总是朴实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贵有自知之明”。说是如此，但有几人明智？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六 安东尼奥尼与影片《中国》的风波

### 安东尼奥尼来华拍片过程

1972年5月13日至6月6日，应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邀请，意大利著名制片人、导演安东尼奥尼率电视摄影团队访华，先后到北京、上海、苏州、南京、林县等地拍摄了大量素材，回去后制作了电视片《中国》，在意大利和一些国家和地区放映，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与涉外风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文革”中极少批准外国人来华拍片，1970年11月意大利与中国建交后不久，意大利广播电视台公司向我国外交部新闻司提出希望派人到中国来拍片，并特意说明将由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执导，显然是有意表示友好和重视。此事由意大利驻华使馆转告我国外交部新闻司。我方分析，他们要来华拍片的目的，一是表示友好，二是商业运作，但客观上有利于对外介绍中国。我国外交部让我驻意大利使馆了解情况、提出意见，后经广播局军管小组分管宣传与外事的副组长戴征远和外交部姬鹏飞、乔冠华同意批准。因为属于广播电视台摄影，由广播局发出邀请，并负责接待。陪同兼翻译是北京电台（中国国际电台）意大利语部的张文润，还有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分管是广播局负责外事工作的副局长金照。

安东尼奥尼制作的电视片《中国》，是在中国几个城市拍摄的电视纪实片，在制作上，他与我们的认识和视角不同。那时候，中国被世界了解甚少，而误解却甚多，在西方等外国人的眼里，中国是一个“极其神秘的国家”；安东尼奥尼虽然是意大利共产党党员，但他毕竟是外国人，他有自己的阅历、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他又是电视制片人的导演，就特别注意从西方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社会，以他或他们对中国的好奇心来选取镜头，他认为“他感到好奇的东西，也正是外国人对

中国想要了解的东西”（其实，“好奇”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心态）；安东尼奥尼又是一个商业制片人，与我们一切为了“突出政治”完全不同，属于商业运作，他事先就为影片找卖点而进行设计，争取更多的西方电视台能够购买他的片子版权，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因此他必然迎合西方人的兴趣。

安东尼奥尼在中国共拍摄约 9.6 万尺胶片，约合 35 个小时的素材，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为迎合接待人员，他们也拍摄了中国的某些“伟大成就”，但在编辑制作过程中却突出选取了中国特有的人文、风情、民俗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而弱化和舍弃了我们认为反映、颂扬“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和发生深刻变化”的镜头；编排手法上，他更多的是迎合西方和外国人的猎奇，采用西方惯用的表现手法进行渲染，镜头中有蓝色衣服的海洋、蜂拥的自行车车队、光着膀子的人力车夫和农夫、城市的手工作坊、南方水乡的拱桥和蓬船、扛着锄头的知识青年、缠足的老太太、乘凉的市民、对摄影好奇的光着屁股围观的小孩、车间飞花的棉纺厂等，而却没有集中表现我们所希望的反映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南京长江大桥、万吨巨轮、红旗渠、万里长城和取得“伟大胜利”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只应该反映中国阳光的正面，却有着某些消极的阴暗面。

应该说，影片比较客观地表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人文风情，体现了一个西方人观察中国的视角，既反映了中国的进步，也反映了落后面，它不同于某些西方媒体只是有意报道负面，客观上有助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尤其是对于那些了解中国甚少、对中国抱有神秘感或偏见的外国人。

影片《中国》长达 3 小时 30 分钟，于 1973 年 2 月初在意大利总电视台分三次播出，随后在世界广泛发行，西方国家一些电视台购买播映，引起较大的反响，褒贬不一，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总的反应

是正面的、积极的。应该说，这种反应打破了那时国际社会对中国负面认识一边倒的倾向，引起对中国不同的议论，是一件好事。但中国传统文文化中一向喜欢“歌颂”、“赞扬”，中国人爱听好话，那时的中国又正处在“文革”的狂热时期，与世界接触甚少，封闭自傲，怎能接受得了《中国》所反映的现实，怎能容得下半点对中国的“不尊不敬”？而台湾也在购买播放，也许是出于同一文化的原因，台湾也竟认为《中国》是对大陆的负面反映，暴露了大陆的贫穷、落后和混乱。出于这种阴暗心理，他们利用《中国》这一影片对台湾民众进行大陆落后面的教育，这成为后来批判《中国》时“最有说服力”的重要依据之一。

### “四人帮”对影片《中国》发难

在影片《中国》放映过程中，国外有人向国内反映《中国》歪曲了中国人民的形象，引起了国内的注意。按照预先商定，播出片要事先送我驻意大利使馆审阅，但直到播出7个月后的9月份，经多次交涉才交我使馆，1973年11月10日传到国内审看。12月12日，姚文元给中央广播局领导来电话说：“请你们查一下，有个意大利记者叫安东尼奥尼，在你们国际联络部陪同下拍了一个电视片，名叫《中国》，发行很广泛。我听说是严重污蔑中国的。据说，美国人（一家广播公司）花了25万美元（购买放映）。这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是在你们联络部陪同下拍的，要严肃对待。”广播局闻风而动，立即调查，战战兢兢地写了情况汇报。12月13日我外交部向安东尼奥尼提出抗议，表示“遗憾”。

不久，1973年年底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对于“四人帮”大张旗鼓地推行“批林批孔”的真正用意许多人心知肚明，其目的不在林彪，

也不在孔子，而是借题发挥，公开声称是“批现在的大儒”、“批宰相”、“批周公”，影射攻击正在生病的周恩来总理。

1974年1月24日，江青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批林批孔”大会上，把《中国》定性为“反华、反动、卖国”的影片，是“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正在这个时候，12月17日广播局国际联络部有人投其所好，给姚文元写了揭发信，揭露《中国》影片在接待和拍摄过程中“丧失原则”的种种“严重问题”，正中“四人帮”的下怀，给他们送去了一发难得的重磅炸弹，“四人帮”借题发挥，对《中国》的上纲迅速升级。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看了影片《中国》和揭发信后，认为影片是“有意歪曲、丑化中国，反对中国共产党，任何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看了都会感到极大的愤慨”。他们组织中央政治局的人看，江青、姚文元还在那封告状信上画了道道，做了批示，印发内部传阅，声言要进行彻底追查。

12月31日，姚文元给广播局打电话说：“政治局的同志看了电视片，非常愤慨，简直不能看下去！这完全是有意地丑化中国人民，丑化社会主义中国，是一部非常恶毒的反共、反华、卖国的电视片，没有一个好镜头。对新中国的东西极端丑化，对中国极端仇视！没有你们的人员做后台，是不可能拍出来的，有关人员要做检讨，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这是反共卖国的，要认真对待！中央要派人调查。”此时立即组成了以中央组织口负责人郭玉峰牵头的“反动影片《中国》联合调查组”。

1974年1月9日，江青对国务院文化组讲：“意大利的那部坏片子，我看了很生气，奇怪的是那样的坏人是我们自己请来的！你们不但要看，还要组织批判，提出处理意见。”江青等人此言一出，立即组织在中央和各地领导层中内部放映《中国》，组织批判。

1月30日，“反动影片《中国》联合调查组”向中央“文革”提

交报告，诬称接待中存在丧失政治原则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和丧失国格人格的“卖国行为”，要组织批判，对有关人员进行处理。

也就在同一天，1月30日《人民日报》奉命在第二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长篇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文章列举了影片一系列严重问题后，最后归纳总结说：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之行，不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更不是为了增进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敌意，采取别有用心的、十分卑劣的手法，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专门搜罗可以用来诬蔑攻击中国的材料，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污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侮辱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华挑衅投降。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回答国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挑战。这是当前值得人们十分重视的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对影片《中国》的批判由此从内部转为公开，掀起了全国性的讨伐、批判高潮，各媒体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除了“反共、反华、间谍”，还给安东尼奥尼戴上了“反华小丑”、“法西斯分子”、“帝国主义分子”、“充当了已经破产的苏修反华宣传的应声虫”等帽子。

安东尼奥尼说：“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指责我，这真是闻所未闻。”

由此波及涉外许多领域如电视、电影、外国文艺、外国来华人员以及文化交流等，有关部门诚惶诚恐地进行清理和清查。安东尼奥尼与影片《中国》事件，一时轰动了国内外，并酿成了一起严重的涉外事件。

### 长达九个月的京西宾馆学习班

“四人帮”首先为《中国》影片事件定性，接着是深入追查，对有关人员进行处理。江青、姚文元多次强调：这个片子“没有陪同人员和后台是拍不出来的”。称赞写揭发信的人是“反潮流的英雄”。很显然，这件事的责任者首先落在中央广播局身上，安东尼奥尼来华拍片是经外交部批准、以广播局的名义请来和接待的，当然也涉及外交部新闻司、我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甚至连文化部门和各地接待安东尼奥尼拍片的部门都脱不了干系。

在进行了一段轰轰烈烈的追查批判以后，“四人帮”一伙仍然觉得没有“完全搞清楚”，他们又提出进行深入清查，把重点放在了中央广播局。江青说，反动影片《中国》“是很坏、很恶毒的，是一部卖国片，认敌为友。外国人拍，与中国人有关系，要彻底搞清楚，还有其他片子”；“你们那里（广播局）是要害机关，中央对你们很不放心”。

由此，中央“文革”决定，把《中国》事件与清查林彪“大小舰队”在广播局的活动结合起来，深入调查清楚，组织批判，肃清流毒和进行处理。所采取的措施是：从1974年2月6日至10月，在京西宾馆举办了“广播局核心小组批林批孔扩大会议”学习班，以“彻底解决广播局的问题”。这个学习班从“中央三台”和各部门选调120多人参加，长达9个月，其中有7个多月吃住都在京西宾馆，不分早晚和休息日地进行学习批判，其紧张气氛可想而知。

这是我所经历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学习班，即使在那个时候也不多见。这也是我所经历的生活条件“最优越的一次”学习班，在全国人民吃住紧缺的情况下，我们住在京西宾馆，除去一天三餐，夜里十一点半还有夜宵，其中有牛奶、馄饨、醪糟、鸡蛋、面包、油条等，当然都从国库里开支。

学习班开宗明义地说：“广播局这样的重要单位，又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彻底地解决一下。中央决定采取这种形式，住在京西宾馆集中搞。目的是结合批林批孔，联系广播局的实际，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广播局的活动，你们那里与‘大小舰队’挂了钩，小舰队开进了广播局，还有批判反动影片《中国》，肃清流毒。”

当时，大家心里犯嘀咕，学习班的两项内容与“批林批孔”不一致，清查林彪的大小舰队与批判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后来却用把“国际阶级斗争与国内阶级斗争相联系”做了“解释”。学习班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由姚文元负责，领导小组由中央组织口负责人郭玉峰牵头，“中央文革”成员王曼恬为第二把手，成员有中央组织口的李某、中央对外联络部门的李某等，他们经常坐镇京西宾馆。

学习班开始后，首先用了较长的时间，把批判反动影片《中国》“作为联系实际、揭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盖子的典型事例和突破口”，集中火力揭发批判，深挖幕后指使人。学习班自然把火力集中在广播局自己身上，白天黑夜利用各种形式促使他们交代，大小批判会开了若干次，最后对金照、张文润等进行了严厉的处分。

### “四人帮”追查影片后台的用意

“四人帮”对这种结果当然不满意。其实，大家心中清楚，“四人帮”这么无知、蛮横地插手外交领域发难，又如此大张旗鼓地故意把事情

做大，真正用意绝不在几个具体人员身上，其深层目的是以影片《中国》为突破口，矛头指向外交，指向周恩来总理，企图篡夺掌控外交权。

这绝不是臆想和推断而来，从以上“四人帮”的言行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的用意。具体而言：第一，谁都知道周恩来总理一直负责我国的外事工作，“四人帮”一再把事件定性为外交上的“卖国行为”、“投降主义”，一再暗示要深挖事件的“后台”，再联系到在这前后被他们闹得沸沸扬扬的什么“卖国主义”的“风庆轮事件”<sup>①</sup>、“蜗牛事件”<sup>②</sup>等涉外事件，他们竭力挤压我国的外交工作，损害我国的外交形象，他们的发难绝不是就事论事；第二，当时的外事活动是由周总理审批的，他们总认为这次事件周总理也脱不了干系；第三，他们当然会知道周总理和外交部规定的接待境外记者的原则：“既然让他们去的地方，就让他们拍。”

① “风庆轮”是我国制造的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1974年9月30日远航成功回到上海港，这是一件好事，证明了我国有一定的造船能力。奇怪的是“四人帮”反其意而闹事，他们说风庆轮早就应该远航而没有远航，是因为国务院存在着主张买船的修正主义路线，“造船工业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江青说：“交通部却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主义哲学，不向他斗争可以吗？”王洪文还下令把交通部派往船上领导工作的干部李国堂等扣留在上海进行批斗，因为他们对王洪文插手交通部不满，说上海市委极左，并拒绝把进口船只作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加以批判。“四人帮”坚持要处理“风庆轮事件”，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和国务院。当时周总理生病住院，他们就向邓小平发难。在一次会上，江青突然叫邓小平对“风庆轮事件”的处理立即表态。江青气势汹汹地问邓小平“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邓小平严正地回答：“这是强加于人！”“我要调查！”张春桥站起来说：“我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就跳出来了！”在“四人帮”围攻下，邓小平愤然离开了会场，以示抗议。会议无结果而散。后来，毛主席在长沙听到有关“风庆轮”的反应后，指出：“‘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在闹。”

② 1973年，为发展我国的电子工业引进彩电显像管成套设备，经周总理批准，国务院第四机械工业部组织技术考察团到美国等考察，一家美国公司送给考察团成员每人一个玻璃蜗牛。“批林批孔”中有人报告了江青，江青借此无限上纲，说这是帝国主义在侮辱我们是在爬行，还背着一个沉重的壳；大骂有关部门是“卖国主义”、“洋奴”，“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命令要退回去，并提出抗议，内部进行追查；江青还下令四机部不要买美国的彩色显像管生产线。周总理让人做了调查，蜗牛是当地象征吉祥的节日礼物，以表示友好和祝福。此事平息了，但引进也因此作罢，并严重干扰了设备技术引进工作。（以上注解摘自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李先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回顾过去，我清楚地记得，1972年外交部对境外电视台来华拍片有过明确而明智的意见。例如，1972年4月，经外交部和周恩来总理批准，同意邀请南斯拉夫电视摄影组来华拍片一个月，这次拍片也是由广播局接待，由我负责陪同。在周总理批准的由外交部起草的接待方针中明确规定：“既然让（他们）去的地方就要让拍，他们怕陪同的人制造困难，他们会看陪同人员的脸色行事；他们要正面报道中国，但总是外国记者，他们要吸引观众，要猎奇，但并不是出于恶意；与他们谈什么、拍什么，我们都要事先有准备，很好地安排，所拍胶片可以带回去冲洗。”对于这些规定，外交部新闻司在向我们布置这一接待任务时，还对此做了具体说明。他们说：“对南斯拉夫摄影队要给予友好接待，对其拍片要求，根据以我为主的原则和实际可能尽可能安排；他们要写报道，要多拍素材是正常的；他们想了解中国，但了解很少，存有许多糊涂认识，这也是正常的，我们要耐心地做工作，通过他们的电视镜头帮助我们进行宣传。”须知，这是在“文革”中，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今天依然有指导意义。应该说，这次对安东尼奥尼的接待也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显然，“四人帮”有意把造成《中国》影片的原因归结到这一指导思想上来，而没有贯彻他们所主张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维护国家主权，重视国际阶级斗争，提高警惕”的接待方针。

如果连同在这前后“四人帮”发难的“蜗牛事件”、“风庆轮事件”等一起来看，“四人帮”的用意就更加清楚了。“四人帮”早就想插手外交领域，他们在这时接连发难，小题大做，发动一系列的攻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疑虑，误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另外，与此相反的是，“四人帮”的小题大做，使安东尼奥尼一时成为西方媒体报道的焦点，影片《中国》被世界许多国家争相购买放映。

我在2009年9月15日的《作家文摘》上，读到引自2009年《瞭

望周刊》第37期上刘芳文写的《1974：一部纪录片的“恶毒用心”》一文。文中透露，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8年11月1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批判和清理“四人帮”罪行时，李先念提出“四人帮”利用影片《中国》来反对周总理，要外交部好好研究一下。1979年1月25日，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报告，指出1974年“四人帮”大搞对影片《中国》的批判，“其险恶用心主要是打击、诬陷敬爱的周总理，干扰、破坏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同时借机诬害、打击干部和群众”，对造成的“冤案错案，应予彻底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中央作为文件下发，为有关人员平了反。（在此之前的1977年1月，中央发文恢复了金照中央广播局副局长的职务。广播局为张文润等人平了反。）后来，2004年曾经再次邀请安东尼奥尼访华。2007年，安东尼奥尼病逝。这是后话。

此事已成历史。事件本身与前后的变化，留给我们许多思考的话题，尤其是对我国的外交和对外宣传工作。

## 七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续篇）

### 华国锋亲笔信谈耿飚如何进驻广播局

1976年10月6日粉碎了“四人帮”。

在这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在这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中，耿飚、邱巍高等奉命进驻中央广播局，夺回和掌控了常年被“四人帮”篡夺的广播、电视宣传舆论权。我在《新闻背后的故事》一书《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一文中，详细记述了耿飚、邱巍高等奉命进驻中央广播局的过程，同时就社会上对耿飚等何时进驻广播局的几个疑点问题的不同议论进行了考证。但是，对耿飚等人是什么时候进驻

的广播局，并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直到2009年5月，我才看到华国锋写给耿飚夫人赵兰香的亲笔信，得到了最权威的第一手材料。

2009年4月纪念耿飚将军诞辰100周年摄制组对我进行访谈，让我介绍粉碎“四人帮”时耿飚奉命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情况。5月，我收到耿飚的长子耿志远赠送给我的《耿飚将军》纪念册。在纪念册的首页印着华国锋2007年3月6日为耿飚所做的题记，豁然醒目：“耿直坚毅——赵兰香同志惠存。华国锋，八十有六。”<sup>①</sup>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耿直坚毅”四个大字下面，华国锋书写了一篇长文，我过去从来没有见他书写过这么长的文字，详细地记述了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他派遣耿飚“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整个新闻舆论宣传各单位”的具体过程。这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实情弥足珍贵，是最准确最权威的第一手文献资料，现将全文抄录如下（注：文中标点符号和括弧中的字是笔者所加）：

“耿飚同志一生对党对人民对祖国忠心耿耿。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晚，我在中南海召集耿飚、韩念龙、刘振华研究处理有关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稿中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问题，决定即刻给已去联大的代表团通话，将这句伪造的临终嘱咐删去。耿飚等同志态度坚决，立即照办。根据我平时的了解，我已内定在‘四人帮’隔离审查后，拟派耿飚同志立即进驻新闻舆论宣传各单位。我当时告耿飚同志，近日有事要交你办，不要出门，不要离开电话机。他没有问什么任务，就脱口而出：随喊随到，坚决照办！十月四日下午，我又把他叫到住地谈话交代任务，他仍坚定地说坚决照办。十月六日晚将‘四人帮’隔离审查后，我即打电话要耿飚立即赶到中南海怀仁

① 赵兰香是耿飚的夫人。华国锋于2008年9月去世，享年87岁。

堂接受任务。耿到后，我告他‘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现在我代表党中央派你立即组织人员去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整个新闻舆论各单位，也由你派人统一监管。耿要（我）写手令，我即时写就，交给他去执行任务。耿飚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了新功。耿飚同志生前，曾将他参加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写了文章送人民日报，希望发表以纪念粉碎‘四人帮’二十周年。但隔了一段时间未见发表，耿问人民日报负责人，答复文章写得很好，也是事实，但不经过中宣部领导批准不能发表。

赵兰香同志惠存华国锋八十有六”

华国锋题记明确了，是在6日晚8点多粉碎“四人帮”之后给耿飚打的电话，而不是过去我和他人记载的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这一大的界限清楚了，应以此为准。至于具体是什么时间，我曾经在《关于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一文中，列举了晚上7点多、8点半、10点等几种不同的说法。在《耿飚将军》纪念册中的“临危受命”一节中，记载“由于华国锋了解耿飚对‘四人帮’不满，确定由耿飚担负接管广播局的任务。1976年10月6日晚上9点左右，（华国锋）召耿飚到中南海怀仁堂，命令接管广播事业局。耿飚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巍高，带着华国锋的手令，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掌握了被‘四人帮’长期控制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看来这一记载是符合实际的。但纪念册中又刊印了当时耿飚进驻时的记事手迹，其中有“20:00接受控制广播电台任务，进驻广播局”的记载，即晚上8点钟。受命于晚上9点，而晚上8点接受任务，看来时间上仍没有完全统一，可能记录有误。

1976年10月6日晚事件回放

10月6日晚，中联部部长耿飚、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等人突然来到复兴门外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径直闯进了局长邓岗的办公室。他们是奉华国锋之命执行一项特殊的紧急任务。邓岗正在低头办公，耿、邱的突然出现使他大为吃惊，莫名其妙。他们都是熟悉的老朋友，二人来局事先竟一无所知。耿飚说，我们是奉命到这里来的。接着，耿飚把华国锋的手令摆在了邓岗的面前：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

邓岗看着，紧张地思索着，沉默了大约三分钟的时间，大概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又如何应对。耿飚说，你如果现在想给姚文元打电话也可以。邓岗说没有必要了。随后，即依照耿飚的意见，立即召集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和局领导开会。

这一过程，我自然无从知道，都是耿飚回忆介绍这段历史时说的。政治斗争是严肃无情的，在这场斗争的关头，短短的三分钟，邓岗经受住了政治考验。我们以往读史知道，这种时刻常常因几分钟、几秒钟，或一句话、一个举动、一个眼神，就能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没有料到这种事竟发生在我们身边。后来，2009年1月17日晚，在一次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联欢会上，老朋友周幼马告诉我说，耿飚的家人曾经对他说：粉碎“四人帮”不久，耿飚回到家里，兴奋地给家人讲了这一过程。耿飚说，他看见邓岗想拿电话机，手动了动又停下来了。只要他拿电话机，我就立即逮捕他，问题的性质可能就变了。

在突如其来的事变中，邓岗经受住了考验。他马上召集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开会，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执行中央的决定，接受耿、邱二位同志的领导，确保广播电视准确及时地传达党中央的声音。

后来，耿飚回忆来广播局的过程说：“10月6日晚，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去接受任务的时候，叶剑英元帅就坐在一个高凳子上等着，中央领导亲自交代任务。”“中央三台”是党和国家的要害单位，一向内外岗哨戒备森严，负责警备任务的是北京卫戍区部队，邱巍高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他的参与，一是不经事先打招呼可以直接进入广播局；二是可以随时调动广播局的警卫部队。耿飚说，他进广播局后急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局核心小组成员和局领导集中掌控起来。

掌控中央电台直播室，这是耿飚等人进广播局后急需要做的第二件事。耿飚等进广播局的紧急任务是掌控“中央三台”，夺回长期被“四人帮”控制的广播、电视的宣传大权，控制住局势。他们进局后的主要目标是中央电台，首先是控制中央电台的直播室。

10月6日，耿飚等人一进驻，广播局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警卫战士频繁调动，增加了岗哨，增加了执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我在电台工作多年，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局面。我是中央电台副台长，分管宣传工作，为了探个明白，也是责任心所驱使，我赶紧向中央电台的前哨阵地节目传送间走去。一路上，气氛异常紧张，一道一道地严格检查证件，除了固定的岗哨，又增加了岗哨和流动巡查警卫人员，直播室门口有两位持枪战士分列两旁，明晃晃的刺刀在灯光中闪烁，电台从来没有过这种阵势！

不久，我接到电话，要我去直播室。等我到了那里，只见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张香山坐在直播室门前的沙发上。对他们，我是认识的，

对他们的突然出现我感到非常惊诧（后来知道，他们是耿飚进驻后感到人手不够，从中联部召来的）。谁也没有寒暄，他们吩咐我赶紧把直播室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

“文革”前，中央电台的节目实行直播。“文革”开始后，为“增强阶级斗争观念，防止敌人破坏，保证安全播出”，陈伯达一声令下，统统把直播改为录音审听后播出。从此，直播室已经“铁将军”把门多年，时间久了，人们将直播的概念淡忘了，甚至一些电台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有个直播室。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而且格外看重，不仅增派了持枪卫兵，两位副部长寸步不离，在直播室门前坐等。为安全起见，直播室的两把钥匙分别由专人保管，因为长期不用，我也不清楚在谁的手里，我前后追找了半个多小时才找齐上交。他们接过钥匙，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并立即打电话向耿飚报告。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我把钥匙交给冯铉、张香山之后，他们是为了验证直播室的真实性，还是出于好奇，我不得而知，他们提出要看一看直播室，由我陪同。对此，后来张香山《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一文中，回忆参观情景时说：“我曾抽空和冯铉同志一道去看过直播室，它尘封四壁，简直像间废屋一样。陪同我们去的局里同志说，已有十几年不用直播室了，因为在左倾之风日盛时，广播员念错一两个字，就会被上纲到政治问题，所以大家就一律采用录音放送，而不用直播。桌上的话筒还顶用不顶用，也没有人去试过。”<sup>①</sup>

事情到此并没有完。我知道，粉碎“四人帮”和耿飚等人进驻广播局，后来演绎成各种故事和传说，印在书刊里、流传在艺人中有各种版本，生动而离奇。我曾经读到，《炎黄春秋》1994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引用耿飚的话说：“我一到广播电台，带了几个哨兵，就把办公

---

<sup>①</sup> 《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回忆录》第2集，第14页。

室围起来了。我就带着他们的团长到直播室看了一下，在直播室门口派了两个哨兵，交代哨兵交班要有团长在，谁直接冲进直播室，你们就拿机关枪扫，不管是谁。”耿飚当时布置了什么，我不知道，但以上的事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那时，我没有见到过耿飚，事实上，办公室没有被围，在我没有找到直播室钥匙之前，耿飚等人是不可能进直播室的，更不会有准备用“机关枪扫”一说的。（注：据李延河写的《1976年10月北京卫戍区部队奉命内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访北京卫戍区原副司令员邱巍高》<sup>①</sup>中说：“他们快步登上楼梯，来到电台直播室推门进去，……”“邓岗说：‘直播室有两把钥匙，是否交给你们？’耿飚说：‘好！邓岗就把直播室的钥匙交给了耿飚。’显然，与我所知道的不同，邓岗也不会把直播室的钥匙攥在手里。）

据后来耿飚说：“邱巍高到电台后做了四项布置：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门，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sup>②</sup>

紧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是耿飚等人进驻广播局后急需要做的第三件事。6日晚11点零5分，邓岗紧急召集“中央三台”和局机关领导人会议，他表情严肃地说：“根据中央的指示，最近宣传中有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不要再宣传了。一定要把住！”邓岗说：“先从发稿上把这句话卡住，立即执行。今天晚上的节目尽量改，明天早上，从全天开始播音起，一定要卡住！不能再播出去！一切节目都要审查。外边有人来电话询问原因，一律不作回答。”一向善于言辞的邓岗，这次发言却如此简短，他虽然没有解释什么，但在座的谁都知道，“按既定方针办”是在毛主席治丧期间作为“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公布

① 《新民晚报》，2011-11-12。

② 《耿飚回忆录》，第29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的，张春桥、姚文元强调以后的宣传报道中都要有这句话。而现在停播，一定是发生了大问题，这是一个明显的讯号，但谁也没有说什么，表示坚决执行。（注：“按既定方针办”当时的播出情况以及为什么要停播，我在《新闻背后的故事》中《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和《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两篇文章中，做了详细的说明。）

晚上 11 点 40 分，我召集中央电台各部主任会议传达布置，夜 12 点，各编播部门开始审查稿件和节目。那时中央电台有四套节目，每天播音 70 多个小时，几乎所有的节目中都有“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当时，两套节目已经播音结束，对全国播音的第一套节目要到第二天凌晨 1 点 35 分结束，一套对台湾广播也仍在进行中，另外还要审查、制作第二天播出的节目，时间紧，工作量大，但各部门都没有迟疑，这已经是中央电台在完成紧急、重大宣传任务时的传统。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通宵灯火辉煌。当务之急是立即审查、把住正在播出的节目，抢在全天播音结束之前停播了“按既定方针办”。

但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以前“按既定方针办”已经谱成歌曲演唱，而且复制给山西、上海等广播电台，邓岗要我们通知他们停播。山西台立即执行了，并事后感谢中央电台为他们把了关。而上海台却出现了另外的情况。“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正苦于摸不到北京的政治气候，7 日他们听了上海广播局领导人汇报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的歌曲，从中嗅出了味道，立即紧张起来。当后来粉碎“四人帮”的局势明朗以后，这一“通知”竟成为“未经请示，走漏消息”的事件。当时随耿飚进驻广播局的中联部办公厅主任乔石坐镇广播局局长办公室，他把我叫去，仔细询问了事件的过程以后说：“当时你不了解内部情况，而邓岗应该是知道的。”

组织审查播出节目，是耿飚等人进驻广播局后急需要做的第四件事。第二天，7 日凌晨 2 点 30 分，上级通知中央电台所有的节目，都

必须经过统一审听后才能播出，包括节目预告和补充音乐无一例外。审听组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冯铉、张香山和朱大成、毛宝忠组成。但我心里明白，广播不像报纸，只要把住最后的版面就行了，而广播节目每天 70 多个小时，就是全天审听，谁能听得过来，何况距离开始播音只有一个半小时了，会不会影响到播出呢？但不便问，也不容迟疑，我作为中央电台负责宣传的副局长，负责调集已录好的节目交给审听组，介绍节目情况，执行他们修改或撤销节目的意见，考虑随时补充什么新的节目。对于他们具体把什么关、对节目有什么要求，除了撤销“按既定方针办”以外，我并不知道。

据我知道的情况，耿飚等人进驻广播局，在“中央三台”中，实际上只对中央电台实行了直接掌控和介入，并没有派人到中央电视台和国际电台，也没有直接审查它们的节目。审听节目的气氛是严肃的，在场的人都很少说话，甚至连面部的表情都很少变化。审听中提出的问题并不多，偶尔让停机，他们悄悄议论几句，有时咬咬耳朵，或交换一下眼神，我只能从他们的神情中揣摩他们的意图。除了审听一般节目外，重点是审听《新闻报摘》节目的内容，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人民日报》7 日第二版刊登了“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的文章《论〈总纲〉和克己复礼》，要不要选用？他们商量了好一阵子，经电话请示后同意播出。事后才清楚，这本来是不该用的，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继续用“梁效”文章以防止打草惊蛇。

后来，耿飚在回忆中谈到审听情况时说：“他们（指冯、张）的任务主要是和电台的同志一道审查播出前的胶带，包括文字和歌曲、音乐节目。我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出中不能泄露有关‘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sup>①</sup>

<sup>①</sup> 《耿飚回忆录》，第 294 页。

审听节目全天都在进行，大家顾不得吃饭，就这样也无法保证正常安排播出，到了 8 日只好分两组进行。过了两天，随着局势的明朗和稳定，由全部审查节目到重点审查；又过了两天，把审查任务交给了中央电台自己审查把关，持续一段时间后恢复了正常审听制度。

耿飚在完成了控制局领导班子成员、中央电台直播室、停播“既定方针办”和审查节目四项紧急任务后，立即打电话向华国锋做了汇报。后来，耿飚在回忆中说：“不到两个小时，把两个地方控制住了：一是办公室，打电话把局核心小组成员找来开会；二是把电台的直播室控制起来，掌握住钥匙，增加了警卫，同时把住了录制的节目，审听了再播。然后打电话向华主席汇报，已经控制住了，请放心吧！华主席说，一切都如意。”

耿飚在谈到为什么接管广播局时说：“中央不是对电台和电台的工作人员不信任，因为过去是姚文元抓意识形态、抓舆论，中央担心在这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时刻，一旦‘四人帮’有所觉察，哪一个漏掉了，走漏了消息，‘四人帮’的余党或者亲信把持了电台，就会出大乱子，其后果不堪设想。”他说：“新闻舆论长期受‘四人帮’控制，他们经营了十来年，会不会跳出几个亡命徒来？我个人的安危事小，万一电台、电视台出了事，其传播速度和范围比报纸要快、要远，就将迅速波及全国，影响到国外，从而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sup>①</sup>所以在采取抓‘四人帮’的行动时，要把电台、电视台控制住，避免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特殊的战斗生活。**耿飚等人使命在身，对广播局的接管是极其紧张的。耿飚将军戎马一生，经历过无数次战斗，后升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当过驻外使节，经历过重大的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

---

<sup>①</sup> 《耿飚回忆录》，第 296 页。

但这次是一场“特殊的战斗”，重任在肩，不敢有丝毫的疏漏，过着“特殊的战斗生活”。

耿飚后来回忆说：10月6日当晚他和邓岗没有回家，他和邱巍高一直轮流睡在办公室的一张行军床上。头三天睡觉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办公室，由警卫战士送来，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他说：这些事下边和外边都不知道。我在那里待了8天，连晚上睡觉衣服也没有脱过。“特别是第一天晚上睡不着，眼睛瞪得大大的，脑袋里在翻江倒海，考虑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还有什么不周全的地方没有？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突发情况，应当采取什么防范措施？”<sup>①</sup>

2009年5月，我从《耿飚将军》纪念册中看到这样的记载：“耿飚接管广播局后，数日顾不得回家，支起行军床，吃住都在广播局，并向警卫战士下令，有冒充他的签字企图闯入广播室者，立即予以击毙。为防妻子担心，只写了张便条给（妻子）赵兰香。”便条的手迹是：“告知妻儿放心，很好。”对其中“向警卫战士下令，有冒充他的签字企图闯入广播室者，立即予以击毙”这段话，我是第一次看到，也没有听其他人说过，也可能是在极小的范围内有过如此的“密令”。这里说的“广播室”可能是指能够直接播出去的“直播室”。日常工作中，电台自己的人大多数也只能持证件进入播音室录音。内部证件分四级，而能够进入直播室者属于一级顶级证件，控制极严，拥有者很少。

对广播局的接管是顺利的。耿飚这样说：“在党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奉命到广播事业局，夺回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sup>②</sup>

① 《耿飚回忆录》，第295页。

② 《耿飚回忆录》，第296页。

10月21日，中央公开了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连续上街庆祝游行，中央电台做了连续报道。24日，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庆祝粉碎“四人帮”胜利大会，中央电台做了实况转播。1976年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中央宣传部没有恢复以前，先成立临时的中央宣传口，统管起宣传思想工作，由耿飚负责。耿飚调任后，张香山负责中央广播局的工作，后接替邓岗为中央广播局党组书记、局长的职务。1982年广播电视部成立，由吴冷西任第一任部长。张香山后来写了《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回忆这时期的工作情况。

邓岗长期在新华社工作，是新华社原副社长，1974年10月，中央广播局结束军管时，调任广播局代局长，正是在“文革”局势多变、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刻受命。他在广播局的两年，身居“四人帮”控制最严的广播电视宣传舆论的岗位上，经历了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周总理逝世、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等惊心动魄、天翻地覆的时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邓岗被正式任命为广播局党组书记、局长，取消了“代”字，由此，常被人议论。多年的接触，我感到邓岗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实干精神，工作认真，为人正直，心胸旷达，作风正派，是一位不错的领导，但他晚年不逢时。在政治多变、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刻，被调任“四人帮”直接控制最严、最为敏感的广播电视岗位上，在当时“四人帮”打着毛主席、党中央旗号的情况下，他不得已而为之，但他仍有所克制而未推波助澜。据我所知，后来他回到新华社后，为新华社的事业建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是题外话。

粉碎“四人帮”后，我听说中央在决定派出耿飚、邱巍高等进驻中央广播局后，又派人进驻《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等主要新闻单位，具体情况不详。后来从《耿飚将军》纪念册和孙中范《粉

碎“四人帮”时接管光明日报社的经过》<sup>①</sup>的记述中，了解到当时的某些情况。将其中的某些片段转述给读者，以了解当时中央对新闻舆论单位和宣传工作的整个部署。

孙中范当时是中组部核心小组成员、中央派驻《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的成员。他回忆说：中央“决定迅速接管由‘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先后调集耿飚、迟浩田、郑屏年、刘西尧等12位同志，临时进驻中央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等中央主要新闻单位。”

迟浩田回忆说：“10月7日，我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一辆黑色的小车接进了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一进门，就看到了耿飚，他高兴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我们抓起来了！”“不一会儿，耿飚同志的脸色严肃起来，猛地一拍桌子，说：‘我们要去夺权，我们要把‘四人帮’抢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sup>②</sup>

孙中范说，他受命于粉碎“四人帮”第二天——10月7日下午2点。他到中南海紫光阁时，华国锋、纪登奎、苏振华等正在会议厅同迟浩田谈话。后来由纪登奎向王维澄和他交代任务：“由于宣传口长期被‘四人帮’把持，为防止意外，中央决定对宣传口各单位采取特殊措施。耿飚同志已在昨晚进驻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决定派迟浩田、孙轶青进驻《人民日报》社，郑屏年进驻新华社，刘西尧和你们两个进驻《光明日报》社。”纪登奎说：“由于目前的情况比较复杂，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还不能马上公布，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你们进驻报社的任务有三项：一是把住报社的关口，从今天起，再不能有宣传‘四人帮’的字样；二是把报社的队伍稳定住；三是在中央正式公布粉碎‘四人帮’后领导报社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报社原领导小组在你们的领导下

① 《百年潮》2010年第9期。

② 《耿飚将军》纪念册，第103页。

工作。”

各临时领导小组都是带着中央的文件进驻各社的，“每个新闻单位派驻的人都是由华国锋亲笔签署文件”。当时《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是鲁瑛，新华社社长是解力夫，《光明日报》社社长是莫艾。

1976年10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宣传口，由耿飚负总责，朱穆之、迟浩田、王殊、张香山、华楠等分别兼任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中央广播局和《解放军报》社的领导职务。

### 粉碎“四人帮”初期的宣传思路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2008年9月华国锋去世后，新华社发表的华国锋同志生平中说：华国锋“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决定性作用”<sup>①</sup>。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直到21日公开。这期间，对外采取严格保密状态，而内部却处于宣传报道的急剧转折期，既“不动”声色，又必须与以往有原则性区别，否定“四人帮”的做法，使人们觉察到有新的变化，引发人们的思考。可见，处理许多复杂问题的政策性、策略性都很强，必须在中央的严格掌控之中。

国内通过内部通报等形式，有计划地在吹风，公开报道突出中央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决策：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突出中央军委

<sup>①</sup> 引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主席，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等，心照不宣地进行政治、舆论攻势和稳定人心的工作。

就对境外而言，在没有公开关于粉碎“四人帮”之前，经中央批准的对外表态口径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主动告诉；对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不主动谈，如谈及我不证实也不否认；正面介绍我国国内大好形势；对外交官和记者，或答无可奉告，或避而不答，或正面介绍我国国内大好形势。后来公开粉碎“四人帮”之后，外电和境外舆论进行各种猜测和评论，说什么的都有，如毛主席刚刚去世，共产党内就发生了权力之争；是稳健派与激进派之争，是保守派与革命派之争等，并由此引起了我党我国与其他外国政党和国家关系的分化组合。

为便于掌握新闻舆论，应对和处理内外这种复杂的宣传局面，统一宣传报道问题，稳定舆论和局势，中央及时地成立了宣传口。10月16日耿飚调任中央宣传口，广播局由张香山负责。据张香山传达，华国锋主席说，舆论工具掌握在“四人帮”手里，给党中央造成很大损失，我们吃了很大苦头。因此，我们要把舆论工具真正掌握起来，使之成为中央的舆论工具，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宣传口，由耿飚负责。中央宣传口是协助中央管宣传的办事机构，不是一级超越各部门之上的宣传机构，主要管宣传的政策和方向，负责联系有关新闻宣传单位。中央宣传口一成立，就承担起了指导宣传舆论工作的重任。

11月1日，中央宣传口向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写了《关于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下发。这一报告集中地反映了那时的政治情况和宣传报道精神，同时看出过渡时期的宣传特色。请示报告要点如下：

我们最近召集宣传口各单位负责同志开会，讨论了当前宣传问题，

国务院和总政有关负责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大家认为，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党取得了粉碎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当前的任务，是要巩固和发展这一胜利。宣传工作要为党的这一伟大任务服务。目前宣传工作的中心是：坚决拥护华国锋主席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坚决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决地彻底地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消除他们的毒害和影响，继承毛主席的意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宣传要点如下：

一是继续宣传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热烈拥护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要突出宣传华国锋主席是毛主席生前选定的可靠接班人，是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当之无愧的领袖。大力宣传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中国革命的严重关头领导我们党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要认真学习中央16号文件、吴德同志讲话、两报一刊的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大力宣传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宣传这一斗争的胜利，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是大力宣传毛主席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抓住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抓住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千方百计地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这个基本特点，放手发动群众，集中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要揭发和批判他们反对和迫害毛主席，肆意封锁、对抗和篡改毛

主席的指示，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揭发和批判他们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和党中央之上，大搞分裂党的宗派活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揭发和批判他们在国际国内一系列问题上对抗、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反对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采取各种手法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揭发和批判他们严重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优良传统；批判他们反对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批判他们破坏军队建设和民兵建设，妄图毁我长城；批判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揭发和批判他们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全面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揭发批判，彻底揭穿他们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极右派的反革命面目。

三是大力宣传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特别要认真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修防修，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发展和壮大符合接班人五项条件的新生力量；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化革命、卫生革命、科技战线的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勤俭建国，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四是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促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宣传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

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党的三大作风，加强组织纪律性，一切行动听党中央的指挥。充分反映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斗志昂扬，“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展现在我们面前。宣传在人民内部要讲团结，加强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宣传“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宣传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坚持实行毛主席历来教导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五是大力宣传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宣传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大大激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革命和生产呈现一派大好形势；全国人民精神振奋，干劲倍增，要把“四人帮”干扰、破坏所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宣传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首先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争取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六是大力宣传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支持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反对苏美两霸，特别要揭露和打击苏修。

七是以上要点，要通过各种宣传武器，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刊物、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进行广泛宣传，形式要多种多样，内容要鲜明、生动、准确。

在向中央写出报告后，耿飚在 11 月 12 日“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一个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正在展开。过去‘四人帮’一

手把持了宣传工作的领导权，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现在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已重新为党所掌握。中央宣传口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与同志们一起把宣传工作抓起来。”

耿飚在谈到以上宣传要点时，他概括了三个主要问题：一是突出宣传华主席；二是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意义；三是揭发和批判“四人帮”。耿飚顺便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他指出：毛主席讲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伟大胜利，三分错误完全是“四人帮”破坏造成的。

会后耿飚特意提醒：对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对他们表扬过的单位和个人不要轻易点名；我们的报纸、广播、电视都要说老实话，实事求是，不老实就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要办得活泼一些，各个报纸要有自己的特点，不要像“四人帮”时那样，空话连篇，千篇一律，群众不爱看、不爱听；未发表过的毛主席语录，没有经过中央宣传口同意的不要轻易发表。不要老讲华主席在交城和湖南工作的时期，讲多了效果不好，报道面要扩大，重点是现在粉碎“四人帮”、抓纲治国、政治稳定、初见成效等。

几天后，耿飚又强调：（各报）相互对标题、对版面，都一样就没有什么特点了，要把过去的文风改一改，文风是形式，也是内容。他说，我们的文章头上帽子很高，底下靴子很厚，穿靴戴帽，看文章看中间不看两头，中间的内容又不多，假大空，套话，有“帮味”。（注：当时感觉到这些话是吹来的一股新风。）

从“宣传要点”和耿飚的讲话，不仅说明粉碎“四人帮”之初宣传什么和如何宣传，从中可以看出在许多基本问题上坚持的原则和未来政治和政策的走向，同时可以看出必然带有那个时期的烙印。这些对后来研究“文革”后期、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过渡初期的宣传报道，具有资料价值。

随后，中央对主要新闻单位从组织领导上做了调整：1977年1月13日传达中央7号发电，任命朱穆之为新华社党组书记组长、社长，曾涛为党组副组长、副社长，穆青为党组副组长；中央9号发电任命胡绩伟为《人民日报》党组书记组长、总编辑，迟浩田为党组副组长、副总编，孙轶青为党组副组长、副总编，鲁瑛、肖木被撤除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央10号发电任命干戈为《光明日报》党组书记组长、总编辑，杜越凯为党组副组长、副总编，撤销莫艾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央任命王殊为《红旗》杂志社党组书记组长、总编辑。中央审稿分工：外事稿件送李先念，军事、体育稿件送陈锡联，政法、工农稿件送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文教、出版稿件送吴德。中央会议的报道稿件由中央宣传口审定，定不了的送汪东兴。外事工作国内活动的报道由接待单位、主办单位送中央宣传口审定，定不了的送汪东兴。党报党刊的重要评论以及中央指定的重要稿件，由中央宣传口帮助审后送汪东兴，主要社论经汪东兴报中央审批。电视片由主管单位审。由此，完善了组织领导和审稿程序。

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宣传措施，打破了新闻舆论单位多年的沉闷气氛，思想活跃起来。自1976年11月起，中央电台迅速恢复了一批“文革”前被听众认可的名牌节目，并研究《新闻报摘》和《全国联播》节目明确分工、各自办出特色的问题，联播应该“自己走路”，以自采自编新闻为主；中央电台应该有适宜广播自己的评论；11月31日，中央电台记者部提出要办一份自己的业务研究刊物《记者通讯》。中央电视台也提出，电视新闻应该交给电视台自己定，拿不准的请示中央宣传口。

1976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诞辰纪念日，发表了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中央电台当天播出6次，连续播出了5天。

1978年8月，经华国锋主席批准播出话剧《杨开慧》，并且电视转播，广播同时播出。这一话剧中首次出现了扮演毛主席的演员形象，大家议论不太像，电视转播中可出中景，不出特写，但终究开了把领

袖人物搬上舞台的先河。

## 八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宣传始末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现在已经有许多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披露了事件的前前后后。我着重从宣传报道的角度，回顾粉碎“四人帮”前后这一事件从发生到结束、跌宕起伏的演变过程，从中窥视宣传报道与政局变化的关系，从中引申出某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与整顿

对邓小平同志大家都不陌生。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和战争时期，他曾担任党和军队的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以前给我最深刻的记忆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在与苏联共产党进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中，邓小平一直坚定地站在同苏共修正主义斗争的第一线。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首先被打倒了。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列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又把他与刘少奇、陶铸捆绑在一起，成为“刘、邓、陶”集团的一员，受到长期的批判和无情打击，直到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才复出。

据历史记载，20世纪30年代，在中央苏区邓小平因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受到执行‘左’的错误路线的临时中央的批判斗争。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sup>①</sup>这一次被称为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

1971年9月林彪的叛逃，对毛泽东是个极大的伤害，毛泽东思虑着未来，他想起了邓小平，给予“人才难得”的高度评价。1973年3月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的通知，在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委员。12月2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邓小平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了中央军委委员，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从此，邓小平又开始参与党、政、军的重大决策。到1975年1月，遵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不久后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又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大家都清楚，当时周恩来总理病重，邓小平是国务院总理的人选）。至此，邓小平党、政、军大权在握，实现了所谓的“东山再起”。这一次被称为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又第二次复出。

邓小平有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文革”以来他长期清醒地旁观“文化大革命”，他生活在基层，与人民群众打交道，他清楚国家的局势和人民群众的期望。他一旦权力在握，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一系列的整顿，党的作风要整顿，领导班子的软、懒、散要整顿，军队要整顿，经济要整顿，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工业要整顿，铁路运输秩序要整顿，教育、科技、卫生要整顿，等等，尤其在1975年的7、8、9三个月更是紧锣密鼓，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连续出台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论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被有人归纳上升为“三项指示为纲”，显然与毛主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相

<sup>①</sup> 汤应武：《改革开放30年重大决策纪实》，第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对抗)。

一句话，各方面要全面整顿，这是符合实际、顺应民意的。人们早已厌倦了没完没了的“文化大革命”，对整顿和未来的走向抱着殷切的期盼，整顿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当时许多人凭借着多年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敏感，为这种种急切的整顿捏着一把汗。所以要整顿，就是因为有问题，就是要扭转过去的做法，就意味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这一切，渐渐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

毛泽东深谙历史，苏联的严重教训，是他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视为他一生所做的两大事情之一。“文革”后期，毛泽东看到了存在的问题，但已无力解决。他认为对“文革”总的评价应该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他最担心现在或未来有人出来否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看好邓小平，让他复出，对邓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谁都心里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周总理病重期间。邓小平的整顿开始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他是希望能够在维护“文革”的前提下进行治理整顿，后来发现苗头越来越不对头，超出了他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更增加了他对未来的担心。

邓小平的整顿刚刚开始有了新的局面，便招来了横祸。毛泽东怎能容得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遭到否定？这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

1975年11月3日毛主席借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指出其要害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事情做绝。他仍然把邓小平留在了党内，放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这就为邓小平后来再次复出埋下了伏笔。就这样，邓小平整顿开始不到一年，刚刚看到了一线曙光，又爆发了来势凶猛的批判右倾翻案风，要肃清邓小平整顿带来的影响，确保“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后来才弄明白的事。

## 批判“右倾翻案风”

“文革”中，人们对于宣传报道倾向和口径的任何细微变化，都是非常敏感的。当批判右倾翻案风刚开始时，中央电台台长杨祚铭和副局长张冬兴正在大寨参观学习，台领导中只留我在家值班。他们从广播中听出政治风向有点不对，打回电话问我，最近有什么新的政治动向？我告诉他们，现在又提出新问题了，要批右倾翻案风了，看来是针对邓小平的。他们说“好了没几天，又要折腾了”。

我明确知道批判右倾翻案风的事，是从姚文元的电话中。他在1975年11月11日对中央广播局将要召开的全国电视工作会议的报告稿做了修改，12日他打电话给广播局领导，提醒“要注意教育战线的新动向，批判右倾翻案风，先给你们打个招呼”。

1976年1月24日，姚文元给广播局领导又打电话，对一个月后要召开的全国电视工作会议提出要求说：“会议开始要集中一段时间批判右倾翻案风，不要先讨论业务。现在教育战线正在批判右倾翻案风，你们不批判与当前的形势不相适应，是要犯错误的。”

接着，新闻媒体就不断报道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报道社会上支持清华的言论。广播局决定召开全国电视会议，是姚文元在1975年10月5日接见外宾时向广播局领导提出来的，显然是为了加强对电视的控制。对此，广播局领导对姚文元“先打招呼”有着特别的政治敏感，特意发出召开电视工作会议的“补充通知”说，会议“首先集中一段时间，……批判右倾翻案风”。

全国电视工作会议一直拖到1976年4月才在上海召开，因为这时政治局势已经明朗，“天安门事件”之后的4月7日，毛主席已决定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全国电视工作会议期间，上海市委副书记徐景贤到会致辞说：“革命的同志到上海来，我们是很欢迎的。”也就

是这位徐景贤曾经写信给姚文元告中央电台的状。那是 1975 年 10 月，中央电台举办驻地方记者学习班，印发了邓小平的一次谈话作为学习材料，驻上海记者回去后与上海市委谈到学习班的情况，徐景贤向姚文元告状，并附上了邓小平那份讲话材料，姚文元便给广播局领导打电话询问情况。

新闻界宣传报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个逐步升级的过程。在广播电视中，自姚文元打招呼后，政治敏感的广播局领导一方面强调，右倾翻案风是当前最大的危险，将宣传重点迅速转移到批右倾翻案风上来，以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另一方面，多年反复的政治运动，又使局领导多了个心眼，多了几分谨慎。他又多次指出，教育革命大辩论只在清华、北大展开，还没有普及，广播电视宣传是面向全国的，要顾及全国的情况，采取稳妥步骤（这也是在多次风云变幻期间总结出来的稳妥做法）；主要体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精神，可以客观介绍、转述，不要抢先直接配合，有些新的提法不要先从我们这里冒出去；严格掌握宣传口径，要跟《人民日报》，跟新华社，跟《红旗》杂志，不要跟“两校”，不要跟大字报，也不要跟地方报纸，我们广播的影响快、影响大，公开的提法要谨慎，不要干扰中央的战略部署。（“四人帮”用他们掌握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梁效”写作班子体现他们的意图，引导舆论，有什么新的风向，首先从“梁效”刮起，当时流传着“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的说法）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开始主要播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社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报道，不主动组织工、农、兵写文章反击右倾翻案风，但在文艺广播中突出了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歌颂党、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新生事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节目。

##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

1976年2月6日以后，《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开始暗示批邓，17日人民日报开始不点名地批邓。据传达，《人民日报》在是否点名的问题上提出点名与不点名两种方案，姚文元同意暂不点名。同一天，北京（中央）电视台电视摄制组进驻清华大学（3月10日，又传达江青、姚文元的“指示”，要新华社和电视台组织一个常驻清华大学的报道组和摄影队，共6人，其中常驻1人，对清华大学的教育改革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重点报道）。

3月3日《人民日报》未点名地指出“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3月10日发表社论《翻案不得人心》。随后，各媒体出现了什么“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伙同刘少奇的那个走资派”等提法，但谁都没明确点名。

批右倾翻案风在迅速升温，3月24日，姚文元“以有利于鼓舞广大群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志，有利于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有利于发扬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为名，要新闻媒体开始反映和报道群众的批判活动，发动各方面、各行各业大张旗鼓地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遂成为宣传报道和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

当时流传着“要宣传上跟得紧，首先是思想上跟得紧”。从批判右倾翻案风开始，中央电台内部的学习批判占去大量时间，学习中大家议论纷纷，反映对许多问题的界限分不清楚，支部书记在汇报中从侧面婉转地提出一些“活思想”：人们问，对1975年的工作如何评价，邓小平提出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有了成效，算不算突出政治？邓小平抓铁路运输，安全正点，铁路秩序大大好转，这算不算抓了阶级斗争？有人担心，生产刚开始好转，抓了阶级斗争，生产再下来怎么办？有人提出，邓小平被批了，这是不是又开始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我们抓提高广播宣传质量和安全播音，是不是不突出政治，是邓小平的流毒？有的干部提出抓宣传业务是不是“穿新鞋走老路，走资派还在走？中央电台是党中央的喉舌，不掌握中央的精神，为什么却要我们跑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去了解精神？为什么由‘梁效’指导运动？”各种问题反映出人们的担心、不满和焦虑。这种思想情绪是出于对邓小平“整顿”的了解，是出于对“文革”和“今天打倒一批，明天又打倒一批”的厌倦等多种情感的交织。而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未来的忧虑。对当时的政局谁都心里清楚，中央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明显地发生倾斜。

4月5日清明节前后，北京发生了声势浩大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当时被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

天安门事件后，4月7日，毛主席说，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好。性质变了。毛主席决定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同时，毛主席决定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并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晚政治局开会通过有关决议。中央电台在20点的《全国联播》节目中广播了中央的两个决议。

这几件大事竟同时发生、同时报道，全国震撼，各大城市立即举行群众游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央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进行政治表态，拥护中央决议、声讨邓小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入了最高潮时期。中央电台连续进行了报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据后来有文章说：“1976年4月7日晚8时，邓小平本人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的广播。”4月8日夜，邓小平通过汪东兴转递了他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他在信中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华国锋

同志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定。”“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激。”<sup>①</sup>

人们担心，邓小平历史上已经两次被打倒、两次复出，第二次复出已经是奇迹，这次第三次被打倒，不会有“东山再起”的希望了。

把天安门政治事件与邓小平紧密相联，邓小平再次被撤职、被打倒。批邓大张旗鼓地进行，坚持放在首位，一直延续下去，集中批“三项指示为纲”，要求批出新水平。姚文元反复强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中心，不要冲击这个中心”。由此，凡是邓小平的主张和语言都不再使用，如“三项指示为纲”、要团结好作风好、整顿软、懒、散等，就连“整顿”一时也不要用，邓的照片不要再发了。

5月10日传达中央11号文件《关于有邓小平形象和修正主义言论的影片、图片、书刊的处理意见》：“一、一律停止放映、展出，也不向外提供，外国人展出可以劝阻，但不强加于人；二、带有邓小平形象和修正主义言论的书刊一律停止，不对外提供；三、有的可经处理后播出，如重要文件；四、四届人大的可保留，再版时把形象去掉，名字可保留。”由此，彻底清查中央电台的所有节目，就连当时唱的《毛主席领导我们反潮流》、《对着干》等歌曲也停播，因为有支持邓小平或引起联想的嫌疑。除了宣传上严格掌握以外，开始了组织上的追查，有些人因为对邓的认识“转不过弯子来”，而受到批判或组织上的处分。

1976年7月6日，在朱德委员长逝世治丧期间，7日姚文元传达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他强调：“当前全国的大事，还是集中火力批邓，深入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同党内走资派斗，要继续加强这方面的报道。”

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在紧张的抗震中仍不忘批邓，8月4

---

<sup>①</sup> 汤应武：《改革开放30年重大决策纪实》，第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日姚文元会见巴西新闻代表团时说：“过去我们一直是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中战胜自然灾害的，任何天灾、困难都阻挡不住我们前进。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战胜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战胜自然灾害。”此后，姚文元多次给新闻单位打电话，宣传报道要掌握好大方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中心，要放在首位。新华社提出的“当前国内宣传的意见”中说：“当前整个国内宣传应把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放在首位。唐山地区抗震救灾的报道要适当安排，数量不宜很多，发稿不宜太集中（主要由内参做补充反映），以免造成是当前全国工作中心的印象。”这一“宣传意见”经姚文元批准，在广播局传达，参照执行。

在毛主席重病期间，8月28日江青到天津小靳庄。她批判邓小平说：他说雷锋叔叔不在了，现在处处有雷锋。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小靳庄批判《论总纲》的报道，中央电台当晚播出。这时候，凡是涉嫌与邓有关的文艺节目停止广播，要大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举国悲痛，当时广播局局长传达，姚文元在布置治丧宣传时仍然强调批邓：“一定要把全国人民对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表达出来，让全国人民化悲痛为力量，进一步抓好阶级斗争这个纲，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夺取更大的胜利。”

### 粉碎“四人帮”后的继续批邓

1976年10月6日，粉碎了“四人帮”。据毛毛在《我们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说，当邓小平初次听到这一消息时“十分的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2009年，中央办公厅一原负责人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谈到把粉碎“四人帮”这一消息

告诉邓小平，邓小平高兴地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10月10日，在邓小平致汪东兴转华国锋并中共中央的信中说：“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sup>①</sup>

“四人帮”被粉碎了，在批判“四人帮”中，新闻界最关注如何对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的人认为可以结束了，但是，批邓并没有停下来。在粉碎“四人帮”最紧张的日子里，10月11日广播局领导在传达上级指示时提醒：“宣传上，还是要抓批邓的旗帜。”当时听了，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是批“四人帮”，与批邓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政治观点如何“结合在一起”？但这一“提醒”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透露出一种政治倾向。

为什么粉碎“四人帮”后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有人理解为批判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邓的问题不是针对“四人帮”而是针对、否定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从极左的方面破坏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从右的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都是修正主义；甚至有人解释为“如果没有‘四人帮’的干扰，批邓会批得更好，理由是因为‘四人帮’批邓是接过毛主席的旗号，贩卖他们自己的私货，企图达到自己的目的”。显然，他们认为批邓与批“四人帮”都是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这一套“弯弯绕”给的理由很难理解，因此中央要求，宣传上“对社会上有些议论要注意引导，不要以感情代替政策”。

###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粉碎“四人帮”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经历了从“深入批”到“继续批”、由“中心”转向“一般”、从少出现到不出现的过程。诚如以

<sup>①</sup> 汤应武：《改革开放30年重大决策纪实》，第1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

上所记载，在粉碎“四人帮”但还没有公开以前，“宣传上，还是要抓批邓的旗帜”。粉碎“四人帮”公开后，开始由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中心转为以揭批“四人帮”为中心，但宣传报道上依然坚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把二者统盘考虑，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同时提醒批“四人帮”涉及天安门事件，写文章不要给人一种是在替邓小平说话、替邓小平翻案的印象。但是，新闻单位不断提出“这两个批判在一起难以掌握”，认为“批邓干扰了对‘四人帮’的批判”；有人理解，现在提“批邓”不是政策性而是策略性的问题，是个“过渡性的”。不久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央正式文件上把“四人帮”时定性的“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改为“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新闻宣传报道一向对政策、口径和分寸的变化十分敏感，掌握十分严格，尤其从这种重大政治性的问题提法的变化中捕捉到未来的走向，便在实际宣传中很少再提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1976年10月27日，广播局局长张香山讲，批邓不一定每篇都讲，不一定非讲不可。张香山是中联部原副部长，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他被耿飚叫到了广播局，后来耿飚被调任中央宣传口后，由他留在广播局负责，再后来接替邓岗为广播局局长。

粉碎“四人帮”不久，叶剑英、李先念等提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1976年12月14日举行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央领导人中的一些老同志在发言中开始称“邓小平同志”，解释是“邓是党员嘛”。12月16日，张香山明确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可不提了”。尽管当时的解释是来自对某些现象的分析，因为华主席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的讲话中未提“批邓”的问题，《人民日报》等也不提了，邓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同志嘛。但我们心里明白，“可不提了”是有来头的，种种迹象已经说明邓的复出已在酝酿之中，这只是早晚的事。

至此，宣传报道了一年多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到此结束。我们自然高兴，但这一年，1976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大事太多了，惊心动魄，天翻地覆，人们在历经多少熬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宣传报道在经历了重重曲折变化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大家希望看到的明确答案。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可不提了”，这一变化首先直接遇到的现实问题是197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要播出周总理逝世时的纪录片，邓小平致悼词的镜头是否出现，还是由播音员代播？内部称“邓小平同志”是否可公开？这都是极为敏感的政治信号，最后以“尊重历史事实”的解释如实播出。同时，在以后的宣传报道中，开始逐步引用过去被批判、停用的邓小平的一些话语，如批评“领导班子的软、懒、散”，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在为邓小平的复出不断发出信号，下毛毛雨。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他说：“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做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妥当。”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决议，追认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同时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的职务的决议》，永远开除王张江姚的党籍。在决议还没有通过以前就请邓小平出席了会议。邓小平1976年第三次被打倒，1977年第三次复出，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成果。7月21日会议闭幕，22日晚8点中央电台的三套节目并机同时首播了会议公报，然后安排播出了欢庆的文艺节目，烘托气氛。

公报播出后，群众立即上街游行庆祝，中央电台连续三天播出各界和各地党、政、军、民庆祝活动的录音报道。7月22日晚8点新华

社同时向国内外播发公报文稿，北京（中央）电视台播出会议开幕新闻片；《人民日报》7月23日刊登公报，同时发表社论，中央电台提前在7月22日晚10点播出了《人民日报》社论；7月23日各大报同时刊登公报，刊登毛主席像，刊登华国锋主席主持开幕的照片以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人在一起的照片，刊登毛主席语录“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央宣传口对这几天的宣传报道做出了详细具体的安排，这一安排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圈阅的主要领导人中有华国锋、叶剑英和邓小平。邓小平的再次复出成为国内外最抢眼的新闻，纷纷报道和评论。十届三中全会为党的十一大召开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自此以后任何宣传报道、任何节目中，不能再出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提法，只要适合公开报道的邓小平的语言、照片、影片等都可以发表，如影片《夕阳红似火》、《碧波传友谊》等，很快恢复上演。

1978年11月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在形成文件时，在八项问题之外，特意增加了一项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中央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撤销。贯彻这些文件的党委和个人不承担责任，责任由中央承担。

写到这里，我想起在传媒大学等院校给研究生讲课时，他们不了解那个时代，经常用西方传播学的观点提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文革”中邓小平两次被打倒，你们宣传报道，邓小平两次复出你们又照样报道，一会儿是负面报道，一会儿是正面报道，那么新闻报道还有没有原则？你们不同意的能不能不播？否则，提高我们的判断分析能力还有没有用？应该如何理解和把握？

其实，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们新闻人时常遇到和思考的问题。这样相悖的情况很多。从总的方面来说，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

“文革”当中，新闻媒体尽力地宣传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竭力挖资本主义的根子、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竭力清除“个人主义”，狠斗“私字”一闪念，提倡“大公无私”）。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又反过来提倡、推动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人说“过去我们竭力树起来的东西，又要通过我们自己去竭力铲除”。还有许多曾经被批判过的人和事，改革开放后又要去纠正、恢复和宣扬，如从“天安门事件”到“天安门运动”；对于个人，不只是邓小平三次被打倒、三次复出，胡耀邦同样几次沉浮，还有许多，我们都做过完全不同的报道。对此，应该如何解释？

我的理解有以下几点：一是由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我们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它必须与党的事业和工作是一个整体，而不是游离之外，更不是处于对立面。由此，它必须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并服务于党的决议和中心工作，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这一性质，从党1921年诞生时就做出了明确的决定。

二是由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喉舌”作用所决定的。新闻宣传机构（或单位）是党领导下的宣传舆论工具（有人不赞成“工具”的提法），是党的喉舌（同时也是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不是个人或某个集体的代言人，因此必须遵循中央的部署，准确、及时地报道中央的决定和决策，不管个人对此抱有什么样的观点，不能以自己的理解或感情代替党的政策。

三是由新闻工作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规定的。新闻和新闻工作的特性是尊重和报道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而不是自己创造和决定事实本身。报道已经发生（或改变了）的客观事实（尤其是重大事实）是新闻媒体的任务和责任。

四是个人的认识和观点起着一定的作用。新闻报道有规定动作，那就是中央的统一部署、规定的政策和口径，你必须遵守；另外是自

选动作，是依靠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可以有所选择，决定是否报道，决定是积极主动地宣传报道，还是消极被动地宣传报道，是多报道、少报道或不报道，在具体掌握上是有差别的，这就是提高我们的判断能力的作用所在。类似情况，国内外常有，今后还会不断地遇到。

## 九 从“天安门事件”到“天安门运动”

1976年1月8日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总理生前受到“四人帮”的迫害；总理逝世后，“四人帮”又竭力压制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和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邓小平被打倒，人民群众担心着中国的未来。

4月初，清明节将至，首先是首都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后迅速扩展到工厂、机关和市民，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白天黑夜是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去寄托对周总理的哀思，表达对批判邓小平的义愤，声讨“四人帮”的罪行，反映出对国家未来命运的忧虑，长期积压的对“四人帮”的各种怨和恨一起迸发出来。“今有妖魔兴风浪，人民奋起反豺狼”。

天安门广场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各种花圈与活动向四周扩散开来，占据了整个天安门广场，在四周、尤其是人民大会堂前面的松柏树上，挂满了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小白花、悼文、诗词、口号；送花圈的人川流不息，花圈越做越大，越叠越高，群情激愤的人们在演讲，呼喊口号。“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出剑鞘”。毫无疑问，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祖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首次自动爆发的最大一次群众反抗运动！在全国其他一些大城市，如南京也有类似的活动。

自3月20日开始，全国已有学生、工人和居民举行悼念周总理、

反对“四人帮”的游行和集会。3月25日，上海《文汇报》第一版发表的文章中，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那个走资派扶上台”的提法，明显地把矛头既指向周总理，又指向了邓小平，更激起了人民群众的义愤。28日，南京游行队伍打出了“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等大幅标语。杭州、福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地也举行了游行和集会。

从一开始，“四人帮”就密切注意天安门广场和全国的动向，姚文元接连对首都新闻界做出宣传报道的布置，起初不让公开报道，着重从正面引导，他清楚直接报道就是扩散，就是提倡，尤其是发生在全国政治中心首都的重大活动，会引发更多的人走向天安门广场，走向街头。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发生在首都新闻界身边的重大新闻，在北京白天黑夜已闹得沸沸扬扬，但整个首都新闻界却鸦雀无声，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人们疑惑不解，强烈要求反映他们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各单位都在竭力劝说、阻止人们去天安门广场。

4月3日晚，姚文元给中央广播局领导打电话，据局领导当夜传达，姚文元危言耸听地说：“现在往天安门送花圈，不是不理解的问题了，中央（内部）打了招呼，发了文件，还送，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他特意“提醒”说：“你们知道4月6日是个什么日子吗？是台湾国民党（过去）要向我们反扑的日子，又是蒋介石死的日子，许多花圈要求保留到4月6日，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有的人扬言要冲击中央要害机关，你们广播局也要警惕！”姚文元要广播局对各部门、各单位一定严格控制，不要去天安门，不要参与天安门的活动，避免他们在这次反革命事件中“犯错误”。

不仅如此，姚文元还在广播局《简报》上的“南京和天安门广场出现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句话之后，加上：“它的目的是破坏批邓大方向，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反扑，其性质是反革命的，其矛头

是对着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简报》上谈到中央广播文工团有几个人到天安门广场送了花圈，给他们做工作他们思想不通。姚文元批：“望将思想不通的原因及有关人员的情况告我。”但是，他的威胁并没有阻碍人们的悼念活动，在传达了以上姚文元的批示后，广播文工团又去天安门广场送了花圈；广播局所属中国唱片社还有人背着录音机三次到天安门广场录悼文、诗词，被公安人员当场拘留；广播局所属“三台”和局机关的许多人，在下班后悄悄地去了天安门广场；在广播局院内到处是与天安门广场相呼应、进行悼念活动的大、小字报。

面对“四人帮”一再的警告、威胁和广播局出现的动向，广播局领导明确提出了几条，进行约束：一、天安门的活动多数是悼念周总理，但有坏人。不能把我们对周总理的哀思被坏人利用。各级领导要清醒，层层做好工作，首先做好骨干的工作，抓好党员，不能为坏人张目，不能助长敌人的气焰。二、中央明确指出这是反革命事件，对中央的话我们听不听？中央文件是经过毛主席圈阅的，我们听不听？有人再搞是什么问题？三、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央指出集中批判邓小平，要抓好学习和批判。四、要严密注意新的动向，有没有做了花圈要送的？有没有去天安门的？有没有写小字报、听小道消息、散布谣言、发泄不满的？发现苗头及时制止，领导不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场斗争是反革命事件，我们都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现在又一次重大政治考验，我们要跟上形势。

不管如何严厉要求，如何政治上纲，人们的心在天安门广场，事实上许多人都去过那里，参与到群众的洪流之中，包括那些“信誓旦旦”的领导，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些人也去了天安门广场。局长邓岗就在小范围内说：“我们严格要求，是对干部和群众的保护，不要让他们以后出问题。”

但是，对天安门运动的镇压，也在紧张地密谋进行着。事后，我们知道，在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前几天，早已在人民大会堂、劳动人民文化宫内聚集了武警、首都民兵等，进行布置和训练，他们手拿棍棒，只待一声令下，随时出击。4月5日夜开始镇压，包围广场，用棍棒驱赶，清除、运走了所有的花圈，清扫了现场，不留痕迹。6日凌晨，邓岗谈到5日晚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情形，他说那时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观看，广场上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等把广场清理完毕，他们拿来茅台，举杯相庆。

那时的经验，每逢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前期总是保持舆论的沉默，一旦公开便集中、大张旗鼓地报道。整个新闻界的报道权集中在姚文元和“四人帮”手里，由他们定调、审批，由新华社统一发消息，由《人民日报》发评论，其他媒体照发照登，以保持宣传舆论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舆论一律”。5日晚中央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发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都把在天安门的悼念活动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姚文元两次打电话，指定要在中央电台早晨6点半的黄金时间《新闻报摘》节目中播出，以扩大影响，并特别提醒要播好社论为这一活动定性和号召深入批邓的后几段。

天安门事件后，4月7日，毛主席说，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好。性质变了。毛主席决定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同时，毛主席决定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并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晚政治局开会通过有关决议。中央电台在20点的《全国联播》节目中广播了中央的两个决议。

8日晚，广播局领导召开紧急会议，传达精神，部署宣传报道。邓岗传达了毛远新转达的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说：北京市人民群情激愤，游行支持中央的决定，声讨邓小平的罪行，主席听了非常高兴。毛主

席有几点指示：北京群众上街游行好得很，要详细地报道；各省召开大会，支持中央措施的，一律登报；各地党政军民活动要登报。总之，要把北京这一套推到各地去。

中宣部对此高度重视，层层落实。中宣部依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宣传报道做出总的安排：首都群众的游行庆祝要详细报道；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要召开大会，游行庆祝，要报道；各地党政军庆祝活动都要报道。具体如何安排，由《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广播局三家共同研究，向中央提出方案，总的精神是：中央两个决定后，全国一片欢腾，人心振奋，形势迅速发展，抓住有利时机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大造革命舆论，拥护决议，庆祝胜利，声讨邓小平的罪行，鼓舞动员全国人民继续发展大好形势。

经过《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广播局三家研究，向中央提出的具体宣传报道安排是：一、《人民日报》发表几篇社论：伟大的胜利，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说明了什么？革命群众的巨大威力，集中火力深入批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等。二、新华社消息、通讯的安排是：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每个都发一条；各大军区、三大总部、各大兵种、中直单位、国家机关分类综合发，领导人的详细名单都要写进去；还有部分先进单位，如大庆、大寨、小靳庄、鞍钢、首都民兵等发消息，重点单位或活动发通讯；有的干部没有转过来，要让他们出面表态讲话，转好这个弯，抓好大方向；发表一批工农兵表态支持、欢呼的文章，出若干期图片；登载各国和组织发来的支持电。三、广播电视依据总要求发挥自己的特点，先搞京、津、沪游行庆祝的录音录像报道，不搞大会报道，其他地方有选择地搞一批先进典型的庆祝报道，组织讲话。电视在近期报道结束后搞一综合片《伟大的胜利》。

这一报告“经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庞大的、声势浩大的宣传报道计划，足以说明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后来在实际进行中，除了个别稍有变动以外，如对公开报道领导人和“军区”的名称要适当控制，其他都付诸实践，中央电台也做出了自己的安排，与其他媒体一起大造声势，形成了十分强大的舆论攻势。

中央广播局为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布置局内连夜写大标语，把广播局的整个围墙都贴满，并给中央写报告汇报执行情况；9日上午9点召开全局大会，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声讨邓小平的罪行；10点上街游行，一直到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事件”后，为彻底、干净地清查消除“邓小平的流毒”，5月10日传达中央11号文件《关于有邓小平形象和修正主义言论的影片、图片、书刊的处理意见》：一、一律停止放映、展出，也不向外提供，外国人展出可以劝阻，但不强加于人；二、带有邓小平形象和修正主义言论的书刊一律停止，不对外提供；三、有的可经处理后播出，如重要文件；四、四届人大中的可保留，再版时把形象去掉，名单可保留。

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21日消息公开后，开始由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中心转为以揭批“四人帮”为中心，各单位组织大批判组。但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没有停止，依据是毛主席批准的。并特别提醒，批“四人帮”涉及天安门事件，写文章不要使读者误认为是在替邓小平说话，给人一种印象是替邓小平翻案。现在有些青年人，主要兴趣不是如何深入批判“四人帮”，而是在“四人帮”对周总理的态度、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身上，要注意引导，抓住要害。

在批判“四人帮”罪行的过程中，人们的目光自然转向了天安门广场那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7年年初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期间，在天安门广场出现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标语，消息迅速传开，许多地方出现了大、

小字报，有的发表演说，人们以不同的目光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尤其是新闻媒体都跃跃欲试，唯恐在平反问题上落在了其他媒体报道的后边。平反是众望所归，但一些人也存有疑虑。

3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时，谈到“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王震更明确地指出：“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与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肯定了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是合乎情理的。同时，他指出也存在一些工作问题，针对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他说，“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10月18日华国锋为《天安门诗抄》题名，间接地表明了态度。这时，在天安门事件中同时发生的南京事件已经平反，并发了消息。在11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谈到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1977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对因悼念总理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同日，北京市委根据中央的批准，正式宣布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议。新华社当即发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中央电台都及时地做了广播。

但是，对于具体的平反日期，中央电台事前一无所知，也不清楚中央有关事后如何配合宣传报道的精神指示。中央电台认为，“天安门事件”时，广播凭借着“大喇叭”竭力地造声势，造成很坏的影响，现在平反不能没有中央电台自己的声音，就焦急地给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广播局局长张香山打电话，请他了解清楚。

10月20日下午5点40分，张香山给局总编室打电话说：“天安门事件的宣传报道问题，中央没有专门做部署，过程是这样：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新华社认为这是群众关心的大事，经请示华主席后就发了稿，然后就搞起来了。中央正在开会，不能（因此）冲得太厉害。《人民日报》还有一篇说明真相的文章正在修改，一些意见也是几个人商量的，不是中央的意见，你们不要心里不安。”

当时对是否用“四五运动”、“四五精神”的提法把握不准，有的媒体已经用了，许多媒体跟进，因此造成各媒体之间认识不一、提法不一，给未用者带来了顾虑和压力，如果不用会不会造成态度上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张香山说，关于“四五运动”、“四五精神”的提法，不管其他新闻单位是否用，我们自己组织的报道不用，也不要与“五四运动”相比。21日传达新华社提出的有关宣传报道总的精神是，“一定要十分慎重，不要加温”。对此，中宣部12月12日正式通知：“目前‘四五运动’的提法已很普遍，群众这样讲，报纸这样宣传，可不必再改变对‘四五运动’的提法。这已是过去的事，不是现在又要搞‘四五运动’，而主要是注意今后不要随便提中央没有提的运动。”

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为“天安门事件”做出平反决定，公报第三部分指出：“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问题。”“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 十 乒乓外交和转播农民篮球赛

——兼谈体育报道的演变与联想

体育报道与实况转播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报道与实况转播的内容与形式不断发生变化。我在《新闻背后的

故事》一书中，曾经介绍过“文革”中恢复体育实况转播时不报比分、不报比赛结果的《一段奇特的体育实况转播》，但仍有一些趣闻未能涉及，而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变化，不断提出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探讨。

### 中国乒乓球队参加 31 届世乒赛前后

1971 年年初，中央对我国乒乓球代表团是否参加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非常重视，围绕着我国乒乓球队这次活动、美国等五国乒乓球队来访，展开了一系列的内外公关活动，有人把这一年叫作“乒乓外交年”，这期间我国的体育报道，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971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7 日，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办，我国决定派出乒乓球代表团参加。历史上我国乒乓球队参加过多次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文革”中，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参加第 29 届和 30 届世乒赛，让台湾钻了空子，窃取了中国在亚乒联的位置。这次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日本乒乓球协会主席后藤钟二认为，缺了中国形不成世界级大赛的格局，只有具有实力的中国乒乓球队参加才能算得上是世界级的锦标赛，他坚持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

后藤是中国的老朋友，时任亚洲乒乓球联合会会长，他在 2 月的新加坡亚乒联会议上提出了驱逐台湾、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加比赛的议案，被否决，他愤而辞职。后藤回到日本后向中国乒乓球队发出了邀请，他曾经自豪地说：“由于有中国队的参加，可以期待将会有最近六年来从没有过的最盛大的比赛高潮。我可以自信地说，诸位将看到世界最出色的乒乓球比赛。”<sup>①</sup> 由于以上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斗争形势，中央决定派乒乓球代表团参加，重返世界锦标赛舞台，并对日本进行友

<sup>①</sup> 陈敦德：《名古屋轮回：新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的台前幕后》，《纵横》2008 年“奥运专题”。

好访问。周恩来总理在3月16日接见即将出征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时说，后藤很守信用，这次在新加坡会议上主张开除台湾蒋介石退出亚乒联，没有成功，就辞呈了。我们要看到人家在支持我们。

当时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是“东风压倒西风”，“美帝国主义一天天地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形势是大好而不是小好，越来越好”。尽管这样说，但是我们心中有数，我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非常复杂，斗争尖锐。

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了“5·20”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正处在反美斗争的高潮中，引起西方国家的警惕和对立；在世乒联中，有些国家没有与我建交，他们支持台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敌视态度；在亚洲，柬埔寨乒乓球队的位置由朗诺集团窃据，越南乒乓球队的位置由南越傀儡政权的乒乓球队窃据，世乒赛成为政治力量较量的舞台。依据我国外交原则，我们坚决不与朗诺、南越集团的乒乓球队进行比赛，而且反对他们的参与。

在这种情势下，一些国家对我抱着仇视、敌视的态度，甚至扬言要在锦标赛期间搞破坏暗杀活动，气氛异常紧张。因此，在我乒乓球队出发前，我国领导人对他们一再叮嘱，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要他们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去经历一场国际阶级斗争的锻炼，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对于第31届世乒赛宣传报道的要求也与以往不同，关注点在政治，总的要求是以毛主席“5·20”声明为指导思想，通过比赛和对日本的友好访问，加强我国人民与日本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日本和各国人民的反美斗争，扩大反美统一战线；同时充分报道为把柬埔寨朗诺集团和南越西贡傀儡集团的代表团驱逐出国际乒联而进行

的政治斗争，对帝修反的捣乱和破坏活动进行必要的揭露；报道我代表团“文革”以来的新面貌、新风格、新水平和勇敢、坚定、胜不骄、败不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报道要实事求是，不要强加于人，注意清除大国沙文主义、锦标主义、技术第一的修正主义流毒，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勇于创新，全面完成对内对外宣传任务。

这次活动得到日本乒协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中国乒乓球队在比赛与活动中很好地体现了中央规定的出访方针，成绩突出，非常活跃，主动开展友好活动，乒乓球运动员郑怀颖的名言被传媒报道而广泛传颂：“比赛场上的胜利是暂时的，友谊是长期的。”中国乒乓球队不仅完成了参加比赛和出访的任务，广交了朋友，而且带回了友谊，美国等五国乒乓球队的来访，以轰动世界的“乒乓球外交”而载入史册。

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出访前，周恩来总理在3月16日的谈话中，还专门针对电台、电视台过去的体育实况转播中的问题提出了批评。他说，“文革”前的转播中存在一些问题，如解说词过多、讲自己的长处过多、吹嘘、用词不当、误导听众，那时给听众印象最深的几句话是，形容球之快“像流星似的”，比喻摔倒为“马失前蹄”，自己的球打不好就“哎呀”！倾向性太明显，等等。周总理指出，我们的宣传不能老是（对自己）说好的，有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味道。如广播事业局（广播电视）的转播，评价一个球，什么精湛的球艺，什么流星、闪电似的，……我都说不出来，简直是老一套，说自己没个完，说人家就那么几句。大国沙文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要批判。本来那里打得不好，还一个劲地说好，不切实际地吹嘘，把群众引入迷魂阵。我们赢个球就鼓掌，输个球就“唉”！人家赢了不服气。造成这种风气，新华社、广播局要负责。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本质，千万不要陷入圈套。

我记得，中央电台在第 27 届和 28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除了及时报道比赛情况，都办过专题节目，每次 15 分钟。31 届的报道与以往不同的是政治气氛浓，中央电台与新华社、《人民日报》之间加强了分工合作，有关政治内容的报道用新华社稿件，有关言论用《人民日报》的稿件，中央电台发挥自己的长处，主要搞好体育比赛报道（用稿量大），尤其突出实况转播。中央电台极其重视，派出了强大的记者阵容，是各媒体中最多的；报道组做了认真的准备，深刻领悟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分析形势，提高警惕，改进体育报道和实况转播，准确把握政治和宣传口径；及时报道比赛，报道比赛以外的友好活动，凡是有条件安排的都进行实况转播；举办 31 届世乒赛专题节目。因“文革”中断多年，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参加世界乒乓球大赛，也是多年少有的国际体育大赛，全国听众都极其关心，更想借此衡量中国乒乓球水平的高低，衡量中国体育发展的水平，中央电台满足了他们的渴求。

名古屋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有 47 个国家参加，600 多人。比赛一结束，美国乒乓球队、加拿大队、英国队、哥伦比亚队和尼日利亚五国球队提出访问中国，在我有关方面举棋不定的时候，一向最善于捕捉战机的毛泽东主席立即决定发出邀请，邀请他们 4 月 10 日来华访问。这一出乎人们意料的历史性决策震动了全国，震惊了世界！

须知，当时的全国正在一片反美声中，在与美国隔绝了 22 年交往之后，从强烈反美到欣然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这一瞬间发生的巨大反差，使国内外都陷入惊诧之中，这一似乎“不大”的事竟成为震惊世界的爆炸新闻！外电评论：“中国又放了一颗重型原子弹，它的影响压过了正在召开的苏共 24 大。”古巴代办说：“中国又放了一颗地球卫星。”

仔细回想，这种变化也并非没有先兆。1970 年国庆毛主席邀请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引起外界的议论；毛主席后来指出，

美国左中右都可以来，右派也可以来一点；我国政府在 1971 年 3 月 5 日取消了对美国人来华的限制。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此前的一次讲话中首次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到台湾的抗议。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外交对美战略正在发生乍暖还寒的微妙变化。但这种迹象，并非大多数人能够觉察到，或者说，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觉察到。正在这时，历史提供了新的机遇。如果说，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是为开启中美关系的大门试放了氢气球，那么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则是迈出了切切实实的一步。正是这一步，给新闻报道提出了种种新的课题。

美国球队来访如此紧迫地摆在面前，随后开始了紧张、困难、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接待工作。中央在部署关于美国等五国乒乓球队来访的接待方针中，提出的接待口号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但依然把高举旗帜、打倒美帝、支持世界革命作为基本点。外交部欧美司分析：美乒乓球队要来，说明美国处境困难，敌视中国的政策不断遭到失败；我们让乒乓球队来是支持美国的革命，是利用美苏矛盾加强政治攻势。笔者理解，这与我国乒乓球队出访时，提出的“坚持‘5·20’声明，打倒美帝，支持世界革命”是一致的，在接待中依然坚持这些提法，是出于现实政策，既是战略的也是策略的考虑，更多地带有策略性；是出于当时国内人民的思想认识和对国际社会复杂的心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把握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主动权，避免骤然引起内外巨大波动。

当时外交部 4 月 9 日发出的《外交部通报》第 30 期，就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表态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反对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但是对美国人民历来是友好的。我们和美国人民来往、接触，同我们坚持反对美帝的立场是不矛盾的。过去美国人来华条件不成熟，现在尼克松政府的内外政策到处碰壁，受到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激烈反对，处境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邀请一些美国人

来访，不仅不影响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既定立场，而且也有利于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美帝的斗争。”

对于接待方针，周总理在 4 月 14 日的谈话中，详细做了阐述和交代。他在谈到外国球队参观中我们应注意的事项时说，有些提法，如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外不提，一是毛主席不同意，二是讲了效果不好，把兄弟党负责人放在什么地位？周总理说，讲精神变物质要讲过程，不要只说几条语录，要有研究、试验的过程，要有说服力。“讲成绩不要过头，要留有余地，要实事求是，说话要有依据，同类产品超过世界水平，是什么产品，哪年哪代？中国有进步，但还不满意。介绍要简单，避免长篇大论。”周总理说，对文化大革命，外国人最关心，不要回避讲武斗的问题、生产下降的问题（1967、1968 年受了一定的影响）。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一小撮坏人搞的（被称为“5·16 分子”），这样的行动，我党和我国政府是历来反对的。讲缺点要有主要缺点的内容，不要使人感觉是客套，要使人感到是真真实实的，这是科学态度。周总理说，外国记者拍照问题，既然叫外国人看的就允许外国人照，不要怕他们照落后的东西，不要紧张；说错了话也不要紧张，马上改正，要表现出政治家风度。

周总理在 4 月 28 日部署“五一”接待和宣传时又说，这次情况是很复杂的，来了许多记者，要搞好接待工作，要内紧外松。“凡是要求外宾去参观的地方，都可以让他们拍电影、拍照片，让他们放开拍吧。实际上在地球的上空许多个卫星在那里转，很多重要的情况早叫它们拍去了。有人提出来，外宾到八达岭拍照时，连西边的地形也拍了，你叫他们拍嘛！”周总理说，有人担心他们在参观中看到防空洞怎么办？叫他们拍嘛，里面不要拍，拍外面的几个土包怕什么？我们不是侵略，我们是防御。

在五国乒乓球队访问之后，世界掀起了“中国热”，这一年“五一”

来的外宾和记者特别多，过去每次 700 多人，这年“五一”来的当政者和记者约有 2400 人。依据总理多次指示精神，接待方针规定，他们参加的活动都可以拍摄，晚上在观礼台上的外宾可以在观礼台拍摄，也可下来拍摄。他们不问的事，我们不要主动解释，不要强加于人，不要灌输，让他们自己得出结论；介绍中讲成绩，也讲缺点；自己不要说得过多，多让他们提问题；有什么必须保密的，我们不安排、不讲就是了，不必那么紧张。

我把周总理的这几段话比较详细地记述下来，周总理如此明确的谈话精神和如此确定的接待方针，在那时提出，不仅需要睿智和科学态度，而且要有政治家的勇气；不只是为了回顾历史，这些精神和方针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依然意味深长，有很强的指导性。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以后不久，发生的意大利制片人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电视片《中国》事件中，江青等“四人帮”成员大加讨伐，追查其“幕后人”，联系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和“讨伐”的内容，笔者认为，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具体情况，我已在《安东尼奥尼与“中国”》一文中详述。

关于美国等乒乓球队来访的报道和国内外的反映，我在《新闻背后的故事》一书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一文中做了详细记述。最紧张、最轰动的是中央确定的中美乒乓球比赛的那场实况转播，周总理指示“怎么打就怎么说”，解放了我们的思想，放下了沉重的包袱，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由此改变了自 1970 年 8 月 16 日恢复“文革”中断的体育实况转播以来“不报比分，不报比赛结果”的奇特现象，该怎么报就怎么报；“怎么打就怎么说”，成了广播和电视体育实况转播的指导思想。不仅如此，4 月 13 日凌晨，周总理还审阅修改了中央电台送审的转播稿，并做了批示：“解说词太长了，我已经都给你们改了，不要那么多形容词。”

那场球赛打得很精彩，转播得也很精彩，吸引了全国听众和观众

的注意力。转播中，我们把美国政府与人民区别开来，现实关系不好讲就避开，讲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不再担心听众说亲美、崇美；主要讲打球，中国队很善解中央的意图，照顾对方，立足表演，打得轻松自如；转播中的解说一直围绕着球台转，描绘现场，善意地转述种种趣闻。中国民众与外界、特别是与美国隔绝多年，处处觉得新鲜，人们似乎主要不是在收听收看球赛，不是评判谁家水平的高低，而是新奇地在看美国人，在看美国，在看另一个世界。一时间，球赛成为全国热议的中心话题，成为世界、尤其是美国等西方舆论评论的焦点：一向善于搞“体育外交”的中国，又通过“乒乓球外交”，“使小球转动了大球”。

### 举办第一届亚非乒乓球邀请赛

在名古屋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不久，1971 年 11 月 2 日至 14 日，中国举办“第一届亚非乒乓球邀请赛”。与其说这是一届乒乓球赛，不如说是一次国际体育中的政治角逐。

邀请赛的目的是想建立一个亚洲—非洲乒乓球联合会，与亚洲乒乓球联合会相抗衡。如前文所述，日本乒乓球协会主席后藤钟二又是亚洲乒乓球联合会会长，他主张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他在 1971 年 2 月的新加坡亚乒联会议上提出了驱逐台湾、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加比赛的议案，被否决，他愤而辞职。后藤辞职后，准备通过亚非乒乓球邀请赛的形式筹建亚非乒联。中间曾经想过把拉美也包括在内，顾及其规模可能超过国际乒联带来麻烦而作罢。

这次的特点是“邀请赛”。“邀请赛”是向“比赛”的一种过渡形式，但不同于比赛。亚非邀请赛的发起国有 6 个，轮流当主席。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刚刚恢复，世界在热议中国，在后藤等人的支持下，由我

国主办“第一届亚非乒乓球邀请赛”，得到众多亚非国家的支持。但同时，由于复杂的政治关系，邀请哪些国家参加又是一场外交斗争和国际政治斗争。这一届共邀请亚洲和非洲 70 个国家，实际参加的有 48 个国家，670 多人，非洲国家居多，与我国建有外交关系的有 30 多个国家，有的国家与我国未建交或建交后又断交，有的与台湾有关系的也来了，参赛国如同一个小的“联合国”。

如何组织好亚非乒乓球邀请赛的宣传报道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任务。当时内部明确的指导思想是，着眼政治，以毛主席“5·20”声明为纲，扩大反美统一战线，动员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及其走狗。着眼于人民，扩大影响，口号是“增进亚非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促进亚非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但同时明确，体育就是体育，要对所有参赛国不论国家大小和水平高低一视同仁，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为体现平等和友谊，团体赛通过循环赛产生冠军；设各项奖，一、二、三名的颁奖台不分高低，均为平台；我国乒乓球队与他国球队的比赛，依据对象不同而打法有别，突出交流与学习，不强调技术水平的高低。例如，我们坚持不与柬埔寨朗诺集团比赛的原则，为区别柬埔寨朗诺集团乒乓球队另建了柬埔寨队参赛；前来参赛的老挝队、巴勒斯坦队也都是临时组建的。为做好宣传报道，中央电台组成报道班子，领会精神，转变观念，设计方案；增加报道量，扩大报道面，增加场内外的花絮；不断更新新闻报道的内容，增强时效；决定 6 场转播（北京电视台设计转播 9 场至 11 场）；从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7 日在第一套节目的黄金时间设立“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专题广播”，每天播出两次，每次 15 分钟；文艺节目中增加播出优秀的亚非文艺。我国媒体很好地理解和贯彻了报道方针，成功地完成了报道任务，在亚非，特别是在非洲国家产生了广泛的正面影响。

## 转播农民篮球赛实况

1975年11月23日下午7点钟，中央电台转播了河北省衡水地区阜城县农民男女篮球赛实况。这是一场特殊的转播。

产生转播农民篮球赛想法的大背景，是在“文革”开始以来批判旧的体育路线，突出工农兵、宣传工农兵的主题下，对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体育宣传应该着眼于人民群众体质的提高，突出群众的体育活动，突出工农兵的主体地位，使他们成为体育舞台上的主角，这也是提高体育运动的基础水平。具体背景一是在1975年9月中旬，召开全国第三次体育运动会，这是“文革”以来，举办的最大的国内运动会，标志着体育运动的恢复，为此中央电台组成了强大的报道班子。除新闻报道以外，办专题节目，每天播出两次，每次15分钟。二是1975年10月15日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这前后大张旗鼓地宣传农业、农村和农民，转播农民体育活动成为具体落实毛主席体育路线、落实“农业学大寨”的一项具体活动。

经过研究和选择，确定转播河北省衡水地区阜城县的农民篮球赛。阜城县是一个革命老区，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县，但体育活动开展得比较好。确定进行男女两场、4个篮球队的转播——抱山公社女队对古城公社女队；抱山公社男队对南城公社男队。转播中插播阜城县和有关公社领导人介绍本地体育运动和“农业学大寨”的发展变化情况，得到当地领导的热情支持，而且对全国有着倡导、推广的意义。

从远离北京、交通和通信不便的农村转播体育比赛实况，在中央电台的体育转播史上是第一次，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转播的最大难点是如何确保成功，尤其是安全播出。要保证安全转播，除日常体育转播的一般准备工作以外，主要难题之一是需要转播设备小型轻便，适宜流动颠簸，而且能在寒冷的天气中正常工作，当时很难找到这种设备；

二是确保线路畅通，那时只能用电话线；三是保证供电不能中断；四是在转播现场必须混播现场效果，而又不能混进不应该有的杂音，特别不能出现政治性的问题。对每个细节都需要过细地研究落实，但依然提心吊胆，不可知的因素太多。

转播在 11 月 23 日下午 7 点开始，在中央电台第二套节目中播送。当晚天气很冷，风大，比赛场地在县城外的一个篮球场举行，四周空荡荡的。我们特意花了 50 元钱租用了一辆公共客车作为“转播室”，台领导、工作人员和转播员在车内，技术人员和选择的民兵在现场保护话筒，遮挡风吹；为烘托比赛和转播气氛，动员、组织群众观看比赛，既要表现出热情，又要防止现场出现不和谐杂音；为保护供电和通讯线路的安全，当地党委和有关部门做了动员，具体落实到单位和人，确保从阜城到衡水、从衡水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北京广播大楼的线路畅通。为了便于收听，中央电台事先反复做了转播的预告，并一再告知从这天的下午 7 点至 9 点，这条线路的电话中断，不再使用。但是我们依然担心，我们知道从阜城到衡水这一段几十里的电话线质量不高，事后我们才知道为保证这段线路的安全，惊动了沿途所在的公社、县委、地委的领导和邮电局，他们不仅反复检查线路，还在转播时特意在沿途每根电线杆子下派一名民兵守护，以防发生意外。

这场兴师动众的转播是紧张的、是顺利的。转播后，我们专门举行了有工农兵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听取他们的反映，可以想象得到，在那种政治气氛下，他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

这是在“文革”特定情况下，中央电台体育实况转播的一幕。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初，中央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一直占据鳌头，后来电视的崛起显示出声像俱佳的优势。在今天电视广泛普及的情况下，广播失去了一些阵地，这是正常的，也是值得欢迎的。但广播仍有自己固守的阵地，有自己的听众，搞好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仍是

有特色的体育报道品种之一。

广播实况转播与电视实况转播的区别在于，电视以画面为主，观众直接目击现场情况，主持人不必多说，主要起背景介绍、看点介绍和画龙点睛的提示作用，以帮助观众熟悉和了解某项体育运动，增加兴趣，起普及和提高的作用。现在的电视转播，已经改掉了初期那种模仿广播转播员的习惯，改掉了那种密集声音解说对观看的干扰作用，逐步形成电视转播和解说的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广播体育实况的解说要比电视困难、复杂得多，必须通过现场描述的形象语言拉近与听众的距离，进而把听众带进现场，在现场与听众之间起沟通桥梁作用，使听众闻其声如见其状，身临其境；广播解说员要不停地介绍现场的过程和细节，通过语调的高低、快慢的变化和感情的起伏，引导和激发听众的情绪，引起共鸣；在现场的氛围中解说员的声音要有穿透力，让人听得清楚。尽管这样，我认为仍不可说话太多，要留给听众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这是广播特色；转播员不只起着转达的中介作用，同时起着引导、突出和深化的作用，这是对一个成功的转播员的素质要求。

我们说，广播依然有着体育实况转播的优势，但要使这种客观存在的优势转化为实际存在的优势，并且能够长盛不衰，需要认真研究广播转播的特点，适应不同时期的主客观情况，不断创新。

### 对体育“转播”与“直播”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央电台的体育实况广播一直沿用“体育实况转播”，而没有使用现在通用的“体育实况直播”；80年代后期，当时任广播电影部副部长的谢文清提出把中央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转播”改成了“直播”，由此曾经引发过一段“学术”之争。

中央电台历史上对直接报道体育比赛和重大政治活动一直用“转

播”，最说明问题的典型案例，是中央电台历史上对“开国大典”的实况转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讯》的醒目标题登载：“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今天全部转播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消息中说：“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全部转播今天下午三点钟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这是新中国诞生时第一次中央电台实况转播的重要预告。这里用的是“转播”而不是“直播”。以后的许多重大活动、重要会议、体育比赛和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都把现场实况的广播叫作“转播”。那时中央电台也有“直播”一词，那是相对于录播而言，只对不经过录播而直接播出新闻时称为“直播”，播音员照本宣科，没有转述作用，没有经过录播和播放的中间环节，为此中央电台设有专供直接播出新闻用的“直播室”。

到20世纪80年代，电视体育转播日益频繁，当时任广播电影部副专员的谢文清在一次会上说：“什么体育实况转播，我看应该叫‘直播’，是直接播出嘛！”随即中央电视台将“转播”改为了“直播”，而中央电台坚持仍用“转播”。我当时认为，他这里说的“直播”事实上并非完全是这样，并不准确。过去用“转播”含有深层的内涵：一、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不同于电视，听众看不到现场实况，是靠转播员对现场的解说和现场音响的传递转达给听众的；二、转播是以现场实况为主的，但在转达中有选择、有取舍、有放大，并不是现场的全部；三、转播中增添了背景介绍、解说、夸张和气氛的渲染，不完全是现场的原貌；四、通过解说员的选取、评述、语气与渲染等，融进了转播的意图和个人的情感，也起着导向的作用。总之，“播”出去的已不是纯粹的现场实录。事实上，电视“直播”也具有以上某些“转播”的特征，并非都是原封不动的“直播”。不久，中央电台在压力下也不

得不把“转播”改为“直播”，“转播员”也改为“主持人”。笔者认为，就广播而言，“转播”更为准确，更为符合实际；“转播员”也不同于“节目主持人”。“转播员”主要是起客观介绍、转述的作用，“主持人”是一个节目、一场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主导者。体育比赛的现场活动并不是由“主持人”组织、安排和主导的。

### 关于体育报道的联想

——写在北京奥运会之前

中央电台的体育报道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经历了大量日常报道，经历了“文革”、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以及多次亚运会、奥运会等大型报道。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尽管体育报道不断伴随着我国和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发展变化，仍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基本遵循的原则。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十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又专门就奥运会的宣传报道准备工作做了调研。我结合历史的演变，以举办奥运会为个案，发表文章谈了对几个问题的认识，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在《中国广播》等媒体上发表，今天读来也并非“明日黄花”，现稍作修改登载如下。

**体育与政治。**体育与政治有着不解之缘，处处得以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来。尽管在奥运会、亚运会的宗旨中，都明确提出体育不与政治挂钩，事实上其背后无不隐含着政治的因素，体育与政治总是交织在一起而纠缠不休：一是从举办奥运的申办到批准的过程，可以看出，都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甚至直接涉及政治稳定的因素；二是一个国家的体育活动和体育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与该国经济社会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精神；三是一些国家提出申办亚运会、奥运会，也是意在提升本国形象，与

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四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体育代表团是否参加国际体育运动会都有政治的考量。

从我国申办到举办亚运会、奥运会的实际情况看，如上所述，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一些本来就不赞成在中国举办亚运会的西方反华势力和反华舆论，起劲地煽动亚洲各国抵制十一届亚运会在中国举办，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诋毁中国的形象。我们后来注意到，美国等某些反华舆论在中国两次申办奥运会时他们反对，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前夕有的又在开始鼓动进行抵制这次奥运会。纵观历史，在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体育活动中，有人总是在扮演反面的角色。我们也不会忘记，1996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甚至不放过转播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的机会攻击中国。这也许是个直接出于反华目的极端的反面典型，对于说明体育运动与政治关系没有普遍意义。但1980年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反过来苏联还以颜色，1984年苏联抵制洛杉矶奥运会，两个超级大国在国际体育领域针尖对麦芒，把举办和参加奥运会作为他们之间进行政治斗争的筹码，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体育就是体育，它隐含着政治因素和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关系，但体育本身不是政治，只是通过体育活动体现而不是直面政治。正如许多事情与政治有关而它本身并不属于政治一样。体育首先是全民的健身活动，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品格。毛泽东主席号召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说明了体育的普遍性和体育的真谛。体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专业性、竞技性强的体育运动会，其特点表现为强烈的对抗性和竞争性。尽管体育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全民素质和精神风貌，但仍然属于体育应有的范畴。着眼于体育本身，重在参与和共同提高，这也就是奥运会、亚运会宗旨中把体育与政治分离的原因。故体育报道不同于对政治活动的报道，不能把体育与政治直接挂钩，不能把体育的输赢与国家利益的得失等同。“文

革”中我们是有过教训的。那时候对什么都强调“突出政治”、“政治第一”，体育比赛中一方面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另一方面又把体育直接表现为政治。（笔者记得，1972年6月10日，在纪念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时，提出了体育的“五个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为建立和发展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支持各国民众的革命服务）对某项重大体育活动取得的成绩不恰当地提升到政治的高度，归结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如果我们在比赛中失败了又如何说？”体育竞技、科学实验等本来就是胜与输、成功与失败的反复博弈，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竞争是体育的竞争，胜负是体育的胜负，如果把其得失、成败都与政治密切联在一起，不仅难以自圆其说，更使自己陷于被动、尴尬的境地。我们从事体育报道，要客观地对待体育，依据体育规律和特点报道体育，不应以政治论体育，更不应发生像1996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转播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那样，出于狭隘政治利益而不懂基本的礼仪。

**参与和举办。**我国媒体对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亚运会和奥运会的报道，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作为举办奥运会东道国的媒体如何报道奥运会，我们还没有经验，报道举办亚运会也只有过一次。北京奥运，提供了一个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国的大好机会，我们要抓住不放；提供了一个锻炼和检验我们体育报道的机会，我们也要抓住不放。事实上，对只参与比赛和参与举办的报道，两者是不完全相同的，甚至大相径庭。了解和把握这种不同之点，对于我们搞好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报道，是很有帮助的。

过去，我们作为体育运动参赛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主要在运动员

的成绩和表现。作为参赛国媒体的报道主要是报道好我国体育代表团的活动，重点是体育竞赛，焦点是我国的优势项目和金牌得主，与此同时报道好其他代表团和运动会的举办，反映世界体育发展的新水平。不管报道任务有多么重、规模有多大，我国媒体的任务比较单一，对运动会的举办处于“旁观”地位而做客观反映，没有报道比赛以外的压力。

今天，我们作为2008年奥运会举办国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则大不相同。北京申办和举办奥运会实际上是举国的行动，举办的初衷就是为了借此对外介绍中国，扩大中国的正面影响力；就是为了办好这届奥运会，为世界体育运动发展做出我国的贡献。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家形象。塑造这个“形象”的主要因素，一是把北京奥运会办成历届最有特色最高水平的奥运会；二是通过体育比赛的成绩来展示我国体育运动的水平；三是通过中国人民良好道德风尚和精神风貌展现中华民族的文明。这就不难看出，作为举办国的影响力，体育竞赛中的成绩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成绩是单一的、暂时的，而对中国的印象才是广泛的、长远的。我国媒体的报道不再只是“旁观”者的角色，而是举办者中的重要成员，共同为实现举办的共同目的而尽职尽责，不再只是报道我国体育代表团的比赛成绩，而是围绕报道奥运会全面展示中国。

举办奥运会目的的实现是主、客观的统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客观效果更为重要。我们不能只想主观要达到什么目的，还要从另一方面仔细揣摩世界各国人民希望从中国主办这次奥运会中看到了什么、了解了什么？一般而言，他们不仅关注中国代表团取得了多少金牌，更关注中国有没有能力办好奥运会，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稳定的、发展的、有承办能力的中国，是一个胸襟开阔、礼貌待人、有着良好文化素养的文明之国。他们的关心，也正是国外媒体报道的热点。我们去参与

比赛是派出，我们举办奥运会是引进。奥运会期间到北京来的不只是各国的官员、运动员，还有记者和观众。他们的特点，一是对中国了解甚少，甚至有很多误解或偏见，他们会新奇地看待中国；二是他们来自各阶层，文化多元，需求多种多样；三是他们中许多人不只是来看比赛，他们的兴趣既在赛场内又在赛场外，他们带着眼睛、耳朵和感受来观察中国的方方面面，甚至更对民间生活有兴趣。因此，我们媒体的展示也应该是多方面的，不只盯着体育竞赛，更多的是运动员和公众良好的体育道德、文化素养、热情周到的服务和干净优美的环境。各国文明尽管不完全相同，但是相通的。做好他们的工作，也许是更重要的。这不仅需要媒体的宣传报道，更需要全民的参与和良好的素养。奥运会是对外宣传的最好契机，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严峻的挑战，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要通过我们的努力，突出报道奥运会的整体性、协调性和规范性，给人以全面的良好印象。

**金牌与友谊。**就比赛而言，毫无疑问，奥运场上的竞赛成绩是各国关注和媒体报道的焦点，自然也是我国公众关注和媒体报道的焦点。我国运动员正在加强训练，他们摩拳擦掌地准备夺取金牌、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为祖国争光，永远争第一”是他们竞技的动力和奋斗目标，在激烈的竞争和对抗中自强、超越是奥运会的魅力所在，取得优异成绩、创新世界体育水平是运动员的职责。毫无疑问，这些是北京奥运会举办成功的亮点和重要标志之一。对于我国运动员来讲，夺得更多金牌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但运动员的成绩不是奥运会唯一奋斗的目标，不是评判奥运会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对于任何事物的把握都有一个度，不可强调到过分的程度，“过犹不及”；对我国观众而言不可过分地引导他们看重金牌和输赢，如果眼睛只是盯着自己的金牌得失，也是一个民族不健康不成熟的心理状态，就没有充分理解奥运会的真谛，就不会办好奥运会。比赛成绩的报道，也

不要只报道几个世界体育强国而冷落他国，各国受众都在关心自己的体育代表团受到的礼遇，注视着中国传媒对他们的态度。

奥运会的宗旨是通过参与与竞赛，实现和平、和谐和共同发展。友谊即和谐，讲和谐就要讲友谊。“重在参与”是奥林匹克的精髓之一，这不只是指运动员，而是包括民众的参与。我们做出承诺，要把这届奥运会办成历届最有特色、质量最高的奥运会。我们从举办奥运会中得到什么？所要得到的不只是金牌，更不要因得金牌而失去了其他。不可过分看待输赢。不以金牌多少论英雄，不以金牌多少论体育。有人说过，金牌是暂时的，友谊是长远的。因暂时而失长远，不值得，不是我们的初衷，更不是我们的民族传统和精神。“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奥林匹克精神在世界的发扬，推动构建和谐世界与共同繁荣。

现在有的国内媒体在制造一种气氛，似乎把我国夺取金牌当作运动员和奥运会的唯一奋斗目标，当作判断奥运会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就看中国体育代表团能否获得金牌第一，就看中国是否是世界体育强国。甚至认为，这次奥运会在我们国家举办，我们理应是金牌第一，不然就有损中国的形象。这种错误的导向是有害的，不仅给我国运动员施加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也误导了民众，误导了奥运会的方向。不宜不切实际地张扬自己的实力，我们要客观地认识和对待自己，要客观地对待他人。国外有的媒体也在制造这样一种气氛，我们要清醒。我们的目标是争取把这次奥运会办好，推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健康发展。事实上，一些成功举办过奥运会的国家并不都是世界体育强国，如最近举办过奥运会的澳大利亚和希腊，同样给世界留下良好的印象。

**报道与记者。**奥运会期间，全世界有3万多名注册持证记者参与采访，同时还有许多不注册的记者前来采访。这是介绍我国的大好时机，我们要热情积极地欢迎他们来采访，他们是北京连接世界的桥梁。我

们要认真执行《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他们云集北京，到处都是记者的眼睛，他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中国。记者是来采访报道的，他们都是带着任务来的。根据以往的经验，来采访的记者有三种类型：一是为采访报道奥运会和赛场比赛而来（包括运动员和观众的文明），尤其关注本国运动员的成绩，这是大多数记者的任务；二是为报道北京和中国而来，他们的注意力在赛场之外的各个方面，他们将深入到各个角落去挖掘自己所需要的题材；三是有极少数的记者为专门挑毛病而来，专找问题进行负面报道，把某些问题故意放大，甚至制造“新闻”，干扰奥运会，诋毁中国形象。不论哪种类型都是客观存在，在举办过程中各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些问题，一视同仁，认真对待，做好接待和服务工作，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各种情况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我们要把功夫下在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应对能力上，争取好的结果。

2000年5月悉尼奥运会前夕，我到澳大利亚采访了该国协调局国际关系部部长考克波恩先生，他介绍说，对于奥运会以外的报道要主动安排。一般来说，在奥运会开始两周以前，有些记者陆续来到悉尼，记者有的是时间和精力，不仅关注奥运会，而且关注澳大利亚的各个方面，找一些与奥运会无关的题目做文章，甚至专挑毛病，对此不能“堵”只能“导”。考克波恩说，记者的采访报道都是有任务的，你必须千方百计地“喂”他们，你不让他们“吃饱”，他们就“到处找食吃”。我们也希望记者多报道澳大利亚，但我们更希望记者发回的报道是客观的、平衡的，为此你要为记者着想，主动为他们安排好，主动为他们提供“食品”。“记者得罪不得。你要想让记者报道好，就要为记者提供全套服务”。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观念：“服务就是宣传。”应该说，考克波恩先生的这番话是很有见地的，我们知道悉尼奥运会

对记者的公关是成功的。对此，我们也有过类似的经验，要让记者搞好奥运会内外的报道，宜多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要善待记者。外国记者来自另外的国度，他们都带着各自的眼光来观察和评判中国，这是正常的；出现些报道和认识上的不同声音也是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我们上下都应该增强承受能力，这也是一个大国国民应有的一种媒介素养。即使有人不怀好意而来，我们更应该以良好的接待和服务争取赢得良好的舆论环境。

**体育报道用语与文明。**体育用语是个具体问题，但却展示着中国文化与文明。我记得 1990 年我国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时，中央电台对开幕式的转播稿做过反复修改，最后删去了宣扬自己的话，如说中国体育“已经跃入亚洲强国的前列”。有人不赞成这样的删节，说“不切实际的吹嘘应该删去，但这是事实”。我认为“是事实也不必由我们去说”。修改中删去了对他国一些不恰当的提法，如说某国“从 80 年代中期才开始开展体育”；说某一项目是某国的强项，曾在亚运会上“获得第五名”；说某某人“是该国唯一进入前六名的选手”；说某国代表团参加过 8 次亚运会，“共夺得 4 枚铜牌”等。以上说法其意在褒，但让人听了不舒服，容易产生歧义，我们都做了修改。我后来也注意到，在历次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报道中，有些过头的、不恰当、不文明的提法屡屡出现，赫然醒目地写着“体育比赛是和平时期的战争”、“横扫某某国家”、“将某某打翻在地”我们在某一项目上“稳坐霸主地位”等提法，超出了人们正常理解和接受的范围。有人认为，体育就是体育，最具挑战性、对抗性和竞争性，用语更具有刺激性，其实体育报道处处显示着报道者的素养和国家的文明程度。我们的报道中也不乏很好的标题，以《京华时报》2004 年 8 月 29、30 日报道接近尾声的雅典奥运会为例，中国“女排登顶奥运之巅”、刘翔“天神使者传捷报”、邢慧娜“东方神鹿重现万米跑道”、“阿根廷男篮雅典封神”、美国“梦

之队梦断雅典”、“英国称雄百米接力”等，把握分寸得当，都很有特色。

从某种意义上说，举办奥运会和媒体的报道、公众的交流都是一次盛大的公众外交活动。我相信，我们既是巨大的付出者，更是巨大的受益者。就我们的媒体和公众而言，我们将更广泛深入地认识世界、适应世界、融入世界，既是对我们素质的检验又是锻炼提高、开阔视野，从中学会如何与世界打交道。

# 特定时期的宣传特点



## 一 “四清”——“文革”的前奏

1964年8月，我开始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那时，中央电台有十几个部，400多人。我被分配到电台的国际部。

这是中央电台的一个小部，只有20多人，但它却承担着中央电台国际问题宣传任务。它办有《国际时事》节目，通俗地讲解国际问题，颇受听众欢迎，是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之一；办有《世界地理知识》节目，介绍世界各国的概况，包括历史和经济地理，以及与我国的关系；办有《在社会主义国家》节目，这是依据与苏联等签订的协议，收录并选播莫斯科电台的节目，集中介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并定期地向莫斯科电台提供我们的节目，进行交换。

我初进电台并没有投入工作，按照规定，大学生毕业后要先劳动

锻炼一年。电台安排我们去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或“四清”运动）。这是一项新的任务，不只是我们这些学生感觉新，那些老广播也觉得新，“四清对象”是整“农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初，我们身在“四清”中，似懂非懂，开始只当作是一次具体的政治运动。后来，尤其是到“文革”时，再回过头来看“四清”，认识得才更清楚一些。

“四清”，是在当时国内、国际大的政治环境下，寻求如何巩固人民共和国政权的一次重要探索，是在新形势下进行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一次试验，是长达10年“文革”的序幕。“文革”中许多基本问题和基本方式，在“四清”中做了预演。

过去我们知道不断搞政治运动，也知道其中的利害，但终究是旁观者，这次参与其中。没想到，初出茅庐，便卷入了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卷入了一场深刻的政治运动。

初步进入社会，不知深浅，热情很高。出发时间定于国庆后的10月4日，去的地方是山西省五台县大建安村。我的个人准备极其简单，困难时期刚刚过去，生活稍有好转，那时的条件也复杂不起来。我是单身，无牵挂；来电台后，先是住永定门外的车马店，买月票挤车上班，不久搬进广安门外的车马店，行装一裹就走。不过，为了照顾我们，经过特别批准，免收布票可以买一身减价处理的旧军装，不过可真旧，穿起来像个部队的伙头军，然后买一个木头箱子一装，就这些。我们是去搞“四清”，去斗“走资派”，当然不会有什“生活补贴”。但是大家的热情很高，争先恐后，能被批准参加“四清”，被当作是政治上的考试，是党组织的信任。

中央广播事业局同时下去“四清”的有四路人马，我们是其中的一路。我们这一队的政委是广播局党组书记、党委第一书记丁莱夫，队长是中央电台副台长耿耀。广播局与山西省水利厅混合编队，先到

定襄集中学习，明确工作队的任务、工作方法。正在学习期间，听到我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大家欢欣鼓舞。

中央先后下发了农村“四清”工作文件“前 10 条”和“后 10 条”作为指导方针，“四清”清什么？如何清？从先后两个 10 条可以看出来。当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十分严重和复杂，新中国刚刚成立 15 周年，农村出现了资产阶级，三分之一的政权（阵地）已经不在我们手里，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要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反对“和平演变、反复辟”，夺回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同时，太不相信群众的觉悟，把农村看得一团漆黑。这种缺乏政治自信、对农村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与 1959 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和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有关，与国际上的反修斗争也有关，把政权得失看得相当严重。

正是基于这种估计，确定了错误的工作方针和工作方法。问题出在党内，工作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集中在农村党支部，特别是支部书记，对他们都不要信任，“有枣没枣打三杆”；工作方法如同解放以前在白区做地下工作，与干部背靠背，扎根串联，访贫问苦，依靠贫下中农，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层层深入发动群众。

为保证“四清”的顺利进行，事先我们工作队在定襄集训，学习政策，了解情况。我们要去的大建安村，是五台县的一个大村，有九个生产队。大建安在滹沱河的北岸，河的斜对岸是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西面是定襄，历史上是拉锯区，阶级关系又比较复杂。同时这一带在斗争中也出过不少名人，大建安徐家祠堂的家谱上有徐向前元帅的名字，薄一波是定襄人，有党的工作基础。要求工作队员必须增强阶级斗争意识和敌情观念，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绷紧阶级斗争

这根弦，更不要被“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打中。对工作队员规定严格纪律，不准一个人去串门，不吃鱼肉蛋（实际上也没有）；特别嘱咐我们这些没有结婚的年轻人，如有人问及婚姻之事，回答的口径是：“已经结婚，并已有了两个孩子。”

几十名队员进驻一个村子，不是个小动静，如同发动一场战役一般，进村前，进行战前动员；一进村，召开群众动员大会，亮明旗帜。在没有扎根串联了解情况以前，对谁都不能亲近，对谁都不能信任。可是，我们发现，这里的农民穷得叮当响，比我的山东老家还穷，他们连窝窝头也吃不饱。从我们吃的，便可见一斑。

我们是吃派饭（即轮流到贫下中农家里去吃饭，到谁家吃饭是一种政治上的信任），一天交三毛钱。尽管我们一再说明，不能特殊，他们总还是设法给我们做得好一点：几个窝窝头、地瓜、山药蛋、稀粥，外加一碗“烂咸菜”。“烂咸菜”是当地的叫法，即把菜叶子、菜帮子、豆角等，都焖在一个缸里，让其发酵、变酸。吃饭时，既是菜又是咸菜，晋北地区大多这样做。有时候也做一点菜，把山药蛋、豆角、南瓜都熬在一块，满满地堆上一大海碗，既是菜又是饭。当地农民很会做饭，一种山药蛋，能做出许多花样来，炒、煮、蒸、烧、腌，我很爱吃。但他们不吃鱼，河里的好多鱼没人捞。有一次，我们教他们做鱼吃，他们从吃了早饭后炖上鱼，一直炖到吃午饭，肉和刺都混在了一起。他们自己吃的，自然比给我们的更差。当地人向往的最好吃的饭菜，是逢年过节吃的炸糕和猪肉炖粉条。

要整当权派，自然把矛头对准了党支部书记宋生和。经过近半年的明查暗访和交代检举，宋的主要问题是群众态度生硬，方法简单，另外爱点烟喝点。所谓好一点，也不过是能吃得饱，能经常吃上窝窝头。可哪里有这样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哪里有这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我们党领导人民奔幸福生活，

那该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在大建安“四清”了4个多月，1965年春节之后，组成了另外一支7个人的分队到离大建安不远的凤栖岩村开辟新点，进行“四清”工作，我是其中一员。

凤栖岩村，多么美的名字！凤栖岩村在一座山顶上，村边一块大石头上有一个“凤爪”印记，相传很久以前有一只凤凰飞来，落在这儿久久不愿意离去，由此得名“凤栖岩”。这美好的愿望，也许就是他们能够住在这里的精神支柱。不过，凤栖岩村并没那么美好。我们从山脚下爬到山顶要两个多小时，我纳闷，好好的平地不待，他们怎么会看中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里有可耕的土地。这个村有30多户人家，大多数人住窑洞，只有几户盖了房，其中有两户是村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村里人干活、串亲都要上山下山，相互串门也是上来下去，无平路可走。村里人最难的是缺水，吃水之难远近闻名。我们还没有进村，听人讲过这么一件事：凤栖岩的人从来不洗脸，早晨起来彼此见了面，相互向对方的脸上吐唾沫。这纯属夸张，但是吃水之难，一般人无法想象。全村人吃水全靠山下的一小股泉水，泉水不是流喷，而是向下滴，家家往返七八里路到那里排队挑水。挑水上山前高后低，那可真难，无劳动力的人家就更可想而知了。水的另一个来源是挖旱窖，在山沟处挖掘一个个旱井，里面用石灰抹平，防止漏水。等到下雨的时候，村里人跑出来，把雨水改道，让羊粪和雨水一起流进窖里，然后封住窖顶，让雨水发酵。过几天把水打上来，颜色如红茶一般，但是喝起来却没有羊粪味，甜丝丝的。就是这种水，我们每天洗脸、刷牙特殊优待半缸子；各家刷锅、洗碗、擦筷子、抹桌子，全靠一块湿抹布。我写这一些，不是给当地人出丑，是想说明他们生活的艰难，在其他地方不是问题的事，在这里成为生死攸关的大事，要费那么大的力气去拼搏；更想说明，像这样的地方，也要去“四清”？也要抓出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什么叫资本主义。

我们在凤栖岩工作了4个多月，自然不是“四清”，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凤栖岩的历史上，从来还没有一次来过这么多人，又是从大地方北京来的“大干部”，他们对我们的感情不掺一点假，没有一点渣。白天我们一起下地干活，晚上除了开会、学习，便是拉家常，一直聊到半夜，尤其是青年人，对外界的事都有兴趣，知道了在凤栖岩以外有一个大得不得了的天地！

我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自认为我了解农村。这次“四清”，使我接触了山西的农村，大大开阔了眼界。我国的农民勤劳纯朴，对党一心一意，但是他们太苦了。在我国，不了解农民，也就不了解国情，也就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我们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应该给他们指出一条富裕之路，应该给他们带来幸福！

“四清”是我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平生第一次参加政治运动，我受到了教育，受到了锻炼。“四清”要搞阶级斗争，要抓“走资派”，这是上边定的我们无法抗拒，但是我们在和农民的相处中，增进了了解，建立了感情。我们离开大建安、凤栖岩一年时，1966年春，工作队委托我专门回去看望他们。我忘不了大建安村民那一如既往的深情；我忘不了，凤栖岩的一对70多岁的夫妇一定要我到他家里去吃饭的情景。这一家只有两位老人，老妈妈早已双目失明，她到院子里干活、上厕所，来回扶着一根铁丝走，唯恐掉下山崖。可他们一定要我到他家去吃一顿饭，“哪怕只吃一口也行”！我去了，他们还专门为我做了莜面。这难得的一顿饭，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们身为国家干部，不能帮他们摆脱贫困，愧对他们。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里的群众并没有找我们算账。可我更担心，因为“四清”，那里的党支部书记、队长会不会再次挨斗？那里老百姓的日子会

不会更难过？本来的穷山村、穷地方也许更穷了！

以后的好多年，我一直与凤栖岩保持着联系，尤其是同几个青年人有来往。我知道，他们中有些人走出了山村，有的参了军，有的到火车站当了搬运工人，有的到山外上了学，我祝愿他们走出了大山！后来的大建安、凤栖岩会是什么样子呢？2001年中秋节前夕，我跟随一个旅游团队从五台山到太原，途经大建安，我要求停留一个小时，我看一看我“四清”过的村子和老乡，在将近40年中会有多大的变化。我进了村，多方打听，找到了当年的村党支部宋生和与当年的总会计。令人高兴的是他们都健在，都已84岁，都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和过得去的生活。我愧疚地说：“当年‘四清’让你们吃苦了。”他们却说：“这是那时候的政策，也不是哪个人的事！”我看到整个村子几乎没有变化，还是那时的房子，还是那下雨后泥泞的街道，街上还是那么多无事可做、聊天的人。村民告诉我，比“四清”时能吃上饱饭了，能吃上馍了，就是没有钱花。凤栖岩在山上，我没有去，我望着那熟悉的山顶，想着当年，我祝福他们生活幸福。

## 二 “文革”初期的特殊宣传

1966年夏，毛主席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骤然刮起的“文革”风暴，改变了新中国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大地开始了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央电台的广播宣传必然地进入了“文革”宣传时期。

“文革”时期的宣传，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政治时期的极其特殊的宣传。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出现过“左”和右。新中国成立后，连续的政治运动，“左”的倾向一直占着主导地位，而且日益膨胀。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膨胀到一个新的高点，而“文革”中更是登峰

造极。“文革”开始后，尤其是初期，中央电台的宣传秩序是杂乱的，宣传思想是混乱的，过去行之有效的一套被打乱了、批判了，现实的一套没有形成，造反派掌权，打着“造反精神”为所欲为。中央“文革”是一会儿一个花样，朝令夕改，今是昨非，宣传不可琢磨。广播又有自己的特殊性，更难以把握，一片混乱。作为历史的回顾，只简单列举几个方面：

“造反有理打倒一切” “文革”兴起，从第一张大字报、红卫兵兴起，“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全国大串联，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大会”——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后来乘坐敞篷车检阅红卫兵等多次接见，以及重要会议、重要文件和重要活动等，作为党的喉舌的中央电台都不遗余力地大张旗鼓地造势，推波助澜。

“文革”的对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被怀疑、被整的对象，放手发动群众，“造反有理”，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对干部“有枣没枣打三杆”，说你是你就是，没有任何法律保障。众多干部顷刻间成为“走资派”，被“造反派”打倒、批斗，挂牌游街，残酷斗争。在人们心目中受尊敬的一些中央高级领导干部，文化、新闻界和社会界知名人士，顷刻间成了黑线人物、走资派、叛徒、特务，今天打倒“刘、邓、陶”、“彭、罗、陆、杨”，明天又打倒“杨、余、傅”；什么“阎王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三家村”、“特务联合国”；到处都是“资产阶级黑线”和“修正主义大毒草”，都在“破旧立新”的“横扫”之列；全国都在大串联、在武斗、在夺权。天下大乱，人人朝不保夕！我记得，1966年12月的一天，当时为中央第四号人物的陶铸，凌晨在中央广播局为我们做完报告后不到三个小时，广播局大院内就贴出了“陶令不知何处

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的大字标语，他已经被打倒。在这种混乱复杂的政治局势中，毫无疑问，作为党的喉舌的中央电台，必须紧跟形势，及时报道“文革”的兴起，并为此大造舆论、推波助澜，被称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

**滥用“毛主席语录”** 学习毛主席著作是经常的任务。学习毛主席语录是伴随“文革”、普及学习毛主席著作而兴起的。由林彪组织编辑的《毛主席语录》，成为人人必备、必带、必学的“红宝书”，而且成为一种政治身份的标志。在集会和重大活动中人人挥舞着，形成了红色的海洋。学习、生活、报刊、广播中到处引用毛主席语录。中央电台各类节目的播出，开始都要先选择与内容有关或相近的语录；为适应形势、推动学习，中央电台举办了《学习毛主席语录节目》，后来又增办了《学习马、恩、列、斯语录》节目。

毛主席语录歌开始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开始，后来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滥，什么样的语录都谱成歌曲。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发表，接着就有“最新指示”语录歌，有些文艺创作人员和演出团体专门做这件事，中央电台也随时组织录制播出。当时流行着最短的语录歌是“要斗私批修”，最长的歌是《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由此逐步演变成对其他内容的文章也谱写歌曲，如毛主席“5·20声明”中的“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生活中还出现了什么“语录操”、“语录电话”、警察用语录指挥交通等奇特的现象。

那时候，各媒体、文章、会议、学习班、大字报等不仅到处登载毛主席语录，凡文章中引用语录都必须用粗体字鲜明标出，以示重视或强调。有许多文章都是用语录串联起来的，造反派用语录相互攻击。报纸上登载毛主席的头像，有的人因稍不留神在报纸上涂画，或扔掉

撕掉报纸，或用报纸包东西，“损害”了毛主席的形象而被揪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对语录的滥用，谁都不敢表示疑义。直到 1971 年 10 月 22 日，中央告之，一般新闻前面可以不用毛主席语录了。此后，中央电台《新闻报摘》和《全国联播》节目开头的语录开始逐步递减；各个专题、对象节目采用不定期、不固定地播出语录。1975 年后中央又提出，文章中不要太多地引用毛主席语录，文章容易写长，必要时可以转述。1978 年 3 月 23 日，中宣部通知：今后报纸、刊物、图书、文件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语录，不再用黑（粗）体字。

“早请示 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流行于“文革”初期，成为向毛主席表忠心的一种形式，起源于北京针织总厂红哨兵的一个报告，随后风行于全国。

每天上班，每个人首先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恭恭敬敬地站在毛主席像前（有的弯着腰），虔诚地向毛主席报告自己的行为打算，做出忠诚的保证，然后学习毛主席著作；晚上下班前，以同样的形式向毛主席汇报，检讨自己一天的言行。广播和其他媒体也大力宣传、提倡和推广。不这样做，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甚至被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受到红卫兵或“革命群众组织”的揪斗。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成为变相的封建迷信，成为实行罚站、罚跪、请罪的一种体罚形式，有的借故打击报复。

不久，“早请示、晚汇报”，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他对 8341 部队说，你们不要这样做。回答说都在这样做。毛主席说，他们做你们不要做。后由 8341 部队开始，到 1969 年四五月份，一些单位陆续停止。广播宣传也由多到少逐步停止。

由此及彼，联想到中央电台每天两套节目早晨开播时的祝福语，在《东方红》乐曲之后播出“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

“主席万寿无疆”要不要改？这是敏感的政治气候。不改，毛主席有话；改了，人们会对中央电台产生误解和强烈的冲击，并会怀疑到“政治气候”有什么变化。中央电台谨慎地采取了过渡的办法，第一步先改成了“首先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后逐步停止祝福语，只保留《东方红》乐曲。

**盛行的“忠”字风** 最初起源于从东北兴起的“忠字舞”，迅速蔓延到全国，到处都在跳，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它与“早请示、晚汇报”一样，都是最具广泛性、群众性的活动，尽管有许多人有不同的看法，但也得做。广播局的“忠字舞”是在1968年年底工人宣传队进驻后搞起来的，在这样的文化单位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兴起来。中央电台没有广播提倡，但在电视上时常出现，客观上起了倡导作用。由此“忠字舞”引申到“忠字歌”，“忠字衣”、“忠字路”、“忠字区”、“葵花舞”、“颂扬会”等。有的地方为设立专门进行效忠活动的“忠字区”，拆房子，平场地，在中心塑毛主席像，周围刷语录，种植花木。中央“文革”积极推动，后来他们知道毛主席对此很反感，1969年6月27日江青等审查电视片时突然提出“忠字舞”、“葵花舞”都不要；陈伯达说“葵花舞是从印度传来的”。此后停止宣传。

**“文革”中的宣传用语** “文革”时期的许多用语，反映着那个特殊时代宣传的鲜明特色。

如，宣传报道中处处讲“三忠于、四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崇敬，无限忠诚，无限敬仰”！

如，宣传报道中到处是“三个万寿无疆、四个伟大、三个健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如，为了强调革命性，到处用“革命”词句，以“革命”和“同志”作为政治划线的标准，称“革命的同志们”，又具体分解为“革命群众”、“革命的工人同志们”、“革命的贫下中农同志们”、“革命的党员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等，在全国人民中严重地制造着分裂和对立；

如，中央电台节目的开头语，由“各位听众”（认为“不分阶级”）普遍改为“现在是××节目时间，革命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现在开始战斗！先学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如，文章、讲话、节目中，充满着“砸烂狗头、混蛋、狗崽子”等恶言秽语，有一篇5行字的稿子就有5个“混蛋”，2000多字的一篇稿子有25个“坏蛋”，一篇不长的文教稿子中有14个“混蛋”、4个“砸烂狗头”；

如，高调播音，越高越革命，越左越痛快。负责宣传舆论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王力讲：广播“要有战斗性”，“为造反派打气”，“要使造反派听了扬眉吐气，保守派听了心惊胆战”！“社论可以比政府声明调子高，文章可以比社论调子高”；

如，到处充斥着林彪的特殊用语。“突出政治，政治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政治可以冲击一切”、“胜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形势是大好而不是小好，形势越来越好！”、“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这只是那时典型用语的一部分。这些大话、空话、套话、脏话，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充斥着新闻媒体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对外宣传、国际斗争中，内外不分，照搬对内宣传的一套，造成严重后果。如1967年2月11日，因为莫斯科发生了红场事件，在

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声讨苏修反华暴行大会，周总理发表了讲话，中央电台事先没有请示总理，由王力批准，把总理的内部讲话实况转播了。周总理非常生气地批评说：“广播局没有负起责任来，把我的内部讲话播出去了！”外电反应“周总理控制不了局势”。中央电台赶紧写了检查报告送给王力，王力蛮横地说：“宣传是中央‘文革’管的，总理不了解情况，不要管他！”

1967年7月发生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给我国外交造成了很大的被动。1967年7月，电台播出了报纸刊登的“打倒奈温反动政府”、“油炸科西金”；1971年3月，新华社在发出的一篇稿子中写道：“警告尼克松政府，如一意孤行，小心你的脑袋！”

更多的是内外不分，自吹自擂、强加于人，毛主席因此在此期间接连就对外宣传提出批评，做出批示，不得不下大力气予以纠正。

### 三 “文革”特色节目设置与演变

“文革”开始时，中央电台有497人。有两套节目，每天播音2140分钟（35个多小时），其中第一套节目1290分钟（21个多小时），第二套节目850分钟（14个多小时）。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出是以节目的形式出现的。每个节目是电台、电视台播出内容的组成部分。一个台的水平、风格具体表现在各个节目上。节目又是电台、电视台的门面和橱窗，每个节目都有自己界定的内容、对象、编排和播出形式。

各个时期的节目都是不断变换的。有的变换快一些、大一些，有的相对稳定。变换的主要依据是由形势的变化而引起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变化、群众需求的变化以及各台自身的发展变化。这种适应变化而相应调整、设置的节目，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和办节目的意图。20世纪50年代，除了名称变化较多的《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和《全

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以外，有些节目如《历史故事》、《祖国各地》、《阅读与欣赏》、《科学知识》、《讲卫生》、《星星火炬》、《小喇叭》等一批文艺专题节目一直延续到“文革”以前。

“文革”期间，上述知识性节目毫无例外地受到批判，被列入“修正主义大毒草”并被撤销。在节目的变化中，有的节目形式没有变化，如《新闻报摘》、《全国联播》等，但其内容和形式在变化。许多节目由“文革”特色的新节目代替。这期间是中央电台节目设置最混乱、最有时代“特色”的时期。在“文革”初期，主要设置的节目有：

《学习马列、毛主席语录节目》 后来随着学习的深入，在毛主席提出学习马列后，改为《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节目》，实际上，主要还是选择语录，有的主张办讲座或系统地讲解几本书，没有被批准。

《天天学节目》 与各地开展的“天天学”活动相配合，1966年11月7日办起了《天天学节目》，安排在早晨一上班的时间播出，由开始的15分钟到30分钟，再到20分钟、15分钟。由一天发一次新节目到2~3天发一次，再到一周发一次。从开始全文播送一篇文章到播出几篇文章相近主题的选段，再到根据需要选播毛主席语录，后来加选了马、恩、列、斯的语录。选播中存在很大盲目性，对象感不强，认识不统一。有人主张以学习基本理论、观点为主，有人主张以配合政治形势为主，比较多的是配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如毛主席最新指示或一篇社论发表后，就选择与内容有关的论述，实用主义地图解内容，很容易从中摸政治气候。选择中有很大难度，一是有些内容和提法不适合于现在（当时很容易被理解成“过时论”而被批判）；有的难懂，要求对背景或典故做出解释；有的语录适用于多个方面，内容有不确定性；有的语录难以准确表达完整的意思，容易断章取义；最主要的是著作太多，而编辑和审稿人知识贫乏，难以准确把握，而当时又是爱“上纲”的年代，天天提心吊胆。后来随着学习方式的改变，尤其

在林彪 1971 年 9 月 13 日叛逃之后，节目逐步停止。后改为《学习节目》，保留了很长的时间。改革开放后改为《理论与实践》节目，曾配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连续播出 13 讲，系统阐述这一观点。

《红小兵》、《红卫兵节目》 将中央电台原来的“学龄前儿童广播”改为《红小兵》节目，1975 年 4 月又改为“对少年儿童广播节目”。《红卫兵节目》是伴随着红卫兵的兴起办起来的，报道红卫兵的行动，鼓动和支持红卫兵起来造反、夺权；播出过红卫兵批判大会的现场录音。王力讲“要开门办广播，要和造反派结合，要派红卫兵监督”，广播“要使造反派听了扬眉吐气，保守派听了心惊胆战”！但是，红卫兵是有不同观点、分派的，报道了某一派，另一派就来冲电台，要求播出他们的声音，动不动就扬言，“如不改变就砸电台”，“就接管电台”！后改为《青年节目》。

《忆苦思甜节目》 这是当时的热门节目之一。通过新旧对比进行阶级教育，启发阶级觉悟。这不是专门的、固定的节目，分别设在其他节目之中，那个节目有需要有对象就讲，多是播出录音讲话，特别适应了“文革”初期发动群众，起过很大的鼓动作用。办节目的基本原则是：选择有阶级苦或民族恨的苦大仇深的人；事实要准确，要有苦有甜，对比鲜明；回忆人要有一定的阶级觉悟，有比较好的表现，经过严格审查；要会讲，善于表达，有健康的感情，不主张哭哭啼啼。事实上不少人掺杂了许多虚假成分，也有的是编造的。

播出毛主席语录歌 这是“文革”后兴起的，从最初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开始，后来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滥，什么样的语录都谱成歌曲。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刚发表，第二天就有“最新指示”语录歌，有些文艺创作人员和演出团体，专门做这件事，中央电台也随时组织录制播出。由此逐步演变成对其他内容

的文章也谱写歌曲。当时流行最短的歌是“要斗私批修”和“要文斗，不要武斗”，最长的是《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谱成的歌曲。

另外，“文革”期间还设立过《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批判孔林》等专题节目等，都是时代的产物。

#### 四 我办《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节目

《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节目是典型的“文革”初期的产物。这是“文革”开始不久，中央电台开办的“国际性”节目，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世界革命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节目由国际部承担，我是其中的编辑之一。节目每天一次，重播一次，每次 15 分钟，按照当时的播音速度 3000 多字。节目的来源，一是新华社记者国外报道和反应（中国其他媒体都没有驻外记者）；二是采访来宾和外国人；三是各渠道能够搜集到的材料，甚至选用《参考消息》上的有关文章。总之，凡是赞扬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凡是赞扬毛主席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凡是赞扬中国成就的，都搜集、集中在一起，编辑播出，调子越高越好。为此，凡外国来访者，我们总要请他们谈访问的感想，意在赞扬，甚至有意在引导，外宾也深谙其意，故意投其所好。我们也常常以他们的表态划线，确定接待是否成功，确定对中国友好还是不友好，确定政治上的左、中、右，而又以不同态度对待之。因此，也就屡屡出现怪现象。

如，外国商人到广州交易会，或到中国各地访问，就先买毛主席语录，拿在手里；买毛主席像章，挂在胸前；专门说对中国、对毛主席赞扬的话，博得我们的好感，为他们的商业活动提供便利条件，达到多赚钱的目的。一次，周恩来总理在谈到广交会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情况时说，日本人一到广交会就买了毛主席语录，手拿语录表示进步，

实际是为了赚钱。

1970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外国来访者，有的是外国政府的部长为了讨好中国，获得援助，会谈中时常引用毛主席语录。他说：1970年，锡兰代表团来访时念毛主席语录说：“你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说完了就开单子、提援助。我们没话说，只好答应。

我这里引用一篇长诗，是当年在《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节目中播出过的。1967年10月1日，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代表团团长莱索尔·培多诗兴大发，写了一首赞颂“文化大革命”的长诗：《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山鹰译），诗的全文是：

红色的巨流在汹涌奔腾，千万面红旗在屋顶、人们的手中和一切地方舞动。今天，全中国到处披上了鲜艳的红装，举国上下发出惊天动地的呼声：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革命舵手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广场上一百万人欢声雷动。全世界发出同一个声音啊，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宏伟的广场变成一片花海，红花染遍了中国的山河、平原和村城。红色的海洋呈现在眼前，响起波涛滚滚的歌声：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今天，广场上、道路上、中国广阔的的大地上，只响彻着一支歌——革命之歌激荡着工人、农民、红卫兵和战士的心胸。人们仰望着天安门城楼，颗颗红心向北京。人们向我们投来热情的目光，我向他们致敬！我望着那列队整齐的战士，他们等待着指挥员发出前进的号令。伟大舵手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人民群众挥手致意，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用各种语言表达出美好的革命感情：毛主席万岁！万岁，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

我，一名阿尔巴尼亚战士，站在观礼台，心儿在毛主席身边跳动，红色的巨流奔腾，人们的欢呼声如同风暴雷鸣！过去，今天，有红旗为人民领路，一位战士高举红旗，千万人把红旗欢呼歌颂。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震撼大地，敌人被吓得落魄丧魄，那红色巨流啊，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进！毛主席在城楼上掌舵，中国巨人的步伐向前飞奔。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像风驰电掣猛进，像势不可当的火车头把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彻底粉碎，消灭干净！五大洲的朋友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欢呼：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北京的夜晚显得更加壮观、美丽，革命的凯歌震撼着大地和天空。彩色斑斓的烟花像万朵鲜花在天空盛开，探照灯照亮了整个北京城。这里的夜晚和白天一样，到处灯火光明。我望着大地上数不尽的红旗，国际友人望着那天空的红旗舞东风。友人们有的是来自越南南方的游击队队员，有的是拉丁美洲的英雄，那非洲和日本的革命者，南亚的革命战士，他们和中国人民一起欢聚在十月的北京城，人们一起欢呼，共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果赞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来掌舵，革命的航船乘风破浪向前进。人们尽情地欢呼，我也用最响亮的声音表达出阿尔巴尼亚的革命深情。我们千百万次地高呼：万岁，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封闭和“极左”时期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在后来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也受过骗，犯过这种国际交往的幼稚病。似乎外国商人到中国来投资，没有自己的私利，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是无私地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们这样对待过，这样宣传报道过。商人就是商人，他们就是赚钱。外国商人很懂得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懂得如何唱高调讨好中国，把我们的精神需求变成他们的商业利益。上

当受骗后我们才变得聪明起来，才实际一些，对投资者以商对商，实现互利共赢。这是后话。

## 五 中央电台的文艺广播

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文艺。文艺广播在中央电台的广播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占整个播出时间的 60% 左右。中央电台播出的文艺节目起着教育、提倡和推广的作用，它不是中国古代和现代文艺、中国与外国文艺、社会上演出和流行文艺的录音版，而是按照“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严格选取的。中央电台文艺门类繁多，小说、歌曲、戏剧、曲艺、电影、古典的和现代音乐、中国文艺和外国文艺等，一些最优秀的作品都集中在这里。在当时电视很不普及的情况下，广播成为最主要的文艺宣传、推广和普及阵地，是最受广大听众欢迎的节目，他们称收音机和大喇叭为“戏匣子”。为满足中央电台文艺播出和听众的需要，中央电台有一个庞大的文艺部，集中了许多门类的专门人才；解放初成立了“中央广播合唱团”、“中央广播乐团”等，专门为电台提供和录制节目；为适应中央电台少年儿童广播的需要，专门成立了为少年儿童演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合唱团”。这些团体不仅为中央电台创作、录制了大量的文艺节目，而且培养了许多有名的歌唱家、艺术家。

文艺的发展道路非常坎坷，历遭劫难。文艺创作和宣传问题十分敏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拿文艺开刀，从文艺路线斗争选择突破的，批判《海瑞罢官》拉开了“文革”的序幕，文艺成为“文革”中的重灾区。中央电台文艺广播是文艺集中的阵地，自然在劫难逃，而文艺广播的状况也就成了反映当时中国文艺形势的标志。

“文革”一开始，狂风骤雨般地横扫“四旧”，批判、清除“一切封、资、修的文艺”，“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歌曲、音乐、戏剧、曲艺、文学、诗歌等所有传统文艺作品统统列入“封、资、修大杂烩”的范畴，列入被批判、被打倒、被停播之列。仅剩下的是革命历史歌曲（主要是抗日战争中的歌曲），歌颂毛主席、歌颂党、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颂文艺”，配合政治斗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文艺”，陆续形成出台的样板戏和盛行的毛主席语录歌，文艺直接表现为政治，完全服从和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斗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被“万马齐喑，百花凋敝”所取代，某个政治权利人物可以凭借政治斗争的需要和个人好恶任意砍杀，文艺成为政治权利和政治斗争的风向标。

广播不是真空。填补这一文艺真空的是“配合文艺”，密切配合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重要会议召开，某一社论的发表，作为政治任务，一些文艺创作和演出人员通宵创作、录音，安排播出。语录歌、忠字歌、忠字舞等盛行，以“反映造反派、突出工农兵”的名义，把工农兵文艺歪曲、贬低为简单的、粗俗的、充斥漫骂和杀气的文艺，一个阶段“他们想怎么演，就怎么播”！把社会上的演出搬上了中央电台，文艺节目中充斥着“杀呀，拼呀”，“来吧，来一次全国性的大厮杀，大搏斗，大夺权”！“红色恐怖万岁”！“夺权！夺权！！夺权！！！大权小权统统夺它个一干二净”！舞蹈中也经常是“夺他妈的权，滚他妈的蛋”！“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叫他妈的永世不得翻身”！似乎这才叫工农兵，这才是工农兵文艺，这才叫工农兵的气魄。

如另文“庆祝九大”中提到的，1969年4月“九大”闭幕后，要求大宣传大歌颂，因北京（中央）电视台组织播出的庆“九大”文艺节目惹下了滔天大祸。本来许多不正常的文艺现象是中央“文革”小组纵容、支持的，可这时他们又换了一张面孔，突然变调，看了演出

后大加讨伐。江青等人连珠炮式的重型轰炸，殃及其他，使本来就敏感、脆弱的文艺战线更加招架不住了。文艺单位纷纷给中央电台打来电话，要求撤出正在录制或准备录制的歌曲、节目，今后也不再给中央电台录制节目了；声明某些节目不能再播出，否则概不负责；有的要回已经录好的节目胶带立即销毁。电台、电视台更是惊恐不定，对所有准备播出的节目重新审听、重新讨论、重新认识，把凡是没有绝对把握的统统封存，将被怀疑为“小调的、不健康的、疯狂的、黄色的”统统销毁，“宁可没有，也要好的”，成为取舍的依据。过了不久，江青等人又借影片《南京长江大桥》中“有《列宁山》上的一句曲调”发难。此后，文艺广播处于最紧张、最困难的时期。所有歌曲和文艺节目都由中央“文革”确定，中央“文革”推荐，有的是通过主管文艺的“文化组”来转达。此外无人敢定，无人敢播，无人敢提，一派肃杀。以“文艺花品种齐全”引以为骄傲的偌大中央电台、偌大中国，只能反复播出经中央“文革”小组审定、陆续出台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等8个样板戏和5首革命历史歌曲，还有江青树立的样板——小靳庄的赛诗会和允许试播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江青说：“有五首歌曲就够了！”文艺工作者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普遍存在着“无所作为论”、“文艺工作危险论”，抱着“斗批走”、“斗批散”的思想。

如何播出样板戏，步步都有斗争和风险。江青等以样板戏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时常以“篡改、破坏样板戏”为名，大加“挞伐”，大开“杀戒”。她明令不许其他剧种移植，不准地方戏移植，不准任何改动，不准走样，每一个样板戏的录制、播出必须经过请示批准，每一种播出方式必须经过审查同意，否则就是歪曲、破坏，就要追查幕前幕后的“坏人”。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指示：“样板戏要提高，要普及。不要工农兵的戏，工农兵看不到，都是城市老爷看。凡是发表了的剧本，都

可以演出。工厂、农村、学校都可以组织业余演出队演，光靠几个样板团不行。开始可能演得不好，但可以一点一点地提高。戏都是好戏，总比演帝王将相好。”（据中央电台驻湖北记者站汇报）但毛主席的指示没有正式传达，局面并没有打开，地方不敢演，中央电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于样板戏的播出，周恩来总理赞赏广播、电视播出转播实况或录播实况。1969年6月27日，周总理说：“实况录音好，有气氛。”而张春桥、姚文元则对中央电台转播样板戏的解说稿大为不满。1969年4月30日，张春桥在审阅中央电台“五一”转播稿时说：“你们转播样板戏也那么多解说词，我都讨厌了。样板戏本身已经表达得非常完整了，你们加那么多解说词，都使我感到这是干扰。糖本来是甜的，你还说是甜的。”“糖本来是甜的，你还说是甜的”，这句话成了扼杀广播解说词的撒手锏，被他们多次引用，姚文元跟着强调：“人家都吃到嘴里去了，你们还在那里说是甜的。”他们根本不懂广播不同于现场演出，也不同于电视的转播，听众只能靠听觉而看不到现场实况，故事概况、背景、情节、人物、串联和现场情况，是需要通过介绍传达给听众，帮助听众欣赏和理解，这正是广播的特殊性所在。按照他们的那一套去做，听众反映听不懂，结果行不通。

在这种困境下，1969年4月28日，周总理在审定“五一”播出的歌曲时，批准8首歌曲可以广播：《东方红》、《国际歌》、《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社会主义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歌》。1971年7月1日，周总理在审定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怀念中国》的歌曲时指出：现在光提革命歌曲，不敢提革命抒情歌曲。革命激情与革命抒情是对立的统一。不敢提革命抒情是一种偏向。

到了1972年7月23日，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免去中央过重的负担”，“歌曲不要都经过中央审定，推荐不要都经过中央批准”，但“要

保留推荐权、批评权和修改权”，依然掌控着对文艺的生杀大权，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1975年10月下旬，举办了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中央电台播出了实况录音，电视台转播了实况，这是“文革”以来第一次播出音乐会实况。

## 六 中央电台的抢先夺权

1966年12月3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造反派，借口广播局总编辑杨祚铭对某一报道的处理不当，冲进局总编室，宣布接管了广播局的宣传权，改由广播局宣传小组领导，宣布了对广播局夺权成功。自“文革”开始后不久，广播局上下的党政领导有的被打倒，大部分靠边站，除广播宣传以外的领导权都早已被造反派接管；广播局各级机构被砸烂，由群众组织成立的各种“小组”取代。但唯独广播、电视的宣传权不能夺，因为广播、电视的宣传权属于中央，广播局是代中央掌权，造反派过去没有敢于贸然夺取，现在打破了这一禁忌。夺权后立即形成了两派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夺得好，造反有理，早就该夺了”；一种认为“宣传权属于中央，是夺中央的权，大方向错误”。争论日趋激烈，广播局造反派内部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在这时，中央“文革”小组派驻广播局的联络员传达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说“中央电台（注：这里用的是‘中央电台’）的造反派夺了权，很好。”“听说内部在吵，要劝他们团结。”而造反派听到毛主席的肯定，大长了他们的志气；而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毛主席的批评而走向了反面。

广播局造反派夺权，全国第一家，比上海《文汇报》夺权还早，只是没有公开报道。广播局造反派夺权受到鼓舞，一发而不可收拾，竟超出自己的范围，1月14日派人夺了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大权，接

管了北京市电台的宣传，派人担任了总编辑，并在电台公开播出了夺权声明，由此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并遭到北京市台（连同北京广播学院）造反派的强烈反对，引发了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激烈冲突。有些人认为，进驻市台夺权是越俎代庖，利用手中掌握的广播权播出自己的夺权声明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如各新闻单位都这样做就乱了套。

市台夺权以及引发的冲突，立即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那里。自“文革”开始到武汉事件以前，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管宣传。对于市台是否应该播出这一夺权声明，他说：“播就播了，没什么了不起。”不仅如此，王力还嫌不乱，竭力主张电台自己可以写评论。1967年4月30日，中央电台写的评论祝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经王力批准播出。

正当广播局内外为夺权闹得沸沸扬扬的关头，1月14日晚江青、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所有成员来到了广播局。江青做了长篇讲话，明确提出“要打倒丁莱夫（广播局党委书记）”！说：“丁莱夫是敌人！不是我们的人！”号召造反派团结起来批斗丁莱夫，“不要让他睡大觉”！进一步挑起了各派之间的纷争。

中央电台夺权后，造反派还擅自向中央电台驻各地记者站发出通知，要他们支持当地电台的造反派夺权，各地电台向中央告状“中央电台记者在捣乱”。

在中央电台，造反派提出不仅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还要“彻底砸烂电台旧的节目时间表”，把新闻部的早、中、晚三班改名为《东方红》早班、二班和三班，各负责新闻的一个播出时段，来什么就播什么，随来随播。有的提议把中央电台改名为“毛泽东思想广播电台”，或者改为“东方红广播电台”。王力、唐平铸、胡痴来广播局听取汇报，积

极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胡痴说：“破要破得彻底，立要立得彻底。”他要中央电台向北京市台学习，想播什么就播什么，想在什么时间播就在什么时间播，这符合革命时代的要求。（但因为违背广播规律而没有成为事实）

夺权后，中央电台成立宣传小组领导和管理全台宣传业务。那时“小组”流行，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到各种小组，其实“小组”的权力不小。中央电台从部门选派代表进驻宣传小组，轮流值班，后成立了负责宣传的常务班子。宣传小组的任务是传达宣传精神，了解和安排播出，每天的大量时间都花在审稿、审听节目和处理各种复杂的业务关系上。当时规定，用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稿子，宣传小组不审，由各部门自己定，重要文章反复播出；凡是中央电台各编辑部自己采访的稿子或来稿，都要送宣传小组审定后，才能播出，各部门无权定稿。许多稿子堆在那里，宣传小组成天主要是看稿子。事实上各个编辑部门的领导也不敢和不愿意自己签署稿件，害怕犯错误，害怕一不留神触犯各种禁忌。有一位地主出身的老编辑部主任披露心声说：“稿中有两处写‘斩尽杀绝地主豺狼’，我不敢改，怕涉及立场问题。”

事实上，宣传小组无法掌握全台的宣传情况，全台都忙于运动，非常混乱，旧的秩序完全被打乱，新的秩序无法建立，群众组织说了算，各行其是，否则就是复辟；各部门都派记者出去采访同一件事，相互碰撞、“打架”。但宣传小组又承担着全台宣传和安全播音的责任，局势和宣传口径瞬息千变万化，他们每天“坐在活火山上”，“如履薄冰”，随时会被扣上各种帽子而受到批判和打击。

不久，夺权成为全国性的风潮，什么权都夺，哪里的权都夺，夺权就是革命，就是胜利。周恩来总理指示，财政大权是属于中央的，不能夺，还是被夺了，中央电台还派出记者采访、广播。1967年7月20日以后，出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把矛头指向了军队，搞

乱军队夺军权。7月31日，中央电台播出了《人民日报》《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连续播出了3天，20次。一时间军内和社会上的造反派一起把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毛主席痛斥是“自毁长城”！广播电视和新闻媒体宣传混乱到了失去控制的地步。

## 七 军事管制下的广播电台

不管运动如何乱，造反派如何折腾，中央的广播宣传不能乱来，不管是谁掌权，都不允许出现混乱。“文革”中，中央电台的广播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那时报纸不能按时出版发行，有些地方半个月都看不到，而且订阅数量有限；电视刚刚诞生不久，全国才有2万多12寸的黑白电视机，而且主要分布在全国九个大城市。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特别是“最新指示”，中央的战略部署，每次都由中央电台首次播出，直接送到全国各地和千家万户，然后是全国群众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然后是学习贯彻不过夜。在造反派夺权、面临广播宣传混乱和失控的状态下，中央决定对广播事业局实行军事管制。1967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制定了《关于对中央广播事业局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以下称《军管决定》）。12月26日，军管小组带着《军管决定》进驻广播局（到1974年解除军管），这一决定长时间指导着广播、电视的宣传。

不久，1968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发出通知，对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全部被军事接管。通知说：广播电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地方电台应由当地军队实行军管，停止编辑和播出本地节目，只许转播中央台的节目。随即在不长的时间内，各地广播电台全部被军事接管。<sup>①</sup>

---

<sup>①</sup> 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第301—304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

“军管”是解放以来很少听到的一个词。军管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特殊政治时期的特殊措施，由中央决定实施的最高最严厉的管理和控制措施，对广播局的运动和宣传实行统一领导。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军管决定》中，对广播、电视的性质、原则和宣传纪律，都做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和要求。

对广播局《军管决定》共有七条。第一条指出：“广播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必须坚决掌握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手里。”需要说明，对“广播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这一命题当时确信无疑，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广播只是一个为政治服务的宣传舆论工具，而不能行使也不具有专政的职能，不能成为实行强制措施的专政工具。但在当时，在中共中央文件中多次反复强调，中央“文革”小组1969年1月19日“关于地方电台应严格宣传内容的通知”中，第一句话就是“电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不仅把广播、电视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而且报纸、新华通讯社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统称为新闻媒体最主要的属性。

当时被实行军事管制的还有新华社。196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中说：“新华社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宣传通讯机关，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极其重要的武器。”“阶级斗争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不仅成为当时宣传舆论界叫得最响的政治口号，而且真正作为“专政工具”使用，严重地误导了舆论宣传的方向，形成了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盛气凌人、任意批判人和给人定性等很坏的作风，使许多人深受其害，并给新闻舆论界造成长期难以消除的思想混乱。

对广播局《军管决定》指出：“广播事业局在宣传工作上，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坚

决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办好广播，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必须保证毛主席的声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准确、及时地传播到全中国和全世界去。确保安全播音，消灭播音事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在保证准确的前提下，及时地宣传报道，确保安全播音，是人民广播的光荣传统，是我们应当遵守的“金科玉律”，不是“文革”中的发明创造，而恰恰是在“文革”中无准确、及时可言。

1970年11月14日和19日，军管小组经过调查研究和准备后，分别两次向中央汇报了“广播宣传的总方针”和“中央三台”宣传的原则，这是落实中央“军管七条”的具体化，是了解那一时期中央电台的宣传（包括整个新闻宣传）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文件。

其中“关于中央台广播宣传的八项原则”是：

1. 在政治思想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全面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宣传路线的自觉性。
2. 在节目内容上，要坚定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全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国内外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事迹、先进经验和国内外大事。广播的一切内容，都要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彻底肃清所谓“知识性”、“趣味性”、“欣赏性”、“娱乐性”的修正主义余毒。
3. 在节目时间的安排上，要首先确保毛主席的声音，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战斗号令，准确、及时地播出。在必要时，应打破原来节目时间表的限制，进行集中、反复宣传。对中央限定播出的文件，可中断原来节目，随时插播、直播。为工农兵广播的专题节目，分别安排在他们适合收听的时间。
4. 稿件来源上，坚决执行中央宣传机关统一分工的原则，坚决

反对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的错误倾向。必须首先充分播好经中央审定的中央报刊和新华社的重要稿件，同时考虑到广播特点和工农兵等对象、专题节目的特殊要求，电台自己组织、采写部分稿件和录音报道，与中央其他宣传单位共同完成中央交给的宣传任务。

5. 在宣传口径上，要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严格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不乱提口号。根据广播国内外都可以收听的特点，时刻提高革命警惕，加强阶级斗争观念，防止电台广播的材料被帝、修、反利用。中央报刊发表的材料亦应视保密要求，考虑适当删节和是否广播。没有把握的问题，一定要请示。

6. 在节目形式上，充分发挥广播利用声音进行宣传的特点，注意组织工农兵等先进人物讲话和制作录音报道。文字和文艺节目恰当地穿插安排，重要文章可配合适当的革命歌曲。努力做到“又要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

7. 文艺宣传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使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的教导，突出宣传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革命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广播国内外的文艺节目，都要以好为标准，不因任何原因，从电台中广播出封、资、修的靡靡之音。

8. 其他节目的方针和指导思想。（分别规定了《解放军生活节目》、《少儿广播》、《对台湾广播》等节目的方针后）对外国寄送来的节目，拟按下述原则广播：一、以内容好为标准，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二、兄弟党和国家的节目，一般只在两国重大节日或两有关的重大政治活动时，作为专题节目广播，平日一般节目不拟采用。革命歌曲音乐节目，中央台除按照上述精神广播外，北京（国际）电台对象语言节目也可适当选播一些；三、友好国家的文艺节目，只有在其国家领导人访问我国时，根据外交需要，并经中央审查同意后，少量广播。

这一“原则”也包括了对“文革”前中央电台宣传原则的总结和

归纳，但它带上了鲜明的“文革”色彩。按照这一要求，中央电台各个节目制订了贯彻落实计划，只有文艺节目因为品种和数量太少、又难以把握而未能制订出来。

与此同时，军管小组还规定和汇报了北京（国际）电台、北京（中央）电视台宣传的原则。其中规定电视“画面必须完整地表现出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大、光辉、慈祥的伟大形象和神采奕奕、容光焕发、身体非常健康、精力非常充沛的伟大形象。画面要清晰、明朗、整洁”。宣传要突出工农兵的形象，“让工农兵的形象占领电视阵地”。“拍摄新闻片、转播，要从路线斗争出发，选择最有代表性的画面，代表前进方向的素材，代表时代的内容”等。

## 八 阴差阳错我走上管理宣传岗位

1967年12月26日中央派来的军管小组带着《军管七条》进驻广播局实行军管。文化大革命时广播局有三个群众组织，其中两个——“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和“斗私批修联席会议”为“革命组织”。我所在的“斗私批修联席会议”，是其中的一个，但力量很小，我是这个组织中央电台的头头。军管小组进局一年后，赶在1968年1月14日江青来广播局讲话一周年的这一天，促成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组成了各级领导班子“勤务组”，中央电台勤务组实际上是由中央电台群众组织临时组成的领导班子。因为我是一方代表，成了中央电台勤务组的勤务员，而且是副组长，也就是第二把手（另一方出第一把手）。那种大联合本来就是捆绑夫妻貌合神离的。“战斗团”自恃人多势大，又以“最最革命”自居，自然想独掌大权，从联合的那一天起就在谋划如何排挤和打击“联席会议”的成员，并得到受命于江青的军管小组主要领导人的支持。联合不到三个月，“战斗团”便发

难，中央电台勤务组中的“战斗团”一派独掌大权，把我排挤出勤务组，从此无事可干。

广播局是要害单位，任何时候不能乱。中央电台的中心任务一直是宣传，这是毫无疑问的，“文革”中打派仗那么乱，“踢开党委闹革命”，但谁都不敢在宣传中玩忽职守，否则便失去了立足之本。1966年12月31日，广播局造反派夺取宣传大权，一夜之间从广播局到中央电台都成立了宣传小组管理和领导宣传工作。1967年12月实行了军事管制，对革命和宣传实行统一领导。1968年12月26日，广播局又进驻了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解放军宣传队（简称“军宣队”）330多人（其中工宣队200人，军宣队130人），中央电台进驻30多人，来帮助“军管”搞“文化大革命”和宣传工作。与其他部门和单位相比较，广播局是全国少有的既有军管又有工宣队、军宣队的单位，是“文革”中派驻最全、人数最多的单位。这些工宣队、军宣队的队员有一种很朴实的感情，很注重家庭出身和本人的政治情况。他们对我“靠边站”大惑不解，（我出身贫农，是共产党员、红卫兵）便提出恢复我的工作。但是，“战斗团”真正抓的是运动的领导权、大批判的领导权、专案组的人事调查权，这是“打倒走资派”和整人的实权、大权。有关运动的实权部门早已被占满，而宣传重要但风险太大，很容易出事，在那种年代一出事如何了得！各派组织的头头都不愿意真的抓宣传，做那种风险大、费力不讨好的事。工宣队、军宣队提出让我以中央电台“勤务组”的名义到宣传小组担任组长，主管全台的宣传工作，“战斗团”乐于顺水推舟，并等待着“看热闹”。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走马上任。当时管广播宣传简直是在玩火，拿政治生命做赌注。我清楚，管理中央电台全台的宣传谈何容易，我胆战心惊，随时都有可能被拉下马来。我是学广播宣传的，深谙其中的深浅、轻重，尤其在“文革”的风口浪尖上，弄不好一篇文章、一

个提法，甚至一字之差，顷刻之间便会被打倒，“朝为革命派，暮成阶下囚”，这种先例多得是。何况我充其量只在中央电台工作过4年，真正搞采访、编辑工作只有两年多的时间，国际宣传还没入门，怎能去面对全台的新闻节目、专题对象节目、文艺节目、少年儿童节目呢？尤其对文艺广播一窍不通，做梦也不敢想！广播影响之大，左右着社会舆论，接受8亿人民的监督；宣传的政治口径要求极严，政治风云瞬息万变，翻来覆去，一会儿抓出一个“走资派”，一会儿抓出一个什么“集团”，宣传口径随之变化，谁能把握得住？哪能没有丁点儿差错？各部门的领导都不敢独自负责，不敢签发稿件，大量稿件向台宣传小组送交，由宣传小组签发。我深知肩上的分量，何况我又是一根只有28岁、工作4年的“嫩竹扁担”！中央电台是个老台，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我如何“领导”！本来我就是有些人反对的目标，万一再出什么事……简直不敢想下去，但这又是军管小组、工军宣队的决定，是政治上的信任（那时十分看重政治信任），推脱不得，违抗不得！只好硬着头皮，横下一条心：干！

我是在1968年12月底到中央电台宣传小组上任的，我既然负责宣传，只能依靠老广播，大家齐心协力、兢兢业业，不敢有半点差池。幸好在宣传小组里有一些懂宣传的老广播，他们是被打倒后又被解放出来工作，临时安排在这里搞业务，如原局总编室主任、后来是中央电台台长的杨祚铭，中央电台新闻部业务秘书何光和一些老编辑等，向他们多学习、多请教。我很清醒，虽然宣传权在握，必须踏实、谨慎从事，在实践中一点一滴地积累经验。有些节目一定要我去“审定”，面对众多的节目，面对多方面的专家，我心中无数，实在难以下笔，难以开口。开始我只注意把“政治关”、“口径关”，这对文字节目好说，对文艺节目不灵。也有人故意给出难题。有一次，听完一首交响乐后，文艺广播的老编辑提出很多专业方面的问题，如某个小号弱了，中间

某个地方少四分之一拍，让我来决定能不能播出。天啊！不要说少四分之一拍，就是少个两拍、三拍我也听不出来，可我手中握有播与不播的决定权！这只能是学、请教，尊重他们的意见。我说：“我是把政治、口径关的，艺术上你们是行家，由你们定。”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宣传任务逼着我去接触新的东西，去学习我不懂的东西，亲身参加种种实践，心中的底数多起来。后来我想起这段经历总是后怕，要不是硬“逼”着我去学去做，也许我一生也不会去接触、去学习那么多东西。

冒着风险，经过艰苦努力，我在中央电台的广播宣传上迈出了极为艰难而又重要的一步。我走上了一条与其他新闻工作者不同的业务之路：不是由下向上，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而是一下子被历史推到主管全台宣传的位置上；不是先从业务的某一方面做起，而是一下子面对全台多种类型的节目；不是只管宣传的某一部分，而是必须熟悉从采访、编辑到节目播出的全过程；不只是安排好日常宣传，而是必须能应付紧急的、重大的宣传任务。因此，这也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我对广播业务了解的面比较广，而对某一方面业务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着重宣传的策划而缺乏具体新闻业务的实践经验，甚至没有认真地单独进行过像样的采访。每想及此，作为一名新闻广播工作者，总有许多遗憾。

## 九 毛主席就对外宣传做出批示

对外宣传是国内政治和政策的对外反映。在“文革”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局势中，对外宣传更是一片混乱的局面，它严重地干扰、破坏了我国的外交政策，败坏了国家的形象。毛泽东主席不得不直接过问对外宣传工作，扭转混乱的外宣局面（同时也是在扭转对内宣传）。在1968年前后短短的时间内，毛泽东针对极“左”思潮和实际问题，

专门就我国的对外宣传做了 30 多次重要指示（大部分收在《毛泽东文集》中），当时我们曾经反复学习，今天简单回顾，更感到内容的丰富、影响的深远，它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对外宣传的思想和理论。

“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中国与外国不一样，外国与外国也不一样。不能把对我国国内的宣传直接搬到对外。1968 年 3 月 7 日，毛泽东在一份拟在援外飞机上喷涂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1968 年 6 月 12 日，又对一份接待外宾计划中“自发地分别地赠送毛主席像章”批示：“不要。”周总理在 1967 年 6 月在谈到对外宣传工作时说：“把国内的硬搬来对国外，不用脑筋，不管对象。要研究一下，对外又不要丧失原则，又要有效果，有不同的特点。”

要尊重各国自己的选择。“文革”中到处强调毛泽东思想对各国革命的普遍性，放之四海而皆准。甚至把有的国家革命的胜利归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一再反对这种自吹自擂、强加于人的做法，强调马列主义与本国实践的相结合。对外国党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应干涉”。

“不要强加于人” “强加于人”是“文革”对外宣传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批示也最多。开始，在 1968 年 3 月 10 日，毛泽东对关于开好 1968 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中的“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作首要任务”，毛泽东在这之后增加了“但应该注意，不要强加于人”。

毛主席反复强调不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普遍真理强加于人，甚至把外国共产党取得的成绩和进步，也归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68 年 3 月 12 日，我援外工程移交问题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建修建

某某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主席对此报告的批示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文革”中，这种种强加于人的做法比比皆是。毛主席反复强调不要把对国内的提法和做法强加于国外。“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要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1968年5月29日，毛主席针对关于对外加强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持外国革命群众斗争的做法指出：“不要强加于人。”

周总理1967年2月26日在谈到《中国建设》的编辑方针时，委婉地对对外宣传提出了批评。他说：“我们文化大革命的这些东西，对阿尔巴尼亚宣传还差不多。对其他国家人家不敢买，等于号召他们的人民起来把他推翻，……你们的杂志调子高了，拿出去没人买了。《中国建设》就是做资产阶级工作，要区别对待。”

**不要自吹自擂** 实事求是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宣传，要全面不要片面，要真实不要夸大和渲染。讲主流也要讲支流，讲正面也要讲问题和困难，讲成绩也要讲不足。“文革”中“以我为核心”的“自吹自擂”登峰造极。当时最盛行的说法多得不可胜数，取其尖端者罗列如下：

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世界革命的中心在东移，由德国到莫斯科，现在已由莫斯科转移到北京。毛主席对此多次提出批评。1969年5月16日，毛主席批评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他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当时许多人并没有（或者不敢）理解毛主席这一批评的实质，仍从“宁左勿右”的角度理解为这只是出于策略考虑，“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而由外国人说是可以的”，所以长时间没有得到彻底纠正。

二是把毛主席说成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1968年4月6日，毛主席将一份文件中的“主要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21个字删掉，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三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毛主席删掉了多处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列的“毛泽东思想”，并反复重申“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而且，在“只要求”三个字下加了着重点。对外国党“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世界是多样的、复杂的，我们承认各国实际，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毛主席早在1962年9月18日赠送给日本工人朋友的题词中就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且反复用中国革命成功的事例加以证明，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四是毛主席反对空话、套话。1970年10月毛主席在修改一份对外复信稿时，将“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删除。

五是在毛主席前面冠以“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凡是讲话、文章等到处充满了这种提法。毛主席多次指出“四个伟大”讨厌，一个都不要。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都是传达贯彻不过夜，坚决落实，但对此却一直没有真正地得到落实。在新闻界有人说这是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毛主席那样说是对的，我们还是那

么写、那么说也是对的。这种不按照唯物主义办事和心存杂念造成了屡禁不止，遗风不断。毛主席生气地说，“说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一句也不顶”。1967年毛主席在审阅氢弹发射成功的公报时，他只好直接动手。他说：“我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勾掉了，把光焰无际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边际。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百分，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就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1968年9月，毛主席对一篇报纸社论的初稿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坚持实事求是** “文革”中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在报道建设成就时总用“伟大”、“辉煌”和“空前”，甚至动不动就把某一项具体成绩夸大为赶上或超过了世界水平，是世界最好的。我们在宣传中也习惯于不切实际、充斥主观的“大力歌颂”、“大造声势”、“大力配合”、“大力渲染”和“唱响”一类的说法，似乎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宣传模式，这些在对外宣传中尤其不适用。

1969年6月，毛主席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中的一段话做了这样的修改。原文是“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毛主席在“繁荣昌盛”前面加了“有了初步”，将“强国”改为“国家”。毛主席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1969年9月，毛主席将对外一份支持电中这样的句子做了修改。支持电讲到20年和“文革”三年来，“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主席改为“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大跃进”的1958年，毛主席就强调“实事求是，不要浮夸，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鼓虚劲”，不要求虚名而得实祸。

毛主席这样说了，而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做到。某些领导人的好大喜功、报道者的投其所好和政治运动的心有余悸以及新闻报道“报喜不报忧”等不正之风，造成了1958年“大跃进”中的新闻吹擂恶习，这个教训我们是永远忘不了的，但真正的改正也并非易事，过去有，现在还有，长期以来时常以各种面目不同程度地出现，至今并未绝迹。敢于面对实际，实事求是是一种充满自信、有力量的表现。那种每遇重大宣传就要“大力宣传”、“大力歌颂”和“大造声势”的宣传模式是值得质疑的。周总理在1958年11月对新闻单位负责人的谈话中，要他们接受“大跃进”宣传中的教训，联系这次错误，深入检查，反对浮夸，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做到热中有冷，把宣传工作做得更好。

宣传报道不是靠自吹自擂、强加于人，不是靠严厉的言辞和气势汹汹，它的力量是实事求是。1967年6月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的批示》中强调：“我们要谦逊，特别是对外。出去谦逊一点，当然又不要失掉原则。”“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中国建设》杂志是由宋庆龄办起来的，由外文局承办。1958年，毛主席谈到《中国建设》时说：“中国杂志用事实说话，对外宣传就是应该这样做。”陈毅在1962年为《中国建设》杂志创刊10周年题词说：“事实胜于雄辩，唯有真理可以服人。《中国建设》向世界各国朋友介绍真实情况，这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 十 恢复中央电台少数民族语言广播

“文革”中，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中央电台恢复了少数民族语言广播。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据2006年2月“非物

质文化展”统计；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有 53 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到 2003 年全国每天以 21 种语言广播）。几千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0 年 5 月，中央电台就陆续开办了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具体时间是：1950 年 5 月 22 日，开办藏语广播；1950 年 8 月 16 日，开办蒙古语广播；1956 年 7 月 2 日，开办朝鲜语广播；1956 年 12 月 18 日，开办维吾尔语广播；1957 年 11 月 11 日，开办壮语广播。1960 年 12 月，在国内经济困难、机构精简时期，中央电台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被停办。

中央电台少数民族语言是中央电台广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电台少数民族语言的举办不仅体现了国家各民族的统一性，而且有利于准确、及时地传达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声音，直接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报道国内外重大消息。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广播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传播媒介，及时把各种信息送进千家万户，因而更受到他们的欢迎。

周总理对民族广播非常重视，1962 年年底，在一次民族工作会议上，乌兰夫向周总理反映中央电台撤销了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周总理严厉地批评说：“民族广播为什么停了？……我们的国家这么大，地区这么辽阔，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央台没有民族广播怎么行？不能只考虑精简几个人，要考虑党和国家的需要。”周总理指示要恢复民族语言广播，以后他一再过问，1968 年催着要赶紧办。

1968 年七八月份，开始了恢复民族广播的筹备工作。9 月周总理在审阅广播局“关于恢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的请示报告”时，就筹建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做了指示。1969 年 10 月 15 日，中央广播局军管小组副组长戴征远、军代表荣昌永（他们负责宣传工作）告诉中央电台，给中央写的“关于恢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的请示报告”已经批下来了，开办蒙古语、朝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

和傣语 6 种语言；需要编辑、记者、翻译和技术人员共 70 多人。中央电台军代表和群众组织的“勤务组”、宣传小组立即研究落实。那时我是中央电台勤务组副组长兼宣传小组组长，分工负责恢复民族广播的筹备工作。1970 年 3 月组成筹建班子，具体研究各语言广播的宣传方针，研究调干的条件、人数、地区、地点；把原来的筹备人员脱产出来组成筹备班子，在局、台的领导下由黄凤锡负责，毕东芝、张小平、盛鸿鹏等参加了早期的筹办，若人手不够，可从“五、七”干校中抽人回来；从中央电台内部抽调一些有经验的编辑组成编辑部，负责统一编发统稿；组成调干班子，开始选调干部。

1971 年 5 月后，是民族语言广播的恢复和发展期。筹备工作中有许多困难的问题，除了办公用房、录音设备、发射技术、传送频道等，如节目方针如何确定？这直接关系到调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播出时间、人员编制是多少？各个民族的播音以哪个地区的发音为标准？有的人愿意来，有的人不愿意离开故土，如何做好工作？在北京如何尊重和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民族风俗？进京指标和户口卡得非常严，住房非常紧张如何落实？等等，都是非常细致、非常重要的事。筹备工作既要抓紧又要细致，许多事都是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尤其尊重有关民族地区的实际和意见，不仅在使用标准语言和调干上尊重和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且在办广播的方针上，中央电台多次派人同他们商量，在反复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的基础上才确定下来。当地都很重视并帮助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他们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愿意做中央电台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的后盾，大力支持。中央电台那时对民族风俗了解甚少，做事也都非常慎重，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如从新建住宅中预留了宿舍，让他们的住地相对集中，开办了民族食堂等。后来经批准，把傣语交给了云南台去办，把现有的和已经调来的傣语人员都转到了云南台。也曾经多次研究过中央电台是否办壮语广播，

根据韦国清同志的意见，中央电台不一定办了，由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去办。

1970年6月中央电台民族部成立。27日军管小组副组长戴征远在成立大会上说：“民族部的成立，不仅是广播局的大事，而且是落实毛主席努力办好广播的大事，是毛主席、党中央非常关心的事。”从6月26日开始进行试播工作，先在内部进行开播的演练，从选稿、编辑、发稿、翻译、录音，一切按照正式开播演练，或不发射，不播出去；或如同正常播出一样，正常发射而不呼台号。演练中发现了不少问题有待完善，如不同语言发稿内容与发稿量之间的区别、播音基调和速度的掌握（请中央电台普通话播音员指导）、翻译速度的快慢（平均每人每天翻译500字左右）、用语与术语如何统一、翻译格式如何统一、一些国家和城市的名字以及人名如何统一、工具书太少等。民族部同志情绪非常高涨，有人急不可待地建议“七一”开播。中央电台认为一旦播出就不能停下来，只能准备好了再上，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上，哪个语言准备好哪个就先上，不求一致。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1971年陆续开播。

具体开播时间是：1971年5月1日，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同时开播；1972年5月1日，蒙古语开播；1972年8月1日，朝鲜语开播；1973年1月1日，藏语开播。每天播音2~3次，每次约1个小时，节目组成以新闻为主，有少量的专题报道和文艺节目。民族语言广播的方针是立足中央、面向各民族语言地区；发挥中央电台民族语言广播的优势，区别于本民族语言地区的广播。宣传报道的重点是准确、及时地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介绍全国各方面、各地区的建设成就和典型经验，报道国内外重要信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适量报道本民族语言地区的发展情况。各民族语言地区情况的宣传报道主要由本地区的媒体承担。

正式播出后随即派人分别去调查，听取反应，以改进工作。如 1972 年 4 月，中央电台的调查组在新疆受到自治区革委会主管领导的接待，革委会主任赛福鼎在家里接待了调查组。4 月 27 日听取沙明、郭景露的调查汇报，总的认为基本符合当地的要求，喜欢听，但希望内容再充实一些，增加一些国家大事、其他兄弟民族的情况和反修文章，希望延长时间，注意民族风俗。对播音基本满意，但用词需要统一等。

其他语言地区的反应也都很好，他们感谢中央对他们的关怀，能够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的重大信息及时地送到边疆，送到少数民族的心中，对建设和稳定边疆非常重要；他们希望中央电台与地方电台分工，中央电台立足中央，面向民族地区，而当地电台着重办好有关当地的报道，并保证转播好中央电台的民族语言广播；他们要求把民族广播办成中央电台《新闻报摘》、《全国联播》节目的精缩版，把主要内容和消息都能包括进去，并能够增加对全国有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报道，加强民族间的交流。调查组到牧民中调查，牧民反映经常看不到报纸，报纸到乌鲁木齐也要一个星期，再到牧区则成了“抱纸”，牧民也没有时间看。牧民的生活流动性强，他们中 80% 有半导体，而且质量好，他们对广播的频率很熟悉，他们形象地说，卷着莫合烟听广播是他们每天都要做的事。通过收听广播，他们能够知道联合国恢复我合法席位、尼克松总统访华；他们希望增加播音次数或延长播音时间，半个小时一次太短，一杯奶油茶还没有喝完就过去了，又要去找别的台。后来，这些意愿都逐步得到了满足。从 1971 年中央电台恢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已过去了几十年，节目正越办越好。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 年 6 月 22 日，华国锋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专门会见中央电台从事少数民族广播工作的全体人员，勉励他们做好广播工作。1989 年 10 月 1 日，江泽民总书记和主管宣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到中央电台视察，专门看望了在民族部工作的全体

人员。这都体现了中央对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的重视。

(注：1977年6月，中央正式批准中央广播事业局为机密要害单位。1978年4月11日传达，中央批准中央广播局《关于更改北京电台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为“中央电视台”名称的请示报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耿飚、方毅、乌兰夫、纪登奎、余秋里同志圈阅。)



## 第二部分

### 重大新闻事件报道的曲折过程



## 一 伟大的转折

——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宣传工作的转变过程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后来的丰富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伟大转折的正确性。30多年来我国走过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之路，中华振兴，跻身于世界经济的前列，让世界刮目相看。回首三中全会，人们很容易记住转折带来的巨大成功，但很少谈及在转折时期产生的一系列难题，以及实现转折的复杂、艰难的过程和细节。事实上，这一巨大转折并不是从三中全会召开之日起开始，也不是以这次会议为终点，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实现转折的重要标志。

这个转折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后就有所考虑，只是后来受到了严重干扰。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文革”，我国的政治生活和政治走向发生了重大转折性的变化。从那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国时局一直处在大变动时期，带有阶段性的重大事件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有国务院务虚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等，从

思想理论、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人事、组织上，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做了前期准备。1979年4月理论工作务虚会议的结束，尤其是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是对转折中重要原则问题的基本定型，在思想理论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基本统一了认识，奠定了后来稳定发展的基础。中国历史的这种变革必然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过去的生活秩序、人们思想观念和习惯，都是一个激荡、强烈、深刻的冲击，新闻宣传同样经历着这一历史性转折。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种巨大的变革不是经常有的；对于一个人来说，这种历史机遇更不是经常遇到的。能够赶上这样的机遇，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锻炼和考验，尤其是在敏感的新闻宣传岗位上。那时，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副台长，分管广播宣传工作。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原则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必须准确、及时、客观地报道现实中发生的新事物和新变化。变革和发展需要新闻舆论强有力的推动，变革和发展的前提又必须是国内局势的稳定，改革与稳定都需要一个良好的宣传舆论环境。毫无疑问，新闻宣传工作要能够顺利地承担起这一任务，自身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而且应该走在全国其他战线的前头。这样，新闻宣传工作要同时承担起推动改革、稳定局势和自身改革的几重任务，又必须做到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今天，再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感觉更加清晰和波澜壮阔。以下我就当时所经历的广播宣传工作中的那一部分做一回溯。

### 两个“凡是”与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中国历史的巨大转折载入史册，但这一转折并不是从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之日开始的。粉碎“四人帮”、结束“文

革”之后，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大量政治、思想、理论、组织和实际工作上的准备。首先是关于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成为开启三中全会的思想先导。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检验真理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各大报转载，中央电台广播，随后在理论、思想、宣传战线展开了不同观点的广泛的讨论。其实这并不是新的理论，这是毛泽东《实践论》中反复讲明的核心问题。但因为现实的思想和实践违背了这一检验真理标准的理论，所以需要重申和恢复。

经验告诉我们，许多重大理论的提出或重申，都具有现实针对性，人们更加关注的是重提这个问题的针对性是什么？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看出，党非常重视理论问题，每一项重大决策或重大变故之前总是以某种理论为先导，这似乎是一条规律。尤其自“文革”以来，对理论重要性的认识（尽管是错误的），对理论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的认识，对理论针对性与即将发生实际问题关联性的认识（实用性的），也即是“政治的敏感性”，达到了人民群众普遍重视的程度，如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关于“批林批孔”、毛主席关于《创业》和《水浒》的批示等，还有“批唯生产力论”、“批经验主义”、“批三项指示为纲”等，总是在其身后跟随着一场政治风暴。那么，现在重提恢复“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又是针对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变革呢？这是人们思想深处最为关注的问题。

“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直接针对的是两个“凡是”，更广义上是反思“文革”、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被归纳为“两个凡是”（当时对“两个凡是”的提法还有多种，用语不完全相同）。

当时人们在学习讨论这一社论时，对“两个凡是”含义的认识并不一致：有的认为，“两个凡是”如同“按既定方针办”，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理解，文化大革命不能否定，“文革”以来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必须遵循，“文革”以来造成的许多冤假错案都不能平反，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邓小平不能出来工作；有的认为，“两个凡是”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依据不断发展的实践而产生的新的理论、政策和创造都得不到认可，社会将难以前进，生活将失去活力。<sup>①</sup>但同时也有些人认为，这是在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毛主席去世不久，“文革”刚刚结束，是多年政治影响和习惯的延续，难以马上扭转，需要缓慢过渡，否则人们也难以接受，急转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另外，在实际工作中也并没有都依照“两个凡是”去做，如已经部分平反冤假错案、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复出，以及强调经济建设上大见成效等；第三，作为“接班人”的华国锋和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也不可能马上做出新的决定，他们一时难以有那样的认识、胆识和气魄，这需要时间和实践等。

这种不同的认识在理论和宣传思想界表现得更为突出，一时竟有人把这两种持不同观点的人不恰当地划分为“改革派”与“保守派”。广大群众以审慎的态度注视着大讨论的开展，对许多人来说，不是理论上不认可，而是对把这一哲学理论纳入政治范畴还心存余悸。也正因为问题如此重大，所以参与“检验真理标准”写作的有关人员才如此的重视、慎重，甚至不惜冒着政治风险，最终依靠胡耀邦的拍板和邓小平的支持，才得以立足和推广，成为确定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

<sup>①</sup> 1980年12月5日通过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将“两个凡是”定性为“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同志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

当然，这一切背后的运作，我们当时并不知内情，自然也理解不了那么深刻。邓小平再次复出后，他在 1978 年 12 月 13 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把这一讨论的意义提到这样的高度。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体系来看待，全面地准确地理解、贯彻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华国锋在同一天的讲话中，对“两个凡是”做了解释性的检讨，他说这“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中央新闻单位凭借着自己的敏感性从不同的角度关注着这场讨论。中央电台如同其他新闻舆论单位一样，每当中央有新的理论、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发生，总是几乎同步地进行内部吹风，不论是否马上进行报道，总要事先了解理论动向，做好思想准备。吹风常常是具体细致的，透露出各种情况和意见，提醒注意把握新闻宣传未来的动向；新闻界有关人员也具有应有的政治素养和纪律性，该保密的绝对保密。

在“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中，中央广播局局长张香山经常传达和提醒广播电视宣传应该注意的问题，依据新的进展调整报道的内容和宣传口径，注意全台广播的氛围和倾向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一直特别要求对于理论问题的宣传报道要保持审慎的态度。对于“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央电台重点新闻节目除了直接播出经过批准的文章以外，大多是间接地配合。但中央电台又与其他媒体不同，多年来办有理论性的《学习节目》，自然对这一讨论最为关注，起初是选取马、恩、列、斯和毛主席有关真理标准的论述，从侧面间接配合，

后来直接组织有关文章，举办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系列讲座。当然，我们的认识并没有达到自觉的高度，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当时认识的倾向性，也是新闻职责使然。如实地讲，当时对于这一讨论，新闻宣传战线的认识并不是一致的，中宣部有一段时间并没有持积极的态度，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媒体的宣传报道。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局势已非常明朗。新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在1978年12月30日对宣传单位提出，关于“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我们都要按这个办事，凡是实践证明是对的必须坚持，凡是证明是错的都必须改正（当时有人戏称为“新的两个凡是”），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一切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根据实践的结果判明是非。

###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奏

#### ——国务院务虚会议与中央工作会议

1978年7月6日至8月3日国务院务虚会议的召开，是这一期间经济局势变化的集中反映。据记载，粉碎“四人帮”以来国务院开过20多次大大小小的务虚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这种形式组织有关人员出谋划策、分析局势、研究政策、谋划经济建设的未来。在这一基础上决定开的这次务虚会议，就某些重大经济问题进行了集中研究，从中可以看出经济政策的走向。

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议前后经过了近一个月，据传达，会上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回顾说，今年开了五届人大，提出了新时期的任务，开始了新的长征，通过了10年规划、23年设想，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国务院要务虚，又要务实，虚实结合，见成效。华国锋提出，这次务虚会着重议论几个问题：一是怎样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问题（受1974年“蜗牛事件”的影响晚了3年）。二

是企业管理问题，包括工业管理。不能好坏一个样，赚钱赔钱一个样。要贯彻各尽其能，按劳分配的原则（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贯彻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他引用社会上流传的话说，过去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干的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捣乱的，这是个社会问题。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要碰钉子的。三是计划平衡问题。千万不能万马奔腾、齐头并进。要突出重点，抓好重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另外，专门研究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四是出口贸易，这是个大问题。总之，先务虚，后务实，统一一个就办一个。华国锋提出，我们思想上再解放一些，胆子再大一些，办法再多一些，步子再快一些。

会议在讨论国内发展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问题时，华国锋认为，高速度发展，主要是先在国内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他说，中央已派出一些领导同志到国外去考察，开阔眼界，学习引进先进，不这样快不上去。不看先进的东西，不比较，就容易骄傲自满、故步自封。过去说外国先进，就是崇洋媚外。现在有的同志说，原来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腐化堕落，一看，不全是这样，人家为了竞争拼命钻研，确实有先进的东西，也看到我们自己的技术水平确实落后。他说，不要看了激动，回来不动，要脚踏实地。在这之后，8月26日又传达了华国锋关于引进技术的管理和使用问题的两次讲话。从这里感触到改革开放正在酝酿，也曾经被人称为是“洋跃进时期”。

谷牧曾经回忆说：“1978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让我带领一个包括6位省部级干部组成的代表团，出访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首先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sup>①</sup>

<sup>①</sup> 汤应武：《改革开放30年重大决策纪实》，第5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但是，那时的一切都是在小心翼翼地进行，都是在毛主席过去指示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至少是打着毛主席允许和对毛主席指示不同理解的前提下进行的，是一个缓慢量变的过程。思想的真正解放和观念的转变，是伴随着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而逐步展开的，这是一个质变。这期间，许多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党的十一大以来，中央就重视科学技术、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等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有人对“农业学大寨”提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用专政理论搞农业，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贯彻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代表秘密签订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等等。对于各个方面发生的这些目不暇接的新变化新举措，后来人看来是那么平常，那么理所当然，但在当时却是新事大事，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事，带来了许多的“重新认识”：如何看待计划经济？如何看待“全国农业学大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等等。后来才意识到这是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是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这一巨大转变的前奏。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开了36天，按照原计划讨论农业发展和经济计划问题，会议中间改变了原来的议程，转向了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开始拨乱反正，成为一次思想上、组织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并决定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12月18日传达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些讲话中已经涉及三中全会的一些重要原则问题。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先行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起，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指出，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sup>①</sup>

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他说：“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一个革命的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sup>②</sup>

30 年之后，在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接受了当代国际援救所颂国柱博士的专访，他在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时，透露和分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些情况。他说：“陈云早在 1977 年 3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恢复工作的问题，……直接促成了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按照胡耀邦的说法，是‘揭开了拨乱反正的真正序幕’。正因为如此，才使邓小平有可能用一年多的时间，从思想、舆论和组织等方面，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朱佳木说：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使“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这是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得以顺利召开，代表成分发生有利于党内正确力量变化，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得以重新确立的重要原因”。他说：“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陈云在东北组所做的《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使会议议程中途发生了违反主持人意愿的改变，实

① 刘吉：《三十年的碰撞》，第 62 页。

② 汤应武：《改革开放 30 年重大决策纪实》，103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际开成了主要讨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真理标准讨论中暴露的问题和中央人士调整问题的会，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关键性作用。”朱佳木说：“自从 11 月 25 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央关于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决定后，我感到中央的主导权已经由原来的主要负责人转到了邓小平手中。所以，邓小平后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第二代的中央领导集体，他在这个集体中处于一个关键地位。”

这期间形势的剧烈变动，也必定是宣传报道剧烈变动的时期。这些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思想理论观点与政策方针，使人感到一股新意、一阵新风，强烈地冲击着过去形成的制度，颠覆着人们的传统理念。同时许多人仍对“文革”心存余悸，新旧两种思想观念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激烈的碰撞，新闻界更不例外。所不同的是，新闻界需要及时做出新的判断，需要立即付诸行动，因此总是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变化，审视过去；总是小心翼翼地思考如何对待、报道每一件新生事物，谨慎对待瞬息变化的宣传政策和口径；总是考虑如何采取恰当的方式既有利于转变又有利于局势的稳定；总是密切关注内部队伍的思想变化和宣传报道的改革。细想起来，转折时期的宣传报道非常难以把握，一切处在变动之中，各种矛盾、观点错综复杂地相互交替，集中反映在新闻宣传中，要能够准确地把握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仅依赖于上级精神的传达，而且必须要有自己对于全局情况的了解和分析判断，经常处于积极、谨慎的紧张思索之中。

### 十一届三中全会宣传报道的新创意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并以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而载入史册。它从实质上结束了“文

化大革命”，是新时期开始的主要标志。这一重大战略转移，在今天看来是顺乎自然的寻常事，在当时无疑是一大惊雷，同任何巨大社会变革一样，充满各种复杂的调整或斗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从12月18日开幕到22日闭幕，前期做好了准备，会期并不长。华国锋主席在开幕词中提出，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22日晚7点半举行闭幕式，通过关于加快农业生产问题的决定草案，通过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明确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增选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进行了选举。据参加会议的中央广播局局长张香山介绍，闭幕式的开法做了一次小小的改革：开幕时沿用过去的做法，华主席等进入会场，全体起立鼓掌。在小组会上，有人提议可以不必起立，会议主席团采纳了这一意见，到闭幕时代表坐着鼓掌，改变了以往起立鼓掌的惯例。

对三中全会的报道，早已被提上宣传工作议程。中央电台和首都新闻界早就做了充分准备，一切立足于改革，立足于大搞。中宣部规定：发会议消息、公报、有关决议、文件和讲话；《人民日报》发社论；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新闻纪录片；电视台拍电视新闻片；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记者转入三中全会报道，另外《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局各增加两名记者。

具体到广播电视，12月18日张香山局长对中央三台提出了以下具体要求：一是组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学习讲话和文件，重点是充分认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个转移是毛主席生前要转的，受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现在转是实现毛主席的遗愿。二是认识没有社会安定就没有

社会主义现代化，巩固、珍惜和发展当前大好形势，安定团结、稳定局势、鼓足干劲、团结一致向前看，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思想僵化，否则四化就没有希望。四化首先是发展农业，否则工业和其他都上不去。四是必须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经济学和科学技术，学习管理，不学好本领，就没法实现四化。五是宣传进行体制改革、人事变动的重要意义。

依据中宣部和广播局的总体要求，层层落实，中央电台明确，首先，要播好会议公报和有关文件，尽快把三中全会的精神准确、及时地传达到全国各地，确保安全播出；其次，迅速地大张旗鼓地反映全党、全军和各民族人民为热烈拥护会议的决定和重大决策而举行的各种庆祝活动，大造气氛造舆论；再次，广泛组织采访学习、贯彻的具体活动，报道全党全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最后，利用中央电台专题、对象节目，有针对性地正面解答反映出来的各类思想、政策和具体问题，把人们的思想认识引导到三中全会的轨道上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促进转折的顺利过渡。

据我所知，新华社原来的安排也是准备大搞。新华社对国内各分社的报道要求首先是“热烈拥护”，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要单发1200字左右的综合消息，先首都后各地，报道人民群众的热烈庆祝，要求报道要新要快，同时抓好典型报道。

但出乎意料的是，会议闭幕前，中央发出通知，改变了以往习惯的大张旗鼓庆祝的方式，不庆祝，不游行，不敲锣打鼓，不搞群众性的广泛反映，把对这次会议的深入学习和报道作为长期的任务。当时明显地感到，这也是一种改革，体现了新的实事求是的作风。22日晚上10点会议闭幕，我们一直等待着准备公报的播出，但当天晚上没有发表会议公报。公报主要由胡乔木起草。后来，据在胡乔木身边工作的朱佳木回忆说：需要反复修改公报稿，“因此，当天已不可能发表公

报”。我们得到消息，华国锋提出，23日晚广播三中全会公报，24日报纸刊登公报。23日，中央电台做好了在晚上8点《全国联播》中首播公报的一切准备，但是没有想到仍然迟迟收不到公报的定稿，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催促着，直到19点收到公报稿时，已经来不及预告，播音员更来不及备稿（那时都是录音播出），早已等候在播音室里的播音员夏青接到稿子后立即开始录音。原来没有估计到三中全会公报竟如此长，7800字，录音合成后长达48分钟，录制中间需要停机、复听，因此直到20点《全国联播》开始播出公报时，录音还在进行中，弄得十分紧张。最后中央电台两套节目并机播出了公报的全文。当晚和24、25日共播出21次。各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和对台湾广播同时播出。

遵照中央的规定，公报播出后，中央电台一改过去的传统做法，没有搞庆祝活动的录音报道，没有一般性的表态，只在第二天的《新闻报摘》中播出了新华社播发的北京、全国和全军的三篇综合反映稿；在晚上的《全国联播》中播出由本台记者采写的典型人物的讲话；要求报道有具体内容，改变过去那种空洞、抽象的表态式的或会议式的报道；随后，转入典型报道，紧紧围绕解放思想、促进工作重心的转移进行学习贯彻，并结合新的一年开门红制定落实措施。这样一次党的重要会议的报道，与过去党代会的宣传报道气氛相比较，与人们和媒体的想象相比较，倒显得平静了许多，而对报道的要求也深入了许多。

当时突出地感到公报的写法很独特，内容竟如此详尽，把全会通过的几个重要问题都写了进去，原原本本地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是过去很少有的。公报开始说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显然，某些老同志的出席是大家所关心的。

公报在第一部分说明：“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公报突出强调，现在条件已经具备，“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公报第二部分着重讲了经济建设，通过了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突出强调了加强发展农业、改善人民生活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公报第三部分指出：“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问题。”“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会议纠正了“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同志所做的错误结论”，并实事求是地继续解决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公报中强调了“民主和法制问题”的重要性，指出现在“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公报中明确：“在人民内部的思想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

公报第四部分重申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充分肯定了关于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意义，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公报第五部分强调“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为严肃党规党法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领导班子。这一部分中明确写入：“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党重申

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叫‘指示’。”

对于公报要点，中宣部部长胡耀邦概括为五个方面：转变的根据和深远意义；实现转变必须把经济、特别是生产搞上去；为实现转变需要长期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还需要解决一大批大是大非问题；实现转变需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为实现转变需要实现党内的民主生活。至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30多年，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曾经为此激动过、鼓舞过，今天重温公报精神依然令人回味无穷。

当时我们是带着惊奇和喜悦的心情来看待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但并没有深刻地理解，不像后来那样清楚。许多历史转折和大事，当事者能够真正清楚的不多，都是在实践和时间的延续中逐步加深认识的，也许这正说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正确性，也印证了历史应该由后来者写的那一名言，只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比较准确地确定某一重大事件的作用及其在历史上的位置。

### 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与“西单墙”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带来了思想理论的解放。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重点工作的转移，这无疑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激发了理论工作者的热情，活跃了思想，他们对过去的许多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产生了质疑，并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全会后不久，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举行。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议首先是由叶剑英提出的，是早在三中全会前中央做出的决定。理论务虚会如何开法？规模是搞大型的还是小型的？按照胡耀邦的说法：一锤子买卖，开一两千人的大会，

我是没这个胆量。一锄头挖出个金娃娃，好是好，贪心太大了，难以完成。先开小会，成熟后开大会。务虚又务实，虚实结合，虚实并举。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月18日至26日，第二阶段从2月1日至4月3日。这是一次内部务虚会，与会者的思想十分活跃，发言踊跃，是长期以来所没有的争鸣景象。由于新闻宣传工作的需要，我们经常听到有关讨论情况的介绍和传达。广播局局长张香山是会议代表，他经常回来吹风，提醒宣传报道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倾向。

讨论涉及一系列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首先是从以真理标准的理论批判“两个凡是”开始，集中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个要害问题，矛头直指文化大革命和极“左”思潮，由此追溯到以往政治上的反右斗争、经济问题和“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各种运动，对过去的重大问题几乎翻了一遍，显然也都是人们最关心、最敏感的重大话题，特别引人注目。这些议论最终引申集中到究竟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集中到最核心的对毛泽东个人和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甚至有人把出现的某些问题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个人的责任和品质。这在以前都是不可涉足的雷区。这些问题的提出，对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民大众而言，如同电闪雷鸣，简直就是爆炸性的冲击。到底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看待、如何评价，成为必须而且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对毛泽东和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不仅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且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和新中国的否定，历史必将会翻个个儿。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向何处去、事关全局的十分重大的政治敏感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评价失当必定会造成全党和全国的混乱，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面对突如其来的理论轰炸，许多人受到强烈震撼，感到迷茫、担心和伤痛。国内外都在拭目以待。正如邓小平所说：“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

中国革命和十年“文革”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思想观念，似乎已“根深蒂固”地深入到人们的灵魂，依据那时人们的觉悟和认识水平，绝大多数人对当时一些人提出的问题，理论上难以理解，感情上难以接受，议论纷纷，忧心忡忡。会议的内部讨论与公开宣传报道是不一样的，“讨论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尤其对重大理论和敏感的政治问题，宣传报道历来是极其慎重的，谁都不会自行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对媒体总的要求是既要有利于思想解放，又要稳定大局。看似简单的要求，执行起来是很难的，这时的中央电台等媒体，只能是总体地间接地配合宣传，尽力创造一种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而不是直接宣传报道讨论的本身，更不能触及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但实际上内部讨论情况根本无密可保，有人无意或有意地通过各种渠道将不同观点外泄，并很快传到社会上，真真假假，是非非，广为流传，似乎到处有“新闻发布会”，到处是议论的“会场”，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也有人写文章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要电台广播），使社会公众之间不同思想观点的争论明朗化；同时，由于延续着“文革”中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载入宪法），各种大字报、小字报、标语到处张贴；不同观点的辩论同时深入到机关、单位内部，尤其是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更为敏感。理论务虚会议开阔了思想，促进了思想的解放，也引发了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动荡，人们以各种不同的目光和心情注视着时局的变化。

有些活动的信息和观点经常反映在“西单墙”上。所谓“西单墙”是指北京西长安街与西单相交汇的一处科学橱窗长廊，这里原来是展出科学图片的地方，但在这时候，一些议论时局的大、小字报开始在这里张贴，很快传开，吸引着北京各方面的人士，日夜在这里进行激烈辩论，成了“街头政治”的场所。当时有人把“西单墙”看作是百家争鸣、发扬和体现民主的一种新形式，称为“西单民主墙”，有人比

喻为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但后来因走向反面被取缔。当时，每天的最新信息和流言蜚语都有反映，似乎是一种不成文的民间“新闻发布会”。了解内情的人清楚，其中的许多言论透露、讹传着务虚会的信息，某些会议发言还断章取义地扩散、延伸、补充和发挥，带有强烈的选择性和鼓动性，夹杂着个人的政治观点。同时，不断引进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观。这种政治动向，显然成为人们最关心、最敏感的议论话题。每天有许多人到那里去（机关干部下班后也常到那里），边看边议论，有的整天在那里参与集会，发表演说。有些人将之错误地理解为这就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就是“民主政治”的体现；只要标新立异就是新生事物，就要提倡和支持；坚持传统的基本原则就是“保守”、“思想僵化”。于是，反面观点无限制地扩散，正面观点得不到宣扬，“西单墙”几乎成了一边倒的言论天下。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此类做法迅速地扩展到全国各地，一些大城市设立各种“墙”，成立组织，创办刊物。自1978年11月20日上海人民广场就出现了《人民论坛》、《民主论坛》等，他们组织请愿和外逃，支持游行，搞串联，呼喊各种口号，甚至发展到冲击机关、殴打干部、占据市委办公室，其严重程度是上海解放以来所罕见的。一时间各种组织、各种思潮、各类报刊在全国纷纷出现，有人打着“民主讨论”和“四大”的旗号，标榜“大民主”和“民主政治”，发表各种真假消息和言论，把油印报、铅印报到处张贴散发，他们利用舆论阵地“否定一切”，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负责任地点名攻击任何人；他们的观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的宣扬不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无所顾忌地攻击党和毛主席；有人标榜为“人权捍卫者”、“不同政治歧见者”，丑化社会主义，公开鼓吹资本主义道路；有的故意把问题提到外国人面前，泄露国家机密，向外国驻华使馆发信，如魏京生向外国人提供

军事情报，煽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1979年10月16日魏京生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有的扬言请外国人来执政，要美国总统来领导中国，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尊严、安全和形象，触犯了国家法律；台湾和西方反华势力借机渗透，外国舆论借此煽动，推波助澜；全国多处出现游行示威，进而闹事，打砸抢烧。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通告，宣布禁止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取缔“西单墙”。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取消了宪法上规定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条文。

动荡的局势加剧了思想的混乱，尤其是青年学生。据我的记载，那时上海一所中学发了10道有关政治思想情况的调查题，要同学们以无记名的方式实事求是地做出回答：1. 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2. 中国为什么与美国建交？3. “现在还是资产阶级吃香”，这句话对吗？4. “学政治没有用”，对吗？5. 你打算今后如何生活？6. 你认为做什么最快乐？7. 你喜欢西方的发型和服装吗？8. 你喜欢哪一类电影？……（我只记下来8道）这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今天看来，有的不算什么问题，但那时候却是震撼性的话题，不要说答案五花八门，只从提问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

1979年2月，中宣部部长胡耀邦谈到“西单墙”时说：“‘西单民主墙’是怎么叫出来的？也就是大字报墙。大部分是好的，也有害群之马；大字报有好的，有不好的，个别的很坏的。有的盲目支持他们，要出乱子的，随便给钱，给纸张，帮助出主意。没有民族气节，投靠外国人，送情报，甚至提出请美国人来当中国的总统。”胡耀邦对新闻宣传部门讲，“宣传上的主要应对措施，重要的是把我们的报纸、刊物办好，疏通言路，健全民主生活，大道畅通，他们就到不了西单去了”。后来证明，“西单墙”的延展走向了反面。

“西单墙”引发的这种“街头政治”的背景是非常复杂的，也是很危险的。各种政治思潮和人物混杂在一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都在背后插手。20多年后的21世纪初期，“街头政治”在中亚乌克兰等国盛行，西方势力打着“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旗号，出资收买和培训“异议者”，插手当地选举，支持集会结社，多次造成社会动荡而导致多国政权的更迭。显然，类似情况在我国早就多次发生过，只是他们没有得逞。

这些问题的出现，当然不能归咎于这次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根本而言是社会处于大转折时期，长期积累和形成的各种思潮和实际矛盾激烈碰撞的总体爆发，是一个社会大变革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回顾历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10年的文化大革命，堆积了大量的各类矛盾；另外，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整套理论和实践，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和人们的思想深处，成为人们思想观念和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成为多年来一种巨大的惯性力量。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巨大变革，完全改变了原来的社会运行轨迹，激烈冲击、改变着人们长期形成的一套政治观念和思维习惯，而用一种新的政治目光重新审视过去的一切、引导未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急剧的变化，使长期积累的种种矛盾一起浮出，一大批遗留问题、一大批新问题、一大批现实思想和社会问题，相互激烈碰撞，必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这是在社会转折中的客观反映。而理论务虚工作会议突破多年的禁锢，一下子把多年形成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摆在了人民大众面前，这种急转弯起了引发矛盾导火线的作用。谁都清楚，如果局势这样下去，人心涣散，其后果将不只是使中心转移和四化建设化为泡影的问题。

新闻界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是一个敏感、复杂的社会群体。这种状况必然反映到新闻界内部，首先表现在新闻人的理论和思想观念

的分野，对务虚会与社会问题有“好得很”与“糟得很”截然不同的看法。认识指导行动，也必然或直接或间接地表露在新闻报道上，尽管“宣传有纪律”，但有的媒体总是或明或暗地表明其政治倾向性，舆论呈现多元趋向。比如，有人认为过去的新闻宣传从理论到实践都错了，不应该再听中央的，要有“独立判断”；有人对基本新闻观发生了动摇，申明不再愿意当“喉舌”，利用自己手中的舆论工具表达自己的意愿；各媒体依据自己的意愿选取信息和文章，采访自己认同的对象；“新闻宣传危险论”又抬头，宣扬忙忙碌碌、糊里糊涂地犯错误。胡耀邦在1979年2月10日的批示中提出：“我们宣传战线上的同志要经常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向黑暗面开火，二是向自己的错误开火。”

这时期的宣传报道应该如何把握？面对这一局面中央主要领导人不断分析形势，对宣传报道不断提出要求。据中央广播局局长张香山1979年1月传达，华国锋谈宣传工作时说：针对时局，宣传上既要密切注视全党、全国的动向，保持清醒的头脑，又要使公开宣传区别于社会上和内部的讨论；既要支持发扬民主，又要使民主健康地、有秩序地发展；既要反映思想理论的活跃，又要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生产秩序；既要有利干拨乱反正，解答新的重大问题，转变人们的观念，又要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权威性。总之，要正确引导舆论，避免错误理论，避免偏激情绪，稳定局势，不能随波逐流，否则就会偏离方向，犯大的错误。

中宣部部长胡耀邦1979年2月28日在研究新闻工作的会议上说：总的说来，理论工作务虚会还是开得好的。有许多同志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提出了很好的观点，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既然有那么多人发言，总难免有一些意见、观点不那么圆满，至少还可以继续探讨嘛！所以不要把大家在会上的发言当作是中央的意见，当作是定论。有些有争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关全党性的重大决策和措施的问题，还是采取

先党内后党外的程序为好。先在内部充分讨论清楚，不要急急忙忙公开发表。我们的党报也好，党刊也好，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多商量一下为好。不成熟的东西，匆匆忙忙地发表不好，容易引起思想上的混乱，自己也会陷入被动。胡耀邦在谈到毛主席的时候，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不能抹杀，但的确也有错误，这是一致的认识。但要考虑讲多了好不好，这不是说包起来不讲了。功是功，过是过，不能包，但讲这些问题有个时机问题，有个分寸问题，有个表达问题，我们新中国是靠党、社会主义和毛主席稳定人心的，希望提到党的利益上来考虑这个问题。

这些要求是明确而正确的，但这里的几个“既要”、“又要”的辩证统一，几个能宣传什么、不能宣传什么以及宣传多少的“度”，落实到实践中很难恰当地把握，需要处处小心谨慎地斟酌。主要难题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中央电台等新闻媒体必须按照中央统一的政策、策略和口径进行宣传报道，但由于中央领导层认识分歧、观点不一和方针政策的不断变化，重大理论认识的混乱，造成新闻宣传基调和口径的波动不稳；二、如上所说，新闻队伍的思想观念同样复杂，不同思想观念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尺度，智者见智，他们在实践上顽强地表现自己；三、广大受众的思想观念和要求也日益复杂，宣传报道任何一种主张和观点，都难以使所有的人满意，而且反映极其强烈，他们来信、打电话把指责的矛头直接对着电台或其他媒体，因为他们所能够接触到的就是这些传播媒体，他们不了解上层问题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活动。

综上所述，历史经验已反复证明：党的宣传工作和我们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新闻宣传导向是否正确关键取决于中央认识的统一和决策的正确，否则，要求新闻媒体导向的正确和统一是不可能的。但新闻媒体并非无所作为，越是在高层认识不一、思想理论和社会局势动荡

时期，媒体人、尤其是领导层和主要负责人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导向出现大的偏差（完全不出现偏差是很难的）。尽管有些基本的报道必须统一刊播，但还有许多报道（稿件、节目等）依据自己的分析判断而表达不同的倾向，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

对于中央电台来说，那时候，听众多年养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广播说了的就是真的，就是正确的，就是中央支持或肯定的（“文革”中，他们认为广播是代表党中央的）。因此，他们以广播为依据印证各种传闻是否准确，他们以广播为依据去支持自己的观点说服他人，他们动不动会说“我听广播了，广播就是这么说的”，而对方常常再无话可说，由此更加重了中央电台的政治责任感。应该说，这时候思想的混乱急需舆论的正确引导，但对人们关心的问题表态不坚定、不直接、不明朗，给听众以“怕左怕右，怕前怕后，极其小心谨慎”的感觉，大大减弱了正确引导作用。其实，这种情况经常有，越是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受众越需要舆论引导时，这种反差越突出。这时候如何遵循新闻特点和规律，掌控舆论引导的积极主动权，一直是新闻宣传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 邓小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正是在这个理论、思想和社会处于复杂动荡的时候，邓小平在1979年3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邓小平一开始就说，这次理论务虚会议，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进行的。会上，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他共讲了三个问题：一、形势与任务；二、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重点是第二个部分，邓小平鲜明而坚定地提出：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对每一项都做了详细的有针对性的阐述。这时候，邓小平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显然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听起来也特别亲切。邓小平在解释其政治背景时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他说：“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邓小平重拾“四项基本原则”，澄清了大是大非，这是人们翘首以待的，反映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我在报告的现场听了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今天看来依然重要，但与当时在现场听报告时的感受大不一样。如实地说，会议开始前，我们与会者都有这种政治的敏感，邓小平的讲话必定要回答全党、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但我仍然怀着极其忐忑不安的心情，猜想着他可能讲什么、怎么讲？从一开始，我聚精会神地听每一句，急速地记录着每一句话，唯恐漏记或错记，我不仅有学习任务，还自认为有“传达任务”，不能走样，他所讲的问题都是我们急切需要知道、需要回答的问题，因此一直处在兴奋之中。我想，与会者有着同样的心情，期盼已久，会场上不时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在那种思想理论混乱的政治环境中，在各种思潮交织泛滥的社会环境

中，在人心不稳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形势下，党中央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基本准绳，澄清了国内外各种流言蜚语，回击了各种攻击，顺应了民心，使党内外许多人解除了对时局的疑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这四项基本原则并没有新的创造，但在那种政治氛围中听起来特别亲切、带劲，如释重负，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思想动荡的人们是很难理解的。据我后来所知，许多在人民大会堂听讲的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新闻界更加敏感，对于宣传报道来说，正处在进退两难、怎么做都难以把握的境地，一下子定了基调，有了明确遵循的基本准则，那种欣喜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在回到中央电台学习讨论时，大家都有一种喜悦、轻松之感，很快就广泛传颂。这一报告是代表党中央的决策，但如实地讲，这样的报告，在当时也只有邓小平才能做得出，只有他有这样的政治洞察力，有这样的权威性和说服力。

在这四项基本原则中，问题的焦点，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肯定和评价。在那时邓小平有两次讲话令我的记忆极为深刻，至今，我还是想把这两段话写下来。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

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邓小平在这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澄清了许多重大理论和政治问题，保证了当时局势的稳定发展，保证了我国沿着党和毛主席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2007年，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 宣传报道的转折与胡耀邦谈宣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党的中心任务，实行改革开放，新闻工作和宣传报道必须与之相适应，这对长期习惯了“以政治报道为中心”的新闻界同样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客观要求转折，首先主观必须转折。主观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广播宣传报道，二是广播队伍。总的看，可以想见的几个主要方面有：一、由长期一直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服务为中心，转为以经济建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在过去政治宣传的路子上走惯了，如何宣传报道好经济建设，这是门大学问、新学问，需要从头学起；二、长期受的教育和在实践中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真可以说是已经“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

行动上”了。毫无疑问，这种过时的观念和习惯必须转变，才能适应新的要求；三、长期以来，中央电台的节目主要是为配合党和国家过去的主要任务而设置的，必须依据新的任务和要求进行调整；四、必须进行全台体制的改革。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就逐步开始了这种量变的过程，但三中全会后要求的是质变，必须加速进行。

这一切客观与主观因素的转变，实行起来非常具体、复杂，都没有经验可借鉴，没有先例可循，每一步都要与全国改革同步积极、谨慎地探索。其主要难度是：一、虽然宣传报道时刻触摸着新的局势、新的政策、新的变化，但受到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的制约，客观形势的发展一时并不明朗，有许多新旧混杂不确定的因素，宣传报道的政策和口径时常难以确定，这是转折期舆论导向调整中不可避免的。二、主观上，受到广播队伍政治观点与思想观念等整体素质的制约，要时时同自己的思想认识、思想观念和长期形成的习惯做顽强的斗争。这是个核心问题，具体表现在对待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要警觉地提醒是新是旧。事实上，当时的思想状况是对新的转变缺乏深刻了解，旧的思想观念总是顽强地表现出来。过去那么说，现在又这么说，过去我们在宣传舆论上反复强调而树立起来的东西，现在又要通过我们自己把它打碎清除。鉴于历史的教训，每向前迈进一步都心存余悸。三、听众中同样存在着复杂的认识和心情，对报道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对广播有着不同的期待，他们又不知道一些问题背后的过程和情况，常常把怨气撒在中央电台身上。四、中央非常看重新闻宣传战线，寄希望于通过宣传报道正确引导舆论，稳定形势，又常常把思想与局势的动荡归咎于宣传舆论惹的祸。新闻界抱怨，“受着上下内外的夹板气”。

其实，我们深知，中央一直在研究宣传思想战线的动向和宣传报道，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直接过问新闻宣传，频繁发表意见，做出部署。如1979年1月，中央广播局张香山局长传达华国锋谈1979年的宣传

工作的几点意见时说：一、注意当前的社会动向、政治动向。要坚决发扬民主，过去民主少，现在提倡民主，但这不是短期的。同时也要估计到，在贯彻民主过程中会出现各种思想动向和社会动向。民主本身也是一种秩序，不要提倡无秩序的民主。宣传工作者要有远见，防止片面性。二、为实现现代化就要加快经济建设，要很好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改变完成、完不成任务一个样，质量好坏一个样，使企业有创造性、竞争性。三、如何使宣传理论队伍更好地团结起来，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任务也很繁重。我们要密切注视群众思想动向，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要给予答复，但也要注意不要提过分的要求。至于争论的原则问题要搞清楚，也要有谅解精神，要考虑到发生争论有一定背景和条件。

为改进和加强宣传，中央及时进行了组织上的调整。“文革”开始，中宣部是被砸烂的“阎王殿”，粉碎“四人帮”后成立了中央宣传口，1977年10月恢复中宣部，张平化任部长。1978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明确分工胡耀邦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27日中央下发通知，张平化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免去中宣部部长、书记的职务；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党委书记，免去中组部部长职务。这期间，作为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是工作最忙碌、思想最敏锐、也是最有建树的时期，短短的三个月左右，他接连举行10多次报告会、座谈会，如在12月30日，胡耀邦为回答中宣部新闻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用了一整天共讲了14个重要问题。胡耀邦这期间的讲话很有创见，对转折期间的宣传报道和稳定队伍起了指导作用，并涉及宣传报道的许多基本问题，很有研究意义。现依据当时的记录，稍作综合归纳如下：

1. 对粉碎“四人帮”两年来宣传工作的评价。三中全会刚刚结束，1978年12月31日上午，新上任的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向首都新闻界的

负责人做了长篇报告。他在评价粉碎“四人帮”两年来的宣传工作时说：这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两年多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大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也的确是一场政治大革命，经历了多少惊心动魄的大场面，雄伟壮观。想想两年的经历，对此做出公正的评价。这么一个大决斗、大革命，没有思想发动，没有思想领先，许多事情是扭不过来的，拨乱反正是拨不好、反不好的。这两年以来，就我们全党来讲，我们的思想、宣传、理论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9年3月10日，胡耀邦说，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两年半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做得很好，这是广大群众讲的，是实践检验的结果，十万大军的成绩、作用要给予充分的肯定。这是主流，不充分肯定这一方面是不公道的。

2. 新闻战线全体同志的工作责任感和光荣感。3月10日，胡耀邦说，据调查，目前新闻战线的基本情况是，新闻战线有10万人以上，有253种报纸，不算刊物，发行量5470万份，其中中央一级的报纸将近3000万份，地方报纸2500万份；全国电台88座，电视台39座，有线广播喇叭1亿只；新华社有分社29个（不包括军队）。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十万大军每天都在与国内几亿人民、国外十几亿人民讲话和见面，总有好、坏和不好不坏三种影响。若搞得好，就产生好的影响，使几亿人民受到鼓舞、启发和教育，就使人民的头脑清醒起来、聪明起来、团结起来、振作起来、振奋起来、……所以报纸、新闻是党的喉舌，人民的喉舌、是党的号角，它的作用应当是鼓舞者和组织者。

胡耀邦说，我们的人民历来把报纸登的东西看成是党中央的声音、指示，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他们有这个集团、那个集团的报纸，各讲各的，人民有时听，有时不听；有时听这一家，有时听那一家的。我们总把报纸当作党的指示和声音，这是长期形成的，没有什么不好。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就要求我

们的报刊、新闻工作者提高责任感。每个人都要意识到，我们是凭借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对人民进行引导的。

胡耀邦在3月10日的讲话中，要求充分发挥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与严格遵守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密切结合起来。他说，这是我们这样性质的国家新闻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胡耀邦详细谈到今后的新闻宣传工作，要求以新的姿态从事新时期新闻宣传工作。

3. 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和要求。12月31日，胡耀邦说，三中全会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以后，我们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尽可能地使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把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他提出，一定要读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书，一定要面向实际，一定要认真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带头搞好我们党一贯提倡的优良学风。

胡耀邦在12月31日说，要很好地研究如何加强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这是摆在全党意识形态部门的一个新问题，一个最大的问题。宣传工作前几年着重政治斗争、路线斗争，从明年我们要以很大的比重谈经济工作，谈四个现代化。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讲话或讲外行话，两年以后，人们就有理由说，你们这些新老爷也一样讲空话、讲大话。

1979年3月8日，中宣部在京西宾馆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总结经验，研究重点工作转移后的宣传报道，着重于宣传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如何把握。3月10日胡耀邦在总结发言中提出，应该经常宣传报道举国上下为四个现代化建设而百折不挠、奋勇向前的雄心壮志和实践活动；经常宣传报道党的现行政策；大力宣传报道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宣传报道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各种专门知识，技术革新的成就和先进的管理；要很好地加强和改进我国的对

外宣传；宣传报道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这是很重要的社会主义阵地。

3月21日胡耀邦在谈宣传时说，保持稳定，才能发展。无疑理论战线、新闻宣传战线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经过实践说明，新闻宣传一定要了解实际情况，要全面稳妥地掌握政策，要严格宣传纪律，一切服从稳定和发展，改革只能是逐步地、积极而稳妥地进行；对四项基本原则要写文章解释，深入人心，统一思想认识；解放思想，反对思想僵化，不能只靠书本、文件看问题；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掀起密切联系实际的高潮；要一切向前看，对历史问题不纠缠、不争论，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集中搞四化建设；宣传报道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要开动机器。

3月26日，中宣部开会继续研究国内宣传问题。胡耀邦提醒宣传报道头脑要冷静，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窝蜂地提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能认为只要标新立异就是新生事物，只要是新生事物一切都好，都要提倡和支持，但又不能直接面对问题去讲，需要引导的艺术。按照胡耀邦的说法，“要经常喊这样的口令：向正前方前进，不要喊向左转向右转，搞得糊里糊涂”。

4. 正确对待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问题。1978年12月31日，胡耀邦特别强调了如何对待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错误问题。他说，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对思想理论研究“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戴帽子”的“三不主义”。他说，有这样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这样说，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容易犯错误。这一条能否成立？搞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容易犯错误呢？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告诉我们的，事物发展中矛盾还未暴露清楚，现象和本质不完全相符。在本质没有完全暴露之前，我们思想认识上的变化性是很大的，所以对于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要特别注意应允许他们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动不

动就打棍子，不要动不动一下子就把人家的作品、创作砍掉。胡耀邦说，有的人抓住某个作品中的只言片语整人，说是影射了什么、暗示了什么，而不是从整个作品中看他的关键所在，对整个作品做出评价。我们党有一些恶棍，对作品横看竖看，不管如何，抓住一点就无限上纲。

对以上的讲话，当时我的感触非常深。显然，新闻宣传工作在意识形态工作的范畴之内，对发生的问题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包容。也许是多年来没有听过如此明确、如此善解人意的话了，也许是过去有过太多的感受，也许是因为过去因此而被严厉整过的人太多，总觉得讲话亲切而又合情合理，有一种被理解、被解放的喜悦和轻松之感。

5. 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负面评价宣传中要非常慎重。1978年3月10日胡耀邦强调，宣传报道中涉及毛主席的时候要非常谨慎，严格遵守三中全会的方针，毛主席是党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事业的根本保证。没有人不犯错误的，领袖也是人。毛主席代表了一个时代，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一个时代，也就否定了自己的历史。胡耀邦说，政策的改进切不可太快，不能超过可控制的范围，中国像一条大船，不能猛然转向，否则，是要翻船的。他说，有人说不对毛主席的错误公开讲，就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我不这么看。最大的唯物主义是什么？是安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把四个现代化搞上去，这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离开了这一点，把中心转移到别的地方去，都是不利的，都是危险的。

6. 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宣传不能操之过急。3月10日，胡耀邦说，没有澄清的过去的大是大非问题不一定那么着急，在中央没有调查清楚以前，公开议论也是不好的。有人说，不把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澄清，就还有精神枷锁，我不赞成这个论点。

7. 关于宣传报道中如何对待表扬与批评的问题。3月10日，胡耀邦说，报纸上没有表扬、批评算什么报纸？算什么新闻？毛主席在

世时经常告诫我们，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表扬什么批评什么，这是新闻工作每天都不可缺少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表扬、批评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明确这样一个目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嘛，要力争经得起客观的、历史的检验，这是可以做到的。要认真核实，从本单位、本人开始核对，核对不清楚，不要急急忙忙，宁愿慢一点。列宁遗言“宁愿少些，但要好些”。

8. “少宣传个人”。胡耀邦在 12 月 30 日讲到 14 个重要的具体问题时，突出强调了“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此问题将作为一个专题来讲）他说，三个月后如果发现哪个报纸、哪些党委再搞这些不像话的东西，就不能马虎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了。突出宣传个人，讲得轻一点是低级趣味；讲得重一点，是反马克思主义，别有用心。

1979 年元旦过后，中宣部连续 4 天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总结“文革”中的教训，依据三中全会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提出大大减少关于领袖的作品，文艺宣传中不得超过整个文艺节目的 40%。要用好《国际歌》和《东方红》，不要把《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与之并列，华主席说过这样下去不好。

9. 文艺要实行双百方针。12 月 30 日，胡耀邦提出，从明年开始抓繁荣文艺。宣传战线要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促进派。不要层层审，这里砍一块，那里砍一块，自己的创作自己负责，反党反社会主义也不是谁说了算，不能说没有，很少很少，我们要非常警惕不要让“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恶霸作风来影响我们。几天后，1979 年元旦刚过，中宣部连续 4 天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落实“双百方针”，领导人的讲话中指出，使文艺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主要解决创作题材和宣传比例问题。文艺应当提高艺术性，丰富多彩、生动形象，突出形象思维，不要只是逻辑思维；要敢于提倡和创作抒情歌曲，提倡创作健康向上的作品。

10. 宣传报道的学风与文风问题。3月21日胡耀邦说，文章要像向水里丢石头，不论大小，都要引起波澜。一般化的文章没人看，空洞的文章没人看，脱离实际的文章没人看，长篇大论的文章没人看，教训人的文章没人看。他说，宣传上不要扣帽子，分什么“凡是派”、“务实派”。

据笔者的记忆，那时新闻战线思想非常活跃，不仅探讨宣传报道如何实现转折，还积极酝酿宣传报道的改革。如，3月8日中宣部在京西宾馆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有发言者提出，党报代表党和人民，党报如果违背了党的正确路线，究竟是否代表党和人民？遇到这种情况如何防止或制止？有的报道或文章是党的决议、集体决定还是个人意见，如何辨别？党报能否提出意见或延缓、扣押某些稿件，提请再讨论，还是一切必须服从？

如，有人提出，党报与其他报纸和媒体是否有所分工？在统一的原则下，能否登载与其办报方针、读者对象有关的内容，以便突出自己的特点，避免雷同、千报一面；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是否有所分工？为扩大信息量，中央与地方是否应该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整体。中央电台为增加报道量，扩大报道面，办出特色，决定由《新闻报摘》和《全国联播》早、晚两大重点新闻节目的内容各自安排，尽量不重复，早晨以综合介绍首都各媒体的重点和特色报道为主，晚上以中央电台驻各地记者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台的重点报道为主，突出广播音响特色，加强自主安排和自主报道。

1978年年底，《人民日报》社等8家新闻媒体向财政部提出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方针被批准；1979年1月，经上海广播局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上海电视台成立了广告业务科，并很

快播出了中国第一条电视广告。<sup>①</sup>1980年年初中央电台开始播出广告。新闻媒体由完全靠国家财政支持，转向增强自身的发展能力，出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

### “少宣传个人”与“不宣传个人”

如何宣传个人，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党的一项重要原则。我党历来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史观，不突出个人，不搞个人崇拜，并为此做出过决定。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曾经做出六条规定：不给领导人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做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等。这一规定由毛主席提议，形成决议，多年来严格遵守。但后来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一些苗头逐步显现，20世纪50年代逐步打破了这一决定，尤其在毛主席“需要有点个人崇拜”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政治阴谋家便投其所好。“文革”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趁机掀起了狂热的造神运动，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尽管毛主席洞察到了他们的政治阴谋，竭力倡导历史唯物主义，但已经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现在提出“少宣传个人”这个问题，是因为粉碎“四人帮”后，对领导人继续沿用了毛主席生前的提法和做法。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中央政治局会议推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随即出现了“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提法；24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粉碎“四人帮”胜利大会，各报刊登毛主席标准像，25日刊登华主席标准像。在粉碎“四人帮”初期的特殊情况下，华国锋集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于一身，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随后，在宣传报道上以及各个方面出现了大量对华国锋的颂扬、崇拜之词与活动，如逢年

<sup>①</sup> 中华新闻报，2009年1月7日

过节，并列悬挂、报刊登载毛主席与华主席的标准像（1978年10月，有人提出逢年过节登载标准像值得考虑。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得到确认），凡提到华主席冠以“英明领袖”，改写《交城》之歌，演唱、广播歌颂华主席的歌曲，到处请华主席题词等。（1977年国庆期间，有人提议播出《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中央宣传口以“词不成熟”为由，不同意播出，“也没有必要成为歌颂华主席的代表歌曲”。）

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并非没有觉察，但容易理解为是历史的惯性延续，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我记得，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的一次学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时，针对当时出现的问题，中央广播局局长张香山说，在具体宣传的把握上，宣传华主席、领袖、党的接班人，态度要坚定、鲜明，不要犹豫和动摇，但又要恰如其分，不是不适当夸张渲染，而是要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正确表达新主席、新领袖的形象。现在把用到毛主席身上的一些歌颂、赞扬的话，都用到华主席身上了，是否合适？更不要用过去毛主席反对过的话，如“敬授”、“敬印”、“敬挂”华主席像等，要表达真挚的感情。不急于都改，要慢慢来。当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办公厅主任的乔石（粉碎“四人帮”时随耿飚一起进驻广播局）说：“要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来宣传。新闻宣传要帮忙，不要添乱。”

1976年11月12日，中央宣传口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当时分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人在会上的讲话中说，现在宣传华主席是形势的需要，但在宣传华主席的实践中，已经发现有大树特树的情况，树立绝对权威，权威不是树起来的，是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有些话讲过头了，把华主席与毛主席同等宣传，如河南一篇通讯讲，“毛主席领导我们消灭了水害、蝗灾，华主席领导我们消灭了王张江姚，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华主席的恩情深”；如“要像忠于毛主席那样忠于华主席”，说过头了，要很好地注意分寸。如果不

注意，不但不能起到好的作用，反而会帮倒忙。“四人帮”和林彪搞的那一套，我们要去掉，如最最最核心的核心，如果还是那样宣传华主席，人民群众就会反感，就起不到好作用，我们要让群众更信服和接受我们的宣传，我们要把毛主席提倡的文风恢复起来。

显然，当时的认识还没有提高到党的政治原则上来。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突出宣传个人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在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委员们又提出这一问题，三中全会公报的第五部分在强调“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这一部分中，明确写入“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叫‘指示’。”“少宣传个人”又一次列入党的决议，要全党必须遵照执行。

三中全会后，12月30日胡耀邦在谈到宣传上几个重要的具体问题时，突出强调了“少宣传个人”的问题，而且提到宣传方针的高度。他说，要坚决执行华主席在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这是我们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是个普遍问题，不是个可讲可不讲、可注意可不注意的问题，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他说，突出宣传个人是从哪里开始的？（20世纪）30年代以前，国际共产主义这种现象很少，开始泛滥我看是赫鲁晓夫搞起来的，他们一伙的调子最高。加里宁有本书《论共产主义教育》，那时对斯大林提得很少，主要提阶级和党。突出宣传个人，我们党30年代、40年代不多。解放后发展是60年代，是林彪、“四人帮”搞的，康生是一个，还有陈伯达，一直发展到宣传一个先进地区、先进单位也是宣传一个

人，宣传一个县也是县委书记，一层一层地宣传个人。有的同志讲得好，这是制造个人迷信，是反马克思主义。不是说个人没有作为，但对群众和阶级来说，制造迷信可使党变质。我们党的野心家就是要制造个人迷信，好去搞阴谋。胡耀邦说，突出个人从理论上讲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当然，我们也不抹杀个人的作用。他说，不要处处宣传个人，要宣传党和人民。宣传老一辈革命家，我认为主要是指去世的，但也不要多宣传。这涉及报刊、新闻、广播、电影、歌曲、小说等，涉及我们各级干部，什么非常热烈呀、欢呼呀，什么“中央首长”呀、“亲切教导”呀，……这是干什么！要坚决实行华主席宣布的“少宣传个人”的方针。三个月后如果发现哪个报纸、哪些党委再搞这些不像话的东西，就不能马虎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了。突出宣传个人，讲得轻一点是低级趣味；讲得重一点，是反马克思主义，别有用心。

现在提出“少宣传个人”，并列入中央的文件和全会的决议，无疑是正确的，但给具体的宣传报道出了一道难题。从表层来说，“少宣传”首先的界限不是不宣传，是在可宣传的范围内掌握数量的问题，多少是多，多少是少？少到一个什么程度？对于中央电台来说，不仅要把握好新闻报道，而且有大量的文艺节目如何掌控？就深层而言，有个质的问题，哪些能宣传，哪些不能宣传，掌握到一个什么口径和度才是适当的？这些具体问题，都体现着如何贯彻执行“少宣传个人的方针”。在难以自行掌握的情况下，新闻宣传单位时常采取“等着中央定”，或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不宣传”。也许是因为“少宣传个人”的界限没有硬性指标，一些领导人难以吸取教训，依然到处在突出个人。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况，涉及某些事件或政治的人物也在宣传报道中禁止刊播他们的言论、照片、图片和影片等，禁止宣传。

谈到这里，时常产生某些联想。

——从“崇拜神化”个人、突出宣传个人，到“少宣传个人”，再到“禁

止宣传个人”，似乎集中说的是“宣传”中的问题；人们也常批评新闻界对此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没起好作用；而新闻界却抱怨是来自上级、领导和群众的压力，抱怨提倡“少宣传个人”但界限不明确，没有具体硬性规定，难以准确把握。尽管如此，彼此心中都清楚，其根源并不在新闻宣传本身。

——从“崇拜神化”个人、突出宣传个人，到“少宣传个人”，再到“禁止宣传个人”，已反复过多次，有过多沉痛的教训，但总是屡禁不止。今后，这种“神化运动”也许不会出现，但“突出个人”会绵延不绝。一些人、特别是某些领导人一旦大权在握，总不适当当地夸大个人的作用，凌驾于群众之上，重复着过去，整个颠倒了领导与民众的“鱼水”关系，这是产生问题的根本所在。媒体又总是自觉与不自觉地（经常是不得不这样做）为此造势。一旦出事，虽然不乏强制性的“禁止刊播”，但并没有认真地查找根源。其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存在着滋生“个人崇拜”的土壤，需要从历史、文化、思想、理论上去查找。

——就“禁止刊播”而言，历史上一律被禁止刊播的人和事，其实属于两类不同矛盾性质、不同类型的问题，依据历史唯物史观和实际情况，是否应该区别对待？对历史表现与现实问题是否应该区别对待？对是非功过是否应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突出个人会造成危害，不恰当地否定个人也会造成危害，因为这些人和事不仅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历史的。采取彻底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评判其功过是非，不因人废事，不因人废言，不因人废史，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既是尊重个人，也是尊重历史，尊重人民群众。

——由此推及到对党事、国事中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是非功过的评价。坚持唯物史观，应该是把这些人和事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看其对社会的发展进步起了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由此分析评判其功过是非，而不是由主观意愿去评判，也不应该以社会发展的不同阶

段去苛求历史。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

——“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以来，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近代和现代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披露了以往严格保密、鲜为人知的客观事实，逐步改变了长期以来一边倒的历史评价，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对宣传报道和历史研究（尤其是文艺作品）的尺度逐步放宽，对以往禁止刊播的人和事已经有所松动，实事求是地评价其是非功过，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事实说明，人民群众并不赞成那种对在位者的“大力颂扬”、“个人崇拜”；也不赞成一旦出了问题就否定一切的“完全禁止刊播”，对个人、对群众、对历史负责，还是要实事求是。

### 胡耀邦戏谈“划圈儿”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领导人之间审批、传阅文件通行划圈儿，不写明自己的具体意见或看法，看不出明确的态度，一般认为是“看过”或表示“同意”，称之为“圈阅”。这种做法省事，但弊端很多。例如，如果是好事，他说“我是表示同意”，或说“我早就表示同意”；例如，一旦出事，追究起来，他可以说“我只是看过，并没有表示同意”，模棱两可，左右逢源；例如，一旦出事，责任所系，他甚至否认这个“圈”是自己划的，是秘书或者是什么人代划的，自己并不知情，推卸责任。“首长”委托秘书或他人代划圈儿，这种情况也的确屡见不鲜，笔者就曾经遇到过，为验明其真伪颇费周折，不得不验证这个圈的大小、走向和用笔的轻重是否符合“首长”的划圈习惯。当然，“圈阅”的危险性和严重性不只如此，这种做法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假传圣旨”。

对此，1978年12月30日，胡耀邦在向新闻界负责人谈宣传工

作时说：林彪、“四人帮”设置、强加在党和人民头上的枷锁还有哪些？开出一批清单来，一批一批地破。我们要搞彻底的唯物主义，打破顾虑。毛主席说了的、划了圈的就碰不得，有些骗子骗了毛主席嘛！10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骗了毛主席划圈，这是毛主席的错误吗？是骗子们的错。

对此，我们在长期的宣传工作中深有体会，也深受其害。在“四人帮”把持宣传的时期，他们经常下达或“传达”说“此件是毛主席划了圈的”、“此件已经毛主席圈阅同意”、“此件已经毛主席圈阅批准”等，借此贩卖他们的私货。谁如果提出异议，谁如果不坚决执行，都被上纲为“是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反对毛主席”。那时，有的听众时常给我来信质问：你们对“四人帮”的罪行怎么不抵制呢？因为他们在上层窃据要职，经常盗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我们不了解背后的真实情况，作为党的喉舌和国家电台，我们怎么能够凭借个人的理解与好恶而进行抵制呢？

胡耀邦说，由此，我们自己也要接受教训，我们当了官也要划圈。现在划圈很多，当了官就划圈，划圈就叫当官。前几天同乔木同志谈话，我插了那么几句笑话，一个人不会写字，只会划圈。说到这里，胡耀邦随口念了一首《圈儿诗》：

“相思欲寄从何寄，  
划个圈儿替。  
我密密划圈，  
你须知奴意。  
单圈儿是我，  
双圈儿是你；  
整圈儿是团圆，

破圈儿是别离；  
话在圈儿外，  
心在圈儿里；  
还有那说不尽的相思，  
一路圈儿圈到底。”

这首打油诗寓意深刻，出自何处，记录是否准确，我没有查证、核对清楚，只是依据当时的记录如实地转述如上。胡耀邦说，我们划圈要谨防上当，积几十年的经验，是有教训的。据我的记忆，上级曾经下达文件，要求领导们在审批文件、报告时，不只是划个圈，要写明自己的具体意见，是同意或不同意？哪些问题需要修改，对哪些问题有保留，都要具体而不是原则的表态。文件中还要求提出报告者，最好一份报告集中提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便于领导审批时表态。

我已离开工作岗位多年，不知现在如何？是否还是“一路圈儿圈到底”？

## 二 报道大邱庄纪事

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走农工商联合的路子，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异军突起，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下的新生事物，对农村乃至全国的改革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但它同时带有浓厚的农村旧意识旧传统的深深烙印。谈大邱庄就要谈禹作敏。这两重性，都集中表现在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董事长、党总支书记禹作敏身上，而且由于他的狭隘、刚愎自用，膨胀到目无法纪的地步而走向了反面，成了昙花一现的悲剧性历史人物。大邱庄的兴衰、禹作敏的覆灭，对我们回顾和研究农村改革初期的历史有着启迪意义。

### 大邱庄的改革之路

大邱庄是一个位于有名的团泊洼盐碱地上的穷村，从20世纪70年代，大邱庄党总支书记禹作敏就带领全村致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顺应改革的潮流，很快起步先后办起了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开关厂等乡镇企业，火了起来；不久便推倒了祖传的土坯茅草旧房，统一规划，盖起了一排排整齐的红砖瓦房，

全村 787 户、3103 口人全部住上了新房，与临近的村庄形成鲜明对照，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大邱庄一年一个样。1983 年大邱庄由单一的种粮大队演变成农副工商各业蓬勃发展的联合公司。禹作敏踌躇满志，雄心勃勃。

但是，对于大邱庄的奇迹变化，对于大邱庄改革所走的路子，上级某些领导人、机关和社会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大邱庄的改革从总体上体现和贯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坚持改革开放，使农村尽快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为我国农村改革起了鼓舞、推动作用；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农村改革就应该立足农村的优势，突出农村的特点，应该办养鸡、养牛、种菜、粮食加工等有自己优势的产业，而不是办什么炼铁、钢管等技术性和原料缺乏的工厂，这不是农村改革发展的方向。甚至有人质疑，大邱庄办工厂用的是大工厂的边角料，是钻了大工厂的空子，“以小挤大”，存在着剥削，上纲到这不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不值得提倡。对大邱庄发展的质疑和改革的认识，关系到农村改革应该走什么道路的争论，有关部门不断派出调查组去大邱庄调查，对此禹作敏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对大邱庄的改革发展，禹作敏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坚持第一种观点，认为他是从总体上、实质上，而不是从具体方式、方法上真正理解和贯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那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使农村尽快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管这是什么模式，实践证明符合大邱庄的实际情况。因为对于大邱庄改革的看法存有分歧，也就一直没有报道出去，不为外界所知。

### 中央电台与大邱庄

中央电台认识大邱庄是从 1984 年年初开始的。中央电台驻天津

记者站一直关注着大邱庄的发展变化。1984年春节过后，记者站向中央电台的领导集体做了详细汇报。为慎重起见，台领导让记者站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大邱庄进行了挨户调查，得出了肯定的结论。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3月初，由台长杨兆麟带队，台领导班子集体去大邱庄实地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大邱庄的工作不是十全十美，大邱庄的干部和群众也并不是完人，但大邱庄的典型意义在于，它符合三中全会精神，适应了改革的潮流，它的发展改变着中国农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邱庄是我国农村最早的改革典型之一，用典型推动改革，看得见，摸得着，容易学，有说服力。”当然中央电台也知道其中的分歧和风险。为报道好这一典型，台长杨兆麟要台领导班子成员直接参与大邱庄的采访，撰写稿子，这在中央电台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最初的几篇稿件经过集体反复讨论修改，并决定在中央电台《新闻报摘》和《全国联播》两个重点新闻节目中播出，从3月7日开始，首播了《大邱庄办工业，促进农业稳定增长》的报道；几个月中以“大邱庄连续报道”为总题目进行多次报道，并不时地配发评论和调查报告。其中有台长杨兆麟写的《大邱庄一日》等三篇报道，副校长杨伟光与记者康平合写的《农村改革的带头人禹作敏》。在我和记者康树集合写的《要致富重人才》一篇中，反映了禹作敏的人才观和他所采取的引进人才的实际措施，其中讲到禹作敏“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他常说，光凭拼体力发展不了大事业。他认为，金银有价人无价，要致富就要重视人才”。随后，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农民日报等中央报刊都接连报道了大邱庄。这些报道把大邱庄推向了全国，形成了轰动效应，到大邱庄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从此以后，中央电台与大邱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把大邱庄作为农村改革的重要典型，经常报道它的新进展和举措。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央电台播出有关大邱庄的新闻报道、文章和言论30篇，全面推介了

大邱庄。中央电台还在中午广播的黄金时间，在听众喜爱的《长篇小说连播》中连续播出河北作家写的大邱庄的报告文学，突出了禹作敏的创业过程，意在推动农村改革，为大邱庄造足了舆论。大邱庄成为全国农村改革的先进典型，禹作敏成为全国瞩目的改革新闻人物。这期间，乡镇企业成为农村改革的新生事物在全国“异军突起”，1985年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倪志福和市长李瑞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等到大邱庄视察。1986年夏，由中央电台联合中央新闻单位评选出“全国十大农民乡镇企业家”，禹作敏与鲁冠球、常宗琳、区鉴泉、李桂莲、武吉龙、周作亮等一起脱颖而出，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们。不久，禹作敏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劳动模范。

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大邱庄走的是一条发展工业促农业，促农业保工业，农副工商综合发展的路子”。（禹作敏语）从1978年至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生产快速发展，不断扩展；农业由专业队承包，率先实行了滴灌和机械化作业，几个人完成了过去全村农业生产的任务。到1983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160万元提高到3002万元，五年翻了四番多；1991年大邱庄工农业总产值18亿元，比1978年增长1300倍，公共积累达到4.8亿元。大邱庄的变化是事实。在禹作敏走上法庭前的1992年，大邱庄的总资产达到38亿元。我曾经对这个天文数字产生过怀疑，但据后来调查核实，此数字是真实的。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年鉴，把大邱庄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列为连年稳居全国农村第一位的“首富村”，走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前头。

### 禹作敏其人其事

从中央电台第一天广播大邱庄起，社会上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反

应，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我们知道，在倪志福之后的天津市委的主要领导人中就有不同的看法，并由此影响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对大邱庄的不同评价、不同态度。1985年春，天津市委曾经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给中央写报告，阐述对大邱庄改革和对禹作敏的意见，并对中央电台报道大邱庄提出批评，致使中央电台不得不向中央写报告陈述理由。中央和天津新闻界对大邱庄也有不同的看法，如天津主要新闻媒体对大邱庄的报道，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坚持以正面报道大邱庄为主；另一种坚持做负面报道。中央电台报道大邱庄的立足点，是认为改革前无古人，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要看大邱庄的主流，存在某些问题是改革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正常现象，典型不可能十全十美，改革的带头人也不可能完美无缺。邓小平说，改革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开始的典型更不可能是成熟的，它的难能可贵就在于敢于“吃螃蟹”。农村的改革比城市要困难得多，也重要得多，更需要有推动力，大邱庄这样的典型也就更加珍贵。

提起大邱庄不能离开禹作敏，他是大邱庄改革的带头人。对大邱庄改革的争论，除了对农村改革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有不同的认识，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禹作敏身上。禹作敏有头脑有能力，对大邱庄的改革有许多独到的做法和见解，什么“改革就是改掉旧的，革掉‘左’的，树起新的，立起正的”；什么“打破大锅饭，划分作业组”，后来又“取消作业组，改为专业队”；什么“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到人，落实到心，盐碱地里出黄金”。禹作敏谈得最多的是人才和教育。他说：“金银有价人才无价，一个人才一条线，一个有才能的人包一片”；“人才一大片，就怕看不见；人才到处有，就怕没人给做主”；几种人不能用：“能溜会拍的，光说不干的；走新路子不沾边，改革创新是门外汉的；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没有个人观点，哪边风硬哪边靠的”。他为培养人才兴教育，奖励考学，在大邱庄办起天津理工学院大邱庄分部，招纳入

才，兴建人才楼等。如一个大邱庄的印刷厂竟能承印中、英、法、日、俄五种文字，承接北京、天津等 30 多种科技刊物的印刷任务，靠的是招募外来外语和印刷人才。为大邱庄农工商的发展，禹作敏采取了许多实际的措施，责任制、奖励分配制度等，在当时都有启发意义。

但禹作敏有许多的旧意识和很强的个性等突出的弱点，这也正是我们要报道大邱庄时最感到忧虑的问题。在中央电台还没有注意到大邱庄以前，天津有的媒体已经对禹作敏有了看法。据说，禹作敏一次在天津住医院期间，大邱庄不断给他送海鲜和大中华香烟，与同住一室病友的伙食形成鲜明的对比，天津某大报记者看到这种情况后写了一篇文章，把禹作敏比喻为“土皇帝”。对此，禹作敏一直耿耿于怀，他做出强烈反应：“农民怎么了？农民就不能吃好的、吸高级烟？”这成了他以后难解的心结。禹作敏身上一直存有一种过去农民中不健康的意识，自卑与自傲并存，听不得不同意见，感情用事。如大邱庄刚开始富裕，他要各厂的干部和村民都做西装，上班穿工服，下班穿西装，这本来是个新鲜事，但他却解释为“要改变对农民的传统看法，农民为什么不能穿西装”？据我了解，他带领厂长到北京参加活动，在饭店打扑克大声喧哗，服务员提醒他们小声点；他们住高级宾馆吃西瓜，瓜汤流到地毯上，服务员提醒他们注意，他都认为这是对农民的歧视，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如果说这是生活细节，但扩展开来就是大事。当中央清理和限制高级轿车时，他趁机买下六七辆高级奔驰轿车，他和所属每个厂长各一辆，每逢进京一连串七辆奔驰呼啸而过，非常扎眼。我曾经提醒他注意影响，别让人感到“你在示威”。他却说：“干部坐车有规定，农民没有规定，谁说农民不能坐高级轿车！”这些都反映出他的某些局限性和内在狭隘的复杂心理状态。

改革前后，有些领导人对大邱庄和对他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事，但他竭力维护自己，容不得半点批评，并上升为对某些领导和

领导机关的对立情绪，甚至拧着劲、对着干，与领导和周围关系紧张。如，从大邱庄到静海的公路常年坑坑洼洼没人修，静海认为主要是因为大邱庄大量的货车运输轧坏的；而禹作敏对静海县委有看法，他就只管把大邱庄范围内的公路段修好。对禹作敏存在的问题，中央电台曾经多次对他进行规劝，开始他还能听得进去，有所收敛。当中央电台第一次播出大邱庄的报道时，禹作敏以这一天为标志，把大邱庄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解放路”，我们制止了他。1985年7月以后，我担任了中央电台台长，在与大邱庄不断打交道中，我们明显地觉察到，随着大邱庄经济实力和知名度的增加，禹作敏身上所固有的缺点和潜意识迅速膨胀，急剧放大。他的架子见长，中央部门有的部长到大邱庄参观，他很少出面；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大，有的记者说他可以当农业部部长，禹作敏放言，他要当就当国务院副总理，而不是当部长；大邱庄的工厂、街道、学校等到处张贴着他的语录；人家说他是“土皇帝”，他就专门对着干，以“土皇帝”自居，模仿用红墙黄瓦，为自己的住宅建起高大的院墙。禹作敏是大邱庄党总支书记，带领大邱庄致富是一种责任，后来他把大邱庄企业当作了自己的私有企业，把大邱庄当作家族的领地，独断专行，听不得对他、对大邱庄半点不同的意见。对此种种，我们曾经在许多场合（有时候专门去他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驻地远望楼、京丰宾馆或大邱庄等）善意地向他提出规劝，其意是在维护大邱庄和他个人的典型形象，也是在维护中央电台的形象，但他却听不进去。对此种种，中央机关和媒体的一些领导也多次提醒他，他甚至产生某些抵触情绪。

从1986年以后，中央电台对大邱庄的报道逐步减少。客观原因是大邱庄已经出名，可报道的方面不那么多了；主观原因是对禹作敏有了更多的看法，开始“保持一定的距离”。据我的记忆，1992年10月大邱庄兴建一条香港商业街，这是中央电台对大邱庄的最后一次报道。

## 薄一波、胡乔木批评“一切向钱看”

1984年年初，禹作敏总结自己的体会，提出了“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用来阐述“前”与“钱”的关系。他要求大邱庄各工厂都把这句话写成大字标语，贴在厂门口。当时正在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禹作敏的这几句话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被当作了“一切向钱看”的典型。对此，禹作敏有自己的解释。他在8月份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外边来的一些人劝我改一下，叫‘抬头向前看，低头抓经济效益’。我不同意改，经济效益是什么，不就是钱吗？为什么怕提钱呢？”“我们向钱看，指的是经济效益，不是一切向钱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为了实现党的奋斗目标。”

1986年12月27日下午，王震、薄一波、胡乔木、宋任穷、邓力群等中央“五老”一起在中南海会见评书艺术家袁阔成。这次会见的对象和意图是明确的，对袁阔成和他说的《评书三国演义》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在谈话告一段落后，“五老”的话锋一转指向了大邱庄禹作敏。“五老”抓住禹作敏“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进行了批评。薄一波发言中，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着重批评了社会上只是赚钱重利不讲理想、崇洋媚外否定中国传统的思潮。他说，有人说“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而且作为主要理论登出来（指《经济日报》），报纸、广播不要这样做。钱的问题影响可大了，怎么一下子就不讲理想了呢？他赞赏袁阔成把《评书三国演义》的播讲费交了党费。他说：“我的老乡关云长对钱就不大喜欢，上马金，下马银，他不在乎。现在就不一样了。”

当时听得出，“五老”绝不是临场发挥，而是有备而来。胡乔木谈到袁阔成和中央电台的同志把《三国演义》搬上了广播，值得学习，

他对此表示敬意。他说：当前“文化艺术界有一些人就是一切向钱看，说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种荒谬的理论和行为与这件事（播出《评书三国演义》），是一个鲜明的对照”。胡乔木对禹作敏的这四句话做了具体分析。他说，这四句话把原则、目标弄混乱了，合理的收入不叫“向钱看”，可能是词意表达不当。“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在表达合理的、正常的意思时说错了话，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胡乔木引申说：“但容易被自称为理论家的人引到人际关系中间，或引导到政治生活中间，也成为商品关系。”

禹作敏对此提醒和批评，不以为然。

### 禹作敏的悲剧

对于大邱庄和禹作敏现象，我曾经与有些人探讨过。有人告诉我：“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也是这样，一些资本家突然暴富，钱来得很容易，个人素质又不高，有的挥霍无度，有的飞扬跋扈，后来随着素质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情况就变了。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阶段，以后会好的。”尽管中央电台对禹作敏有看法，但是我们总是看到和肯定他改革的主流，总是对他的未来抱有希望。

非常不幸的是，禹作敏居功自傲、刚愎自用，竟然发展到目无法纪的地步，私设审讯，接连发生殴打人致死的严重事件。1992年12月13日，大邱庄发生了殴打人致死的刑事案件，禹作敏竭力包庇、藏匿罪犯，设法帮助罪犯潜逃，阻止执法办案，最后发展到完全无视法律与警察武装对抗，走上了违法的道路。1993年2月18日，天津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道路，禹作敏命令全村民众与武警对峙。就在这天的凌晨三四点钟，他急匆匆地打电话给我，希望中央电台赶紧派记者去采访报道，制造舆论，为他解围。对当时的情况，我事先一无

所知，我非常吃惊！对禹作敏的要求我拒绝了。我在电话里说，这件事很严重，已经不是一般的的是非问题，法律是神圣的，在法律上没有特殊的公民，我规劝他不要激化矛盾，不要玩火，实事求是地帮助把问题弄清楚。他当然不会听进去，愤愤地挂了电话。

1993年4月21日，禹作敏被逮捕。内部传达精神：对禹作敏案情的宣传报道严格控制，低调处理，不透露内部情况，防止被人用来诋毁改革。审案结案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对大邱庄坚持正常生产等，由天津媒体报道。从此，中央电台再也没有自行采访报道过大邱庄，其他媒体也很少报道，大邱庄逐步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以下是大家所熟知的情况：1993年4月15日，禹作敏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拘留，21日被逮捕；7月13日、8月14日，检察院就刘玉田、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对案件进行了审理，8月27日天津法院对8名被告进行审理和判决，禹作敏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99年10月，禹作敏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结束了一生。

一个兴起不久的“农民企业家、改革家”的显赫人物成为阶下囚，在中国引起不小的社会震动，引起人们的种种反思。禹作敏对党和群众有很深的感情，他多次说“要坚定不移地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要“听中央的话，走群众路线，用有才之人，行改革之路”；他积极响应和实行农村改革，带领大邱庄致富，在短短几年中使一个贫困的盐碱涝洼的大邱庄成为全国农村第一位的“首富村”（禹作敏要把大邱庄建成“天下第一村”）；大邱庄走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前头，闪现过光芒，开阔了农民的视野，对我国农村的初期改革曾经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但是，禹作敏走出了农村改革重要的第一步，却没有能够继续往前走，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悲剧的发生可以从中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因素去寻找，但更多地应该从他的主观意识中去寻

找。他不能正确地看待和要求自己，心胸狭隘，居功自傲，刚愎自用，恶性膨胀到超然于党和群众之上、法律之外。禹作敏并非不能认识自己，但他不能去改，他生前曾经多次流露过今后未必有好的结局，但发展中触犯到法律却是必然中的偶然。

### 三 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曲折发展

——中外关系与舆论宣传

#### 中南关系由政治判断向国家利益的转变

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位于历史上事故多发区巴尔干半岛的中部。我国与南斯拉夫于 1955 年建交，但历史上南斯拉夫在中国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一直不好，南斯拉夫是个什么性质的国家，本来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在那个多管闲事又较真的年代，我们偏偏很有兴味地对它说三道四，弄得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据历史记载，“二战”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不听从斯大林的指挥，坚持按照自己的国情走社会主义道路。受斯大林的影响，我们党从 1948 年就批判南斯拉夫，1958 年 5 月 5 日，《人民日报》社论把南共七大通过的纲领定性为“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后来，中国共产党在与苏联共产党长达几年的关于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中，写了许多批判文章，时常拿南斯拉夫做靶子来影射，指桑骂槐，严重地伤害了南斯拉夫。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从

1963年9月6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开始，到1964年7月14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为止，连续发表9篇评论文章（简称“九评”），第三评的题目直言不讳：《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依据我们的分析判断，文章认为，从“二战”后的1948年南共联盟就“开始变修”，背离共产主义原则“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骂铁托集团不仅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而且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共产主义的叛徒”。它的代表人物就是约瑟夫·布罗兹·铁托。这样的文章，再经过中央电台那气势磅礴、攻势凌厉的播音，给人留下了南斯拉夫是起着带头羊作用的第一个修正主义国家的印象，这一烙印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子里，到“文革”南斯拉夫更成为“反帝反修”的攻击目标，影响了几代人。

在长期的中南关系中，总的来说，南斯拉夫面对中国的攻击保持着比较克制、平静的心态，从1958年开始，我们写过40多篇文章批判南斯拉夫，他们的回击不多，并始终透着一种改善关系的愿望。直到1968年，中南关系才开始出现了解冻的迹象。1970年11月沉寂了多年的中国乒乓球队出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虽然外交部介绍情况时说“中南关系是一种很复杂的关系”，但终究开始了正式的交往。也就在这时，出现了我国观众争先恐后地观看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热潮（铁托是瓦尔特的原型），而且允许在中央电台反复播出该电影的录音剪辑（这是那时播出的少有的外国电影剪辑），生动形象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铁托艰难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急剧地改变了人们长期对南斯拉夫和铁托总统的负面看法，铁托的名字在我国叫响。现在看来，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允许播映《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是有意发出的一个信号，也是一种自我反省。“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当时我们对国际局势的总体认识是“大动荡，大分化，

大改组”。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南斯拉夫，我们已认识到过去的看法并不是客观的，南又一直同苏美有着很深的矛盾，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威胁，因此有改善南中关系的需要和余地。从斯大林时代开始，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一直处在紧张之中。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尤其是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事件后，苏又提出了“有限主权论”，这对南是一次大的警醒，感到了直接面临的威胁。南斯拉夫处于巴尔干半岛中部，地理位置重要，成为美苏争夺的要地，被称为欧洲的火药桶。中南之间改善关系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所以逐步靠拢走在一起。

中南关系的变化迹象说明，我们对国家关系的认识，由“文革”中推到极点的政治关系（以政治划线，支持和推动世界革命），开始向国家利益关系转变。经验反复提醒我们，政治关系是靠不住的，只有国家利益才是连接和调整国与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从此，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改变我国民众对南的形象，就被提上了我国外交和宣传舆论的日程。

20世纪70年代中南关系开始有明显改善，但这个进程是缓慢的。回顾当时的情况，在两国关系的交往中，南方更为积极，努力加强贸易往来，1970年南主动派来驻华大使，我国驻南大使曾涛也随即赴任，受到破格的礼遇，铁托会见时称曾涛为“同志”。国家关系主导着宣传舆论，南《政治报》派记者访华做客观报道，南媒体大大增加了对中国的正面报道，宣传毛主席著作，介绍毛泽东思想，并主动要求派广播电视记者来华采访。

#### 接待南电视摄影组的正确方针与极“左”表现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1970年7月，贝尔格莱德电视台编辑什切

基奇向我驻南使馆提出派 5 人电视小组访华，拍摄我经济、文化、教育、历史等几个专题片，并表示“保证最大限度地客观报道”，对我方言论和解释“准确翻译”，编好后送我审批才放映。8月19日，考虑到电视报道的影响力，客观上会更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影响，我方对此做出积极回应，只是因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在访问南斯拉夫，对尼克松的访问我们持反对态度，所以不宜在这个时候发出邀请而暂时搁置。1971年4月3日，在南外长特帕瓦茨即将访华前夕，我向南发出邀请，同意南电视摄影组“由 4 人于 4 月下旬自费来华采访，为期一个半月左右（实际是两个月）”，到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武汉、长沙、韶山等地采访。

南电视摄影组的成员都是精心选择的，领队是贝尔格莱德电视台著名评论员什切基奇，他曾是南驻联合国记者，是铁托总统的座上宾，在南很有影响力。他们为此行做了细致的准备，表示要客观地反映中国的情况，为发展中南人民的友谊做出贡献；选择题材应是反映中国发展中的一切积极方面；突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反映中国如何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自力更生，克服过去的重重困难发展自己的国家。

我方也很重视，我国外交部门对接待来访进行了认真分析和安排，在“文革”的政治环境中，提出对南要给予友好接待，对其拍摄要求，根据以我为主的原则和实际尽可能安排；他们要写报道，要多拍素材，是正常的；南是旅游国家，名胜古迹的片子各国都愿意要，我们要理解，提供条件（我们那时对旅游抱有错误的认识，认为是花花草草，游山玩水）；他们想了解中国，但他们了解很少，如“大跃进”、红卫兵，还有许多模糊认识，这是正常的，我们要耐心地做工作，通过他们的电视镜头帮助我们进行宣传。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外交部提出，“既然让去的地方就要让拍，他们怕陪同的人制造困难，他们会看陪同人员的脸色行事（要搞好陪同）；他们要正面报道中国，但总是外国记者，

他们要吸引观众，要猎奇，但并不是出于恶意（要理解他们的特点和需要）；与他们谈什么、拍什么，我们都要事先有准备，很好地安排，所拍摄胶片可允许带回冲洗”。如实地讲，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对外国记者的采访能有这样的见解和胸怀，实在是难能可贵，改革开放30年来，也没有完全做到。

南电视摄影组来华拍片的接待任务交给了中央广播局，广播局又指名让我担任接待组组长，另外有北京（中央）电视台一名陪同人员和北京电台（国际电台）两名塞尔维亚语翻译，4人组成接待小组。应该说，在整个陪同采访过程中是遵照方针执行的，但在最初的磨合期却不断发生碰撞，甚至出现过非常过火的极“左”行为。依据我驻南使馆的建议，摄影组4月中旬经香港自广东深圳入境，采访广交会后经长沙、韶山、武汉抵北京参加“五一”节采访，然后再到处地。

尽管接待方针非常明确开放，但是处在“文革”的极“左”氛围当中，我们接待组对整个国际局势和中南两国关系的认识并不清醒，多年形成的南斯拉夫印象没有扭转过来，抱着宁“左”勿右的思想，做出了一些过火行动。这些行动，从当时的整个思潮看并不过分，具有那时的典型性，今天看来令人无法接受。我把某些细节纪录下来，供今天一斑窥豹。

从一开始，我们对南斯拉夫就存有戒心，而摄影组领头的又是南斯拉夫电视台有名的评论员什切基奇，也就更增添了几分警惕。有了戒心，也就容易挑剔。在由深圳到广州的路上，他们看到我国南方优美的风光，什切基奇大发感慨地说：“真美，像是南斯拉夫！”

他说第一次，我没有在意，认为他是一位评论员，爱发评论，也是出于友好。他说第二次时，我有所警觉。他说第三次时，我认为他是“别有用心”，憋不住了。我不热不冷地说：“这是我们中国，怎么会跟你们南斯拉夫一样！”他愣一下，不吱声了。

在广州访问一所中学时，什切基奇摸着一女学生的头说：“我女儿也这么大了。你真像是我的女儿。”我听了不自在。在访问一座纺织厂时，他当着众多女工的面，脱光了膀子，比划着说“纺的布跟他的上衣差不多”。一些女工不敢正视。这时，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提高了声音说：“请你文明一点！”他疑惑地看了看我，赶紧穿上了上衣。

“他们怕陪同的人制造困难，他们会看陪同人员的脸色行事”，外交部早有预见。有了几次交锋，他们有所收敛。但是，我忘记了外交部事先告诫我们的话。“既然让去的地方就要让拍”。一天早晨，摄影组到一座公园好奇地拍摄人们的晨练。摄影师正要拍摄打太极拳的镜头，我的助手顺着摄像机看去，发现在人们背后的墙上有一条不合适的标语，可是已经来不及阻止了。他急中有失，伸手把镜头挡住了！什切基奇和摄影师暴跳如雷，嚷着“不拍了！不拍了”！我明知此事做得不妥，但又不能讲明原因，更不能向他们认错。仍然硬着头皮，把他们“教训”了一番！然后，我们自己关起门来总结教训。

在历时 50 多天的拍摄中，后来我们混熟了，相处得比较融洽。那段不愉快的过往已成为笑谈。20 年后的 1991 年，南斯拉夫原摄影组成员之一的卡桑诺维奇来华访问，老朋友相见，谈起往事，当年的回忆更成了难得的趣谈。

据后来了解，他们这次采访摄制的电视片，在南斯拉夫电视台连续播出，都是比较客观、比较好的，他们还把有的节目卖给西方电视台播放，让更多的人从中了解了中国。

### “我们批外国的事，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铁托总统来访与宣传报道

在毛主席生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就希望访华，由于种种原因未

能成行，成为憾事。1977年8月，铁托总统在访问苏联、朝鲜之后来华访问，8月10日我国政府发出了铁托总统即将来访的预告。

铁托总统8月31日到京，受到华国锋主席和首都10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原来确定华国锋、李先念到机场迎接；群众欢迎的规格不断提升，原来准备飞机场有2000人、钓鱼台有1000人夹道欢迎。后来觉得不妥，参照铁托总统行前的莫斯科是10万人欢迎，平壤是几十万人，我们不能太少。最后确定10万人，从东单起坐敞篷汽车，少先队员献花，天安门前5万人、钓鱼台5000人隆重热烈地欢迎，并增加文体表演。华国锋举行盛大宴会，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等出席。

关键的问题是会谈，中南之间一些重大问题如何表态，是否承认南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与南发展党的关系？以前，我们互相骂过，我们骂人家在先，伤了感情，断绝党的关系。1975年毛主席会见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时，让他转达对铁托的问候，称赞铁托“是铁”。毛主席还说，你们这个国家不错，你们这个党不错，我们和你们都是被骂出来的。这是个主动改善两党和两国关系的重要信号，引起南的重视。

对于铁托总统的来访，中央分析认为，南斯拉夫的独立是靠自己打出来的，他们从193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打游击战争，打过两次世界大战。铁托是南斯拉夫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英雄，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反帝反殖，不参加苏美两个集团，保持不结盟，在第三世界有影响，保持着独立自主的良好形象。开始南对毛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不理解，后来认识到与他所主张的不结盟没有冲突，表示不反对三个世界的划分。中央认为，铁托总统已经85岁，这样的高龄来访，对我们友好并有需求，我们对他也有需要，他们与我国关系最不好时仍然支持我们参加联合国，南的地位重要，可以相互发展贸易；铁托在第三世界有影响，有利于对付苏

联社会帝国主义，过去毛主席很重视。中央认为，以前我们互相骂过，我们不纠缠老账，过去的就过去了，今后的关系还是要开正门直接谈，这个正门要慢慢打开，先开一点，这次还不能完全解决，要给我们一个转弯的准备时间。但不走后门，也不走旁门。为此，中央做了具体细致的安排，第一天欢迎宴会时，我方讲话称“铁托总统阁下”；第二天会谈握手时说“我们欢迎铁托同志率领的代表团来访问”。如果头一天就称“同志”会“太突然”。想办法解释清楚，两国关系要发展，两党关系的发展需要时间。与铁托总统会谈，也不提“苏修”，他们犯忌，必要时提“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有领土和民族问题，一直关系紧张，阿骂我们接待铁托也没有关系。中央认为，我们党和民众对南斯拉夫的认识，也有个转弯的过程，我们要做好工作，热情接待。这个弯子能够转好，过去对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与日本外交关系正常化，都能转，这次也能转（据后来调查，由于长期形成的印象，国内外仍然有些人对南和铁托的认识一时转不过弯来）。铁托敬重毛泽东，他提出要瞻仰毛主席遗容，中央同意，让汪东兴陪同。

铁托总统来访有许多特殊性，中央对如何宣传报道非常重视，体现在，第一，要求扭转整个宣传报道和舆论氛围，正面介绍南斯拉夫的情况，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气氛；第二，要求隆重热烈，群众欢迎中央电台搞录音新闻，观看体育表演搞录音新闻；第三，中央特意批准中央电台播出南斯拉夫的9首歌曲，以形成气氛；第四，要求整个宣传报道严格掌握口径，注意提法和口径的变化，准确报道；第五，中南双方和世界舆论都很敏感，对外宣传更要注意，不要让国外记者和舆论抓住把柄。

这次对外宣传的效果如何？没有调查凭据，但后来有一件事提醒我们要非常注意相互关系的影响。在1978年华国锋主席访问南斯拉夫等东欧三国期间，9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中谈到，加强与

南斯拉夫的友好合作，对苏联霸权主义是个沉重打击。这句话引起了南方的顾忌，南斯拉夫主席团委员米尼奇对我驻南大使表示，不愿意同苏联的关系搞得太僵。对访问罗马尼亚的报道也有类似的问题，不宜提“联合起来对付苏联”这样的话。这对我们是个有益的提醒，我们的宣传要顾及他人的感受，不能不顾及分寸和策略。——这是后话。

对于这次铁托总统访问的评价，表态口径是：“华国锋主席与铁托总统进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广泛地交换了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双方都很满意。对第三世界和不结盟国家的团结反霸斗争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铁托总统访华后“中南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不久，中南两党两国关系迅速升级。1977年12月南斯拉夫国庆时，华国锋主席在贺电中以党的关系称铁托为主席，我国参加招待会的外交官也以党的身份出席，宣传中可以公开提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不久以后的南共十一大时完全恢复了党的关系，1978年9月华国锋主席访问南斯拉夫等东欧三国时，已经公开地与南斯拉夫会谈两党两国之间的事宜了。

中南关系的正常化，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历程。总结这一历史教训，各国各党情况不同，以后涉及他国内部情况，我们应少发表评论。毛主席说，我们批外国，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毛主席1968年3月29日关于对外宣传的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政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家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sup>①</sup>

---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43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 铁托生前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在铁托墓地的沉思

1984年1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逗留了10天。那是在中央广播局采访组访问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之后，要到贝尔格莱德乘中国民航回国。我们采访组一行三人提前3天到达那里等候，不巧的是飞机降落的那一天赶上了大雾，从苏黎世飞来的中国民航在机场上空绕了几圈，没有敢降落就飞了过去，因为要求出访要坐本国的飞机，我们只好由民航安排等一周后的下一班飞机。因为是路过南斯拉夫，没有采访任务，就有时间在贝尔格莱德游览。

在去南斯拉夫以前，早就听说南斯拉夫极其开放（这也是我们过去批判他“自由化”的主要理由之一），我的感受却不尽然。开始给我们的印象是宽松的。12月3日，我们从布达佩斯乘火车去贝尔格莱德，车上乘客不多，车厢宽敞、舒适，但不见乘务员。在即将进入南斯拉夫境内时，车停下来，车厢里出现一位年岁较大的查票员，他看了看我们的护照，从背包里拿出印章盖上了事，入境一关竟这么简便，我们感到新鲜。但是另外的两件事却给了我另一种感受。4日下午，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新城参观，多瑙河与萨瓦河交界的国际会议中心大厦雄伟奇特，吸引了我的视线，我便找到一个较远的角度拍全景。才举起照相机，一辆南斯拉夫安全全部的汽车停在了我的身旁，下来两个人，出示证件，要我把照相机交给他，他们看了看，不容分说就全部曝了光。我与他们语言不通，难以弄清原因。后来，我驻南使馆人员解释，可能是一次误会，因为我身后有一座桥梁，属于军事设施，他们误认为我在拍桥梁；另外，我用的是日本产照相机，他们可能误认为我是日本人。事有凑巧，第二天我在拍一座大楼时，有一位老者上来阻止，然后他叫来了警察，要没收我的照相机，警察认出了我是中国人而作罢。

后来使馆人员告诉我，那座大楼是南斯拉夫的国防部。他们开玩笑地说：“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两件事立即改变了我对南斯拉夫的印象，都是大街上的建筑却不允许拍照，那叫什么开放？警觉性那么高，更像是全民皆兵。可见，他们是多么热爱自己的祖国。

我们最想去瞻仰的是铁托墓。12月5日，我们去铁托墓地和铁托中心。墓地在离市中心不远的一面土坡上，周围很开阔，12月仍是一片绿色，整齐的草坪中间有通道、长椅，一派肃静气氛。一眼望去就看到了墓地的入口，在警卫人员的引领下，我们拾级而上，来到一座淡黄色的不大的平房，这就是闻名遐迩的铁托墓。铁托1892年5月25日生于现在的克罗地亚共和国库姆洛瓦茨市一个山村的农民家庭，1980年5月4日逝世，葬在了他生前的花房。我们按照箭头指引的方向行进，门口有两名持枪卫兵肃立，墓穴上方略呈拱形，光线通过玻璃照进来，柔和明亮。室内不远的白色大理石基面上，安放着一口白色大理石棺椁，上面写着“约瑟夫·布罗兹·铁托，1892—1980”。有四名卫兵持枪肃立。周围摆满了人们献的鲜花，有的写着：“铁托同志：南斯拉夫人民的儿子！”就在这里安眠着“二战”中抗击法西斯的英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元帅。我们怀着敬意肃立三鞠躬。

距离墓地不远，是铁托中心。这不是一处高大的建筑群，而是一幢一幢的低矮房屋，一个个展室分别展出铁托生前的战斗生涯和荣誉纪念品，有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送给他的纪念物、外国国家元首和贵宾赠送的礼品（其中有中国的木刻山水画、8幅屏风、大型贝雕和瓷器等）、铁托的办公、学习和生活用品（如打猎的枪、兽皮等），还有铁托的艺术收藏品等，琳琅满目，反映着铁托一生的各个方面。在他不大的办公桌上，放着办公用纸、文件夹、笔架、烟斗、烟灰缸、逝世当天的报纸、小型放音机，桌子上的日历停留在“1980年5月4日”。

铁托生于危难之时，一生波澜壮阔，打造了一个统一而繁荣的南斯拉夫。但是，我们那时候就知道，他一直不轻松，深深忧虑着南斯拉夫的未来，他太了解南斯拉夫，太了解这个国家所处的外部环境，他一直牵挂着南斯拉夫的统一，尽管他为此做出了切实的努力，但是他到死也难以瞑目。

果然，在我们瞻仰后不久，铁托生前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么快，南斯拉夫解体得竟如此彻底，这位大英雄的多处塑像被毁，还有人一直争论要把他的墓地迁移他处，瞻仰的人日渐稀少。（据报道，前些年被遗忘的铁托墓，近几年由于国家的分裂与痛苦，许多人又想起了他，鲜花又多了起来，可谁又说得准呢！）世事沧桑，世态炎凉，这一切，也许是他没有想到的。这是后话。写到这里，产生了许多联想和感慨，世态变化是政治的风向标，但历史不应该随风转来转去。后来我看到了张维写的《别了，南斯拉夫》<sup>①</sup>一文，张维是何许人，我并不了解，但对他的见解我有同感，他在流畅的行文中谈得非常深刻，有许多人不一定读到，我在此借用几段用来作为本章的结束语。

### 警钟长鸣

历史不会重演，却又在时时重演

——张维在文章中说，铁托总统逝世后，南斯拉夫失去了强有力权威人物，为体现平等，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实行了国家元首集体轮流的体制，无法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6个共和国各自为政。“南共长期的政治教育敌不过民粹主义者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西

<sup>①</sup> 此文发表于《天涯》2009年第3期，本文引用于《作家文摘》2009年5月22日。

方推动的‘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南斯拉夫整个知识界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话语，而这个话语的核心是一个天真的梦；只要采取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南斯拉夫面临的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南共联盟的地方党部也先后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话语，纷纷推出了一个比一个更为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斯洛文尼亚共盟于1989年3月首先提出了‘结束一党制，实行多党制’，之后整个政治局势演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联邦政府和南联盟的中央机构被完全架空。”

——“1990年7月，南联盟通过了《政治结社法》，正式实行多党制，一个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现了200多个政党，而赢得最多选票的都是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的政党，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1991年，从斯洛文尼亚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共和国宣布独立，脱离联邦，南斯拉夫‘内战’随即爆发。”这给长期虎视南斯拉夫和巴尔干的西方国家提供了插手的极好机会，德国第一个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随即美国和欧盟国家接踵而来。

——“当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在德国和西方的支持下获得独立后，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就像多米诺骨牌，一场接一场发生，最终导致了20多万人丧生，无数人致残，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创下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

——作者感言“德国也好，整个西方也好，很少顾及别人利益”，“国际政治中有多少正义？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利益”。作者设想：“如果中国某一天自己内乱了，最终导致台独、藏独、疆独势力泛滥的话，美国、德国、法国乃至整个西方都会出来承认，他们一定会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什么人权啊、民族自决权啊”给予支持而肢解中国。

张维的文章似乎揭示了一种政权演变的“规律”：国家的控制力减弱——西方价值观通过知识界乘虚而入——内部开始思想政治分

化——出现并实行多党制——各政党相互竞争攻击，出现内乱——外界从幕后插手到公开亮相支持某一派——政权更迭易帜或国家分裂。

后来，这一幕在许多国家不断上演！

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 四 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的前后

——苏联解体时的舆论斗争与我宣传应对策略

1989年以来，国际共运发生严重危机。4月至6月中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政治风波”平息不久，国内局势未稳，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共运又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东欧几个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接连发生急剧的变化，长期执政的领导人纷纷落马，看似稳固的共产党政权接连被推翻，一个个社会主义国家“易帜变色”。

这场风暴随后积聚于苏联，不到两年的时间，成立93年的苏联共产党被推翻，建立政权69年的苏联社会主义联盟解体，克里姆林宫红旗倒地，迅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和历史的轨迹，成为20世纪的重大事件，这也是我所经历的最重大、最复杂、全局性的国际局势的剧变。

国际政治密切联系着国内政治，局势瞬息万变，错综复杂，国际反共反华势力和反华舆论联袂合唱，国内人们的思想情绪动荡不安，我们的注意力既在国外更在国内，我们的宣传如何做到既反映国际又稳定国内局势，把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放在第一位？原则性、政策性和策略性极强，紧张而又必须准确、谨慎地把握，完全是一种新的严

峻的考验。这段长达两年多不可忘记的历史，从国际政治和新闻传播学的角度，都极具研究价值。

### “新思维”与政治体制改革

苏联曾经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但这并没有挽救这个庞然大物顷刻解体的厄运。苏联的解体是他长期推行错误内外政策的结果，对内脱离人民，对外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内外矛盾积聚。苏联的演变始于赫鲁晓夫，而恶化于戈尔巴乔夫。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石破天惊地揭露了斯大林、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开始动摇了苏联人民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原有信念。后来苏共几任领导沿着这条路子继续走下去。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了苏共总书记，他雄心勃勃，大力倡导要改革过去的弊端，随即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方案，但改革遇到了强大的阻力。1988年6月苏共来了个急转弯，把改革的重点由经济体制转移到政治体制，但他实行的错误改革措施，致使苏联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一下子总爆发，把苏联引向了灭亡之路。

1987年11月出版了戈尔巴乔夫撰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以下简称《新思维》)一书，作为支撑他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新思维》提出“苏共中央在开始改革的时候，依靠两种强大的现实力量——各级党委和大众信息手段”。在这里，把舆论信息摆在了与党的领导同样重要的位置，当成推动改革的强大推动力。经济改革遇到阻力以后，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旧制度和旧势力，他的注意力更转向了政治，他号召群众公开揭露苏共的阴暗面，向“保守势力”开火。过去苏共对新闻媒体和言论的控制极其严格，只讲正面，歌功颂德，听不得任何不同的意见。20世纪70年代，一位美国记者这样评论莫斯科

电台：“由于它有明显的倾向性，它的新闻一般限于直接宣传价值的内容，它还经常用严峻和讥讽的口吻对待苏联的对手，而报道苏联的活动时却往往极尽美化之能事，因而使听众对它的高度倾向性和说教大为失望。”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反苏联舆论的传统，大力倡导“反对保守势力”，在政治和舆论上推行“民主化”、“多元化”和“公开性”，要“多一些公开之光”，“力求在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大的公开性”。自十月革命胜利，苏共长期执政，经历过不同的历史阶段，积聚了种种重大失误和严重错误以及各种社会问题，而又没有及时公开披露和总结纠正。在“新思维”推动下，媒体舆论又忽然倒向了另一面。我们希望新闻报道放开，要求放开，但不是这样的放开。这种放弃领导、不顾现实承受情况的突然全面“公开”，新闻媒体如脱缰之马，失去了控制，苏共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成为集中攻击的目标，各种媒体争先恐后一边倒地爆料阴暗面，揭露不为人知的黑暗内幕，各种问题一下子铺天盖地地暴露出来；许多媒体甚至哗众取宠，捕风捉影，伪造事实，骇人听闻。大量惊人的事例描绘着苏共黑暗、残暴的形象，严重地动摇着苏联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基础。“新思维”影响之广之大，成为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改革的代名词，曾经赢得内外学者高度评价。对此，西方政要更加清楚，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新思维”受到美国总统布什等西方政界和舆论的大力褒扬。

1989年12月初苏联公布了新闻法草案，提出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办媒体。各种媒体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攻击谁就攻击谁；各种政治思潮蜂拥而出，形成了各种政治派别和政党，他们拥有自己的媒体，代表和反映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制造舆论，攻击苏共，号召群众集会与游行；西方舆论推波助澜。在“民主”、“公开”的旗帜下，苏共的话甚至禁令再也没有人听。新闻舆论搞乱了理

论，搞乱了思想，思想理论变为组织行动，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开展反对苏共和苏联的“街头政治”。

有关分析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公开性”的文章数不胜数。下面这篇文章有一定的代表性。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在《苏联不稳定的根源》一文中，对一个超级大国在短短几年内分崩离析的分析说：“戈尔巴乔夫选择的这条改革路是对党加以控制，通过公开性揭露党的缺点。但是公开性很快就失控，使苏联的统治作为一个整体的合法性威信扫地。”文章还说：过去苏联的稳定“党用一种声音讲话是一种信条，然而，在公开性的影响下，这种一致性很快就不复存在”（《参考消息》1991年10月4日）。新闻舆论对引发思想和社会动乱、催生各种政治派别，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 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苏联的解体，迅速波及东欧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小国和政党本来就十分脆弱，它们无法抵挡这股来势汹涌的浪潮，纷纷遭遇灭顶之灾。东欧六国的剧变有它们自己的原因，但主要源自苏联，因为它们与苏联有着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缘，这时候戈尔巴乔夫又放手不管。首先是波兰从1980年团结工会成立到夺权，然后是匈牙利共产党在多党选举中失去了执政地位，开创了两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被反对派夺取政权的先例，并停止了党的活动。1989年8月波兰出现第一位天主教徒的团结工会成员的总理马佐维耶茨基，他宣扬“马克思死了，而基督还活着”。他看到了新闻媒体起的作用，他说：“在当代条件下，在政府与公民关系之间，大众传播媒介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广播和电视。它们今天应该具有多元化的性质。从垄断制度到多元，我认为在这一领域是

不可少的。”

继波兰、匈牙利之后，民主德国经营多年的柏林墙于 1989 年 11 月 9 日顷刻轰然倒塌，东欧接连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维持了 40 多年的社会主义政权顷刻变色，有的演变成社会动乱和暴力流血，最为激烈的是罗马尼亚。1989 年 12 月 22 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家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捕，未经公开正式审判，旋即在 25 日被执行枪决。这是齐奥塞斯库生前绝没有想到的，世界为之震惊。

东欧六国的演变过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概括为“五步曲”：一、最初以推动改革之名，提倡舆论的“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新闻舆论转向负面报道，矛头自然对着执政党，争先恐后揭露执政党与社会制度的弊端；二、直接结果首先是引起思想的混乱，动摇人们的传统信念和思想理论基础，进而提出思想多元化，最后演变为政治多元化；三、由此出现并形成不同政治派别（多以“激进”面目出现），演变为各种政党组织，进而提出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修改党章、宪法，使之合法化；四、共产党沦为议会党，进而为在野党（有的被取缔）；五、改变旗帜，原执政党下野，甚至被清算。

以上演变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各政治力量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反对派最善于利用时机，内外互动，精心策划，煽动民众进行“街头政治”，向执政者施压，迫使矛盾激化、执政党退让、交权，反对派最后达到夺权之目的。其间，西方反对势力通过长期的舆论鼓动和各种形式的幕后“支持”，进行着演变。不难看出，整个过程中都是新闻舆论（引发社会舆论）为先导、为推动力，包括偌大的苏联也没有能够逃脱这一演变过程。

## 苏联政权从量变到质变

这一风暴随后又迅速回转到苏联自身，促使苏联在一些关系党和国家的许多根本性的问题上，急速地发生着移位变化，从长期的量变演变成质变。对于这种变化，不可能展开来谈，综合有关资料<sup>①</sup>，我只就一些阶段性、标志性的重大转折列一个时间表，从中体味变化的过程及其速度、广度和深度。

——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但毫无进展，经济状况恶化，出现了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为代表的批评经济改革的“激进派”（另有“保守派”或“传统派”等），叶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批判，党内公开了派别斗争。

——1988年6月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开始把经济体制改革转移到政治体制上来，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根本改革我们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发扬“公开性”、“民主化”，实行“社会主义多元化”和“舆论多元化”，向“保守势力”开火，改变了原来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而且提出党只管制定政策、意识形态和党务工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开始动摇了苏共执政党的地位。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通过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国家“实行总统制”的建议，同时提出开放党禁，实行多党制，并提议取消苏联宪法中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代替共产主义，不再把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的目标，不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些提议都被通过，都列入了修改后的宪法、党章。3月15日在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第一任总统，实际权力由党转政，集中到总统身上，戈尔巴乔夫大权在握。开放党禁，苏联境内一下子涌现出500多个各式各样的政党，他

<sup>①</sup> 除笔者当时的记录，另外主要来自刘洪潮：《沧桑巨变十年》，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们开始了鼓动和争取群众、进行夺权斗争的激烈活动。党员和群众对苏共逐步失去了信心，1800万党员中有400万人退党，在1990年7月12日苏共二十七大上，叶利钦等人宣布退出苏共。

——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更加活跃，影响迅速扩大。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为苏联最大最重要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苏维埃主席；接着叶利钦在7月的苏共二十八大上叫板，提出了“要苏共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撤销企业党组织，没收苏共财产，实行军队、克格勃内务部非政治化”的要求，进行釜底抽薪，甚至要戈尔巴乔夫“立即辞去总统职务”。

——苏共领导的削弱，导致了局势的加剧，苏联开始解体。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脱离苏联共产党而独立；1990年3月以后，由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6月12日俄罗斯发表主权宣言，作为苏联主体的俄罗斯宣布独立，这是苏联解体标志性的变化。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15个加盟共和国中，俄罗斯占70%的领土、52%的人口、60%的苏共党员，俄罗斯的独立，使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被架空。

——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进行总统选举，戈尔巴乔夫为保住自己的“总统”位子，与叶利钦出现了短暂的联手，叶利钦以57%的选票（其中有戈尔巴乔夫的一票）当选为俄罗斯总统。7月10日叶利钦就任后，便毫无顾忌地接连颁布法令在俄罗斯禁止政党活动，限期解散俄罗斯机关、企业和军队中的苏共组织，在全苏联引起轩然大波，各组织纷纷抗议，但无法阻止俄罗斯总统的权力，8月4日非党化命令生效，大批共产党组织被停止活动。

——苏联的急剧变化与西方长期对苏联的和平演变有直接的关系。戈尔巴乔夫走到这一步，更加讨好、依赖西方，而西方却发狠：“只有疯子才会向苏联提供贷款！”美国总统布什1991年7月29日至8

月 1 日访问苏联，西方媒体评论说：“像一位皇帝去视察一个被他征服的国家一样，公开地教训苏联。”

### 震惊一时的“8·19”事件

就是在这种紧急时刻，1991 年 8 月 19 日莫斯科时间凌晨 4 点，苏联发生了“8·19”事件，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部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 8 人，软禁了不在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了摇摇欲坠的苏联政权，“中止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活动”，由副总统代行职权，并发表了告人民书与呼吁书，开始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实行宵禁和军管，在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三个共和国实行戒严，企图阻挡加速演变的潮流，防止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挽救分崩离析的苏联。同时，紧急状态委员会加强对新闻舆论的管制，只允许几家电台、电视台播音，其他台转播，几家主要报纸在一版登载指定的相同的内容，取缔俄罗斯电台、电视台，并向叶利钦提出“警告”。

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仓促、犹豫不决，所实行的措施并没有到位，很快受到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几个共和国的强有力的抵制。惊魂未定的俄罗斯领导人积聚在俄罗斯议会大厦（白宫）迅速组织力量进行反扑，他们据守在大厦内设立电台进行播音，宣布政变非法，号召“总罢工”，鼓动群众走上街头，打出横幅，呼喊口号，举行集会，许多人迅速集中在议会广场。议会大厦被坦克部队包围，叶利钦等人惊恐不安，只要坦克冲进大厦，也许苏联的历史将是另一种写法。但坦克兵却迟迟没有行动，在群众的包围和劝说中，从上午相持到下午军队变了向，宣布保持中立，撤出包围。这给了叶利钦等反对派喘息、组织力量的

机会，多数加盟共和国也处于反对和观望状态。

一直处在高度兴奋中的西方世界乱了套，西方国家首脑纷纷表示“非常震惊”和“遗憾”。西方舆论一片哗然，纷纷指责是“宫廷政变”。自戈尔巴乔夫搞乱了苏联，取消了苏共的执政地位，西方认为苏联已经无力与他们抗争，“冷战已经结束”，世界缓和的新时期已经开始。他们正弹冠相庆和平演变的胜利，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是他们没有想到的。美国总统布什严厉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违反宪法”，叫嚷“要给予严厉制裁”！英国首相梅杰坐立不安，两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停止对苏援助，一直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保持密切的联系，呼吁苏联公众支持戈氏重新登台。

先天不足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内外反对势力的夹击中只存在了60个小时，就以失败告终，有关人员有的被杀，有的被捕后受到审判被关进了监牢（亚纳耶夫于2010年9月24日去世，终年73岁）。

### 克里姆林宫红旗倒地

“8·19”事件后，叶利钦再也不肯放过任何时机，加快了倒共倒苏的步伐。8月23日他全然不顾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当面签署俄罗斯总统令，宣布苏共和俄共停止在俄罗斯的活动。当天下午，查封苏共中央、俄共中央和苏共中央莫斯科市委的办公大楼，接管档案，没收财产，停止出版党报。晚上6点半，扯下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红旗，换上了沙俄时代的红蓝白三色旗。与此同时，哈萨克宣布废政党令，有的共和国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大势已去，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承认“许多改革尝试遭到了失败”。至此，拥有93年历史、执政69年的苏联共产党被摧垮。

从此也加速了苏联的解体。12月8日，叶利钦与乌克兰总统克拉

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秘密会晤，达成了解散苏联和成立三国独立联合体的“别洛韦日协定”，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已终止存在”。16日俄罗斯议会通过接管苏联议会所在地克里姆林宫的决议。21日，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11位国家元首在阿拉木图聚会，宣布组建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不是国家，不是国际法主体），每个独立国家都是主权国家；他们联名致函戈尔巴乔夫，通知他“苏联已经停止存在，苏联总统设置同时撤销”。戈尔巴乔夫成为没有国家的国家总统，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无可奈何地宣布“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以后形成的局势，我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的活动”。戈尔巴乔夫在过了一年又九个月的总统瘾后，不得不在辞职书上签了字。当晚7点38分，飘扬在克里姆林宫的苏联国旗倒落尘埃，随即被俄罗斯的三色旗所取代。至此，存在69年的历史的苏联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宣告终结。旋即列宁等革命者的雕像如斯维尔德洛夫像、捷尔任斯基像等被毁。看似一个强大的苏联，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到1991年前后只有6年多时间便不复存在。

### “8·19”事件中的舆论争夺战

苏联、东欧局势的变化中，各种政治力量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在想方设法把新闻宣传舆论控制在自己手里，显示了新闻宣传舆论尤其在政局变化中的极端重要性。毫不夸张地说，在这种时刻，谁掌握了新闻宣传舆论，谁就掌握了主动权，掌握了群众，谁就会赢得胜利。它反复地证明了毛泽东正确而深刻的论断：“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在当时，我注意搜集和整理了苏联局势最紧急几天中公开发表的有关新闻资料，写了《在苏联局势剧变时刻对新闻

舆论的控制》(以下简称《控制》)一文，在1991年11月的中央电台内部业务刊物《编播业务》上发表。现摘其要点(个别有修改)，以展现当时一场活生生的舆论争夺战的真实具体情况。

苏联的演变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新闻舆论是先导。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苏共在强调“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中失去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反对派专门揭露苏共和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搞乱了党的理论和人们的思想，逐步瓦解、动摇了苏共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对此，戈尔巴乔夫也非常清楚，在1991年发生的“8·19”事件失败后，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回到莫斯科，8月22日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谈到他执政6年中苏联发生的变化，强调指出“重要的是关于舆论的作用问题”。他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变革的决定性阶段。权力在变化，所有制在变化，联邦在变化。”“苏联已经发生了不会再走回头路的变革。”

1991年8月19日莫斯科时间凌晨4点，由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8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同样非常重视新闻舆论，凌晨6点零8分由塔斯社播发了亚纳耶夫签署的命令，7点13分播发了《告苏联人民书》。据塔斯社内部透露：8月19日凌晨，塔斯社副社长希什金被叫到克里姆林宫(塔斯社社长斯皮里多诺夫当时正在休假)，向他宣布了要实行紧急状态。早上5点钟，交给他一份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并严厉警告说：早晨6点钟通过塔斯社播发出去，供报刊采用，并派出国家安全机构的工作人员待在他的办公室里监督执行。

同一天的17点12分，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第二号命令——限制中央和莫斯科报纸出版的决定。决定中说：“一、暂时限定中央、

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社会政治刊物的出版种类，只出版下列几种报纸：《劳动报》、《工人论坛报》、《消息报》、《真理报》、《红星报》、《苏维埃俄罗斯报》、《莫斯科真理报》、《列宁旗帜报》、《农村生活报》；二、其他中央、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报纸和社会政治刊物的重新出版，将由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专门成立的机构来决定。”另外，为加强对新闻舆论的管制，只允许几家电台、电视台播音，其他台转播；几家主要报纸在一版登载指定的相同的内容；取缔俄罗斯电台、电视台。8月19日亚纳耶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报纸暂停发行时指出，“不是关闭而是重新登记”。他强调说：“过去国家所处的混乱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某些舆论的罪过。”

与此同时，紧急状态委员会控制全国性的电台、电视台整天播放全国委员会的声明和代总统亚纳耶夫的讲话，除此以外，电台播放轻音乐。而俄罗斯联邦的电视台被停止广播，立陶宛和拉托维亚等共和国的电视台被“军警关闭”。列宁格勒市卫戍司令8月19日上午10点利用该市电视台宣布成立本市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并对舆论工具实行了严格的控制。路透社记者20日发自莫斯科的报道中说：“把总统戈尔巴乔夫赶下台的人昨天迅速采取行动，重新对公开性时代蓬勃发展的传播媒介严加控制。”

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了种种措施控制舆论，但是并没有到位，没有严格有效地执行，也无人无力去执行，这就为反对力量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苏联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议会门口的一辆坦克上向群众讲话的镜头，叶利钦呼吁工人举行罢工。俄罗斯电台、电视台被停止一天播音之后，电台搬进了俄罗斯议会大厦播音，成了叶利钦的“喉舌”；而莫斯科回声电台则公开呼吁人们去“保护”俄罗斯议会大厦白宫；晚报《消息报》用了一整版的篇幅刊登叶利钦反对实行紧急状态、号召实行全国总罢工的呼吁书；莫斯

科电台华语广播 21 日播出了布什、叶利钦要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和东正教谴责紧急状态的谈话；《国际文传通讯社》却一直在工作，8月 19 日播发了苏联前外长谢瓦尔德纳泽领导的“民主改革运动”的声明，指责 19 日事件“是民族的悲剧，是一次反宪法的政变”。这家通讯社还随时报道了一些共和国领导人反对 19 日事件的声明，报道了西方某些国家和舆论的反对态度，起着动摇军心、民心的作用。就是官方的塔斯社，也没有闲着，据内部后来透露，尽管紧急状态委员会实行了新闻检查，并不断进行具体干预，塔斯社还是向国内外播发了“有关各地不安和抗议、合法选举的政权机构不承认自封的阴谋机构、罢工等活动的消息”，“不加任何歪曲、删节和其他有倾向性的改动”（但是有选择——笔者注）地播发了“各个大国领导人、政治活动家、有影响的国际组织谴责政变企图的声明”。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中的许多共和国领导人利用所直接掌控的电台、电视台和报刊等大力进行反宣传，谴责“8·19 事件”，争夺舆论也就是争夺民众。主要反对派领导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举旗，他在 8 月 19 日当天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在俄罗斯议会白宫前发表演说，号召实行全国总罢工反对紧急状态，解放大众传播工具，并在议会大厦内设立了中波电台，成为他的喉舌。对此，紧急状态委员会未及时采取果断行动，直至晚上 9 点 20 分才发表声明，对叶利钦等人轻描淡写地发出“警告”。民主改革运动领导人谢瓦尔德纳泽也在当天举行记者招待会支持叶利钦的呼吁，在电话线路被切断的情况下，他用无线电传真机“传递消息”。另外，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等，公开谴责紧急状态、支持叶利钦，由此引起连锁反应。不仅如此，一些反对派领导人纷纷举行记者招待会，号召实行联合行动反对实行紧急状态。

由于委员会没有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切断电讯、电话联系，致使

反对派各组织之间，各共和国领导人之间，苏联国内与国外之间的各种渠道的联系畅通无阻。叶利钦可以随时与美国总统布什和西方一些国家的首脑保持联系，就是在克里米亚的戈尔巴乔夫也竖立了天线，“收听英国广播公司、自由广播电台以及美国之音的广播”，并能多次与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以及布什等西方国家领导人通话。与此同时，西方政要和新闻舆论发动了谴责“政变”、蛊惑民众的强大舆论攻势。

紧急状态于莫斯科时间 21 日下午 4 点 12 分解除，紧急状态委员会也随之解散，从 19 日凌晨 4 点开始不到三天，仅 60 小时便宣告了“8·19 事件”以失败告终，“戈尔巴乔夫宣布已经控制了形势”，同时宣布解除对新闻出版的限制。人们在评说这一事件失败的原因时，尽管分析了多种因素，但普遍认为，关键的因素是失去了对反对舆论的控制。西方世界情报人士和学者的分析很有代表性：

——他们“企图封闭敌对的新闻媒介，禁止俄罗斯电视台和电台的广播和改革派报纸的出版，但是，他们未能封闭独立的莫斯科回声电台，这家电台的秘密发射机躲过了新闻检查。他们也没有关闭机场”。

——他们“没有切断苏联首都的内部及其与外国的电话通讯线，没有设法阻止外国记者采访和发送报道”，致使“叶利钦及其盟友、前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得以同外国人进行联系，争取国际上对抵抗力量的支持”。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 1991 年 9 月 21 日的一次讲话中，谈到苏联“8·19”事件的失败时说：是由于苏联已进入信息时代，如果发生在 70 年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它就可能成功。

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失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回到莫斯科后，8 月 22 日他在电视台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谈到这一

期间新闻舆论的情况。他说：“我不能不指出，绝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和新闻舆论工具是全心全意忠实于他们所捍卫的民主的职责的。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他们毫无差错地选择了他们所在的地方和同谁站在一起，没有被吓倒，没有胆怯，没有奉承篡权者。”他毫无掩饰地向他们表示“敬意”。

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后，反对力量趁机进行反扑，也是首先拿新闻舆论界开刀，完全没有了过去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开放性”。在紧急状态开始，叶利钦等人吃了不掌握新闻舆论工具的苦头，“在这场斗争中，俄罗斯明显感到缺乏舆论工具和通讯手段”。俄罗斯联邦新闻部部长波尔塔宁 19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已无法通过电视台、电台向国内外发布消息，希望外国记者帮助传递消息”。成为“苏联英雄”的叶利钦随即在 21 日发表一项命令，把全苏电视公司转交俄罗斯管辖，苏联“中央电视台在法律上已归俄罗斯”，解除中央电视台领导人列昂尼德·克拉夫琴科的职务，并交由司法机关“做出法律评价”。22 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做出决定，把《真理报》、《苏俄报》、《工人论坛报》等收归国有，使“苏共没有喉舌，无法鼓动群众”，“达到进一步搞垮苏联的目的”。23 日，叶利钦宣布把俄罗斯国内的所有印刷厂实行国有化，停止出版 6 家共产党报纸，并任命了新闻社和塔斯社的领导人。叶利钦的所作所为，曾经遭到《真理报》编辑部的反对，一位编委说“白色恐怖已经开始”，但这已无济于事。在新的形势和压力下，一些报纸和通讯社相继发表声明改变自己的宗旨：

——22 日，《真理报》编辑部集体通过一项决议，将这家长期的苏共中央机关报改组为一般政治报刊，取消了第一版上的列宁头像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真理报》自 1912 年 5 月 5 日创刊，至此完全改变了性质。

——1917年3月13日创刊的《消息报》接踵而来，《消息报》曾经是苏联第二大报，22日宣布，由于该报叶菲莫夫与紧急状态委员会合作，决定撤销他的总编辑职务，并将两名编委解职。同时宣布，《消息报》不再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机关报，而成为一份独立的报纸，撤销第一版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

——塔斯社新闻工作者组织理事会的一个倡议小组和各分部的代表提出一项改革塔斯社的计划，把塔斯社从国家组织改为独立的通讯社，转交给劳动集体。俄罗斯新闻出版部部长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25日发表谈话，支持这项改革计划。

——与此同时，苏联各地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依据新的形势改变自己的宗旨，有的被勒令查封，有的自行取消。苏联时期媒体几乎都是由苏共长期掌控，看来非常严格，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而在刹那之间都改变了性质。

新闻舆论是重要的。在当代社会，现代化的舆论工具掌握在谁手里，就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前车之鉴，当三思之。

### 苏东剧变与我国宣传应对策略

现在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以上对苏联东欧演变过程的概述，主要是在事后才有比较清晰的认识的，而当时对事件的本身以及未来的发展过程，尤其事后发展的结局都难以预料，因此人们的心情、认识和宣传报道都随着事件的进程而变化起伏。为说明这一宣传过程，还要从头谈起。

苏联东欧突如其来的局势恶化，给我国政治造成强烈的冲击，使我国宣传报道措手不及。这完全是一种新的特殊情况，有许多难以把握的新特点：一是来势迅猛，冲击力大，准备不足；二是波及面广，

涉及几个国家，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和格局，要高度重视；三是这些国家的内外情况复杂，起伏不定，未来走势难以预料，要时刻密切注视局势的变化，报道（尤其言论）要留有余地；四是直接关联着我国国内局势与国际关系，承受着内外的巨大压力，必须以国家利益和安全为核心，审时度势，既尊重客观事实，又要十分讲究政策与策略；五、要顾及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对未来的前瞻性，始终掌握报道与外交的主动权。

苏联东欧剧变发生在我国“政治风波”之后，国内正面临着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国内风波未平，国际飓风又起，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东欧闹得世界沸沸扬扬，这对中国和世界共产党人都是个巨大的冲击和震撼，更与我国有不可分割的连带关系。中国与苏联东欧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中国人民有着复杂的苏联情结。我们那代人都清楚，“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些都是20世纪50年代经常挂在嘴上的口号，而且深入人心。对苏联的骤然变化，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级干部、广大党员、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同志震惊中难以理解，都极其关注局势的变化，议论纷纷，思绪起伏：今天苏联变了，“中国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未完全平息的“政治风波”，会不会受到国际大气候的蛊惑，又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和命运将会如何”？国际力量对比的改变，会给中国造成多大的政治压力？这是许多人都在担心和思虑的问题。

当时我国更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尤其是七国集团）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制裁的严峻形势，而东欧、苏联的动乱，正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机会，他们把此变化当作“盛宴”，在“狂欢”中注视着中国，加大了对中国的制裁，期望以压促变，在中国发生多米尼诺骨牌效应。西方政府和舆论认定此时中国必乱、必变、必垮。我们党

和国家领导人非常清醒，必须顶住这场压力。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sup>①</sup>

我党、政府和全国人民一直密切关注着东欧、苏联局势的动向，加紧研究对策，加强对新闻舆论的掌控和指导。中央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一直坚定地认为我国的危险主要在我们国内，关键是稳定内部，一切从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出发。稳定我国的局势先要稳定我国的新闻舆论。宣传舆论的政策与策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宣传报道的每一步都极其谨慎地对待。现在回顾当时宣传报道走过的历程，依据国际政局的变动而及时调整国内宣传的政策和策略，所采取的“谨慎、客观、低调、适度”的宣传报道方针是正确的，使我国在极其不利的国际政治的强烈冲击中稳住了阵脚，赢得了主动。这一方针是逐步形成的，它的具体运用是依据实际分层次、分阶段灵活掌握的。

东欧局势动荡初期，注意力在东欧国家，冷静观察，跟踪分析。“政治风波”平息不久，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就预见到：“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sup>②</sup>东欧局势动荡的苗头一出现，1989年10月27日，邓小平在谈话中提醒全党：东欧的混乱不可避免，东欧的稳定与中国的稳定有关系。

1989年11月11日，民主德国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下台，12月9日柏林墙倒塌，轰动了西方世界。无独有偶的是，也是在9日这一天，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9页。

<sup>②</sup> 《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5页。

北京航空大学的 7 名学生在中央广播局门前打出横幅，要中央电视台改革，提出民间办电视台，这是“政治风波”后第一次有组织的行动，这一讯号更引起我们的警惕。10 日，在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中央提出要密切关注，跟踪研究东欧局势的动向，分析情况，提出对策。但因其来势迅猛，情况复杂，发展趋向并不明朗，一时拿不出明确的对策，但当时即意识到，对东欧局势的宣传报道不能常规对待，需“谨慎、客观”报道。

后来，经过具体分析研究，明确我国新闻媒体有关报道所沿用的基本原则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内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立足国内，内外有别，把稳定国内局势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有利于团结稳定鼓劲，实事求是地报道我国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和取得的成就，实事求是地说明我们面临的困难和复杂的实际情况，突出经济建设和社会安定，做好内部稳定和防止动乱的预防性工作；对东欧局势的报道，稳住阵脚，坚持少量、低调，而不是一味地强调新闻报道的特点，不能就事论事。谁都清楚，新闻舆论和意识形态太重要了，舆论阵地必须宣传党的声音，不能失控，舆论阵地一定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广播、电视的具体安排是借即将来临的新年、春节办好节目，展示社会的安定祥和，增强信心，加强信念。为此，除夕之夜，中央领导人借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节目的舞台向全国各族人民拜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播出大型文艺晚会《希望之光》，北京电视台组织播出了《同心曲》，营造节日祥和氛围。同时，对未来面临的内外局势要有足够的估计，宣传报道不要引发社会动荡，为此有意淡化了“一二·九”运动的宣传。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化解社会敏感问题。

东欧、苏联剧烈动荡时期，我们确立了“谨慎、客观、低调、适度”

的宣传报道方针。由民主德国柏林墙倒塌引起的风浪开始，迅速波及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速度和深度惊人，连西方也感到震惊。随后，这一风暴迅速转移到苏联自身，苏联出现了连锁反应，我国国内宣传报道的关注点转向了苏联。

正在这个时候，1989年12月初苏联公布新闻法草案，进一步放开舆论，提出所有政府、社会组织、协会、团体和苏联公民，只要经费自理，都可以按照法律程序登记注册办各种媒体，包括电台、电视台。这无疑是为已有的新闻舆论的“公开化”、“多元化”火上浇油。苏联的新闻舆论完全失去了控制，苏联局势迅速逆转，自1989年年底，在半年的时间里，接连发生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那时候，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曾经在我国新闻界、理论界广泛流传，并得到某些人的赞赏，甚至有人以此用来抨击我国的政治改革和新闻改革，这时候苏联新闻法的颁布更引起一些人思想的波动。

这时候，对于苏联局势的报道毕竟不同于东欧各国，苏共是大党，苏联是大国、强国，它究竟会发展到哪一步，一时看不透，前途未卜。可以把那时的苏联局势概括为四句话：突发性强，发展迅猛，错综复杂，前景难料。中央要求密切关注，冷静观察，跟踪动态，加强分析，并组织班子加强研究，提出对策。

正是在这个重要时刻，邓小平总揽全局，针对局势提出对策，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对认识和稳定形势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他说：“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sup>①</sup>他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外交策略。他说：“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

<sup>①</sup> 《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0页。

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sup>①</sup>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针对新的情况又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sup>②</sup>由此，形成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善于守拙，绝不当头”的完整外交策略，也成为我国宣传报道的策略思想，赢得了外交与宣传报道的主动权。对这一外交策略，后来有些人撰文做了解读，我把中央外事办公室原主任刘华秋和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的两段解读摘录于下：

——中央外办主任刘华秋2004年8月写的《邓小平同志对中国新时期外交工作的伟大贡献》一文中，对这一外交策略做了详细解读。他说：冷静观察，就是用全面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为一时一事所左右；稳住阵脚，就是要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跨我们。中国自己不能乱，否则人家就会打我们的主意；沉着应付，就是要不慌不忙，处变不惊，善谋对策，从容应对；韬光养晦，就是在和平发展的主题下，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的对比现实出发，既有雄心大志，又善于藏拙，埋头苦干，避免张扬自己，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避免引火烧身；有所作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绝不当头，当了对我们没有好处，但不等于我们就无所作为，我们还是要有所作

---

① 《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1页。

②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3页。

为的。

——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在《浅谈外交》一文中说：“我国外交政策中的韬光养晦与我们自己国家所处的地位、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中国既是一个发展速度很快的国家，同时从人均收入来看，又是一个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我们不能当头，也没有资格当头。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反而更加有所作为。”他说，在国际事务中，既要坚持原则更要注意策略，善于理性冷静思考，分清是涉我问题和国际问题的关系，分清是涉我一般问题和根本问题的关系，一般不要处于矛盾和斗争的焦点，不要卷入矛盾中心，不与某些大国捆在一起，保持较大的回旋余地。他说，对国际全局的正确把握，对国际重大事件的准确驾驭，对外交策略的得心应手的运用，反映了我国政府和外交的成熟，对我们如何理解宣传策略是有益的。

从东欧局势变动开始到这时，依据邓小平的指示和中央的精神，宣传报道的基本思路和方针也逐步完善：冷静观察，跟踪动态，加强分析；沉着应付，不慌不乱，低调处理；不急于表态，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不忙于做结论；不宜于大量报道，不宜于公开论战，不当出头鸟；区别对待，内紧外松，不四面出击，不到处树敌，不引火烧身；利用矛盾，发展自己。以上概括为：“谨慎、客观、适度、低调、不评论、不论战”的宣传报道方针，后来简称为“谨慎、客观、低调、适度”。这一宣传报道方针，充分估计到了局势的复杂性和我国应对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使我们在被动中赢得了主动，“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以上宣传报道精神，经过新闻媒体等多次研究和工作实践，我具体总结归纳为：宣传报道在着眼全局、立足于国内、保持局势稳定、尽量避免诱发负面影响的总要求下，具体把握好以下几点：一、不集

中，不抢先，有选择、有倾向地报道；二、对重大事件做及时、客观、简短的事实报道，不遗漏，不发表评论，让国内民众及时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三、如果苏联东欧以及西方世界内部有不同的声音，可有选择地报道、尽量引用他们自己的材料和外电报道，我们不站出来讲话；四、一般问题不报道、不评论，涉及有关干涉我国内政和危害国家利益的言行，我们要及时做出反应，揭露批驳，阐明我国的严正立场，我们不会吞下他们制造的苦果，但要严谨，注意策略，不纠缠；五、《参考消息》的把握比公开报道适当放宽，但也要从严，多用外电的报道客观反映事态进展、人们情绪和造成的后果，而《内参》要及时、全面地反映情况，供领导参阅；六、在对外宣传中树立中国“和平友好，稳定发展，改革开放”的形象，可准确及时地多对外提供有关苏联东欧的信息，把握尺度适当放宽，在国际舆论斗争中要有我们的声音；七、对正常的党际和国家交往正常报道，包括与苏联、东欧和西方的关系，也要警惕西方对我国的和平演变，准备应对西方对我国新的制裁；八、重点宣传报道我们自己，稳定局势，把经济搞上去，我们就稳如泰山。

实践证明，以上方针原则是积极的、正确的，起到了了解世界、稳定国内大局的作用。对此，我认为如果没有前期我国国内发生动乱的经验教训，增加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免疫力，我们应对国际上的这一重大突变，也许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难以提出这样全面的应对措施。冷静对待重大突发事变，为当时赢得了稳定，为后来赢得了主动。

依据“谨慎、客观、低调、适度”的报道方针，对苏联出现问题的原因，我们的做法是结合国内问题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观等，下毛毛雨，使我国民众对未来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所认识和思想准备。不久苏联局势越来越乱，迅速恶化，我们开始适量公开报道，但总量控制。中央规定，由新华社统一掌握，控制报道数量；《人民日报》和中央广播局所属“三台”可

以依据自己的特长和特点，发表评论或录音、录像播出；除此以外，其他新闻单位和媒体转载，不得自行其是。在“政治风波”一周年前后，美国之音不放过时机，举办特别节目进行煽动，我国国内一些大城市和院校已有不正常活动，我宣传报道采取更为谨慎的做法，对每天的节目都做出精心安排。

苏联崩溃时刻，密切关注“8·19事件”。1991年8月19日莫斯科时间凌晨4点，苏联副总统亚那耶夫等8人组成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了苏联政权，“中止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活动”，并发表了告人民书与呼吁书。我们对这一事件及时做了客观报道，塔斯社莫斯科时间5点21分（北京时间11点21分）发稿，中央电台于当天下午北京时间2点从中国国际电台得知这一消息，新华社下午3点发稿（美联社对新华社发稿之快感到惊奇），下午4点中央电台播出。

我国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感到震惊，因为情势不明，宣传报道所坚持的依然是“谨慎、客观、低调、适度”的八字方针，但与前期不同的是：一是提高了报道时效，要求及时客观报道发生的事情；二是增加了报道量，主要事实不遗漏，但依然不评论；三是由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表明“这是苏联内部的事，我们不干涉苏联的内政，尊重苏联人民自己的选择”。这一谈话于20日发表；四是内紧外松，主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讲我国国情和成就，稳定国内局势；五、在与苏联交往上，鉴于目前的局势不明，原来确定的副部级以上访问暂时停止（这期间，原定的广播影视部部长艾知生的访苏之行被取消），但外交上继续与苏联和西方国家打交道。在非常紧急的时刻，我国的外交和宣传理性对待，没有采取过激行动，表现出我们应对国际重大、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成熟。

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主要来自新华社，并适量选用塔斯社、莫斯科电台的报道。但很快发现，苏联媒体的报道是混乱的，而且迅速发

生着导向相悖的改变，增加了我们选择判断的困难。从 19 日凌晨开始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到 21 日晚即告失败，仅存在了 60 个小时。中央电台在 22 日早晨 6 点 30 分的《新闻报摘》节目中报道了“戈尔巴乔夫宣布已经控制了形势”，“苏联国防部部务会议决定撤回部署在实施紧急状态地区的部队”。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使苏联乱了套，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联手加速了解体进程，苏联局势不会再有逆转的可能；西方世界吸取教训，加强了对叶利钦政治、物力和舆论的支持；我们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内外局势，9 月 4 日来华访问的美国议员团竟然毫无顾忌地在天安门广场打出反对中国人权的旗帜，进行煽动。

新闻报道不是我国信息传递和思想政治引导的唯一渠道，内部的传达学习历来是我党的传统和法宝，尤其在政局剧烈变动时刻，许多话是靠内部讲的，这是外界所不了解、不理解的。这时，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和宣传单位要充分估计到形势的严峻性，要有应变的足够的思想准备。中央要求，每个单位的主要领导人都要出面做报告，对本单位的职工进行内部引导，各自稳定自己的内部。我作为中央电台的台长自然也不例外。内部教育主要是讲我国国情与苏联、东欧国情的不同，突出我们的优势。例如，我国与他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革命斗争的历史不同，我们是由农村包围城市，经过 20 多年的艰苦革命斗争打出来的江山，与广大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我们的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经过我们长期探索做出的适合国情的选择；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地位；我们实行充满活力的改革开放，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我们十分注意尊重和处理好民族、宗教关系，得到世界各国的称赞；苏联是 15 个加盟共和国的联合体，各加盟共和国一有机会就纷纷闹独立；他们的演变内因是主要的，也与他们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关系，他们长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在苏联内部制造不同政见的反对派；等等。结论是：“苏

东剧变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这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苏联模式的失败。”我们认为，世界格局处于大变动中，不会演变成世界性的军事对抗。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感到忧虑和担心，我们要充满信心和自信，最主要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加快改革开放，保持国内的稳定和发展。不管当时的这些分析是否中的，应该说，在人们处于思想混乱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了解疑释惑、稳定人心的作用。

冷静应对一个变化了的更为复杂的世界，赢得未来的主动。

苏联东欧剧变，世界旧格局被打破，新格局没有建立起来；进入后苏联时期，矛盾转化，旧的未除，新的出现；西方正弹冠相庆，头脑发热，野心勃勃地准备集中对中国发难，掀起新的反共浪潮；世界各国和人民在惊愕之后，开始了新的思考，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寻找苏联、东欧剧变的根源，总结如何吸取教训、面对未来。

西方政要和舆论欣喜若狂，要让共产主义成为历史过客。美国总统老布什说：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试验即将结束，我们将是这个形态灭亡的见证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欣喜地说：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苏联的解体。美国前总统里根跑到柏林市政厅发表演说，大谈和平演变的威力和成功经验。西方说：现在印刷地图都赶不上世界的变化。布热津斯基更是一个政治活跃人物，不断发表演讲、著书立说，为共产主义唱挽歌。尼克松临终前留下了他的预言《1999：不战而胜》。西方把下一个演变目标聚焦中国，但他们也清楚：“不能指望中国在一夜之间发生戏剧性变化”，“中国党有控制局势的能力”。（美国总统老布什语）西方时刻期盼着苏联东欧的局面在中国出现，我们列一个清单，即可一目了然：“政治风波”后美国等七国集团变本加厉地制裁中国，集中在人权、西藏、民族、宗教、台湾、经贸等问题上一起发难；1991年中国发生大水灾，美国认为中国过不了这一关，只给了几千美元的捐款；1992年美国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并有

预谋地邀请李登辉访美，加剧中美紧张关系；直到 1997 年邓小平去世，他们预测邓后中国局势必然失控，会变、乱、垮。结果，这一切都落了空，中国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好，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他们才又回到现实中来。

当时，我国宣传报道有三个新的面对：如何面对新的东欧和独联体？如何面对西方的压力？如何面对国内人民群众的情绪？在当时存在激愤与悲观两种情绪下，邓小平曾经讲过的几段话起了重要作用。1990 年 3 月 3 日，邓小平在谈到国际关系时说：“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sup>①</sup>他说：“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继续同他们打交道，搞好关系。”<sup>②</sup>他说：“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sup>③</sup>面对国际局势的复杂变化，我们依然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善于守拙，绝不当头”的外交策略；宣传报道依然坚持“谨慎、客观、低调、适度”的方针。总的原则和做法是立足于国内，坚持正面宣传，团结、稳定、鼓劲，把人民群众的注意力从对苏联东欧局势的关注引导到国内来，引导到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来；总结和吸取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坚定我国人民群众的信念和信心，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加强对外宣传，用事实向世界说明中国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化解朋友的疑虑，澄清西方的谣言；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加强广播、电视对我国边疆和沿海地区的覆盖，抵制外来思想渗透；对苏联解体后当地出现的群众反抗行动，以及国际共

① 《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3 页。

② 《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9 页。

③ 《振兴中华民族》，《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8 页。

运中许多党反对苏联共产党和戈尔巴乔夫的激烈言行，我们采取谨慎的报道。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没有采取过激行动，冷静应对复杂的局势，学会在新形势下与世界打交道，走活了一步新棋，走出了一条宽阔的新路。

总结长达两年的对苏联、东欧剧变的宣传报道，在中央正确及时的领导下，政策、策略的运用是恰当的，坚持了正确的舆论导向，稳定并发展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回顾这个时期的广播电视，只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出现过一些差错，如 1991 年 9 月 9 日晚 10 点，中央电视台在播出纪念革命烈士罗世文的“雕像的诞生”纪录片时，播出了过去录制的原片中的解说词“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立即引起敏感观众的强烈反应。经查证，是罗世文当年在监狱中对青年进行革命教育时说的话。录制中是用俄文讲的，但打出的字幕被观众敏锐地发现。差错发生的原因是中央电视台违背了安全播音“重播必须重审”的规定，话说得不合适宜。这是个小小的插曲。

### 苏东剧变后的思考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东欧剧变并没有使世界感到非常震惊，苏联的解体却大不一样。人们不解的是，一个有着 93 年历史、执政 74 年的苏联共产党，存在 69 年的一个幅员辽阔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一个看似军事和科技力量强大的超级大国，怎么会在不到短短两年（甚至是几天）的时间内被彻底摧毁了呢？苏联共产党人、学者及其西方各国政治家、舆论界和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纷纷发表言论、文章，著书立说，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得出各自的结论，并借助历史的经验教训预测未来。我们党也在研究，我国民众也在思索。

我曾经先后四次去过莫斯科，但都不是正式访问，只是做短暂的停留。第一次是1970年8月我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之后绕道莫斯科回国，尽管前一年中苏之间发生珍宝岛战争，两国关系处于紧张时期（我们戴着毛主席像章，在红场不断与苏联人辩论珍宝岛的归属问题），但对莫斯科、对红场和克林姆林宫，尤其是对列宁墓，怀有神秘、向往和崇敬的心情（这种情感以后几次消失了）。第二次是1983年去民主德国采访，在莫斯科停留。第三次是1984年从北京坐火车绕道莫斯科去东欧三国采访，6天的旅途中饱览西伯利亚自然风光，为苏联的辽阔地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惊叹。第四次是2001年7月乘飞机前往莫斯科参加北京申奥，在俄罗斯上空，俯瞰西伯利亚那广阔的大地、茂密的森林，思绪又回到了苏联解体的问题上来。这么大的一个强国，由莫斯科发动而随之像一场飓风席卷全国，竟然在几天之内改变了颜色，究竟是什么原因？时间可以沉淀历史，越是到后来或许越能够清晰地洞悉其本质。有些原因上文有所涉及，从整体和深层来看，我认为，以下几方面是值得深思的：

一、由量变到质变，由渐变到突变。苏联东欧剧变是长期演变的恶果，正是那些不起眼、不经意的“小变”、“渐变”，起着涣散、腐蚀作用。应该说，以上我们在内部教育中所分析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都是长期促使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一旦到了质的突变，谁都难以回天。把握好现实，才能把握好未来。

二、苏东剧变的关键在党，动摇了根本。苏共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民主社会主义，动摇了根本，在党内失去了党心，在全民中失去了核心。苏人民对现实不满，强烈要求改革，而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中央又实行了错误的改革政策，一次又一次地削弱党的领导，最终失去了党的执政地位。

三、国强民穷，失去民心，动摇了根基。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几

十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过举世公认的成就。但苏联的发展日益显露出思想和体制的僵化，经济停滞不前，大搞军备竞赛，国强民穷，人民群众的贫困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再加之官员腐败，形成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失去了民心，社会主义失去了吸引力。我想，为什么在舆论争夺战中，苏共说话无人听，而叶利钦的主张与反对舆论却能够动员群众？根本原因在于苏共长期的所作所为失去了人心。苏联朋友告诉我：当叶利钦派人查封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总部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许多党的干部和党员袖手旁观，为什么？他们在想：“也许改一改会好呢？”这位朋友感慨地说：“正是抱有这种‘也许’的幻想而错失良机。政权易失而不复得，政权得失是可以搞试验的吗？一旦失去，无力回天！”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历史终归是由人民推动的。民众是国之本，“得人心者得天下”，一个社会制度好坏，其标志是民富国强。当一个国家处于贫弱时重心是发展国力，国强才能民富；而在和平发展时期，从根本而言，只有关注民生，民富才能国强，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长期处于生活贫困和不公平、不公正社会状态，早晚是要出事的，这是苏联解体的深层因素。

四、苏联时期固有和不断加深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是引发解体的动因。苏联有 150 多个民族，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俄罗斯民族占主导（俄罗斯境内有 130 多个民族），苏联长期没有重视和处理好各民族、宗教的关系，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日益尖锐；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是一个由 15 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合体（其中共和国内还有自治共和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而貌合神离，一旦中央控制力削弱，离心倾向就会加剧。这一切，也给西方势力的渗透、演变提供了可乘之机。内外综合矛盾的作用，成为苏联解体的直接动因。

五、军队和新闻舆论的失控，成为局势剧变的重要因素。枪杆子、笔杆子是和平时期维护安定团结的重要因素，是在时局剧烈变动时期

决定走向的关键因素。事实说明，“8·19事件”的短命，取决于苏联军队脱离党的领导的变向和新闻舆论的倒向。

就新闻宣传而言，苏联的新闻媒体长期都在苏共的严格掌控和绝对领导之下，主流媒体几乎都是党报、党刊、党台，只坚持正面报道、歌功颂德的原则，不得宣传报道苏联现实生活的阴暗面，实行的是一种违背现实、违背新闻规律、僵化的新闻体制。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依据他的《改革与新思维》，又不顾实际地强调“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把禁锢了多年的僵化新闻体制突然放开，如决堤洪水，一下子完全走向了另一面。不管哪一种做法都不可取，平时看似牢固掌控的新闻媒体，在关键时期却纷纷倒戈，易帜易色。这似乎不可思议，细想并不奇怪。其实，我们也有过自己的切身体验。在1989年5月中旬“政治风波”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总书记突然决定进行新闻改革，新闻报道突然放开，由统一发稿改为各媒体自行报道，由一边倒的正面报道改为放开报道，由学潮的“动乱”性质改为推动改革开放，致使首都新闻界和新闻报道骤然出现了严重混乱局面，出现了新中国成立40年来新闻工作者首次、多次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新闻自由”、“解除党禁”。联系后来苏联、东欧新闻舆论发生的事情，竟是如此的相似，让人感到似曾相识，似乎看到了“新思维”的影子，又像是一次提前预演。

这种相似说明了彼此内在的联系，有某种共同性和规律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如何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尤其是在政局动荡时期保证党的领导、保持新闻舆论的导向正确和稳定，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也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我认为，关键时期对新闻舆论的掌控在于平时的把握。新闻体制的僵化和突然搞活、放开都不可取。在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下，依据我国国情和新闻报道的规律，有领导、有计划地加快循序渐进的新闻改革，在坚

持以正面报道为主（因为这符合客观实际）的前提下，逐步增加负面报道，增强透明度，加强监督权，客观、全面地反映现实，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分尊重民众的知情权，这是一种良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历史告诉我们，平时不注重建设，关键时刻难以控制，何况今天网络媒体的普及，又比以往增加了许多新的难题。

六、摆正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在过去长期的国际交往中，我们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因素和社会制度的关系，模糊了国家之间关系的根本原则，但事实教育了我们，在对待和处理党与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要坚持把国家最高利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回顾我国与苏联的关系，在沙俄时期，通过不平等条约，沙俄侵占了中国超过 15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关系有过短暂的友好岁月，60 年代苏联在苏中、蒙中边界上加强军事设施，部署导弹的数量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增加到 100 多万人，构成了对我国的边境的直接威胁，1969 年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大量的事实说明，不管是“坚如磐石”，还是“同志加兄弟”，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是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而是国家利益和安全始终高于一切。意识形态是变化的，而国家利益是不变的，不必抱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情结。邓小平 1989 年 10 月 31 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sup>①</sup> 在对苏联东欧剧变的宣传中，我们始终立足国内，以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作为把握宣传报道的准绳，妥善处理我与苏联及其他各国、现实与未来的关系，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这为我们今后应对国际风云变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30 页。

## 采访柏林墙追忆

2009年10月以来，西方媒体和政要不断发表言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由此勾起了26年前我采访柏林墙的回忆。

1983年6月12日，我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德语记者部的何廉（兼翻译）组成“中国广播记者组”，到民主德国采访。当时我国与苏联的关系已有所缓和，与民主德国的关系走得更快一些，但多年已很少有互访，更少有新闻界之间的交往。我们去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采访，向国内介绍民主德国的现实情况；二是实地了解和感受民主德国。民主德国广播委员会对中国去的广播记者组非常重视，到达的第二天就安排我们去参观柏林墙。他们解释说，这是一次特意安排，对其他国家的记者是不安排的，你们是第一个被接待的广播记者组，并说明“不供报道”。

自柏林墙1961年开建以来，早已被西方舆论炒作得沸沸扬扬，但对其具体的真实情况我们并不了解，我们自然也十分好奇。在到达后的第一天，我们参观民主德国柏林电视塔，登高望远，就迫不及待地俯瞰柏林墙的走向，由上而下看去像一条灰色的水泥“马路”，蜿蜒曲折地环绕着西柏林，施普雷河从下面穿越；这条“马路”有时从一个村子的中间或一座桥的中间穿过，把一个村子、一座桥分成两半；在勃兰登堡门，一条连通的长衢大道被截断，放眼望去，西柏林方向是一片开阔的绿地，据介绍原为西柏林的民航机场，现在不用了，属于美国占领区。

当地时间6月14日上午9点，我们走进了位于勃兰登堡门左边的警卫室，接待我们的是巴登上校，他首先把我们带到了一座模型前面。他介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一分为二，柏林一分为二，民主德国的首都是柏林（又称“东柏林”），与它毗邻的是“西柏林”，被美、

英、法共管。他指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界限说，这是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界限，实际上也是北大西洋公约与华沙条约国两大军事组织之间的界限。这里经常出事，如果发生冲突那就危险了，就会发展成为两大阵营、两大组织之间的冲突。

巴登说，我们的邻居不承认柏林，不承认这条边界，只承认 1937 年的边界，说这条边界不是国家之间持护照的边界，因此他们不尊重这条边界，他们经常在边界挑起冲突。西柏林是在民主德国国土上的一座孤岛，也是联邦德国和美、英、法等西方国家进行渗透和扩张的桥头堡，他们利用这条 165 公里（有的报道为 150、106、166 公里等）难以设防的边界组织渗透、骚扰、挑衅活动，实现他们企图吞并民主德国的计划。

巴登说，社会主义的敌人在西柏林特别多，有驻军 1.3 万人，有庞大的警察队伍，有 77 个法西斯组织。他们组织在边界闹事，甚至把武器运进柏林；另外有 80 多个组织搞策反活动，用金钱收买，用职业诱惑，造成民主德国大量人员外逃，把大批知识人才策反到联邦德国去，企图打乱和阻挠我们的经济发展计划。他说，边界冲突频繁发生，防不胜防。从 1961 年到现在（1983 年 6 月）已经发生超过 15 万次的冲突，而且呈迅速上升趋势，1978 年有 9000 多起，1981 年就有 14000 多起，他们打枪、扔炸药，打死炸死妇女和儿童；他们散发黄色宣传品，喊话，在柏林墙的那一面写标语口号“德国只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希特勒万岁”！他们的坦克时常开到边境线这边来。1982 年 6 月美国总统里根到西柏林观看柏林墙，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来过。我们要保卫国家的领土和安全，从 1961 年开始封锁边界，建立柏林墙，设立了 83 个边境站。柏林墙完全建在民主德国的领土上，向外还保留 5 ~ 7 米宽的边境地区。

随后，巴登上校陪同我们参观了位于勃兰登堡门一带的柏林墙。近距离观察，柏林墙是用一块块竖起的大型水泥预制板连接起来的长墙，也并非整齐划一，看得出有的路段借用了原来的砖墙，把原有的拱形门堵起来；柏林墙约有两人高（3.6米），也并不厚，每隔一段竖立着说明和“警告”的牌子。在勃兰登堡门搭起两个水泥看台，从这里可以瞭望西柏林，我们发现对面也有人向这边瞭望、照相，彼此相对，指指画画；柏林墙的另一面被各种颜色和口号涂抹得一片狼藉。

对柏林墙的修建，民众的看法不一，大多认为，为了国家安全，这是一个不得已采取的措施。陪同我们的民主德国翻译说，他妻子在外地上班，原来坐火车只要45分钟，现在要1个半小时，绕道多花去一倍的时间。

尽管有了柏林墙，采访中，民主德国广播委员会的负责人无法掩饰他们的忧虑。民主德国的面积不到原来德国的三分之一，联邦德国在西方的扶持之下强势发展，而民主德国战争破坏严重，资源贫乏，又承担向苏联的战争赔偿，经济落后；两个德国一墙相隔，除了美国等设立的“欧洲自由电台”，周围有25家德语电台和电视台，每时每刻受到西方舆论和文化的包围；两德是同一民族、同一文化、同一语言，民主德国的民众直接面对联邦德国的广播、电视和西方文化的诱惑，这种演变谁都无法设防，这是柏林墙所挡不住的。如此的说法，我们在民主德国到处都能够听到看到。面对这种特殊的情况和环境，如何稳定民主德国的政局和民心，广播电视宣传和官方都深感忧虑。

几年之后，柏林墙在1989年11月9日倒塌了。这一天，迫于民众的压力，民主德国取消了与西柏林的交通限制，柏林墙被涌向西柏林的人流冲垮，戈尔巴乔夫执政的苏联，没有像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1968年出兵捷克那样，而是下令苏联驻德部队不许干涉。1990年7月，民主德国边境控制完全解除，到了10月两德合并。后

来，柏林墙被完全拆除，只剩下比较完整的 1300 米的遗址，其他为断垣残壁。1996 年我访问德国时，又专门去寻觅柏林墙的踪迹，只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看到几块残缺不全的水泥板，上面涂满了各种图案，它的原貌只能从出售的某些“纪念品”中去寻找。柏林墙的遗址成为纪念物，旅游者不断，据《参考消息》2009 年 10 月报道，游人之盛，甚至超越了勃兰登堡门，有的发出这样的慨叹：“没有看过柏林墙，就不能算是到过柏林！”但 20 年后的德国年轻人，已经对这段真实的历史知之甚少。

对于柏林墙的构建，我以为，德国是一个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裂成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主权国家，不管是什么原因，这是事实，也就必然形成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安全。民主德国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出发，采取保护措施这是正常的，无可厚非。后来的以色列不是也想构筑一条与巴勒斯坦之间的隔离墙吗？

在柏林墙倒塌 20 周年之际，德国、西方国家政要和媒体接连发表谈话、文章纪念这一事件，对原来构筑柏林墙大加指责，这正应了“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写的”那句话。2010 年是两德统一 20 周年的日子，有关柏林墙的种种，今后还会继续被炒作下去。今天柏林墙成为被嘲弄的对象，其用意也不难理解，并非只为那段历史，无法掩饰其借题发挥之意。据美联社 2009 年 10 月 21 日报道，德国青少年制造了 1000 块特大号多米诺骨牌沿着原柏林墙部分遗址摆放，在 11 月 9 日推倒。一名组织者说，这一活动的想法是“根据骨牌理论创造历史”。

## 五 克林顿总统访华

——复杂舆论环境的应对

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这是对江泽民主席1997年10月访美的回访。由于中美关系在世界全局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访问引起了世界关注。

就在克林顿来华的前夕，美国共和党利用舆论掀起了反华浪潮，其矛头是对着克林顿和民主党的，妄图压制克林顿放弃早已定了的中国之行。他们总拿中国说事，制造种种事端和谎言，把一盆盆脏水往中国身上泼，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的内政，而且愈演愈烈。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把他们对中国的攻击归纳出8条，其中有什么“政治献金案”、“卫星导弹出口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扩散国家”，要克林顿“不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要“向中国施压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反对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反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等。

面对这种情况要不要进行反击？中国是礼仪之邦，按照过去的惯例，当某个国家的元首到我国访问时，要营造一种良好的舆论氛围，

如果不是遇到特殊情况，舆论中不谈两国之间的分歧和历史上不愉快的事情。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情况。但美国人不懂得尊重他人，不顾及这些，反而更加起劲地攻击中国。对此，宣传上决定针对这种特殊的情况采取特殊的对策，以舆论对舆论，对美国的反华舆论进行强有力的回答。而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保持友好的气氛。不是不斗，也不是斗而破裂，这是掌握的度。这样既可以打击美国反华势力的气焰，有利于两国的正常关系，又有利于克林顿的来访。

当天下午，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迅速向中央新闻单位做出部署，新闻界立即行动，从各自的特点出发，选题目，找采访对象，各显神通，很快写出了一批很有说服力、很有特色的稿件，制作了一批很好的节目，通过评论、采访专家和学者、采访外国友人和采访天安门广场的外国游客等，摆事实，讲道理，讲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直接或间接地、有理有利地驳斥了美国的反华谬论，为克林顿访华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气氛。几天之后，克林顿发表了长篇讲话，阐明了他访华的意义，表明了访华的决心。

6月2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如期来访。

### 中美高层记者招待会

6月27日，是克林顿访华高峰会谈的第一天，许多政治性的活动和实质性的会谈都集中在这一天：天安门广场的欢迎仪式、会谈、记者招待会、欢迎宴会等。这些活动的结果如何，标志着这次访问有多大程度的成功，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活动的安排自然非常紧张，并要做到万无一失。

安排在有序地进行，也不时地传来一些杂音，如在天安门广场的欢迎仪式前，有外国舆论突然传出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可能穿一身

黑礼服参加欢迎仪式，表示对“政治风波”事件的回应，讨好美国舆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我方做了紧急防范，事实上如此情况没有出现。

对于两国领导人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更是重中之重，自然双方都很重视，借此相互亮明共同点和分歧点，成为记者关注的热点，中美广播电视直播。对于这种记者招待会的开法，国际上有惯例，其规定程序为：主方先致辞，客方后致辞，但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正好倒过来，客方先回答提问，占一、三位置；主方后回答提问，占二、四位。各自只有两次回答问题的机会，而且都不能指定本国的记者。自然，谁都愿意占二、四位置，这个位置有很大主动权，他可以借最后一次回答问题的机会，针对以上的问题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总结性的回答。

对于那次记者招待会的情景，我想做一点简单回顾。记者招待会一开始，江泽民主席致辞，对克林顿总统的来访表示欢迎，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东道主应有的礼节，然后他从世纪的高度谈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用比较长的篇幅谈到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点，同时简洁地点明了存在的分歧，共用了大约5分钟。随后是克林顿总统致辞，他利用这个讲坛做了长篇的讲话，开始就讲分歧，占了他讲话的绝大部分，中国人不习惯，觉得作为客人竟没有必要礼节可言。（这使我想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转播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的这种场合，竟对中国进行攻击。是他们的文化和哲学特点，还是傲慢与偏见？这提醒了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们打交道）克林顿把美中之间的主要分歧、尤其是敏感问题公之于世，其用心有对中国显示强硬的一面，也是有意迎合、缓解美国反华舆论对他的压力。但不管怎样，我对突然出现的这种不合常理常规的情况大为惊讶。这在我方的预料之中，还是在预料之外？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得出，江泽民主席表情严肃，但他很快恢复了平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现出镇定自若，你来我往，从容

应对，针对记者提出的敏感尖锐问题，他毫不掩饰地阐明了我国的立场，又表现出了顾全大局的开阔胸襟。

## 出人意料的两次直播

对美国总统克林顿来访的宣传报道，我方做了认真准备，但对两国领导人联合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和克林顿在北京大学演说是否进行现场直播，却迟迟定不下来。美国人料定我们是不会直播的。他们认为中国领导人不会让中国的公众直接了解克林顿说了些什么，尤其是美中之间的分歧和涉及中国的敏感问题，中国领导人必将对此进行封锁，因此在是否直播的问题上，他们有意提出挑战。在我们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担心不知克林顿会说些什么，一旦出现政治敏感问题，直播没有回旋的余地，群众对一些敏感问题的承受能力如何？当时分析，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信，该讲的分歧问题，美国舆论天天在讲，我国人民也是清楚的，他还能讲出什么新问题？我们要充分相信我国人民的觉悟和判断力，因此做出了我国广播电视台两次现场直播的决定。但当时对外是严格保密的，一直到直播前的几个小时，美国才被告知我们要直播，这大大出乎“信息灵通”的美国人士的预料，对他们是“意外惊喜”，以为这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面对十几亿人的讲坛，中国受众会“为美国而欢呼”。据美国白宫发言人麦柯里事后透露，美方原先只希望中方能直播克林顿在北大演讲这一场，他们没有敢想中方会直播记者招待会。

决定现场直播中美高层联合记者招待会打破了惯例，招待会时间之长也打破了预测的时间，由 40 多分钟延长到 70 多分钟。实践结果证明，决定直播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引起美国和世界舆论对中国政府充满自信和新闻开放的强烈反响，甚至可以说刮起了一场舆论的

风暴，为中国和中国领导人塑造了很好的形象，也是一次影响巨大、成功的对外宣传。我当时记录下几家境外主流媒体的报道，以下引用几段。

——CNN认为“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使一切成为空前”。《纽约时报》说：“现场直播表明中国领导人充满自信，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得当。”

——有台湾背景的中天电视台说：北京破例让中央电视台全程直播，这在中国大陆是罕见的做法，“出乎美国官员的预料”，“国内外齐声叫好”。

——香港《东方日报》这个一向不说中国大陆好话的报纸，也不得不说：北京中央电视台破天荒现场直播江泽民和克林顿联合新闻发布会，内容包括一向被视为中国大陆“禁忌”的“西藏问题”和“6·4”事件，70分钟内容毫无删减，“原汁原味”展现在中国电视观众面前，即使一向对北京处理言论自由大有意见的美国官员，也承认这是一次进步。

——对于群众，他们说，观看电视直播，中国民众得以即时目睹江泽民与克林顿两位国家元首就“6·4”和人权问题唇枪舌剑的辩论，对记者会上触及敏感问题，起初多表惊诧，但其后亦表示相当的判断力，而且认为这是中国传媒开放的好先兆。

对于我国广播电视直播克林顿总统在北京大学演讲这一场，也是美国所始料不及的，直到头一天晚上他们还在四处打听中国媒体是否直播。开始，他们料定是不会直播的。由美国政府出资办的“自由亚洲电台”是这样向中国的听众预告的：该电台将于星期一北京时间早上9点半现场直播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的演说。由于中国官方

的电台、电视台都不会安排直播，因此这一直播将可以使中国人民有机会直接听到这一现场演说。可见，他们的预言又错了。

对这场演说直播的效果是很有戏剧性的。美国人是很精明的，他们对访问中的每一项议程都经过反复研究、精心设计，他们之所以选中北京大学，含有他们的主观意图，克林顿在北京大学大讲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人权、科学的问题，他一改过去的锋芒毕露，讲得含蓄，表现得自信、轻松，以为会出现“热烈欢呼”的场面。

他错了。在北大学生提出的一个个尖锐问题的面前，他的潇洒和自信迅速消失了，显出的只是在被动地招架。境外传媒是这样报道的：学生“所提问题的水平相当高，也相当尖锐”，有的博得掌声雷动超过一分钟；大学生敢问，克林顿兜圈子，避重就轻地回答问题；北大学生的表现展示了中国新一代知识青年的风采，“中国可以说不”；“当美国传媒见到北大学生直接尖锐地提问时，都感到意外，克林顿当时的神情也是相当的惊讶”；中国有的媒体说：“电视观众看得津津有味，为我们的大学生叫好！”过去的境外媒体很少有这样的评说。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北大演讲直播的声音效果却很不好，声音失真，时断时续，翻译既不标准又跟不上，观众很不满意。有些人给中央电视台打电话提出批评，有人错误地认为是中央电视台做了手脚，因为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事。中央电视台也非常着急，可音频的调试是由美国人操纵的。据直接听演讲的人说，现场声音很清晰，可不知为什么转出来让观众听就变了调。在直播结束时，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不得不幽默而又含蓄地向观众做出交代说：“刚才由于美方的技术原因，可能有些地方听不清楚，请观众谅解。演讲中的翻译是美国提供的，也许是语言的习惯与我们不太一样，有些地方听不太清楚，看来美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有时候还要从语言开始。”他承诺把情况进一步了解清楚，向观众做出交代，后来却没有下文。

后来，我从2011年2月26日的《文汇报》上，看到白岩松2009年3月31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一篇演讲稿。其中谈到这场直播时说：“当克林顿总统在上海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记者问道：‘这次访问中国，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说：‘我最想不到的是这两场讲座居然都直播了。不过，直播让中国受到了表扬，而美国却受到了批评。’”也算是一种交代。

通过直播，美国和世界直接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也使中国人民进一步了解了美国。中国人民从中增强了自信。

笔者认为，这是一次思想观念的解放，是一次很有说服力的实践。既然这么多重大、尖锐、敏感的话题与活动，都可以直接面对国内外，收到了好的效果，今后还有什么值得直播的活动不可以直接转播？

## 六 北约袭击南联盟

### ——复杂真伪的舆论战

我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工作岗位上，经历了科索沃危机、北约袭击南联盟以及我国驻南使馆遭受轰炸事件的宣传报道。那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管理突发事件和国际问题的宣传报道，我即感到这是在一场新的形势下的特殊战争、特殊任务、特殊宣传，内外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纷繁多变。不久以前发生的事，成了今天的历史。这是一段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体面的侵略史，充满着政治的谎言、军事的霸权和舆论的欺骗。这段历史是在冷战结束后，在单边势力极度膨胀下的肆意所为。科索沃危机导致的袭击南联盟成为北约“新战略”的实验场。这是一场复杂多变的媒体战，对于研究未来国际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走向，认识和研究西方主流媒体，有许多规律可资借鉴。但当时忙于应对眼前的事变，无暇顾及做系统的思考。退居二线后，这一连串的事件一直在脑子里萦绕而挥之不去，也有时间去重新翻阅有关的资料，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自己的所知所想写出来。记录历史，就要还原历史，运用历史的事实、历史的观点和历史的语言，为后来的研

究提供客观、真实的情况。

### 喊着人道主义行霸道

南斯拉夫位于有欧洲“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地区。“二战”后，铁托领导建立起一个多民族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那时叫“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现在已不同），科索沃是南联盟内的一个自治省，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00多万，主要居民是塞尔维亚族（简称“塞族”）和阿尔巴尼亚族（简称“阿族”）。塞族在南联盟人数最多，信奉东正教，科索沃是塞族的发祥地；另外是阿族，与邻国阿尔巴尼亚同属于一个民族，阿族在科索沃人数最，占90%，信奉伊斯兰教，科索沃是阿族的祖居地，由此多年来科索沃存在着复杂的民族和宗教关系。

铁托总统在世时，最大的心病是忧虑南斯拉夫因民族和宗教矛盾而发生分裂，但这种悲剧还是发生了。铁托逝世后，尤其是1989年后，在动荡的国际大背景下，南斯拉夫民族和宗教矛盾加剧，加之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不断发生冲突，联盟内的一些共和国纷纷独立。科索沃的阿族1990年7月发表“独立宣言”，并独自举行全民公决获得通过，1991年自行宣布独立，并建立自己的武装。对此，南联盟不予承认，坚持科索沃问题是南联盟的内政，对科索沃拥有主权，为保障主权和领土完整向科索沃派遣军队，1998年2月底科索沃爆发冲突。南欧巴尔干地区一向是大国争斗的要地，美、欧、俄三方的介入，使本来动荡不安的科索沃局势更为复杂。6月科索沃地区局势急剧恶化，阿族武装不断发动武装进攻，南联盟对科索沃境内的阿族武装进行军事打击，武装冲突不断升级。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早已盯着科索沃，借此散布只有200多万人的

科索沃有 100 多万难民逃离，以“维护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南联盟内部事务，挑动分裂，实行经济制裁，不断向南联盟施压。1998 年 2 月 28 日，北约秘书长索拉那声称“准备对科索沃采取行动”。1999 年 2 月，北约在法国提出了政治解决科索沃危机的《朗布依埃协议》，按照协议北约将派军队进驻科索沃“帮助”科在南联盟内取得“实质性的自治”，并在三年后重新确定其地位，外电评论实际上等于科索沃获得了独立地位。依据这种趋势，南联盟如果接受协议即意味着国家分裂和主权的丧失。阿族已在协议上签了字，南联盟拒绝签字。因此，北约实行军事打击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教训南联盟，迫使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签署《朗布依埃协议》，撤出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军队，让科索沃取得独立，纳入北约的势力范围，从而控制巴尔干地区。按照北约的说法是消除“欧洲的最后一个红色堡垒”，实现一个“统一的欧洲”。

在科索沃局势发生急剧变化的过程中，我国媒体不断跟踪发表一些报道和评论，表明我国政府的立场和主张。在宣传报道中，注意了掌握以下几点：

——密切配合我国外交行动，报道我国政府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及其为解决危机发挥的积极作用，指出这是南联盟的内政，南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应当受到尊重；表明我国政府主张通过政治谈判和平解决的态度，指出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在处理有关问题时应当慎重行事，采取任何举措要有利于该地区局势的稳定，外界军事介入和动辄军事制裁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客观报道发生的新情况，多报道南联盟政府立场；在援引西方通讯社有关消息时，应有所选择，尽量避免具有西方倾向性的报道，以免造成对我国立场的误解。

——对西方大国插手而导致局势进一步紧张可进行适度评论；积

极反映国际舆论及知名人士反对大国插手巴尔干事务、要求和平解决科索沃危机的呼声。

——密切注意科索沃危机的新动向，对危机有可能升级、演变为地区战争有所警惕，但不做预测报道。

——关注民众情况与反映，但对由于冲突引发的难民潮等国际敏感问题要慎重报道。

这期间，我国几家主要新闻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国际电台等常驻南联盟的记者及时发回报道，中央电视台专门派出记者采访报道。在这期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依据科索沃时局的变化，不断组织主要新闻单位研究改进宣传报道，要求在及时、准确报道的同时，加强对局势的分析，发挥专家学者的长处，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度报道，不在于言辞上是否激烈，而要分析透彻。

### 北约扩张“新战略”

北约卷入科索沃危机，除了传统的原因，与北约在新形势下的扩张有重大关系。北约建于1949年，当时是一个主要对抗苏联的集体防御性的军事集团。冷战后，美国一霸独存，北约失去了对手，曾经产生过“北约有没有存在必要”的议论。但美国一霸独强，而制约美国的力量薄弱，美国霸权主义极度膨胀，肆无忌惮，在美国的操纵下改变北约的战略，使其成为进攻性的军事集团，为美国的战略目的服务。美国于1998年12月出台了《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声称美国的目标是“领导整个世界”，决不允许出现挑战它的“领导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1999年4月25日，北约各成员国聚集在华盛顿庆祝北约建立50周年时，做出战略调整，正式出台了《联盟战略概念》(又称为“华盛顿宣言”)。

在这前后北约紧锣密鼓地散布了种种“新战略概念”，并大张旗鼓地张扬，声称北约“无限东扩”，北约承担起“不受地域限制的新使命”，“可以随时使用武力把世界秩序的概念强加于它的邻国以及世界的任何地方”，也就是说只要北约认为与他们的“利益攸关”，可以把北约的“防御区”扩展到成员国领土之外的任何地方，把一个“集体防御性的军事组织”转变成一个“侵略性进攻性的军事集团”；北约声称“不是为土地而战，而是为（西方）价值观而战”，是“为人权而战”，英国首相布莱尔提出了“主权不及人权”的国际关系新准则，从而引申出“人权高于主权”、“国家主权过时论”，必要时以“人权”的名义对他国“拥有行动的自由”，打着“人道”行霸道。这样，北约由防御性到进攻性，由军事到推行价值观，由欧洲地区扩展到全球，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这种不顾国际法的约束、推行世界霸权的“新战略”，被国际观察家称为“世界宪兵自白书”和“新干涉主义”，颠覆了1948年《联合国宪章》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原则。人们担心，如果以这种幌子和理论为借口，北约就可以为所欲为，任意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人权，干涉他国的内政，以达到他们背后的真正目的。

北约为实践它的“新战略”，首先瞄准了它身边巴尔干的南斯拉夫，以消除“欧洲的最后一个红色堡垒”，建立“欧洲统一的秩序”。它利用科索沃危机，以“防止人道主义灾难为借口”，蓄谋拿南联盟开刀。南联盟成了“新战略”的试验场，并以此“杀鸡给猴看”。

在此，有一段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北约“新战略”出台后，立即遭到我国和许多国家以及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但当时由于某些复杂的原因，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人权高于主权”、“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主权过时论”等认识模糊，甚至有的学者以不同性质的欧盟组成为例赞同“主权过时论”。北约袭击南联盟这一严酷的事实，揭示出“新战略”的本质，让许多人看清了所谓“新战略”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尤

其是使那些弱小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他们会经常面临着强权与霸权以各种名目的干涉和侵犯，国家主权和安全受到威胁，有的评论指出：“南联盟的今天，也许就是某些国家的明天。”

### 霸权下的谎言

我记得在 1998 年，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夫人来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会见她时，她忧心忡忡地谈到南斯拉夫的演变和分裂，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不知不觉中就会有灾难。此话不久，便在科索沃上演。

狼要吃小羊，又想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北约要进攻南联盟总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使其“师出有名”。为此找借口，这是西方新闻媒体的拿手好戏，他们经常这样做，善于为某场战争行为制造欺骗舆论。远的不说，许多人记得，1991 年海湾战争前有这样一个故事“打动了许多人”，成为推动和支持那场战争的“催化剂”：1990 年伊拉克侵略科威特，10 月 10 日在美国人权听证会上，有一位 15 岁的科威特小姑娘，声泪俱下地控诉说，伊拉克侵入科威特时将婴儿从医院保育箱中扔出去。这种残暴经美国媒体张扬得家喻户晓，情绪大大激动的人们支持了布什进行海湾战争。“大赦国际”在同年 12 月 19 日出版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侵犯人权的报告中，记载有 300 多名科威特婴儿死于这种残暴，由于“大赦国际”的传扬而扩散到世界各国。海湾战后人们才弄清楚，故事中的小女孩是科威特驻美国大使的女儿，她的证词只是事先有意准备的说辞。但已时过境迁，此事的澄清已经没有实际的意义。

2003 年美国出兵伊拉克，故技重演，拿最能引起公愤的恐怖活动说事，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独裁、残暴，与本·拉

登和“基地”组织有联系，暗中支持策划了“9·11”恐怖事件，手中握有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后来的情况大家都清楚，美国派出一批又一批核查人员深入到伊拉克各地发掘这种武器，谁也没有找到，没有拿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最后以“莫须有”绞死了萨达姆，占领了伊拉克，造成伊拉克内乱不止，大量平民死伤。

这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打击南联盟，又制造了一些什么“理由”呢？为妖魔化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渲染科索沃难民灾难，他们捏造出一个南斯拉夫在科索沃残杀平民的“拉察克事件”。据西方媒体报道，1999年1月在科索沃的拉察克村发现了40多具平民的尸体，惨不忍睹。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借欧安组织驻科索沃观察团团长沃克尔之口，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先入为主地定性为是南联盟政府军“对阿族平民的集体屠杀”，耸人听闻地归结为“种族清洗”，“是人道主义的大悲剧”。随后又有什么“万人坑”等各种流言不胫而走。西方舆论凭借舆论霸权，采取惯用的手法，集体炒作，轰炸式地轮番播放被“集体屠杀”的悲惨画面，一堆堆尸骨的镜头给民众以强烈感官和精神刺激，形成轰动效应；他们反复报道阿族“难民潮”，放大标题、图片，文字表达耸人听闻，传遍和震惊了世界。这一切，似乎证据确凿地说明米洛舍维奇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激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愤，为北约进行所谓“人道主义干预”赢得了支持票。

战争期间，这一“野蛮屠杀事件”一直成为北约挑动塞族与阿族仇恨、欺骗民众的典型事件，成为发动和支撑北约袭击南联盟的精神支柱。我记得，战争爆发时我正在与美国时代华纳商谈“《财富》上海论坛”，商谈对手是《财富》杂志的高级编辑阿格蒂，北约开战时她正从美国来到北京，一见面我们就开始了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辩论，她慷慨激昂地阐述北约轰炸的“人道主义”理由，依据就是“拉察克事件”，消息来源就是媒体舆论。北约依据自己制造的“灾难”，然后又以救世

主的面目举起“制止种族清洗”、“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和“防止大规模战争爆发”的义旗，替天行道，进行着一场别有用心的侵略战争。

战争结束后，据 1999 年 10 月 17 日互联网的一篇《科索沃的屠杀场到底在哪里？》的文章称，国际调查组织对科索沃几百个“屠杀可疑掩埋点”进行的 4 个多月调查中，经过掘尸、清点，只找到分散掩埋的几百具尸体，多半是在交战中死亡的，不像是战争大屠杀，“由此看来，‘种族屠杀’的说法还不能成立”，认为塞族对阿族清洗中屠杀了大约 1 万人并“以大屠杀作为发动战争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找到的尸首也不到 200 具。可见，“万人坑”的电视片是美国媒体运用摄影手法从不同角度反复拍摄编辑炮制的。当谣言被戳穿后，他们又说是尸体“被转移走了”，有的归结为是“听难民传言产生的一种错觉”。靠“传言产生的一种错觉”，竟发动了一场战争。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1999 年 10 月 31 日刊登记者乔恩·斯温的文章“有关科索沃大屠杀的数字游戏”，也谈到这件事。文章中这样说：“在北约轰炸南联盟期间，西方媒体纷纷报道科索沃北部的拉察克有一个埋着成千上万科族人尸体的大坑，并称那是塞族军队进行种族清洗的铁证。但时至今日，设在海牙的联合国战争罪行国际仲裁法庭在对拉察克的‘万人坑’事件，进行了长达 4 个月的调查后不得不承认，他们在那没有找到一具尸体，也没有发现塞族人滥杀无辜的证据。”文章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夸大阿族死亡人数的西方各政要和北约军队的指挥官们就是在欺骗舆论和愚弄人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北约轰炸南联盟的行为是否正当表示怀疑。”<sup>①</sup> 真相大白，西方媒体对此却集体失语，噤若寒蝉，但军事打击的真正的悲剧已经酿成，北约的目的已经达到，真相如何并不重要了。

① 见《参考消息》1999 年 11 月 2 日第三版。

还有，西方媒体先是散布科索沃阿族领导人鲁戈瓦下落不明，后说鲁戈瓦可能已被杀害，制造阿族与塞族之间的仇恨，而鲁戈瓦却神奇地出现在与米洛舍维奇的谈判桌前，媒体又说鲁戈瓦已被米洛舍维奇软禁，失去了人身自由。

许多案例和多年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说明，美国政府与其主流媒体没有什么诚信、公正可言，做一套说一套，推行霸权主义，一切为了一己的私利。

以上事件，都成为中外新闻传播学中造谣欺骗报道的典型案例。在英国殖民战争时，英国作家吉卜林这样说过，“战争的第一个牺牲者就是事实”。纵观西方主流媒体有关战争的报道，似乎有一种规律可循：一旦政府确定了打击的目标，媒体就先行制造舆论，为达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地编造事实和谎言，欺骗民众。他们过去常用，现在常用，成为他们颇为得意的一种舆论霸权模式，将来也必定会屡用不鲜，不只用于为发动战争造势，它会大同小异地出现在各种场合和各个方面。我们拭目以待。

### 独立自主主持正义

#### ——我国政府的立场与媒体报道原则

1999年3月24日凌晨，北约秘书长索拉那下达了对南联盟实行军事打击的命令，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公然侵犯，我国政府和新闻媒体立即做出强烈反应。

我国各新闻媒体客观真实地报道了西方媒体歪曲、回避和掩盖了大量的消息，如北约空袭给南联盟造成巨大损失和带来的严重灾难，尤其是造成大量平民的死伤，践踏人权，造成的非人道主义惨剧；南联盟军民不畏强暴，面对强大的敌人奋起抗击；我国政府的严正立

场和人民群众对南的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战呼声和抗议行动，战争的非正义性。同时，我媒体还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北约“人道主义”的伪善和“新干涉主义”的本质，揭露他们打着“人道”、“正义”的旗帜夺走了几万人的生命。在北约严格控制信息资源、西方舆论一边倒和南联盟广播电视被摧毁的失常状态下，我国舆论仗义执言，让美国、北约和世界民众了解了这一战争的真相，激起反战声浪，这当然是北约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文章说，“中国的国家媒体反映很快而且强烈”。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直接出面相要挟：“4月14日，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麦克海直接写信给中央电视台赵化勇台长，无理地指责CCTV有关北约军事干涉南联盟的报道‘有失新闻职业的基本准则——客观、公正’，一些专家的评论过于‘片面而草率’，‘令人不快’。麦克海还提出希望CCTV安排时间，播出他们提供的反映北约观点的节目。”“另外，在此期间，与中国中央电视台有转播合同的美国WNVC在转播CCTV节目时也明显地进行了有意的删剪，对于诸如反映西方各国反战示威的报道，往往是画面刚刚出现几秒钟就被不相干的广告打断。”<sup>①</sup>

报道中，有人曾经提出我们是否有必要那么支持米洛舍维奇？米洛舍维奇并非做得都对。我认为，不管米洛舍维奇对国内或科索沃问题的处置是否得当，那是南联盟的内部事务，这与反对外来侵略、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不同性质的问题。主权原则是维护国家完整、抵御霸权主义的弱小国家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应当主持正义，也是在捍卫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如果“主权原则”发生动摇，霸权横行，世界将永无宁日。世界有200多个国家、2500多个民族，大多都是民族国家，存在着民族问题。一个国家的民族问题，应该由该国政府和

---

<sup>①</sup> 参见中国国际电台新闻中心副主任王冬梅：《关于科索沃问题新闻战的几点思考》。

人民通过正确的政策加以妥善解决，而不应成为外部势力干涉的借口，更不应成为对他国动武、控制的理由。否则，国家就没有真正的安全，世界就没有秩序和安定可言。

随后，我们一直在密切跟踪事态的发展动向，不断修正报道的重点和策略，既要准确、鲜明，又要适度，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赞同和支持。科索沃问题的解决最终回到了联合国，6月9日，南联盟宣布接受俄罗斯和北约拟定的政治解决科索沃危机的“和平计划”。联合国安理会10日投票通过政治解决科索沃危机决议。依据这一新的事态变化，我国媒体的宣传报道及时做出调整，冷静观察，客观报道事态的发展变化，着眼于我国政府的最新表态，强调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尊重南联盟的意见；由围绕战争为主转入客观报道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新矛盾，反映“计划”签署各方的立场和分歧，反映国际社会的呼声和为此做出的努力；客观评析“计划”的实质、存在的分歧和履行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继续报道北约轰炸造成的灾难和南联盟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所做出的努力。

### 朱镕基总理访美面临复杂的舆论形势

正是在北约打击南联盟后不久，按照预定计划，1999年4月初朱镕基总理将访问美国和加拿大。这是个敏感时期，我国坚持反对北约的侵略，形成了与美国等西方舆论的对立；另外，我国正积极筹备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正在关键时刻，正协助美国时代华纳筹办“上海《财富》论坛”，还有“政治风波”10周年这个敏感期等。西方媒体认为，这时我更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外部舆论环境，而他们却趁机加强了对我舆论的围攻，掀起了反华舆论浪潮，耸人听闻地抛出“考克斯报告”和所谓“李文和盗窃机密案”等加以炒作，

肆意污蔑中国盗窃美国技术；与此同时，中美要员的互访中止，美国政府危言耸听地提醒公民少到中国旅游，难以保证安全；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相关法案。西方紧锣密鼓，转移人们的视线，损害中国形象，向中国施加压力。其反华浪潮的实质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增强已开始引起了西方的注意，他们预感到某种未来的趋势，他们在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败坏中国形象，舆论的背后是企图阻止中国的崛起。

在这种新的情势下，外电纷纷猜测，朱镕基总理的访美是如期进行，还是推迟，或是取消？而对于我们来说，国内稳定和国际斗争相互交织，如何应对中美关系之间许多敏感重大问题，准确把握中美两国关系的脉搏呢？我国民众以不同的理解、从不同的角度注视着我国政府如何处置。

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朱镕基总理按计划如期访美，即使是“地雷阵”也要去闯，面对面地谈问题，与美国各界和民众广泛接触，让他们具体地理解和感受中国，而采取回避只能为他们的造势提供新的口实。朱镕基总理在访问期间充满自信，谈经济，谈友谊，谈共同利益，也坦诚分歧，坚持原则，态度从容，语言幽默，赢得了好感。回顾历史，我国领导人以往在国外访问中，有时因遇到意想不到的示威或突发事件，临时取消某些活动采取回避的事是有的。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复杂的，现在我们能正视和积极应对国际斗争的现实，这是一个大国领导人和民众都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

就宣传报道而言，依据以往惯例，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某个国家，或某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访华期间，我们的宣传报道是突出友好而回避分歧，礼貌待客。但这次打破惯例，明确在朱总理访美的期间的宣传报道，以我为主兼顾对方观点和舆论气氛，注重友好和共同点而不回避分歧，注重原则而不着眼细节，让我国人民了解全面真

实的情况。

事实上这样做早有先例，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双签署的联合公报，既有共同点，又不掩饰分歧，摆明了各自的不同点，为后来所称道。在朱总理访美期间，对科索沃局势照常跟踪报道，不必回避；涉及中美之间的双边或国际问题的其他报道，不必都与朱总理访美相联系而刻意注意气氛的协调，依据我们的分析判断照常报道；对待美国等西方媒体的涉华舆论，需要澄清或批驳的正常进行，该讲什么讲什么，该怎么讲就怎么讲，以舆论对舆论。应该说，新闻报道上这种依据实际而区别对待的报道是一种进步和提高。

在这期间，我国媒体不断与美国舆论交锋，批驳他们的污蔑不实之词，赵启正主任直接出面举行记者招待会，一而再地批判“考克斯报告”，引起积极反响。据1999年12月20日一期美国《时代》杂志（网络版）的报道说，该刊选出“1999年十大丑闻”，“考克斯报告”“荣膺”榜首。

### 西方主流媒体到底在做什么？

现代战争实际上是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一是军事战，二是宣传舆论战。宣传舆论是战争中一支强大的方面军。战争期间的报道有许多特殊性，严格控制信息源，严格控制记者。北约袭击南联盟，其信息源几乎全部由美国及北约新闻发言人所垄断，他们讲什么、不讲什么、如何讲，都由他们说了算，而他们手下又有一批经过严格选择的听话的西方记者。与他们不同的声音是零散的、微弱的，只是来自南联盟自身媒体、中国等主持正义的国家的媒体，还有西方个别正直的记者，就是这微弱的声音也一直受到北约的打压，战争舆论的极其不平衡也就不足为怪了。

战争初始，美国总统克林顿、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国防部部长科恩等美国和北约政要一齐出动为战争造势。整个战争期间，西方主流媒体一边倒地为战争辩护和唱赞歌，在他们的笔下战争竟是那么平静，看不到破坏和平民的伤亡，听不到炮弹的呼啸和人民群众、国际社会的反战声浪，真好像是“没有硝烟的战争”。隐瞒事实真相，只发表对北约有利的新闻和言论，甚至为了需要而制造新闻，进行飞机炸弹不可替代的舆论欺骗，迫使美国民众发出了“停止撒谎，美国人民需要知道真相”的呼声！

英国《新政治家》1999年4月19日刊登约翰·皮尔格的《欧洲的战争》一文，这是一篇不多见的文章，幽默而又辛辣，现摘录如下。文章中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英国当时的首相乔治曾向《曼彻斯特周刊》主编斯科特吐露真情：“如果人民了解真相，这场战争明天就会被制止。但是，他们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真相。”现在，天天都在隐瞒真相，“英国广播公司在新闻节目中把对科索沃的轰炸称作‘天使之音’”。作者说，轰炸了平民只是轰炸机“受诱惑偏离了目标”，而“现在，北约轰炸了科索沃首府的居民区，受到惊吓和被炸死的正是克林顿和布莱尔所说的他们要保护的人们”。作者风趣地假设，如果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的开头这样说：“晚上好！轰炸开始后逃离家园的数十万难民一周来并没有得到北约的帮助，而北约的空袭继续在塞尔维亚杀害无辜的平民，英国政府提供了2000万英镑。”这样的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约翰·皮尔格在文章中谈到北约几次明知而又轰炸平民的惨剧，他说“真正的新闻是北约的空袭与人道主义毫无关系”。他说，英国一家杂志的女记者采访了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韦斯利·克拉克将军。她压根没提问与平民伤亡有关的问题。相反，她似乎在鼓励这位将军派地面部队。

另据美国“公正与准确报道”调查，在轰炸的头两个星期，美国

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节目，没有报道过与美国不同观点的意见，而其选择的采访对象中 55% 是现任或卸任的美国政府的官员、军方人士、北约代表或部队人士，他们成了宣传战争的机器。所以美国巴尔干事务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在 4 月底赞扬说：“我们最近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看到的关于科索沃的报道是非凡的和堪称模范的。”英国《新政治家》周刊 5 月 17 日刊登一篇题为“盲人引路”的文章说：“媒体实际上就是北约这次行动的一部分，它们在通过宣传任意涂抹历史和现实。”文章提醒，大量的事实告诉人们，在美国大喊“新闻自由”的时候，人们一定要特别提高警惕。

与此同时，北约对那些于他们不利、反映事实真相的其他新闻媒体进行封杀、攻击，不惜进行打击。他们公然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悍然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炸死我 3 名新闻工作者。有的美国议员叫嚷“不给南联盟政府以任何可能的舆论空间”，北约把南联盟电台、电视台称作“造谣机器”、“战争工具”，作为“军事目标”连续多次进行狂轰滥炸。4 月 23 日，北约用巡航导弹袭击了塞尔维亚电台电视台大楼，造成 10 人死亡、15 人受伤，大楼被毁，致使正在播音的三套节目中断。27 日，北约飞机再次摧毁了 6 家电台和电视台的无线电设备。

对此，新华社驻贝尔格莱德记者邵云环写了《在血与火中的所见所闻》，她在谈到电视台被炸时写道：“就在北约的飞机向电视台发射导弹时，大楼内 100 多名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工作。当时就造成了两人死亡和 17 人受伤，第二天死亡人数已增至 10 人。这还不算埋在废墟里不知死活的人数。”邵云环写道，当天下午上百名外国记者举行抗议集会时，德国一家电视台的记者用颤抖的声音说：“几天以前塞尔维亚电视台的一位朋友还询问我的工作地点是否安全，我告诉他我是安

全的，可现在他却不在了。”谁也不会想到，没过多久，邵云环也遭到被炸的厄运。北约对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的轰炸，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新闻记者成为战争被打击的目标而不是被保护的对象，他们的生命安全和新闻自由失去了保障。

北约连自己的同类也不放过，对待英国广播公司国际新闻主编辛普森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西方主流媒体的实践颠覆了他们标榜的新闻理论和新闻观。这一切，是西方主流媒体采用的基本手法，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下，针对不同的事件而反复变换使用。万变不离其宗。

科索沃战争刚刚结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中心副主任王冬梅即发表了长篇文章《关于科索沃问题新闻战的几点思考》，以她在电台宣传报道第一线和接触国际电台驻外记者的方便条件，记述了驻外记者亲历实感，从方方面面真实、客观、具体、生动地披露了在这场新闻战中西方主流媒体的种种表现和手法，很有说服力。以下转录其中的一部分：

我台（中国国际电台，下同）驻华盛顿记者杨磊在一篇题为“在美国感受没有硝烟的战争”的通讯中说，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开始后，位于华盛顿的“外国记者新闻中心”为记者们提供了所谓“全方位的服务”，反映出美国政府的新闻材料应有尽有。可是当记者想了解一些有关轰炸给南联盟平民造成损失的情况时，得到的回答却永远是：“对不起，现在没有。”杨磊的报道还说，自北约开战以来，美国公众反对战争的人数一直保持在35%～48%之间，但这些人的声音却“基本上被忽略了。偶尔有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现出反战情绪，马上就会被主持人纠正过来，或是被更大的支持战争的声音压过去。更为过分的是，美国舆论甚至不能容忍比较“温和”的“中性”报道。在北约轰炸南联盟初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首席大牌记者丹·拉瑟在贝尔格

莱德采访了米洛舍维奇的夫人，拉瑟问她塞族军队是否在科索沃进行了屠杀，米洛舍维奇的夫人回答说：“根本没有！”拉瑟没有进一步深问便转到另一个话题上。该节目播出后，拉瑟便遭到美国舆论的攻击，讽刺他“太软弱”，质问他为什么不直接“指着她的鼻子说：你在撒谎”！根据美国“公正与准确报道”组织的调查，在北约轰炸南联盟的头两个星期，美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没有报道过任何与美国观点不一致的意见，整个节目完全成了巴尔干战争的推进器。

我台驻布鲁塞尔记者高世军在报道中说，北约对南联盟动武前后，北约总部发言人谢伊以及北约的指挥官等人得意忘形，每天至少举行两次新闻发布会，不厌其烦地向记者宣扬北约的决心与战果。但是，他们在挑选提问记者时，却把记者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般只叫西方那几个大媒体的记者，以和他们形成呼应；而对于来自中国、俄罗斯、南联盟那些他们认为可能提出令北约尴尬问题的记者，却始终采取躲避或敷衍态度。此外，对于那些他们认为不会影响北约成员国公众意见或在国际上没有太大名声的发展中国家媒体的记者，同样也采取冷落的态度。

我台驻德国记者谭蕾深有感触地说：在国内常听到有人用羡慕的口吻谈及西方的所谓“新闻自由”，自己虽不赞同，却也没有实际的体验来反驳。到了德国，置身于一个标榜“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从事新闻工作后，才对“新闻自由”有了切肤的认识，才发现那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的幌子。特别是在北约轰炸南联盟之后，德国媒体上一点也看不到北约战机轰炸南联盟造成破坏及死亡的情况，每天都是米洛舍维奇是“塞族的希特勒”，北约的军事干涉是出于“人道主义”，拯救科索沃阿族于水深火热等一边倒的言论。在一次官方的记者招待会上，谭蕾提出了一个质疑北约行动的问题，竟遭到了不予理睬的待遇。

我台驻罗马记者金力在北约对南联盟动武前夕奉命到科索沃采

访，他发回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内容：“3月4日，在普里斯蒂纳南联盟政府信息部部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几乎没有见到西方记者；而在一天前欧安组织观察团团长沃克尔的记者招待会上，则挤满了西方记者。在那里，我耳闻目睹了一位加拿大记者因提出一个对南联盟有利的问题而遭到西方记者无理嘲笑的场面。”

我台驻伦敦记者许华珍报道说，英国广播公司（BBC）驻贝尔格莱德的资深记者约翰·辛普森日前遭到了英国政府的严厉批评，原因只是他在报道中援引了一位贝尔格莱德市民的话说，北约的轰炸增强了他们对米洛舍维奇的支持。<sup>①</sup>英国政府指责辛普森的报道有失一个老记者“应有的水准”。更令英国不满意的是，辛普森还报道了被北约轰炸的现场。他认为塞族人让外国记者参观被炸现场，说明他们对北约的指责是有根据的，没有撒谎。但英国官员却指责说，辛普森这样的报道是“简单和表面”的，会给人以北约的轰炸使塞尔维亚民众和军队更加“团结”的错觉。经常指责中国对新闻实行控制的西方国家着实让辛普森身上开了自己一个玩笑。

我台驻肯尼亚记者江爱民将美国主流媒体对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与去年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使馆被炸这两个同样是举世皆惊的事件报道进行了一个比较：对于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CNN四家美国主流媒体，一改平日急风暴雨式的炒作习惯，在5月8日至20日的12天中，对这一事件（中国使馆被炸）的报道都仅有10篇左右，平均（每家）不到每天一条，而且都是篇幅少、时间短。在20日以后，它们就像预先约定好了似的，对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干脆都无声无息了。而同样是这几家媒体，在过

<sup>①</sup>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3月28日刊登辛普森的报道“我所报道过的最奇怪的战争”，把这次战争与1991年的海湾战争做了性质不同的对比，其中写道：“在塞尔维亚电视台的节目中，我们看到的是熊熊燃烧着的建筑物，大规模的爆炸场面。在这座最不起眼的城市里，被炸的火箭工厂中滚滚冒出的橙黄色有毒浓烟聚集在郊区的上空。”——笔者注

去 10 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中断对美国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两个使馆被炸案的追踪报道，其专题报道数量分别为：《纽约时报》139 篇，《华盛顿邮报》143 篇，美国广播公司滚动播出 2868 条，CNN 滚动播出 2183 条。这组统计数字可能并不十分准确，但却足以说明美国主流媒体出于政治需要对这两起事件报道在立场、热情等方面反差是多么强烈。

美国媒体在这次科索沃危机中的表现受到了官方的赞许。美国巴尔干事务特使霍尔布鲁克就赞许说：“我们最近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有限电视新闻网（CNN）看到的关于科索沃的报道是非凡的和堪称典范的。”对于媒体的这种表现连西方人自己都感觉“不对劲儿”。英国《新政治家》周刊曾刊登一篇文章（中）说：“媒体实际上就是北约这次行动的一部分，它们在通过宣传，任意涂抹历史和现实。”

科索沃危机应在联合国范围内用政治手段解决。自 1999 年 3 月 24 日至 6 月 9 日，北约袭击 78 天，南联盟难以承受巨大损失和压力，被迫做出妥协，塞尔维亚议会通过了接受由俄罗斯、欧盟和美国三方提出的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危机的和平方案。这一方案，满足了北约坚持的南联盟从科索沃撤军，以北约为首的维和部队进驻科索沃，科索沃难民重返家园等基本条件；同时北约认可了科索沃问题在南联盟主权和领土完整框架内解决，阿族非法武装组织“科索沃解放军”将被解除等。6 月 10 日，联合国安理会以 14 票赞成，1 票弃权（中国）通过政治解决科索沃危机决议。联合国表决时，我国对此“计划”是有保留的，但作为谈判主方的南联盟迫于压力和已造成的灾难不得不妥协，我们也只能尊重这一客观现实。10 日北约停止了对南联盟的轰炸。

北约 78 天的空袭，据统计，至少死伤 1 万多人，其中约有 1800

平民丧生，难民 100 多万人。毁坏：57% 的原油储备，60 多座桥梁，12 条铁路，5 条公路干线，7 个机场，大批工厂、医院等民用基础设施，财产损失约 6000 亿美元。尽管有多种不同的具体统计数字，这种差异并不重要。南联盟认为“轰炸使南斯拉夫倒退了几十年”。战后，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却以“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被海牙国际法庭逮捕入狱，多次受审而无定论，最后死在狱中。

## 七 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报道纪实

### 我国政府声明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

1999年5月7日贝尔格莱德时间晚11点48分，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中央立即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紧急会议，迅速做出强有力的反应。

5月8日1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国内外播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5月7日午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3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袭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造成馆舍严重毁坏，迄今为止已有2人死亡，2人失踪，20余人受伤。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40多天的狂轰滥炸，已经造成无辜平民百姓大量死亡，现在又居然轰炸中国大使馆。北约的这一行径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也是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肆意践踏。这在外交史上是罕见的。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一野蛮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并

提出最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从我国“政府声明”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集中的关注点和强调、坚持的重点：一、说明了中国政府对这一事件的高度重视程度和问题的极其严重性；二、把对我使馆的袭击和轰炸情况具体化——“使用3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袭击了中国大使馆”，“声明”中有的事实是依据当时所能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来写的，如“使用3枚导弹”，后来查明是5枚（其中一枚没有爆炸）；“已有2人死亡，2人失踪”，后来查明是“死亡3人，失踪1人”，但当时有1人是死亡还是失踪说法不一致，当时确定写2人死亡2人失踪，留有余地，更为主动。声明用具体事实说明了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不是误炸，而是有预谋、精心策划的；三、把造成的损失和严重后果具体化，“造成馆舍”严重毁坏，“迄今为止已有2人死亡，2人失踪，20余人受伤”，具体说明了对我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和所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激起国人的愤慨和国际社会的同情；四、指出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40多天的狂轰滥炸“已经造成无辜平民百姓大量死亡”，“现在又居然轰炸中国大使馆”；五、在“北约的这一行径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也是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肆意践踏”之后，又加重强调了“这在外交史上是罕见的”；六、特意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一野蛮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指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郑重声明“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使我国始终保持主动，保持对美国及北约的压力。各报刊发表“政府声明”时的副标题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这一措辞严谨、严厉、强硬的声明全面反映了我国政府和人民的

严正立场，成为我国媒体进行新闻报道的依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召集首都主要新闻媒体研究宣传报道部署时强调：一是充分表达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坚决支持我国的外交斗争；二是充分表达全国人民的强烈义愤和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三是维护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把人民群众的强烈爱国热情化为巨大力量，做好自己的事情，增强国家实力。中国媒体一向把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作为宣传报道的最高原则，他们迅速做出了强烈反应，发挥了表达和引导的作用。

### 中西媒体截然不同的声音

我国政府声明指出：“北约的这一行径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也是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肆意践踏。”一个国家的大使馆是这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是受国际法保护的，有的军事专家说，如果这种使馆被炸事件发生在双边关系紧张的国家，等于变相向一个国家宣战。我驻南联盟使馆被炸，直接侵犯了我国主权，威胁着我国的安全，是直接对我国的挑衅行为，我国媒体必须立即做出最强烈的反应，调动一切手段，加强内外舆论宣传，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宣传报道紧紧围绕对我国主权的侵犯，突出这是有预谋的袭击而不是误炸，突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使馆破坏的事实，主要打击对象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我国各新闻媒体都紧急行动起来，打破常规，加大宣传报道的密度、力度和声势，密切配合我国政府处理这一事件的部署和外交活动，充分反映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充分揭露和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霸权行径。

北约袭击我国使馆，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反对霸权、捍卫主权、爱我中华、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中国人民举行了各种抗

议活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等地的广大群众到美国使领馆前游行示威，愤怒声讨美国及北约没有人性的暴行和霸权行径。中国各新闻媒体（我国网络媒体才刚刚兴起）集中做了报道，采用多种方式反映他们声讨北约罪行的正义呼声，既体现了我国的原则立场又积极疏导舆论，保证了国内的社会稳定，增强了群众的凝聚力和强国意识。

香港、澳门媒体迅速做出反应，刊发中国政府声明和新华社消息，坚决支持我国政府采取的坚定立场，充分报道大陆和本地人民群众的抗议活动，并纷纷开辟专栏，以醒目的标题和大幅照片做出态度鲜明的评论。台湾公众和团体以多种方式举行抗议活动，一些媒体对使馆被炸和大陆的抗议活动做了报道。但有的媒体态度暧昧，发出了某些不和谐的声音，对此台湾舆论指出“血浓于水”、“台湾方面也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海外华文媒体也积极做了报道。

我国政府声明发表后，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迅速播发，大量稿件援引我声明要点和新华社消息，但却很少报道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密切跟踪和研究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舆论反映。注意到，从善于造势的西方媒体上，很少看到中国的正面反应，报刊上几乎没有刊登使馆被炸的照片，个别照片反映的却是中国使馆宿舍保存较好的那一面，可见其用心之良苦。这就是一向标榜“客观、公正”的美国和西方主流媒体！相反，西方主流媒体迅速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大量报道什么中国人民游行示威冲击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焚烧美国国旗、投掷石块、焚烧汽车、打碎玻璃；冲击肯德基等快餐店，提出禁止美国货等。他们极力渲染、添油加醋，误导公众。他们把示威者称为“暴民”，诬称中国政府在通过舆论操纵民众、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媒体煽动“我想我们应该停止道歉。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这是一次意外事件，美国对此问题已经无能为力”。这就是一向标榜“客观、公正”的美国和西方主流媒体！就连老朋友基辛格

在5月11日接受CNN主持人采访时也说，“我认为中国的反应过度，确实无法让人接受，特别是我们这些一向主张美中建立最亲密关系的人”。对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写信给基辛格表示对他的谈话“不理解”，基辛格在解释中承认不妥，5月31日基辛格发表了《新的世界混乱》一文，批评克林顿的科索沃政策以及“美国同中国、俄罗斯的关系”。

纵观这一时期美国媒体对袭击我国事件的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归纳出几个特点，录以备忘：一、坚持“误炸”说，帮助推卸责任。他们统一口径定调，坚持“误炸”一面之词，“用了过时的地图”，几乎都冠以“错误的”、“意外的”字眼，不是“蓄意的”，是由“一步小的失误引出巨大的灾难”，企图把大事化小，帮助美国及北约推卸责任。二、对我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反应冷淡。对我使馆被炸表示“惊讶”，对我三名记者遇难和使馆馆舍的破坏只认为是一场“悲剧”、“悲剧性错误”而轻描淡写地带过，却反击我为此举行的对待牺牲者、受伤人员的活动和媒体报道是“反应过度”。三、对我民众抗议活动大量歪曲报道。美国媒体诬蔑我示威群众是“暴徒”、抗议活动是宣泄“反美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美国国防部长科恩也指责是“有意煽动的反美情绪”），编造美国驻华使领馆和在华人员“没有安全感”，甚至要中国赔偿他们领事馆的损失。四、攻击我国政府在推动“反美浪潮”。政府在策划群众的抗议活动，支持群众的“过激行动”，诬称“中国的宣传机器”为反美情绪“推波助澜”，“它通过不准确的事实和煽动性的口号使这种情绪不断升级”。五、利用“道歉”倒打一耙。宣扬对于美国的“道歉”中国政府不理睬，中国媒体不报道，中国的“反应过度”，要求“难以接受”。六、有意造谣我增加军费，加快发展军事力量，宣扬“中国威胁论”，制造紧张关系。七、对我国内形势枉加评论，说什么“矛盾加剧，社会动荡”，企图挑拨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八、借我

申请加入世贸组织向我施压。美国“不能做出不明智的让步，不能不惜代价讨好中国”。总之，从美国媒体的上述表现可以看出，一向标榜“客观、公正”的西方媒体，总是坚定地维护他们的国家利益，在遇到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总是惯用歪曲事实、转移视线、以守为攻的策略。这哪里是“客观、公正”，是不折不扣的舆论霸权主义！今后还会反复不断地故技重演。

### 荒谬的“误炸”说与“过时地图”论

中国大使馆被炸，依据中国政府声明的原则，中国外交部向美国正式提出：必须公开、正式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受害者家属道歉；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迅速公布调查的详细结果；严惩肇事者。有人归结为：道歉，彻查，公布和严惩。

事实证实，5月7日深夜中国大使馆被炸时，受到两次攻击，5枚（起初报道是3枚）激光制导炸弹从不同的角度进入。这是有意的报复行为，而不是误炸。许多中外专家也从不同的角度做了论述。从大使馆被炸废墟中逃出来的《人民日报》记者吕岩松当时写的《我亲历中国使馆被炸》<sup>①</sup>发出呼喊：“我想跟国内的同胞说，北约完全不是误击，你们千万不能相信他们，要记住我们同胞的血和泪，他们是有意在屠杀我们，摧残我们。”但是美国及北约官员和西方主流媒体一直定调为“误炸”和“过时地图”为袭击中国大使馆辩解。“误炸说”与“过时地图论”是如何形成的？

“误炸”是由谁最先提出来的？又如何演变成是由于使用了“过时地图”而造成了“误炸”？开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表示，如能证明确实是北约造成的，将对中国表示遗憾。5月8日，在北约举行

<sup>①</sup> 见1999年5月9日《环球时报》。

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大使馆被炸成为记者集中关注的话题。根据当时的记载，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开始说，“北约的确炸到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他说，“中国使馆不是我们（轰炸）的目标”，目标是南联盟的供给措施，但“不幸炸了它”。他声称“这是个巨大的错误”。北约军方发言人沃尔特·杰特兹为袭击中国使馆辩解时说：“我们原以为中国使馆所在的建筑是南联盟的一个‘联盟供应和采购中心’。”北约指挥部对此表白，他们袭击的目标是包括一家被当作南联盟特别警察部队营房的旅馆，目的是扰乱南联盟军队和特别警察部队的指挥；北约欧洲盟军声明称，它集中轰炸的是南地下掩体，一个用于准军事目的的旅馆、国防部和军警建筑，无意中击中了中国驻南使馆。他们混乱的说辞都在为自己的残暴行为辩解，虽然他们没有用“误炸”一词，但是回避了是“有意的”，隐含着“误炸”，这成为被媒体称为“误炸”说的起源。

北约用“误炸”抢先为他们的发言、研究对策和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统一了口径，找到了辩解的“说辞”。据中国国际电台王冬梅《关于科索沃问题新闻战的几点思考》的文章中说：“5月8日，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等大媒体，在简单地报道我国使馆被炸的消息时，异口同声地称之为‘误炸’，随之还配发了北约开始轰炸南联盟之后八次‘失误’的背景资料，‘高度一致地’为北约‘误炸’寻找佐证，竟连一点怀疑的声音都没有。”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误炸”？5月8日北约军方发言人沃尔特·杰特兹面对记者的细节追问，为袭击中国使馆辩解时说：是“程序发生了错误”，“信息错了”，“炸弹制导并没有错误”。对于为什么会造成“这一错误判断”，他同时展示了两份地图，说明被炸地点。据当时的记载，这时候竟有记者这么具体地提出了问题：“是否军事地图有错误，中国使馆才建了三年，或许北约用了一张旧地图。”这样的提问似乎无意，

但又像是有意，分明提出了“地图有错误”，而且可能是“一张旧地图”。

这一记载，在后来王冬梅《关于科索沃问题新闻战的几点思考》一文中得到印证。该文说，据香港《亚洲周刊》报道，关于使用“过时地图”之说，“最早并不是北约或美国的官方机构提出来的，而是由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克里斯托弗·迪基5月8日在北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来的。他说：‘是否有可能由于某些原因，采用了一份过时的地图，上面没有表示出新的中国使馆的所在位置？’”以上报道的两种说法，尽管用词不完全一致，似乎是同一件事。

两天后的5月10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防部记者招待会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两位高级官员指出，使用“过时地图”是“误炸”的原因，首先抛出了“过时地图”论。这种前后的变化，不得不使人怀疑“过时地图”论有没有幕后的策划，先假借记者之口提出，放出气球，或者借记者之口受到启发而顺水推舟。随后西方媒体就围绕这一定性说法进行炒作，形成了所谓的“主流解释”。同一天的《纽约时报》记者埃里克·施米特把“误炸”具体归于一份1997年的地图做了报道。全美报刊和电视台都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个解释版本，从此再也没有改口。

就这样，“过时地图”与“误炸”之说，互为因果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学者、专家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有据有理地从各个角度提出质疑，分析批判这一编造的谎言；国际舆论提出“这是不可能存在和发生的事”，即使地图有错，在实施轰炸之前要经过许多环节的审查和审批；查阅当时美国媒体的报道，《纽约时报》1999年5月8日报道：“贝尔格莱德人说，混淆中国大使馆与轰炸目标并不容易。中国大使馆是一幢大理石建筑，有蓝色的玻璃，而且飘扬着中国国旗。而轰炸目标则是一栋白色写字楼，而且年代也较为久远。”尽管“误炸”与“过时地图”论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但美国及北约官员和媒体坚持不改口。

自“误炸”与“过时地图”论出台以后，美国国家地图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们不愿意背黑锅，5月16日地图局发表了关于“轰炸中国大使馆”的声明。声明中说：“瞄准目标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综合分析多渠道的国防和情报信息。一份地图册并不是作为识别和确认目标的唯一凭据。对目标的区别和确认依赖于各种不同渠道的信息总合，以及各种情况和战斗情报汇集而成的自动数据。同样，地图并不是航空和航海的唯一信息源。它需要定期补充一段时间的最新情况，如飞行信息资料、给海员的告示、气象信息以及作战指挥员提供的最新情况。”声明中说：“最近有关国家地图局地图准确性的新闻报道是不准确和不全面的。”<sup>①</sup>美国国家地图局是美国国防部的测绘机构，由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测绘机构合并而成。据《亚洲周刊》报道，地图局发言人珍妮弗·拉弗利向《亚洲周刊》进一步证实说：“我们的地图正确地标示出中国大使馆及南联盟军需局的位置。”事实上，中国大使馆与南联盟军需局之间距离约250米远。

中国使馆被炸后近10年，笔者看到，被认为“误炸事件”中“用错地图”的“元凶”、美国陆军中校、长期为中情局工作的班尼特，2009年3月22日在美国遭到袭击身亡，他们更把一切推到了班尼特的身上。2009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中国顾问李侃如（前驻华大使）认为，“误炸”言论在美国已定调，当时造成“误炸”的人也已作古，中国使馆被炸事件在美国逐渐被淡忘。按照他的这一逻辑，用“过时地图”造成中国大使馆被“误炸”之说，似乎成了死无对证的国际大谜案。

5月7日中国大使馆被炸后，依据中国政府声明的原则，中国外交部向美国正式提出：必须公开、正式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

<sup>①</sup> 来自“互联网美国国家地图局网页”

受害者家属道歉；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迅速公布调查的详细结果；严惩肇事者。

美国总统克林顿听到中国使馆被炸后，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歉意”，中国政府不接受，中国媒体不报道。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压力下，几天之后，14日凌晨克林顿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悼念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遇难者留言簿上留言，写下了：“对死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同一天，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要求，与克林顿通电话。克林顿说：“我愿对发生在贝尔格莱德的悲剧表示由衷的道歉，尤其是向受伤人员和遇难者的家属表示我个人的歉意。”他保证查清事件发生的原因，并尽快让中国人民了解事实真相。江泽民重申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指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彻底、公正的调查，并迅速公布调查结果，满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提出的全部要求。

6月16日美国总统特使、副国务卿皮克林奉克林顿总统之命，来北京向中国政府报告了袭击中国大使馆事件的“调查结果”。他说，美方调查表明，中国大使馆被炸是一起由美国一些部门的一系列失误所导致的“悲剧性误炸”事件。他讲了三个重大失误：一是目标定位方面的错误，原因是使用了“1989年和1996年以及美国国家地图局绘制于1997年的三幅地图”。二是美国数据库存在缺陷，尽管美国官员曾数次去过中国驻南使馆新址，但数据库没有及时得到更新，美国拍摄的卫星图像也没有显示出中国驻南使馆的显著标志。三是审查程序未能纠正上述两项失误。

对此，我方重申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并提出美国政府对中国使馆造成的破坏要“承担起全部赔偿责任。对中国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做出迅速、充分和有效的赔偿”。我方提出美国要采取实际行动妥善处理好这一事件，为中美关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创造必要的条件和气氛。

## 八 “人权”入宪前后

2003年3月初，我走进了政协，同时担任十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我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期间曾经分管人权的对外宣传，2001年退居二线后担任了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和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的职务。由于历史的延续，我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依然分工对外宣传和人权工作。在政协工作的前后5年，也总是在做自己熟悉的事，建言献策总离不开外宣和人权。而恰恰在这个时期，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有了突破性和标志性的进步，2004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高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这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之事，也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人权”入宪决定的因素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为把“人权”写入宪法和实施宪法，党和国家以及有关组织和人士都做了大量工作。

### “人权”认知与发展的曲折历程

“人权”入宪，是我国社会和人权事业长期发展的结果，在这之前

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要理解人权入宪，我认为有必要首先简要回顾一下我国人民对人权的认识、争取人权的斗争和人权事业的发展历程。

人权是什么？很长时间国人对这一概念都很陌生。对于什么是人权？当今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有过许多论述。“人权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们的社会性权利。”（冯卓然教授）。“人权，实际上是做人的权利和资格，就是人的尊严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良心自由和人格尊严便成为人权观念的基石。”（谷春德教授）。“人权本质上是代表着人类的尊严，尊重人权，就是尊重人本身。”（张晓玲教授）。

概括地说，笔者认为“人权是人应该享有的尊严和基本权利”。这里的“人”，包括所有的人。人是天地万物之灵，一切个人或集体的行为，都是为了满足个人或集体的需要，以人为核心，以人为本。人活得要有尊严，人所生存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基本权利都应该得到国家的保障，尤其是法律的保障。以此而论，人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要求，逐步形成人们的共同愿望，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包括斗争），然后成为法定的或公认的权利；因此，人权是社会的，是“历史地产生的”。（黑格尔语）而不是“天赋的”、“上帝赐与的”或“与生俱来的”。

依此追述历史，在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治国理念中，有着非常丰富的人权理念，如“天生万物，惟人为贵”，“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也者，人也”，“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得人心者得天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民有“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患，要“知民稼樯之艰难”；“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礼之用，和为贵”；“兼相爱，交相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天人合一”；等等。这些至理名言俯拾皆是，从中所折射出的人权理念至今仍有旺盛的生命力，为国内外人权界广泛认同。

但是，作为明确的“人权”概念的提出，不是中国文化的发明，是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启蒙思想家的专利和贡献。他们针对欧洲中世纪最黑暗的封建专制特权和神权，适应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发展的需求，提出了标志个人和个性解放的平等、自由、民主和博爱的口号，形成了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是最早法定“人权”概念的重要文献，平等、自由、民主和博爱等成为西方人权观的核心。“二战”后，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构筑了国际人权框架的基础，宣告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受恐惧和匮乏威胁的自由”四项自由原则，被许多国家所认定。

“人权”概念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的后期，比欧洲晚200多年。在旧中国，由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多次入侵，中国人民生活在“外无国权，内无人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尽了各种侮辱和压迫。

中国人民为争取主权和人权，经历了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1919年爆发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陈独秀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重任，高举“外争国权，内争人权”的大旗，为此浴血奋斗了28年。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中国人民争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把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真正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为中国人获得生存权、发展权及其自由、平等、民主等权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由人民当家做主，中国人权状况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迎来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新纪元。

享有充分的人权是全世界追求的崇高目标，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

程。人权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严格地说，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由该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进步所决定的，构成了这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等有了根本政治保证和基本的物质保证，在国际上也赢得了自己应有的尊严和地位。但是由于当时的内外政治环境等主观与客观原因，对人权的认识和实践都出现过重大曲折，走过了一段弯路。解放初期出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需要，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后来又进行“反右”斗争等多次政治运动，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戴上种种政治问题的帽子并受到打击，在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中也就不再提倡“人权”。后来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上把“人权”当作资产阶级口号和法权批倒批臭，实践上严重地践踏了宪法和法律，人的尊严、权利甚至生命受到严重侵犯和摧残，从此无人敢谈人权，给人们打上了视“人权”如虎的深深的思想烙印，但也从另一方面大大激发了人们对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渴求。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我国人权发展最坚实的基础，也是最好的时期。但就我国人权建设自身而言，改革开放的初期依然是谈人权而色变。我记得，1979 年 3 月下旬《北京日报》依然发表了《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的文章，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肯定和推崇。严格地说，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才把研究和重视人权提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

1989 年春夏之交发生了“政治风波”，在西方敌对势力和舆论掀起的一片反华声浪中，攻击和制裁的焦点集中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严重地损害着中国的形象，这才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不久中央明确提出“要研究人权”，并要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即：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力量把人权理论问题弄清楚，回击西

方反华舆论。这时候，才把“人权”概念又重新提出来，并加以研究，有了全面的分析，予以充分肯定。带有标志性的事件是1991年11月我国首次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白皮书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首次提出并确立了“生存权、发展权是中国的首要人权”，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建设。这期间，经中央批准，1993年3月“中国人权研究会”和1994年8月“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等人权研究组织相继成立，从此对国内外人权的理论和实践进入有组织有系统的全面研究，并积极开展了国际人权领域的人权斗争和人权交流活动，逐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人权理论，不断提高了我国民众的人权观念和人权意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既是中国人权理论、也是中国人权实践发展最快的时期，是中国集体和个人人权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生巨大变化、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对此我们都切身受益，而且得到国际社会所公认。

### “人权”概念入宪诉求

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对人权的法律保障提出了“人权”概念入宪的诉求。人权，作为人应该享有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应该受到政府、尤其是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把人们的共同愿望形成法定或公认的权力，才切实可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已经制定过有丰富人权内涵，甚至直面人权的法律法规。新中国建立后，从1954年开始先后制定了四部宪法，人权保障的原则和内容不断完善。《宪法》规定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原则，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民权原则，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区域自治”的原则，而且其中总有一章详细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公民享有平等、言论自由等各种权

利，并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等等。为使宪法有关原则得到切实的实施，先后制定了涉及各领域的具体法律法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大加快了法制建设的步伐，对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等做出了具体法律规定。

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以往的宪法和有关的法律中，尽管涵盖了人权的内涵，却都没有明确地提出和运用“人权”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条文，这反映了以往对人权认识上的差距和法律上的缺失。据我所知，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曾经多次讨论并提出把“人权”写入宪法的建议，有的专家、学者还对一些国家宪法中的条文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们集体或个人向中央和全国人大提出过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大体可以概括为：一、在我国历部宪法中没有载入“人权”这一概念，宪法是不完全的；二、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由此在各项法律法规中也就没有明确提出保障人权；三、没有宪法和法律对人权的保障，一些官员对人权认识模糊、意识淡薄，甚至任意侵犯人权；四、没有宪法对人权的规定和提倡，影响了对公民人权的教育，公民缺乏人权意识，不能正确认识自身应该享有的尊严和权利，不善于甚至不懂得用宪法和法律进行自我保护；五、宪法是国家民主政治的一面旗帜，“人权”不入宪在对外交往和国际人权斗争中时常处于被动不利地位。因此建议，把“人权”概念明确写入我国宪法，是反映我国客观现实、顺应公民愿望和历史发展的潮流，是进一步推动中国人权建设和带有国际重大影响的举措。

### 第一次与网民互动直面人权

我国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党对人权日益重视。1997年9月党的

十五大把“尊重和保障人权”鲜明地写入政治报告中。如实地说，当时对我们这些从事人权研究和宣传的工作者是一个大大的惊喜，在振奋中以研讨、写文章等各种形式加以解读和宣扬。但是，我国的宣传舆论却少有反应，宣传报道中很少涉及人权，社会反响并不大。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又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政治报告，又一次使我们受到鼓舞和启发。就此，我在2003年3月十届政协一次会议开会期间，多次就人权发表意见，积极建言将“人权”概念写入宪法，成为国家法律依据和公民的行为准则。

为宣传“尊重和保障人权”，普及人权知识，我与搜狐网商议，借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55周年的契机，举办《有关人权知识系列访谈》。之所以选择搜狐网，是因为它是一家有影响力的商业网站，比较放得开，而且有回旋的余地。我和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央党校的张晓玲教授承担了首次嘉宾访谈，直接与网民互动对话。如实地说，尽管党的报告中已经两次提出人权，依然有许多人（包括领导干部）迷惑不解，把人权视为神秘、敏感的政治话题而讳莫如深，甚至有的干部担心公众人权意识的提高，会给领导管理带来麻烦。有人告诉我，一位在监狱里服刑的犯人（犯法人员除了依法被剥夺的权利以外，同样享有人权）被打，他说管理人员侵犯了他的人权，而管理人员却说“我打的就是你的人权”！

我国媒体的宣传报道中除了每年几次反驳美国等西方政府或舆论对我国人权的攻击，平时很少涉及人权报道。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某日，中国人权研究会向某一重要新闻宣传部门发了一份开会通知，因为已经下班，便把通知从门缝中塞进了办公室。第二天，几个人上班后看到这一带有“人权”字样的通知，谁也不敢捡起来，纷纷议论是“法轮功”所为。类似情况并非罕见。

在这种情势下，举办访谈既有必要，又有许多顾虑：互联网毫无

遮拦，面对网民直接交谈人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网民会提出什么不适宜的问题？访谈的局面能不能掌控？有关领导部门对此会不会认可？如何做到帮忙而不添乱？如果言语有失或有冒犯会带来什么样的指责和社会反响？顾虑重重，犹豫再三，却还是鼓起勇气走进了搜狐的直播室，与网民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对话，被搜狐主持人荣跃称为“这是我国第一次与网民直接对话人权”。

网民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积极参与，反映热烈，其中经过搜狐选择的跟贴就有 500 多条，所提问题五花八门，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人权的认识模糊，感到神秘，遥不可及或界限不清。所提问题的 80% 是具体的，如下岗了、失业了找不到工作做、土地被侵占了、房屋被推倒了、人被干部打了等等，他们问这是不是人权？我们还有没有生存权的保障？我们的回答是真诚而谨慎的。另外，有些问题是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如生存权、发展权是否是我国永久的首要人权？现在我们有了温饱是否过时了？生存权、发展权与民主、自由权是什么关系？如何加快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人权与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人权？也有人从中外人权观的对比中提出问题，如“扫黄打非”是否侵犯了人权？他认为“西方对黄色文化是允许的，我们为什么要打击”？我回答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完全相同，对‘黄色’的认知和评判尺度不一样，但一旦被各国认定为黄色的东西，都在他们的法律取缔和打击之内。”网民对我们的整个回答基本是肯定的，但有的认为我“没有完全放开，有点像回答记者提问”。这种访谈式的人权对话共进行了三次，分别由不同的学者与网民交谈，每次我都参加。

通过这几次人权对话，我们有四点体会：一是能够在网上与网民面对面地交谈人权问题，本身就是人权的进步；二是这种做法没有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质疑，同样是一种进步；三是客观效果是积极的，

从而走出来一条就人权与民众对话的新路子，同时是一次直接、广泛的人权民意和意识的调查；四是利用大众传媒与民众进行人权对话是一种好形式，网络媒体可以这样做，其他媒体都可以做。有关对话的情况和体会，在政协开会期间，我做了介绍并提出了利用媒体和多种形式普及人权知识、提高国民人权意识的建言。

### 围绕“人权”入宪建言献策

2003年12月1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修改宪法的建议，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定程序提出宪法修正案议案，提请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12月22日党中央公布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后，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立即做出了积极响应，特别针对新增加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联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写了《建议书》，表明了态度，并提出了三条建议：“一、建议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家有关机构中设立人权委员会或相应组织，推动我国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二、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人权普及教育，提高全民人权意识，促进全社会更加重视和保障人权。三、建议利用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积极主动地开展国际人权交流活动，扩大对我国人权事业的对外宣传，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更为有利的舆论环境。”

在即将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提交人大讨论之前，2004年2月12日上午，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召开主任办公会议。我在发言中针对“人权”入宪后的新情况，郑重地提出了几条建议：一、目前我国全国性的人权组织只有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等，这是为研究和对外宣传我国人权而设立的。“人权”入宪后，为保

障宪法的实施，应适时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家有关机构中设立人权委员会或相应组织，以保证、监督、检查宪法的实施，维护宪法的严肃性，推动我国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二、应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加强人权普及教育，提高全民（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人权意识，促进全社会更加重视和保障人权；三、应依据宪法的要求，对有关法律条款做必要的补充和调整，制定新的法律，使人权有具体的法律保障；四、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利用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开展国际人权交流活动，扩大对我国人权事业的对外宣传，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人权发展状况和成就；五、为此，更好地调动人权研究组织和专家、学者的积极性，结合实际研究新情况，解答实际存在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外事委员会认为这几点是适时的，很有参考价值，立即整理专报。

几天之后的3月2日，中国人权研究会召开第二届全国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我在总结发言中，具体地阐述了“人权”入宪后人权研究会所面临的新任务，提出适应新形势，抓住大好时机，积极主动地做好人权研究和宣传工作。

2004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高票通过宪法修改方案，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载入宪法，由执政党的意志上升为宪法原则，获得国家最高法律效力，这不仅是我国的首创，据当时调查，也是世界仅有的明确把“人权”概念载入宪法的几个国家之一。人大通过宪法修改案时政协会议已经闭幕，我在外事委员会组织学习讨论会上，谈了对“人权”入宪的认识，并对今后的实施建言献策：一、“人权”入宪是高高举起的一面人权旗帜，表明国家对人权的重视和发展、保障人权的决心，必将加快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保证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二、它将会大大提高全民的人权意识和维护自身权利的自觉性，“人权”将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词汇；三、它增强了党

和国家干部的人权观念和尊重、保障人权的自觉性，是对滥用权利、违反人权行为的法律制约，把保障权利与限制权利统一起来；四、依据宪法原则积极加强、完善法律的人权保障和人权法律建设，建议在条件成熟时专门为人权立法；五、积极推动建立和扩展民间人权组织，有计划地对公民进行普及人权知识教育，把对领导干部和学生列为普及的重点。

在这次发言中，我再次建议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家有关机构中设立人权委员会或相应组织，具体调查、负责和处理侵犯有关宪法权利的行为，并且说明这符合联合国准则，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早就讨论过设立国家人权机构的问题，“请各会员国在国内建立人权委员会，以配合并促进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工作”。1960 年经社理事会通过第 772 号决议，“鼓励各国成立此类机构”。后来，我将这一部分建议专门整理成提案提出。

在以后的日子，对以上建言我多次写文章加以详细阐述。这期间，为配合宪法的实施，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撰写了“人权”普及知识读本，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汇集出版了“人权文库”。直至 2007 年 3 月，在十届全国政协最后一次会议期间，我依据外交部对世界各国政府和议会等设置人权机构的调查统计资料（该资料显示，世界已有 80 多个国家设有不同形式和名称的专门人权机构），继续提出了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家有关机构中设立人权委员会或相应组织的建议，并希望更加积极主动地扩展我国人权的内外宣传报道。

## 九 拉萨事件与火炬传递

——西方反华舆论反华透视

(按：2008年春，西方主流新闻媒体借西藏拉萨事件和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掀起了反华舆论浪潮。他们自以为得计，却充分暴露了自己。在此期间，我注意搜集、整理写成了此“备忘录”。当时，被搅得周天寒彻的天空，现在似乎晴朗了许多，但阴霾远没有散去，还会时时卷土重来。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学会应对。)

在2008年发生的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和奥运圣火在法、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传递中，西方一些反华政客和媒体做了充分的表演，使我国公众看到西方反华舆论的严重性，这对我们识别他们的反华本质和手法有着长期的借鉴作用，也对我们全面地认识我国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很有益处，有益于我们应对未来的各种变故。正是出于以上考虑，我在当时注意记录、整理了这期间西方反华舆论的具体情况，并发表。现登载于此，录以备忘，录以备考。

中华民族一向以宽容著称，我们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但这次教训实在太深刻了，我们不应该健忘，“防人之心不可无”。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更为客观地反映当时的境况，我较多地引用了那个时期境外媒体和学者的有关言论。同时在此说明，我们要谈的是他们的对外报道和言论。西方政客与媒体对内与对外的报道是不完全相同的，它们实行的是双重标准。有评论说，“在西方社会，政要对内批评要负责任，媒体的严密监督会迫使发言者说真话；而他们对外指责则是不要负责的，媒体也无求证的职守”。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的内外新闻观和报道更是这样，对内有法律和民众的监督，比较谨慎客观，而对外则不同，尤其是对他们看不上的国家则不顾事实地任意歪曲、编造消息而不负任何责任，充斥着舆论霸权的味道。因此，我们不能完全用评判他们对内问题的报道，来评判他们对国际问题的报道。

2008年3月14日，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一伙“藏独”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走上街头，用石头、棍棒、匕首等袭击执勤民警，呼喊“藏独”口号，打砸抢烧学校、店铺、医院、银行、电力和通信设施，焚烧过往车辆，追打过路群众，冲击政府机关，烧死、砍死18人，致伤382人，公安干警、武警官兵都有严重的伤亡。随后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暴力事件。我国政府依法采取措施，果断平息了这一事件。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明确表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国家插手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自3月10日以来，中国驻美国、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印度等多处使领馆以及贸易机构，连续遭到境外“藏独”分子的暴力冲击。

不久，奥运圣火传递在巴黎、伦敦和旧金山等地受到国外“藏独”分子、他们的支持者和反华势力的严重干扰和破坏，甚至从残疾人手中抢夺火炬，殴打火炬手，躺在路上撒泼，在传递路上撒玻璃碴，多

次迫使火炬熄灭，不得不改道；有的在背后搞小动作，表面上“彬彬有礼”却在圣火传递开始的仪式上，警察对“藏独”分子打着旗帜、标语、呼喊口号置之不理，任其所为，待他们把影响造足以后，警察才出面驱赶。对此，西方主流媒体都作鼓动性报道，甚至明确提出“抵制”、“反对”北京奥运。

拉萨事件的性质十分明确，对这样的犯罪暴力事件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采取坚决的处置措施，哪个主权和法治国家会容忍这种暴行？奥运会是世界体育盛会，奥运圣火的传递是宣示友谊与和平。却出人意料地遭到西方政客和某些媒体的激烈反对，他们把拉萨事件与圣火传递看起来两个互不相干的事“捆绑”在一起恶性炒作，借机掀起一场近几年少有的反华浪潮。一时间，西方各种政治人物和主流媒体纷纷登场，来势汹汹，显得不可一世，“搅得周天寒彻”。尽管拉萨“3·14”事件的真相十分清楚，但他们不谴责暴力犯罪，却一再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中国政府面对暴力犯罪“保持克制”（实际是纵容暴力犯罪），甚至某些政要放言以不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相要挟；他们完全不顾事实地渲染“中国政府进行‘镇压’”，报纸、电视、广播和网站充斥着“中国政府镇压”藏人的报道，他们大肆扩散达赖和“藏独”分子的喧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CNN）、英国广播公司（BBC）等西方主流媒体以“中国是对西藏的占领者”、“军事镇压藏人”、“武力管制”、“侵犯人权”、“剥夺藏人宗教自由”、“灭绝西藏文化”等作为攻击中国的“口实”，误导公众和社会舆论，鼓动“抵制北京奥运”。我们在国内感触到的这种气氛还只是冰山一角。我的一位同事去西方国家旅游，她不得不提前回国。她说：“那种反华气氛真叫人无法忍受！”

他们这样做，显然并不是偶然的，他们有着明显的动机，且错误地利用了这个时机。事实表明，拉萨“3·14”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组织、与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和反华势力相互

勾结、多方联手的反华行动。他们选择了中华民族举办奥运的重要时刻，经过筹划和力量的积聚，“藏独”分子出面寻衅闹事在先，西方政客在后，反华媒体冲锋在前，相互呼应。他们在这时候发难，更多的是冲着北京奥运会而来。达赖集团放言，“2008年是关键的一年，奥运会是最后的机会”。对此，一些境外媒体做了分析。德国《日报》4月16日文章《西方歇斯底里的行为》一文中指出：“西藏事件不是自发的，而是在奥运前夕策划的非和平运动。”香港《南华早报》文章中指出：“一些西方领导人正在成群结队地利用西藏暴乱，在中国即将举办奥运会时羞辱中国。”美国人权活跃分子吉尔·萨维特毫不掩饰地说：“奥运会是向中国施压独一无二的工具，对于我们来说千载难逢，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说：“北京奥运将是一个良好的契机，……中国申办奥运时西方有些人指望通过北京举办奥运会，促使中国政治发生变化，但几年的事实使他们失望了，他们想看到的现实没有出现，而中国却在迅速地发展。有了可操作的机会，他们便相互利用发难、造势。”说得明白一点，他们过去的期望没有达到，借此机会诋毁中国形象、破坏北京奥运会，进而分化和演变中国。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中指出：“这股势力意图很明确，就是企图给中国抹黑，向中国施压，迫使中国为了开好奥运会而在政治和其他方面做出妥协和让步。”但是，谁都知道，国家主权永远高于一切，是不可妥协和动摇的。《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3月19日文章中说，他们“试图通过威胁破坏奥运会，迫使中国改变政策”。该报在4月13日文章中又说：“奥运会对中国而言意义重大，但不及西藏问题。主权与安定永远高于公共关系。”

我集中引用了几家媒体的评论，他们把问题已经分析得很充分了。据我多年的经验，西方政客和媒体经常利用我国发生的某些事件、某些重大活动，有准备有组织地积聚力量、互相联手、借机发难，企图

造成轰动效应，左右国际舆论，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我们已经领教过多次。但是，这次他们却找错了时机，再明显不过地暴露了他们的用心。

### 西方媒体无法掩饰的政治用心

毋庸置疑，西方政客和西方媒体借拉萨事件和圣火传递掀起的反华浪潮，其本身就是为了政治目的。所以在此突出来谈他们的政治用心，是他们以往太多地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掩饰自己的政治目的，并以此攻击中国媒体注重政治，而这次却再也无法掩饰。

政客靠玩弄政治生存。有些西方政客多年以反华为职业、拉选票，尽管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少，但却非常活跃，“逢华必反”，“好像中国做什么都不对”。（新加坡《联合早报》语）他们对拉萨事件和圣火传递起劲地鼓噪，或是仇视，或是偏见，或是搞“政治秀”，或是出于政治压力，或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赛格林·罗维尔说，让北京照常举办奥运会“将是我们价值观和原则的一次失败”。德国一位议员竟然呼吁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

中华民族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但这一次给我们的刺激太大、太深了，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要记住，当火炬在巴黎的传递经过法国国民议会大楼时，40多名议员佩戴特别标志跑到阳台上高呼“自由西藏”的情景，一些政治人物竟然要持不同观点的人分清是“站在哪个阵营”；我们要记住，巴黎市市长德拉诺埃在那时提议并授予了达赖“巴黎市荣誉市民”的称号；我们要记住，那个美国国会众议长佩若西女士，她对中国知之甚少却又有反华的狂热，甚至某些好莱坞艺人也脱离自己的本行，陷进政治旋涡而不能自拔，站出来质疑什么“达尔富尔问题”、“中国的人权”；当然，我们也要记住，圣火在伦敦等地传

递中，那些明里暗里让 13 亿中国人难堪的事件。这许多事实，也就必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外电评论说：“中国民众对法国表现出的愤怒是很自然的事。奥运会相当于在中国办的‘大盛宴’，法国的做法相当于帮助一些恶人‘砸场子’。”当然不只是法国。中国人民不得不想：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奥运会是世界的体育盛会，中国人才站起来不久，他们为什么竟然如此恶意羞辱、不公正地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民？！

西方媒体一向标榜自己的报道没有任何政治倾向和目的，他们著书立说，也总是说坚持“公正、不偏不倚”。有不少西方记者曾经信誓旦旦地对笔者说：“我们的报道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只是客观报道事实。”接着，他们反唇攻击中国的报道有政治倾向性和目的性。“坚持客观、公正、真实”似乎成为他们标榜、捍卫自己、攻击他人的一件法宝。西方有许多新闻传播理论也为此虚伪地打掩护，但他们到底要做什么人们都心知肚明。了解内情的人都清楚，他们标榜的这一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他们不是自欺，而是在欺人。他们对拉萨“3·14”事件的报道和言论丢掉了一切伪装，慌忙中毫无掩饰地把自己的真实意图暴露在世人面前，让世人看得清清楚楚，成为印证西方媒体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一次最有说服力的典型事例。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正义和道德的捍卫者，却不顾事实和新闻道德，进行连篇累牍、触目惊心的歪曲报道，故意制造假象，一边倒地肆意挞伐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有些国家的政府要员竭力把与政治分离的奥运会政治化，对中国提出政治要求和要挟，致使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和名誉主席萨马兰奇也不得不多次出面澄清问题。罗格十分明确地说：“让北京办奥运会是正确的决策。”“国际奥委会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因而无法干涉中国的内政。”萨马兰奇说：“如果有些领导人不愿意出席开幕式，那么我们也不需要他们。我们需要的是运动员。”我们知道，奥运圣火在旧金山传递中，美国有的媒体公开声称，破坏旧金山圣火传递就是“让国际

奥委会尴尬，让中国政府尴尬，让旧金山市尴尬”。据《参考消息》登载，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新闻频道节目主持人奥雷利和米勒，在“奥雷利实情”的脱口秀节目中大谈如何“让中国丢脸”。他们说：“既然已经很难改变中国举办奥运会的现实，为何不利用这个机会让中国丢脸呢？”这种阴暗的心态，已经超出了新闻道德的范畴，而是一种政治的变态和傲慢。

对此，西方有的人士认为，“西方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已经达到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差状态”。瑞典一位学者用“白色恐怖”来形容这一舆论围攻。过去有人把西方媒体的恶意炒作解释为“商业利益”，他们也尽量这样解释，我们不否认这有真实的一面，但他们始终把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有时候是用“商业利益的招牌”来掩盖其政治用意，尤其当“两个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服从政治利益。俄新网3月25日的文章中指出，“他们的目的就是引导国际舆论反对中国”。莫斯科教会对外教务联络部副主任弗谢沃洛德·恰普林3月28日在俄新网发表题为《莫斯科教会指责西方媒体将西藏局势用于政治目的》的文章中说：“拙劣地利用现实和虚构的人类灾难达到政治目的已成为西方媒体的一项准则。这不仅是伪善的，也是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实施挤压的一种手段。西方试图肢解所有与自己内外政策不符的国家。”德国作家协会、国际笔会和德国记者联盟成员伯恩哈德·甘特尔在《针对中国的歇斯底里》的文章中说，作为一个德国人，他想告诉中国人：“目前在德国，人们为所谓的新闻自由流下了很多愤怒的眼泪。”他说，我认为，这里的主流媒体并非自称的那样在政治上保持独立。他们对中国抱有固有的成见，竭力误导公众。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利用反华转嫁国内政治、经济危机，这也许是我们过去很少想到的。德国伯恩哈德·甘特尔在《针对中国的歇斯底里》一文中说，在西藏事件发生以前，德国媒体已经对中国进

行了很多负面和不公正的报道。德国汽油涨价时，报纸说是中国大量进口石油把油价抬高了。德国牛奶和黄油价格上涨时，媒体又说这是中国人大量购进牛奶的结果。他们在为德国国内问题找替罪羊。德国民众并不太了解情况，不少人是主流媒体说什么，他们也人云亦云。

法国与中国历史上保持着友好关系，但国家利益是根本不可改变的。进入 21 世纪，法国经济不景气，在过去的 25 年法国 GDP 由世界第 7 位下降到 17 位，2005 年中国超过了法国。有评论家指出，法国这次借拉萨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突然与中国变脸的直接原因是“法国便生醋意”。

我们知道，美国的大选是美国自己的事，可是每到大选，他们总爱拿中国说事，给中国编织种种“罪名”，无非是政客为转移国内公众对政治、经济问题的视线耍的一种政治把戏。德国《每日镜报》4 月 6 日发表署名文章《有关恶龙的谎言》，文章中列举事例说：“当美国的竞选斗士喋喋不休地谈论中产阶级变穷时，他们喜欢到中国寻找替罪羊。要么把雇员缩水归咎于北京的领导人，要么指责中国企业窃取知识产权，危及了美国的福利。”“类似的观点在欧洲也很流行。阿伦斯巴赫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德国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德国是个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也说，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把‘中国的经济崛起看成威胁’。”

### 西方媒体“客观、真实”的虚伪性

事实是新闻的本源，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是新闻传播学最基本的常识。西方新闻学和媒体总是把“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挂在嘴上，夸耀自己，指责、教训他人，颇有迷惑性。可这次，从大量的事实可以清晰地看出，政治偏见和不正常心态让他们在利令智昏中现了原形，

甚至扭曲到冲破了“客观报道事实”的新闻道德底线。

**抢先为事件定调。**他们完全不顾事实真相，“逢中必反”，这次更甚。香港《太阳报》3月21日评论指出，西方媒体“几百年积淀下来的偏见与傲慢，首先是指责中国，又以此选择和解读事实，以此影响公众，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的主调是负面的，在这次拉萨事件中，依然采取先入为主的判断，抢先定调‘藏民和平示威’，完全不顾事实歪曲为中国政府进行‘镇压’”。这一基调就成为西方媒体宣传报道拉萨事件的统一口径，他们把一切都纳入这一预先设定的议程之中。（1999年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以定调为“误炸”统一了美国等主流媒体的报道口径）

**无中生有伪造事实。**他们不顾拉萨事件发生的事情，用来自达赖集团的“信息”，凭道听途说的“据说”，耸人听闻地编造“中国政府派军队镇压”，“拉萨到处是军队”，“解放军肆无忌惮地朝人群开枪”，“死亡人数超过100”，“数百人死亡”。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的大标题就是“西藏人的死亡”。

**以偏概全扩大事实。**他们违背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和平衡报道原则，只选取符合自己设定议程的负面事实。据《环球时报》驻德国记者4月调查，德国影响比较大的《明镜》和《明星》两家周刊“90%的涉华报道是负面的”。德国前驻华大使塞茨在德国媒体上发表文章批评对华报道一叶障目，“很少听到有关中国巨大的正面发展进程的报道”。法国媒体不惜版面大量报道破坏圣火的活动和言行，“甚至一张报纸在短短的10天内连出五六个头条或社论”，任意放大负面声音，却对维护火炬传递的正面言行默不作声。一位新闻传播学院的研究生指出：“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很客观，但抹杀了事件的实质，实际上是一种假客观。”

**任意删改事实。**CNN刊登一幅军车在拉萨街头行驶的照片，旁边

有一辆汽车在燃烧，前方有人在奔跑。中国网民从网上的原照片对照，图片右面本来有一些参加打砸抢的人在向军车投掷石块，空中的石头清晰可见，经过 CNN 制作时都剪辑不见了，只有人在奔跑，造成中国警察在镇压的假象。

**片面选取事实。**在圣火传递中，西方媒体对信息进行筛选、剪裁，“在法国的华人欢迎、保护圣火，对他们的活动、观点和呼声，法国媒体做了惊人的过滤，最后导致了对这种声音的无视”。后来华人多次举行抗议活动，媒体上依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CNN 片面选取拉萨街头只有警察在行进、巡逻的画面，不见暴乱活动和造成的破坏，给人造成警察镇压、恐怖的视觉效果。

**配解说词造假。**中央电视台 3 月 16 日播出拉萨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的真相后，西方电视台“选取”中央电视台的画面，进行加工，配发自己的解说词，插播达赖 3 月 18 日“不赞成搞暴力活动”的谈话，播出境外藏人的抗议活动，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模样和性质。

**编造说明词造假。**3 月 17 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柏林晨邮报》等德国主流报刊刊登了一幅中国警察携一少年在拉萨街头奔跑的照片，都解读为“中国警察抓人”。其中《南德意志报》还添油加醋地说明“中国警察连小和尚也不放过”。同日德国多家电视台也在新闻节目中播发了这幅图片，并做出了类似的解说。经查明，事实上，该图片是从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录像中截取的静态画面，反映的是中国警察将一少年从暴徒的手中解救出来。

**省略解说词造假。**人民网法文网站收到来自法国的网友对法国媒体刊登的“中国军人假扮僧侣”的照片提出质疑，这是 2003 年在拍摄电影《天脉传奇》时军人扮演群众演员时穿的袈裟，在刊登时却略去了原来的解说词。

**移花接木制造事实。**德国 RTL 电视台网站和电视新闻频道分别在

3月19日、20日发表拉萨警察武力驱赶游行者的照片，把3月17日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保安部队用棍棒驱散示威群众的照片挪用到拉萨警察头上，印证拉萨警察的“暴行”。

**以攻为守，转移公众视线。**中国民众的愤怒谴责、海外华侨华人的抗议，被西方媒体歪曲为“民族偏见”、“民族主义情绪”，并且是“由中国政府支持”、“中国政府煽动”公众情绪，以此转移公众视线，这是他们在危机处理中惯用的伎俩。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和中国飞机被撞事件中，美国媒体就是这样报道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每当中国人表达自己的意愿时，西方总把这种爱国主义冠以“中国狭隘的民族主义”，倒打一耙。

**公开鼓吹暴力和恐怖活动。**福克斯电视台新闻频道节目主持人奥雷利和米勒在“奥雷利实情”的脱口秀节目中，大谈如何“让中国丢脸”。两个人在一问一答中，给反华分子“出招”，如在运动服上印上表示支持“藏独”的标志袖章或丝带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和运动会，“让中国出丑”。他们出主意“通过网络与参加运动会的各国运动员联系，共同协调行动”。观众反映“我很担心，这个收视率很高的节目可能会蒙骗许多美国观众，一些人受到煽动后可能会付诸行动”。

**“道歉”轻描淡写，推卸责任。**德国 RTL 电视台网站和电视新闻频道造假照片被识破曝光后，引起众怒。3月23、24日才不得不声明表示“道歉”，而把原因轻描淡写地归结为纯系“疏忽”所致，德国多家媒体也都说成是“疏忽”，或是个人的“错误”，造成“张冠李戴”，而媒体是“公正的”。这是西方一些媒体惯用的手法，造成事实和恶劣后果，要么不认账，硬顶；要么找“理由”开脱，或归于个人疏忽而不是媒体意愿，更没有政治意图。

**放毒不消毒，媒体集体失语。**4月9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CNN）评论员杰克·卡弗蒂侮辱中国人民的言论，在中国政府和

海外华人华侨的强烈抗议（控告）之下，CNN 副总裁 5 月 15 日才致函中国驻美大使“仅代表 CNN 就此向中国人民道歉”。但此道歉信未公布，CNN 没有在原播出频道上公开道歉，而且选择了中国人民正集中抗震的时间，显然是精心策划的。很值得深思的是，对于这一“道歉”敏感新闻，一向好奇的西方主流媒体竟然如此“默契”地“集体失语”，不予报道，而他们却对当时卡弗蒂的侮辱言行大肆地进行了报道，传毒而不想消毒。他们经常在不得不“道歉”时放在不起眼的版面位置，用最小的字号，淹没在大量的报道中，根本无意挽回已经造成的负面影响。

**借“道歉”之名行反攻之实。**4 月 16 日，CNN 声明中为杰克·卡弗蒂侮辱中国人民的言论辩解时说：“卡弗蒂指的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对于那些不是这样理解的人，他们表示道歉。”这不仅表现出他们的傲慢，而且借此挑拨中国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继续在进行攻击。CNN 声明中说：“应该指出的是，多年来杰克·卡弗蒂曾批评过很多政府，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及其领导人。”我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刘建超强调：“新闻从业人员要讲职业道德，他们没有污蔑、谩骂别人、别国政府的特权。”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秦瑜要卡弗蒂必须向中国人民做出真诚的道歉。

**压制和打击不同的声音。**在拉萨“3·14”事件中，德国媒体表演特别突出，也特别恶劣，完全是一边倒。德国作家协会、国际笔会和德国记者联盟成员伯恩哈德·甘特尔看到德国媒体一边倒地报道拉萨事件后，他说：“这完全是歇斯底里，这种片面和带着偏见的报道对中国是不公正的。”他在谈到西方“新闻自由”时说，他多次试图向报纸投稿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但稿件均未被采用。无奈之下，他将文章发表在自己的网站上。他说，我们在德国有所谓的新闻自由，我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但就是见不了报，因为人家认为我的观点不合适。

报纸不愿意刊登不同的声音，人家要的是政界和主流媒体想要登的东西，而这却是片面的，这是不公正的。

以上种种，并不是全部。这次西方主流媒体情急中赤膊上阵，表面的气势汹汹，透视着实质的虚弱，集中暴露了本来面目。美国华文媒体形容“西方媒体就像一个输光的赌徒，不惜把裤子脱下来当赌注”。外电评论“任何一个中国人对这种任意歪曲事实的抹黑，都会感到愤慨”。他们的所作所为让西方人蒙羞，让西方媒体蒙羞。德国作家甘特尔在文章中说，作为一个德国人，他想告诉中国人：“目前在德国，人们为所谓的新闻自由流下了很多愤怒的眼泪。”

西方主流媒体这次掀起的反华浪潮，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西方列强过去攻击中国，是因为中国贫弱，他们看不起中国和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攻击中国，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的确立，她的影响力也使西方世界感到恐惧。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 1958 年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说：“在中国，四分之一的人类不仅冷眼拒绝了基督教，而且也拒绝了美国市镇集会方式的民主、法律至上、个人主义的理想、多党选举程序、公民自由和民族自决，事实上拒绝了我们的整个政治秩序，以及通过正当法律手续的自由与安全的概念。我们怎能不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已直接受到威胁？”<sup>①</sup> 他们现在攻击中国，不单是历史的延续，是因为中国开始变得强大。

对现实原因的分析，人们通常理解为他们对中国不了解，而误解又甚多。德国一位署名为“LAGATOU”的网民说：“许多德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他们从没去过中国，也不懂中国的语言，只是通过一些媒体扭曲的事实和有选择性的报道来感知中国。”西方人乃至世界

---

<sup>①</sup> 孙瑞琴、陈则宪译，商务印书馆 1971 年版，第 321 页。

上的许多人对中国所知甚少，他们的消息来源是西方的媒体。应该说，这些都是重要因素，但这里主要是指国际公众缺乏对中国的正面了解，而听到的几乎都是西方媒体的负面报道，容易产生误解，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笔者认为，这不完全适用于西方的反华政客和主流媒体。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不了解中国的因素，但不是主导的。不了解可以设法逐步了解，今天已不是十分困难的事。不了解并不构成对一个人、一个国家长期诬蔑、攻击的理由。他们的政治偏见扭曲了他们对西藏、对整个中国的看法，他们不想了解真实的中国；他们那种仇华、反华的不正常心态使他们失去了新闻工作者的良知；他们那种道德傲慢使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高人一等”，他们自认为任何做法都是合理的，具有普世价值，其他人或其他的不同存在都是无理的，都会构成对他们的挑战；他们更不愿意看到一个与之不同的中国。这是他们的固有根源，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不同和对立是实质，这使他们看待中国的任何问题都是扭曲的、颠倒的，并以此来误导公众。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西方经常看错中国，“不可以用西方的尺度来衡量中国，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其特殊性，中国的社会变革将遵循自己的道路”。笔者记得，在一次中美媒体研讨交流会上，一位美国朋友悄悄地对我说：“如果中国的制度变了，我们之间 90% 的分歧就没有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对外宣传不再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可他们并没有忘记；我们主张共同合作、发展，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

历史因素，是西方媒体长期反华的基础。人们更注意到在今天所以激烈反华的现实因素，其深层原因是西方对华的传统矛盾和观念受到新的冲击，在激烈碰撞中的爆发。新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强大。本来中国的复兴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是对世界和人类的贡献，这没有什么错。所以一些中国人纳闷，我们刚刚过了几天好日子，

为什么会遭到他们如此激烈的怨恨？因为中国的发展使西方对中国的“常态”思维和心理受到强烈冲击，出现了一系列的不平衡和矛盾对立，“产生了怨恨和嫉妒”，甚至认为“威胁到他们的利益”。这是国外学者议论最多最集中的话题。

中国连续30多年快速发展，2010年GDP已居世界第二位，且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被发展中国家所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4月11日的文章《奥运政治：两个世界的碰撞》中指出，“西方社会的反对声音现在突然变得如此强烈，并不是因为中国做错了，而是因为这些问题涉及一个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的大国”。该文具体指出：“中国产品好不容易走出国门，却被丑化为导致西方工人失业的罪魁祸首；中国商人和资本进入非洲大陆，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心生嫉恨地称之为新殖民主义者；中国企业在海外展开并购活动，西方政府视之为洪水猛兽。当然，还有庞大的贸易盈余、庞大的外汇储备、庞大的军费开支、庞大的能源消耗，更有‘被共产党统治和驯服’的庞大的人口，这一切都使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被挑战、被取代、被超越、被损害的恐惧感。”俄罗斯一位教授更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麻烦源于它的崛起”。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强盛这个事实对世界就很有说服力，中国在政治上已经变得相当强大。德国外交研究会会长桑德施奈德教授在与德国网友讨论中国问题时回答一位读者的提问，他说：“任何重要的全球问题都不可能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解决。”《环球时报》2008年3月20日的文章中说，北欧人认为“中国太大了，同时发展又那么快，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中国明年会变成什么样。于是，没到过中国的人不能理解，即使到过中国的人也很难理解”。《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4月13日文章中说：“中国的崛起使它成为一个受伤的西方——尤其是美欧——宣泄所谓愤怒的对象。西方仇视这样一个成功的，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影响力方面的新对手。”

这些评论反映出西方各种复杂的心态。这一切，都借这次拉萨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发泄出来，也就不奇怪了。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11日的文章《奥运政治：两个世界的碰撞》中指出：“藏独分子借奥运之机发泄对北京的仇恨和敌意，与这些年来西方社会对中国崛起态势所产生的抵触、疑虑和不满是完全合拍的。”西方“以恐惧和嫉妒的心态看待中国，一切都变成了扭曲的政治图景”。

为了把他们的各种心态看得更为清晰，笔者从几个方面简要归纳外电有关报道和言论：

**对北京举办奥运可以改变中国的期待落空。**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14日发表署名邱震海的文章《奥运风波：折射中西双双深层问题》。文章中说：“此次西藏和奥运风波，分别涉及中西双方各自在思想传统方面一些尚未理清的困惑，也涉及中西双方过去几年面对北京奥运会的不同心理期待，再加上中西双方这几年本来就面临中国崛起的新课题，所有微妙心态和情节，都借着此次西藏事件和奥运风波得到了总爆发。”

**担心中国影响的进一步扩大。**今天，“中国的崛起”使许多人难以理解，更是那些一贯自傲的西方人不愿意看到的，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14日邱震海的文章中说：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大张旗鼓筹办奥运的契机，对中国来说是自然的事，但使西方原来希望在这期间中国发生政治、经济和社会重大演变的内心期待落空，反而促成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重要机会，这种巨大的心理反差难以适应和调适，对西方长期居高临下的批判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傲慢和偏执受到中国崛起的挑战，是他们不愿意看到、更不能接受的，使他们产生了难以接受的迷茫和彷徨。

**心理状态的巨大反差难以调适。**中国的崛起是对西方优越感的严重打击，一旦这种优越论受到挑战，必然引起激烈的反抗情绪。对于

西方心态，外国媒体做了深刻的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使西方期待“让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也提出“与世界接轨”。但后来发展表明，中国投入世界经济市场和全球化，但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社会形态和价值观，中国发展模式使西方社会制度、政治的优越感和价值观受到挑战和威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且不愿意接受的。德国作家甘特尔在接受《参考消息》驻柏林记者班瑋等人的采访时说，“我认为，德国媒体目前对中国有偏见，原因是德国人目前害怕中国。中国现在很强大，特别是在经济上。这就引起了一些嫉妒”。“中国一直令德国人既向往又害怕”。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说，他本人来自欧洲，更能体会西方社会对中国发展强大的复杂心态。

**担心“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德国《明星》画刊4月3日署名文章《魅力与怪异》中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影响力更为引人注目，“中国崛起引发全球恐慌，与其说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政策，不如说在于中国的地广人多”。他们更担心“中国发展模式”在世界上、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由此产生对西方模式的置疑。

**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恐惧。**德国《明星》画刊4月3日文章《魅力与怪异》中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2年间翻了一番，而美国实现这个目标用了40年。三周前，中国超过美国，其网民人数达到2.2亿。学者们认为，中国将在2040年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德国外交研究会会长桑德施奈德教授在与德国网友讨论中国时，他针对德国说：“我们从几年前的中国热早已转向了中国恐惧。”“因为它发展得快，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一进程对我们的直接后果到底是什么。”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诠释受到美国的主导，而美国对中国则抱有双重的拒绝态度：一是拒绝中国坚持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二是觉得中国不可捉摸，而且非常害怕。”有人说“不认识的东西，总

是可怕的”。

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涉及就业。巴黎近郊一个年轻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如今法国人很害怕中国人，你们经济增长太快，法国很多工厂都搬到了中国，我们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后还要抢走我们的工作机会。”有的说：“我们担心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中国货币不升值、中国劳工薪水低，中国的假货，中国不和我们适用同样的规则。我们失业屡屡上升，很自然就表现出苦恼。”有人直截了当地说：“欧洲民众对中国看法上的变化的根源在于对全球化的恐惧，中国的发展已经构成了对欧洲的挑战和威胁”，“欧洲民众不愿意接受中国发展的模式”。这些问题的具体的，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我们都必须慎重面对。

以上种种情况告诉我们，面对中国的发展，各阶层的心态是复杂的，由此出现不同问题、不同层面的反应。据《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在欧盟最大 5 个国家中，“大多数欧洲人把中国视为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据《英国金融时报》4月 15 日报道，该报与美国哈里斯民意调查所在 2008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 8 日对欧洲 5 个国家的调查表明，“平均 35%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全球稳定构成的威胁超过任何其他国家”。这一数字都比 2007 年 6 月高了许多。显然，这一“调查”的数字并不完全反映实际。这些问题的形成，起源于政治的分野，引发于心理因素，扩散于新闻媒体推波助澜的片面报道，他们“只是通过一些媒体扭曲事实和有选择性的报道来感知中国”。但它是客观存在，我们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它提醒我们要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中国经济威胁论”是有市场的，表现在许多方面，我们要认真地全面地思考应对措施，慎重对待，不能简单以否定或“批判”对待之。

## 对中国的客观反映在增长

现在，西方媒体在主导着国际舆论，主导着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这是目前的现实。从中我们也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中国的发展已经走进了世界公众的视野，他们对中国的客观认识和报道也在不断增加，尽管还受到打压，尽管还十分微弱，但世界已经不是一种声音的天下，国外有一些政府官员、社会知名人士、学者和媒体表示了不同意见和看法。

一些了解中国的人士仗义执言，媒体的客观报道有所增加。奥地利《新闻报》4月12日报道，德国前外长根舍说，让中国举办奥运会没有错。中国的承诺也正在兑现。针对西方对中国人权的攻击，国际奥委会执委丹尼斯·奥斯瓦尔德在接受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采访时说：“事实表明，中国的人权状况近几年已有长足进步，而且一直在改善。……奥运会在一个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大国举行，仅仅这一点就是人权的进步。”德国驻华记者乔治·布鲁恩出版了《中国不是邪恶的帝国》一书，以他在中国10多年的经验客观地介绍了中国。他认为，默克尔与中国谈人权，更多的是为了博取国内人们的关注和欢呼。书中说，默克尔总理不加区别地迎合德国主流媒体“罪恶中共”的规则，很多人还以指责中国为荣，这是根本性的错误。事实上，目前中共领导人极为坦诚和开朗，中国普通民众信赖政府是经过思考的。

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直接或间接感受中国的机会，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活动，也通过对各种负面报道中事实的思辨分析，从中看到中国真实的发展事实。直接接触和了解中国的人正在迅速扩大，他们的亲历、亲见、亲闻所形成的正面印象是稳固的，即使对中国发展中的问题也有比较客观的分析。德国《日报》4月16日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这样一个多样而分散的国家是很难管理的。中国明白民主的重要性，

关键问题是实现如何民主进程。这需要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准备条件，欧洲完成这个过程花了数百年，这并不能一蹴而就。”直接接触了解中国，将会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条重要而有效的渠道。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从不同的角度关注着中国。中国已经不是闭塞的中国，也不是可以被忽略的中国，有关中国的各种消息在传播，打破了过去对中国的沉默。不管这种消息是正面或负面，总在引起世界公众的关注和议论。各种以中国为主题的研讨会、辩论会和文化活动正在进行，不同的声音的争议有助于对中国的了解，尤其是青年学生经常参与其中。笔者认为，不论讨论中国的什么问题、持什么观点，有声音总比没有声音好，有多种声音总比只有一种负面声音好。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而负消正长，中国的正面形象将在矛盾和斗争中逐步确立并得到承认。

外国公众正通过日常生活广泛接触和了解中国。他们的了解是具体的人和事，包括中国贸易、中国商品、到中国旅游、与中国人的交往、身边的中国旅游者和华人华侨等。他们各自的兴趣和关注点不同，对中国的看法日益多元化，如在拉丁美洲，“他们最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据《环球时报》10月19日登载，记者在北欧采访时，惊奇地发现位于丹麦格陵兰的一位老渔民竟然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开幕的消息，而且能说出“互联网、电视和报纸上‘中国’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被这样的新闻‘轰炸’也就知道了；新闻上说中国最近变得富裕了，到北欧旅游者越来越多”。

一些媒体在反思。中国民众自我意识的增强，国际社会对西方媒体反华行为的批评日益增多，德国媒体、法国媒体等开始反思，尽力在修补自己的形象。对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受到破坏，对于在法国华人的护卫行动和表达的愤怒，法国媒体都曾经置之不理，后来火炬在阿根廷和坦桑尼亚的和平传递等，法国媒体多了一些平衡报道。

可以看出，“对中国了解逐步增多，仍然受西方媒体主导”。（《环球日报》记者语）但情况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和转变，这是一个必然的长期的发展过程。时间对我们有利。我们要学会面对，善于促进了解，化解误解。

我想特别说明，在西方反华舆论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来自西方的客观声音在增加，我们更要看到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拉萨事件和火炬传递所持的正确态度，看到他们对中国所持的态度，这是可信赖的外国朋友和巨大的支持力量；我们还要对西方国家的民众有一个客观的分析，某些反华政客和媒体并没有真正地反映他们的民意。德国作家伯恩哈德·甘特尔有一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他特别“叮嘱中国人民：如果德国政府犯了错误，那么这不一定是德国民众的错误，而是德国政府的错误，是操纵民众的德国媒体的错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相信各国民众逐步了解中国的真相后，会对中国有一个客观的正确的判断。

### 西方从中国看到了什么？

西方借拉萨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掀起的反华浪潮在我国引起强烈震撼。人们提出他们为什么睁着眼睛说瞎话？为什么对中国没有任何的友好、和平的善意？“中国一直把举办奥运会当成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自豪的时刻，象征着中国作为大国重返世界舞台”，为什么遭受如此的羞辱？美国《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文章中说，“很多中国人把抗议圣火事件，视为西方国家图谋羞辱和控制中国的证据”。德国外交研究会会长桑德施奈德说：“当时中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在我看来是完全正常的。认为通过压力、批评或威胁可以给中国带来政治变化，是我们这里广泛流传的错误估计。”美国《纽约时报》引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的话说，“现在中国人民认为（西方）示威者意在最大限度地羞辱整个国家及其人民”。《纽约时报》4月13日文章《忠诚的中国青年》中说：外国的抗议活动在中国年轻人中激起了强烈的爱国情绪，对他们来说，“奥运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事件，这些破坏火炬接力的人就是为了要击倒中国”。

中国人民对他们反华的政治用心和拙劣手法看得十分清楚，受到了反面教育，这是那些始作俑者所没有想到的。那么，这次他们从中国人身上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了中国人民与政府的一致性。**西方一向认为，中国实行的是“独裁统治”，中国人民与政府是对立的。所以，CNN就卡弗蒂侮辱中国人的言行进行“道歉”时，狂妄地把矛头指向中国政府，企图挑拨中国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引起中国人民强烈义愤和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西方惊奇地发现，中国人民竟如此一致地支持政府。《华盛顿邮报》在一篇报道中写道：“这种观点被广为接受，甚至是使用电脑的年青一代。”《纽约时报》4月13日文章《忠诚的中国青年》中说：“最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对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理直气壮地感到骄傲。他们的爱国心和自豪感常常表现为绝对支持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尤其如此。”西方学者评论说，西方本来认为只要借此反对中国政府（共产党）会受到青年人的响应，却遭到他们激烈的反对；西方惊奇地发现，中国青年人与政府是如此的一致，这远比他们的主观想象复杂得多。西方对他们这种“得不偿失”的冲动，使他们不得不反思，“如何有效地把他们的想法传达给中国，而不是制造更多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反感”。

**看到了中国真正的民意。**中国网民一直密切跟踪西方就拉萨事件和圣火传递的报道和言论，纷纷发表看法。他们说，过去我们太相信西方媒体的话和西方的传播理论，这次看出CNN是“谎言之首”，网

民中有一句流行的话：“做人不能太 CNN。”中国网站发起“全体中国人谴责 CNN 的关于拉萨暴乱无耻报道大签名”，发起对西方媒体恶意反华行为的抗议行动和抵制行动。他们针对巴黎某些人纵容、支持“藏独”分子破坏圣火传递，发起抵制法国货的签名活动，迫使“家乐福”大股东和法国部分企业界赶紧出面声明澄清与达赖和破坏活动无关，法国政府在一周之内连续派出两批高级代表团来到中国，就巴黎支持“藏独”分子破坏圣火传递道歉。他们非常关注我国今后所采取的反遏制措施。《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4月13日文章引用中国学者的话说：“如果任何国家采取伤害中国人民尊严的行动，中国将不得不采取行动，中国在贸易谈判中可能更强硬”。“西方人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里找不到西藏、达尔富尔问题的盟友”。西方政客和媒体一向标榜最重视民意，经常打“民意牌”向某些国家政府施加政治压力。长期以来西方媒体自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反映中国的民意，面对真正的中国民意他们感到惊讶。中国的民意在中国人的心里，不是靠西方塑造出来的。中国学者单仁平在《中国民意应让西方醒悟》一文中说：“西方媒体这一次在中国民众中威信扫地。原因首先就在于，他们的批评让中国人看不到一点善意和诚意，他们怀着一种阴暗的心理看中国，中国民众大大质疑西方媒体的公信力。二是他们的指手画脚让中国人感觉他们既无知又无理，就凭着自己的嗓门大。第三是他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先入为主，为批评中国滥用新闻材料甚至捏造事实。”

看到了中国青年一代的真实精神风貌。美国《纽约时报》4月13日文章《忠诚的中国青年》中说：很多西方人看来，中国“老一辈强硬派高压政策”失去了对受现代教育的青年一代的“控制”。文章说，这种看法天真幼稚，他们“不仅不对政府的人权纪录感到不安或烦恼，反而是你能遇到的最爱国、最支持政府的人群之一”。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4月6日发表《火炬在伦敦传递后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在最近

事态的冲击下，“80后”出生的中国年青一代开始对西方世界进行新的集体反思。“很多对西方持有浪漫看法的青年人，对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企图十分失望，而妖魔化往往回引发相应的反作用”。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青年一代所表现出的对西方媒介的批判和爱国热情，打破了一些人对西方新闻观和新闻传播学的盲从，这种“突破”只是靠正面教育是难以完全奏效的，西方媒体的行为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一代人，这是他们没有料到的。中国青年对西方媒体这一新的认识，将对未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和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力。《纽约时报》引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话说，西方“这种蔑视中国和中国事务的行为将在奥运之后产生永久的影响”。美国“反战”网3月26日的文章认为，在“西藏问题”上做文章对西方也没有好处。“经常这样，我们创造了我们害怕的敌人”，“我们自己才是我们最坏的敌人”。

**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等为祖国的发展强大和举办奥运而自豪，他们凝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在反对“藏独”、保护圣火和反对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显示出一种可贵的爱国力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让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力。

**看到了中国人民媒介素养的提高。**中国民众清楚地洞察并一再揭露西方政客和媒体的反华用心和虚假报道，迫使他们极不情愿地做出“道歉”。西方政客和媒体总抱着一种“给中国上课的心理”。德国外交研究会会长桑德施奈德教授说：“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成就也使中国登上国际舞台的自我意识迅速增长，跟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一样。”法国一些学者提醒那些政客和媒体，中国经济发达了，中国人受教育和了解外界的人越来越多，在信息化时代，他们接触各种信息，中国人更加自信。笔者认为，我国民众这种对媒介信息警觉和识别能力的提高，对西方反华者是一个警示，他们不得不反思过去奉

行的那一套反华策略还是否有效，靠虚假和造谣信息反华还能维持多久。桑德施奈德教授在与德国网友讨论中国的论坛上说：中国的崛起这个挑战我们不曾面对过，我们现在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在过去几个月越来越明显：中国接受西方开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 中国这次报道中的得与失

从我国媒体关于拉萨“3·14”事件和奥运圣火在西方国家传递的报道中，可以明显看出比以往的改进，也存在不足，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采取恰当的应对政策和策略。拉萨“3·14”事件发生后，我国政府依法采取措施，果断平息了这一事件。在涉及我国内政的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明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国家插手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内政。”随即面对西方政客和主流媒体的反华言行，主要由我国外交部与媒体打交道，出面予以驳斥、澄清。与拉萨事件相比较，奥运圣火在西方传递遇到的阻挠、破坏是不同性质的问题。笔者注意到，我国中央领导人除了在会见外国政要时提及以外，没有直接就奥运圣火传递中的问题出面表态，都是由我国外交部出面阐明我国的态度。笔者认为，我国政府领导人这种克制、冷静地应对方式是一种进步，不仅回避了直接面对的许多矛盾，留有回旋的余地，也表明了我国政府对这种情况并没有十分在意，表明了奥运会不是中国而是世界的体育盛会。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不同性质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态度。对某些国家领导人以不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我国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个问题是由各国奥委会而非中国决定，“某国政要是否接受邀请，是他对本国奥委会做出的回答”，无所谓是向中国“施压”。从容应对，既符合奥运宗旨，又表现出大国风度。针对一些政客和媒体对火炬传递的阻挠、破坏，我外交部发言人及时表明我国的态度，有分寸地区别对待，对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干涉中国内政的反华行为点名批评，对CNN评论员卡弗蒂侮辱中国人尊严的挑衅，坚持要求必须做出正式道歉。

媒体及时报道。拉萨“3·14”事件发生后，新华社当天下午4点接到驻拉萨分社的电话，5点42分发出消息，定性准确，争得了引导舆论的主动权。

我国媒体对西方政客和媒体的反华报道和言论，毫不掩饰地如实告诉我国公众，让他们了解涉华西方舆论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过去一边倒的正面报道。这是过去少有的，表明了对我国民众的信任、自信和新闻报道的开放度。

这次也出现了对同一事件有着不同声音的报道，是一种失误，也是一种尊重事实的勇气。如4月7日圣火在巴黎的传递遭到“藏独”分子的破坏，而《人民日报》驻法国记者在所写的通讯中则是一派和平气氛：“奥运圣火在法国巴黎完成第五站在境外传递”，文章中充满“杨柳青青、百花吐艳”、“流淌不息的塞纳河，与奥林匹克火炬同行，微波荡漾；两岸树木染上新绿，楼阁倒映水中”的“浪漫风情”。显然这是事先写好的稿子，没有据现场实际情况而改动。《人民日报》4月8日照样刊登，中央电视台等也正面报道，北京奥运会新闻发言人也对此含糊其词，粉饰了和平，误导了读者。但是，同是《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同一天（4月8日）以《法国没保护好圣火》的通栏标题，发表了巴黎圣火传递真实情况的报道，与自己的《人民日报》唱了对台戏，给受众以真实。报道开头就说：“一群傲慢、放肆的抗议

者昨天在巴黎蛮横地阻挠奥运火炬的传递，致使传递活动多次短时间中断。这样的表演令全世界看到西方一些人丧失理性的偏激，也让人看到巴黎警方的无能。”“7日巴黎上演的一幕让中国人感到一丝不快，但它更是巴黎和法兰西的耻辱”，掷地有声。我猜想，他们本来也会有预稿，正面报道巴黎圣火传递活动，当看到实际情况后，便放弃了原稿，据实报道，在短短的时间内写出完全与原来不同的长篇报道是非常辛苦的，值得佩服的是记者的政治敏感和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更值得赞叹的是该报决策者的勇气。《人民日报》4月18日在报道新德里火炬传递时从两个方面都做了详细报道，突出了正面，也披露了发生的问题，做到平衡报道。媒体不同于政府，媒体报道也不同于政府发言人，我国媒体的国际报道不等同于国内报道，更不能以“君子之心”对待西方媒体的反华报道和言论，应该如实报道，让民众知道事件的真相。

根据政府领导人允诺在适当时机让外国记者到拉萨实地采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落实兑现，分别邀请记者、驻华使节到拉萨实地采访和观察，得到肯定的反应。

广泛反映中国的民意。我国主要媒体十分注重采访报道民众、非政府组织和海外华人的反映和情绪，尤其是网民意向，对一向标榜“民意”的西方政客和媒体起到了震撼的作用。面对西方处于强势的话语权，中国对外媒体要根据对外的需要和特点更加开放，不必过于拘泥“慎言”，加大自己的声频；要合理地利用多种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分工合作，发出多种声音，充分表达和加大民意更具影响力；要发挥多种对外渠道的作用，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从多方面介绍和阐述中国，给人以多方面的信息。

善于采用西方容易接受的方式，说自己的话，说带有感情的话。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4月13日针对英国圣火传递事件和攻击言行，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火炬伦敦传递后的思考》，她以

第一人称、平等交谈的细腻的笔法，写了自己对圣火在伦敦传递的美好想象和实际表现出的许多不解的“设问”，传递自己的想法与英国公众交流、沟通，启发、引导人们的思考。例如，文章开篇说：“4月6日早上，我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不禁想：今天的北京奥运火炬伦敦段的传递将会怎样？”当失望地看到传递活动受到骚扰时，她写道：“在返回机场的大巴上，北京奥组委年轻的女士们，都坚定地认为是全英国人跟她们作对。一个女孩说：‘这哪是养育了莎士比亚、狄更斯的国家啊！’另一个说：‘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到哪儿去了？’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试图说服她们，但从她们潮湿的眼睛中我明白，我没有做到。”傅莹大使在文章中写道：“一个年轻朋友看了BBC对火炬伦敦传递，他在给我的信里写道，此刻百感交集，有悲哀、愤怒，也有不解。像他一样，很多人可能从中领悟到，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阻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文章发出了中国民众的声音，美联社、法新社等西方主要通讯社和主流媒体转发，在英国等国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我引了这么长两段话，不用任何解释，大家也会感到亲切和有说服力。

当然，我们并非做得都恰到好处。比如有关拉萨事件的报道缺少及时的连续报道；我们集中发表的有关西藏新旧社会对比和揭露达赖集团的文章，长篇与综合多，说给谁听？对象不明确，更像是对国内做工作，而不适合对外；有些评论过于空泛，言辞激烈而说理不够，对象不明确，缺乏特点和说服力；我们还不善于反映民意，没有有效地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都是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面对外国主流社会的广大公众，我们应写好专门对外的文章。“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要反驳那些对手，更要让外国广大受众得到充足、全面的信息，从而

帮助他们做出公正的、有利于中国的判断”。<sup>①</sup>

笔者注意到，在以后不久的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及时地无掩饰地披露灾情，全天候地直播，国际社会反映“世界看到了过去中国从未被世人看到的另一面”，“让世人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中国”，“展现了一个国家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一面”。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中国本来就这样，（过去）未展现出来。”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又从另一个方面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外电议论，“奥运会是向世界展现中国大国的机会，使中国重新崛起的象征，是世界承认中国实力的契机。奥运会使中国人变得更加自信”。它增强了我国领导人和民众的承受能力与自信，我们的另一种自信是，实践证明，这两次报道都获得了巨大成功，我们担心的问题没有出现，却得到国内外普遍的好评。笔者设想，汶川地震的报道是自然灾害，奥运会是世界体育盛会，都可以放开报道，那么，对我国政治性的和社会性的问题，今后能否同样放开报道，或是更为开放呢？这也许是许多人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政治、社会问题的报道不同于以上的报道，应有所区别。但是，从我国短时间发生的明显变化，从实践所得到的良好反映，从未来的发展趋势，尤其从一个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发展中大国所面对的外部舆论形势来看，继续加快对外新闻报道的开放步伐，以有效地应对外部舆论环境，是必然的。

### 国际视野与大国心态

#### ——应对未来西方媒体的挑战

这个题目我已考虑很久，最早萌动于改革初期，但问题并不突出。后来这种思维不断在脑子里转悠，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

<sup>①</sup> 吴旭：《让更多的老外愿意为中国说话》，《环球时报》，2008-3-25。

提高，尤其是这次拉萨事件与圣火传递的遭遇，感到了扩大国际视野与树立大国心态日益迫切。

国外学者认为西方媒体掀起的这一反华舆论浪潮，不单是历史的延续，“其深层因素是妒忌和惧怕中国的崛起，惧怕中国的强大，惧怕中国的影响力”。中国的发展竟成为西方反华的动因，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这是个新的趋势，这个问题不仅会长期存在，而且今后会日趋激烈，我们将面临一个更为复杂的国际关系和舆论形势，这是不以我们的愿望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国内外许多专家后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引人注目，中国越好，遭到的批评会越多。“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批评中国正在成为一种时髦。中国今后很难指望在别人的掌声中前进，只能在挑剔声中走自己的路”。我们同样可以预见，时间对我国有利，客观了解中国的人必定会越来越多。但是多种因素决定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外部舆论环境不会发生有利于我国的根本性转变，甚至有时候更为险恶，我们要有足够的准备。我们如何应对？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国民，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树立大国意识和国际意识。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中西在道德价值上的冲突迟早会公开化。“而对中国来说，至少可以使很多人认识到国家崛起的困难性”。现在的公开，尽管中国不愿意看到，但必须泰然处之。“如何理性和有效地处理可能的危机，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标志”。

我们要深入认识我国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和面临的外部形势。中央要求党和国家干部要用国内和国际两个视野看问题。一个正常的大国心态是建立在正确把握自己和对国际形势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的。回顾我国近代史，在国际关系中，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中国人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羞辱，在国际上没有发言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打压和污蔑，被塑造成反面形象。新中

国成立后，受到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封锁。总之，中国长期被打压，被边缘化。

但今天不同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正在发生变化，日益显示出大国地位和作用。中国不但昰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也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国，是一个融入世界对世界负责任的、有影响的大国。这说明，中国正由自然状态的大国走向不断增强综合实力的大国，由近代的弱国走向未来的世界强国，由被边缘化的中国走进国际关系的中心舞台，不断改变、提升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辩证法告诉我们，你上来了，就意味着他下去了，就必然会产生新的不平衡，必然成为某些对中国怀有偏见的傲慢的西方国家难以接受的现实。“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中国的强大必然受到国际社会来自各方面的不同对待。中国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各种风险，会遇到与一些国家利益关系的激烈碰撞，会带来对外关系的复杂变化，这一切也必定会集中地反映在媒体舆论上，突出表现在与西方反华舆论的激烈碰撞中。对我国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我们要有自觉的清醒的认识。

我们要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变化，我们又要深入地了解世界的变化。“让我们了解世界”不是一个空泛的口号，不是过去形成的一成不变的观念，也不能只是一的了解，需要对世界的历史和现实进行系统的研究，不仅了解历史的世界，更要了解一个现实的世界，才能找到切合实际的对策，准确有效地应对西方反华舆论的挑战。

例如，我们对过去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的认识是清楚的，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与过去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有一位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曾经说过类似的情况。他沿着当年恩格斯对英国曼彻斯特工人状况调查的路线走了一趟，发现情况大变，这个城市的工人比例已经由过去的80%多减少到20%多；他在走访工人家庭时，他们不承认自己是

无产阶级，自己已经有了固定的收入，有了房子、汽车和不错的生活。他认为，过去无产阶级无法活下去，起来革命，现在再像过去那样发动革命已经不现实。以上事例告诉我们，对于资本主义新的发展态势，我们要有新的思维。

另外，我们必须面对西方大国，以一种宽阔的国际视野和大国心态妥善地应对西方传媒。西方媒体的新闻观是以负面报道为主，我们反对他们的歪曲攻击，但也不能总希望他们为我们说好话，如同要求国内媒体“以正面宣传为主”一样，这是难以做到的，他们不可能特殊地对待中国。如何看待西方舆论，不要只从对方去找原因，还要“检讨”我们的认识能力和承受能力，是否适应国际社会的客观情况。笔者经常听到某些领导人的批评：“到了国外，看不到中国的报道，能看到的也是批评报道，我们的对外宣传是怎么搞的？”笔者在同西方媒体打交道时，也经常向他们提出类似的问题，希望他们多报道中国。他们幽默地说：“按照他们的新闻观，报道中国的消息越多，负面的东西越多，你们希望这样吗？”他们认为，他们“没有为一个国家正面报道的义务”。他们反问自己“我们为什么为一个国家说好话呢”？我们要求他们的应该是增加对中国客观、真实的报道。

我们要自信自强。这是大国心态的首要之举。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保持国内的稳定，加快发展，这是立足之根本，让事实说话才最有说服力。我们十分清楚，舆论宣传不是万能的，有的矛盾不是只靠舆论可以化解的，最终要以自强不息、做好自己的事来转化矛盾。我们十分清楚，要改变这种不公正的政治和舆论状况，塑造中国的正面形象，只有靠我们自己，靠我国自身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这一切都决定于国家的综合实力的增强。国际关系的基础主要在国内。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印证着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就会赢得许多国家的认同和尊重，中华民族就会平等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许多事实也说明，中国要

被世界认知，光靠一个国家的实力并不能塑造良好的外部形象，还必须辅以正确的外交政策和有效的对外宣传。

我们要理性对待涉华各种问题。“大国要有大国的气度，要坦然地面对各种批评和赞誉”。在国际关系中，中国人是在西方的骂声中长大的。中国不怕骂、不怕压，这已经被许多历史事实所证明。今天中国发展了、强盛了，依然在挨骂，依然被围攻，而且这骂声竟来得如此猛烈！还要有被长期骂下去的思想准备，学会在骂声中识别真伪，在骂声中生存和发展。认识到这种客观存在，我们就会理智地看待世界，理性地对待各种恶劣的环境，包括政治和舆论环境。我们要冷静地区别对待西方媒体，他们是在什么问题上、以什么态度对待中国，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还是一般的问题？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我们必须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对于恶意攻击和挑衅，必须给予有力的回击；而对于由于文化差异等各种因素造成的对中国的不了解、误解或偏见，对于外国、包括西方媒体正常的负面报道，我们学会坦然面对，以事实逐步化解，促成转化。以上集中谈了西方主流媒体的典型表露，并非把他们看得一片漆黑，在我国新闻学界有人却不承认西方有“反华政客和反华媒体”。我认为，那些以仇视、反华为职业的政客和媒体是存在的，他们靠反华吃饭，让他们改很难。对此，我们不要忘记！但不是多数。不管是哪一类，我们都要做“转化”工作，就是把我们要介绍的内容，经过我们的“消化”，转化为他们能吸收的营养；就是把他们不了解（或误解，或偏见）的问题转化成他们能够理解的问题；就是从战略全局出发，冷静分析，区别性质，区别对待，化解矛盾，趋利避害。做好这一“转化”，就是我国对外宣传工作者的全部任务，也是我国国民的任务。

我想特别提出，历史上，我们主要和善于与小国、弱国打交道。现在，国际舆论的客观形势决定我们要学会与西方大国媒体打交道、

树立大国心态时，绝不意味着有任何的大国傲慢，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有疏忽小国、弱国利益的心态，更要尊重他们，谨慎从事，妥善处理与他们的关系，谋求与他们的合作共赢、良性互动的国家关系。否则，我们将来也会走向反面。

加强媒介教育，着力提高我国青少年与全体国民的媒介和科学文化素养，提高我国自身对西方媒介舆论的辨析和防范能力。一种成熟的国民素质，是一种精神力量，是对友善者的尊重，对不怀好意者的震撼。在这次拉萨事件和圣火传递中，我国国民的表现令世人所称道，理性地表达，理智地应对各种麻烦，及时把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转移到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来，保持国内的稳定和发展，集中力量筹办奥运会，有力地挫败了破坏奥运的图谋。但是，如实地讲，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民，我们（包括群众和领导干部）的心态和素质并不完全适应，我们对世界的客观了解还太少，我们的应对方式还是太单一，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还太弱，难以做到坦然面对、区别对待。不断增强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善于应对各种变故，处惊不变，这是一个大国国民应有的素质。

以有效的宣传报道方式应对复杂的国际舆论。认真研究和搞好我国的媒体外宣和大外宣。现代国际社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存共赢。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一是要了解国际社会，二是取得国际社会的了解、信任和支持。这种国际形象的塑造，改变了历史上传统的对外传播观念：第一，不再是只依据本国规则介绍中国，需要熟悉和遵循国际游戏规则。第二，不再只从本国需要出发介绍中国，必须善于从全球的角度定位传播的内容和方式，提出和解答问题，寻求主客观需求的最佳结合点和效果的最大化。第三，不再只从本国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出发介绍中国，必须善于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尤其是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处。我们既认定资本主义是必定被代替的社会制度，但又

是现实的社会制度，而且依据其经济技术和信息的实力处于现实的优势地位，我们必须学会与之长期打交道。第四，不再只以中国的视角看待世界，也要以外国和全球的视角看待中国。研究中国的对外传播，确定其走向，应该从内外关系的联系和互动中交叉定位。在我国关于拉萨事件和圣火传递的处置和宣传报道上，我们的改进是明显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大，不断改变着长期以国内宣传报道方式对待国际舆论的传统做法，有一些新的政策和策略是很奏效的，对我们搞好对外宣传很有启迪作用。我国的综合实力必定会不断增强，我国国民的视野必将会不断扩展，我国新闻媒体应对国际舆论的能力必定会日益主动自如。

（本文写作于2008年年底，刊登于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的《俯视到平视——外国媒体上的中国镜像》一书，后稍作修改补充）

## 第三部分

# 广播新闻实践的多维度思考



# 广播新闻面面观



## 一 新闻在广播中的位置

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新闻舆论机关，尽管有教育性的专题、对象节目和文艺节目，但新闻节目是中央电台广播的主体，也是中央电台最大的优势。

广播新闻的特点，首先是信息容量大、传播快而广、方便收听，尤其在过去信息渠道不畅的年代，它独占鳌头。纵观中央电台广播 70 多年，历经多个时期，其新闻节目一直占总播出量的 20% 左右（这个比例是稳定的，不包括记录新闻），而文艺节目却一直占 60% 左右。对此，电台内部曾有人产生过质疑：中央电台是不是新闻舆论单位？这个回答一直是肯定的。新闻决定着中央电台的本质属性，从建台的初衷到现在的实际（以后也会是这样），党和国家一直把中央电台作为

重要新闻传播舆论工具来看待、来使用，正因为如此才给予高度重视。

另外，实践反复证明，不管平时有多少人收听中央电台的文艺或其他节目，但听众主要是从中央电台了解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国内外信息动态，尤其是遇到重大事件或形势急剧变化的重要时刻，听众最关注的是中央电台的新闻，“文革”中不必说，平时也是这样，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深刻记忆，这是客观需求。

因此，广播局和电台领导一直首先关注的是新闻的采访、播出和新闻节目的布局安排。广播局老局长梅益熟悉新闻而主抓新闻；1982年广播局提升为广播电视部时，中央选调的第一任部长是曾经同时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辑和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最关注的也是新闻；第二任部长是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艾知生，中央交代首先要抓好新闻，尤其是电视新闻。

在此，我想讲一件有关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审稿的事，与中央电台有类似之处。据艾知生回忆，1985年5月在他到广电部上任时，几位中央领导人找他谈话，都强调去广电部的主要任务是“把好宣传关”，特别是电视新闻，而且要求得非常具体。艾知生一上任，就把很大的精力用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采取组织措施从中央电台抽调主管新闻的副局长杨伟光和新闻部副主任沈纪到中央电视台，指明是加强电视新闻。7月4日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央电视台审片后，对艾知生提出具体要求：“你们要像报纸的总编辑每天看大样那样审看《新闻联播》。……你们对广播电视节目要一个一个地研究，一个一个地改进。你们的主要业务，就是每天编排节目、审查节目、提高节目质量。”为贯彻胡耀邦总书记的指示，艾知生说：“除了必须参加的重要会议以外，我几乎每天下午5点以后到中央电视台和部、台的同志们一起审看《新闻联播》，实际上是和同志们一起编排节目，及时发现纠正各种可能发生的也包括文字上的常识性的差错”。由此“建立了由部长、主

管宣传的副部长轮流审看每天(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的制度。”形成了部领导、台领导和新闻部负责人的“三堂会审”制度。这项制度坚持了9年。<sup>①</sup>

对这种“越俎代庖”的措施，曾经引起电视台、广播电视台内外的非议，电视台有的领导抱怨说：“反正有部领导把关，由他们说了算，我们也就轻松了。”即使这样，艾知生也一直不松手。笔者认为，那时候正处在全国电视崛起、迅猛发展的时期，电视人员需求很多，根本来不及培养和培训，素质也很不适应，电视宣传、特别是新闻和文艺宣传质量跟不上，并不断发生大问题，观众反映强烈。短期内采取这种不得已的“三堂会审”把关的措施是得当的，也是有效的。但这不应视为一般的、长期的做法。

中央电台新闻节目的布局是很有讲究的。每次都是全台调整节目重点，总是先安排新闻的布局。那时中央电台时期只有两套对全国广播的节目，在40多个小时之内，总有20多次新闻播出，以方便各地和各个时间段听众的收听；各次新闻节目除重要消息普遍使用以外，又有所分工，如时政新闻、经济新闻、文教新闻、国际新闻等，节目形式上有综合新闻、新闻、简明新闻、记录新闻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重点综合新闻节目《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简称《新闻报摘》）和《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简称《全国联播》），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编辑制作复杂，集中体现了广播新闻的特点和优势，集中反映出“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形成了中央电台的新闻品牌。

新闻节目的设置和布局安排主要是方便听众收听。从广播的特点出发，首先在早、中、晚听众密集的“黄金时段”安排大块综合性新闻节目，尤其是在早晨和晚上，至今在电视和互联网的冲击下，国内

<sup>①</sup> 均见艾知生著：《广播影视工作谈》，第5页，中国广播出版社，1997年。

外仍普遍认为早晨是广播的最佳时间。所以 70 多年来，一直坚持早晨《新闻报摘》和晚上《全国联播》两个重点新闻节目，至今没有更改，即使“文革”年代，许多节目因遭受批判而停播，但这两个节目一天也没有停过。除此以外，在每天的 20 多次新闻节目中，上午 10 点、中午 12 点、下午 4 点为次重点综合新闻节目。在梅益任广播局局长时期，他经常强调安排好深夜零点新闻，以适应晚间工作人员收听，这种做法延续了好多年，也确实收到了良好反映。中央电台 1987 年的新闻改革中，在之前实现整点新闻的基础上，又实现了两套节目相互交叉、每半个小时有一次新闻节目的最佳安排，随时报告最新消息，又便于记忆和收听。

新闻节目的布局具有相对稳定性，这是广播的特点之一。与此相适应，新闻工作体制实行早、中、晚三班制，这是各新闻媒体的通行做法，只是具体做法有区别。笔者记得，“文革”中有人提出把中央电台改为“东方红电台”，打破节目布局，每天分早、中、晚三段时间，实行三班制，什么时候有新闻就什么时候安排播出，但终究因为违背广播的播出和收听规律而作罢。

## 二 广播新闻的稿源

首先，中央电台的新闻消息来源主要是新华社，这里有历史因素，延安新华电台原来是新华社的口播部，中央给延安台规定的任务是把新华社的消息与言论准确及时地播出去，后来一直沿用这一做法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也是中央对主要新闻媒体如何使用的一种分工。后来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坚持自己走路”，逐步有了自己的部分新闻。

电台播出新闻总要说明新闻来源，对此也有过许多波折。最初，延安台是新华社的一部分，那时就用“新华社电头”，表明消息来源；

“文革”开始后，新华社的报道曾经取消过电头，中央电台无偿使用新华社的新闻稿，不报新华社电头直接播出。后来，为了说明消息的来源，分清责任，增强消息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同时新华社也想借此扩大自己的影响，1971年年底，新华社就恢复五六十年代电头的用法问题专门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不仅报日期，而且要在日期前加上月份，以便于区分几月几日。经中央批准，从1972年1月1日起，新华社电头不仅加了上月份，而且又加了上年份，如“新华社北京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讯”，成为历来最长最复杂的电头，每条消息都这样。中央电台用新华社消息时必须播出电头全文，一次新闻节目中播出好几条消息，不厌其烦地重复，有时电头比一条简讯还长，不仅太麻烦，还因占去了宝贵的广播时间而减少了信息量，听众也反映不习惯，不久便停用。从1979年4月始，中央电台新闻节目又开始恢复使用新华社新的电头，只报日期。

其次，中央电台的重要新闻来源是报纸，主要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并不多，也不是它的长处，主要播出它的社论、言论和文章，有时候专门介绍版面，因为它是党中央机关报，非常具有权威性，因此选用、播出都是严肃的。中央电台1950年4月10日创办《首都报纸摘要》节目，传达中央精神、精选要闻和言论给全国“读报”，主要指《人民日报》，兼顾其他全国性报纸。为及时取得《人民日报》，中央电台收发室设专人骑摩托车每天凌晨去取报纸大样。“文革”后《人民日报》经常不能按时出报，常常是下午才能看到当天的报纸，而《新闻报摘》是早晨6点半首播，经常为等《人民日报》而焦急不安。尤其是1967年年底中央广播局实行军管后，军管小组从政治考虑明确规定：“《新闻报摘》必须以《人民日报》的头条为头条，不能自行其是。”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或以《人民日报》大样（不确定性，带有冒险性）的头条为头条，或自行设临时头条，等《人民日报》

正式出报后再及时改换。不仅是中央电台，各地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报纸也都是以《人民日报》的头条为头条，每天都要焦急地等待与《人民日报》对头条对版面，他们什么时候能出报就可想而知了。对于各地电台另有一招，为争取较快播出，他们与中央电台新闻、尤其是《新闻报摘》节目对头条，每天凌晨中央电台的电话铃声不断。这都是当地党委交给报社和电台的政治任务，报社电台设专人做这项工作。

在此，我还想特别多说几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播出（有时是“两报一刊”社论）。今天的元旦社论不一定特别引人注目了，“文革”中不同，似乎一篇社论不仅传达毛主席、党中央的最新指示精神，而且决定了一年的大政方针和政策走向，被中央和地方炒得不得了。从每年元旦的前一个月始，甚至更早，新闻媒体和各界都开始探听元旦社论的精神了，距离元旦社论发表愈近，风声也愈紧，各地通过本地媒体以及各种渠道打探消息，甚至派专人驻北京来办这件事。究其原因是复杂的，一是各地计划安排新一年的工作依据，不能偏离了中央的中心；二是摸清中央的政治气候，新一年的运动如何搞，重点是什么，于公于私早做打算；三是各级领导人的活动、年终讲话要做到事先有底，不要造成被动而被炮轰；四是新闻界有关新年前后的报道重点或选题要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这是那时特殊政治环境下的特殊心态和做法。而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领导人也因此故作神秘，为元旦社论的发表制造声势，要各报届时都在一版通栏标题套红刊登；批示中央电台事前反复预告，提前在头天晚上《全国联播》播出，随后连续广播，甚至连续广播半个月是常有的事。例如，1972年12月31日播出“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按照姚文元的意见，连续安排播出了20天，共播出129次。在31日晚《全国联播》中首播时，连续播出两遍，中间播放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渲染气氛。元旦社论一经广播，各地组织游行或大会庆祝，

然后作为元旦期间的主要政治任务组织学习，新闻媒体做长时间的宣传报道。纵观多年元旦社论的内容和贯彻情况，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地方，时常是发表后不久，工作的中心就因为毛主席的一句话或时局的变化而改变了。把元旦社论的宣传纳入政治范畴，如此造势，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复杂的人为行为，故作神秘。但是，任何不慎，都可能带来不测风云。

第三个中央电台的新闻来源是电台本部记者、驻各地记者站记者与地方广播电台记者采访的新闻、撰写的文章以及有特色的讲话录音和录音报道等，这是最具广播特色的一部分。一般而言，中央电台分四类节目：一是新闻；二是专题、对象节目，如学习、知识性节目与少儿广播等；三是文艺节目；四是服务性节目，如节目预告、天气预报、广告等。后三类由电台自己办，第一类新闻由全国新闻媒体、主要是中央新闻媒体办，起初中央电台自采新闻比例不大，现在占了绝大部分，体现了“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

这里，我主要介绍时政记者的特殊性。时政新闻是指对国家重大节日、重要会议或政治事件与活动的及时报道，尤其是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内外活动的报道，属于核心机密。因此，一是中央对新闻单位采访记者的掌握非常严格；二是对新闻报道和工作人员的审查和要求非常严格；三是报道什么、如何报道、什么时候报道严格统一。新中国成立以后，起初中央只批准新华社一家有时政新闻的报道权，他们成立了时政新闻报道组，向各媒体统一发稿。后来从广播的时效快和影响出发，中央批准了中央电台的时政报道权，也成立了时政报道组，直接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大政治活动的采访，长时间仅此两家。1958年北京（中央）电视台成立后，也因其影视特长被批准参与时政报道。中央电台的时政新闻一般与新华社稿件统一，大多由周总理审定，经常批示为中央电台提前发稿，“今晚8点广播，明天见报”；有时候

又需要播出录音讲话、录音报道等。电视台更具有其不可代替的优势。毛主席晚年，由于眼睛和身体不好，周恩来总理特别关照电视台成立了专门拍摄毛主席活动的电视摄影小组，并特别提醒不要把灯光直接对着毛主席的眼睛等。

对时政记者的政治审查和政治纪律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大家都能理解，他们经常接触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和核心机密。中央电台的陈寰、刘振敏、刘振英、罗观星等常年做时政记者。一般人认为时政报道很简单，似乎有简单的格式，其实它有特殊的规律和特点，平时对内容、政治、分寸口径和名单核对不能有丝毫的偏差，遇有盛大节日、重大政治活动和敏感问题更为复杂，记者责任重大，不可有丝毫的马虎和任意性。记得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总理与尼克松会谈，经周总理审定的新闻稿中有“诚挚地交换了看法”，而北京（中央）电视台军代表审稿时认为同尼克松有什么“诚挚”可言，挥笔删去了这句话，受到总理的批评。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新闻报道也在改革，中央电台的时政报道逐步增加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现场口头报道。一位河南籍的时政记者，有多年报道经验，但河南口音改不掉，有些听众来电话说：“全国十亿人就找不出个会说普通话的来？”说实在话，还真难以找出个既能适合、精通时政采访又说一口普通话的记者。为改善报道，中央电台特别申请增加一名播音员随中央领导人出访，由时政记者采访写稿，由播音员现场播音。因为播音员不熟悉时政采访，又不便临场发挥，现场念稿无异于播音室播音，此试验也只好作罢。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当时广播对《红旗》杂志文章的用法，也曾经是广播内容的一部分，尽管所占比例不大，时间也不长。那是“文革”中的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也是中国新闻史上一种特殊现象。《红旗》（《求是》杂志的前身）杂志是党中央机关刊物，经常发表一些政

治性、理论性很强的文章，对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学习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因此历史上很受重视。“文革”后，能否在《红旗》杂志发表个人署名文章又多了一层意义，不仅说明理论的正确与指导性，而且表明对某个人政治上的认可，甚至有可能被提升，这也成了某些人撰写文章的原因之一。

“文革”开始以后，逐步把《红旗》杂志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每逢有重大节日、政治活动或政治理论问题，时常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名义联名发表重要文章、社论，被视为最高的权威性文章，不仅成为人们学习和行动的指南，而且成为各媒体宣传理论的口径依据。《红旗》杂志的文章，也时常被中央电台选用播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刊物能够进入中央电台的广播（“文革”中和这以前，明确规定“地方报纸不允许外国人订阅”，严防泄密）。自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和理论宣传以来，每期《红旗》杂志出版后，姚文元再三强调，即便是《红旗》杂志中公开发表的文章，广播中也不能“照用”，能否采用直接由他决定，他经常对其中的文章批示“不登报，不广播”，或“只登报，不广播”，或“等见报后，同时广播”。1971年8月，他对《红旗》杂志的用法做出了全面的规定：一、《红旗》杂志的文章，不一定都适合广播；二、《人民日报》转载的《红旗》杂志的文章，能否采用也要从广播的角度考虑；三、对选用每期《红旗》杂志的文章准备广播，都要专门请示，不能自作主张。从此，每期杂志出版后，中央电台都要提出采用的意见，专题向姚文元报告请示，由此提高了《红旗》杂志文章的身价，也就提高了姚文元的身价。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中央宣传口才解除了禁令：“《红旗》杂志的文章是否用、如何用，由各新闻单位自行决定。”

### 三 中央电台的记录新闻

中央电台曾经长时间地办过记录新闻，现在知道的人不多。社会上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有一定的时代背景。据老广播回忆，1940年年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音时，在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军队内部，以及国民党统治区，都有人抄收（有的设专门抄收员）延安台的广播，传播、印发、学习。20世纪50年代中央电台正式设记录新闻，其任务是供各地县级以下宣传单位抄用，或印发宣传材料，或出黑板报等。那时候订阅报纸的人少，时效性更差，出报不及时，送报更难，几天、几十天看不到当天报纸是常事，被人们戏称“报纸为抱纸”。记录新闻的播出，占用中央电台第二套节目，每天播音3个小时，“文革”后期的1975年4月使用春季节目时间表时改为一个半小时，实际上有重大宣传可随时延长。在我的记忆中，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案，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应邀抵达联合国，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整整一天有57个国家的代表致辞。毛主席指示按照发言次序一个不少地全文刊登和广播他们的发言，共6万多字，广播一次要5个多小时。中央电台的记录新闻也破例进行广播，分4天8次播出，删去开头和落款，共播出59705个字，2126分20秒（合35小时26分20秒，约连续播出一天半的时间），按照30分钟一盘胶带计算共发播71盘胶带，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最长记录。当然，谁也不会抄录那么多，不会用那么长，一是供地方报纸刊登，二是显示和感受我们的一种胜利气氛。

记录新闻的选择、编辑、播音和播出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殊要求，由专组专人负责（较长一段时间是唐生德、赵雅丽负责）。编辑的选稿以要闻简讯与政策方针居多，尽可能简而明，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

都必须十分清楚、准确；播音清晰，大多由女播音员葛兰、曹玉琨、肖楠播出。根据广播容易误读、误解的弱点（如同音字），对难读难认的词字都要标音、准确注释，没有广博、深厚的语法修辞根底等，很难胜任编辑工作。播音不仅速度慢，而且要匀称，每句话必须重复三遍，对难读难写、容易误读误写、音同字不同或字同音不同的字词等，包括标点符号（如逗号、句号、引号等）都要解释、交代清楚，避免抄错，这种不同于普通播音和说话的速度与语调，实际上是很难掌握的。还有些字词甚至标点符号，本身含有政治含义，其解读必须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气氛协调一致。在这里，我讲一个有关播出标点符号的趣闻。“文革”中许多文章、公报等，最后总有几句口号，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是“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记录新闻每播出一句口号，都要说一句“惊叹号”。尤其是播到“毛主席万岁”，后边总带有“惊叹号”、“两个惊叹号”、“三个惊叹号”。听众对此有意见，而且上纲到政治的高度。为此，中央电台聚集语言学家反复讨论，有的提出“念到这几句口号时不读标点符号，做特殊处理，听众容易理解”；有的提出“在播完几个口号后，总的说一句‘后面加上惊叹号’”。多数不同意这样处理，认为更容易被听众误解，本来无事却成为“此地无银三白两，符号就是符号”。经中央电台写报告层层向上级请示，最后按照正常播出处理。

中央电台的记录新闻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新闻媒体的迅速发展和传送渠道的畅通而消亡。

## 四 重要新闻的播出与重播

重要新闻的播出安排也有自己的规律可循，没有规律的事物是最难把握的。20世纪的50年代至80年代，凡是重大新闻、重要文章的播出，都是精心研究的，而且一般要事先预告，便于更多的人收听。中央电台的预告早就有，从新中国成立算起，第一次预告是“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中央电台前身）转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由《人民日报》10月1日预告：“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全部转播今天下午三点钟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显然，预告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的简明新闻，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

后来的预告方式有以下样两种：一是直接告诉听众什么时间将要播出什么，一般属于机密性不强的内容，可以让听众早知道，因为这种预告本身就是一条简明新闻；二是对于机密性、新闻性强的内容，一般采用“本台几点将有重要广播，欢迎大家到时收听（或组织收听）”，不具体讲是什么事。如1976年9月9日播出毛主席逝世的《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时是这样预告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这种预告方式尤其在“文革”中盛行，自80年代后逐步减少，现在已不多见，目前保留的主要是转播政治活动和体育活动的预告。

重大新闻与重要文章的播出中，新闻的排列次序、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的排列次序都是很严肃、很讲究的，也特别敏感。广播新闻的排序与报纸版面设计都是最费琢磨的事。如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来访，中美签订了《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对这样一条最具新闻价值的爆炸性新闻，经请示中央决定，中央电台除首次播出放头条以外，其他播出都排在一次新闻节目的中间偏下位

置，表示并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其政治背景是中美关系没有正常化和内外政治环境的复杂、敏感性。如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时，《人民日报》以《蒋介石死了》的小号字标题，放在了国内要闻四版偏下不起眼的位置，似乎是不经意，但都是从当时的政治考虑决定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的排列是新闻报道中最敏感、最难处理的问题，时常因此而延误报道时效，甚至出现政治差错，凡从事新闻报道者都有同感。这一名单的排列是一门学问，被新闻界称为“名单排列学”，主要由中央办公厅掌握。如果不慎，多报或漏报，或者其中的头衔、次序排列有误，甚至给某个领导人电视镜头的大小、时间长短、形象与文字解说如何等，都会酿成政治性问题，受到单位、上级的指责，甚至被领导者本人或中央批评。这种事屡见不鲜，须格外谨慎。

凡属于重要消息和文章，中央电台在首播之后，都要尽快安排重播。重播是广播的一大特点，它可以扩大覆盖面，在短时间内满足更多听众的收听和重听。因此也最容易鼓动群众，造成社会舆论氛围。同时由于广播直接播出方便，中间环节少，只要打开直播室的话筒就能把声音传播出去。这是广播的优势。中央电台工作人员长期形成了这样的职业素养和职业习惯：许多重大事件在播出之前要做到严格保密，一旦播出，便尽量让更多的听众在最短的时间内知晓，方法是加大重播的密度，如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毛泽东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等，都在首播后密集安排重播。

正因为如此，对广播电台的管理也最为严格。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多，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与此同时，派耿飚、邱巍高等人进驻中央广播局，实际上其主要目标是迅速、果断地控制中央电台，尤其是直播室。正如耿飚所言：“中央不是对电台和电台的工作人员不信任，而是因为过去是姚文元抓意识形态、抓舆论，中央担心在这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时刻，一旦‘四人帮’有所觉

察，哪一个漏掉了，走漏了消息，‘四人帮’的余党或者亲信把持了电台，就会出大乱子，其后果不堪设想。”他说：电台、电视台“传播速度比报纸要快、要远，将会迅速波及全国，影响到世界，从而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sup>①</sup>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许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在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都要设法严格控制或争夺电台。我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访问匈牙利和泰国的时候，据该国广播电视的领导人讲，他们对广播的管理比电视还严格，报纸、电视都可以私有化、商业化，而国家广播电台不能，必须由政府严格掌控，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重播是广播的规律，依据新闻传播学理论，重播时间过长违背新闻规律和收听习惯，但“文革”中走到了极端。如1970年4月21日，中央电台在广播反修文章时，连续播出10天。1972年12月31日晚上播出“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连续安排播出了20天，共播出129次。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播出《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至18日追悼会之前，10天共播出96次。谁都清楚，有谁能坚持经常收听？这种重播，更多的是某种“重要性”的象征。改革开放后的新闻改革中，中央电台逐步减少了重播，因信息量增多，新闻媒体和渠道增多，形成了新闻信息“只播一轮”的不成文的规定，也就是某条消息首播后只在24小时内安排。

## 五 《新闻报摘》的特点与工作方式

### 汇集中央新闻媒体精华

中央电台的《新闻报摘》节目最早创办于1950年4月10日，名

<sup>①</sup> 《耿飚回忆录》第295页

称是《首都报纸摘要》(今天《新闻和报纸摘要》的前身，简称《新闻报摘》)，以《人民日报》的言论和新华社的消息为主，兼顾如《解放军报》(因其军队、军事保密的原因，实际采用不多)、《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性报纸。《首都报纸摘要》的宗旨是在报纸不多、信息传送不畅、读者阅读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广播迅速广泛地得以传播，帮助全国各地听众尤其是各级干部读报，及时了解中央的精神和国内外动态；同时也看出，广播在继续沿用“报纸有声版”的功能。

1951年5月1日中央电台举办《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除了选用《新闻报摘》的部分要闻和言论以外，主要是汇集当天的要闻，同时偏重于各地广播电台自己采写、提供的稿件或节目，密切了中央电台与各地电台的联系，突出了广播特色。

这两个节目都安排在广播最好的“黄金时间”，一个在早上人们上班、工作以前，一个在晚上人们休息的时间。中央对这两个节目的收听非常重视，特地就各地电台的转播下发通知并做出规定：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从省市电台一直到县以下人民公社的大喇叭、村里的大喇叭，每天都要完整地按时转播《新闻报摘》、《全国联播》，通过广播传达政令，将宣传教育一竿子插到底。因此，从一开始，各地电台就安排当地最好的频道转播这两个节目，通过无线和有线广播，一直传播到最基层，届时“全国广播一个声音”。多年来，全国听众形成了早晨听《新闻报摘》、晚上听《全国联播》的习惯，有许多干部感慨地说：“一天不听这两个节目，就不知道国内外大事和党的方针政策，就不知道如何工作。”这两个节目一直沿用至今，60多年长盛不衰，是中央电台历史最长、最有影响、最著名的新闻品牌。

《新闻报摘》的首播一直固定在早晨6点半钟的第一套节目中，覆盖全国；第一次重播是第二套节目的7点，主要覆盖华北地区；第二

次重播在第一套的 8 点半钟。每次重播随时增加新的内容。对于 8 点半的这次重播，不了解内情的人曾经提出，这次重播时间太晚了，“文革”中有人曾经提出要取消这次重播，实际上这次重播主要考虑的是西部地区的时差问题，北京时间 8 点半实际是新疆早晨的 6 点半钟。

《新闻报摘》以最迅速、准确地传达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播送国内外最新事态，汇集首都主要新闻媒体的要闻、言论和重要文章，以及各地最新动态，在 30 分钟的节目里最简练、集中地让听众在第一时间知晓国内外大事，带着最新的消息走上工作和生产岗位。

每天准时收听《新闻报摘》成为全国听众的习惯，有最广泛固定的听众群体。尤其是在媒体少、报纸订阅、传递不便和新闻时效慢的情况下，这一最全面、最迅速、最廉价的新闻广播节目，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文盲较多的国家，更具信息传递优势。这个节目发布的消息有着无可争辩的权威性，被认为是“中央的声音”。在“文革”时期，政治风向不定，不论群众、干部，每天不听广播，心里就不踏实，上班就不敢发言，不然说话就可能成为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消息和口径。人们见面经常问：“你听早晨的广播了吗？”或者问：“你听今天的《新闻报摘》了吗？”如果没有听，说话就不理直气壮，赶紧追问：“有什么重要消息吗？”有人比喻《新闻报摘》相当于一份‘新闻早餐’，吃了这套丰富的早餐，全国、全世界发生了哪些大事、中央有什么号令、各地有什么动态，基本上都知道了，全天心里就有了底气”。

各家报社也非常看重这个节目，这是宣扬他们报纸的最大最有利的窗口，是体现报纸价值的重要阵地。起初，中央电台安排专人在凌晨去《人民日报》等取大样，后来有些报社主动送报纸大样，争取上《新闻报摘》的机会。有时他们事先主动提供“内部信息”，介绍文章的背景，希望预留播出时间；他们把上中央电台的《新闻报摘》作为内部

评报的重要依据，作为表扬奖励甚至是评定业务职称的重要依据之一。《新闻报摘》编辑工作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简明，有关报纸把《新闻报摘》采用和如何缩编本报的长消息、长文章，在报纸上标出，张贴在“评报栏”里公示，请大家评说，作为业务研究的一项内容，有的报社还插上小红花进行表彰。

广播新闻与其他媒体新闻比较，最鲜明的特点之一是短，简练、准确。他们每天能从信息的海洋中独具慧眼地选取最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他们能够把几千字的新闻摘编成几百字、几十字的消息，而且保证准确地表达。有的报社老总感慨地说：“我们自己压缩不了的长新闻，到了中央电台《新闻报摘》编辑的手里就变成简讯了，新闻性更加突出了，而且摘得很准确。”正因为有这样的要求和工作环境，中央电台的许多人愿意到《新闻报摘》节目来锻炼，这里也是中央电台最出人才、最出领导干部的地方。

### 发展演变历程

中央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名称经历过多次演变，每次演变的背后都包含着新的思考。据中央电台老广播朱世瑛同志提供的资料，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从1950年4月10日创办到1955年4月3日为第一阶段，也是初期阶段。其特点：一是没有连续性，时断时续；二是名称变换多。先后和交替使用过的名称有《首都报纸摘要》、《首都报刊摘要》、《首都报纸评论》；三是首播时间不在清晨。

从1955年4月4日到今天为第二阶段，也是定型阶段。其特点：一是固定播出，连续不断；二是节目名称比较稳定，变换少；三是首播与两次重播时间固定，几十年未变。这期间先后采用过的名称有：《中央报纸摘要》（1955年4月4日起）、《新闻和中央报纸摘要》

(1955年10月3日起)、《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1960年5月1日起,同时增加了《北京日报》)、《新闻和报纸摘要》(1967年1月26日起,简称《新闻报摘》),现在一直沿用最后这个提法。从名称的演变可以看出,《新闻报摘》节目的内涵和外延随形势发展在不断变化,总的趋向是在扩展。

几十年中,中央电台对《新闻报摘》这个节目中含有的“报刊”、“报纸”、“评论”等提法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是赞成、支持,无论从党的新闻事业的统一性,还是从发挥广播优势、扩大广播影响力、满足听众的需要而言,都应该坚持这样做;另一种是在中央电台的发展和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多次想把“报摘”这个词改掉,“理由”一是“报摘”这个词不好懂、不好记;二是中央电台“摘抄”其他新闻媒体的消息,不是自己的独家消息,不那么“光彩”,应该“坚持自己走路”,突出电台自办广播,不应依赖其他媒体。依此提出,应该在早晨这段黄金时间办完全属于中央电台自己的名牌节目,或叫《中央电台早新闻》,或叫《晨声》、《华声》节目等。

这种意见时起时伏,比较激烈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电台实行新闻改革时,其客观因素是其他新闻媒体也在酝酿对电台采用稿件收费制度,以“保护知识产权”。但终因涉及党的新闻事业的统一性、媒体合作、新闻采访体制和广播的性质、作用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而搁置。

笔者认为,不管将来形势如何变化,媒体如何发展,媒体之间竞争关系如何复杂化,作为中央电台的广播应坚持“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的整体观念和广播优势。最充分的理由一是中央对中央媒体有分工,相互形成一个整体,这是我们体制的特点和优势;二是作为国家电台的任务和责任,应该全面、准确地反映形势、政策和国内外大事;三是我国国情过去是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现在信息畅通、信息爆炸,中央电台能集中在一两个重点节目中,选择

最有价值的信息汇集传播，有利于听众收听，有利于全国思想、政策和步调的一致。

## 工作方式独特

中央电台新闻编辑工作的方式以《新闻报摘》最为典型。

中央电台与报社早晚班大同小异，报纸编辑多是忙于前半夜，保证凌晨出报，而电台编辑则主要忙于凌晨，发《新闻报摘》。报社的编辑都知道值夜班最紧张、最苦；中央电台是上早班、值《新闻报摘》节目更紧张、更苦，加之工作、生活条件差，工作紧张而责任重大。

编播《新闻报摘》一般是七八个人，多时九至十一个人（包括播音员，不含技术人员）。一般工作程序是：新闻部在上半夜晚班下班后，留一个人值“大夜班”，负责接收、剪贴新华社的模写稿，通盘了解发稿情况，记交班本，为早班做前期准备工作；凌晨3点有两个人上大早班，初选稿件，看上一班的交班本记录（及时、如实地写交班本是准确传递精神、选择稿件、安排播出次序的重要依据），为上班后开班前会做准备；3点半全体人员到位，开始介绍情况，从几万字的稿子中研究、确定选题，然后分头编辑、审稿签字，最后定稿7000字以内，播音员开始备稿，6点以前开始录音，6点30分准时播出。“文革”中，节目的开始曲是《东方红》乐曲，结束曲是吹奏乐《国际歌》，有时播出重要消息或文章，中间插播《大海航行靠舵手》等乐曲。“文革”后逐步取消《东方红》开始曲与《国际歌》结束曲，开始曲曾经以电台自行创作的乐曲替代，因不理想改为《歌唱祖国》吹奏乐。《新闻报摘》这种一条龙式的工作方式，一环扣一环，紧张有序，遇有临时赶稿、改稿，特别是重大紧急事件，异常紧张。这类事经常遇到，我在《新闻背后的故事》一书中，谈到林彪叛逃之后、粉碎“四人帮”等的

具体情况，我这样记录了当年发生唐山大地震时早班新闻的情景：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大地震，正是中央电台《新闻报摘》节目早班人员上班的时候，有的才迈进广播大楼，有的正骑自行车走在路上，突然大地震颤，他们明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惊慌，没有人迟疑，首先想到的是广播大楼的安全，是中央电台的安全播音。地震就是命令，他们不顾家人和个人的安危，义无反顾地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沉着镇定地做好播出前的准备工作。尤其是技术人员，有的工作在广播大楼的最高层，震感最强，他们置生命危险于不顾，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那时工作条件极其艰苦，都是手工操作。广播要求高质量、出精品，而产品的制作却是手工作坊，甚至是土得不能再“土”。举两个具体的例子：一、以剪贴新华社模写稿为例。新华社每天发稿在100条左右，长期是竖排纸条传送（播音员很不习惯，近90年代改为横排），每张纸条有同样的两行字，时常字迹不清楚，电台新闻部要随时将模写剪贴在稿纸上，在上面进行删改编辑，抹来勾去，画出许多个“气球”；遇到紧急赶稿，手抄电话传稿，反复核实改动，不得不重新誊写。电台播音要求稿件字迹清楚规范、通俗口语，尽管事前备稿，播音员坐在话筒前又不得不在改编的模写稿上找来找去，播音经常中断，甚至经常造成播出差错。有一次，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到机场迎接一个外国代表团，新华社模写稿把“姬鹏”与“飞”字分别写成了两行，结果被播成“姬鹏——飞到机场”，稿子上的“照了相”也被播成“吃了饭”。二、用废报纸裁成的字条记录稿件名字、排列新闻播出次序。报纸非常重视排版面，有横竖左右的自由度。而广播新闻只能依据先后播出的次序纵向排列，而且要注意上下内容的衔接。当班编辑将选题写在用废报纸裁成的纸条上，大家一起七嘴八舌，议论取舍和先后次序，最后由当班组长或主任拍板。播出后，再将播出目录抄写在记录本上。

存档。这种模写和工作方式延用了几十年。

电台的审稿权是有特殊规定的。以《新闻报摘》为例，审稿权和签发权是经过批准的，一般由编辑部组长和主任承担。凡是经过审定签署的稿子，编辑、播音员等任何人不能随意改动和增减，这是宣传纪律。如果对定稿有不同意见，如果发现有需要改动的地方，如果在录音时因时间长短需要增删稿件，均需要报告审稿人同意方才能改动，除此以外谁都不能私自做主而增减。试想，如果每个人都能随意删改或增减稿件，埋下隐患，岂不是广播大乱！

那时生活条件极其困难。谁都知道，凌晨3点正是熟睡的时候，夏天还好一些，天亮得早，凉快；最难受的是冬天，凌晨，天最黑、最冷，又不得不离开暖被窝。广播是定时播出，是绝对不能耽误的。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住房极其紧张拥挤，夜里值班，白天无法休息，还要经常开会、学习；电台无集体宿舍，多数人员又离家远；交通不便，少有的公交车深夜停运，电台无车接送，值班者步行或骑自行车上班，有的需要有家人护送，如遇雨雪和刮风天气，路途更难；尤其是播音员，一旦误班，无人代替，值班播音员开始住电台附近的集体宿舍，由传达室工作人员按时叫班，后来宿舍被挤占，叫班制度取消，靠闹铃叫醒，唯恐误事，难以入睡；电台没有食堂，自带饭盒，用电炉子热饭，这是经特别批准、全台允许唯一能用的电炉子（电台最怕火灾隐患），但等到发稿播出后，毫无食欲，得胃病者、神经衰弱者甚多。

我在电台上过新闻早班，做过一年多短暂的《新闻报摘》的编辑和审稿人。1975年我任副台长，分管新闻宣传，那时家里没有电话，凌晨时常往来于宿舍和电台之间。1985年我任台长兼总编辑，经过广电部特殊批准家里按了电话，这本来是工作的需要，但那时电话很少，任何的差异都被看作是不同的政治待遇。我一家4口人，住在一间14平方米的筒子楼里，几乎每天凌晨4点钟电话准时响起，早班汇报当

天《新闻报摘》的选题安排，全家都被惊醒；不一会儿，电话又响了，汇报对某篇稿子的处理意见或次序排列，全家不时被惊醒，抱怨不迭，并搅得四邻不安。由此，我养成了一个“早班习惯”：拿起电话不糊涂，放下电话睡得着；每天午饭后都要补觉，哪怕是 15 分钟也好，不然，一下午昏昏沉沉得进入不了工作状态。

我的经历，比起电台许多“老早班”，根本算不了什么。他们常年上早班，有的几十年一直上早班，有部主任、有编辑，如章敬、夏佛生、何光、朱世瑛、沅华、铁云、孙静珊、沈纪、陆荣生、杨青、陈绍础、郭仲儒、冯素瑛、黄吴怀等，早班是一个艰苦奋斗的群体，也是一个特别能战斗的群体。这是中央电台新闻部、也是全台工作的一个缩影。

## 六 《全国联播》节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联播》节目（全名是《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是中央电台法定的全国电台最早的联播节目，多年固定在中央电台第一套节目晚上 8 点的黄金时间首播（1987 年 1 月 1 日改为下午 6 点半首播），第一套晚 8 点和第二套晚 9 点重播。它与《新闻报摘》节目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在于：一、都是全国内外重要新闻的集汇，互为重播，全天的许多国内重大新闻集中在晚上首播，尤其是中央领导人的活动大多在当天下午 4 点钟以后，“周恩来总理曾经指示重大的新闻事件指定在晚上 8 点的《全国联播》首播”。我曾经多次看到周总理这样的批示：“此稿（文）今晚 8 点广播，明天见报。”二、如果说《新闻报摘》节目是汇集了中央新闻媒体的精华，体现了中国新闻一体的特色，《全国联播》更突出广播特色，播出具有广播特点的录音报道和记者的口头报道等。三、《全国联播》安排上比较宽松、灵活。重要活动的录音报道，主要在这个节目安排播出；每个样板戏的发表，

包括《钢琴协奏曲》等，都选择播出选段；五届人大闭幕时播出通过修改的新《国歌》也在《全国联播》节目中播出。

那时对待国际问题和国家关系，以政治上的“左、中、右”划线，对“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有着特殊的感情，不仅在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上给予特殊的政策，而且在宣传报道上也网开一面。1971年10月30日，中央电台在《新闻报摘》和《全国联播》中，播出中共中央祝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30周年的贺电，在贺电后播出了由阿尔巴尼亚创作、中国演唱的歌曲《真正的朋友》，而在其他重点新闻节目中选编了三组阿尔巴尼亚歌曲，连续三天每天播出一组，以表示不同寻常的“磐石般的永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在给外国的贺电后配发歌曲是不多见的。

《全国联播》自身的特点：一是党和国家最新消息和重要消息的首播阵地；二是全国电台优秀节目的联合汇集和播出阵地；三是全国电台联手同时播出的时间，扩大广播和信息的覆盖面；四是通过电台把信息传递到各地的有线广播，特别是以县广播站为主的广大农村广播网，把党的方针政策一竿子插到底，送进千家万户。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有线广播网。这是适应中国国情的一大创造，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农村广播网，起着把党的方针政策直接送到农民家里和田间地头等多重作用。

毛主席非常重视农村广播网的建设，1956年批示“普及农村广播网”。1975年7月中旬，经毛主席批准，全国有线广播网会议在山西昔阳县召开。据当时统计，全国有收音机1800万台，比解放前增加了20倍。全国2600多个县基本建立起广播站，公社建立了广播放大站4万多个，93%的大队和90%的小队通了广播，60%的农户装上了广播喇叭，山区创造了用收音机带动喇叭的收听办法，形成了以县广播站为中心、以公社广播放大站为基础、联络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

队的农村广播网。从省、地、县直到农村广播网，定时转播《新闻报摘》和《全国联播》节目，是中央的规定，也是听众的要求。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信息技术发展以后，各地的转播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对《全国联播》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以上记录了中央电台新闻和主要新闻节目的特点和几十年的工作情况和工作方式，这是一段新闻历史，录以备考。

# 中央电台播出轶事



## — 一首没有唱响的《国歌》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五届会议第一次会议2月24日至3月8日同时召开。这次“两会”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召开的，明显地带有那个时期的政治特征。

会议之前，召开了中共中央十一届二中全会，为“两会”做准备。人大的主要议程是政府工作报告、修改宪法、换届选举、通过新《国歌》。“两会”报道主题是“宣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热烈拥护华主席、党中央，紧跟华主席继续革命，决心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为完成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实现三年大见成效和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会议对宣传报道的要求是“放开报道”，开成一次开放的会议。如何“放开报道”？大会报道规定：一、会前发预告；二、开幕、闭幕发消息；三、发华主席特写照片，“两会”各发“两报一刊”社论、“两会”报告和修改宪法的报告后即发消息，消息中摘发报告要点；四、每天发小组审议、讨论消息和发言要点、会议特写；五、采访大庆、大寨、硬骨头六连等先进典型和工、农、兵、学、商、政、党等代表人物的先进事迹；六、对外宣传及时报道会议进程，播发开幕与闭幕电视新闻片，随会议进程发报告内容摘要；七、国外贺电《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其他报纸可选择发表；八、外国记者不参加大会采访，有关新闻和文件由外交部新闻司统一提供。除此以外，中共中央特发通知在大会闭幕后，“各省市区可组织 20 万人的游行庆祝，京津沪可多于 20 万人，各基层单位可举行庆祝会”。

修改通过《国歌》是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

《国歌》是国家的象征。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如何确定新中国的国歌、国旗、国徽是一项严肃而重大的事。为制定一个能够代表国家、反映历史、体现时代和凝聚民族精神的国歌，决定面向社会广泛征集，社会各界和个人献辞踊跃，但选来选去认为不够理想，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在 1949 年 9 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以聂耳作曲、田汉填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对内不忘历史，居安思危，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一直延续下来，在许多重要场合被演奏、演唱，庄严激昂、催人奋进，一直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国歌》的歌词尽人皆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  
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

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聂耳 1935 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的背景，是在日寇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掀起抗日救亡的时刻，起到了动员人民、鼓舞人民的巨大作用。到了“文革”之初，因歌词作者田汉被打倒，便不再演唱和使用，在许多情况下以《东方红》或《歌唱祖国》替代，有时也只演奏《义勇军进行曲》，不唱歌词。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文革”终结，新时期新长征开始，中央决定修改《国歌》，理由一是因为田汉还没有平反，二是觉得歌词过时，要反映新时代新长征的特点，且具有长期性。原则是保留原来的曲谱，重新填词。为此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征集小组”，1977年10月开始在全国广泛征集新《国歌》的歌词。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从大量的歌词中首选出其中的两首，再进行讨论修改，准备提交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根据当时的传达记载，这两首歌词是这样的：

首选歌词之一：“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听胜利的号角，召唤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任何风浪任何敌人挡不住我们。团结！战斗！前进！我们前赴后继，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首选歌词之二：“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们！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的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1978年3月5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选用了“首选歌词之二”，后来披露此歌词为郭沫若撰写，“中央指派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按原曲填词。郭老经过一番冥思苦

想，按原曲的韵律创作出了新歌词”。<sup>①</sup>通过《国歌》后，在中央电台的《全国联播》节目中播放了演唱《国歌》的录音，以后在多次严肃场合播放，并在广播中进行教唱，但一直没有流行开。

不久，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田汉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恢复原来由聂耳作曲、田汉填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次短暂的《国歌》更替历史，给很少的人留下了记忆。

## 二 曾经播出的毛主席生日祝词

“文革”期间，对毛泽东主席的热爱和崇拜达到了巅峰，因此，对毛主席诞辰的宣传也就格外重视，虽然不违背中央关于禁止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祝寿的规定，但在12月26日这一天，心照不宣，特别精心，对节目的祝福语、毛主席语录的选择、重点新闻内容的安排、全台节目的内容选择、文艺节目的气氛和播音的基调等，都有意做到正面、喜庆、歌颂。

1968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75岁生日，中央“文革”违背中央过去做出的不给领导人祝寿的规定，23日向各地发电报，把12月26日这一天的日历印成红颜色，并注明“1893年这一天是毛主席的生日”，以示隆重纪念。中央广播局军管小组负责人专门开会，对广播电视宣传提出要求、做出部署。他强调“这一天要大歌大颂”。为此，中央电台重点新闻《新闻报摘》、《全国联播》节目，都要打破原来主

<sup>①</sup> 高智勇：《国歌史话》，《纵横》，2009年第一期。

要播文字节目的传统，播出《东方红》——生日的祝福语——“四个伟大”——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歌曲；各个专题和对象节目都在呼号后，加祝福语和“四个伟大”。具体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节目时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同志们，首先让我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敬祝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现在让我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面播送……”。

除了毛主席的生日，这种祝福语在重大节日、重要会议、重要文章、重大成就、各种报喜时也经常用，在“万寿无疆”之后，还要加上“祝愿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12月29日，分管宣传的军代表在总结26日的宣传时说：“中央台对26日的宣传搞得比较好。播音员为了播好祝福语，就录了好几个钟头，还征求了工人的意见。”

但是，在1967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那一天，也曾经出过“差错”。这天《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开始，中央电台新闻部一位副主任选用了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中的一条语录播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里一连有几个“死”字，被认为犯了忌讳而受到追查和严厉的批判。以后形成一条戒律：在每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这一天，文章和节目中凡是有“死”字的词句，有悲伤、悲凄、哭泣的音乐、配乐和音

响效果，中央电台都避而不用。

这样做并不是毛主席的本意。到了 1971 年 12 月 26 日毛主席生日这一天，宣传发生了变化，明确布置：不再因为生日用对毛主席的祝福语，节目和播音气氛也不要太突出，可略高于平时；多播出一些内容扎实的学习和歌颂文章，但不要有意制造和渲染气氛；注意选用工农兵各方面和各民族的文章，反映面要广；文艺节目的气氛要喜庆、欢快，多用些歌颂的；尽量防止不协调的内容、气氛和反义词。

### 三 中央电台节目的开始曲与结束曲

一座电台、一个节目的开始曲、结束曲是它的形象标志。

对于如何设定开始曲、结束曲，一般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认为它是节目的一部分，开始曲所表现的主题、格调、形象，应该与节目的方针一致；另一种认为，它只是一种符号、一种标志，让听众一听，就知道是某家电台、某个节目，不会混淆。这两种见解都有道理，事实上两种情况都存在。过去持第一种见解的多，在突出政治的年代，开始曲与结束曲的变化如同晴雨表，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反映着政治气候的变化。现在持第二种见解的逐步多起来，使用也在增多。

一般而言，开始曲、结束曲有两种类型：一是指每一套节目全天播音的开始曲、结束曲，如中央电台的一、二套节目；二是指每一个节目的开始曲、结束曲。不管哪种类型的开始曲都不是固定不变的。

中央电台第一套节目从早晨 4 点钟开始播音。从 1950 年 4 月 16 日起，这套节目全天播音用的开始曲是《国歌》吹奏乐，然后开始预告节目；到第二天凌晨 1 点 35 分第一套节目全天播音结束，用的结束曲是《歌唱祖国》乐曲。第二套节目从早晨 5 点钟开始播音，晚上 11 点 55 分结束，所用的开始曲与结束曲与第一套节目相同。

“文革”开始不久，中央电台一、二套节目全天播音的开始曲发生了变化，先是电子音乐《东方红》乐曲，然后是《东方红》合唱；全天播音的结束曲改为《国际歌》齐唱（1968年5月20日起用的节目时间表中正式注明）。“文革”初期，“造反派”曾经酝酿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为“东方红电台”，没有被采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人建议将两套节目全天播音的开始曲《东方红》乐曲改为《国歌》合唱，没有被采纳。1979年年初改用“春夏季节目时间表”时，两套节目全天播音开始的前奏改为《东方红》钟声，然后合唱《东方红》，预告节目；从1980年5月19日起，全天播音的开始曲只用《东方红》乐曲，停播了《东方红》合唱，实际是为未来改变《东方红》乐曲的一种适应性过渡，一次都改掉太敏感；全天播音结束曲由《国际歌》齐唱改为乐曲。1983年11月1日，两套节目全天播音开始曲又恢复到“文革”以前的《国歌》吹奏乐，结束曲是《歌唱祖国》乐曲。从以上不难看出，这种变化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关系非常密切，也非常敏感，每次改动都是慎重考虑、经过请示决定的。

同时各地广播电台全天开始播音的开始曲与结束曲，也随着中央电台的改变而改变。

比较而言，每一套节目的开始曲、结束曲相对稳定，而节目的开始曲和结束曲的变化更大一些。以中央电台每天早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每天晚上的《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为例。“文革”前几经变动，后来稳定在以《歌唱祖国》乐曲开始，不设结束曲，用回报的方式结束。“文革”中这两个节目都以《东方红》乐曲为开始曲，以《国际歌》吹奏乐为结束曲；有重要广播时，如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改为《国际歌》齐唱为结束曲，更显气势。这样，在每次30分钟的节目中，开头、结尾两个曲子占去4分多钟，减少了节目的信

息量。

“文革”结束不久，形势和政治氛围发生了变化，同时从增加新闻信息量考虑，取消了两个节目的结束曲。20世纪80年代初，准备先改变《新闻报摘》的开始曲《东方红》乐曲，先是选取了一首乐曲中的某一章节，用过三个月，由于听众的反对而取消；后又自行组织创作了一首没有明确主题的开始曲，曲调比较软，旋律不明快，也用过一段时间，招来众多的非议，有人称为“美人曲”。这两次开始曲的改变时间不长，影响不大，许多人没有印象。最后还是采用了听众认可的《歌唱祖国》乐曲，同时取消了结束曲，恢复到“文革”以前的做法。《全国联播》也做了同样的变动。

其他节目一般只有开始曲，有的是用现成的曲子（或加以改编），如《对农村广播》在一段时间用的是《全国农业学大寨》乐曲，体育节目一直沿用《运动员进行曲》，有的是专门为某一节目创作的开始曲，大家最熟悉的是《小喇叭》和《星星火炬》。

国外电台的做法有相似之处。我1984年访问波兰时，在波兰古都克拉科夫电台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克拉科夫起源于一个贸易小镇，逐步发展成为波兰南部的贸易中心，建起了城墙，成为波兰的古都。这里早晨吹号开城门，晚上吹号关城门，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据说，13世纪，鞑靼人入侵这里，人们心中恐惧，把早晚吹号改为每一个小时吹一次，向市民报平安。一天夜里，鞑靼人偷偷登城，被塔楼上的号手发现了，他立即吹响号角报警，但是刚刚吹了一半，就被鞑靼人射中咽喉而死。市民们知道出了事，纷纷奔向城墙，打退了鞑靼人的进攻，保卫了克拉科夫。人们非常敬重这位勇敢机智的号手，后人又接着吹响了这支曲子，而且不把曲子吹完，只吹到那位号手断曲的地方为止，让人们永远记住过去的历史，居安思危，提高警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克拉科夫电台恢复播音时，在中午12点播出了这

首没有吹完的曲子；波兰人听了无比振奋，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从此，克拉科夫电台把这首断曲作为 12 点播音的开始曲，每天中午播出一次，而且不是用录音带，由号手直接吹。我们在访问的一天中午观赏了这一幕，这成了克拉科夫的一景。

把开始曲、结束曲作为一种符号使用的节目也不少，起到节目标志的作用。这种情况多适用于综合性的节目，很难确定一种主题；另外是一种特别（或特殊）的节目，有鲜明的特点，需要特别的音响。“文革”结束后，一些广播电台进行了尝试（如用电子琴音符），但是能够被听众所承认、保留下来的不多。

在波兰的卡托维兹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卡托维兹以煤炭和冶金工业著称。走进卡托维兹电台，迎面摆着两件东西，在一吨重的煤块上雕刻着矿工的形象，在一个小巧的木匣子里放着铁砧。主人告诉我们，敲打这个铁砧发出的音响，就是电台播音的开始曲。我们这才看清楚，铁砧上面安装着两个小锤，一个专敲铁砧的大头，另一个专敲铁砧的小头，轮流上下，发出浑厚和清脆两种不同的声音，这就是开始曲了。更有趣的是，每次播出现敲现放，不是用录音播出。具体时间由机房的人控制，一按电钮便自动敲打起来，通过匣子里的麦克风传送出去。主人为我们做了两次现场表演。

有人把节目的结束曲与节目之间的间奏乐相提并论，其实两者并不是一回事。间奏乐主要起上下间隔的作用，同时也要注意上下内容的衔接，尤其是与上面节目内容的衔接，与其内容、气氛协调。

广播（电视）节目开始曲一般只有几秒、十几秒，不能长，但创作却极其困难，既要与节目的方针一致，有主旋律，有鲜明的音乐形象，又无法展开。如同做文章一般，文章愈短愈难写，它比写短文更难。一首开始曲，要经过反复的录制、审查，见解不一，更难以被听众（观众）认可。一些作曲家不愿意接受此项任务，费力不讨好；一些演奏

团体也不愿意接受录音任务，太短，开头即是结尾。因此，有些开始曲，只有从大家熟悉、认可的歌曲或乐曲中选取。

看似不起眼的开始、结束曲，其中却大有学问。

#### 四 广播称谓的演变

1989年2月20日，李先念就广播、电视的称谓问题，专门写信给总书记，对不称“同志”很有意见。总书记让广播电影电视部艾知生部长查对一下历史，艾知生又将任务交给了我，查对以后写出报告。

2月21日中央电台汇报了调查情况。经查：“文革”以前，中央电台在全天播音的开始曲后，称谓用语是“各位听众”，重点新闻节目《新闻报摘》和《全国联播》的称谓也是“各位听众”！这个用语范围广泛，对听众没有政治界限的区分，包括所有收听广播的人。

“文革”是一个特殊的政治时期，中央电台的称谓用语混乱，隐含着明显的政治区分。在全天开始播音的称谓是“同志们”！这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个特殊的政治用语，把许多人排除在外，尤其在“文革”中的政治分界更为突出。中央电台各个节目的称谓用语更为直白，比较多的是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同志们！”，青少年节目等有的用“红卫兵小将们！”，有的甚至用“造反派的战友们！”。在称谓后边是“现在开始播音！”，有的用“现在开始战斗！”连起来，经常出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某某节目时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同志们！现在开始战斗（播音）！现在先学习毛主席语录：‘……’”。

“文革”结束后称谓改为“同志们！”

改革开放后，从1983年起又恢复到“文革”前“各位听众！”不久称谓又出现了混乱。“各位听众”、“同志们”时有出现，而经常用

的是“同志们，朋友们”，或者只用“听众朋友”，并开始出现“女士们，先生们”、“太太、小姐们”这些久违了的称呼。一些节目称谓追趕时髦和新奇成为时尚，似乎也是一种“改革开放”；而“同志”、“同志们”已不吃香，似乎是一种“僵化”和“左”的影子。只有特定对象节目的称谓没有改变，如少年儿童节目仍然称“小朋友，你们好”！

艾知生部长开会征求中央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意见，讨论用什么称谓为好。考虑到听众和观众的广泛性，电台和电视台认为，除了特定对象的节目和特殊情况以外，一般用“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为好；视不同节目、不同对象可以用“同志们”、“朋友们”，或者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也可以“同志们、朋友们”合用。

这个意见被艾知生采纳了。2月22日中央电台就把新闻节目的称谓由“听众朋友”改为“各位听众！”。23日，艾知生部长告诉我，22日把报告送上去以后，总书记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批给李先念和其他同志阅。艾说，估计没有什么问题了，但仍然要有改动的思想准备。

1990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李荒的文章《同志颂》，谈了对广播、电视某些称谓的不同看法。李先念对这篇文章非常称道，11月3日下午让秘书徐克友给中央宣传部打电话，称赞《同志颂》写得好，说先念同志早就对把“同志”改为“先生”、“朋友”等有看法，不赞成。他说，“同志”这个称呼是我国人民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形成的，为什么一定要改呢？说得重一些，这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迎合，当然并不反对在外交场合称“先生”、“女士”、“夫人”、“小姐”。

遵照这个意见，艾知生部长提出要电台、电视台再做研究，并规定在11月14日，中央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主要新闻节目中，一律把“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的称谓改为“同志们”。对此，两台采取了同步的做法。过了几天以后，中央电视台出现了几种用法，有时用“观众同志们”，有时用“各位观众，同志们”。

听众和观众对称谓的任何变化都非常敏感，对这一改动评说不一，外电也很快做出了反应。外国驻京记者给电台、电视台打电话，询问有什么背景。我们回答是正常变动，防止称谓使用的混乱，做了规范统一。《美国之音》对这一改动做了报道，并胡乱猜测说“中国的强硬派占了上风”。

11月19日，中央电台对不同对象节目的称谓进行了具体研究，区别对待。新闻节目用“同志们”（后来还原为“各位听众”）；各专题节目和文艺节目一律用“各位听众”；对象节目中的对少年儿童广播继续沿用“同学们好”、“小朋友好”；对台湾广播依据具体对象而定。在一般情况下不再使用“先生”、“太太”、“夫人”和“小姐”的称谓，特殊情况例外。

## 五 王震与评书《三国演义》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不久，经过10年“文革”的文化肃杀，全民面对文化饥渴。《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名著之一，但不通俗，难以普及，中央电台花费了几年的时间，进行整理、编辑、录制、播出，得以推广。《评书三国演义》的播出极其成功，既保留了原貌，更突出和强化了人物的性格和故事性，适应了广播特点和收听习惯，雅俗共赏，喜闻乐见，而由著名的评书艺术家袁阔成绘声绘色地播讲，更是入耳入脑、扣人心弦。

中央电台安排在覆盖全国的第一套节目、听众最集中的中午12点半黄金时间播出（这是中央电台精心设计的《长篇小说连续广播时间》），每天30分钟连续播出4个多月（另外安排下午重播），轰动了全国，万人空巷，听众以先听为快，成为广泛议论的话题。

1986年2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评书三国演义》，这是一

部 62 万多字的浩瀚巨著，由袁阔成改编播讲，李程、袁枫整理。为《评书三国演义》的改编、录制、播出，中央电台文艺部付出了辛勤劳动，编辑袁枫不仅参与改编，而且要组织录音，一遍又一遍地审听节目、复制节目、发播节目，我经常看着她抱着沉甸甸的一摞胶带，在中央电台文艺部、录音间与播出间之间走来走去。

《评书三国演义》的播出，在中央领导人中也有许多“粉丝”，最忠实的是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将军。他相当入迷，不仅百听不厌，而且迫不及待，从中央电台要去了一套录音，在家里反复听，外出必带，与朋友交谈总提《评书三国演义》，而且还能绘声绘色地来上几段。1984年2月18日王震在写给袁阔成的信中说：

“我的孙子是初中生，他非常喜欢听你广播的三国演义。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我的孙子总在你广播时打开收音机调整音节，这在一个老而有疾病的人，倾耳听讲是极有乐趣和有教益的。老头子入迷了！孙子们也入迷了！我告诉他们，袁伯伯（请允许我卖老吧）讲，你们听，是学国语的好方法。的确，他们很尊重你、敬爱你。阔成同志：我以千千万万忠实听众中的一员，向你恳切地提一点建议，那就是要求你把《三国》上那些主要人物的对话从原本上有选择地多讲几句，我在公余之暇，在听了之后，翻开书读读，有此感想。谨此奉告。祝你健康，并祝为振兴中华文化做出卓越贡献。”<sup>①</sup>

由书及人，王震向中央电台提出，要把袁阔成调进北京，安排在中央电台的文艺部工作，专门录说评书。袁阔成本来是北京人，从小学说评书，在曲艺界乃至文艺界都很有声望，后来到辽宁营口说唱团

<sup>①</sup> 录自 1986 年 2 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评书三国演义》。

工作，任团长，他的调离进京工作由中央电台出面办理。当时的进京户口指标极其困难，虽有王老的指示也很费周折，层层闯关，先后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中间王老不断催促。1986年袁阔成调进，安排在中央电台的文艺部，专门录说评书节目，并参加社会上的文艺演出活动。

袁阔成调北京后，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艾知生部长等多次看望他。1986年12月27日下午，王震、薄一波、胡乔木、宋任穷、邓力群中央“五老”一起在中南海会见袁阔成，中宣部副部长李彦、广电部副部长马庆雄、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中央电台台长杨正泉、中央电台文艺部主任尹廉钊和编辑袁枫、营口广播局局长刘继武和营口说唱团李程等陪见。这次会见是由王震发起的，会见的对象和意图很明确，“五老”有许多话要说，从下午3点直到5点，对袁阔成和他说的评书给予很高的评价。

王震开门见山，他说：《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名著，书里什么人都有，“我这个人，也可以从《三国演义》中找到自己的形象——周仓，抡大刀”。“古代的东汉时期，群雄并起，互相角逐，要统一，中华民族需要一个大统一，需要长治久安。”

《评书三国演义》后来不断应听众的要求重播，出唱片，出光盘，直到200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央电台向社会推广60年的优秀文化、优秀文艺节目，又精心编辑、制作了一套《评书三国演义》的光盘，其封面的推广词说：“耗时长达五年录制的鸿篇巨著，中国首批十大曲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评书巨匠袁阔成里程碑之作。”显然，《评书三国演义》将会长期保留下去。

# 播音与播音员纪事



## 一 初识播音趣事

我认识广播是从接触播音开始的。我出生在山东省肥城县一个农村，解放后上小学，我们在农村和学校都听不到广播，更没有见过收音机，只见过挂在树上的大喇叭，主要是供村里开会或是发通知用，偶尔转播点电台的新闻、放点音乐，我们叫它“话匣子”、“戏匣子”。直到 1957 年上高中时，我才在校长的办公室里见到一个大木匣子的落地收音机。现在提及的“播音”一词是后来的标准用语。

1960 年我高中毕业时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当时我并不知道广播学院是干什么的，只是喜欢新闻工作，而新闻系又最难考，在仅有的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的招生中，唯独广播学院招生最多，录取概率高，我便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考

广播是为了将来在电台工作，当时我想广播电台肯定也是个大喇叭，无非就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那里轮流说话。他们说的是京话，软绵绵的，比直通通的山东话好听。后来才知道那是普通话，与京话不完全是一回事儿。我还担心我满口的山东话，又不会唱歌，考广播学院能行吗？在电台我能干什么？结果考上了，竟由此奠基了我一生的职业道路。

广播学院课程的设置突出广播的特点，其中有一门课叫《语音》课，教我们学说普通话。老师说不仅播音员要说普通话，广播编辑和记者也要学说普通话，是一项基本功，既是为了进行报道，让听众能听懂广播，也是为了向全国提倡和推广普通话，使语言规范化。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规定，全国推广普通话是以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发音为标准的，广播电台和播音员都承担着推广普及普通话的任务（除了特定对象如台湾客家话、闽南话的方言广播和对少数民族的民族语言广播外），起着示范作用。

人类最早的交流工具就是语言文字，语言在先，文字在后。古时候尚且知道书同文、车同轨的道理，像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大国，没有一种统一规范的语言文字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山东人学普通话真难。山东话一是硬，二是哏，似乎舌头不会打弯，分不清四声，根本就没有第三声，直来直去，再加上一些方言土语，常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一个人要改掉多年、尤其是幼年形成的乡音谈何容易，但我还是努力地学、努力地改了。也有不学的，在广播学院我有个同年级的山东老乡，他说祖祖辈辈都说山东话，我为什么要改啊？他就一直没有好好学。后来毕业后不久就回山东工作了。北京广播学院的《语音》课是一门不起眼的课程，可几十年一直坚持下来了，它为我们这些学子后来的工作提供了便利，至今学友谈起来仍赞不绝口。

应该说，我在校时学普通话是用了心的，但那时对普通话的要求

不是很高，今天看来那只是个“初级阶段”。我毕业后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一干就是30年，我逐步地认识了广播，认识了播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中央电台出面组织过几次“全国业余普通话大赛”，意在推动全国学习普通话。因为我是中央电台台长，每次都由我担任大赛组委会主任，每次到决赛后发奖的时候，总要我讲几句话，一开口便露出了马脚，引起哄堂大笑。他们疑惑：怎么中央电台台长还是山东腔啊！这让我很尴尬，真正感受到了没有学好普通话的尴尬滋味。

这里还出现了一个插曲：就在第三次大奖赛我讲话后不久，接到一封写给中央电台台长的来信，信中让我为她寻找一位同乡。信中说，她有一位小学同学，分别已经40多年了，一直没有联系。她在听“普通话大赛”时，听到一位叫杨正泉的领导发言，名字熟，声音也像，但不能确认，“请台长为我打听一下，他是不是我要找的同乡”。这封信找对了头，我惊喜不已，我们很快取得了联系，我戏之曰“乡音识老乡”。后来年纪大了又出现“返祖”现象，不经意间乡音越来越浓了。有一次，中央电台播音艺术指导方明听了我的发言后，半认真地说：“你的山东腔越来越重了，过去丢掉的那些山东音又被你拣回来了。”乡音难改却能改，要学就应该学好，尤其是广播人应该有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 二 只有“两个播音员”的电台

播音员是广播电台形象的代言人。那时社会上对广播对播音的认识也是肤浅的，如同我最初的想法一样，认为广播电台只有一男一女两个播音员也就够了。这种想法一直延续了许多年，直到2000年年初，有一位省级领导干部还对我这样说：“广播有什么搞头，不就是一位男播音员、一位女播音员在那里念稿子吗？！”

无独有偶，2008年我出版了《新闻背后的故事》一书，其中回顾了我在中央电台时经历的一些重大宣传，我把它寄给了我上中学时期的一位老师，他给我打电话说：“我真没有想到电台的宣传竟是那么的复杂，惊心动魄，我还以为就是几位男女播音员在那里念稿子呢！”

也难怪，隔行如隔山嘛！广播电台天天在宣传，但很少讲自己。播音员处于广播电台的最前沿，广播听众所直接接触的也就是播音员和后来兴起的节目主持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播音员的重要性，反映出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形象。每个播音员都有个人形象，听众有不同的评价，但播音员所展现的首先是广播电台的代言人和形象代表。人们认识广播是从播音员开始的，人们评价广播也首先是看对播音员的认可程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播音员靠依托电台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重要原因。

从1940年12月30日党领导下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诞生起，其宗旨就是为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务，这是广播宣传所遵循的最高准则，用一句形象的比喻就是“喉舌作用”。在这里，我想起延安时期的老广播工作者、广播学院教授温济泽在讲授人民广播历史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广播工作者的任务是什么？是为党和人民站岗的、放哨的、擂鼓的、吹号的。”我理解，站岗是把关，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放哨是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擂鼓和吹号是对社会的发展进步起推动和鼓舞作用。电台播音站在广播第一线，直接与听众见面，当然毫不例外。“播音员主持人拥有表达话语的权利，但是必须明白，我们的播音员主持人是党和国家的喉舌，话语权是由台里授予的，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中央电台播音艺术指导铁城语）。

这种客观事实，主要不是理论而是实际问题，听众就是这么看、这么要求的，他们以此来评判一个电台。下面将涉及许多生动事例，回过头来再看这个问题便一目了然。广播是这样，电视也是这样。不

久以前，对中央电视台更换新闻联播播音员引起不同的反响，观众评头论足，高标准要求，也就是这个道理。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这客观地说明了播音员的位置、责任和作用。播音员是节目、电台形象的代表，同时又体现出个性特征。如果过于强调个性而丢掉共性，容易走偏方向；而过多地强调共性而丢掉个性，那就会千篇一律。播音员（主持人）是共性与个性的完美统一。

## 三 中央电台的播音基调和风格

每个国家广播播音基调和风格的形成，是与它的文化传统相适应的，那么中国电台的播音应该具有中华文化的传统和气派，符合中国国情与民情，符合中国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接受习惯。但同时又与时代(时期)特点相结合，因此播音基调和风格的形成是客观与主观环境的统一。

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广播事业——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1940 年 12 月 30 日诞生于延安窑洞，这一天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诞生日。人民广播最早的播音员是麦风、姚雯和萧岩。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民族矛盾和斗争占据主导地位，与阶级矛盾和斗争相互交织，而且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声音又极其微弱，特别需要打破舆论的包围，这种客观政治环境决定了播音需要战斗的风格，需要大声疾呼宣传党的主张，介绍根据地的实际，动员人民和各种力量联合抗日。那时候的播音基调和风格与客观环境和党的任务是完全适应的。我们党领导下的革命和建设，决定着人民广播事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解放战争初期，新华广播电台撤离延安不久，我军取得了蟠龙大捷，新华广播电台及时播出了这一胜利消息。毛主席听了，赞扬那位女播音员好厉害，讲起胜利来欢欣鼓舞，骂起敌人来义正词严。这个故事广为流传，由此形成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播音基调和战

斗风格。不久，毛主席在发布《土地法大纲》的一份文件上批示：“此文不能播错一个字。”

“不能播错一个字”是对播出某一具体文件的要求，随后推而广之成为中央电台播音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播音员的座右铭。“播音员主持人的安全播音意识是广播电视的生命线。”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奠定了人民广播的基础，形成了延安传统和延安精神，并被广播界发扬光大，中央电台播音艺术指导铁城说：“总结历史经验，概括为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那时候的客观环境极为复杂，斗争极其艰苦，今天的情况不同了，但这些基本经验依然没有过时。”

这不难看出，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任务，决定着电台播音的不同基调和风格，换言之，播音基调和风格也应该随着党和国家的形势与任务而发生相应变化，这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在这一总的框架内，不同的电台、不同的节目、不同的播音员之间存在差异也是不难理解的，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对播音员性质的认定和安全播音的基本要求不应该改变。在中央电台，长期坚持“零秒无事故”。广播工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安全播出高于天。”（雅坤语）“播音员主持人的安全播音意识是广播电视的生命线。”（铁城语）

## 四 转播开国大典：中央电台的骄傲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庄严的时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天安门城楼上转播宣布和庆祝新中国诞生的实况，把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遍了全国和世界，一直成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骄傲。

在转播前，10月1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讯》的醒目标题登载：

“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今天全部转播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消息中说：“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全部转播今天下午三点钟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这是伴随新中国诞生的第一次中央电台转播的重要预告。

这次的转播把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盛大阅兵式以及人民群众欢庆新中国诞生的历史时刻，通过电波迅速传向全国、全世界！中央电台播音员齐越、丁一岚也与新中国一起，永远载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事业的史册。

在这之前，1949年9月20日晚，新华广播电台（首次）播出了毛泽东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全国人民第一次从收音机里听到人民领袖的声音。新华社9月22日报道了沈阳、北京等地听众的热烈反应，消息中说：“沈阳、北平等地区人民在收音机前热烈倾听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当电台20日晚上播送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讲话录音的时候，沈阳市各工厂、机关、商店、街头的每一架收音机和扩音器前都挤满了人群，听众们用热烈的掌声和歌声来欢迎毛主席的讲话。北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学生，都在大礼堂等地方架设扩音器，倾听毛主席的讲话。清华大学一千多名师生员工听完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高呼‘人民领袖毛泽东万岁’，‘新政协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1949年12月5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国庆大典的转播，开创了中央电台转播重要节日和重大活动的先河。国庆节是我国固定的盛大节日，国庆宣传是新闻媒体每年的重大宣传之一。1959年10月1日的10年大庆，1964年10月1日的15

年大庆，1969年国庆20周年大庆，以及后来的多次国庆节，中央电台都在天安门城楼上做国庆实况转播。

## 五 对“大论战”中播音的再认识

为党、国家和人民服务，始终是人民广播的核心和主线，这也就决定了广播宣传和播音的总基调。同时，随着国家不同发展历史阶段中心任务的不同，而又有所变化。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赞扬播音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与建设年代，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应该说时代不同了，播音的基调和风格也应该随之有所变化，但那时候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基本沿用革命战争时期的播音基调和风格。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共产主义大论战中，又加强了这种风格，形成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观点鲜明的“论战式的播音风格”，届时各地都在组织收听，显示出广播的巨大威力，凡是听过“大论战”播音的人，都会留下难以抹去的记忆。我们那些正在学习广播新闻的学子，更为广播的威力而倍感骄傲。

时过50多年后，2010年5月在纪念人民广播事业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70周年前夕的座谈会上，年轻的广播人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在回顾历史上重大播音事件的筹备纪念活动中，人们对那次论战的播音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多数持否定态度，这源自对那次论战持否定的看法，因此也殃及对播音的评价，甚至有人认为不应该再保留那时候的录音带。他们问我的看法如何？

我直言不讳，指出当时的论战事出有因，不可完全否定。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不断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看待历史问题要依据当时的客观与主观环境，分析某一事件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起

了推动还是阻碍作用，而予以肯定或否定，而不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或高度、以今天的观点去批判或苛求历史，如果是那样，后人否定前人，历史的存在永远没有合理性，也就永远没有正确的历史。试想，到了共产主义，用那时的现实看待人类史，从其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包括我们今天的现实存在）的种种现实都是可笑的，甚至是荒谬的。我们不是空想者，没有历史也就没有今天，没有今天也就没有未来。

我认为，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是在极其复杂的内外政治形势下展开的，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起到振奋、鼓舞的作用，播音功不可没。播出大文章的齐越、夏青、林田（女）、费寄平（女）和潘捷（女）等，都是一代名播音员，他们的播音是中央电台乃至广播事业的集体成果，达到了新的境界，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论战风格，丰富了播音史。即使论战完全被否定，播音依然有研究价值。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不是我们都能够完全理解的，尤其在形势千变万化的时刻，我们只能听中央的，这是纪律，是无条件的。我们决定不了论战的内容，也决定不了播与不播，但我们可以研究如何播音。那时播音的基调和风格与论战的内容、政治环境和民众的情绪是吻合的、融通的，而且很有创造性，这样才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而令人久久难忘。这是一段值得骄傲的珍贵的播音史，不但应该保留，而且应该深刻研究，吸取播音在特定情况下的经验。我们曾经做过不少蠢事，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和特色人物特定环境下的典型录音，或因保留不善，或因政治变故而完全销毁，再也不能复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我之所以这样讲，因为过去曾经涉及过与此相关的若干问题。许多听众不会忘记，由当年著名播音员齐越播音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曾经感动过多少人，产生过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就是在广播界，也一直被认为是优秀播音的典范，实现了时代、内容、情感与艺术风格的完美统一。但是，几十年后，当人们重拾旧话，再听当

年的录音时，有的认为声调过于高亢，甚至有些生硬，与现实的格调极不协调，甚至有人提出那时的播音是否值得如此褒扬。当然，把过去纳入现实可以研究，学术可以争论。殊不知，那是一个时代的声音，如果那时用现在的基调和风格播音，不仅电台不会通过播出，听众也不会答应。正因为如此，保留历史上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播音（其他文献资料也一样）才有历史价值。

另外，如何播出大文章的一套程序也是极有参考价值的。对此，我没有亲身经历，但后来的多次沿用，使我悟出其中的道理。据说，每逢播出论战文章，中央电台第一代播音员中，许多人都摩拳擦掌、争先恐后，哪篇文章更适合由谁主播（经常要录男女声两套，轮流播放），最后由中央电台领导甚至是由广播局局长梅益来定。每篇文章的播录都要组成播出班子，由播音部的领导、播音员和新闻部有关人员组成，广播局局长梅益经常坐镇，一起解读、分析文章的背景、内容、重点、正反主要论点、文章逻辑结构，确定播音基调、速度、逻辑重音和语言艺术特点等，都反复具体分析研究。

最难处理的是文章中引用的反面论点和包含的幽默讽刺，如何通过声音准确表达而让听众一听了然、会心理解，需要语音、语调、语气和速度的变换等高度艺术技巧（这是一种广播的创造）。每次录音，都要进行反复试播，不达要求绝不罢休。“试录出来后送周总理审定”（方明语）。听众每次听广播后，都议论纷纷，从中深切地领悟到，播音是一次再创造、一次好的播音，不仅立场坚定、观点鲜明，而且通过语音、语气、声调、速度、情感的变换，通过逻辑的力量，为文章增色，帮助听众加深理解文章的内涵（相反，不好的播音也会把一篇好的文章播得杂乱无章），充分彰显了播音的魅力。这种组织播出大文章的成功模式，曾经被中央电台长期沿用。

## 六 播音员的考核上岗

原北京广播学院在复兴门外、广播大楼西边的真武庙二条。1960年我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时，复兴门南北的城墙还在，每天清晨总听到中央电台播音员面壁城墙练声的声音。后来走进电台内部，才知道坚持练声是播音员的一项基本功。他们练声很认真，也很苦，他们经常像富连成戏班学员练功那样严格要求。但同时，播音员也受到特别的爱护和保护，如三年困难时期受到特殊的“照顾”：经广播局特报批准，每月给每个播音员特供4斤鸡蛋、1斤黄豆，增加营养，滋润喉咙。据说夏青播音中，有时候喝生鸡蛋润嗓子。

播音责任重大，对播音员的要求也就非常严格。播音是分层次的，对于晋级内部的掌握很严格，每一步都要进行考核。譬如，新来的播音员都有师傅带领，坚持练功和播音练习，等达到上岗的基本条件后，被批准可以试话筒。

第一步从录播节目的头尾、播出天气预报和节目预告等做起，参与实践锻炼；第二步经过考核合格后，可以播录专题、对象节目的稿件；第三步是播出一般新闻节目，“文革”前直播，“文革”后录播；第四步是参与重点新闻节目的播音，尤其是《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各地电台联播》节目。这两个节目的播音要求最高，由最有经验的播音员来承担，他们的上岗要经过播音部和中央电台领导的考核批准。能够承担这两个节目的播音，是对一个播音员全面素质的客观肯定，自然是每个播音员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除此以外，还有分别适合播出重大新闻、长篇通讯、大文章、重要社论（评论）、文艺、少儿等特殊文稿（如讣告等）的播音员，各有自己的特长。

在长期的实践中，中央电台播音员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被广大听众所熟知、所认可。在我所认识的三代播音员中，如男声有齐越

(齐斌儒)、夏青(耿绍光)、铁城(王铁城)、方明(崔明德)、陈刚(唐宏仁)、常亮(侯长生)、丁然(葛立治)、曹山(曹石安)、金锋、林光等，女声有林田(翁斯英)、费寄平、潘捷(潘励)、葛兰(王静蓉)、雅坤(佟雅坤)、虹云(冯云)、赵培、雷阳(张智慧)、漓江(张桂珍)、于芳(吴忠伟)等，几代男女播音员的群体都深受听众的喜爱。

这种严格的训练和上岗考核，在“文革”中被批判、取消了，“文革”前新闻节目的直播也因“阶级斗争太复杂，为保证安全播音”(陈伯达语)而一律改成了录音播出，只有组织播出大文章的做法以“学习班”方式保留着。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恢复过播音员考核与播出大文章的做法，以后改为职业职称评定。新招收的播音员大多是经过播音、艺术专业培养的专门人才，但对他们的要求没有以前那么严格了；有的人也奈不住寂寞，急于上手，一旦担当也难于进取。严格的考核晋级制度、重点文章的严格播出程序、高度的责任心，催生了最有影响的播音员，这也是历史的经验。

## 七 “文革”时期的反常播音

“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政治时期。那时要求广播必须适应造反派的需要，必须为“文革”政治斗争服务，形成了“造反派”的“高八度”的播音风格，或者称为“文革播音风格”。尤其是“文革”初期，达到疯狂的程度，大失准则，不堪回首。这不是播音本身的事，电台无法决定自己如何播，而是被“文革”大环境和极“左”思潮推着走，是历史的产物。“文革”早期分管宣传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又竭力鼓动：广播电台的播音“要有战斗性”，“社论可以比政府声明的调子高，文章可以比社论调子高”；广播要充分表达出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表达出造反派的战斗声音，“要使造反派听了扬眉吐气，保

守派听了心惊胆战！”在此，我只简单地归纳几个方面，说明当时大的政治环境，可能会引起大家更多的联想。

——中央电台对全国广播的两套节目每天的开始曲是《东方红》乐曲，早晨开播时的祝福语是“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宣传报道中处处讲“三忠于、四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无限崇敬，无限忠诚，无限敬仰”！处处是“三个万寿无疆、三个永远健康”和“四个伟大、三个万岁”：“敬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为了强调“革命性”，处处以“革命”词句为划分敌友之间的界限。电台节目的开头称谓，由过去面向大众的“各位听众”，分别改为“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派、红卫兵、红小兵”，甚至是“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工人同志们，革命的贫下中农同志们，革命的党员同志们”！节目开始播音为：“现在是××节目时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同志们，现在开始战斗！先学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时要连续播出好几段语录。报道中大话、空话、套话连篇，无限夸张，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如总是强调“文革”、“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形势一片大好”、“是大好而不是小好，越来越好！”。

在这里，我想举一个1968年3月30日广播局开大会的例子，大会的主持词与当时的播音很雷同：“同志们，战友们！现在让我们怀着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向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

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致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全体起立高唱《东方红》！现在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上得到解决。’‘……。（这一次竟学习了 11 段毛主席语录）；现在请某某人讲话。”那是一个毛主席语录铺天盖地的年代，报刊、广播、电视上到处是语录，人民的生活中到处用语录。

——播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战略部署、重大活动、重要文章，更需要感情饱满、提高播音声调。那时候刊发的重要文章、社论等，最后总是以口号结束：“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整个文章的播出都必须是高调，高呼这几个“万岁”还要拔高，而且要一个比一个更高，以表达最真挚、最充沛的无产阶级感情。而这时候，播音员已经精疲力竭。每次重要文章的录音，都要组成一个审听班子来把关，这个班子不仅负责对文章的把握和表达是否准确，播音有没有差错，特别注意最后几个“万岁”的播音是否达到了最佳状态。由于审听组各个成员的理解和要求不同，播音时常多次反复，几句口号反复录制几遍、十几遍是常有的事。那时候的这类播音，经常由男播音员铁城、方明、陈刚和女播音员葛兰、雅坤和赵培担任。有人回忆说：“那时是真出汗！陈刚几个‘万岁’上不去，就使劲勒皮带。还有的踹着桌子腿借助点力量。”

在播出“九大”开幕新闻公报时，都必须是最高音，陈刚（唐宏仁）最后的几个“万岁”反复播录了 15 分钟，但在播出后，进驻中央电台的工人宣传队对播音仍然不满意。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对你们的

录音我们不满意，你们缺乏感情和激情，你们看看电视上的开幕新闻，想一想会场上的情景，再对照一下你们的录音，就看出差距来了。你们不是代表自己播音，是代表 7 亿人。现在公报才几千字，录音就这么费劲，如果是大报告怎么办？还老是倒胶带（注：指改错），这怎么行？

他们说，宣传毛泽东思想脑子里要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思想怎么能宣传好毛泽东思想的声音？想一想工农兵是什么感情？你们没有表达出来，如毛主席登上主席台会场上是什么情景啊！为什么没有反映出工农兵的感情来？主要是内在感情不够。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如不重视，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要有私心杂念就会出差错。最后三呼毛主席万岁，要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有力，想一想会场上他们如何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上想毛主席，下想亿万群众，要在欢呼中战斗，在战斗中欢呼！播稿子时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话筒前面有斗争。

显而易见，每句话都连着政治，都在上纲上线。

那是一个任意、无限上纲的年代。记者、编辑、播音员一旦出了差错，更是立场、感情、态度问题，“朝为革命派，暮成阶下囚”是常有的事，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常常仅有一字之差。播音员惧怕播音，有的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差错不可避免论”、“宣传、播音危险论”普遍存在、“斗批走”等是一种普遍的思想情绪，有人说“刨地总刨不出个反革命来”。这些想法在当时都受到批判。

——新闻报道、文章、讲话不讲政策，不讲文明，不计后果，充斥着“砸烂狗头”、“混蛋”、“狗崽子”之类的话，才更能表现出“革命性”。有一篇 5 行字的稿子就有 5 个“混蛋”，2000 多字的一篇稿子有 25 个“坏蛋”，一篇不长的文教稿子中有 14 个“混蛋”、4 个“砸烂狗头”！

这种极“左”思潮和对内宣传的播音一套同样用于对外宣传，甚至有过之。如 1967 年 7 月，电台对报纸刊登的“打倒奈温反动政府”、

“油炸科西金”等都播了出去；1971年3月，播出新华社一篇稿子中“警告尼克松政府，如一意孤行，小心你的脑袋”！给我国外交造成了很大的被动。

以上案例，只是想说明中央电台播音的大环境。可以想见，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播音的反常现象。“文革”中、后期的极“左”思潮以及在对内对外宣传中的表现，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后逐渐有所收敛。

## 八 记“文革”中一次播音员的选拔活动

播音部是中央电台最敏感的一个前沿部门。1968年全台共有497人，播音部占45人，其中播音员23人。“文革”开始，播音部首当其冲，一部分人受到冲击而被停止播音，播音员奇缺，当时又强调工农兵占领意识形态和宣传舆论阵地，播音自然不会例外，被认为是“话筒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

“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参加过一次选调播音员的工作。这不是一件大事，在播音员的选拔中也不突出、不典型，但鲜为人知。“文革”中，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播音员，“实践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要让工农兵牢牢占领上层建筑这个阵地，他们对毛主席、对工农兵最有感情。为贯彻落实这一方针，经上级批准，中央电台在1969年10月31日组成了选拔播音员的班子，有罗兰、林田、方明和我。罗兰是播音部党支部书记，林田、方明是很有名气的播音员，而我呢？既不会播音，又不会说普通话，似乎有点滑稽，我是以中央电台群众联合组织代表和宣传小组组长的身份去把政治关的。我们先办学习班，统一认识，制定政治条件、业务条件和身体条件。到哪里去找？确定先从北京的工厂、农村和部队中选调。我们总以为偌大个北京，选几个播音员是很容易的事，会说普通话、嗓音好的人有的是，接触到实

际才知太难。

我们先从工人中找。我们四人背着枕头大的录音机（当时是最先进的德国录音设备，只有中央电台有），一时间跑遍了北京的一、二机床厂，京棉一、二、三厂，还有首钢、广播器材厂、第二通用机器厂，以及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中央美术馆等，结果竟没有选中一个。说来也奇怪，仔细分析中央电台几位有影响的播音员，并非都出自北京，有的来自东北（夏青），有的来自四川（林田），有的来自南方，而且有人认为北京地方音难改，北京以外的普通话更纯正。我们又把目光转向了北京郊区，选择了顺义、怀柔，与县委联系，请他们物色推荐，他们又通知了各个公社，特别是广播站，大家都很支持，适合条件的男女青年热情很高。我们选择了4个公社，6天中白天、晚上面试了其中37个大队的270人。我们前后转悠了一个多月，挑三拣四，有些人由于种种条件的不足，特别是文化程度低而被淘汰，只对四个人进行了复试，最后只选定了一名在天竺公社做广播员的女生。

由于关系到话筒掌握在什么人手中的问题，选择的条件太苛刻，与实际情况差距太大。明确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查三代，根正苗红；社会关系没有大问题，直系亲属中没有被杀、关、管的；本人18~20岁左右，历史清楚，文化程度初中以上（含初中），经过劳动锻炼；“文革”中表现好，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贫下中农和领导部门反映好，党团员要占多数；出身不好而表现好的个别人也可以考虑，实际上没有；业务条件是普通话基本规范，发音正确、声音洪亮，吐字清楚、清晰，有一定表达能力和发展前途；身体健康条件是，没有慢性病，发音器官、呼吸器官健康。可以看出，能够符合这种政治、业务和身体条件的人实在太少了。那时候广播电视不普及，觉得播音神秘而高不可攀，工厂、农村的青年人根本没有要当播音员的意识，更不会有这种学习和训练的准备。这次选拔不成功，后来，

中央电台从部队农场等选调了一批，成为中央电台第三代播音骨干。

这次选拔播音员既有“文革”初期的特性，又有某些共性。在这以前，我没有想到过，最难选的竟是男播音员，报名者寥寥，一个也没有选上。除了政治条件，或发音不准、不亮、没有共鸣，或处于变音而不稳定，或没有发展前途，苦心寻找而没有中意者，为此也曾怀疑到我们的条件和认识是否有问题而发现不了人才。后来才知道，男播音员历来最难选。中央电台男女播音员的数量一直不成比例，地方电台也这样，后来兴起的电视台也不例外，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人专业中的男生也一直短缺。事过37年后，我看到《环球时报》2006年4月19日的一篇《美国为男主持人少发愁》的文章中说，据“美国广播与电视新闻部门和波尔州立大学共同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电视屏幕上的男主持人越来越少了，“如今，你只能在几个全国性节目中看到男主持人的身影，老明星不得不继续挑大梁”。其原因“似乎播音更钟情于女生，女生的声音稳定、路子广，也更热爱和安心于这个专业，而男生却有更多的其他选择，因为这项职业受年龄、声音、公众形象等的受控太多而没有稳定感”。原来是广播如此，电视如此；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

据最近材料统计，现在全国有300多所院校有播音主持人专业。播音员尤其是主持人的需求也大大增加，“过去中央电台最多时播音与主持人60多人，现在200多人”。<sup>①</sup>

## 九 艰难的播音改革

中央电台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建设时期形成的风格，适应了那个时期的政治形势和任务，并造就了几代在全国享有盛名的播音员。“文

<sup>①</sup> 方明：《播音员主持人不是简单的说话工具》，《中国广播》，2010年第4期

革”时期播音被扭曲。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电台恢复了“文革”中被批判、被取消的一批优秀节目，逐步恢复了“文革”前的播音，但依然带有深深的“文革”烙印。高调播音，以教育者的口气居高临下，与听众不平等、不亲切、不自然，明显与时代、与听众不协调。有的听众来信说中央电台的播音“可敬而不可亲，我们好像是仰着脖子在听广播”。我记得播音员虹云讲过一个生动形象的例子：“文革”后，有一位农村老大爷省吃俭用，攒钱买了台收音机，想听听新闻、听听戏，可他听了生气地说“买回一个爹来”！

1978年后，掀起了全国改革的大潮，新闻界的改革也被提上议程。广播的改革从讨论“广播自己走路”开始，不断地解放和改变着广播人的思想观念。结合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央电台开展了一场“关于记者口头报道”的讨论，这是针对广播记者的文字报道而提出的，普及记者直接进行口头报道（现场播报），实际上是对广播特点认识实践上的一次突破。讨论的焦点除了如何界定口头报道，主要是记者的语言、语音问题。记者来自全国各地，南腔北调，他们能不能做口头报道？我在《论记者的口头新闻报道》一文中说：“只要题材适合于这种报道，只要记者的语言基本上是普通话，口齿清楚，比较流利，反映敏捷，要提倡由记者出面做口头报道。”这一观点是从那时候的现实情况出发的，是一种过渡的低标准要求。现在不同了，又有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讲普通话、讲好普通话，应该是选拔广播（电视）记者的基本条件之一；广播记者不仅会写也要会说，写好也要说好，也要学习播音。

随后，中央电台进行了新闻等全面的改革，播音自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政治环境变了，工作重心变了，播音风格是否也应该改革呢？今天的回答是没有疑义的，世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自己可遵循的规律，但又没有固定不变的事物，一个时期的播音风格是在那个特

定环境中形成的，它服从、服务于那个历史时期的形势、中心任务和听众的需求。改革广播宣传必须改进播音，这是应有之义，而且应该走在前头。从理论、从现实和听众的需求，显然需要播音改革，但认识上存在严重分歧。有人认为“祖制”不能改，改了就不是中央电台了，要让人一听“这就是中央台”！一位性格非常直率的老播音员还在播音部的黑板上画了我的几幅漫画，说我在声嘶力竭地喊“播音改革”而无人响应！后来改革中逐步统一了思想认识，可新的播音基调和风格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一时难以说清楚。经过反复讨论逐步统一了认识：每个电台都有自己的播音基调和风格，这个基调和风格是由时代特征与听众需求、电台的地位与对象、广播的内容与方式决定的。播音是时代的产物，反映时代的声音。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央电台的播音应该是“在坚持正确立场和方向的原则上，更接近群众、接近生活、接近实际（简称‘三接近’），朝着亲切自然、朴实大方、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后来有人概括为“爱憎分明、刚柔相济、严谨生动、亲切自然”16个字。）事实上，一个台的播音在一个比较一致比较稳定的基准范围内，不同类型的节目，如新闻、专题、文艺的播音有别；同类节目中的不同稿件，如新闻、通讯、言论播音有别；对不同对象播音有别；不同的播音员更是各有所长，有自己鲜明的个性，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使每个播音员和主持人尽情发挥个性特点，形成自己的风格。播音也要“百花齐放”，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这正是共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和谐一致。同时，改革中确定恢复新闻直播，增加对重大活动和体育、文艺的现场直播，设立节目主持人和广播评论员，依据广播规律把路子走宽走活。

## 十 播音员与节目主持人

广播、电视设节目主持人是西方常用的一种形式。我国电台设立节目主持人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产物，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是由中央电台的对台湾广播开始的，走在全国的前列。

对台湾广播面对着特殊的对象，1981 年元旦，对台湾广播《空中之友》节目的播音员徐曼（徐乃文）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和台湾听众的启发，一改多年传统的严肃、刻板的播音风格，以轻柔、亲切、富有情感的声音主持节目，赢得了台湾省国民党官兵和民众的欢迎，被亲切地称为“徐曼小姐”。对台湾广播适合设主持人，当时中央电台在考虑，这种形式能不能用于对大陆、对全国的广播？这种一改传统的播音，在当时却引起众多的非议。但这种播音形式终究因适应了改革开放的形势，而迅速蔓延开来。

实践证明，节目主持人形式是适合广播、电视节目播音的一种非常好的、有效的形式。过去的播音是念稿，不论稿子写得如何通俗化、口语化，播音也还是念稿，而不是口语化的通俗生动的播音。从这个意义上说，播音（或者说广播）并没有真正突破文字的限制，没有真正改变“文字的有声版”，也就是说，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广播的优势，没有完全按照广播的特点办广播，而电台设主持人意味着播音面临一次新的重大突破。

1986 年的改革中，在对全国的节目中首选了《午间半小时》和《今晚八点半》、《对农村广播》和《青年之友》作为主持人节目的试点，经过认真的准备，1987 年 1 月 1 日推出后，很快得到听众的认可而获得成功。中央电台最初节目主持人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播音员转为主持人，这是主要的。他们的长处是发音标准，学习、掌握了一些播音的基本规律和语言艺术。但播音员的弱点是对编采工作不那

么熟悉，知识面比较窄，习惯于念稿而不习惯于说。二是来源于记者、编辑，从他们当中选用。他们的优点是熟悉编采工作，文学底子比较厚一些，弱点也很明显，发音不规范，缺乏播音知识和技巧训练。改变的办法是对他们进行培训，两者各自发挥长处、弥补不足。初期的这种情况符合事物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事先准备那么多的主持人，大多是在实践中锻炼提高。做一个称职的主持人很不容易，不仅有标准清晰的发音、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还必须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把握能力，有政治、思想、文化的修养和广泛的知识积累，这一切构成播音基本功。众多的要求集主持人于一身，并结合不同的问题和对象完美表达出来，是很难做好的，但又必须做到，这就需要专门的人才培养。中央电台提出，改革不仅在于调整节目、改革机构，不仅出一批高质量的名牌节目，同时提出要出一批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出一批名播音员和名主持人，他们的出现是一个电台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志。我认为，中央电台过去的名播音员大多是以播大文章闻名，那么今后将主要出在主持节目当中。

广播电台、电视台设立节目主持人在一些国家早就习以为常，而且已有一批知名度很高的主持人，这对我们来说还是新生事物。20世纪80年代初刮起了一阵强劲的“主持人热”，似乎有囊括一切播音之势（历史上经常出现各种“刮风现象”），许多节目、许多人跃跃欲试。新生事物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但是，任何新生事物都只能占据它应有的位置，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节目主持人形式适合广播、电视节目，但不是“唯一”的形式，任何事物都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过去我们在强调一种事物的重要性时，容易走极端。在节目主持人出现时，有些人提出播音员将被取代。我当时写文章指出，主持人不能替代播音员，播音员和主持人都是一个节目（总体上也是一个台）的代言人和形象代表，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位置。就中央电台的实际而论，播音

是客观存在的，重大新闻、消息的播出，重要文章、讲话、评论的播出等，需要客观播报。新闻（特别是消息）的播报方式更为客观、严谨、可信、简洁，而主持人则时常加进个人的议论和情感，更适合对象、专题和文艺节目。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的重点新闻节目《新闻与报纸摘要》、《新闻联播》等，播音员为“主播”而不是“主持”，必须严格播报稿件，不得随意改动和任意发挥。“播音员主持人是用语言艺术进行宣传的新闻工作者，根基还是在新闻播报上”。（方明语）我们注意到，外国一些广泛采用主持人的著名电台、电视台，其新闻节目一直由播音员播报，而且有许多是著名的老播音员，他们在电视上也并不十分注重外表，有的男播音员已经谢顶却更具魅力。我在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人艺术学院成立和周年纪念大会上，曾经几次阐述以上观点，防止重主持人而轻播音，并希望他们加强学识修养，防止浮躁心理和过于注重外表，克服“只吃青春饭的思想”。

我国节目主持人的实践经历过探索发展阶段，最初的一段特点是值得记忆的：一是过于注重表现形式而缺乏思想内涵，没有理解主持人的真谛，如节目中频频呼用“听众朋友”作为亲切交流和转换、过渡，误以为这就是“主持人节目的特点”，表面的热闹掩盖了思想和内容的贫乏；二是充斥多余的话，一会儿是对“听众朋友”的问候，一会儿是谈天气，一会儿是男女主持人之间不顾听众的对话，一会儿是“你是谁呀，你在哪儿”的繁言絮语、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地侃侃而谈，把啰唆当作通俗、亲切，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没有给听众更多的信息；三是主持人成了主讲人，不是起提问、转换、提示、引导、解说的作用，而是自己从头说到尾；中央电台播音艺术指导方明在《播音员主持人不是简单的说话工具》一文中，引用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的话说：“主持人的任务是把人介绍到台上去表演，而不是

你自己跳出来表演。”<sup>①</sup>；四是提问简单、笼统、公式化。“你有什么感想？”“请你谈谈认识好吗？”，有的绕来绕去。主持人不去研究采访对象，不做认真准备，自己心中没底，被采访对象心中就沒底，听众也就沒底，不知所云；五是简单模仿。某一主持人一旦成名，其他人跟着模仿，没有创造，体育转播尤为明显，淹没了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六、把新闻媒体主持人混同文艺舞台的主持人，取悦于听众。“如果只把媒体作为文艺娱乐的舞台而不作为政治传播的舞台，思想上就有了缺失。”（铁城语）种种情况初期难免，但不可长留，不可提倡。中央电台在改革中设立了主持人与主持人节目，同时把提高主持人素质和节目质量作为改革的内容，开始进入在探索中提高、创新的过程。

具体而言，播音员与主持人也是一个综合概念，不仅两者有共性和特殊性，两者自身之间也有很大差异，无须多言，这种种差异都很值得研究。我举个例子：中央电台播音艺术指导夏青的播音与众不同，他对内容理解深刻、把握准确；播音庄重、从容，逻辑性强；声音洪亮，有很好的胸腔共鸣，有气势，因此很适合播大文章。但他并非什么文章都能播好。1986年中央电台改革，设立《午间半小时》主持人节目，为把节目办成名牌，一些人积极推荐由夏青担纲主持，我认为不可。为了说服他人，决定由夏青试音而确定。当时选了一篇知识性稿件《如何做通心粉》交夏青播，大家审听后哈哈大笑，没有一个人认可。我注意到，中央电台到2004年在播音、主持与节目融合的改革中，把播音员、主持人分别划分到几个频道，分解、取消了存在50多年的播音部，播音员和主持人归属不同节目频道，有利于同记者、编辑以及与节目的融通，但也使他们的业务范围变窄，更减弱了业务的研究与交流。这说明，对播音员与主持人的认识与培养仍然是一个

---

<sup>①</sup> 《中国广播》，2010年第4期，第22页。

值得研究的问题。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又启发了我的联想。观众对中央电视台最有影响的《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的老面孔，感到有些厌倦，曾经引起某些观众的非议；对于《新闻联播》的传统播音，一些播音与艺术院校的学生也很不以为然，甚至成为被嘲笑的对象。2006年6月，中央电视台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调换主播，改变多年的老面孔，一时成为社会议论的话题。但当新主播康辉、李梓萌真的出现在观众面前时，人们又产生了新的议论，引起了对过去播音的褒扬。有的认为，“《新闻联播》有其特殊性，播音应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像一般娱乐节目的人选那样说变就变”；有人认为，“换血是势在必行，即使有阵痛也是没有办法，……应该给这些年轻人机会和耐心”。后来，康辉、李梓萌主持《新闻联播》逐步被观众所认可。这里有习惯、不同的期待和心理状态等复杂因素。这也说明，人们对不同内容、不同节目的播音（主持）的要求是不同的，《新闻联播》不适合用“主持人”，而应以“播音员”或“主播”为宜，播音起着客观传达的作用；说明人们认同《新闻联播》的播音风格，即使有新的变化，也不宜改变其宗。

## 十一、播音员的穿着风波

“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对于广播播音员主要靠声音和播音质量塑造形象，而电视播音员则不完全相同，除了内在的素质，还有一个外在的表现：长相、表情、动作、穿着等，都是观众评判播音员素质、是否得到认可的一部分，而且也都密切联系着对播出内容和效果的理解，他们在话筒前的举手投足都透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影响着观众。就电视播音员的穿着而论，在常人看来纯属个人喜好的生活习惯，但却成为公众议论的对象，成为其内在素质的外在表现，尤其在社会敏

感时期，更与政治气候密切相联，成为判断某种政治气候变化或播音员个人好恶的外在表现。

1987年1月16日晚，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张宏民播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公报，他一改过去穿西装的习惯，穿了中山装，引起观众的种种猜测，他们敏感地意识到“政治气候可能发生了变化”，“要转向了”！有的观众打电话询问是否是有意表明加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决心？是否又在提倡艰苦朴素？实际上这纯属一种巧合。当时播出公报事先并没有得到通知，没有播音准备，只好临时安排当天不值班的张宏民播音。他临时借了中央电视台台长的中山装应急，却闹出一场“穿着政治风波”，迫使中央电视台不得不设法向观众做出澄清。中央电视台本想在节目中公开就此做出回答，但因考虑波及面太广，而改为在18日的《中国电视报》上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做了解释。

播音员的穿着，也成了电台、电视台动向的风向标，类似的事情不断发生。

## 第四部分

### 国际新闻传播之我见



# “首都有座外文城”



——中国外文局与对外传播

## 一 意想不到的工作调动

“首都有座外文城”，这是《光明日报》记者 1996 年 6 月在报道“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以下简称“外文局”）时用的标题，从中便可以看出外文局的规模与特色：单位多人多，搞对外宣传的书刊出版发行。

外文局坐落在北京百万庄一带，20 世纪 50 年代静寂的北京郊区现在成了繁华的中心市区，外文局十几个局级单位广泛分布在西二环至西三环以外，这就是“首都有座外文城”的来历。我从 1993 年至 2001 年在这里工作了八年。想起最初去外文局工作，颇有戏剧性。

1993 年春，中央电台有传闻说我的工作将有调动。类似的传闻已有过多次，我不在意。有朋友问我，我说：“我没有听说过，就是有

我也不走，我学的广播，办的广播，如愿以偿，别无他求。”当时摆在面前的有四件大事要做：一是中央电台急需的大楼建设刚刚开工不久，这是好不容易才争取下来的，一定要抓紧建好；二是中央电台节目的调整改革还要进行，使之真正走上按照广播规律办广播的轨道；三是最后完成中央电台职工住宅的建设和分配任务，基本解决职工住房困难问题；四是在 1992 年完成创纯收入 5000 万元的基础上，当年确保 6000 万，争取 8000 万，来年保 8000 万，争一个亿。我在想，如果完成了这四项任务，就为中央电台长期稳定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前景！

没有料到，过去的传闻是假的，这一次却是真的。了解到这一确切消息后，我给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信，表示“不想离开中央电台”。

3月19日，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找我去谈话。我没有想到谈话竟是如此的直截了当。他说：我们想把你的工作变动一下，调到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去工作，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又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这样便于对外开展工作，专门负责党和国家的对外宣传工作。他们正需要尽快把班子配齐。你当台长已经八年，做了许多工作，治理一个大台也很不容易，但也该换一换地方了，我们推荐你去搞外宣。去年开了党的十四大，现在正在开八届人大，涉及许多人事问题，本来可以不征求你的意见，因为你写信表示不想离开电台。你的情况不用谈了，我们已经考察你十几年了，了如指掌，现在只要你表一个态就行了。

我还是简要地谈了我的想法，突出谈了中央电台以后的四大任务，结论是不想离开中央电台，我希望为中央电台做点事。

这位负责同志说：“你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抱有你这种想法的人不多，这种机会对许多人来说不是都有（那时中央电台台长是正局级），对于你也并不多，你现在已经 50 多岁了。”

“我愿意这一辈子搞广播，从中央电台退休。”

“这事我们已经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了，我们心中有了底才找你来谈。你在中央电台有优势，我们清楚，但工作调动一下也有好处，不一定一辈子就在一个地方，到中央外宣小组更宏观一些，对自己也是一次锻炼、提高的机会。”

话已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再说什么呢？“我的意见、想法已经说了，请组织上考虑。”我说，“受党多年的教育，作为党员和党的干部，这一点觉悟和组织原则还是有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服从组织的安排。”

“对了，就是要听你这几句话。那我们就正式向中央写报告了。”

后来我知道，在这之前的3月10日，中组部已经向中央写了报告。

谈话到此可以结束了。这位负责同志似乎不太经意地顺便谈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还让你兼任一下中国外文局的局长、党组书记。”

这更出乎我的意料，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会去外文局当局长。我急切地说：“我不了解外文局，我也不懂外文，我干不了。”

他简略介绍外文局的情况说：“外文局是个大单位、老单位，很重要，有5000多职工，有十几家杂志社、出版社，共有十个正局级单位。外文局有多年的外宣经验和好的传统，对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局长早已超期服役，班子不健全；建党组的事早已经批了，至今还没有建起来，现在就先任命你一位党组书记；外文局创收手段不多，职工的收入比较低。这些都是你的事了。中央电台是个大单位，你有在大单位工作的经验，由你兼管一下比较合适。不会外语不要紧，又不是叫你去做编辑、翻译工作。你是领导，搞管理。你的情况和想法就不要多讲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工作需要，而且很着急，你先把外文局抓起来。”

我还能说什么呢？“服从组织分配”。

4月15日中央任命的通知下来了（通过时间是4月8日）。第二

天上午 8 点 30 分，广播影视部艾知生部长找我谈话。他把中央的任命《通知》放在我面前，当时我是什么心情，说不清楚。

## 二 初进外文局的尴尬

4月22日，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曾建徽向我和同时任命为副组长的李源潮介绍情况，23日就要我去外文局报到。据有工作调动经验的同志讲，在这承上启下期间，应该好好休整一段时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工作调动，却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甚至想实地了解一下外文局也没有时间。第一次去外文局就遭遇尴尬，23日上午曾建徽到外文局宣布对我的任命时，我竟然不知道外文局在哪里，走错地方去了外文印刷厂，等转到外文局时比预定时间晚了20多分钟。

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尴尬”。既然已经到外文局报到，就要进入角色，承担起责任。29日，我第一次参加外文局全局干部会议，这是一次由上一届局领导班子布置改革的会议，借此让我与干部见面，并让我讲话。我开头就说：“今天跟大家见面非常高兴。我们以后要在一起共事了，中间有一个彼此了解的过程。这次到外文局是奉命而来。先自报家门，我生在1940年，在来局里以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台长，可我不懂外语。”讲到这里，引发台下一阵笑声。其实，我也觉得可笑，哪里有外文局的局长不懂外语的呢！后来我了解到在外文局的历史上这不是仅有的，曾经有过老局长不懂外语的，可他们是老革命，后来的几位局长都是英语专家。正因为不懂外语，我曾经有过好多梦想，可从来没有做过做外宣工作的梦，更没有做到过外文局工作的梦，历史好像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不懂外语”，成为外文局时常谈论的话题。有人问我“是否有意说这句话”？甚至后来竟有人演绎说，我说那句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有针对性，还带有“挑战性”。我哭笑不得。我实在没有那份傲气和勇气，我只是实话实说，倒是带有几分胆怯，哪还敢“挑战”？

没有学好外语是我的一块“心病”。在学生时代我一直是一个学习不错的学生。到了高中设了外语课，但是我们农村中学请不到外语教师，又赶上1958年大炼钢铁，直到高二下学期，才在当地农村请到一位70多岁的英语教师（据说是原燕京大学的学生）。那时的农村学生又孤陋寡闻，“自己的语言都学不好，还学什么外语，学了又有什么用”？没有高中的外文基础，到了大学因不是主课也没有学好。随后就是10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后的外语热中我也赶过一阵子浪潮，终因工作缠身而没有毅力坚持下去。工作中，我曾经多次出国访问，多次带领广播电视台记者组出国采访，尽管有翻译跟随，深切体会到自己不懂外语造成的不便和带来的遗憾，在单位和学校我经常以自己的感受警示后人。我在1985年5月写的《漫话国外采访》一文中，很有感触地说：“对国外采访的记者来说，外语是重要的交流工具，要努力去掌握它。通过翻译采访，不但多花费很多时间，而且不能和被采访对象直接交谈，影响相互之间的交流。”显然那时候的认识是肤浅的，还只是从采访的角度提出问题，后来接触外宾，接触外文资料，而现在面对的是整个外文局和对外宣传，这种力不从心的感受更直接而强烈。有的领导为我解脱说：“你是领导，不是做具体的工作，就是会外语也只能会一种两种，外文局有那么多语种，谁能都会？”说是这么说，但不会外语终究有许多不便，是个很大的缺憾。因为不懂外语而失去了许多自由：失去了与外国人对话的自由，失去了到国外采访的自由，失去了阅读外文书刊的自由，失去了了解外文局外文书刊状况的自由；如实地讲，每到外事场合总感到一种尴尬，这也是我自感跟不上形势、应该退出工作第一线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的客观环境更不同了，我在与研究生交谈中，总用自己的体验劝说他们学好外语。

另外是工作和感情上的不适应。我在中央电台工作了30年。中央电台是个新闻舆论单位，而且是时效性最强、反映最敏感的新闻媒体，正常工作是每天下午4点钟要开编前会，确定晚上6点半《全国联播》节目播出的主要内容；在平时，有了消息及时播出，有了重要消息或突发事件要随时插播，时效之快在其他新闻媒体之前。但这一切，在外文局都不适用，一切都是慢节奏。外文局是我国出版发行期刊和图书的新闻宣传机构，但不直接报道新闻消息，图书不要说，就是期刊登载新闻性的文章和图片，等编辑、翻译、出版已经慢了好几拍，等航空或飘洋过海到达国外读者的手里，大多是事发后一个多月的事了。几十年习惯了新闻广播，对这种慢节奏非常不适应。但后来体会到，杂志图书的出版不仅有自己的规律，更有其他新闻媒体所想象不到的难题。某件事情发生了，新闻广播及时报道发生的事就“完成了任务”，但对于对外的杂志而言，出版晚，到达读者手里更晚，显然不能照搬新闻报道，必须仔细揣摩事件发生一个多月以后，事态会如何发展，外国读者还想从中知道些什么，我们如何对事件做有针对性的报道和解疑释惑工作，必须依据杂志特点和读者需要而另辟蹊径，自然更困难得多；不仅如此，对于转瞬即逝的重要新闻和瞬息万变的新闻事件，必须预测到一个多月后事实、政策、观点的变化趋向，使到达读者手中的期刊与已经发展了的现实基本一致，否则会造成被动或相反的效果；同时又要把中文转化为多种外文，由国人的接受和思维习惯转化成外国人的习惯，而外国人又千差万别。

这次工作调动，有一种完全变了样的感觉：由对内宣传转为对外宣传，由广播转为书刊出版发行，由中文转为外文。我认为，整个外宣工作就是做“转化”的工作，由国内转向国外，通过我们中间的消化转为国外受众可以接受、吸收的营养，由我们的预想转为实际的效果。显然，这一切要比当时直接的新闻报道困难得多。有人说“搞

书刊外宣还是干新闻本行”，可我觉得尽管有共通之处，但毕竟是小同大异，面对的是一个新的领域。我原来所熟悉的对内宣传和广播宣传的一套行不通了，原来所有的自信所存无几。书刊外宣大有学问，我必须从头学起。

### 三 我所知道的外文局

我在中央电台做对内宣传，不太关注对外宣传是怎么一回事，更不会去打听外文局是怎么一回事，虽不属于“隔行”，也不属于同行，平时相互很少打交道，也就了解甚少。

开始我在中央外宣办的具体工作不多，参与工作部署和重大宣传问题的研究，分工由我主管外文局。外文局是个大局，又处在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难题不少。我又任实职，离不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思想领导小组组长丁关根同志给我布置任务，要我在八个月内了解外文局的基本情况，然后提出今后工作的计划。我也想先在外文局多干一段，等理顺一些再说，兼职实际上成了我的主职。

在此以前，我没有在电台以外的其他部门工作过，只觉得广播传播快、覆盖面大、影响广，有点“神气”。到了外文局，我才感觉到广播之外另有蹊径，体味到“天外有天”的意境。外文局是承担着党和国家书刊对外宣传任务的新闻出版机构（不只是出版发行书刊，同时担当国家对外宣传任务），又是一个大而老的新闻出版单位，人才济济，为我国的对外宣传做出过重大贡献，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我国对外宣传的主力军之一，为让世界了解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巩固人民政权起了独特作用，功不可没。几十年中，奠定了外文局扎实的外宣工作基础和好的传统。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对外称“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成立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与新中国诞生在同一天，其前身是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所属的国际新闻局。国际新闻局主管对外宣传、新闻报道和出版工作，从一开始就聘请外籍专家参与翻译工作，可见中央对外宣是多么重视。1952 年 7 月 1 日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1963 年 9 月成立中国外文局，直属国务院领导，担当起党和国家书刊对外出版发行的任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一项独立的事业都自成系统，党和国家把外文局设计成为一个从采访、编辑、纸张供应、外文印刷、期刊图书出版和发行集于一身的完整体系。1995 年 12 月 1 日，中央办公厅文件中规定“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是中共中央所属事业单位，是承担党和国家书刊对外宣传任务的新闻出版机构，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代管”。

我到外文局上任时，有在职职工 4000 多人（包括离退休人员共 5000 多人），聘请上百名外国专家，是我国聘请外国专家最多的一个单位。外文局所属 7 种刊物 32 个文版的杂志和 11 家出版社，还有外文印刷厂，纸张供应公司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书刊发行到世界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给世界，为世界了解中国架设起一座合作和友谊的桥梁。“外文局的中心任务是书刊对外宣传，没有书刊对外宣传就没有外文局”，这是历届局领导和全局职工的共识。对外宣传是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几十年来，已有几代人在这块固有的外宣阵地上，兢兢业业、默默地做着奉献，做出了光辉的业绩。正因为如此，受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周恩来、宋庆龄、陈毅、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而具体的关怀，在我的记忆中，像外文局的几家刊物如此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并不多见。

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过的人深知，要完成好这一外宣任务是多么不

容易。外文局是中国向世界敞开的一个窗口，书刊外宣工作不仅重要、政策性策略性强，而且时局瞬息万变；不仅要了解中国，而且要了解世界，更要了解各种众多的读者；不仅要做好出版，而且要做好面向世界的发行；这里是经受政治锻炼、又是做学问的地方，文字工作要求极其严谨。几代人几十年甚至毕生在这里笔耕不辍，在实践中探索着我国外宣的规律。他们创造了业绩，创造了经验，也造就了一批批懂得对外宣传的行家里手。有人说，外文局是“藏龙卧虎”之地，罗俊、吴文涛、爱泼斯坦、叶君健、杨宪益、丁聪、冯亦代、唐明照、鲁平、刘德有、张彦、穆欣、车慕奇、范敬宜、段连成、林戊荪、沈苏儒、沙博理等，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外文局工作过，有些人在那里工作了一辈子。他们中有领导者、专家学者、翻译家等，有的是我国对外宣传和对外传播理论的开拓者。他们在国内外鲜为人知，而在国际上却颇有影响。

我在外文局长了不少见识，认识了外文局，也认识了外宣。外文局是党和国家书刊对外宣传的基地，期刊图书出版发行的宗旨非常明确，面向海外、主要是外国人，针对不同的国家、地区、阶层、职业及性别、年龄人们的不同要求，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合作，进行国际舆论斗争。在这里，我想介绍几家出版发行的主要机构，以便从中了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外宣、对书刊出版发行的重视和精神，具体了解外文局深厚的外宣底蕴、任务和情况。

### ——期刊

那时有《北京周报》、《今日中国》、《人民画报》、《人民中国》、《中国报道》、《中国文学》、《中国与非洲》7种刊物，依据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不同对象，每种杂志又有多种文版，如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西班牙文、斯瓦希里文、世界语等，共有 32 个文版。其中有：

《北京周报》这是经由周恩来总理倡导、批准、定名，于 1958 年 3 月 4 日创刊的时事政策性的对外新闻周刊，它以我国首都之名为国家象征，经常被误解为是北京市创办的刊物。创建之初，“周总理多次谈起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和相互了解的看法，谈起设法使国外各界人士更好地了解新中国的迫切性”。“周总理说：我们应当有一本自己的英文刊物，及时地向国外介绍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就，阐明我们的内外政策”。<sup>①</sup>《北京周报》通常用英文、法文、日文、德文和西班牙文 5 种文字出版，每周一期，全国独此一家。它的政治性强，在国外读者的眼里，它代表着我国党和政府，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它的政策性强，直接登载和阐述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它的时效性强，对国内外一些重大问题和事件反映比较快，同时起着诠释政策和解疑释惑的作用。这是周报的特点和优点，也是它的难点。它的宗旨也就决定了《北京周报》主要是办给那些关心、研究我国时事、决策的人看的，多是知识阶层和中上层人士，并曾经摆在了一些国家政要如尼赫鲁、苏加诺、肯尼迪、美国国会议员和驻华使节的办公桌上，是他们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研究我国的政局和发展趋势的一条可靠的信息渠道，对国际社会有广泛影响，尤其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

《北京周报》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据记载，毛泽东主席每期必读英文的《北京周报》，在谈话中时常引用其中的文章，而且借助《北京周报》学习英语。“他把《北京周报》的文章念出声来，让老师来纠正发音”。毛主席看了《不怕鬼的故事》，要何其芳为此写一篇序言，毛主席审阅后，于 1961 年 1 月 24 日给何其芳写信说：

---

① 戴延年：《周恩来与“北京周报”》

“序言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毛主席称赞《北京周报》创刊初期配发地图、图表和插图的编排方法图文并茂、插图很好。但是在“文革”中，1967年6月毛主席也曾经批评《北京周报》“吹得太厉害”。周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批评说：“把国内的硬搬来对外，不用脑筋，不管对象，要研究一下，对外又不要丧失原则，又要有效果，有不同的特点。”1968年9月毛主席又批评《北京周报》“尽抄人家的东西，有一股抄风，抄人家的电报、公报、社论，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还不如《中国建设》（《今日中国》的前身）办得好。《中国建设》还有一些自己的内容”。无论是正面的肯定还是批评，都体现了毛主席对《北京周报》的关心，更从中看出毛主席对外宣的要求。

《北京周报》在发展中，周总理时常给予宏观的和具体的指导。1963年3月5日《北京周报》庆祝创刊五周年，周总理登门祝贺，亲切看望职工与外国专家，并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后来周报的人才知道这一天恰巧是周总理的生日，以后就正式把3月5日作为《北京周报》的创刊日。邓小平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对《北京周报》的文版布局做过批示。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4月1日为《北京周报》手书：“中国之窗，世界之友。”这说明中央对外宣的重视和期待。

在我国对外宣传的统盘布局中，把《北京周报》列为重点媒体之一，1994年全国对外宣传会议上，把《北京周报》、《今日中国》和《中国画报》三刊列为国家对外宣传重点刊物，对《北京周报》提出“办成世界性的新闻周刊”的奋斗目标。“世界性”的特点，除了重点报道好国内，大大增加国际问题的报道和发言权，吸引更多读者的注意力，这成为《北京周报》努力的方向。

《今日中国》它的前身是《中国建设》，是由周总理建议、由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女士倡导创办的（1952年1月创刊），宗旨是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是新中国最早、也是办得比较好

的外宣综合月刊。这个刊物对象广泛，注重民间交流，内容包容量多，办刊的方针和风格，是周恩来总理 1957 年确定的“以社会主义建设为范围，以生活为内容，积极地正确地报道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坚持的风格是宋庆龄女士倡导的“真实性报道的传统”，坚持以事实说话，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宋庆龄女士为办好这本刊物倾注了大量心血，动手撰写、审阅大批文章；即使在“文革”中，《中国建设》依然坚持出版，宋庆龄坚持不改变“真实报道的传统”，直到她逝世前的 4 个月还期望《中国建设》“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990 年 1 月，按照宋庆龄的遗愿，适应时代发展，《中国建设》更名为《今日中国》，仍保留着原来的特色。《今日中国》顾名思义，是以介绍改革开放的中国为主，同时适当进行历史对比；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广泛报道社会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文章注重选择有针对性的典型事实，心平气和地叙述事实，真实地反映生活；它不是暴风骤雨而是和风细雨，不是蒸馒头而是煨鸡汤，潜移默化地起作用，是对外宣传中有典型意义的一种方式。

据我所知，毛泽东主席很少专门就一本刊物发表意见，他在 1958 年说：“《中国建设》杂志用事实说话，对外宣传就是应该这样做。”“文革”中毛主席赞扬《中国建设》办得好，“《中国建设》还有一些自己的内容”。毛主席把《中国建设》真实报道的传统扩展到整个对外宣传，基本做法是报道事实，学会用事实“说话”。在它创刊五周年时，周恩来、陈毅等前来祝贺，发表讲话。每逢创刊逢五、逢十都要举行庆祝活动。在《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时，宋庆龄、周总理、邓颖超、陈毅副总理前来祝贺。周总理为此题词：“把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的友好愿望传播得更广更远。”陈毅题词：“事实胜于雄辩，唯真理可以服人。《中国建设》向世界各国朋友介绍真实情况，这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谨祝继续努力，获得更新更大的成就。”“文革”中的 1967 年 2 月，周总

理对《中国建设》讲：“我们的读物是供给国外的。要争取广大中间读者。……你们的杂志调子高了，拿出去没人买了。”邓小平、江泽民多次会见爱泼斯坦总编辑。2002年在《今日中国》创刊50周年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庆祝，江泽民、李瑞环等领导人和外国使节发来贺信和题词表示祝贺。

《人民画报》这是新中国最早、影响最大的画报，为几代人所熟知。它诞生于1950年7月，毛泽东主席为《人民画报》题写刊名。《人民画报》形象地记载和传播了新中国走过的历程，记载了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重大事件和建设成就，还有人文习俗、生活面貌、文化艺术、自然风物等，以优美的形象展示中国的自然景物和人的精神风貌，弘扬中华文化的主旋律。尤其在没有电视的情况下，它独树一帜，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镜头，是一部最逼真的看得见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是流动的画报，而画报是凝固的电视。

《人民画报》的几种外文版叫《中国画报》，是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我国重点外宣刊物之一，多种文版发行到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画报以直观形象的方式向国外介绍新中国、新生活；图文并茂，不分国家民族、年龄职业、文化水平、语言文字，谁都喜欢看，看得懂，便于收藏；通过视觉形象的艺术魅力，给人以美的享受，最没有“宣传味”，最容易取得共识。画报是最普及、最吸引人、最容易沟通的刊物，即使在电视和各种媒体盛行的今天，画报依然有自己的读者，是其他传播手段无法代替的，它以完美的艺术品呈现给读者。

《人民中国》这是一本专门针对日本读者的综合性月刊，长时间是我国对日本的唯一大型刊物，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办出特色、容易办得好的刊物，对象集中，内容也容易集中，共性的东西多。日本是我国的近邻，历史上的交往多，文化上与我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在近代史上，日本多次侵略中国，对中国人民欠下了血债，至今还有许多

纠葛；在当代，双方致力于睦邻友好，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不断提升，民间交往日益增多。这个刊物历史较长，在日本有一批稳定的读者群。尽管如此，日本民众对中国并不那么了解，许多认识还停留在过去的中国。我出访日本时，日本友人告诉我，日本青年倾向于西方，他们认可中国的古代文化，而不大认同中国的现实，这是我们应着重研究的一个课题，如何能介绍好当代中国，是让他们了解中国的重要方面。

《人民中国》时常涉及一些严肃话题，但并非都是板着面孔讲道理，早在1963年廖承志就确定了本刊物的风格。他说：“轻松幽默的短文很为需要。我看杂志这方面的文章很少，每篇都是正襟危坐的样子，给人的印象，好像中国人不会笑。”《人民中国》要努力做到内容丰富具体，形式多样活泼，文字短，版面活，采取日本民众尤其是日本青年容易和喜欢接受的方式。

《中国报道》这是用世界语介绍中国的一份刊物，1950年创刊。过去我不知道，到了外文局才知道世界语（被称为“国际普通话”，创始人是波兰人柴门霍夫）底蕴竟是如此的深厚。早在1939年12月9日，毛主席在给延安世界语者协会举办的展览题词：“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么，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早应该学的。”以外语这种形式载中国和国际之道，一直是外文书刊的指导思想。阅读有关史料，我才知道竟有那么多老前辈和著名人士学习、关心世界语，鲁迅、巴金、叶籁士、胡愈之、陈毅、楚图南等，他们都钟情世界语并写过不少论述文章，成为世界语系统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世界语《人民中国报道》（后改为《中国报道》）审定的编辑方针是“通过文学、艺术、生动活泼的特写，反映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知识以及世界语运动，也做适当的介绍与报道”。世

界语在世界各地有比较广泛的基础，读者对象的共同点比较集中，世界语者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国外遇到会说世界语的彼此有亲切感，很容易交朋友。这都是办好《中国报道》杂志的有利条件。但实际上由于读者分散，所在国度、地区的不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不同，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的不同，受社会和舆论的影响不同等，他们之间又有很大的差别，既寻求共同点又要办出特点，办好杂志的难度很大。为办好这份刊物，廖承志、胡乔木、姚依林、胡绳等都给予热情关注和支持。

陈毅在 1963 年 7 月 25 日出席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有许多精彩的见解。他说：“讲到世界语，就是同志。不管黄种、白种，也不管信仰不同，一讲世界语，就可以坐下来谈几分钟，谈几十分钟。”他在谈到如何体现政治时强调“不要急”，“不要多”，不要“长篇大论”，不要强迫人家接受，“每期有一点，三五十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大批堆上去，连一个观众也（会）失掉”。主要“搞一点中国建设的，搞一点文化艺术，搞一点图片，搞一点农业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搞一点科学、语言学，这也是政治，这是厉害的政治”。“可以用正面的方法，也要（运用各种形式）搞一点迂回曲折的方法”。这些 20 世纪 60 年代的见解至今仍然闪烁着光芒。《中国报道》是办得比较好的一本杂志，深受世界语读者的欢迎。但由于订阅者经费的困难，发行量上不去。

#### ——出版社

外文局所属有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海豚出版社、新星出版社、今日中国出版社、人民中国出版社、人民画报出版社、朝华出版社、中国文学出版社等 11 家出版社。出版宗旨是“面向一切外国人，照顾不同国家、不同阶层、

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人们的不同兴趣和要求”。各社专业有分工，分别从政治、经济、外交、历史、地理、文化教育、体育卫生、法律条例、人民生活、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等不同的角度，生动、真实地对外介绍中国的情况与知识，反映中国的光明与进步，增进国外对中国的了解。

这些出版社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外文出版社（简称“外文社”）。“先有外文社，后有外文局”。外文社与共和国同时诞生，是我国以英文为主、多文种的最大外文综合出版社，每年出版上千种书。1963年中国外文局成立后，外文社成为局属一个单位。在改革开放之前，外文社主要承担党和国家政治图书的出版任务，几十年出了许多重要文献，如多种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等著作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等，同时大量出版了我国优秀历史、文化、基本知识等图书，有几万种之多。外文社出版外文书藉有权威性，在国外享有盛誉，为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起了特有的作用。

中央对外文社非常重视。历史上，对外宣传出版发行不计成本，尤其是重点图书，当作政治任务，由国家财政保证。有人给我讲过这样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布票非常紧缺，为出版某些重要著作的精装本，需要布面包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专门召集会议调集棉花；有的需要羊皮做封套，李先念开会调集羊皮。出版社不为发行操心，许多书靠赠送和散发，“包上几架飞机，把书往上一装，别的就不用操心了！”

在改革开放转制过程中，对外宣传的期刊和出版社都发生了变化，改变过去的体制，与对内书刊一样进入市场，进行成本核算，订购，收回成本。我刚到外文局的时候，许多同志谈到外文局出版社的现状，摇头叹息：他们认为不如对内出版社，对内面对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国内读者，有共同的文字和语言，有广阔的市场；对外市场太远，

读者太散，出书成本太高，而印刷、设计、包装的质量又比国际水平差，没有竞争力，发行难，是赔钱货等。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大家都算是认账的。但是，一些对内出版社却羡慕外文出版社有他们无法比拟的优势：第一，面向两种读者，用两种（或多种）文字出版，扩大了读者面，吸引了由外学中、由中学外的两种读者。第二，面向两个市场，同时在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发行，比一个市场大得多。第三，路越走越宽。我们走出去的人和国外走进来的人日益增多；国外想了解中国、学习中文的人，到中国旅游、办企业的人越来越多；汉语教学、儿童读物、中国烹饪、医疗健身等，日益受到广泛关注，需求多种多样，而各种具体服务都是在介绍中国。第四，出版有两个来源。我们可以卖版权，也可以买版权，还可以合作出版，而国内出版社狭路相逢，选题难找。第五，了解国内外图书市场。我们长期搞外宣，与外国打交道，了解国际出版发行行情，交了朋友，建立了联系渠道，越是改革开放越有生命力。问题在于这是存在优势，如何变成现实优势不容易，用好了是巨大财富，用不好是沉重包袱，要不“抱着金饭碗要饭吃”，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转化”。

打开国外图书市场的诀窍是多出精品书、特色书。什么是精品？我到外文局后，有了新的认识，在此多说几句。从对外宣传讲，综合指标是内容好，针对性强，设计和制作精致，读者喜欢。其中最重要的是读者喜欢这一条，这是客观效果，光我们自己说好不行，要国外读者认可。我们要出一部分非常精致的大部头的图书、画册，能够进入外国国家和大学图书馆供收藏，这代表着出版社和国家的水平。但是不可能多出，出这类书时间长、投入多、价格高、读者寡，造成积压。我们自己看好的书不一定卖得好。我们要改变一种观念，一说精品就是大部头。对外出版主要面向广大读者，那些小部头的，甚至是袖珍装，只要内容好，有中国特色，读者欢迎，也是精品，这是大量的。对于精品，

我们要重视设计包装。一个时期，我们致力于图书的设计包装，缩小了与国际上的差距。但更要重视内容的针对性和翻译的质量，这是国内外出版界的共识。我在会见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和比利时长城书店负责人时，曾向他们询问我国图书的销售，谈到设计、包装上的差距，他们都强调“这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内容是否对路”。

####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简称“国图公司”）

早期叫“国际书店”，成立于1949年，是与我国对外出版相配套的发行机构，也是我国最早、最大专门进出口各类图书、报刊的发行公司，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国图公司承担着全国、主要是外文局书刊对外发行的任务。出版界都清楚，搞好出版社，必须抓好两头：前头是进口，要有适销对路的选题，内容好，装帧美；后头是出口，把发行搞上去。有进有出，出版社才能活起来，才有生命力。尤其是对外出版，国图公司是把书刊送达读者手中、实现对外宣传愿望的纽带和桥梁，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国图公司面向世界各地，突出重点国家和地区；面向世界所有读者，主要是外国人，进入国外主流社会读者和收藏、研究单位；不断拓宽发行渠道，积极参加国际书展活动，扩大版权贸易，采取一切先进的（如网上推广征订）发行方式，努力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主渠道；先后在美国、英国、德国、埃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等建立了发行机构；改革开放以来，加大了对来华外宾、企业家和旅游者等境外人士的书刊供应业务，利用国内条件做好送上门来的工作。国图公司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就投入国际市场经济运营，我国书报刊发行到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达13亿多。发行以市场为导向，搞好对外出版发行，就要加强对国际书报刊市场的调研。调研市场，也就是调研读者，了解读者的需求、接受

习惯、方式和购买能力，逐步建立稳定的读者群，这不只是对外发行的关键环节，也是进行对外宣传调研、了解市场和读者信息的重要渠道。

我一进外文局，就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我国对外宣传的重视和期待，初识了我国对外宣传的基本要求；感受到以书刊出版发行为主体的外文局的几代人、几千职工和外国专家，一直默默无闻地坚守、耕耘这块沃土，把外文局建设成为我国外宣的重要基地；感受到他们历经 40 多年的积淀，为我们留下的对外宣传的丰富经验和好的传统。

## 四 新时期书刊网外宣面对的新问题

新时期，改革开放给外文局和对外宣传带来了新的巨大变化，就宏观而论：一、改革开放、国家发展改善了我国的内外环境，为我国对外宣传提出了新的要求，开创了从来没有过的发展空间，世界也更瞩目中国，这种“两相情愿”的良性互动带来了外宣的春天。二、对外宣传从过去主要服务于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和国际斗争（“文革”中的“促进世界革命”），转向了对外广泛介绍中国，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正确形象，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在党与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和交往中，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更不以输出意识形态为目的。三、扭转了过去“全面出击”的做法，从我国改革开放、国家利益和国际舆论斗争的形势出发，集中力量和有限财力搞好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宣传，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社会。四、扩大了出版范围和出版规模，由以马列和领袖著作、政治理论、重要文献为主扩展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国情知识等各个方面，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数量，增强文章的客观真实性和生动、趣味性，逐步改变国外长期把中国外宣当作鼓动革命的政治宣传的印象。五、宣传对象由过去以国际左派为主扩展为“面向一切外国人”，摒弃了“文革”

中“提高‘左’派、争取中间、分化右派”的极“左”倾向，转为“适应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党派、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人们的不同兴趣和要求”；六、书刊发行积极打入国际书刊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加强国际书刊交流合作，努力进入国外发行主渠道和主流社会。这些基本性的转变，使外宣走宽了一条新路子，面临一个广阔的天地。

与此相适应，对书刊外宣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要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正规的贸易发行和市场开拓，书刊进入市场，预先订阅，基本收回成本，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实行的国家买断或统包政策不复存在，转变为进入国际市场竞争“双效益”的生产经营方式。应该说，这是国家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这种以贸易形式经营的变化，符合市场运行规律和读者的心理。外国读者视“赠送”为“宣传品”，他们不接受宣传，只有自己花钱购买的才是需要的；没有定价的书刊不能算作正式出版物，不能进入发行渠道，想购买者无法购买；减少了过去买断统包造成的人、财、物的巨大浪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部分外宣经费；进入市场，参与竞争，也必将促使提高书刊的质量和针对性，淡化宣传色彩，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显然，这一切有利于与世界书刊市场接轨。

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在转轨的新时期，在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有关部门对书刊外宣同样毫无例外地相应调整，对外出版发行纳入成本核算和市场运作是正常的，但实际做到却非常困难。对外宣传有它的特殊性，这一巨大转折，强烈地冲击着外文局长期形成的计划经济的固有模式，出现了观念与体制的严重不适应，书刊出版发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老、大、难”的困境。这项事业的特殊性和难度在于：

1. 我国的对外宣传是党和国家的事业，最初所采用的是苏联书刊外宣的模式。对外宣传是向世界介绍我国的情况（我国受益），而用

的是非母语的外国语言文字（我们没有优势），出版发行所面对的是难以了解的国外读者和遥远的国外市场，又要让读者自愿掏腰包订阅，从中达到介绍我国的效果，不难看出这中间几经转折，每一转折都非常难。

2. 对外宣传是国家行为，是一项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工作，各国概莫能外。因此，历史上外文书刊的出版发行基本是非贸易的，或以贸易发行为名而对外赠送，长期由国家财政支持，不计成本，国家统包，无经费之忧，是地地道道的计划经济部门。现在采取贸易发行，按照书刊订阅的实际发行量调拨经费，并要回收成本作为经费的一部分（而且是硬通货），而对外书刊成本高（如翻译费等），再加上昂贵的航运费（运输费是成本的几倍、十几倍），又要平衡国际市场同类产品的定价，书刊质量越高、发行数量越多则赔钱越多，影响到出版发行的积极性，发行大幅下降。

3. 在市场竞争上，我们在多方面处于“以弱对强”，书刊是兼有文化与商品双重属性的特殊商品，又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等多种因素，遇到了西方主流社会有形或无形的抵制，受到市场的排斥；又由于书刊市场的行情千变万化，发行部门担心销路不畅造成积压，经济利益的趋动压缩了向出版社的订货，出版社叫苦。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联手对我国进行制裁，过去曾发行我国外文书刊的许多国外公司、书店以及友好团体，有的断绝了与我的来往，有的转向，有的解体，导致我发行网络急剧缩小，发行不畅威胁着对外出版的生存。例如，苏联解体后失去了一大批读者，尤其是世界语读者。现在订刊用美元，俄罗斯读者谁肯订？这不是生活必需品，一美元兑换几千卢布，他们首先解决生活问题，谁还有多余的钱订阅一份外国杂志？

4. 人们长期固定的观念是“外宣是国家的事，国家要统管”，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体制，机构多，人员多，这一转变人们的观念跟不上，

体制不适应，工作难度大。但改革开放的现实，又要求对外宣传必须尽快扩大规模、提高效益。这种历史与现实、现状与需求之间的不协调日益突出。

5. 外文局过去那种只管宣传不管民生的做法行不通了，工资外的收入与单位的创收挂钩，住房不再统一分配，外文局必须把职工的衣、食、住、行统统管起来。住房建设和单位创收被提上重要议程，而对外宣传却没有有效的创收手段，社会上又出现外语人才奇缺，“高酬金”、“高待遇”的吸引力造成队伍不稳，留不住人。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外文局汇集了众多的编辑、翻译和出版人才，有的是周恩来总理从各地调进的，他们为外宣做出了贡献。但随着调整，有些小语种的编辑、翻译人员失去了工作，收入的不平衡又造成队伍（尤其是英语等大语种）的不稳和人才流失。

外文局同样面临着发展的机遇和矛盾，求得发展的出路只能是改革，这是时代的主流，也是各单位的共性，但外文局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改革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外文局的改革早已在进行，我的前任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我清楚现在要做的是改革的速度与深度。

## 五 外文局宣传格局的历史性变化

初进外文局，在进行调研、摸清情况的基础上，首先把组建局党组放在了首位，只有有了党的领导集体和决策机构，一切工作才能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组建党组与健全局领导班子同时进行，于 1993 年完成，接着是理顺局机关机构。外文局历史上的归属有过 10 次变动，难以做到工作的连续性。外文局所属有 16 个单位，其中有 10 个正局级单位与外文局的领导平行，甚至高于局领导，每个局级单位的社长、总编辑都是正局级，而局领导中只有局长是正局级，上下领导关系不顺，

工作难以推行，隶属关系又多次动荡不定。这期间，经多次向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反映和申报，经党中央批准，1995年12月1日，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机关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明确规定了外文局的性质、任务、机构和隶属关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是中共中央所属事业单位，是承担党和国家书刊对外宣传任务的新闻出版机构，由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代管。”加强集体领导、体制等基本问题的确定，为外文局以后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外文局的中心任务是书刊对外宣传，一切工作都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现在回顾我在外文局的8年，由党组决策，与全局一起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摸清情况，理顺关系；二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三是调整布局，突出重点；四是改革创新，形成新的格局。这中间始终贯穿着如何处理好小环境与大环境的关系、适应形势促进外宣发展、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稳定和提高外宣队伍素质等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依据实际不断进行改革。

新形势下，改革是外文局的领导和职工的共同期盼，但如何改革，一直处于谨慎探索过程中。今日外文局书刊布局的形成，都是前人艰苦努力一步一步建设起来的，得来不易，每一项局部调整改革都要极其慎重，甚至涉及国家的外宣格局，要进行充分论证，而且必须报请上级部门审批。

经验说明，任何单位的改革都必须从思想观念入手，而且贯穿始终。外文局更是这样，由于长期的完全计划经济，要打破大锅饭转向市场竞争生存是多么困难，根深蒂固的旧观念一直在顽强地起作用，要求国家经费统包、不求自身改革成为顽症，而外部环境又不允许。这种内外环境，使外文局每前进一步都非常困难。1995年4月，外文局在反复调研的基础上正式向中央外宣办写出了“关于调整期刊布局

的请示报告”，提出有的要调整方针、有的要停办、有的要创办三种具体意见，得到了批准。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外宣办又取消了批准的意见，不同意调整方案，原因是会影响我国的外交关系。这样的事屡屡发生，改革一再受挫，而经费又严重不足。如，某一外文版的《中国画报》，是考虑到当时的国家关系而办的，后来该国封锁不让这一画报进口，连续两年是零发行，而我们仍然月月、年年照出不误，每期出版后即堆进仓库，造成大量的积压和浪费，多年请示停办，都因“问题敏感，会影响两国关系”而不能停办，拖延多年，不得已于1995年年底自行停办。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应用，过去那种单一的宣传手段和形式已经不能适应，使以纸质印刷品为传播媒介的书刊外宣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也同时为外文局的发展带来了新生。书刊是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媒体，事实已经证明，互联网是不能完全代替纸质传播媒介的，但外文局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对传统书刊出版发行进行调整改革；二是顺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加快采用新技术，而互联网与对外宣传又有着特殊的优势，这也是中央从一开始就把网络媒体的管理交给中央外宣办的原因之一。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中央有关文件反复强调利用互联网搞好对外宣传。1999年10月16日，中央办公厅转发的《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关于加强国际互联网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增加资金投入，解决必要的机构和人员编制。要用两三年时间，在现有基础上建立信息量大、覆盖面广、服务功能强、知名度高的网站，包括外文为主的网站。”其中具体指出，“要将出版周期长、发行量小的外文刊物，转为网络版”，似乎是专门针对外文局而言。外文局从1999年年初就开始研究制定建立一个多语种的、杂志图书型的网站，但进度缓慢，这一文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000年3月8

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同志在听取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汇报工作时指出：外文局出版的刊物出版量太小、时效性不强的要下决心在今年年底结束，去搞网络版。外文局那么多人，许多人不擅长搞网络，可以考虑集中力量办一两种品位高的杂志，也可有一种是对内的。外文报刊也要充分利用网络。胡锦涛同志针对外文局的指示如此明确而具体，全局大为振奋，局党组抓住这一时机，进行全局布局改革的设计规划，形成了“期刊结构调整、出版社整合和网络建设”三项改革的明确思路，并向上级主管部门写了请示报告：一、加快外文局网络中心和网站建设。二、对期刊结构调整分别提出四种处理方式：停办几种发行量少影响小的期刊，也不再上网；保留几种发行量大、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期刊并开办网络版；其余期刊停止出版文字版，改为网络版；同时创办几种面向国内市场的刊物。三、对局属各出版社进行撤、并、重组，形成一个以出版外文图书为主、一个以出版中文图书为主的两大出版社和几个专业出版社。四、争取国家财政支持。中央外宣办批准了此报告，并责成外文局提出具体实施意见，报上级及有关部门批准。经过进一步的调研和统一认识，外文局正式提“网络建设、期刊调整、出版社整合三项改革方案”，分别报有关主管部门中央外宣办、新闻出版署、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后，获得批准。

**网络建设**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同意外文局挂“中国国际互联网新闻中心”的牌子，作为一个实体，正式得以确认；外宣办批准把《中国国际互联网络新闻中心》所属“中国网”与外文局网络合并为《中国网》，交外文局承办（具体情况将在《中国网落户外文局》一文中介绍）。

**期刊调整** 过去的指导思想是开办尽可能多的语种，以求更为广泛地介绍中国；现在对外宣传的途径拓宽，方式大大增多，外文局期刊就显得战线太长，形不成规模，办不出特点，也就没有了以往的优势。

因此需要缩短战线，集中人、财、物办好几种重点刊物，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措施。新闻出版署批准的书刊调整方案是：一、2001年1月起，《人民画报》印地文版和藏文版停刊；二、《北京周报》、《中国与非洲》、《今日中国》、世界语《中国报道》的17个文版停止印刷版，转为网络版；三、《北京周报》、《人民画报》、《今日中国》、《人民中国》等9个主要文版印刷版与网络版并行，保留下来的几种刊物，必须改革创新为一种新面貌；四、经新闻出版署批准，外文局所属北京周报社、今日中国杂志社、人民画报社、人民中国杂志社、外文出版社和中国报道社，分别创办《双语世界》、《小读者》、《大周末》、《英语角》、《中国报道》和《服饰与美容》6种杂志，面对中外读者。有30多个文版，停止出版印刷版的有17种杂志，继续出版印刷版的有9种。确定从2001年1月1日起（这是个吉日，新百年、新千年），新办6种杂志陆续开办。

**出版社整合** 经新闻出版署2000年9月5日批准，外文局撤销、合并了几家出版社，正式批准几家出版社的中文书籍出版权；正式创办几种中文或中外文双语种的刊物。过去外文局有几家出版社曾经被允许搞过小规模的中文出版试运营，取得了经验，也出过不少问题，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工作上的被动。这次取得中文出版的“合法地位”，以一个外文出版社和一个新世界出版社为骨干，带动各有特色的专业出版社的发展。中文图书同时面对国内外两种读者和两个市场，但依然着眼于对外宣传，扩大外文局的业务范围，扩大外宣影响力，提高外文局的知名度和创收能力。

至此，外文局在改革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大步，改变了过去五十年一贯制的传统书刊外宣格局，形成了网络、期刊和图书出版发行三位一体、互相补充的新格局。这三项改革，是一个互相联系、结为一体的完整方案，为外文局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此，外文局以出版外文图书与期刊为主，同时也出版中文图书与期刊；不仅面向国

外市场，还面向国内市场；不仅出版发行书刊，还办起了中央重点新闻网站。这种格局的变化，适应了新形势，给外文局的发展带来了生气和广阔发展前景；事业留人，吸引稳定了外宣队伍。抓住时机，积极推动，使之逐步得以落实。

三项改革融进了先进宣传手段和快节奏的工作方式，是一次新的创业，许多不熟悉的东西要从头学起，对转岗人员要进行学习培训，组织安排好人员的转岗分流。直接面对的是一大批职工的变动和调整，最难做但又必须做好。他们热爱外宣事业，大多在外文局工作了几十年，对他们应该安置好。我们强调每个人应该服从改革的大局，又要强调不能让一个人因工作下岗，更不是“优胜劣汰”，而是“转岗分流”。不允许借故把他们推给社会，不能因为要改革让他们付出失去工作的代价。下岗容易，但对于任何一个人、一个家庭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他们可以不做原来的工作，但必须都有工作可做，要积极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再让他们“转岗分流”，这也是一条原则，保证改革积极稳妥地进行。

## 六 不可不说的翻译问题

谈对外宣传不能不谈翻译问题。外文局是多年专门从事书刊外宣的新闻出版机构，不但不能忽略，而且要有一支高质量的翻译队伍。我不会外语，不懂外文，但近朱者赤，多年的熏陶使我有了些皮毛的了解。

我曾经用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做过近似的比喻，一是如同播音员、主持人直接与听众、观众交流一样，书刊外宣是通过外文直接与读者见面的，能否达到外宣预期效果取决于外文水平的高低，翻译质量是书刊质量的重要标志；二是好的播音员、主持人为

节目添彩，不好的减色，翻译也是这样，文章再好，翻译不准确不对路，读起来别扭难懂，总像吃了一粒沙子，弄不好会出大问题。正因为如此重要，外文局集中了多文种的一批翻译人员，聘请了近百名外国专家，外文局还成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的业务主管部门和挂靠单位，国家把评定翻译界高级职称的任务交给了外文局。从另一方面讲，我国外宣的性质、任务和要求，更不允许有差错、有疏漏，尤其不能有政治上的、政策上的内容、口径差错，就是技术上的问题也直接影响到效果。

我不是探讨翻译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谈某些实际问题，争取一个更好的外宣效果。就总体水平而言，我国的翻译水平不高、不平衡，出现的问题和差错屡见不鲜。我记得在一次中央外宣办向中央领导汇报外宣工作时，中央领导专门议论过翻译工作，认为我们的翻译水平与一些国家、与我们的历史水平都有很大差距。拿英语来说，中国不是英语的强国，除了那些英语国家以外，我们在亚洲也不是翻译强国，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这些国家比我们的英语水平高。但是，我国历史上曾经有一批外语根底很厚、潜心研究外文的翻译大家，他们翻译的马列著作、著名文学作品等，中外贯通，至今仍无可比拟。我国现在学习外语的人大大增多了，出国留学的人增多了，这是一件好事，但真正高水平、潜心治学的人并不多，多停留在一般水平上，有一种浮躁情绪。我们很需要一批潜心治学的外语专家。一般来说，直译是不成功的，一些题目、名词直接来翻译，译得人家不知所云。显然，这些议论是符合现实的。1996年由中央外宣办组织评选的对外“七个一工程”，从各地选送来的对外优秀作品中，有85%不能过关，错误百出，甚至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仅有两本书中翻译没有差错，其他没有送来的大量作品就可想而知了。1996年，我收到挪威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写来的一封信，对我们的刊物提出意见，一是内容人家不愿意接受，政治味、宣传味太强；二是价格太贵；三是翻译问题。他说，

你们翻译的东西，到我们这里常常看不懂。外语不是中国的母语，正如外国人说中国话一样，说得再好，也是外国人说中国话。所以你们要非常精心，提高翻译水平。

第三，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内涵和表达方式的区别（如内涵丰富、概括力强、文字简练、表达含蓄等），中国现代语汇的层出不穷以及高度的概括简化（如“三个代表”、“以德治国”、“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荣八耻”等），更带来翻译的困难，而又必须十分准确。1995年2月15日，我在与长期经营中国书刊的比利时布鲁塞尔长城书店的冯斯先生交谈中了解到，他对选题的政治性太强和翻译的不准确提出意见。他说：“中国书刊中有些提法外国人与中国人的理解不一样。中国经常提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西方人说‘富’是指发大财，是指百万富翁，不是指老百姓。在对外宣传报道中不一定这么提，可采用对比手法，用事实说话，来讲老百姓生活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在西欧一些销售中国书刊的书店调研时，时常听到老板抱怨“这书太厚太重，很少有人买”；“这书印得不错，就是翻译不好，看不懂，差错太多”。有的老板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有些医药、针灸、气功和烹饪的书不知所云，有的成了害人书，这里没有政治观点的问题，但关系到人们的生活和生命，翻译中的错误是会死人的。

正因为如此，外文局从一开始对翻译工作的要求一直非常严格，为此曾经多次制定过翻译、校对、审稿、定稿等规章制度。这些是几代人的经验总结，有的是用沉痛代价换来的，它要求每个人必须严格遵守。老一代翻译家总是强调把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放在第一位，强调要有丰富的知识修养和严谨的学风。外文局出过不少资深翻译家，他们很有建树，各有特色，如段连成、杨宪益、叶君健、林戈荪、沈苏儒等。沈苏儒说：“翻译除了要有两种以上的语言功底，还要有丰富

多样的文化修养和广博的知识。”

但事实与这一要求差距太大。我就多次看到，我国有些出版社、有些地区，花几十万元的巨资出的外文书画刊，由于翻译出现政治性错误，竟成了一堆废纸。有一位地方外宣办的主任送给我一本设计精美的大型画册，他告诉我是集 40 万元出版的，为保证翻译质量，专门请了一位大学英文教授翻译。我请懂行的外文专家审看后发现，由于那位教授不了解外宣用语和外国人的表达习惯，依据文字直译，不仅没有生气和可读性，还闹出不少笑话，致使画册拿不出手。但这还是认真的，有些外宣品的翻译更是粗制滥造，误以为只要会外语就会翻译，是外文就是外宣品，有了外宣品就有好的宣传效果。翻译是一门高超的学问和艺术。受外文局翻译的启发，我曾经多次在一些外宣会议上提出，各地出版对外重点书画册，如果觉得翻译没有把握，你们愿意的话，可以送外文局最后把把关，不是为收取审阅费，而是保证质量和效益；不是外文局的翻译一定高明，而是他们是专门搞外宣，而且有聘请的外国专家。为此，2000 年 7 月，外文局的爱泼斯坦、林戊荪、沈苏儒三位联名向上级写报告，《呼吁重视对外宣传中的外语工作》，引起了重视。

问题不仅出在对外宣传的书刊中，据外文局外文专家称，各单位、企业的对外介绍说明书中，门口的外文招牌，街头的各种外文标识、口号或醒目的大标语中，翻译错误百出，几乎比比皆是，不仅闹出笑话，甚至不堪入目。外文局曾经设想过（尤其是在北京申办奥运会取得成功后）对北京公开摆放的外文宣传品、街头路标、广告甚至用餐菜单（都很难翻译）等，尽力做一些把关工作，尽管没有兑现，但提出的建议却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说过，我们的翻译作品“应当让人家觉得就是用那种语言写成的”，这是一种更高的要求，但是应该做到。历

史分工形成了采编与翻译分工、分离的工作方式。实践中大家越来越感到实行编译合一的紧迫性。我们积极提倡和支持中文记者、编辑学习外文，这不仅是为了节省人力，主要是为了便于他们了解对象国的情况，懂得外文的表达方式、用语习惯，切实提高刊物的质量；我们也积极提倡和支持翻译懂宣传、懂采访编辑工作，学会直接采写稿件；而更高的境界最好是用外文直接写作，由采编、翻译各自发挥长处，各自弥补不足，到实行编译合作，再到编译合一，从一开始就着力培养了解内外情况、采编与翻译集于一身的复合型外宣人才，这是提高外宣效果的重要途径。

## 七 “中国网”落户外文局

互联网的兴起，引起党和政府的重视，自互联网诞生以来，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的网络媒体迅猛发展，为我国对外宣传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无力解决的落地难等许多基本难题，成为我国对外宣传的主要传播渠道。中央外宣办早就设想利用互联网建立对外宣传的“中国新闻信息平台”。1996年10月24日，中央外宣办写了《关于建立国际互联网对外宣传信息平台的请示》的报告，建议成立“中国国际互联网络新闻中心”(China Internet Information Center，缩写为CIIC)，经李鹏、丁关根、邹家华等中央领导批准。1997年1月1日1点40分开通了“中国国际互联网络新闻中心”，统称为“中国新闻信息网站”，简称为“中国网”([www.china.org.cn](http://www.china.org.cn))，功能定位于向世界介绍中国，地点设在外文局所属国际图书贸易进出口总公司。

“中国国际互联网络新闻中心”成立后，由于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进展比较慢，一直没有成为一个实体。在此期间，外宣办曾经多次研究由谁办、如何办的归属问题，设想过多种管理方案，向中央主管宣

传思想工作的丁关根多次汇报请示，建议由外文局承办“中国国际互联网新闻中心”这一“中国新闻信息平台”。2000年5月30日，中央外宣办主任办公会议，一致认为我国需要建立一个专门从事对外宣传的重点新闻网站。会上具体分析了外宣办与外文局的优势互补：外宣办是网络宣传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者，CIIC 在国内外已经具备了一定影响；而外文局有一大批懂政治、懂业务、有丰富外宣经验的采访、编辑和翻译队伍，有半个多世纪积累下来的丰富资料，外文局自身的网络信息筹建工作已经初具规模，有了一支专业网络工作人员，初步形成了一个好的基础，与“中国国际互联网新闻中心”的构想基本一致。主任办公会议做出决定，将“中国国际互联网新闻中心”与外文局办的网站合并，进行组织机构调整整合，确定由“中央外宣办主管，中国外文局主办，外文局挂‘中国国际互联网新闻中心’的牌子”，实现优势互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将其办成信息量大、覆盖面广、服务功能强、知名度高的“发布多文种的综合性对外宣传信息和对国际舆论斗争有重大影响的专题性信息网站，还要办成我国国际互联网新闻宣传体系的搜索引擎”。

6月6日，由我召集并主持会议研究落实合并方案，整合原有机构。为具体实施，成立了由我任组长、赵常谦（外文局常委副局长）任副组长的外文局网络领导小组，对网站的机构、人员编制、资金来源、办公用房和技术设备等提出请示报告，提出 CIIC 设在外文局，与外文局自己开办的网站合为一体，由外文局承办。7月20日，外文局向中央外宣办报送了筹备落实 CIIC 有关工作的报告。

外宣办7月28日批复，要求外文局尽快把 CIIC 所属“中国网”办成符合中央要求的信息量大、覆盖面广、服务功能强、知名度高的重点新闻宣传网站，办成在引导网上舆论的对外宣传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网站。不久，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同意外文局挂“中国国

际互联网新闻中心”的牌子，作为一个实体，正式得以确认。11月24日正式在外文局挂牌，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王晨、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伍绍祖等出席了挂牌仪式。至此正式命名，其所属的“中国网”正式落户外文局。我们清楚，把“中国网”交给外文局来办，是看重了外文局丰富的外宣资源、外语和外宣人才，以及多年的外宣经验；也给外文局搭设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大舞台，给了有利于生存发展的空间，同时也就带来外宣、机构、人员和工作方式的变化。办好中国网，不只是把书刊和多年积累的外宣资料搬到网上，重要的是加强了信息量、扩大了信息范围，尤其是增加了适合对外的国内外新闻，提高了信息发布时效，这对长期从事书刊外宣的外文局无疑是个重大变化，成为真正的“新闻机构”。这一变化要求各方面、尤其是新闻人才和工作体制与之相适应。为此，提前开始了新闻练兵，开始派记者参与“两会”和重要活动的新闻采访，加强值班，时效上网。

1997年年初CIIC初建时的中国网开通了中文繁、简两种字体和英文三个文版，2000年9月28日又开通了德文、法文、日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和世界语6种文字，共有8种文字9个文版，成为当时文种最多的网站。在这一天的全局干部会议上，局党组提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办成一个有10种文字、11个文版，信息量大，服务功能强，知名度高的、以对外宣传为主的网站。”现在的中国网已具备较大规模，内容不断丰富，特点已经形成，截至2010年10月，中国网已成为开通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世界语、俄文、韩文和中文（繁、简）10个语种、11个文版的综合性对外传播网站，它以新闻为主体、以国情为基础，融合各地通讯、专题，网上服务、媒体搜索等内容，向世界全面推介中国，日均访问人次550万至600万、点击率2亿左右。中国网与其他重点新闻网站相比，它有两个鲜

明的特点：一是以对外宣传为主的网站，二是搜索引擎网站。它通过自身和连接发布真实、权威的信息，发布政府文告和文献；制作热点和重点问题报道的专题，提供新闻背景材料；跟踪国际舆论，进行国际舆论斗争；提供中国的基本情况和各地特色，为外国来华者提供服务，服务就是外宣；推广我国对外传媒，介绍对外书刊；与我国主要新闻网站链接，方便网民集中阅览。根据要求，将来应把中国网办成在世界有巨大影响的、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宣传门户网站；办成信息量大、服务功能强、覆盖面广、访问人次多、知名度高的网站；办成与新闻单位网站链接的新闻信息平台；办成菜单齐全的中国新闻搜索引擎。

2000年世界银行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协商，由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办“中国发展门户网站”，以扶贫和发展为主题，向世界介绍中国国情、发展状况、扶贫信息，服务国际合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把这一网站交由外文局承办，2001年9月1日外文局正式开通了“中国发展门户网站”。后来外文局还举办了“明镜网”，弘扬科学，反对伪科学和邪教。这样，外文局形成了三网并存的局面。

中国网的建立，改变了外文局半个世纪书刊外宣的格局，形成了图书、期刊和网络媒体并存的新的外宣格局。我一直认为，书刊、网络各有优势，各有读者群，不是相互代替，而是实现了优势互补。但从信息时代的特征和今后的发展趋势着眼，要进一步开创我国外宣的新局面，改变多年的外宣被动状态，最有效的便捷措施，是下力气建好用好一两个专门承担外宣任务的网站，集中人力、物力做大做强网络媒体，这是做大我国外宣的重要环节，这也是当时建立中国网的初衷。

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实际面临的外部舆论环境，决定了我国的对外宣传必须立足于自身的发展，其他人都靠不住。而发展自己好、快、省的办法是做大做强一个国家的专门外宣网站，这是党和国家的外宣布局和任务。这个网站的目标、任务、特点非常明确和专一，就是专

门做外宣综合性网站，这应该是中国网所承担的任务，要做到“欲知中国事，请上中国网”。过去为中国网定位于“以对外宣传为主”，留下了“兼顾对内”的余地；现在，我国兼顾内外的重点新闻网站并不少，它们是“以对内宣传为主，兼顾对外”。经验证明，凡兼顾内外网民者，办好网站都很难，“三心二意”难以办出特色，导致不伦不类，内外效果都不理想。我认为，应该把中国网建成一个完全对外宣传的重点新闻网站，不必兼顾国内网民的点击量、看法及其他（如经济效益等），专门有一批人依据我国对外宣传的需要，集中地、深入地、一心一意地研究对外宣传的对象、需求，依据对外宣传的规律和特点，采取一切有效的形式扩大我国的正面影响。外宣网站就是外宣网站，即使对国内的外国人和华人华侨，也要定位于“外宣”，办出外宣特色，即使用汉语也不要离开一个“外”字。中国网对内对外公开亮明旗帜，反复公开声明是“对外传播网站”，对外扩大知名度，不必兼顾国内市场和网民需求，也不必在意国内的评估。我曾经多次建议并写文章论述，我国应该集中人力、物力打造一个专门对外宣传的“网络外宣航母”。

对外网站涉及的内容主要为内外新闻、中国文化、国情知识、各项服务四大部分，以新闻（侧重政治、经济）、文化为主体，构成两大特色。新闻稿源主要采取拿来主义，专门组织强大的新闻编辑和翻译力量，依据对外需要和新闻特色有针对性地进行选取、摘编、改编和翻译。只要有中央的尚方宝剑，这些资源的利用都不成问题。就文化而言，翻译成外文的中国名著已积累了不少，不仅可以选用，而且可以“打碎”专题编用。文化名著的大部头，对于国外收藏是必要的，而对广大读者则是“望而生畏”，读者寥寥。我们应该依据他们的需要和阅读习惯，编辑成各种故事的单行本和适合他们视听习惯的各种形式，以达到传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目的，而且也是“多、快、好、省”的一种办法。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认为，现在对外文化传播的重点，

由传媒转向了文化产品。我认为这是个重要的判断，我们在做好网络媒体文化传播的同时，利用外文局和我国文化资源转化为面向境外市场、读者需要的文化产品。

这样，就带来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一、书刊网的相互关系。这种传统排列次序是历史形成的，从实际出发，网络的影响已大大增强，未来更是这样。如何排列并不重要，主要在于如何分析认识。我认为，今天的外文局应该以网络媒体为对外宣传的主体，也就是围绕中国网来建设和发展，改变传统格局，形成以互联网为主体、辅以书刊对外宣传的外文局。现有的期刊和图书的一部分首先服务于网上对外宣传，尤其是期刊，动员全局各社从不同的角度为中国网的外宣服务，然后从网中各摘取其中需要的精彩部分出版各自的期刊，这样不仅丰富了网上的内容，而且也有助于提高期刊的质量，实现书刊网优势互补，扩大外宣效果。二、相应改变外文局人员结构，逐步向新闻记者、编辑和翻译力量方面倾斜，增加有关专业人才，建立相应的工作方式。三、征得中央财政的认可和支持。这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无从谈起。做大做强专门对外宣传的网站是党和国家的事，要中央批准，得到中央的认可和支持，给予宣传政策，首先要有财政的保证，不仅事业，包括人员等各项开支，要让外文局无其他之忧，一心一意搞外宣（也可考虑一局二制）。我知道在当前转制时期似乎是逆道而行，但并非不可能，借鉴许多国家对外宣传的经验，都是列入国家预算序列的，给予明的暗的支持。由国家主办，建一外宣网站投入不多，却事半功倍。在香港回归前的 1995 年 12 月 4 日，我曾经依据当时的媒体情况，写报告建议自主发展对外宣传优先广播电视，利用香港回归的时机“在香港建一专门对外的电视台”，利用内地的资源和香港的人文、地理优势，更有效地扩大对外宣传的影响。由于当时考虑到经费等因素的困难而未被采纳，但集中力量做大做强对外宣传网站是不难做到的。

2001年5月我离开了中央外宣办和外文局的工作岗位。回顾这8年多收获颇丰。当初我一人来到外文局，我感谢外文局接纳了我，得到了外文局干部群众的认同、帮助和支持，说明我和他们的“血型”有相融之处。我有缘结交了一批新同志、新朋友，这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从他们身上学习如何做人、做外宣、做学问，受益匪浅。我在外宣办更为接近中央的宣传决策，宏观思维，开阔了视野，增强了全局意识。我这才意识到，换一个地方工作，换一个位置，对于思考和把握宣传的锻炼提高，是多么有益。有时候我想，如果我还是在电台，那是原来意义上的延伸，后来在对外宣传的岗位上，那是新领域的拓展。总起来可以概括为：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结交了朋友，受到了锻炼，是我人生又一个值得怀念的阶段。

## 八 记忆爱泼斯坦

我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交往并不多，不像一些老外宣，与他共事几十年。我认识爱泼斯坦是我1993年到外文局之后，一上任，就随同丁关根、曾建徽同志去拜访他，以后8年中经常去看望他并向他请教外宣。爱泼斯坦是几届的全国政协常委，2003年后我们又同时在十届全国政协的新闻出版界，直到他2005年5月26日去世。

爱泼斯坦忠诚于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学识渊博，是一个既懂得外国又懂得中国的人，精通新闻和外宣，他为人谦恭、和善，与他相处的人都依据他的英文译音亲切地称他为“艾培”，又叫他“艾老”。艾老在我国有很高的声望。我们党有过明确的规定和传统，不为领导人祝寿，也不曾有过祝寿的报道，但对几位专家是个例外。1985年爱泼斯坦七十诞辰时，邓小平、邓颖超、乔石、习仲勋、胡乔木等出席了庆贺招待会，胡耀邦发了贺信，李先念、彭真题词，王震从外地打

电话对他表示祝贺。199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爱泼斯坦，祝贺他80寿辰暨来华工作60年。爱泼斯坦90诞辰时，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到爱泼斯坦的家中亲切看望了他。我记得，在祝贺爱泼斯坦80寿辰时，中央领导人赞扬他一直致力于国际宣传和对外传播事业，表现出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谈话气氛融洽轻松，相互谈到一些生活的共同感受，比如随着年纪的增加，对历史的记忆愈来愈清晰，对现在的记忆却不那么清楚，甚至记不起今天的早饭吃了什么。李瑞环顺口说了一种“反常”现象：“往事忘不了，今事记不住；躺着睡不着，坐着打呼噜。”引起哄堂大笑。同一天，中国外文局、宋庆龄基金会、国家外国专家局等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为艾老举行祝贺茶话会。我在代表外文局的讲话中，介绍了爱泼斯坦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特有的贡献。

爱泼斯坦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兰，1917年随父母移居中国，曾在天津上学，1931年后在英文《京津泰晤士报》从事新闻工作，1933年他结识了进步记者斯诺，1937年他作为美国合众社战地记者深入中国抗日前线南京、广州、武汉、台儿庄等采访，写下大量战地通讯。1938年宋庆龄团结中外知名人士在香港创办“保卫中国同盟”，年轻的爱泼斯坦参加了同盟并负责开展国际宣传，主持编辑出版对外宣传刊物《新闻通讯》（英文版），对外介绍中国抗日战争，争取国际支援，他那时就直接参与了中国的外宣工作。那时，一批富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外国朋友，相继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和战争前线采访，如斯诺、史沫特来、斯特朗等。爱泼斯坦1944年6月作为中外记者团的记者，突破国民党的封锁在陕北抗日根据地采访三个月，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震等领导人，写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新闻通讯。后来又出版了《突破封锁访延安》。这次陕北之

行对他走上中国革命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说，在延安“我看到中国的未来。当时我就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1947年他在美国出版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详细阐述中国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和战后中国面临的问题。直到1995年爱泼斯坦在他80诞辰茶话会上的答词中，依然深情地回忆起这段历史。他说：“我感到幸运的是，在这场斗争中我一直同中国人民在一起，并且在延安和解放区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他崇敬和缅怀中国革命前辈们为此做出的艰苦考验和巨大牺牲，“对这些考验和牺牲，不应该允许任何人加以缩小、轻蔑和玷污”。

新中国成立后，为突破帝国主义的舆论封锁，尽快开拓对外传播渠道，向世界介绍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以争取国际朋友对人民共和国的了解与支持，周总理与宋庆龄协商，筹办一本对外英文刊物，这就是外文局的《中国建设》（现名为《今日中国》）。为办好这份刊物，宋庆龄特别邀请当时在美国的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尽快返回中国参加刊物的筹备工作。1951年夏，这一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重新回到中国。《中国建设》于1952年创刊，爱泼斯坦担任执行编辑。1979年以后，爱泼斯坦担任《中国建设》的总编辑，1990年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建设》更名为《今日中国》，仍保留着原来的特色，适应改革发展拓展了报道的范围。直到2005年5月26日他90岁去世时，仍是这本杂志的名誉总编辑。他以中国为家，把这份杂志作为终生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

1957年爱泼斯坦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忠诚的中国公民和优秀党员，此后仍延续以“外国专家”的身份做着对外宣传和国际友人的工作。对此，直到1995年艾老80寿辰茶话会上致辞时，他仍然激情地说：“请允许我在这里公开宣布，我能成为革命前辈所创建的新中国的公民，感到无比自豪。”艾老平时谈话总是那样的平和，很少有这样的激动。爱泼斯坦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中

国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他说“是中国人民哺育了我，教育了我，并给了我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黄华在祝贺爱泼斯坦 80 诞辰的茶话会上的致辞中，称赞爱泼斯坦“不愧为坚贞的国际主义战士和忠诚的爱国主义公民”。

爱泼斯坦在华工作 70 多年，经历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历史时期，是中国对外宣传的开拓者之一，又是终生的实践者。他参加过中央重要文献以及《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香港《基本法》等的英译文定稿工作；1954 年他在朝鲜板门店采访报道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他深入我国各地采访，在他 80 诞辰时为他编辑出版了《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一书。特别需要提出的是，1955 年他首次沿着新建的川藏公路、艰难奔波了 12 天到达西藏采访，以后又三次踏上西藏高原深入采访，艾老四次深入西藏，最后一次是在 70 岁以后，1983 年出版了 20 多万字的《西藏的转变》一书，真实生动地记录了西藏的历史变迁，成为外国朋友系统了解西藏的权威性英文专著。

爱泼斯坦是一个真正懂得外宣的人，他以外宣为己任，为我国外宣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他不断写信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领导部门直言不讳地指出外宣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我到外文局不久，他写信向中央领导人反映对外书刊发行难的问题，反映应该向留学生赠送我外文刊物的问题；2000 年 7 月，他与林戊荪、沈苏儒联名写报告《呼吁重视对外宣传中的外语工作》。使我最难忘的是，1999 年 1 月，他给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 4300 多字（译成中文）的长信，经过详细调研，谈了他认为是“有关中国外文对外宣传书刊面临‘生死存亡’危机”的六个大问题，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设性意见。他说，应该“确认一条原则，即对外宣传是同国防与外交一样重要的事业，是维护国家利益所必需的”。在这封信发出以前，他把信的中文稿送给

我，征求我的意见，并让我转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赵启正主任征求意见。

艾老处处在介绍中国，他每次回美国或参与国际活动，总是借机介绍中国，回答各种疑虑，进行外宣调研；他非常尊重读者，重视文章的语言表达和技巧，语言简洁、幽默、含义深邃，力求达到最好效果；他以不倦的热情、丰富的经验、睿智和特有的见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懂得对外宣传的编辑记者和翻译人员。

我到外文局后经常向艾老请教，与他相处久了，他竟然叫我“老杨”。我说：“我是您的小学生，你来中国采访时，我还没有出生呢！”艾老有很深的外宣情结，每次会面，他总要谈到外宣，而且总有一些说不完的新见解。

我记得，我到外文局不久，为向艾老请教对外宣传与他做过一次长谈。他辩证地给我讲了几个“不可估计过高与过低”的关系。他说，不可把外国读者对中国的了解水平估计过高，他们对中国了解得很少，有的人并不太关心别国的事；不要把他们的觉悟估计过高，他们天天受到西方舆论的影响，很难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他们了解的是被歪曲了的中国形象；不要把他们的接受能力估计过高，不要以为他们什么都懂，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不如一个中国的中学生，是一个小学生；也不要认为我们讲过的事他们都懂，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总是抱有戒心，有些基本问题要反复讲；但不要把他们的思维能力估计过低，尽管他们对中国了解很少，觉悟不高，但他们自信很了解，而且有自己先入为主的看法，不容易改变。他们是小学生的水平、大学生的思维，不能像对待小学生那样对待他们。由此可以看出，艾老对西方读者的情况有深刻的了解分析。这次谈话是实事求是的，我们的对外宣传只有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才是从根本上加强了针对性，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我记得，艾老在具体谈到宣传的针对性时说，他在1947年出版

了他的第二本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我写作时，头脑中有两类读者。一类是同情或有可能同情中国革命的读者；另一类是某些国家的政府。我写给后一类人看，不是想使他们改变立场，那是不可能的。我只是想告诉他们，中国革命力量将胜利，阻碍他们是徒劳的，那只会增加你们自己的麻烦，你们必须认清这个事实。”他说，他在写《宋庆龄传》时，读者对象也是两种。这就告诉我们，对外宣传要有宏观的针对性，每篇文章、每本书又要具有具体的针对性，有明确目标和对象，多为读者着想，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艾老曾经四次踏上西藏高原深入采访，撰写了《西藏的转变》一书，成为外国朋友系统了解西藏的权威性英文专著。据说，他在第四次赴西藏以前阅读了几十本外国人写的关于西藏的书，为这次采访和写作的针对性做准备。1994年1月10日，我与艾老谈起西藏的对外宣传，他对我说，一部好书的影响是大的，一部坏书的影响也是大的。一位英国人早年写了一部歪曲西藏的书，竟成为至今西方人了解西藏的必读书，事先形成的看法是很难改变的。一部书横向影响一大片，纵向影响多少年，我们要很好地组织写几本西藏的好书，写几本中国的好书。谈到这里，我才更深刻地理解了当初艾老不辞辛劳去西藏采访的用心。艾老还谈到对俄罗斯记者奥契尼科夫写的西藏一书手稿的看法。他说：作者对写作比较在行，他懂得如何写得通俗，而又注入一些严肃的内容。“诚然，在某些方面，该书也没有按照我们的思路去写，但这没有关系。毕竟他是一名外国作者，而这点也正好是优点，他不是我们的新闻发言人。”艾老启示我们如何看待和对待外国记者（或外国人）报道中国，如何借用外国媒体来介绍中国。

我记得，一次谈到《今日中国》宋庆龄提倡的以事实报道为主的真实性报道传统。他说：“政策可能是策略性的，事实就是事实。”他谈到他写的那本关于西藏的书，由于封面上的那张布达拉宫的图版印

反了，西藏流亡者就攻击说：“这书怎么会说真话呢！他们连前、后、左、右都分不清。”他告诉我们，真实是包括细节和全部事实的真实，都马虎不得。

艾老时刻关注着外宣。1995年1月，新年刚过，他在5日、6日连续给我写了两封信，继续谈他在年前外文局专家招待会上没有谈完的推广发行的话题。那时，他的著作《宋庆龄传》刚出版不久，由此谈到图书对外推广发行问题。<sup>①</sup>艾老在5日的信中说：“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推广工作都是十分紧迫重要的，而在过去却未建立起推广体系。”“首先，必须确保我们的图书能进入到目前国外图书市场所通用的电脑图书目录。因为，国外书商只订购已列入电脑书目的图书。即便读者要求购书，书商也只能根据电脑书目所提供的书名、作者名等有关信息来供货。”另外，他多次强调书评对于图书推广的重要性，一本好的书，要有好的书评，我们要“免费赠样书，争取书评”。“例如，我们的一些学术性专业书，可以把样书寄给有关中国的学术通讯，征得书评。如果，我们的书质量好，就会得到书评，一次得到书评，今后就有可能得到更多的书评”。

艾老在6日给我的信中，竟然对外文局开办“零售书店”一事设想得那么具体周到。他建议在外文局办公大楼一层开一个“零售书店”，由于书店门开在侧街，可在办公楼“开一扇室内门，设一个或一些中英文醒目的标志，使进入正门的人一进门就能见到，告诉他们何处拐弯可以到达书店”。如果还不方便，“在外文局大楼前设一块用中英文书写的黄铜牌或者别的通告，字体要足够大，提醒人们我们有此书店并给出明确的路线，怎样拐弯可以到达。这一标志不需要搞得很复杂，

<sup>①</sup> 据何雁在《忆爱泼斯坦》一文中说：“宋庆龄在1975年5月给艾培的一封信中，嘱托在她身后为她作传。‘我只信任艾培来做这件事，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我’。”转引自《作家文摘》2010年4月13日。

只要给出我们组织的全名、书店名等就够了。或许只要告诉人们在拐弯处，诸如此类就够了。”艾老还就书店内中英文书籍的排列、设立新书专柜、举办出版发行仪式和作者签名日、旧书如何选取陈列、书店提供椅子让读者坐下来阅读，以及如何优惠打折、邮寄或送书上门等设想得非常具体，他特别强调如何突出外文书刊，更吸引外国读者，“因为我们是外文局”。依据艾老的建议，外文局调整了已有的书店；不久，外文局所属外文出版社在局办公楼一层开设了中外文图书零售点。从上述具体列举的两封信的部分内容，我们可以看出 80 多岁高龄的爱泼斯坦对外宣竟是如此熟知，更是如此倾心、如此呕心沥血。他把外宣事业当作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令我们这些后来人感奋不已。我说过：“似乎爱泼斯坦就是为我国的外宣而生。”

1995 年 1 月 30 日，中央外宣办主任曾建徽和我去向爱泼斯坦祝贺春节，他开门见山，直谈外宣。他说，《今日中国》要发展，最重要的是发行。要扩大读者，推广是很重要的，不要怕花钱。他说，搞对外宣传不要怕别人骂，要和他们说理，但不要每一件都辩论，要选用一些例子，说明事实真相。我们的宣传要有战略思想，尔后是策略问题。我们的宣传干部要说服别人，先要自己相信。宣传要讲客观，但客观要看到主流，要防止片面性。对少数民族问题的宣传，汉族同志写得多，少数民族同志写得少。而且一写少数民族，就是爱唱爱跳，好像是演员。要多请他们来写自己的生活，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的变化和发展。

艾老在谈到杂志的时效特点时说：“《今日中国》是月刊，从采编到翻译出版，二三个月后才能与读者见面，不那么快，这就要抓住时间性不强的东西。比如 1 月 30 日有这样的拜年活动，4 月份登出来有什么意思？假如我们谈的不是一般问题，即使三个月后看也很有意思。三天前的报纸，我不想看，但三年前的报纸有意思，我想看看，从中了解一件事的发展过程。”他主张对重大的问题要写通俗一些，大问题

不一定讲大话。相反，很轻的稿子，也应该有分量、有内容、有思想。艾老强调要研究情况和读者。他说，“我们自己的队伍要提高。以前是我们讲，人家在听课，现在是对话，我们要研究读者。现在参考资料很丰富，我主张一方面要看，一方面要评论，才能不断提高”。

1995年4月20日外文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祝贺艾老来华工作60周年暨诞辰80周年的茶话会，他在“答谢词”中说：“我多年来一直在对外宣传战线上工作，所以我想就对外宣传谈一点想法，供大家评论和参考。”他说西方传媒总是在攻击中国，“中国做什么都是错的，这成了现在一种时髦的风气”。对此，我们不必感到一种无谓的烦恼，“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做什么，不是别人在说我们什么”，而在于“我们自己怎样说，如果说的是合理和真实的（不要只是完美无缺），是会产生效果的。……只要我们做得对（如果做错了就改正），我们不必为所谓‘形象’过分担心。我们的工作是阐明我们的作为和信念，而不是像推销化妆品那样去抓住眼前的买主。我们当然不能对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制造的虚假‘形象’置之不理。我们不必去回答每一条谰言，而是要在根本问题上下功夫。我们必须突出我们的长处，并学会用新鲜活泼的手法去做，而不是翻来覆去老一套。对于确实存在的缺点，我们应该用实实在在的改正措施和取得的效果去说服人们。……尊重自己的人才能赢得别人的尊敬，相信自己的人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

与艾老相处多了，无话不谈。有一次，我谈到了一种社会现象：我国有某些企业家挣钱很容易，近几年就暴富，他们不知道这些钱如何花，有的挥霍无度，大吃大喝，坐豪华车，甚至嫖赌，这种现象很令人担忧。艾老解释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现象，但也不必要过分担心。在西方资本主义刚开始兴起的时期，也是这样，一些人像淘金一样，很快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他们的素质低，钱来得太容易，就恣意挥霍。这是一个历史阶段。后来，他们的素质提高了，视野开阔了，就不是

这样了，而是用于新发展、再投资。”

艾老晚年，总觉得有干不完的事，感到了时间的紧迫。他想起“那些为革命和建设奋斗的同志，许多感人的事总写不完”。在他 80 寿辰的茶话会上，他在答谢词中说：“我欠下了许多文债。在 70 岁生日时，我保证再写 3 本书。现在，10 年过去了，我只完成了 1 本。尽管这是一部重要的书——《宋庆龄传》，仍然是不够的。第二本我还只写了一半。这是一本回忆录，记录在这 80 年中我认为有意义的观感和经历。”为此，他公开向大家申明：“至于我个人的意愿——我要完成所有我认为对人民仍然有益的写作。因此，我要减少一些社会活动，在我完成写作任务之前，有不少会议和活动我将不能参加，在此我谨先致歉意。”

2003 年，爱泼斯坦又一次被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尽管年事已高，事情繁忙，在这以前又曾经动过癌症手术，他依然参加政协的会议和活动。他经常坐着轮椅出席，发表自己的见解，尽一个委员的职责。2003 年 3 月 7 日，艾老在十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讨论会上，谈到书刊重包装轻内容的现象。他说，有的刊物包装不错，比过去有很大改观，但内容并不那么好，犹如一位丑姑娘穿了一件不合适的漂亮花衣裳，内外并不协调。应该更注重内容，书刊质量的提高不要都落实在包装上。客观的报道，内容首先要准确。2005 年 3 月 8 日，在十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期间，新闻出版界为艾老和同界的沙搏理、陈必娣三位专家（都是外文局的专家）同时举办 90 华诞联欢活动，书法家邵华泽、沈鹏、苏士澍分别书写祝词相赠，表达对他们的尊重和敬意。

2004 年艾老又完成了《见证中国》一书，这是艾老的一部回忆录，是一位记者对中国革命和建设 80 年珍贵的历史见证。4 月 28 日在这部书的出版座谈会上，艾老高兴地说：“过去（外部）人们关注的是如何改变中国，现在人们关注的是中国如何改变世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问艾老下一步有什么写作打算。他说：“如果再给我 10

年的时间，我会再写一部著作。”2002年艾老患了结肠癌，“上帝”没有再给他时间。我记得，在2005年3月政协新闻出版界为艾老等祝寿时，艾老的夫人黄浣碧看到艾老那高兴的样子，却带有几分伤感地对我说：“这可能是艾老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了。”没想到，那竟是他出席的最后一次政协会议，5月26日艾老病逝，享年90岁。

爱泼斯坦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为中国对外宣传事业奋斗的一生，他以他的特殊视角和新闻记者的敏感见证了中国伟大的转折和发展，他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外宣经验、书籍和资料。艾老逝世以后，遵照他生前的意愿，把他的藏书、书稿6800余册和部分手稿捐赠给了清华大学，2008年10月18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了“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研究中心”，开始对他的一生进行系统的研究。中国外文局原局长、《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致辞说：“爱泼斯坦是中国新闻人的旗帜”，“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富”。

## 九 《政协提案的故事》丛书诞生记

2009年9月16日，在政协礼堂金厅举行了《情系国计民生——政协提案的故事》丛书首发式，如期完成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献礼的任务，受到了政协领导和与会者的好评。

《情系国计民生——政协提案的故事》(以下简称《故事》)是一套面向社会、面向国内外读者的故事丛书。编辑出版《故事》的意念是在一次编委会上正式提出来的。2009年春节前夕，《把握人民的意愿——全国政协提案及办理复文选》(以下简称《意愿》)编委会总结工作，研讨未来的改进意见。会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国

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意愿》编委会副主任蔡名照提出了一项建议。他说，自2002年开始，《意愿》已经连续出了7年，主要选登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而在提案形成的过程中，他们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案背后的故事更精彩。我们能不能出版一套《提案背后的故事》丛书，面向社会公众，面向市场发行，让读者更详细地了解委员和政协的工作。他的建议立即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得到了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李铁林的充分肯定。

他如何想到出版这套丛书，我不得而知。只是当他一提出“背后的故事”时，在场的人笑了，新世界出版社有人插话说：“我们的杨正泉老局长刚刚出了一本新书——《新闻背后的故事》（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很受欢迎，人们很想知道一些事件的内幕，知道产生的过程以及细节，这些更为真实动人。如果出版‘提案背后的故事’，我们出版社愿意承担。”蔡名照接着说：“写背后的故事，杨局长是内行。”我摇了摇头，摆了摆手。

事情也就到此为止。没有想到，春节过后不久，全国政协的杨凤文和新世界出版社的原总编辑周奎杰、编辑部主任张世林打电话给我，说是要来我家里征求对出版“提案背后的故事”的具体意见，在交谈的最后，杨凤文突然提出：“我们设想要成立一个编委会，请你担任主编。”我当时竟然没有回过味来，以为是顺口一说。等我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时，我立即说“不行，不行”！我的理由是年纪大了，已退居二线，精力不够、水平不高，难以胜任；我还有自己要做的一些事情。这时候，杨凤文才说，这是由政协有关部门研究定下来的，认为你合适。也知道你忙，特意配了两位执行主编，由他们做具体事，由你出主意、把关。我埋怨他们事前没有打招呼。杨凤文说，我们要事先打招呼，你就不叫我们来了。

不久，2009年2月18日，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发出了《故事》的《征稿通知》。通知中说，“为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联合中国外文局，将于国庆前夕共同编辑出版《情系国计民生——政协提案故事》丛书”。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由李铁林担任，副主任由蔡名照、王国卿、周明伟、杨正泉担任，主编为杨正泉。通知说：“丛书旨在通过约请提案者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记述提案前后的真实的故事，使广大读者真实感受人民政协提案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发挥的特有作用。丛书公开发行，并向各级政协推介。”

我后来得知，对于当初出版《故事》动议的“提案”，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和全国政协秘书长会议迅速做出了回应，明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0 周年为契机，开始编纂出版这套故事丛书，向“两个六十周年献礼”，并以此为开端继续做下去。明确《故事》的编辑思想是“通过遴选自政协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各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提案，约请提案者撰写文章，讲述有关提案背后的故事；通过提案形成及办理的来龙去脉，使读者了解人民政协特别是广大政协委员履职尽责、为国为民殚精竭虑之情，同时为各级政协提供一份鲜活，生动，可资借鉴的提案工作经验。”这就不难看出，《故事》与《意愿》既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的“姊妹篇”，而又各具不同的特色。

显然，编辑出版《故事》丛书是一项很有意义、很有特色的工作。“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大团结大联合的组织”，“民主、团结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两大主题”。（《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协工作的意见》）这就明确了人民政协的特点和委员的广泛性、群众性。回顾历史，先有全国人民政协，后有新中国。自有政协起，也就有了政协委员的提案。提案是政协委员履行职责最直接、最广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是反映社情民意、建言献策的重要渠道。政协委员来自各党派团体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他们之中不乏某些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实际工作者，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又与民众和社会有着广泛的密切的联系，是一座极其丰富的人才智能库。他们提出的提案围绕国家的大政方针，具有创见性，又与民众息息相关，体察民意，反映民情。据我所知，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重大的、有纪念意义的事项和国策，源自当年政协委员的提案，如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等44名委员联名提出的“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驻联合国代表”的提案等，产生过重大影响。每届政协都非常重视提案工作，迄今为止共有85000多件，反映和记录了共和国走过的历程，有着重要现实价值、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

编辑出版《故事》丛书，不愁资源匮乏，不愁没有高质量的文章。据我在政协的体会，委员们使命在身，提出提案是积极而慎重的。提案是建立在大量事实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每项提案从发现问题、确定题目到最后形成，是一个多方调查研究、反复思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掌握了大量的事实、大量的资料，其中不乏典型的事例和感人的故事，不乏他们经历的曲折坎坷和引发的创见。但提案的行文有特殊的要求和规范的格式，最后形成的提案都经过反复精选、提炼，不得不割舍掉大量丰富的素材、生动的故事、曲折的过程、有趣的细节，以及提案人触景生情的联想。现在决定出版的《故事》丛书的初衷，就是着重把那些提案背后的典型事实、典型事例和典型故事写出来，真实、鲜活、生动地记录提案形成的过程，广泛展现社情民意，公诸社会，面对市场，吸引读者，让读者更为真实、透明地了解政协和委员的工作，了解提案的来龙去脉，了解丰富多彩的社会实情，同时起着延伸、补充和诠释提案的作用。

5月6日，编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报立项过程，研究有关事项。

对《故事》的编辑出版，编委会做了精细的研究，力求有别于《意愿》，突出《故事》的鲜明特点，做成精品。为此，研究确定了几项原则：

1. 真实性。写真人真事，而且主要由提案人撰写，写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对于已经过世或不能动笔的提案者，或由知情人、他人代写，或派记者采访，重要的是把事实记录下来，以再现历史和提案形成的真实情况。

2. 历史性。政协已成立 60 年，从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号提案到今天，是一个相互联系、不断发展的过程，《故事》丛书应该保留它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记录历史，传承经验，启示未来；该丛书首先要涵盖 60 年人民政协不同历史时期的提案情况，稿件编排难以依据年限排序，稿件内容不以问题和界别分类，这样不仅方便编排，更有助于读者了解不同时期政协委员的工作，透视社会的方方面面，感受时代的变迁；《故事》丛书稿件内容与编排尽可能做到与时俱进，与提案基本同步，展现《故事》的现实性、时代性。

3. 故事性。丛书与提案不可分，但又不同于提案，不同于一般故事书，更不同于文学故事，也不同于政论性的书籍，它是以事实为基础的纪实性故事丛书；《故事》丛书定位于面向社会广大读者，面向市场发行，要增强可读性，吸引感染广大读者；《故事》丛书不请政协领导写序言，减少官方色彩——从这里，我感受到了编委会理念的开放性。

因此，编委会要求撰稿人依据《故事》的特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阔思路，秉笔直书；不同提案人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见解记述同一事件，保持最初的真实，多说并存；稿件着重记述典型的事例、曲折的过程和有趣的细节，抒发真情实感；力求生动活泼，规避业务性、学术性的研讨。

在这之前，已向委员发出 424 封约稿函，但只有很少一部分有回音，收到几篇稿件，一是委员忙，二是摸不清脉搏。如此状况，要为

60周年献礼，时间紧迫，难度很大，且有些具体问题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编辑主张只能先出一辑，举行首发式。我认为这不成规模，而且只要约稿中的三分之一应允，就能完成。我竭力主张首次出版三辑，关键是加紧约稿，加强编辑力量，与作者多沟通。编委会同意了这一意见，编辑出版就没有了后退的余地。约稿、编辑、设计工作的紧张可以想见，执行主编张世林在《编后赘语》中记述编辑们的辛勤付出。他说：“为了出版这三本书确使我苦不堪言，但也正如‘痛并快乐着’一样，我也深深地陶醉其中，并为自己能亲自参与这项工作而颇感自豪和骄傲。”<sup>①</sup>中间由李铁林主任召集进行过几次研讨，征求对书名的意见，我建议把最初提出的《情系国计民生——政协提案背后的故事》丛书中的“背后”二字取消。

《故事》如约出版发行。9月1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榕明、郑万通、厉无畏等与编委会成员、部分作者、有关部门和新闻记者出席了首发式。厉无畏在发言中指出：“《丛书》不仅时间跨度长，而且内容丰富、意义深远，既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共创伟业的真实写照，也为民主党派进一步履行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起到借鉴、参考和激励作用。”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故事》编委会主任李铁林发言中评价已出版的三辑“真实生动，可读性强”。他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运用故事的形式，通过丰富的事实和有趣的细节，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提案形成过程中提案者亲历、亲见、亲闻和真实情感”。

我认为，编辑出版《故事》丛书，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这只是个开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政协在提案在，就会有提案的故事，这是一项与时俱进、不断延伸的长期工作；《故事》有极其丰富、不竭的资源，有各界别素质高的作者队伍，一定会越办越精彩。

① 见《故事》第三册。

# 中西观念的碰撞与磨合



——再谈“99《财富》上海全球论坛”

按：我在《新闻背后的故事》一书中，写了“99《财富》全球论坛·上海纪实”一文，详细记载了这一论坛的全过程，但言犹未尽。《时代周刊总编辑眼中的中国》一文是我在2000年1月《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一篇发言，着重从宣传报道的角度谈了自己的认识。

1999年9月27日至29日，“99《财富》全球论坛·上海”（以下简称“《财富》上海论坛”）在上海举行。这是在我国第一次举办的全球性大型经济研讨活动，开得很成功，按照《财富》自己的说法，“是《财富》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标志着中国比以前又开放了一大步”。美国《财富》是时代华纳旗下一份很有权威性的经济杂志，《财富》论坛自创办以来到1998年已举办过四届，这次“《财富》上海论坛”是第五次，由《财富》主办，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协办，上海承办。我参与了论坛从筹备到举办的全过程，曾写过一篇文章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以下只是记载其中的某些镜头，以便在认识论坛中认识美国，认识国际会议举办的方式，认识我国的对外宣传。

## 一 双赢：寻求利益的结合点

首先，这次论坛能在中国举办，是一种双赢的结果。论坛召开的背景是，1998年年初，时代华纳集团首席执行官杰拉尔德·李文先生率团访华，他看好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下独自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李文产生了在上海办“1999年《财富》论坛”的想法，邀请全球商界的老总们共同探讨未来中国的发展和对世界的影响，进一步“开发中国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潜力”（《财富》语），并在中国一些地方搞一次时代华纳自己的新闻（观光）旅行。中国的市场对世界商业巨头很有吸引力，这些巨头也愿意借此机会了解中国，并与中国政府的官员、企业界和学者一起，共同寻求和扩展与中国进一步合作的机会。

这样的合作当然不会是只对一方有利，我国同意协办“《财富》上海论坛”，自有我国的打算。改革开放的中国极需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尤其是塑造中国的经济形象，扩大与世界高层的经济交往。通过举办这次论坛可以借用外力宣传中国，办我们自己难以办到的事。一是利用时代华纳手中的媒体客观报道中国。美国和西方社会充斥着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我国的对外宣传很难进入他们的主流社会，时代华纳既在中国举办活动，又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时代华纳所属的CNN、《时代周刊》、《财富》等几大媒体就不会像平时那样只做消极报道，而且对西方和世界有直接的影响力。二是利用他们的关系网把客人请进来，更便于这些企业家实地了解中国（并邀请他们参观北京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盛大阅兵和游行），同时时代华纳对西方人士又比较了解，确定论坛的议题、发言人和开会的方式，更适合他们的口味。三是借此机会扩大我国在全球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与美、日、欧等国经济界的联系与合作。四是开阔我国政府官员、学者和企

业界的视野，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总之，着眼于经济，又不限于经济；着眼于目前的利益，又看得更长远。就对外宣传而言，借论坛，借众多的境外记者，尤其是利用美国的主流媒体进一步向世界介绍中国，是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机会，显然举办论坛是双赢的局面。

我国领导人会见了李文，李文的想法很快得到我国政府的支持。经双方协商确定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未来50年”，副题为“东西方相会”，并把举办论坛的地点选在了中国最富有经济活力的城市上海。我们的方针是“热烈欢迎、积极协助、充分利用、扩大影响”。

笔者以为，这个世界既复杂又简单，都为“利益”二字所系，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当前利益、长远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各种各样的利益，但最高最根本的利益是国家利益。“利益”成为国际各种关系之间，尤其是国家关系之间沟通、交往、友谊的纽带。在国家交往中，只有对相互联系的双方（或各方）都有利的事，才有合作的基础，不能只对一方有利，更不能由一方的利益而损害他方的利益，除非推行霸权。遇事权衡利益的大小，一般而言，择其利大者而从之，在特殊情况下吃点亏亦可从之。我国在对外宣传和对外交往中，要收到预期的效果，在自己设想的主导下，应尽可能考虑到我与对方的共同关系和共同需要。只是主观需求的“一厢情愿”，是很难奏效的。

## 二 磨合：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协调

论坛的筹备工作是相互碰撞的过程，是相互协调的结果。筹备“《财富》上海论坛”的工作量大而繁杂，任何一项安排，不是哪一方说了算，都要中方与时代华纳（美方）共同商定。由于双方对一件事的理解不同，各自的要求不一样，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存在差异，协商过程中许多事情谈不拢，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要发生摩擦和碰撞，每一件事都

要经过多次磨合，中间不乏有许多的误解，有时也会将一些具体问题作为原则问题互不相让。“不打不相识，不打不成交”，在摩擦和碰撞中彼此才逐步重视了解对方，这实际是中方与美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一次碰撞与磨合。在一年多的筹备时间里，从论坛的主题到选题，从出席官员到代表人数和人选，从活动日程到新闻报道，从论坛场所到会场布置，总之，从整体设计到具体细节，从会场内到会场外，从中国到外国，甚至具体到领导人演讲时的灯光、会见时的座次、宴会的桌次、菜单、饮料和音乐等，每一项每一细节都要反复协商多次，处处需要磨合。

对待出现的各种分歧，我们曾经上纲到政治立场与政治观点的高度（那时又正在“三讲”期间），后来我们逐步觉察到是由于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不同造成的，这比较符合实际。例如，每次会谈，我们总是从宏观谈起，说明问题的重要性和意义，提出总体设想再谈具体安排，希望最后能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字协议，共同信守承诺，不准随意更改，然后分别去逐项安排落实，下次会谈时回顾检查，随后确定新的任务，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这是我们习惯了的一套对内对外的工作模式和思维定式，而且认定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具体、从整体到局部是一种最佳的工作模式，应该放之四海而皆行。

美方有自己的工作传统和思维定式，几乎与我们完全不同。概括起来是轻理论重实践，轻宏观重具体。美国人的谈判方式是从微观、从具体问题入手，先谈一项一项的具体安排、具体问题，拿不出全盘计划；遇到什么谈什么，什么急需谈什么，没有整体次序；定了的事情难以按时落实，定了的计划可以随时修改，没有的项目可以随时增加，他们提出的事又总是变来变去，朝令夕改，按照我们的思维方式是“说了不算数”，这种不确定性致使许多项目难以动手。按照他们的说法，把每一件事做好了也就都做好了，把一项一项的任务完成了整体任务

就完成了。经过反复沟通才觉察到，美国人与中国人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有着不同的思维习惯和工作方式，这是两国文化差异的反映。

中美两方相比较，可以看出一种倾向，我们更注重务虚和宏观思维，他们更重视务实和具体思维，各有千秋。由此，联系到美国的其他方面，到处都可以找到这种不同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的表现，这说明彼此之间的合作需要一个相互了解和适应的过程。美国人曾经幽默地说：“我们美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他们的解释是，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美国才只有 200 多年，相比较而言，可以忽略不计。我在美国访问时感到，我们中国人爱谈历史，美国人爱谈现在和未来，恐怕也与历史文化的差异有关。中国与美国和世界的有效沟通是一个逐步了解美国、了解外部世界的过程。让世界了解中国不容易，让中国了解世界也不容易，我们对世界了解得并不多。

### 三 经济：无法摆脱的政治

这次论坛不同于在我国召开的一般性的国际会议。“《财富》上海论坛”是一次大型经济活动，是世界企业界巨头的高级聚会，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世界的企业巨子，他们有很强大的经济实力，又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这是一次经济研讨会，但又不完全局限在经济范畴之内，经济与政治从来就是不可分的，从一开始就笼罩在政治的阴影里，当时正值科索沃战争、我国驻南使馆被炸和美国掀起的反华浪潮，是一个中美关系的多事之秋，这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尖锐化，更增加了其中政治的含量。论坛是否应该在中国举办一直受到美国媒体政治上的非议。

这是由美国时代华纳在我国主办的论坛，论坛议程主要应由他们来安排，我们只是协办，也就是为开好这一论坛提供必要的条件。但是，这次论坛却不同于《财富》以往举办的 4 次论坛，不仅是在中国召开，

而且首次确定讨论的核心议题以东道国为对象，研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并确定出席和参加论坛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企业界人士（包括港澳台），他们要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和大小研讨会上发言。实际上，我国既是协办者、参与者，又是这次论坛研讨的对象，各国参与者都可以在这个讲坛上对中国“品头论足”，媒体都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报道、发表议论，我们必须准备充分的应对措施，因此大大增加了我们“协办”准备工作的难度。

这次《财富》全球论坛是否应该在中国举办，一直受到美国媒体的非议，认为这是在讨好中国。从论坛的筹备到召开，美国一些媒体为削弱中国的影响力，竭尽挑拨和攻击之能事，他们的注意力从来就没有放在经济上，攻击的焦点一直是政治，什么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中国威胁论”等一些老掉牙的问题，旧调新弹，再加上一些新炮制的什么“政治献金案”、什么“技术盗窃案”等政治谣言，大肆炒作，把“论坛”冲淡，把经济冲淡，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其他方向，继续抹黑中国。纵观多年，这是美国媒体的惯用策略，在中美关系史上，每次遇到对美国不利的严重冲突，美国媒体或默不作声，或轻描淡写，或抓住枝节不放，而经常采用的策略是转移重点、转移视线。如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美国军用飞机撞毁我国飞机事件等，他们离开问题的真相而大谈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政治问题是难以调和的。科索沃战争刚刚爆发后，我们的一位“论坛”谈判“对手”从美国回到北京，平时我们处得不错，可谈及这场战争，彼此有着是“干涉内政”、还是“人道主义干涉”等截然不同的立场观点。

#### 四 简明：与国际的沟通

我们一般想象中的开幕式讲究隆重而热烈，要人出席，各方讲话，

念贺信，送花篮，一大套程序，说不完的恭维话。但“《财富》上海论坛”的开幕式却是一切从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令人难以置信。他们重内容而不那么重形式，按照我们常规所想象的一切都没有，甚至没有要员主持。主席台的正面被一个大屏幕占据，在主席台的一角放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时代华纳旗下《财富》杂志的一位主任编辑出来主持开幕式，三言两语过后，播映了克林顿总统的贺信，江泽民主席在前一天的宴会上做的主旨演讲，接着便开始了“全球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经济”的研讨。

参加论坛人数达到 802 人，分别来自世界 36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属于世界 500 强的企业号称 60 家（实为 57 家），超过参加《财富》前 4 届论坛的总和。“发言”也是别开生面。4 个人一组，围坐在大屏幕前的一张圆桌周围，时间限定在一个小时，每人发言限制在 5 分钟以内，迫使人们只能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说自己最想说的话，把另外 40 分钟的时间留给台下提问，进行讨论交流。这期间，主持人在台上台下走来走去，或对主讲人做背景介绍，或做简短评论，或请大家提问，或穿插几句幽默活跃会场气氛，他是那么轻松自如，会场上也是那么轻松。其间，人们进进出出。各个分会场更是进出自如。我们有些不习惯，但这是国际论坛、研讨会的通行做法。老总们的发言都不念稿子，都充满自信，都表现出诚恳真实，没有大话、空话。他们大谈经营之道，“向每一位顾客负责，才能做到向广大顾客负责”。他们的发言给人以强烈的感觉，国际化的公司要有国际化的胸襟和观念，要综观全局，这正是我国企业走向世界所缺乏的。

老总们在简短发言中不乏幽默，有意作秀。在开幕式的第一个演讲中，有三个小插曲是令人深思的。第一个是中国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他说海尔在创业之初，一批产品质量不合格，是销毁还是混进市场？他毫无迟疑地决定销毁。他说：“要敢于否定自己，要不断否定自己；

与其让别人打倒自己，不如自己打倒自己。”他举了一个例子，他把一批不合格的冰箱摆开，由他开始砸第一锤，职工受到强烈的震撼，哭了。后来，谁生产的产品贴上自己的名字，不合格者，自己砸。人们把“质量第一”永远记在了心里。

第二个还是这个张瑞敏，他在农村调查海尔洗衣机的销售情况时，发现好多农家用洗衣机洗红薯，随行者中有的埋怨农民素质低，可张瑞敏却想如何能生产一种洗衣机，既能洗衣又能洗红薯，不是更好吗？是让市场适应产品，还是让产品适应市场？后来这种“洗衣机”诞生了，果然销售很好。海尔采取市场链的方法，质量一环套一环。这也许就是海尔产品蜚声海内外的主要原因。

第三个是可口可乐的总裁巧妙推销商品。论坛严格禁止利用讲坛推销自己的产品、做广告。主席台上 4 位主讲人面前摆着 4 杯同样的橙汁，每一组的演讲都是这样。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道格拉斯·艾华士上台时，手里却拿着一瓶自己的产品可口可乐，“不经意”地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然后不事声张地把它拧开，倒入玻璃杯中，像喝而未喝，不易察觉地轻轻地放回到桌子上。细心人立即意识到，他是在推销。显然，这一细小动作是精心策划的，他们的商品推销意识非常强。还是这位总裁，在回答“可口可乐在中国的发展战略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用一句不能再简单的语言赢得了台下的喝彩：“让中国 12 亿人都喝上可口可乐！”

接下来，是其他各组的发言和回答问题，都有精彩的表现。这期间，人们进进出出，想听就听，想走就走，显得“没秩序”，台上不受影响，照讲。据了解情况的人说，这种论坛特色，也是一般国际会议的特色。我们不习惯、不适应，但要习惯、要适应。

## 五 媒体：观念与应对

在当今世界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开好一个论坛（会议）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首先把论坛（会议）开好，二是组织报道好，两好相得益彰，才是真正的好。只是把事情做好而没有报道好，就不会被外界认为是真好；而事情没有完全做好，但报道好了，反而被认为是好。“《财富》上海论坛”是国际性的经济论坛，提供了向世界展示和推介中国的机会，对它的报道主要是面向国外。

伴随“《财富》上海论坛”筹备过程，一直没有中断中国的声音，我国媒体一直跟踪报道，时代华纳手中的新闻媒体也不断传播有关中国正面的信息。论坛举办期间国内外 600 多名记者云集上海。这次论坛是在中国举办，研究探讨的是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我国媒体自然全力以赴地正面报道，“全国一盘棋”地报道好这件事。CNN 在上海建立了临时演播室，现场转播了江泽民主席的讲话，派出强大的记者、编辑和主持人团队，报道了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会见的消息，报道了论坛研讨的盛况，大量援引与会代表和知名人士的话，对中国未来 50 年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较为客观和乐观的评估，还播放了我国国庆 50 周年阅兵和群众游行的实况。西方主要通讯社、报刊、电台、电视台对论坛盛况和中国见闻等增加了正面报道。这都是过去少有的。

在世界 500 强和各国有代表性的大企业中，有的与我国的企业有合作关系，但大多数没有，有许多老板还从来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大地还是一片神秘的荒漠。请他们从实地观察和考察了解中国中得出自己关于中国的结论很重要，什么样的看法并不重要。主动请他们来，是我们自信的表现；他们能够来，就是收获。这一效果达到了。有的到上海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中国有那么大具有潜力与活力的市场，这无疑增加了他们对中国投资的兴趣和信心。

时代华纳董事会举办的“新闻旅行”，是从新疆的喀什开始的，经过武汉、宜昌，畅游三峡，在上海参加了论坛，到北京观看国庆 50 周年庆祝盛况，历时 10 天，横穿了中国大陆。他们有意地着重了解了我国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三峡工程、村民选举、计划生育等敏感问题，显然是一次有针对性的调查。《时代》杂志记者发表文章谈了自己的感想，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积极变革潮流，不是西方人所能阻挡的。

这都是成果，都是对外宣传，是包括媒体在内的“大外宣”。但是，也充斥着大量的不和谐之音。按照我们的常规理解，这次论坛是美国时代华纳要求到中国来开的，美国的媒体也应该是积极配合，至少不会有意找上门来惹麻烦，故意把关系弄僵；尤其是时代华纳自己的媒体，更不会给自己拆台。但美国媒体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而且出现了反常，借机挑拨和攻击。我们注意到，像美联社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在论坛筹办过程中就竭力阻止在中国上海举办，向时代华纳施加压力，说他们在中国举办论坛是“讨好中国”、“向中国屈服”，正面报道中国“有悖新闻、媒体行业的核心职业道德”。在论坛举办期间，他们对这一重大活动基本没有报道，似乎这一客观事实并不存在，却寻机在其他问题上诋毁中国的形象，转移对论坛的注意力。

就是时代华纳旗下的媒体，其表现也并不一致、不如一。他们一方面要做正面报道，表明自己确定在中国举办论坛的正确性，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要搞“平衡”报道，做给美国反华势力看，表明自己的独立性。如在论坛开始前，美国有的媒体嘲弄时代华纳“讨好中国，不讲人权”时，时代华纳提出要在论坛上讨论人权问题，我方以“违背论坛主题”为由予以否定；该集团所属媒体以所谓“新闻的公正性”，报道什么“中国人权问题”；在“6·4”10 周年前后 CNN 记者擅自采访了所谓中国“民运人士”，并播出了编制有当年镜头的电视专

题片，我们都及时进行了严正的交涉。针对 CNN 播出有“6·4”镜头的电视专题片，在论坛期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赵启正主任在上海会见 CNN 总裁特纳时就此事提出严肃批评，特纳信誓旦旦地表示以后不会再播放，事实上 CNN 在播出我国成立 50 周年庆祝游行的实况中又穿插了这一镜头。他们的承诺不可信。

对这些如何认识、如何应对，一直是我们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一般而论，大多是预料之中的事，不足为怪。就美国媒体而言，从根本上说，他们不是举国体制，媒体之间有着不同的商业利益，相互竞争激烈，各自在寻找民众的关注点，也就是卖点。他们对“论坛”表现出舆论的“不一律”，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声音，对时代华纳举办的活动也并不买账，他们会说“我们为什么配合它的活动，为什么给它去唱赞歌”？当然更不会因“论坛”在中国召开而对中国的攻击有所收敛，相反却找到了新的攻击点，故意唱反调与时代华纳和中国为难。不仅对中国，他们对谁都一样。但是，就特殊而言，会因为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思想观念、生活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因为对中国的不了解、误解和傲慢，更因为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攻击必然加剧。时代华纳究竟是美国中的一员，他们生活在美的环境中，信仰美国政治，维护美国的利益，可以因论坛召开在反华上暂时有所收敛，但绝不会改变。

我们对美国媒体的认识要符合美国的新闻观和美国媒体的实际，而不是以我们的新闻观和媒体的实际去权衡（我们却经常是这样做），承认差别，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分析，不然会产生误读。但是，对待美国媒体和媒体报道，我们要有自己的分析和把握，分清哪些是美国媒体正常的负面报道，哪些是存心恶意的攻击；是一般问题还是原则问题，是不理解还是有意挑衅？从冷静的客观的分析中准确地把握原则和策略，以决定恰当的应对方式，是不予理会、解释说明，还是进

行反驳？我们坚持密切观察、预防为主、沉着应付、坚持原则、方法灵活、处理得当、做好服务的原则，尽量争取有利于我国的报道。对一般性的负面报道，不看得那么重，不无限上纲，承认他们与我们之间在认识和新闻观上存在的差异，不必事事计较。但对于涉及我国利益的原则问题和攻击性的问题，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坚定慎重处理。论坛期间，尽管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由于把握及时、处置得当，避免了媒体的炒作，没有酿成负面的影响。

保证会议开好，这就是大局，这就是成功。对“论坛”期间美国和西方媒体出现的涉华报道，我们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多少年来，几乎全是负面报道，不可能指望他们有多大的改变，只要能逐步打破完全是负面的声音，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对中国的客观报道在逐步增加，这就是收获。从哲学的角度思考，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并没有增加，将来增加的只是客观报道，人们还会从他们的负面报道的事实中反思，这都有利于世界公众逐步地、客观地了解中国。举办论坛的实践，增强了我们对美国和外部世界的认识，增强了我们识别和应对美国与西方媒体的能力。

## 附：美国《时代》周刊总编辑眼中的中国

1998年时代华纳集团的总裁李文先生率团来华访问，他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文明开放，想在上海搞“1999年全球经济论坛”。江泽民主席会见了他，对他的想法表示支持。后来，确定这项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协办，负责总的组织联络工作，由上海承办。

与这一活动有关，1999年2月5日，江泽民主席在钓鱼台会见了美国时代华纳旗下的《时代周刊》总编辑诺曼·帕尔斯丁一行，并同他共进晚餐，时间长达3个多小时。

我们知道美国《时代周刊》的影响，它不仅在美国和西方世界很有名气，在世界上像这样有影响的周刊并不多，在我国的一些外资机构中大多订阅这本刊物。由刊及人，主观揣摩这位总编辑一定是见多识广。在这之前我对他却闻所未闻，就是见到他时，也对他估摸不足。那是在江主席会见他以前，我和他先在休息室聊天，他并不太善谈，学者风度，还有些拘谨，或者说是过于谨慎。他告诉我他是“第一次来中国”，他的拘谨可能与这有关系，过去他又过多地听到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心中无底，谨言慎行。他说，他这次是专门绕道香港来北京的，在香港住了两天，有意在进入中国大陆以前先在香港了解一些大陆的情况。

江泽民主席对这次会见很重视，后来演变成了一次接受采访，借此澄清了当时被美国舆论热炒了的一些问题。会见和晚餐共三个多小时，一直在亲切、轻松的气氛中。双方相互介绍个人的经历，谈家庭，谈历史，谈政治，谈经济，谈文学，当然，谈的最多的还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新变化，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我从旁观察，这位《时代周刊》的总编辑对这一会见，原先没有料到会给他这么长的时间，会谈及这么多的重要问题，他更多地看成了是一种礼节性会见。开始，他对谈话内容并没有做记录，也可能没有打算写文章，谈吐谨慎。帕尔斯丁受到了气氛的感染，中间他询问“这次谈话，可不可以报道？”得到江主席的肯定回答，他开始记录了，后来他主动地提出问题，才显示出他的思路清晰，反映敏捷。帕尔斯丁向江主席提问：“为了准确起见，有些要点是否请您再复述一遍？”江主席在重述要点时申明：“新闻报道只要不歪曲事实，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帕尔斯丁回去后写的报道《与江泽民共进晚餐》，他转述了江主席谈话中的突出问题和主要观点，但这是一篇典型的西式报道，委婉、含蓄、谈两面。为了说明问题，从中了解他们对

中国的看法和文章的写作、表达方式，我引用其中的一些话。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对中国的记忆始于 50 年前。坐在一台 10 英寸的电视机前，喝着牛奶，吃着抹着花生酱的三明治，正读三年级的我和几个最要好的小伙伴，既着迷又恐惧地观看了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进驻朝鲜的消息。那是 1950 年，是蒋介石率国民党流亡台湾、毛泽东率共产党接管中国的第二年。”

可以看出，西方人写文章大多是从“我”开始的，把自己摆进去，不做壁上观，外国读者也喜欢看这类与“我”有关的事，显得真实亲切，似乎一下子拉近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文章中也透露出，这位《时代周刊》总编辑——帕尔斯丁对中国的记忆和了解是多么的遥远。

这位总编辑对中国的发展变化知之甚微，但对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并不缺乏了解。他过去受到的关于“极大地丑化了毛泽东及其红色中国”报道的影响，那时他认为是对的。他说，可“就在我飞抵北京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共进了三个小时的晚餐之后，那些想法和情绪立即烟消云散了”。当然，长期积累下来的许多问题和看法是否能“烟消云散”得那么快和彻底，另当别论，至少是在他身上开始发生某些变化，客观地了解到某些问题。接下来的佐证是，他在文章中谈到中国的正面变化时，仍然不断地提出了他对中国所谓“镇压异见人士”、“武力威胁台湾”、计划生育等问题的“难以理解”。这也符合认识规律，不可能通过一次谈话、一次来访就解决他多年形成的困惑，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恐怕永远难以解开。他在这篇几千字长文章的最后所做出的结论性概括，是客观的，说实话的。他说：

“中国的发展方式不可能总令我们满意。不管多么坦率不讳，一次三小时的晚餐也无法回答一个人的全部问题。重要的是，我们要逐渐视中国为盟国，而不是对手。中国的经济越强大，对中美两国就越有利。”

应该说，一次会见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已经很不错了；他能够得出这样的看法，也已经很不错了。这符合他的实际，就是帕尔斯丁。

如何看待这篇文章，我们内部的认识并不一致。我最初看到时，也有不同的想法，直观感觉是引用江主席的话太少，这跟他事先送来请我们核对的引用语不成比例，而且文章中还含有对中国的负面的报道、认识和语言，觉得格调不高。冷静思考，忽然明白了，帕尔斯丁就是帕尔斯丁，《时代》杂志就是《时代》杂志，他有他的立场观点，他有他观察问题的角度，他有他的办刊宗旨，他有他的表达方式，我们不可能改变他。同时他生活在那个环境中，他需要包装自己。帕尔斯丁自己说过，美国的新闻传媒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是专门爱挑毛病的，一般不愿意为他人说好话，他们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为他说好话呢？可他这次还是说了好话，说得比较委婉。有位美国朋友看了帕尔斯丁的文章后说，美国的报道爱谈两面，求得平衡，如果只谈好的，读者认为你是在搞宣传。当然，笔者认为，谈两面并不是没有主次，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和倾向性，而是暗含其中。也许正因为这篇文章有这种特点，也就更容易吸引读者，效果也许更好。

此后不久，在召开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有意把帕尔斯丁这篇文章发放与会代表参阅，也想听听他们的见解，众说不一。我在这次会上谈了自己的见解。但不管如何，这终究是我们自己的看法。对外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外国人，我们宣传效果的

好与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应该由他们说了算，接受他们的客观检验。我们还是来看看对这篇文章的境外反应吧。

帕尔斯丁在后来写给江泽民主席的信中这样说：“一想到这段令人兴奋、深受启迪的会晤，我的心就不能平静。”他说，他这篇文章已在《时代》杂志国内版和所有的5份国际版上都刊登了。也就是说，有550万份杂志上都登了这篇文章，我猜测有3500万人在杂志上看到了这篇文章。”这是他的猜测，不会毫无根据。

不管这个数字的准确度如何，从笔者看到和听到的来自多方面的反应中也可以得到某些证实。在近期内笔者接触到几位美国朋友，他们都说读过这篇文章，都能谈出其中的内容，而且都是肯定的。美国凯旋公共关系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杜博思先生说：“这篇文章在讲述对江泽民主席的印象和中国的变化时，基调是积极的，写得比较好，印象深刻。这对美国和西方人士了解中国、改变过去不正确的看法很有帮助。当然，其中也并非全是好听的。”凯旋先驱公关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朱伟基解释说：西方媒体在报道时非常注意平衡，如果尽说好的，可信度就会很低。正面和负面的报道都很重要。帕文发表不久，美国之音电台的特邀评论员汤本先生在要求会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赵启正主任的传真件中也顺便提及该文，他说：“此文对中国改革、中国领导人予以正面介绍，文章显示出江先生的开明并具有开放意识，亦可显见公关、沟通对于美中关系是何等重要。”

香港报纸在一篇署名文章中这样说：“帕尔斯丁以近乎赞赏的口吻肯定江的领导个性和积极变化中的中国。这在美国媒体中极为罕见，而出现在《时代周刊》报道中更出乎意料。该刊物如此善意，充分显示江泽民努力改变美国公众对中国印象的公关战已初见成效。”

当然也会有主要是负面或完全负面的评论，那也是正常范围内的事。笔者设想，如果我们接待外宾来访，接待记者采访，如果我们的

对外宣传，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不应该一厢情愿地要求他们都是正面的报道，达到与我们一样的认识水平，甚至用一样的语言表达。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都符合我们的“要求”，其客观效果会如何？如果我们坚持这种“要求”，不能说明外界对中国不了解，而恰恰说明我们还不了解外部世界。



# 战争与宣传舆论



——从伊拉克战争看宣传舆论战<sup>①</sup>

## 一 宣传舆论是第二战场

伊拉克战争已成定局，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有了比较明晰的答案。从战争一开始，人们对美国军事上的胜利没有抱有怀疑，但认为它在政治上是失败的；它会赢得战争，但会失去道义和人心。如果说，美国赢得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它强大的宣传舆论，那么它的丢分也恰恰在于它宣传舆论的失当。在这场战争中，战争双方以及世界各种舆论都表现得非常充分，实践对以往的新闻宣传理论提出了种种挑战，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回答的新课题。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高形式。赢得战争胜利的基础是以经济、军事、技术为基础的综合实力，但直接取决于

<sup>①</sup> 2003年4月18日完稿，原载《对外宣传通讯》2003年第9期。

军事和舆论两个方面。现代战争实际上是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是军事战，二是宣传舆论战。在当今信息社会，宣传舆论对战争的胜负作用更为突出，也有着许多新的特点。

宣传舆论战被称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战争中一支具有强大“软杀伤力”的方面军。军事可以攻城夺地，则舆论攻心。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主张战争以攻心为上，也就是鼓舞自己的士气，分化瓦解敌军，制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舆论氛围，以助战争的胜利。“攻心”的主要武器是宣传舆论。在今天，没有宣传舆论的支持就难以打赢一场现代战争；在今天，谁不了解和不善于运用宣传舆论谁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军事家。“二战”时期的美国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舆论赢得战争，我从来都不把派驻到我司令部的记者们看作是编外军官。”一个聪敏的战争决策者总是在制定作战方案的同时制定宣传舆论的方略。宣传舆论一直伴随战争的始末，而且是始于战前止于战后，甚至在更长时期起作用。

笔者认为，伊拉克战争较之近几年任何战争中新闻媒体的参与率高、竞争性强、报道充分以及公开度和透明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也比以往更加重视心理战，宣传手法也更为全面和现代。各种媒体在竞争中充分表现自己，有关各种信息瞬间传遍世界，使局部战争与世界连在了一起，引起国际社会直接或间接地广泛参与，形成了不同观点的国际社会舆论。这是全球信息化的一种必然。今日世界已是一个以信息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整体。

## 二 战争报道的开放与控制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特殊形式，战时的舆论宣传不同于平时，一旦被纳入战争体制，即受到“战时新闻法”的管制。战争的各方比任何

时候都懂得媒体的重要，都需要媒体的支持，但战争的特殊性质也比任何时候对媒体控制严格。他们利用媒体，也必然控制媒体，期望宣传舆论能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把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利用和控制战时舆论，美国有着丰富的经验。美国在南北战争期间首次提出并确立了书报检查、新闻检查和战地采访许可证制度，成立了管制机构。但在越南战争中掌控松散，有些美国媒体做了如实公开报道，美国认为它“失败在宣传舆论上”。鉴于教训，它在1983年占领加勒比海的格林纳达时，拒绝记者采访，有的记者因报道而遭到逮捕。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对战争的报道采取了严格管理控制中的有限度放开，把主导权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它严格制定报道方针，严格选择随军报道单位和记者，严格制定新闻管理和审查制度，严格掌握报道口径，统一审定和发布消息，记者报道只能听任军方摆布，记者抱怨消息奇缺，电视没有战争的画面，“就连发射导弹的闪光也没有”。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吸取了以往战时宣传报道的教训和经验，为打赢这场宣传舆论战做了精心的准备，其特点是把大胆放开与严格控制相结合。

建立战时新闻管理和发布机构。美国是一个善于制造战争舆论的国家，它通过政府、军方和“利用”媒体控制新闻来源引导舆论。美国媒体、政府和公众之间有着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和各自利益的不同性。对伊拉克实行军事打击以前，政府和主流媒体早就在为这一战争行动寻找“理由”。美国把“战略影响办公室”改名为“全球宣传办公室”，用于对伊战争宣传，散布萨达姆与恐怖主义和“基地”组织有关系，罗织萨达姆的种种暴行和罪行。战时的主要新闻来源在政府和军方手里。在军方，美国为伊拉克战争设立了中央司令部新闻中心，掌握战时的新闻资源和新闻发布权，并由中央司令部司令四星上将弗兰克斯直接掌管新闻发布会（在过去战争中的新闻发布官也是由军事将领担

任)。这位将军一手握剑,一手拿笔,集文武于一身、军事与舆论为一体。什么时候发布新闻,发布什么样的新闻,其主动权和导向都由他说了算。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提问规定了“三不准政策”,而美国记者却享受特权,被安排在显著位置,并给予更多的提问机会,以有利于阐述美国的意图。

严格制定战时新闻管理制度。五角大楼为战地记者规定了“六大守则”,其主要内容有:要得到军队指挥官批准才能发布正在进行战斗的消息;用笼统的语言发布常规战斗结束时间、地点和结果;不在战斗进行时报道盟军的作战行动和部署的具体消息;不报道军方出于作战安全考虑而禁发的消息;不发布未来作战、推迟或取消作战的消息;在作战环境中须请示军队指挥官才能使用电子通讯设备等。具体列举了14项允许报道内容和28项禁止报道内容。五角大楼还为新闻中心记者规定了“三不准政策”:“第一,不能问美军和联军伤亡的情况;第二,不能问与目前正在举行的军事行动有关的问题;第三,不能问与今后军事行动计划有关的问题。”

这次美国首次邀请记者登上航空母舰采访(其中有中国记者),在发给记者的《战地手册》中规定,对伤员和战死的军人以及敏感和机密信息等都不得报道。手册上写道:“为了美军和随军记者的安全,记者必须遵守战地守则。违反战地守则将导致立即终止随军的后果。”另外,记者要与美方签订“生死状”和“君子协定”,在战场上发生受伤、死亡和财产损失,美国政府概不负责。可以看出这层层“不准”之外,还有多少报道的余地?

控制新闻源头,掌握舆论主导权。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五角大楼批准200多家媒体的600多名记者进行战地采访,而且邀请记者登上航空母舰采访。据说,这是美国对外战争史上的第一次,由此树立了美国战时报道公开透明的形象。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外松内紧”、“宽

严结合”的策略。其主要手法是五角大楼通过精心选择和安排前线记者（甚至是安插记者），通过控制第一手资料掌控舆论引导的主导权。他们以支持还是反对战争对媒体和记者划线，把随军采访的记者分为几类，对不支持战争的大多数记者不发特许证，使他们随军但无法接近前线，只能报道军事行动的前期活动或后勤活动。真正能够在前线采访的记者只有他们信得过的几家，能得到这种“殊荣”的自然首选美国的主流媒体和记者，又以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福克斯电视（FOX）为先，我新华社没有前线记者名额，就连盟军英国的BBC等也不能与美国媒体平起平坐。所有的进攻部队中都有CNN的记者，美军为CNN采访提供方便。他们通过控制新闻源头，实行新闻垄断，许多外国记者只能从新闻发布会或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和电视画面中选取被过滤的消息。记者对这种不平等的竞争忿忿不平却又无奈，质疑“这种报道有多大的客观真实性”？他们同时掌控着新闻发布会的新闻资源。对此，美国新闻中心主任亨德里斯毫不掩饰地说，因为“这是我们的战争”。有人说，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跟着美国转。各国媒体的报道，弄不好会成为美国舆论的“转播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主持人唐·拉瑟说：“新闻学教授对学生说，‘不要干预你所报道的事件’，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说法实际上是错误的。”

不仅如此，2003年3月16日拉美社据《纽约时报》报道，五角大楼做出决定，对那些写出有利于美国政策文章的记者，将会得到美国政府一笔不菲的“润笔费”。他们还派出文职官员用金钱收买随军的外国记者为美国说好话。而对“不听话”的记者或媒体则实行严厉制裁。在阿富汗战争中，由于美国之音不听国务院的警告播出了访问塔里班领导人奥马尔的录音，台长惠特沃恩和主管局长康尼夫被撤职。伊拉克战争开始不久，就有多名记者被吊销采访证，取消了随军采访资格，半岛电视台驻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两名记者被吊销采访执照。美国连自

己的记者也不放过，有两名美国记者被驱逐，原因是“他们报道了不利于美军的消息”。

进行严格的新闻审查。战时新闻审查是各国通行的做法，主要是为了防止泄露军事秘密，但美国扩大了这种做法。1989年12月，美国罗织罪名出兵巴拿马把总统诺列加逮捕时，即使对他们严格选出的记者，也只能报道官方通报的情况。在阿富汗战争开始时，五角大楼不允许记者采访，并封锁了一切可能“泄露消息”的渠道，警告一旦谁违背规定将受到严厉的惩处；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手下人威胁说：如果走漏了一丝一毫的敏感消息，他们就会为此而坐牢。对此，一向信息灵通和标榜独立的美国新闻界，在对阿富汗空袭几个小时后，才从国防部部长那里得到一点消息。阿战期间，设在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播放了本·拉登的讲话录音，美国主流媒体也进行了报道，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打电话给美国各电视台老板，要他们在报道本·拉登及其有关言论时“表明立场”（也就是要有自己的观点，要有分析批判）。各老板心领神会。

伊拉克战争中，对于新闻检查记者不敢稍有违抗，动辄被扣发采访证，内容被删除，胶卷被曝光，记者被取消采访资格，甚至被扣留。开始打击伊拉克不久，凤凰卫视的两名记者魄静和肖燕无意拍照了一般镜头，就被从随军记者名单中“请”了出去，10天之后才说是有误，又予以恢复。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资深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被开除一事。他是几十年的战地记者，在报道越南战争中获普利策新闻奖，他首先报道海湾战争打响而使CNN成名。3月31日他在接受伊拉克电视台采访时说：“由于遭到伊拉克抵抗，（美国）初步作战计划已经失败，他们显然没有料到伊拉克军的抵抗如此顽强。”这话惹恼了美国政府，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以“不应在伊拉克的电视节目中发表个人观点和意见”为由解聘了他，而持反战观点的英国《每日镜报》

接着聘任了他，一时成为很有戏剧性的新闻。新闻报道的放开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五角大楼的官员后来感到有些失策。

### 三 未能“正名”出师不利

“师出有名”、“名正言顺”，这一中国古训同样适用于现代战争。打仗，总要找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理由，这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常识。“师出有名”的正义之师，才能凝聚力量、鼓舞士气、震慑敌人，也才能“得道多助”。中国古时候打仗总要发一篇讨伐檄文，最著名的是唐朝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外国也是这样，战争发起者都说自己是以正义之师讨伐无道。英国《金融时报》在谈到 80 多年前英国军队司令斯坦利·莫德中将远征伊拉克时说：“我们的军队不是作为征服者或者敌人踏上你们国土的，我们是解放者。”当年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攻波兰时发表讲话说：“波兰已经发布了总动员令，这是恐怖主义死灰复燃。为了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决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日本侵略中国打的是“东亚共荣”。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海湾战争前做演讲说：“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征服伊拉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解放科威特。”克林顿总统为打击南联盟提出一个“人道主义干涉”。美国总统小布什在进攻伊拉克前的 3 月 19 日发表电视讲话说：“我们在伊拉克没有野心，只想铲除威胁，重新让这里的人民管理自己的国家。”我所以引用这么多的讲话，是觉得它们之间虽跨越时空，却是如此的相似。

应该说布什总统真的很重视“名分”，很重视联合国“授权”这块招牌，不像科索沃战争时那样直接绕开联合国。为此他反复申明萨达姆与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有联系，暗中支持了“9·11”恐怖事件；伊拉克违背联合国决议，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因此锁定推翻萨达姆、解除伊拉克武装、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战争目标。但由于

他出言无据，且违背联合国政治和平解决的决议，许多国家认为其背后另有他图，所以一直未能得到联合国的批准。最后布什总统下决心抛开联合国，上演了一幕“狼吃小羊”的悲剧。尽管美国精心策划有利于自己的宣传舆论，但立名是立论之本，由于“名不正言不顺”，遭到100多个国家的反对，从战争一开始就在道义和舆论上丢了分。

有人说，丢分又将如何？美国和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制造了一个“万人坑”事件，作为他们发动战争、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依据，后来证明根本没有那么回事，但已经是明日黄花，于事无补。这次美国又制造了“莫须有”的依据，如果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又将奈何？有道是“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纵观世界历史，君不见哪有千年强盛不衰的帝国？

2001年美国“9·11”事件的发生，我认为，是美国开始走下坡路的标志。它不仅说明了美国并不是强大到无懈可击，而且攻击直接进入到美国的心脏地带；这一事件，向外部暴露了美国的弱点，开始改变对美国的看法；这一事件，动摇了美国人的自信心，这是最可怕的，致使后来畏惧“恐怖”而草木皆兵。这一切，改变了美国强大而不可战胜的形象。

#### 四 特殊时期的“特殊报道”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的手段，战时是一个特殊时期，战时新闻宣传也以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交战各方都制定自己的宣传战略和管理措施。战时报道似乎打破了一切常规，一些被公认的新闻基本原则都变了形，真真假假，是非非，反而使人觉得这不仅合乎战情，而且是军事家的一种睿智；它利用了人们急于想知道真情又难以知道的需求，各种谣传、猜测和议论混杂在一起，满足了人们的一种“战时心态”。

对于战时宣传的特殊性，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有过精辟论述，孙子的“兵不厌诈”已成为古今中外的用兵之道，也成为战时舆论宣传的信条。这种在平时为人所不齿的舆论欺诈，却成为战时报道可以容忍的一个特点而屡用不疲。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指出，宣传战就是靠信息的传播而使敌人陷于被动并产生错觉。

谎报军情。军事报道很难令人置信。在英国殖民战争时，英国作家吉卜林说：“战争的第一个牺牲者就是事实。”谎报军情，古已有之，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招致杀身之祸。但历史的教训并不是都有启迪作用。《参考消息》驻伊斯兰堡记者刘洪在《真假难辨阿富汗》一文中说：“阿富汗战场鏖战急，有关战事的报道也是铺天盖地。许多消息乍看上去，似乎都有根有据，言之凿凿，让你不由得不信。但互相对照后就不难发现，许多消息是前后矛盾，真假难辨，时常让你如坠五里雾中，浑浑然不知东南西北。”伊拉克战争有过之，甲方说取得重大胜利，乙方也说取得重大胜利；甲方说攻下了某地，乙方说是“战略转移”；甲方说某军已经投降，乙方声明正在顽强抵抗；甲说有则乙说无，乙说有则甲说无，都信誓旦旦。这种相互矛盾的报道竟同时出自同一媒体，令受众不知所云。

在我国解放战争中，毛泽东要求新闻报道对每一次取得的战果都要认真核实，一个人、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可虚报。现代高科技战争、远距离打击，客观上给核查带来了困难，但战争双方有意夸大战果完全是出于一种需要。3月20日，美英打击伊拉克刚刚开始，就传出在“斩首行动”中萨达姆已被炸伤、炸死（这是最具杀伤力的心理战），萨达姆的长子乌代被炸死，萨达姆的高官同僚不死既伤，被描绘得活灵活现。伊拉克电视台用播出萨达姆录像讲话反击，美国媒体怀疑他是替身，进行对照验证后承认萨达姆还活着；美国报道说守卫巴士拉的伊拉克51师师长哈立德率众8000多人集体投降，巴士拉已

经被联军攻陷，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播出了采访 51 师师长哈立德的录像讲话，说他们正在英勇顽强地抵抗。事实证明，十几天之后巴士拉仍在伊拉克人的手里。这种荒唐事多得不胜枚举，至于谁打死打伤或俘虏多少人、攻占了什么地方、缴获了多少武器装备、谁打下了几架飞机，更是漏洞百出。信谁？事实只有一个，甚至都不是事实。

制造谎言。新闻报道是以诚信赢得公众，似乎战时报道是个例外。一百多年前，俾斯麦就曾经指出：“大选前、战争中、胜利后是谎言最多的时候。”有人说，战争的宣传报道“是为胜利而说谎”。这种人为地制造谎言、假象是战争的需要，也是战时舆论的特点。事实与谎言交替充斥于报道之中，古今中外，都不乏实例。一部《三国演义》中比比皆是，如借东风、空城计、死诸葛吓退活司马、“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等。我曾经在《读者》上看到一篇“奖赏欺骗”的文章，列举了公元前 12 世纪，希腊联军远征小亚细亚半岛上的特洛伊城的特洛伊木马的故事，公元前 340 年孙膑和田忌率齐军用每天减少灶头的办法战胜魏军庞涓的故事，1812 年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增设篝火战胜拿破仑的故事等等。作者说“欺骗在军事斗争中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受到鼓励和奖励的”。究其原因，客观上战争本来就虚虚实实，瞬息万变，难以准确把握；战争充满“诱惑”和猜疑，谎言和谣传成为战争的孪生兄弟，人们容易接受；记者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和战争全局，有的只是道听途说；主观上是战争双双有意隐瞒真相、造假象，有的记者甚至有意制造“独家新闻”。说到底，战争就是战争，为赢得胜利“兵不厌诈”是也。

在海湾战争中，美国伟达公共关系顾问有限公司与科威特驻美国大使的女儿一起杜撰了一部片子：一个女孩流着眼泪诉说，她看到伊拉克士兵把新生儿从暖箱里拉出来，放在冰凉的地板上冻死。伟达公司让 700 多家电视台播放了这部片子，观众大为吃惊，激起公愤。战

争结束后，目击者揭露了这个完全虚构的故事，美国将军却辩解说：“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不真实。但是，我认为，最后这一点并不重要。”他如此轻描淡写，难怪有人幽默地说：“在战争时期不重视欺骗就是一种疏忽，怀疑谎言是反常，说明真相是犯法。”

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制造了“万人坑”事件，制造了“阿族领导人鲁戈瓦被塞族军方杀害”的谎言。伊拉克战争中的谎言比比皆是。美国媒体多次报道萨达姆之死，伊军投降，英国电视台 25 日报道巴士拉爆发反对萨达姆的起义等。而伊拉克也不甘示弱，以谎言对谎言，新闻部部长萨哈夫矢口否认美军占领了国际机场，声言已经被打退；萨哈夫多次摆出巴格达决战的气势，美军却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开进了巴格达，记者已听到坦克隆隆开过的声音，萨哈夫依然否认，而且说：“美国人已陷入陷阱，我发誓，他们已经上了圈套。”否定事实也是制造谎言。萨哈夫对美国宣布的任何战果都予以否认，被人称为“否认先生”。但令人奇怪的是，萨哈夫却没有给人留下憎恶，相反却有一个不错的名声，成为世人瞩目的新闻人物。

隐瞒真相。这完全是有意的行为。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战争期间，真相如此宝贵，以至必须用谎言加以保护。”违反“客观”、“平衡”的报道原则，也是一种“说谎”。

美国当权者对战争报道最怕三件事：一是战争的真相如何？二是自己的士兵伤亡多少？三是平民的伤亡多少？最怕的事也就是最想隐瞒的事。美国人民一向又过于相信自己的媒体，这也是信息时代的一种悲哀。从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国媒体都在隐瞒战争的真实目的。因为人民一旦了解了事实真相，就会动摇美国当权者发动战争的基础。在越南战争时，美国人民总以为美军是正义之师，战争进展顺利。直到 1972 年，发表了一张几乎被燃烧弹烧死的越南女孩的照片，她赤身裸体绝望地哭喊着，这才唤起了美国人民的良知，激起他们的

反战情绪。

有人说过“战争就是杀人”，而美国打仗最怕自己死人。为了迎合公众的心理，美国领导人信誓旦旦地向公众许愿“零伤亡”。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只有靠封锁消息欺骗民众。笔者收看CNN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他们天天制造美军胜利挺进的假象，美英军队长驱直入，快速推进，伊军望风逃窜；战斗中只死敌人，美国兵都安然无恙；轰炸中不伤害平民百姓，反而是人民手捧鲜花欢迎；美军在分发食品，向儿童散发糖果，一派“军民友好”的和平景象（美国人不知道他们已进行了多少次的轰炸）；伊拉克人民对萨达姆恨之入骨，把他的像推倒，朝他的头上开枪，欢迎美军的解放。他们以此种种赢得美国人民对“正义之师”的支持率。他们对战争的残酷，对伊拉克人民生命财产遭受的巨大灾难轻描淡写，甚至根本不做报道。

但他们不讲有人讲。伊拉克也不示弱，专拿战俘做文章，找美国的痛处打，不断公布打死打伤美国士兵的人数，其他媒体纷纷转载。半岛电视台接连不断地报道联军的伤亡、伊拉克平民被炸的惨状、世界反战。美国人民从外来的报道中知道了美军死亡、被俘的消息，有的认出了自己的亲人，向布什讨还她的儿子。布什当然明白，事实一旦败露，就难以收拾，他怒斥伊拉克违背《日内瓦公约》。其实，他又何尝不是这样做的呢？

明显的倾向性。以上几种反常表现，都说明了媒体的倾向性。人们奇怪的是，一向与政府吵吵闹闹、标榜“独立”、“自由”的美国主流媒体，在对外战争中总是“很乖”，毫不迟疑地与政府站在一起，表现出不寻常的爱国热情。外电报道，美国媒体为发动对伊拉克战争造势，似乎公众支持战争的积极性高得不得了。这倒使人觉得，平时的吵吵闹闹却是为了关键时刻的有效一致。这不是偶然的。远的不说，如在科索沃战争中，在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出事后，在遭受“9·11”

打击时，在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时，甚至在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和美国侦察机撞击我军用飞机时，他们始终与政府唱一个调子，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结。

这不难看出，在“独立”的美国媒体背后总有一只手控制着。CNN 报道了阿富汗平民被炸的景象，白宫悄悄提醒这家电视台“炸死平民的画面太多了”，CNN 的领导马上贴出内部通知要记者注意“不要过分强调阿富汗的平民受害和战争不可避免的残酷性”，并引导说“美国的军事行动是对屠杀近 5000 人的恐怖事件进行的还击”，为报道定调。对伊拉克战争如何报道，美国政府和媒体老板都有明确的交代，比如不让播放本国战俘图像。事实上美国媒体也并非是被动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丹·拉瑟在电视节目中就明确表示愿为国家效力。自打击伊拉克以来，美国主流媒体的所作所为，世界有目共睹，他们“几乎每天播放士兵表达战斗决心的图像”。他们过多地融进了自己的倾向和情感，失去了准确、客观、公正，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其价值取向毫无遮掩。有人说，“我不喜欢 CNN，因为这是美国人的观念”。世界舆论指责说，“美国媒体似乎只关注美英联军的战事进展情况和他们在战场上的胜利”。“美国媒体已成为美国战争的一部分”，“是政府的‘托’”。有的美国舆论提醒自己的民众“不要阅读该死的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主流媒体用他们的新闻实践反驳了他们用心呵护的新闻理论。

综上所述，美国拥有世界级媒体，拥有各种媒体的“航空母舰”，但并没有在这次的宣传战中占上风，美国人自己也承认“我们在新闻战线上打了个大败仗”。伊拉克媒体最初赢得了同情，但后来却发现多是骗局。最得分的是交战双方之外的“第三种”媒体。这种事实说明和验证了什么？一是验证了毛泽东“两杆子”的论断是至理名言；二是验证了战时新闻宣传虽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但它同样不能违背新

闻舆论的基本理论和规律；三是验证了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正确性，而资产阶级标榜的“新闻自由”和“客观公正”受到质疑，毫无遮拦地还原其本来面目，这也许是当事者始料不及的。

## 五 空前的心理战

心理战是与军事较量并行的政治攻势，是“攻心”策反的强有力武器。古代最典型成功事例是尽人皆知的“四面楚歌”。汉军一曲楚歌“吹”散了项羽千军万马，使一代盖世英雄“霸王别姬”。近代心理战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时被广泛运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运用心理战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现代心理战与过去不同的是，高科技含量提高，手段也更加多样。

美国打心理战有专门部队，有强大的宣传机器，有的是钱和技术，又有自己成功的经验，1991年海湾战争中曾经成功策反8万多人。这次“打伊倒萨”心理战，比美国历次对外战争做得都大。美国这样做是出于对伊拉克形势的分析判断。他们认为伊拉克人民对萨达姆的长期残暴统治早已恨之入骨，他们长期生活在饥饿贫困之中，早已不堪忍受，盼美军解放如大旱望云霓。只要美国高举“解放伊拉克”、给予“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旗帜，登高一呼，伊拉克士兵和人民就会揭竿而起，反戈一击。这岂不是取得胜利又快又好的办法？

广义地说，美国的“斩首行动”和“震慑轰炸”既是军事策略，也是心理战。狭义说，心理战的核心是攻心策反。美国想了不少的办法，各种手法并用。一是利用强大的媒体。在当代，媒体自然是心理战中的主角。除了日常宣传，美国早就调整和开办了专门对着伊拉克和阿拉伯地区的广播和电视，战时把广播、电视设备安装在车上流动播音，为收听方便空投了40多万台收音机。二是散发传单。战争开始没几天，

在伊拉克上空散发了 2500 多万份传单，整个伊拉克平均人手一份还多。三是利用阵地喊话，要伊拉克士兵停止抵抗，放下武器投降。有人开玩笑说，“这是跟我国学的，是人民解放军当年瓦解敌军的做法”。四是大棒与胡萝卜并用。一边轰炸、开枪开炮，一边高喊人道主义援助和许诺战后重建，亦打亦拉。五是“典型示范”。反复播放举白旗投降、鲜花欢迎、散发食品医药和“军民一起”的镜头等。但收效并不理想和持久，伊拉克人民要的是和平和国家独立。一位英国士兵接受采访时说：“没有想到会遭到这么顽强的抵抗。他们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

宣传战与反宣传战并行。美国心理战的另一手是破坏伊拉克的宣传机器，削弱敌对舆论。在科索沃战争时他们就反复轰炸南联盟的电台、电视台，对伊拉克也不例外。2003 年 3 月 26 日，美国在袭击伊拉克国家电视台时，有针对性地使用了一枚专门破坏电子设备的炸弹，大楼遭到严重破坏，电视播出中断 45 分钟。尽管大赦国际人权组织发表声明说“电视台是一个民用设施，是受到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保护的”，轰炸是违背《日内瓦公约》的。可这对美国又有什么用？不几天又炸了大家熟悉的伊拉克新闻中心大楼，好多媒体都以它为背景进行过电视直播。就在被炸的前一天，中央电视台记者水均益还在那里报道过巴格达的战况。

伊拉克电视台被炸是意料中的事，是迟早的事。伊拉克也在打心理战，电视台不断让萨达姆出面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不仅戳穿了“萨达姆被炸伤、炸死”的谣传，而且鼓舞着伊拉克军民的士气；它经常播出战争的残酷、平民的死伤、伊军的顽强抵抗；最不能令布什容忍的是竟敢播放被俘美军的录像，以至世界许多国家的电视台、尤其是半岛电视台反复播放，就连美国的一些电视台也不顾不许播放的指令，跃跃欲试。美国政要当然明白它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指责它们违背《日内瓦公约》，布什总统以战犯相要挟。美国把伊电视台和新闻大楼为自

己宣传作为被轰炸的“理由”，是难以自圆其说的，难道“只许州官放火”？而且有人揭露美国早就播出了伊拉克战俘的录像，有的还打着白旗。

## 六 战争与媒体

有人说，媒体是欢迎战争的，它们“惟恐天下不乱”。因为战争时期媒体的收视率大增，会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可以发“战争财”。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战争是媒体激烈竞争的战场，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的潜力和威力，影响或改变着受众对战争的态度，尤其是电视；媒体报道了战争，也塑造着自己的形象。

战争成就媒体。1991年的海湾战争成就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CNN，因直播和全方位报道海湾战争而名声大噪，一跃成为世界级媒体。

2001年“9·11”突发事件成就了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因为我们能直接看到），它的全天候现场直播，至少吸引了几亿中国观众和海外华人华侨，使他们目睹了世贸大楼被炸时惊心动魄的场景和抢救死伤人员的全过程。

2001年10月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军事打击和追捕本·拉登，成就了不为人知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这个成立于1996年的电视台以首家直播阿富汗遭到空袭的画面，独家采访播放了本·拉登讲话录像和阿富汗战争新闻，成为世界瞩目的电视台，连美国总统布什和政府要员都刮目相看。布什要他的阁僚们想方设法挤进半岛电视台接受采访，以扩大美国对阿拉伯地区和世界舆论的影响。

这次美英联军打击伊拉克，半岛电视台又赢得了较好声誉。它派出了30多名记者深入到伊拉克各个城市做现场报道，采访报道了伊

拉克 51 师师长、被击落的“阿帕奇”直升机、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和反美反战舆论等，尤其在 3 月 23 日播放了美国士兵被击毙、被俘虏的图像，引起美国人民强烈的反应和布什总统的严重警告。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有地利人和的优势，报道又比较超脱，不仅吸引着广大观众，而且成为其他媒体的新闻源之一，打破了美国媒体新闻资源的垄断和封锁。

半岛电视台也给自己惹来不少麻烦。“9·11”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对它的报道表示过“担忧”，布什总统直截了当地敦促卡塔尔埃米尔“管好半岛电视台的舌头”。阿富汗战争中它驻喀布尔记者站被美军炸毁；伊拉克战争中它的记者多次被取消随军采访资格，在巴格达的办公楼遭到美国导弹袭击时，记者塔里克·阿尤布不明不白死于炮火。

阿联酋的阿布扎比电视台和设在阿联酋的“阿拉伯人电视台”，在伊拉克战争中不仅崭露头角，而且在阿拉伯世界形成了气候，在世界舆论中也小有名气。有资料说，阿布扎比电视台属于阿联酋新闻集团，只有 130 多名工作人员，却派出 30 多名记者赴伊拉克做战争报道，而且专门成立了“报道伊拉克战争委员会”。

“阿拉伯人电视台”是由沙特“中东广播中心”联合黎巴嫩和科威特的投资者在不久以前成立的新闻台，设在阿联酋的迪拜。在这次战争中，他们派出 40 多人进入伊拉克做报道，力求观点中立、平衡。这两座电视台成立的初衷是与半岛电视台在阿拉伯地区进行竞争，但很快就直面伊拉克战争，以其在阿拉伯地区语言、宗教和历史渊源的各种优势，以其独家新闻和着重报道战争伤亡以及平民灾难的独特视角，赢得了阿拉伯世界的广大观众。

战争与媒体的关系给人以启迪：一是在战时，人们比任何时候更关注有关战争的报道，最能够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二是在战时，媒体的竞争比任何时候更为激烈，媒体的各种倾向和特点都毫无遮拦地

凸显出来，接受受众的评判和实践的检验；三是在当今信息时代，每个媒体都是属于世界的，它不在规模大小、地处何方，只要坚持报道的客观公正，办出特色，敢于竞争，都可以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媒体。

## 七 战争与记者

战争造就记者。有了战争，也就有战地记者（又称“随军记者”）。据资料称，最早的战地记者是英国《泰晤士报》的威廉·拉塞尔，1854年2月他随英国远征军赴马耳他采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战地记者。真正意义上的战地报道和战地记者形成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国成立了新闻管理和发布机构，开展宣传战和心理战，而且广泛运用了广播，成立了广播机构。

在世界各国战地记者的名单中，美国文学巨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欧内斯特·海明威有过传奇般的记者生涯；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都曾经有过战地记者的经历。中国的萧乾是二战国际报道著名的战地记者。

战争需要记者。靠他们记录和传播战争信息，沟通战争与社会的广泛联系，记录战争的灾难和历史。战地记者是一批特殊的记者，是一个危险职业，他们不仅要有记者的一般素质，更需要有勇气和牺牲精神。有战争就有死亡，记者也不例外。他们生活、穿行在枪林弹雨中，随时都有可能死于战火；他们是恐怖活动打击的重点目标，随时都有可能遭遇恐吓、绑架、失踪、暗杀，经受着生死的考验（尤其是美国记者，是恐怖袭击的目标）。据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统计，1999年全世界有33名记者以身殉职，其中10人死于塞拉利昂。2000年有62名新闻工作者成为“暗杀或谋杀事件”的牺牲者。2001

年有 24 名记者在执行任务中身亡<sup>①</sup>，其中意大利女记者玛利亚·库图利与西班牙《国家报》记者富恩特斯、路透社记者伯特和海达里 11 月 19 日在阿富汗遭到伏击身亡。2002 年全世界有 50 名记者遇害，其中有《华尔街日报》丹尼尔·珀尔在巴基斯坦被绑架杀害。2003 年在伊拉克战争中，截至 4 月 10 日至少有 9 个国家的 12 名记者死于战争。4 月 8 日美国炮火袭击了外国记者下榻的巴格达巴勒斯坦饭店，半岛电视台、路透社和西班牙电视五台的 3 名记者被炸死。

记者的生命不只属于他们个人，还有他们的亲人、朋友，他们所在媒体以及他们的国家。有人说媒体希望战争，笔者认为没有人希望有战争。“和平真好。战争离我们越远越好。”这是中央电视台赴伊拉克前线采访记者冀惠彦最深刻的体会。

### 我国媒体与战争的报道

在中国的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中印、中越边界自卫战中，都有许多战地记者随军报道，我国新闻界的许多前辈都是从战争的硝烟中走过来的，仅新华社先后就有 100 多名记者献出了生命。1991 年我国媒体走向世界，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专门派出记者采访报道海湾战争，在重大国际事件报道中开始有中国记者的位置和声音。在后来的科索沃战争中，我国有更多的媒体，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国际电台、《光明日报》等派出了记者。在伊拉克战争中，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多名记者到了战争前线，直接采访报道了战争的真实情况，这说明了我国媒体参与国际报道的能力和意识在迅速增强。走进战场，他们也必然面对许多风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在科索沃战争中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社记

<sup>①</sup> 见《环球》2001 年第 24 期薛永《勇敢的心》一文。

者许杏虎和朱颖牺牲。正如《参考消息》驻科威特记者洪漫所说：“当人们读着战地记者采写的一篇篇生动鲜活的文章时，却不知道他们冒着多大的危险，有时甚至是拿生命做赌注。”

我国媒体对伊拉克战争的宣传报道，有了开创性的进展。中央电视台用一、四、九套节目做滚动式报道或现场直播，信息量大，时效性强，不时地导入现场或外台画面，让观众直接了解战争情况和各种反映，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邀请军事和国际问题专家做现场评说，介绍背景。这是一种创新，一种有益尝试，大大提高了收视率，提高了媒体的品位，赢得了好评。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环球时报》等媒体也都做了充分的报道。网络媒体积极参与，信息量之大是空前的，网民在了解事实中增强了独立分析判断的能力。据有关媒体统计，网民有反战倾向的占70%左右，谴责萨达姆暴政的占10%左右，而处于中间状态的约20%。这次宣传报道和直播坚持了客观公正和平衡的原则，增强了公开性和透明度，有利于国内稳定和爱国主义教育；这次宣传报道和直播的成功，使中国媒体走进了国际媒体竞争的行列，取得了实践经验，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我国新闻媒体的潜力，有利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我国地位相称的媒体的影响力。

这次宣传报道也暴露出有些方面的不适应和准备、经验的不足；由于种种原因，真正在第一线没有我们的记者，所用画面多转自美国或其他媒体，难以全面反映战场的真实；对战争的评说把握得还不够平稳，其客观原因是战争本身充满变数，让人琢磨不定。为适应现代战争、提高战地报道和应对国际突发事件的能力，增强与国际媒体的竞争力，有计划地培养战地记者的适应能力，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开始注意到战地记者适应能力问题。现代战争比历史上的常规战争要求高得多，战时报道对记者有特殊要求，不仅需要勇气、胆量和牺牲精神，而且需要渊博的政治、军事、新闻和技

术知识，需要特殊的敏感和快速反映以及独立工作的能力；为减少记者伤亡，事前应对记者进行严格的战争训练，使他们能够熟悉战时报道要求，应付险恶的环境，增强独立生活的能力，尽量规避风险；完善技术装备、通信设备和安全设备（在伊拉克战争采访中，有些西方记者准备了防化学毒气装备，防弹衣服，防弹汽车，有的备有军刀甚至手枪等）；密切后方与前方的配合，建立快速有效反应机制。笔者注意到有的外国人提出，由于记者面临生命威胁，媒体机构面临巨大压力，派记者去前线有没有这个必要？能否另辟蹊径，通过高科技手段来做报道？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新课题。但战争不能没有记者，媒体不能没有记者，今后的竞争只会更加激烈。战争报道是媒体和记者最具竞争力的时刻，只有属于自己的记者才能真实地反映战争，媒体才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才能走进世界级媒体的行列。我们要千方百计保护记者，但谁也不能保证“零伤亡”。在伊拉克战争中，我们看到一批批记者坚持在第一线；我们看到有的记者倒下了，又有更多的记者迎上去。有的记者说：“我知道这里很危险，但这是我的工作。”“有幸报道战争题材，作为一名新闻人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 出访见闻



——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纪实

2000年5月9日，我和同事一行6人组成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代表团，踏上了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旅程。此行的目的是调研澳、新对外宣传的情况，思考如何向他们介绍中国，这就确定了访问的重点是澳、新新闻媒体。此次出访又正值悉尼举办第37届奥运会前夕，了解他们在奥运期间如何接待记者、报道奥运会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澳、新的历史并不长，但是他们的新闻史却不短，澳又是世界闻名的新闻集团的故乡。澳、新是西方世界的成员，他们的新闻观与传播方式具有西方传媒的特点，因此这也是了解西方传媒的一个机会，事实上过去一些疑惑的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答，对我们认识和借鉴西方新闻媒体有所裨益。

## 一 飞行途中看日出

我曾经到过一些国家访问，但能飞越赤道、走进南半球这还是第一次。首先遇到的是季节的变化，我知道北京的暮春正是那里的深秋。我们从北京乘飞机，一个半小时后降落在上海机场，稍事休息后开始了长途飞行，要在夜间连续飞行 9 小时 40 分钟、8800 公里后，才能到达悉尼。我欣赏澳大利亚驻华使馆的做法，他们没有为我们饯行，而是送给我们每人一套澳大利亚简况介绍，我在飞机上不停地翻阅，知道了不少情况。但长途旅行总是寂寞的，又是在夜间，可是一次日出，把我激活了，使我兴奋起来。

许多人看过日出。我也看过，看过多次，在山上看过，在海上看过，在飞机上也看过，那是 1970 年在地中海的上空，可最难忘的还是在太平洋上的这一次。当我一觉醒来，已是北京时间凌晨 4 点钟，按时差推算该是澳大利亚时间 6 点了。我模糊地意识到，快出太阳了。我推开机窗，果然天际已经发亮，有一层淡淡的橘红色，我想起过去观日出的壮观，想把同伴们叫起来共享。可我又突发奇想，南半球的太阳也是从东方升起吗？后来我弄明白了，太阳还是从东方升起，所不同的是，在北半球看太阳是东南方向，而在南半球则是东北方向；正午看太阳，北半球的人向南看，南半球的人向北看。

我的同伴在酣睡，我请航空小姐把他们叫醒，小姐去看了看转回来说，他们睡得正香，不好打搅。我说，睡觉天天睡，可看日出机会难得。小姐莞尔一笑：“日出也天天有啊。”我想，也许这些小姐见多不怪了，可对我们太难得了。等我把同伴叫来时，海天相接之处已出现淡淡的红色，像是镶嵌了一道金边。他们惊叹“哇，太美了”！有的忙取过照相机，准备拍照。这时，红色越来越浓、越来越大，细心的人看出，似乎从大洋底下被鼓开一道道裂缝，裂缝中滚动着“岩浆”。“太阳会

从那缝中冒出来吗？”大家相互猜想着。果然不错，大约过了10分钟，“岩浆”中突然冒出一个耀眼的亮点，随即喷射出一道道金光。亮点渐渐升高，红红的，由小变大，把半个天映红了！我们旁若无人地欢呼起来，“太阳出来了！”，忘记了满舱的人还在睡觉。

太阳升高了，变大了，真红，真亮！我们几个人中，有的还从没有见过日出，见过的也说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景象，都情不自禁地欢呼“太好了，太奇妙了！”。我是见过的，但没有这么真切、绚丽、壮观，天空净得一丝云都没有，一切都袒露在视野中。也许因为是在大洋上，也许是因为飞机飞得高，也许是因为空气污染少，我从这些“也许”中寻找着理由。连航空小姐也被吸引了，她说过去也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日出，“你们可真有运气！”。

红球越变越大。奇妙的是光亮却由火红变为金黄，射出万道金光。真的是金光，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赤金”，绝对是百分之百的成色！从机舱窗口看去，形成了巨大的金色光柱，不，是光环；不，是由一圈圈光环组成的金色隧道！金亮金亮的，耀眼。有人形象地说过“时光隧道”，这是不折不扣的“金光隧道”。我马上想起了“北京有个金太阳，照得大地亮堂堂”，真的，是金太阳，太阳最亮最美时是金色的！我叹服有人观察得竟是那么细微真切。如果不是亲见，真想象不出，总以为太阳是火红火红的。

太阳缓缓上升，逐渐在变圆，猛地跳出了水面，光线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白、越来越刺眼了。然后开始变红，成了红太阳。我关上窗户，赶紧记下下面这段文字。

我们处在兴奋中，睡意顿消，掩卷沉思。

太阳升起来了，万物沐浴着阳光，新的一天开始了。

日出，壮观的日出，迎接了我们的来访。

## 二 游悉尼湾见故人

对于澳大利亚我并不陌生，但总给人一种遥远的感觉，越是这样越想去看看。我们是应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的邀请去访问的。澳的首都在堪培拉，离悉尼有三个小时的汽车路程。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悉尼。

我们一早到达，因为下榻的饭店要到中午才能腾出床位，我国驻悉尼总领事馆的赵晓林领事建议我们先去游览，这也正好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开车的也是我们的同胞，兼做向导。游览的首选目标自然是悉尼湾，这是悉尼的脸面。我们在电视中看到过悉尼湾，那是在悉尼庆祝申办奥运会成功时，北京人正在悲伤流泪，他们在围着悉尼湾倾城欢庆；那是在迎接新千年的時候，世界几大电视台联手转播，悉尼是南半球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这里的悉尼大桥、悉尼歌剧院和悉尼塔被称为“悉尼三宝”，是悉尼人、也是澳大利亚人引以为傲的地方。这一天的天气又特别好，我们先后从陆地、海上、白天、夜晚，在不同的时间从各个角度把悉尼湾看了个够。

悉尼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城市，有 400 多万人，占了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山、水、岛、树把城市打扮得多彩多姿，看起来很干净，朋友戏说“澳大利亚的苍蝇都可以吃，腿是洗过的”；澳大利亚人不杀生，蟑螂横行，个头也大。据司机讲，这里的胖人多，个个都够重量级。我在堪培拉见到一位女同事，她也太瘦了点，我便随口说了一句：“你应该再胖一点好。”她颇有几分得意地说：“这样才好，澳大利亚人就怕说他胖。”

到悉尼后的另一大发现是中国人多，到处是。我们从上海上飞机时已经感觉到了，但还是估计不足。游悉尼湾同船的 90% 的游客是我们的同胞，操着南方北方的“故乡音”，彼此相视而笑。异国他乡，南腔北调也亲切，以语识人，交谈中才知道，有些人竟来自西安，是大

西北人。后来，在墨尔本驻地宾馆，用早餐者 80% 竟是祖国同胞。在一些旅游点，到处是我们熟悉的黄面孔，一种温馨之感油然而生。

这些年人们的口袋鼓起来了，有的人先是走出家门，到县外、省外，到国内的名城大川去旅游观光，成为传媒争相报道的一道风景。后来他们渐渐不满足了，开始走出国门，到新、马、泰；不久胃口越来越大，又看上了澳大利亚、新西兰，也不管漂洋过海，路途遥远了。这可是几千年都不敢想的事。真不知人们下一个目标又瞄向了哪里？我们议论：谁说我们中国人不懂得旅游，不会享受？外国人议论：“中国人这是怎么啦？人这么多，出手那么大方？”我三句话不离本行：“这就是对外宣传。”司机同胞告诉我们：“中国人爱把钱带在身上，常常是小偷盯的主要目标。”

### 三 服务就是报道

悉尼奥运会在即，悉尼已经成为国际舆论的热点，自然成为我们访问的首选目标。我们参观了为悉尼奥运会新建的中心场馆、新闻中心和奥运村，这些银灰色的建筑，从设计造型、技术设施到柔和的色彩，都很有现代气息和时代感，与周围的景色浑然一体，成为悉尼新的景点，反映出悉尼的设计水平，也反映出澳大利亚的经济实力。离奥运会开幕还有 4 个多月，场馆建设已经就绪，而且对游人开放，他们说，场馆公开，让民众了解我们的设计方案、建筑质量，这也是对场馆设施的实地磨合和检验。

之后我们会见了悉尼奥运会组委会总部的负责人，彼此首先谈起了奥运会的筹备情况，谈起了场馆的建设，交谈的重点自然是有关奥运会新闻报道和记者管理的话题。他们在许多方面与我们有共识：记者重要，记者难管，记者得罪不起，这件事一定要做好。我谈了多年

积累的体会：“要办好一项大型国际活动，有两个条件最重要，一是要把活动本身搞好，二是要宣传报道好，两个好加在一起是真好。如果活动搞好了而没有报道好，是不及格；如果活动不甚理想而报道好了，就是成功。”接待我们的组委会国际部部长约翰·博文和总经理、媒体主管密尔顿·考克波恩都以为然。考克波恩说，萨马兰奇主席曾经多次告诫奥运会主办国组委会，一定要好好地照顾新闻媒体，因为他们是最后决定奥运会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考克波恩说，一般认为运动员是最重要的，但是媒体认为他们才是最重要的。记者可以得出与运动员完全不同的结论，运动员认为“比赛太精彩了”！而记者可能会说“糟糕透了”！而绝大多数受众不在现场，他们是听媒体怎么说的。

如何才能做到让记者报道好？他们认为，新闻报道的开放性是办好奥运会的条件之一。他们从筹备工作开始，对新闻报道就是开放的，及时把奥运会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向记者吹风，介绍给国际社会，既满足了记者，又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舆论氛围，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为此，他们成立了媒体小组，最初有十几个人，负责向国内外媒体发布有关筹备工作进展情况的信息。媒体认为他们有权知道有关任何信息，但由于诸多原因，有的信息是不能对外的，有的涉及安全或商业机密。使组委会感到困难的是，国际新闻媒体提出采访奥运场馆设施的时候，也正是施工和准备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但也尽量做出安排。我们访问时，他们正在设计一种完善的机制，能够更方便地为记者提供服务。从距离奥运会一个月开始，将全天候地为记者工作。

对奥运会期间的报道，过去的普遍认识是，主办城市主要为记者的现场采访报道准备好技术条件，把劲主要用在采访报道的现场上。在同他们交谈后，我更感到了场外和幕后服务的重要。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允许多少记者来采访，决定权在国际奥委会，而主办国最需要做的事就是为记者服好务。应该说，对于现场的比赛早有固定的安排和程

序，目前的技术通信条件足以满足记者报道的需要，硬件设施比较容易准备。难的是软件。媒体多样，报道千变万化，记者抱有各种想法，主要应该做的是人的工作，按照他们的说法是通过满意的服务让记者满意，让满意的记者做出满意的报道。悉尼奥运会的主办者很清醒，他们把精力既用在赛场之内又用在赛场之外，花了很大工夫设计如何服务好外国记者。我们到访问时，他们根据报名初步统计，告诉我们到时来采访的文字和摄影记者约有 5500 名，其中有 4800 名是来自澳大利亚以外的；广播电视记者约有 11000 名，还有 3000 名广播电视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外国人。为此，他们安排了 200 多名工作人员和 2000 多名志愿者，分别为文字、摄影记者和广播电视记者服务。

他们在环境优美的奥林匹克公园设立了“记者中心”，在每个运动场建立了方便记者报道用的服务设施；他们专为记者建起了“媒体村”，可为 6000 多名记者提供住宿；他们尽力为记者的吃、住、行提供各种方便。考克波恩直截了当地说：“公交设施运转良好，准时将记者运到场馆，有关技术操作没有问题，保证接待工作彬彬有礼、耐心周到，宾馆饭店提供良好的住宿和餐饮，记者能及时得到运动项目和比赛结果，这样记者们就会比较开心，写出的报道也会比较积极。”他说，“最深刻的教训是 1994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记者们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他们就会写一些不好的故事，发泄对运动会的不满”。

关于比赛报道的本身，他们介绍说，对于体育记者，最好的营养品是事前为他们及时提供有关奥运会的筹备信息、背景材料、历届奥运会的数据、运动员的介绍和照片等，耐心地回答记者感兴趣的问题，组织记者参观和熟悉运动场馆。在运动会期间，他们将集中提供所有场次的广播电视讯号，哪些场次需要直播或录播，由各自选择；他们采用多种形式，随时报告最新的比赛进程和结果，不仅让记者了解自己感兴趣的比賽项目，而且能了解比赛全貌，供记者选用。

对于奥运会以外的报道主动安排。一般来说，在奥运会开始两周以前，有些记者陆续来到悉尼，记者有的是时间和精力，不仅关注奥运会，而且关注澳大利亚的各个方面，找一些与奥运会无关的题目做文章，甚至专挑毛病，对此不能“堵”只能“导”。考克波恩说，记者的采访报道都是有任务的，你必须千方百计地“喂”他们，你不让他们吃饱，他们就“到处找食吃”。我们也希望记者多报道澳大利亚，但我们更希望记者发回的报道是客观的、平衡的，为此你要为记者着想，主动为他们安排好，主动为他们提供“食品”。“记者得罪不得。你要想让记者报道好，就要为记者提供全套服务。”听了他们的介绍，我明显地感受到，要搞好活动以外的报道，宜多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变被动为主动；要善待记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服务就是宣传报道。

我在与考克波恩的交谈中谈起了历史。我说，当年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北京和悉尼进行过友好的竞争。当悉尼沉浸在一片欢乐中时，正是北京为落选难过之时。这次来访看到你们如此精心准备，我祝贺奥运会的比赛和新闻报道都取得圆满成功，两者成功才是真正成功。彼此的谈话活跃起来，他们一再询问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进展情况。他们说，悉尼对北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衷心祝愿北京申办成功！

悉尼奥运会时，他们的宣传报道是不是完全按照设计方案做了，记者是不是满意，我没有直接参与报道，也没有做过全面调查，但听到的负面意见和抱怨不多，萨马兰奇认为悉尼奥运会是迄今办得最好的一次奥运会，我想其中也包括新闻舆论在内。访问归来，我即写了报道，现在登载于此，悉尼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都已成为过去，但这并不重要，它对我们的启发不是一时的，也不只关乎体育。

## 四 “形象司”：如何应对记者？

澳大利亚十分重视自己的国际形象。据介绍，他们从“二战”后开始向外介绍澳大利亚。起初，澳大利亚的对外宣传独立于外交和贸易部。1987年后并入外交贸易部，他们自称是因为国小人少，机构必须精简。我们就是应外交贸易部的邀请去访问的。这个部里设了一个旨在让海外了解澳大利亚的司，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形象司”。我们到达悉尼后，这个部的公共外交司司长和形象司副司长克里斯从堪培拉赶来欢迎并宴请我们。据克里斯介绍，形象司的职能有三项：一是向国内受众和媒体介绍澳大利亚的政策，回答他们对有关政策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疑问；二是针对对澳大利亚产生负面影响的国际舆论做出回应。他说得很认真：他们通过驻外使领馆和互联网收集负面信息，一旦国际上出现对澳大利亚的抨击，有损形象，他们就做出快速反应，为此建立了对负面影响进行控制的机构“损害控制司”；三是积极主动地对外介绍澳大利亚，在世界树立澳大利亚的良好形象。他强调后一项很主要，澳大利亚由于地理环境与外界接触不多，国际社会时常产生对澳大利亚的误解，政府十分重视对外宣传。在堪培拉与外交贸易部会谈时，我们彼此都认为，形象司的职能与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职能很相近，相互有一种知音认同感，很谈得来。

他们认为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外部形象不仅关系到政治、关系到外交，也直接关系到经济和国家安全。要树立澳大利亚的良好形象，由国内媒体介绍自己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多与外国媒体打交道，通过他们介绍澳大利亚。他们说，这样做最有效，外国记者出面说话的效果要比自己出面好得多；反之，如果做不好，负面影响也大得多。为此，外交贸易部在悉尼成立了“澳大利亚国际媒体中心”，专门从事与国外媒体的联系。我们访问了这个中心。中心的负责人尼娜女士原

来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工作，她很精干、很敬业，也很热情。

她开宗明义地说，国际媒体中心是政府联系外国记者的桥梁，主要职责是向来访问的记者提供服务。从她的介绍看，他们的主要做法是，经常组织记者招待会，或采取工作午餐的形式，向记者发布新闻；接受澳大利亚驻外使馆的推荐，安排接待一些外国记者或新闻机构的访问；对记者提出的问题，负责与有关方面联系，提供答案或安排记者直接采访；向记者提供有关新闻的背景资料；通过自己的网站介绍为记者服务的内容。给人的感觉是，尼娜女士介绍的这些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各国媒体管理机构通常的做法，但其中的区别是有的想到了、做到了，有的只是想到了而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媒体中心是认真的。

她谈了一个观点很有新意：记者到澳大利亚来采访，一般目的明确，对所采访的问题准备了大量的背景材料，而且做了深入的研究，他们来采访只是要取得现场的材料，只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报道角度。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满足他们的要求，帮助他们找到这样的材料和角度。听了她的介绍，我想就此谈一点感想：接待记者要重视研究记者的需求，不能只当作事务性的工作，多做有效的劳动。花钱费力把人请来了，尽量把工作做得好一些，力求有一个好的效果，通过引导记者来引导舆论。

我们了解到在媒体中心工作的人不多，做的事却不少。除日常事务以外，他们配合政府某些政策的出台和敏感问题，主动组织一些活动。我们访问时，正赶上澳大利亚政府公布年度财政预算方案，由政府出资，国际媒体中心组织了一个外国记者团到首都堪培拉，听财政部部长吹风并采访部长。尼娜女士说，这一活动的效果特别好。她着重强调，我们负担了这次活动的全部费用，是从政府财政支出的。用这种方式资助记者，使记者不必为经费花费精力，把心思集中在参观采访上。

尼娜女士说类似的活动经常有，他们有一个“国际媒体访问项目”，每年邀请一些外国记者来访，由政府资助。视不同的情况，对记者采取四种不同的做法：一是邀请记者自费来访，他们安排接待；二是由他们提供记者在国内外的吃住和交通费用；三是由他们全包，包括国际旅费，一般是邀请高级记者；四是专门邀请少数著名高级记者、资深记者，不带任务，时间较长，通过参观访问感受澳大利亚。她很坦诚地说：“当然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写文章、写书介绍澳大利亚。”我说这是个好主意，由资深记者写文章、写书更具权威性，影响广泛而长远。我说，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记者访问澳大利亚，最好成为你们第二、第三类的邀请对象。大家相视而笑。形象司副司长克里斯对我们说过，他们向记者解释政策和提供材料，不是为了把记者的观点改变过来，而是让他们更多地了解政府的立场。

我提出另一个问题，与媒体打交道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时常会遇到很难打交道的记者，记者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你们如何应对？尼娜女士耸了耸肩膀，她想了想说：这方面我们也不能说有成功的经验，记者来自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所提问题是在变化的，任何人都难以做到使他们都能满足。当不能满足时，我们会尽量给记者提供联系采访的线索，让他们可以找到能够解决自己问题的对象，或者给他们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让他们自己寻求答案。显然，她还没有完全回答我的问题。在以后的访问中，我们从多方面了解到，他们一般采取提供情况、资料，联系采访主管权威部门和人员，事后进一步答复的做法。我们在访问新西兰内政部传播办公室时，媒体顾问弗莱明说：在新西兰，面对记者，一般情况下要避免用“无可奉告”之类的话，“不加评论”、“不予置评”的说法，被认为是不诚实，有意掩盖事实。

澳大利亚政府和有关部门，也经常搞一些大的活动。我们在堪培

拉访问澳大利亚通信、信息技术和艺术部时，他们集中向我们介绍了政府正筹备澳大利亚百年庆典的事，依然是着重国家形象的塑造。他们做了认真的准备，说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澳大利亚从 1901 年 1 月 1 日才开始统一，澳大利亚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准备通过百年盛大庆祝活动，对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多民族的凝聚力；对外扩大澳大利亚的影响力，树立澳大利亚的形象。他们介绍了开展活动的指导思想。我说，对你们开展这一活动的意义，我非常理解，你们的用语和措辞与我们开展类似活动的提法几乎一样。大家都笑了。

## 五 扑朔迷离的新闻观

澳大利亚是除南极外地球上被发现最晚的一块大陆。从英国皇家海军的詹姆斯·库克船长 1770 年 8 月 28 日登上澳洲算起也不过 230 多年，如果从 1901 年 1 月 1 日组成澳大利亚联邦算起才只有 100 多年。而由费尔福克斯家族 1841 年创办的《悉尼先驱早报》算起已有 160 年的历史；在澳排行第一的《先驱太阳报》成立于 1850 年，该报最初由现新闻集团总裁默多克的父亲管理。今天的澳大利亚媒体发达、技术先进，报刊、广播、电视、通讯社和互联网等，使其信息畅通、反应敏捷。

澳大利亚是西方世界的主要成员之一，媒体的新闻观和管理方式虽不是最典型的西式，但具有西方媒体的基本特征。了解媒体也是了解世界，不仅便于媒体交流，也便于寻求我国外宣受众的接受方式。其间我们访问了十几家最有代表性的主流媒体，如《悉尼先驱早报》、《澳大利亚人报》、《先驱太阳报》、《星期日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及其所办的电台和电视台、SBS 电台和澳大利亚联合通讯社等，并同新闻主管部门和新闻机构进行了交流探讨。

彼此谈的最多的是新闻媒体与政府和公众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澳所有新闻媒体都强调自己的“客观公正性”和“独立性”，而且信誓旦旦。但对其中的许多矛盾又没有一个满意的解释。

问及新闻媒体的报道意图和政治观点，他们总是谈新闻报道的具体操作，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什么倾向也没有，只是为新闻而新闻，为赚钱而赚钱。澳大利亚联合通讯社(AAP)总编辑汤尼·沃尔米坦言：“我们不提供任何带有倾向性的产品。”《悉尼先驱早报》国外总编辑哈密什·迈克唐纳德说，他们选择新闻的标准是靠一种“直觉的感觉”，“任何渠道提供的消息都可以选择”，但“是以不牺牲我们的新闻报道原则为前提”。他们的报道原则是“客观”、“平衡”，报道格言是“是新闻就发表”。他表示不支持、不歧视任何特定的一方，报道积极面也报道消极面。但他着重强调，正常的事不是新闻，稀奇古怪不寻常的事才是新闻，他们更重视负面报道，对于那些受到压迫、遭受灾难的事件，往往体现出一种同情，给予更多的报道。当我们抱怨澳媒体报道中国的消息太少时，他幽默地说：也许是中国领导人太完美了，没有显示出个性化、情绪化的一面，可报道的新闻不多；按照我们的报道原则，如果报道中国的消息多了那就不好了；如果上头版多了，那就严重了。

他们强调“客观”、“平衡”的原则，但他们对国际新闻信息源的选择倾向是值得深思的。他们多次说明，自己派出的驻外机构和记者有限，许多信息购于国外，主要来自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西方媒体的报道。这也是他们有关中国报道的主要信息来源，《悉尼先驱早报》等都直截了当地说，他们登载的有关中国的报道“是经过美联社、路透社过滤了的消息”，对于来自中国的消息则“基本不采用”。不难看出，信息源直接影响着舆论导向。

澳所有新闻媒体都强调自己的“独立性”，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

四力量”。不论是政府出钱办的公共媒体还是自负盈亏的商业媒体，都竭力表白与政府划清界限，不受政府和任何集团的影响，自己对所报道的事做独立判断，并以经常与政府“唱反调”为荣。以言论著称的《澳大利亚人报》声称记者的报道和报纸的言论不反映政府的立场观点，甚至也不完全代表编辑部，“所表现出的倾向性，主要是采写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报道和言论没有引导作用，只属一家之言，目的是引起大家的讨论。AAP是澳大利亚唯一的全国性通讯社，总编辑汤尼·沃米尔说：“AAP与政府的关系只是商业关系，政府是我们的客户。作为报道机构，我们也报道政府的活动，除此之外，我们与政府没有其他任何关系。我们不会因政府喜欢与否而为其撰写某方面的消息。”

这种表白是一种实质性的还是策略性的考虑？媒体在经济上的独立性愈强，与政府的关系就会愈远，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如果说作为自负盈亏、独立生存的商业媒体，强调其“独立性”不足为怪的话，作为政府机构的“国际媒体中心”是如何对待这一问题呢？尼娜女士告诉我们：他们是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但从效果考虑，并不想让人认为是政府的宣传机构，那会引起公众的不信任。他们的做法比较巧妙，政府官员来这里发布消息，只说是利用他们的设备。她补充说，事实上我们也把场地和设备出租给其他人。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是政府的广播机构，同时是管理广播电视的机构，不做广告，完全由政府出资，每年预算5亿澳元（合人民币25多亿元，他们仍嫌经费不足）。ABC网络电视总经理容德松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是政府拨款的机构，但我们并不直接受政府的管制，在报道上ABC确实是个独立机构，我们经常发表一些言论批评政府的某些做法。

我的同事似乎迷惑不解，澳政府是很在乎自己的形象的，怎么会对“出钱挨骂”这样的傻事呢？我讲了1986年我出访美国前，当时

的美国驻华大使洛德讲过的一段话。他说，“美国之音”是由国会出钱办的，可美国之音有时候骂国会，有的议员提出，不应再给美国之音拨款了，哪有拿钱买骂的？洛德问我对此有什么看法。我说“骂比不骂好”。他和夫人包柏漪哈哈大笑，说“我同意你的看法”。容德松先生听后，认真地想了想说：“当然，我们会想到我们是由政府出资的，如果政府部门听到使他们不高兴的报道，他们可能会减少或不再提供预算，这是比较可怕的事情。但这种不愉快的事情还从来没有发生过。”事实上，我们在访问期间，澳国内炒得最热的新闻是政府公布本年度财政预算，各大媒体争相报道，都是在支持声中从各自的角度谈一点不足，以体现标新立异、与他人的不同。

关于中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的问题被多次问到。我强调两方面，中国媒体对国家对社会负有高度的责任，它们同时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以正面报道为主，对政府实行的对国家建设和发展有好处、对人民有益的事，新闻媒体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报道，这种支持有助于社会各方面对政策的理解、推动和实施，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另一方面，对各级政府行为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批评监督，这几年加大了这一舆论力度，各种媒体都设有这类节目和栏目，最有影响的是CCTV的《焦点访谈》。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达到同一个目的，宣扬正确的，揭露批评错误的，进行正确舆论引导。他们听了有些惊讶，在西方许多人的眼里，似乎中国的媒体没有批评监督作用，或者政府不允许媒体进行批评监督。

澳媒体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媒体与公众关系，都是千方百计迎合、“讨好”公众，这是资本主义竞争的产物。澳新闻互动集团总经理多佛把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比作如“足球比赛的甲乙双方一样，我们是对手”。《先驱太阳报》说，媒体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争取读者，二是争取广告，争取读者也是在争取广告。民众是媒体赖

以生存的基础，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就无法支持编辑部的工作。发行量对一家报纸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谁赢得了读者，谁就赢得了市场，赢得了广告。我们努力使报纸更具商业化，确保内容更适合大众。

民众强调自己的“独立判断”（尽管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受着舆论的引导），因此媒体投其所好，以一种“客观公允”、尊重事实的面貌出现，尽量避免说教或发号施令。《澳大利亚人报》介绍，“我们报道和反映政府的观点，也反映民众各方面的观点，尽可能地把两个方面都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做出自己的判断”。“现在民众对政府持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而对媒体的态度更强烈，他们未见得相信媒体告诉的一切事情，他们只把我们的观点作为一种讨论或辩论的工具”。媒体认为，民众是具体的，他们生活在一个地区、一个州、一个国家、一个世界上，报纸要多报道与他们自己有关的、最关心的、最感兴趣的事情，提供了解和交流的介质，提供他们表达观点和讨论的途径。

商业媒体把赢利看作是否经营成功的标志。AAP总编辑沃尔米说，通讯社是商业运作机构，以利益驱动为目标，以赢利为目的。他直言不讳：最重要的运作是能够赚钱。凡是愿意付钱的他们都提供服务。“哪里有购买者，我们就把市场转向哪里；哪里能产生价值，我们就把目标投向哪里。我们非常简单的经营哲学是，不无偿提供任何东西。网站上的所有信息都是收费的。”当我们询问“你们在采写和选择新闻上，是否也以这一原则决定取舍”？，他们做了否定的回答：“我们可卖的产品是新闻，所以制作的产品一定是可靠的。产品的制作只能遵循新闻本身固有的原则，而不能受商业利益的驱动，把不受任何不良影响的新闻卖给读者。”他们再三重复：我们的宗旨是向市场提供服务，当然是不以牺牲我们的新闻报道原则为前提。对此，我们疑惑不解。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要能够解决既坚持新闻原则又能满足公众兴趣相左

的矛盾，操作起来非常难”。一些媒体担心，“随着信息流动的商业化，信息的真实性将大打折扣”。

澳大利亚是互联网发展名列前茅的国家。在堪培拉政府办的文化网站主要用于对外宣传，他们为我们做了详细演示，认为，互联网的竞争使对外宣传更需要精品。新闻集团在悉尼建立了新闻互动集团，这是一个纯互联网的媒体机构，拥有访问量最多的网站。总经理多佛先生认为，网站现在不是花钱去创建新的内容，去找新点，而是从各方面调动信息，然后进行打包。他说，从商业价值看，都说互联网是一座金矿，可现在谁也没有淘到金子。但网上服务前景光明，尽管现在还很难赚到钱，但他们都会加大对互联网开发利用的投入，争取在竞争中占有较大的份额。《先驱太阳报》认为，互联网是传统媒体的竞争者，35岁以下的年轻人已很少看报纸。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认为，互联网的发展使广播在世界范围内都面临着挑战，美国之音等对外广播的收听率都在大大下降。但也普遍看好，传统媒体会保留，相互补充，利用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手段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对于互联网的管理，“政府正在制定一些规范措施来限制其负面影响。在澳大利亚，网上色情对青少年是有影响的，我们采取了审查制度”。

## 六 行业性隐蔽管理方式

澳大利亚媒体真的是无目标无定向的“导弹”？记者是无人管的“无冕之王”？其实，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他们的管理缜密有效，只是管理方式有所不同，一切运行隐蔽而巧妙。

一是政府控制着媒体的主要信息来源，这也是媒体离不开政府的原因之一；政府如何用好手中的信息资源，是影响媒体和媒体导向的重要手段，他们多采取公开新闻发布和幕后吹风的方式。

二是政府制定法律并派驻机构进行管理。如对政府办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政府任命一个委员会进行管理，监督ABC是否按照规定完成工作。而ABC董事会具体落实委员会的要求，为ABC的报道方针制定一种准则、一种标尺，用来规范员工的行为，以此确保ABC报道的平衡。对澳大利亚商业性广播机构的管理，则由澳大利亚广播管理局制定行业规范。

三是制度管理。据澳大利亚联合通讯社讲，他们有新闻审查制度，叫“新闻媒体会议”，规范和完善媒体行为，定期审查媒体的报道，对违规者点名批评。

四是行业管理，由新闻媒体和社会资深人士组成非政府的各种行业协会，制定职业道德规范，接受民众投诉。

五是人员职责和素质管理，强调媒体自检自率。他们更看重编辑，尤其是资深编辑。媒体的主编、编辑处在重要位置，日常稿件的采用大权在编辑手里，“他们对新闻有一定的选择和控制权。每天对内容和报道立场的选择取决于编辑，往往是根据编辑的变化而变化。”而“编辑是有自己的标准和经验的”；所有的新闻从业人员都要具备与职业相称的素质和经验，否则就不适合做这项工作。

六是在政府的周围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权威撰稿人，政府时常向他们透露些背景材料和“内部情况”，由他们来引导媒体和舆论。

给人总的印象是，政府的直接干预、直接管理不明显，而是遵循媒体规律完善制度、规范行为，实行间接管理和行业管理，以媒体管理媒体，以舆论引导舆论，已成为媒体和民众接受管理的习惯方式。

## 七 多元文化与报道中国

澳大利亚有独特的文化，它源于欧洲文化，尤其是不列颠文化，

后来随着移民的增多，逐步发展成为多元文化。据记载，在 30 多年前，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一种白人的民族同化政策，受挫后放弃了这一政策，因为政府不可能强迫人们放弃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特色，又找不出一种典型的能具备澳大利亚人形象和特点的文化让大家所认同，所以多元文化就成了澳大利亚文化的特性。澳大利亚有 40% 是海外移民，多元文化政策将是一种长期的政策。新闻就是一种文化。反映这一文化的典型是澳大利亚多元广播公司（SBS）。SBS 的宗旨就是向所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人传递本土和来澳定居前母国国内的信息，使他们能够了解澳大利亚和他们的母国所发生的事情，使他们不割断与母国的联系，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澳大利亚人。SBS 每天用 68 种语言播放 120 多个国家的节目，其中包括华语普通话和广东话的节目。SBS 的口号是“一个国家多种语言，是多元文化的统一；多种语言相当于一种语言，多种民族相当于一个民族”。节目的设置是以语言为基础，而不是以国家或民族来区分。SBS 是 ABC 的一个补充，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广播公司。

19 世纪中叶，“淘金热”吸引大批的移民到了维多利亚洲，许多华人相继到此，华人为澳大利亚的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维州的一个城市就是华人建起来的，至今在巴拉腊特附近的小镇还竖立着一个纪念碑，纪念这些开拓者。2000 年时澳大利亚的华人有 50 多万人，占澳多民族中的第四位。

我们在澳大利亚经常能够看到和听到 SBS 的电视和广播节目，看到 CCTV 的第四套节目，看到普通话教学。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我们没有陌生感，我还接受了 SBS 广播电台的采访。SBS 节目的设置是按人口普查统计数字的多少来分配播出时间的，如在华人中，讲普通话的人是讲广东话的二分之一，电台每周播出 6 小时的普通话节目，播出 8 小时的广东话节目，这样避免了时间和时段分配上的矛盾。他们

告诉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后几代的母语已经退化，他们在招聘节目主持人时一般都选择新的第一代移民。我认为，他们的普通话播音水平是不错的，柔中有刚，有些中央电台之风。SBS 的华语广播与中国的许多电台有密切的联系，如与中国国际电台、中央电台以及上海、广东、江苏、陕西等电台都建立了联系。

在澳大利亚有众多的华人媒体，从报纸、期刊到广播电台应有尽有。他们从各自的角度介绍着中国，消息是灵通的，但他们主要采用的是西方通讯社对中国加工了的报道，认为更适合他们的新闻观和报道口味。我国互联网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方便条件，不仅直接阅览，而且成为华文媒体的重要信息来源，促使我们尽力办好对外新闻网站。墨尔本是华人华侨居住比较集中的城市，我们在那里与华文媒体记者举行了座谈，并接受了华夏传媒集团中文电台的现场直播采访，回答了他们关心的问题，介绍了祖国新闻媒体改革发展的现状。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几年中澳两国的关系才有了比较快的发展。两国领导人高层互访增加，贸易往来、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不断增多。国家关系的确立和起伏是与各自国家的利益相关的。在交谈中我们彼此开诚布公，澳方非常关注中国，首先是关注两国的经贸发展，看重中国的大市场。澳大利亚有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国际尤其是在西方贸易中的回旋余地不大，需要寻求和扩大新的贸易伙伴，他们意识到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位置和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我们当然也有自己利益的考虑，增进关系的愿望是相互的。经济贸易和国家利益，是中澳相互连接的纽带，是相互关系的基础，并决定着未来的发展趋向。舆论环境对于相互关系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随国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

实际上舆论宣传与国家关系和经贸往来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要滞后得多。访问中我们明显地感到，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声音有了加强，

但依然很弱，与中国人对澳的了解不成比例，在澳媒有限的报道中，客观的、正面的、实事求是的报道并不多，多数是不了解、不理解，甚至是误解的负面报道占上风。他们对中国最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得到的回答似乎在意料之中。正面报道多在友好访问、友好交往上，在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和体育、饮食上。负面的报道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在热点问题上，其他问题处于两者之间。我们也了解到一些政府官员、社会知名人士，甚至媒体人士到过中国的甚少，不了解中国的今天，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存有不少的疑虑或误解，这些“开放的国家”并不开放。一位华人朋友给我讲过这么一件事：一位澳大利亚地方官认为中国贫穷落后，他就想带这位官员来中国看看。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这位官员简直不敢相信周围的一切，冲他发火：“你把我带到了什么地方！”“这就是中国的上海！”他解释说。许多人对中国不了解，但他们却表现出对中国的好奇和兴趣，表现出想了解中国的愿望。我们的外宣工作很有潜力。

## 八 西方媒体批评国家领导人之谜

新西兰是一个遥远的国家，但并不陌生。别的不说，只是那一片绿草地、遍地的牛羊、鲜美的牛肉，就够叫人向往的了。这是大家从电视和饭馆里都能领略到的。

访问了澳大利亚之后，我们从墨尔本乘飞机3个半小时后抵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从“惠灵顿”这个名字上就不难看出，新西兰与英国有着很深的渊缘。新西兰属于西方移民的国家，居民多是欧洲人后裔。

我们一下飞机，就有一种异样的发现，海关人员牵着警犬围着游客转来转去，进了海关又有人牵着警犬在转，这是别的国家看不到的一道风景，令人毛骨悚然。使馆的同志告诉我们，警犬是在搜查外来

农产品和毒品。新西兰是一个农牧业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态环境，他们绝不允许带外国农产品和食品进入，这对他们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游客中如果有人携带，必须事先填表声明，交由他们处理，否则一经查出，处置非常严厉。

在新西兰，处处在加深着农牧业国的形象。大自然的恩赐，得天独厚，从南到北，整个国家是一个牧场，是一个绿色的自然公园。一会儿下雨，一会儿雨过天晴。深秋季节依然如春，碧绿的牧场一块接一块，之间用矮矮的木桩相隔，一群群的牛羊在悠闲地吃草。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些牛羊从生下来就在牧场，白天黑夜，一年四季，从这块草地吃到那块草地，直到被送进屠宰场，中间很少用人管理，牧羊犬反而比人还灵活，更有“权威”。对于这个只有380多万人口的国家，只靠牛羊这一项，吃穿就不愁了。牛羊还是主要的出口产品。联合国认定，新西兰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

的确，如果只是满足温饱，在新西兰可以过得很快乐。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如果做进一步了解，就会发现，他们也有许多美中不足的地方。与新西兰朋友交谈，他们感到市场繁华但没有什么大工业、重工业，经济实力并不厚实；市场狭小，且已饱和，发大财的机会不多；地处岛屿，与外界联系多有不便，在全球化时代更为凸显。据说，在香港回归前，有港人对回归后不放心，把家迁往新西兰，后来发现不对头，就把家安在新西兰，然后到别处去发财，有的又把家回迁到香港。新西兰新闻、文化界的同行也认为，新西兰并不是做学问的理想地方，人们对外界了解不多，且又过于自信，有一种优越感。这些，不能不制约着他们的的发展。他们说，他们也在加大改革开放。

新西兰是一个媒体发达的国家。据了解，广播、电视、报刊的人均拥有量都是高的，那时有几十家报纸，几百家杂志，允许外国办广播电视台。媒体竞争激烈，真正影响媒体市场的是两三家主流媒体，发

行量最多的《先驱报》有 21.3 万份。媒体的报道强调新西兰特色，但主要反映西方的价值观。这些媒体如何生存？回答是媒体产业经营，靠广告还过得去。

政府与媒体之间采取积极接触的政策，吸引媒体报道政府想要表达的内容，主要形式是举办新闻发布会。据官方新闻机构介绍，他们避免对记者使用“不加评论”、“不予置评”、“无可奉告”的说法，这容易被认为是有意回避或掩盖事实，并对记者不够尊重。新闻从业人员不多，他们与政府机构之间非常熟悉，相互沟通极为方便。官方新闻机构介绍说：“在新西兰，公众往往认为官方发布的新闻是一种宣传，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而由私人公司为政府提供报道会避免宣传的味道，提升公众的信任程度。”新西兰是个地区小国，其国际影响不大，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不多，外派记者很少，在国际报道中没有专门的记者，主要是从大国通讯社获取消息，如路透社、法新社，报道的重点是美、欧、澳；没有长期驻华记者，涉华报道来源于路透社、法新社等西方主要通讯社或澳大利亚的报道，所以主要传播西方的观点，媒体也是以西方的观点来看待中国，正面报道不多。他们对中国了解甚少，却误解颇深，尤其是在西藏、台湾、人权等问题上更为突出，西云亦云，但又特别自信，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晚邮报》政治编辑布伦特·爱德华说：“很多人通过媒介认为中国是一个不适合旅游的国家。”

新西兰对新闻媒体的管理分几个层次。政府对媒体竞争不加干预，只是宏观管理。新西兰在信息开放的体制下，政府出台了新闻法，记者的行为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和约束。另一种是行业管理，这是主要的管理方式。如“新西兰新闻媒体评估委员会”，是对各种媒体进行评估、管理、规范的非政府机构，既保障新闻自由，又促使自律，对违规者实施处罚。新西兰的“记者联合会”，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规范教育，并由媒体出资成立的“媒体委员会”监督媒体，如有报道失实，

促使媒体向受伤害的一方道歉，如不道歉，受伤害者可向媒体委员会投诉。委员会的负责人一般由前任大法官担任。新西兰的“广播规范委员会”，主要对广播电视进行规范和监督。第三是媒体自率，规范职业道德，如果报道了不应该报道的内容，如暴力、色情等，要自己检查纠正。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一些媒体谈及与政府和政府领导人的关系。《晚邮报》政治编辑布伦特·爱德华的一席话有代表性。他作为政治编辑经常与新西兰政要打交道，他告诉我们，他经常出入总理府，与总理是好朋友，但不影响他撰写批评或反对总理的报道，而且经常这样做。他说，他正在写反对总理新政的报道。我们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总理执政以来，所实行的政策越来越偏向于平民，使一些财团受到损失，他们感到有压力，这不利于稳定社会制度。他说：“我们反对总理，是反对某一个人，不是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而恰恰是在维护我们的制度。如果换一个人，他的政策会对社会更有利。”他这番不在意的话，揭开了我们的一个谜团，西方媒体为什么能够大胆地、公开地批评他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除了不同政党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与竞争以外，一个共同的原因是他们把当政者与其社会制度不等同看待，制度不能变更，而当政者可以变更，个人不等同于制度，“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们是看谁更能够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更有利于维护他们的社会制度。如不能，反对个人不是反对，而是维护制度。

由此我们想到，我们在与西方记者打交道中，他们会经常抱怨某位执政者，开他们的政治玩笑，甚至可以批评、反对国家最高领导人，但却没有听到过他们抱怨其社会制度，而是在维护他们的制度，这正是他们的政治高明之处。

## 九 访问后的几点思考

我们的对外宣传要进行战略性的思考。我们向世界介绍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主要面对的是西方世界。而西方世界实行的是经过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在政治统治中有了一套法制、经验和运作方式，有了一套与其体制统一的新闻理论和运行机制，并为公众所认可，成为公众的思维定式，对另外的新闻理论和运作方式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我们面向他们介绍中国，既要以我为主，又应“投其所好”，尽量做到报道我们的事实，顺应他们的报道形式和接受习惯。

我们的对外宣传面对的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强大的资本主义新闻体系和强大的舆论，处在资本主义舆论的包围之中。相对而言我们又是少数、是弱者。我们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的不同将长期存在。我们对外宣传的方针是正确的，立足点是增进他们能够客观地了解中国，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消除误解和偏见，为我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而不是改变他们的观点。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任务，我们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我们应该主要依靠自己，着重研究如何更有效地介绍自己。

外宣的成功是一种综合效果。根本是加强国家的经济建设，是国家的强大，“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宣传中要尽量寻求利益的共同点和关注的焦点，如中澳之间的经贸和亚太情结，澳的多元文化也为我们介绍中国提供了方便条件。在多种手段中应首推互联网，是重要的信息源，应集中力量办好。导向由信息源始，我们应想方设法多提供对外有用有效的信息。方式多种多样，应多做主流媒体的工作，许多人想来而没有来过中国，来过与没来过大不一样，特别是应邀请一些主流媒体的老板、主编和编辑。这不是新鲜看法，是许多人的共识，问题在于能不能做起来。我们把人请进来，不能都叫人说好话，他们

对中国会有不同的看法，出现反面的声音不足为怪，不是天天有大量负面报道吗？再增加一点也不多，只要是善意的都是正常的；也必定会增加正面的声音，有了两种声音总比过去只有一种好。

从全局考虑，区别对待。美欧是我们对外宣传的重点。澳、新的价值观新闻观，都是属于西方的，其重大的外交和舆论行动受到西方大国和传媒的影响。澳、新的涉华舆论环境取决于西方大国的舆论环境。美欧不变澳、新亦不变，美欧变澳新亦变，不论积极的或消极的变化都是这样。对待澳、新涉华负面报道，除了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外，对有些问题不必事事相对。要做好澳、新媒体的舆论工作，应着重做好美国等西方大国的舆论工作。

对敏感和热点问题，我们要充满自信，理直气壮，如关于人权问题。也不要怕别人揭短，过于看重他人的评说，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和承受力，与“国际接轨”应有大国心态。越是这样，越主动，避免炒作，有助于我们的客观形象。